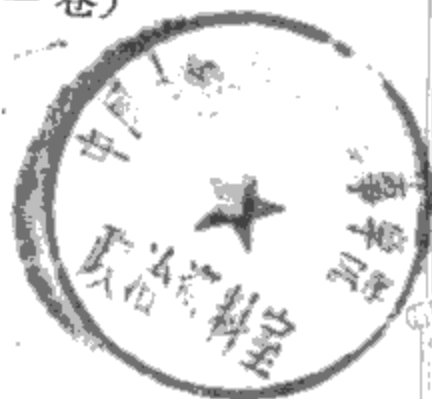


2 021 0970 7

普列汉诺夫
哲学著作选集

(第一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二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5 年版译出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一卷)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56 號

五三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¹/₃₂ • 印張 29⁷/₈ • 插頁 6 • 字數 627,000

1959 年 6 月第 1 版

1962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5,001—15,030 定價(六) 3.90 元

統一書號 2002 • 114



原出版者的話

这部普列汉諾夫著作的五卷集，收入了著者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哲学著作。

在头三卷里收入了有关与民粹主义、修正主义和馬赫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保卫和論証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第4卷里收入了普列汉諾夫关于俄国哲学的和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最优秀的著作，第5卷所收入的是关于文学和艺术問題的著作。

普列汉諾夫著作的原文是根据保存在列宁格勒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国立公共圖書館附屬的普列汉諾夫紀念館的俄文和外文著作手稿和当时发表过的原文重新校訂过的。

每卷都附有緒論、說明事实性質的注释和人名索引；此外，在第5卷里并載有全部五卷的索引。

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是在普列汉諾夫紀念館的参加下，在姆·依奧弗黜克、阿·馬斯林、普·費多謝也夫、伏·福米娜、巴·察金等所組織的編輯委員會的监督下，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

整理原文和編纂注释工作是由耶·柯茨、依·別林基、斯·菲尔索娃、巴·雅柯布逊等做的。

目 次

原出版者的話	
伏·福米娜:普列汉諾夫及其在保卫和論証馬克思主义 哲学中的作用(緒論)	1-49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51-118
序 言	51
我們的意見分歧	119-409
給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代序)	119
导 言	137
(一)人們怎样責备我們	137
(二)問題的提法	141
(三)赫尔岑	143
(四)車尔尼雪夫斯基	146
(五)巴枯宁	165
(六)特卡乔夫	175
(七)結論	181
第一章 一些历史資料	187
(一)俄国的布朗基主义	187
(二)吉荷米洛夫	190
(三)*“劳动解放”社	201
(四)在和*“劳动解放”社斗争的吉荷米洛夫先生	207
(五)資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212

(六)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	223
第二章 俄国资本主义	238
(一)国内市场	238
(二)工人人数	244
(三)家庭手工业者	254
(四)家庭手工业和农业	263
(五)家庭手工业者和工厂	265
(六)俄国资本主义的成就	268
(七)销場	271
第三章 资本主义与公社的土地所有制	274
(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	274
(二)公社	276
(三)我国公社的分化	280
(四)民粹派的理想的公社	290
(五)圈地办法	302
(六)小土地所有制	312
(七)結論	313
第四章 资本主义及我们的任务	316
(一)行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質	316
(二)“夺取政权”	340
(三)“人民”革命的可能后果	349
(四)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之间的 搖摆	367
(五)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的可能后果	379
第五章 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真实任务	382
(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打耳光”	382

(二)在工人中間的宣传	392
第六章 結論	406
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綱領	410-415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綱領第二草案	416-420
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煩惱	421-465
(对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的回答)	
作者的話	421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466-469
(1889年7月14—21日)	
〔第一草稿〕	466
〔第二草稿〕	467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	470-501
〔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終結》一書俄譯本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譯者的話》	
和注释〕	502-563
譯者的話	502
〔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费尔巴哈……》一書俄譯本第一版	
所写的注释〕	504
〔原校訂本第一版的注释〕	558
往时的有产者	564-566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	567-809
第二、三版序言	567
第一章 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	569
第二章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	580
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594
第四章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	626

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	669
结 论	779
附录一 再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論“三段式”	810-818
附录二 对我們的反对者講几句话	819-863
注释	864
人名索引	928
后記	950

普列汉諾夫及其在保卫和 論証馬克思主义哲学 中的作用(緒論)

俄国第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是一个最卓越的思想家和評論家。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他以論述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历史的卓越著作出現在俄国和国际舞台上。普列汉諾夫在他的著作中捍卫、論証并通俗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深刻地闡发并具体化了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論上的一些問題，如：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思想体系的作用，等等。普列汉諾夫在論証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

他的有关哲学史、美学史、社会政治思想史方面，特别是有关唯物主义史和俄国哲学史方面的优秀著作，是他对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所做的伟大貢獻。

列宁認为普列汉諾夫是最通晓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称普列汉諾夫的哲学著作作为国际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最优秀著作。

列宁关于普列汉諾夫写道：“他的个人功績在过去是巨大的。在二十年間，亦即在 1883—1903 年期間，他写了大量的卓越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馬赫主义者和民粹派分子的著作。”①普列

汉诺夫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哲学遗产，这些遗产直到今天还有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事业，有助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



普列汉诺夫开始其社会政治活动和文学理论活动的时期，恰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俄国革命形势成熟的时期。

刚刚结束的俄土战争（1877—1878年）使俄国人民经受了許多严酷的考验。战争明白地暴露了专制地主制度的不可医治的痼疾，暴露了军事和行政机关的专横跋扈、无法无天、贪污盗窃、克扣军饷等等弊端。这一切都激起了饱受沙皇政府、地主、资本家的惨重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更高的愤怒。

这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在1861年的改革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在工业方面已经确立，并逐渐深入农村，引起了农民的分化。农民失地现象，为工业和地主—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造成了自由雇佣工人的大軍。农业生产中为专制地主制度所支持的农奴制关系残余，以及在国内个别地区依然保存的自然经济的要素，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缓慢地，然而使人痛苦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使地主的统治保存达数十年之久。在改革后的农村中，农民的小私有的、小生产的个体经济占着优势；国家依然主要是个农业国。

在保存地主专横统治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劳动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对抗。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333页。

基本农民群众由于受到农奴制度和资本家的双重压迫，而饱受耕地不足、农奴制残余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痛苦，并日益陷于破产和贫困。因此，六十年代后半期稍趋消沉的反抗地主的农民运动，自七十年代中期起又重新加剧。

工人阶级的处境也极其艰难。不知餍足的资本主义剥削、工资的低微、保护劳动的立法的缺少，以及对建立工人组织厉禁和警察的专横——这一切都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和自发的风潮。七十年代中期，俄国出现了最初的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企图使自发的工人运动组织起来。

这时的俄国工人运动是跟当时在俄国解放运动中占主要地位的一个派别、即建立了“土地与自由”组织的革命民粹主义不相干的。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是在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革命的民粹派，虽然他们的世界观具有局限性，却在俄国解放运动中起过卓越的作用。他们为解放农民、为消灭专制制度和贵族特权进行了忘我的斗争，想把农民发动起来反抗沙皇政府。“民意”运动是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革命民粹派反对地主和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顶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民意”派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为人民忘我牺牲的精神给以崇高的评价。他们两人曾指出：革命危机正在俄国日益增长；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开始转移到俄国。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普列汉诺夫译）序中强调说：“……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①。

改革以后，俄国革命家跟西欧革命运动的联系扩大了。在半个世纪当中，亦即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革命的俄国密切注视着西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3页。

进步理論思想的发展，吸取了西欧各国劳动者的革命斗争經驗。俄国的先进人物都研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69年用俄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1872年出版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俄国的革命民粹派分子（拉甫罗夫、洛巴廷、查苏利奇等）就俄国的經濟和政治发展問題，以及俄国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問題，跟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密切的書信往还。

普列汉諾夫在他的社会活动的初期曾参加过革命的民粹派組織。

格奥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汉諾夫于1856年12月11日（新历）生于唐波夫省利彼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他的父亲瓦連廷·彼得罗維契·普列汉諾夫是一个小貴族。他的母亲瑪丽亚·費多罗夫娜（別林斯基的亲戚）是一个具有先进观点的人，她对自己的兒子曾发生巨大的影响。1873年普列汉諾夫自沃龙涅日陸軍中學校毕业以后，曾在彼得堡的康士坦丁諾夫士官学校学习数月，然后于1874年入矿业学院学习。

1876年，普列汉諾夫参加了民粹派的“叛逆者”小組，这个組織后来并入“土地与自由”組織。他是1876年在彼得堡卡贊大寺廣場上举行的俄国第一次政治示威的組織者。彼得堡工人第一次参加了这次政治示威。普列汉諾夫在示威大会上发表了揭露专制制度的热情洋溢的演說，捍卫了当时在流放中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从这时起普列汉諾夫就处于秘密状态中。他工作的地方彼得堡公共圖書館（現名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圖書館），成了他的《alma mater》^①和避难所。

年輕的普列汉諾夫是車尔尼雪夫斯基和別林斯基的热情崇拜

^① 意即“母校”。——譯者

者。他把他們看做自己的真正的先生和导师。別林斯基的文章的丰富思想內容使普列汉諾夫极为惊佩；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作品和革命的英雄主义也鼓舞普列汉諾夫去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普列汉諾夫后来写了許多有关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別林斯基、車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活动和創作的著作，是并非偶然的。

普列汉諾夫在自己活动的初期曾是一个民粹主义的理論家。作为民粹派的宣传家，他两次“到民間去”筹划起义，相信通过农民革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正象他自己所說的，他也非常关心“工人事业”。他領導工人小組，出席工人集会，帮助組織罢工，在《土地与自由》杂志上发表文章和通訊，撰写有关大規模工潮和罢工的传单和小册子，号召工人参加斗争。跟俄国工人的亲密交往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普列汉諾夫認清工人階級在革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八十年代初，普列汉諾夫由于認真研究馬克思主义和西欧工人运动經驗的結果，終于明确理解了这种作用并且轉到革命无产階級的立場上。

从八十年代初起，即自亚历山大二世被安德列·日里雅波夫和索非亞·皮罗夫斯卡雅所領導的民意党人暗杀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治下出现了黑暗反动的年代。民粹派的革命恐怖的浪潮被打退了。革命的民粹派被粉碎了。在九十年代，民粹派已經轉变成宣传与沙皇政府妥协和放弃革命斗争的自由主义派別。

普列汉諾夫曾两度(1877年和1878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而于1880年又因日益加紧的迫害而被迫流亡国外。1882—1883年，普列汉諾夫成为信心坚定的馬克思主义者。八十年代末他跟恩格斯建立了个人的联系。

1883年，普列汉諾夫、查苏利奇、德依奇、阿克雪里罗得和伊格

納托夫在日内瓦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組織——“劳动解放”社。它的任务是用俄文翻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当时在俄国占統治地位的民粹派学說，借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劳动解放”社給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理論基础，并且大大地促进了俄国先进工人政治觉悟的成长。

列宁曾經着重指出，“劳动解放”社在“因躲避書报检查而在国外出版的著作，第一次有系統地用各种实际的結論来解說了馬克思主义思想”^①。

1895年4月，列宁为了統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革命工作而到国外去与“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列宁此行对于俄国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劳动解放”社第一次与俄国建立了正規的联系。

把传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当做自己終身事业的普列汉諾夫，在流亡法国、瑞士和意大利期間，展开了坚持不渝的政論活动。他还发表各种題目的講演和学术报告。还在1882年，普列汉諾夫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譯成俄文；1892年，他用俄文翻譯出版了恩格斯的小册子《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并且加了自己的注释；翻譯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的一章——《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八十年代初，普列汉諾夫写了一些論述革命馬克思主义的卓越的、富有独創見解的著作，教育并培养了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

列宁的学生和战友加里宁曾用下面这些鮮明的話語來說明普列汉諾夫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在那黑暗反动的时期，当普通工人要遭遇很大困难和化費非凡努力才能学习到初步文化的时候，在工人团体中就已經流传着出于格奧尔基·瓦連廷諾維奇手笔的地下出版物。

这些著作给工人阶级展示了新的世界，号召工人阶级去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用明白的、简练的、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笔法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些著作以对工人阶级理想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念使人确信，走向这个理想的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阻碍，都将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轻易扫除净尽。”^①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普列汉诺夫在西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当中占着一个显著的地位；他被国际公认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工人运动的权威活动家。许多年间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主义局中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经常向它彙报俄国的形势。他也积极地参加了德国、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的政治活动，以及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和书记处的工作。

他写了许多有关俄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以及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问题的广泛范围的评论。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俄国的秘密出版物上，以及德国、保加利亚、法国、瑞士、意大利、波兰等国的社会主义报刊上。

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批判，在为奠定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具有极大的意义。

从八十年代初起，在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对俄国知识青年具有很大影响的条件下，普列汉诺夫反对了无政府主义和它的冒险主义策略。但是他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观点当中，没有阐明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以及关于国家的一般问题，因此受到列宁的批评。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0卷，第225页。

② 《彼得格勒市社会局通报》，第40号，1918年6月12日（新历5月30日）。

在西欧的馬克思主义者中間还未曾有一个人举起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旗帜。这一点由普列汉诺夫做到了。他还批判了米勒兰、毕索拉奇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他在俄国反对机会主义派別“經濟主义”和反对玩弄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丑剧“合法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举世聞名的。他为揭露社会革命党人、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个人恐怖策略，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在反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反馬克思主义派別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馬克思的經濟学說。他在闡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反对了欧文、圣西門、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和蒲魯东、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等的小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他反对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經濟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和司徒卢威主义的那些名著固不消說，就是他的《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觀》、《論現代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宗教》、《外部观察》、《工人的四个演說辞的序言》和《內部观察》等等著作，也証明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問題的深刻研究。

在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論敌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分析了斯密和李嘉图这些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古典作家的观点的社会实質，捍卫了馬克思的經濟学說，特别是关于剩余价值和資本的革命学說。

在老一輩的馬克思主义者的生活当中，普列汉诺夫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他在俄国的革命团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

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紀初起，在資本主义的发展上出現了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动荡和革命搏斗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社会民主党重新修改旧的工作方法和急剧改变自己的活动，要求全面地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使之适应新的历史条件。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普列汉諾夫虽然捍卫了并論証了馬克思主义，但是他未能闡明新的历史时代的性質，未能揭示它的規律性和特点，未能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經驗并用新的理論上的結論和原理来武装工人階級。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諾夫变成了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之轉上孟什維主义立場，他在这个时期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际上所表现的不彻底性，在不少的程度上是受了盛行于西欧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影响。普列汉諾夫站在孟什維克的立場上，在馬克思主义的許多极关重要的政治問題上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維克。这些問題包括：无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及其策略路綫問題；对待农民的态度問題；1905年革命的評價問題；关于国家的問題；等等。由于在政治上轉向孟什維主义，普列汉諾夫在哲学上也犯了許多重大的理論錯誤，在許多問題上脱离了彻底的馬克思主义。

普列汉諾夫虽然在工人階級的政治和策略的根本問題方面站在孟什維克的立場上，但是直到1909—1912年仍然主张保存党的組織，反对取消主义，保卫党的秘密組織，支持列宁为党所进行的斗争。

普列汉諾夫反对取消派分子在1912年所召开的八月代表會議。列宁曾經強調指出这一点，說普列汉諾夫曾直截了当地表明：参加这次代表會議的都是“非党分子和反党分子”^①。

1908—1912年，当布尔什維克在列宁领导下对馬赫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在第二国际的理論家当中只有普列汉諾夫一人发表了反对波格丹諾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揭穿了把唯物主

① 參閱《共产党人》杂志，1956年第5期。

义庸俗化了的舒里雅齐科夫等人。这时，他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一有价值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尖锐地批判了柯罗齐、马赫、阿芬纳留斯、彼特佐里特、文德尔班、里凯特、柏格森、尼采，以及其他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这些年代里，他打退了“路标派”和“寻神派”对俄国先进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的解放传统的进攻。但是在1912年普列汉诺夫成了与取消派“团结”的拥护者。列宁曾经写道：“他自己不能说明应该跟谁团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团结；但是他现在却因这种说教断送了他分裂时期反对取消派和在马赫主义猖狂时期反对马赫主义的巨大功绩。”^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普列汉诺夫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结束了三流的生活，回到俄国的彼得格勒。

由于长期流亡国外，普列汉诺夫脱离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回到俄国以后，他仍然迷信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理論，不能弄清俄国社会发展的复杂错综情况和特点。大家知道，他是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的。他根据第二国际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必须逐渐成熟的教条来判断俄国革命的命运，说什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文化的“高度水平”，等等。他认为，1917年的二月革命，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应该给资本主义在俄国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因此，普列汉诺夫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抱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对一切历史规律的破坏”。普列汉诺夫虽然坚持否定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反对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和苏维埃政权。1918

^① 参阅《共产党人》杂志，1956年第5期。

年5月30日，普列汉诺夫逝世于芬兰皮特凯雅尔非疗养院，葬于列宁格勒沃尔科夫陵园的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坟墓近旁。

* * *

资产阶级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侵入工人革命运动，在十九世纪末叶曾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在西欧，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不仅有资产阶级的教授如唯心主义者和折衷主义者布倫坦諾、桑巴特、舒尔茨—赫維尔尼茨之流，而且有那些追随他們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黑赫柏格等人。当时在俄国虽然还很少有人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但是却不仅有地主君主国家的官方思想家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教授，而且还有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以及后来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企图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使它庸俗化，公开地或隐蔽地诽谤它。

在这种条件下，普列汉诺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就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这些发表在俄国或外国报刊上的著作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论证了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极其伟大的科学内容和革命内容。

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必然胜利的普列汉诺夫，以勇敢无畏的精神对各种各样“批评”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展开了斗争。他在俄国破天荒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卓越地分析了民粹派的错误观点，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反驳民粹派的空想，指出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从而使民粹主义受到了极其强有力的打击。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曾受到列宁的崇高评价，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本书不仅尖锐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而且明白地表述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著名原理的深刻意义。这本书还谈到把俄国的革命斗争同那被正确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普列汉诺夫的这本小册子在九十年代被译成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

普列汉诺夫的其后的著作，如《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也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样，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最卓越的理論著作。

普列汉诺夫在这些著作里面第一次（对俄国说来）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改革后俄国的经济关系，阐明了俄国革命运动的迫切要求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他揭露了跟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民粹派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反动本质。

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继续批判了民粹派的整个理论体系，特别是批判了他们的经济“理论”和对俄国农民问题的错误观点。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称《我们的意见分歧》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部社会民主主义著作”。恩格斯也对普列汉诺夫的这本著作备加推崇^①。

他的一部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写于伦敦（他是在1894年被法国放逐后不得不到那里去的）。列宁说这部书“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308—311页。

与这部著作的主题有关的，有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写于1894年，1896年在斯图加特用德文出版，在国外享有很大的声誉）；《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写于1891年，最初也是用德文出版的。恩格斯曾誉为卓越的著作）；以及其后年代所写的其他哲学著作。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在俄国是用别尔托夫的笔名公开出版的。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据普列汉诺夫自己说，故意给它起了个“蹩脚的”名称叫“一元论的”，而不指明到底讲的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被译成许多国文字的这本书立即风行一时。恩格斯在1895年1月30日写道：“格奥尔基的书出得非常及时”^①。1895年2月8日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您能够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无论如何要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②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书中主要地谈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问题。他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等人的论战中，提出了揭穿主观社会学的唯心主义的任务。

普列汉诺夫的上述著作以及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其他著作，都明白地说明了他的马克思主义造诣之深，以及对哲学思想史和社会思想史的渊博知识。这些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以往先进社会思想基础上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它的来源和组成部分，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问题。在同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特别是实证主义和康德主义）以及“经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给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许多富有独创见解的新论据，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得到具体化和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俄文版，第336页。

② 同上书，第338页。

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在列宁組織“工人階級解放斗争协会”以前、在他从事丰富多彩的馬克思主义理論活动的时期所写的优秀著作，都包括在本版《哲学著作选集》的第1卷中。

* *
* *
* *

在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的斗争中，普列汉诺夫捍卫了哲学和历史中的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和历史过程的辩证法。

普列汉诺夫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务，首先在于闡明馬克思主义适合俄国历史条件这一原理。

关于俄国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关于俄国“应该”或“不应该”通过資本主义“学校”的問題，是民粹主义的經濟理論中的主要問題。

主观主义的民粹派分子認為，俄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因为資本主义仿佛是“人工移植”到俄国来的，所以它对俄国經濟制度說来是偶然的，是一种沒落和倒退。所以，应该“遏制”和“阻止”資本主义的发展，使資本主义“不再摧毁”俄国生活的永恆基础。民粹派的这个立場是反动的，它實質上是要保存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残余。

民粹派分子在他們議論資本主义不能在俄国发展的时候，企图歪曲馬克思及其在俄国的信徒的观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硬說，馬克思不加分別地把自己的历史公式应用于俄国；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仿佛也不加批判地搬用了馬克思的这些“現成的公式”，忽視了足以說明俄国的不同于資本主义的“独特道路”的事实。米海洛夫斯基、沃龙佐夫等人宣称，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論在某种

程度上只适用于西欧国家，而完全不适用于俄国。

与民粹派对馬克思主义的評價相反，普列汉諾夫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馬克思主义完全适用于俄国的經濟和政治的条件。

为了揭露民粹主义的經濟理論的全部錯誤，普列汉諾夫把資本主义在西欧产生的条件和所起的历史作用同它在俄国发展的条件加以比較对照，闡明了資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中发展的一般前提，从而証明了把俄国同西欧对立起来是錯誤的。他指出了民粹派关于俄国經濟发展“特殊”性的神話的全部荒謬性。普列汉諾夫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中，对改革后俄国的經濟关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資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了深刻的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本书列举了許多历史事实和統計資料，來說明俄国各个不同領域的經濟生活。它卓越地論証了外国資本向俄国的滲入、小手工业对商业資本的日益增长的依賴、手工业者的无产階級化过程，以及小手工业生产向家內大生产的轉化。普列汉諾夫写道：“資本主义却走着自己的路，繼續打击独立生产者，使得他們連自己不穩固的地位也保持不住，用它‘在西方’实行得最有效驗的同样办法来在俄国創造工人的队伍。”^①

普列汉諾夫还以同样的說服力揭示了資本主义向农村經濟的滲入，以及“农民世界的支柱”即公社的瓦解。

民粹派分子从小資产階級的立場上来反对資本主义，認為公社是不可摧毀的堡壘，是防治資本主义的一切病患的万灵药，是使俄国可以越过資本主义而逕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們把資本主义以前的生活方式加以理想化，对现实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价；正如普列汉諾夫所写的，他們的言行恰似絲毫不懂生活的辯

^① 本卷，第266頁。

証矛盾的形而上学者。他們侈談什么沒有內部矛盾的“人民的”生产，而人民則是某种冥頑不靈的群众。他們撇开历史現象的现实发展和变化来形而上学地看待历史現象。

民粹派分子不願意去看公社的衰落和瓦解过程。普列汉諾夫在《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中用事实証明了：公社只是在它還沒有脫離自然經濟条件的时候才显示出无可怀疑的生命力。公社之开始衰落，并非由于不以公社为轉移的外部条件的影响，而是由于內部原因，由于“貨幣經濟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已經在慢慢从根摧毁公社的土地所有制”^①。

普列汉諾夫深信，俄国沿着資本主义道路发展，并不象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外部力量或促使它走上这条道路的神秘規律，而是因为事实上沒有一种內部力量使它能夠摆脱这条道路。他說：“我們社会生活的整个进路都趋向于資本主义”。

根据对俄国现实所作的分析而得出的主要結論，就是私人資本主义大生产正在俄国一往直前地扩大着、发展着，而民粹派关于莫名其妙的“人民生产”的幻想以及其他空想的观点，却被生活本身所打破了。

普列汉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証明：“乡村公社，就它內部的組織性質來說，首先是力求讓位給資產階級的共同生活方式，而非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乡村公社’所起的不是积极的作用而是消极的作用；它不能推动俄国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②。

普列汉諾夫的最大的历史功績，就在于他在研究俄国經濟发展道路的同时，給俄国階級力量和階級斗争性質的問題作了馬克

① 本書，第277頁。

② 本書，第382頁。

思主义的解决。民粹派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人民”理想化。他们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忽视无产阶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第一个用关于俄国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历史作用的学说，反驳了民粹派的空想。

民粹派的立场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就是工业在俄国仿佛根本没有发展，因此微不足道的工人阶层仿佛也没有增长。

普列汉诺夫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革命家必须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无阶级这个与最先进的生产形式即大工厂生产相结合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上面，而不应该寄托在农民身上，因为农民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少数的剥削者和多数的劳动者”^①。

普列汉诺夫在我国第一个证明了工人阶级必然要在俄国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起主要的作用。“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只能由我们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担任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己自觉的努力才能达到。”^②

普列汉诺夫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前途的这个信念，明显地表现在1889年他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中。他那时宣布：“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当它是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我国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出路的！”^③

庸俗经济学家认为社会政治制度只具有极微小的意义。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驳斥说，凡是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地

① 本卷，第313页。

② 本卷，第382页。

③ 本卷，第467页。

方，这些阶级的利害矛盾就必然要导致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因此，劝告工人只进行经济斗争而忘却工人阶级的政治任务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说，这不过是一条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的路线。只有反对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才是解决工人阶级的历史解放任务的唯一道路。这一斗争将以革命这一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和达成社会的社会经济改造的手段而宣告结束。

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正在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荒谬观点。民粹派认为，俄国既然仿佛没有资产阶级，从而它可以避免资产阶级革命，而俄国农民又有着向往共产主义的趋向，所以俄国具有实行人民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条件。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没有经济上的前提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俄国即将来临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认为将来终将争得政治自由的工人，必须在农民当中进行革命工作，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

但是，因为普列汉诺夫认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正在没落，所以他沒有估計到争取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而农民必定要在这一斗争中起巨大的进步作用。

还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中，就常常提到农民的消极性、非政治性和保守性。这个谬误证明了他对农民的革命潜力估计不足。后来他对农民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的错误的孟什维主义观点就是从这里发展来的。

八十年代初，当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运动还正处在胚胎发展过程中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卓越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所表述的革命活动纲领，是当时在俄国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的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布拉果夫、托契斯基和布鲁斯涅夫等人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成员(他们当时在俄国做实际工作,并且与“劳动解放”社保持着联系),都非常推崇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他们指出了这些著作在当时动摇涣散状态下宣传革命理论的意义,并且要求“尽量多和尽量快地”寄给他们这种小册子(指《我们的意见分歧》和《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

拟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当时的一个迫切的要求。在1884和1887年,普列汉诺夫分别草拟了两个这样的纲领草案。第一个草案包含许多错误的论点,如:承认个人恐怖、“英雄”崇拜以及其他民粹主义的残余。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布拉果夫等人的)曾认为这个草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二个纲领草案要比较正确些。那里面提到通过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之转为公有来从资本压迫下完全解放劳动,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目的;而这只有在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才是可能的。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认为,在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中有着为社会民主工党纲领所完全必要的成分^①。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两本著作,完成了巨大的历史任务。俄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两部著作的影响下把自己的视线和希望转向工人阶级,力求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政党,并且进行各种活动来帮助工人阶级起来去与资产阶级地主制度进行斗争。普列汉诺夫“向俄国革命者指出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②。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直到九十年代中叶才得以诞生。九十年代,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① 参阅《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卷,第212页。

^② 参阅同上书,第242页。

上到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时在俄国，两个伟大的力量即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溶合在一起了。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新时期是跟列宁的名字，跟他所创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俄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的活动分不开的。

* * *

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活动的意义，并不限于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应用于俄国的历史条件，也并不限于在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中捍卫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极力保卫、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带给哲学的一切新东西，并力求使之通俗化。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局限性，给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提供了说明。

普列汉诺夫说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最伟大的革命。”^①他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看做全部社会思想史发展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看做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认为马克思的革命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表现。

普列汉诺夫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并且揭示了它的真正内容。这在当时说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论敌想把历史唯物主义贬低到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水平，用各种各样的反科学理论如种族主义、

^①·本版第2卷(《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

馬尔薩斯主义、“因素”論、地理論等来頂替它，或者根本閉口不談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这一事实。

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書中，普列汉諾夫跟那位“沒有注意”馬克思的历史理論、甚至为了坚持主观主义而力图抹杀馬克思的天才思想的米海洛夫斯基进行了論战。普列汉諾夫指出，历史、經濟、政治关系史及文化史方面的許多专家虽然对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无所知，可是他們得出的結論却明白地証明了馬克思的理論。普列汉諾夫确信，必将有更多的发现来証明这个理論。“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理論則我們坚信其相反：‘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証实，不論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①

普列汉諾夫不止一次地写道，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是十九世紀理論思想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馬克思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績。馬克思以前沒有一个人能够給社会生活的历史提供正确的、具有严格科学性的說明。馬克思破天荒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的发展，創立了关于社会的科学。

同时，普列汉諾夫还強調指出，唯物史观，作为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成就之一，不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認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要素”是錯誤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必須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前提。

普列汉諾夫明确地、令人信服地闡明了馬克思的哲学理論、社会学理論和經濟理論的有机“統一”，揭示了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之間的密切的相互关系，表述了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統一的、严整的革命世界观的特点。

普列汉諾夫在闡述馬克思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观

^① 本卷，第762頁。

点的时候，一贯力求找出社会生活现象中的主要的东西，亦即这些现象的物质基础。他从这个立场出发，分析了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哲学观点，以及康德、斯宾塞、黑格尔、鲍威尔兄弟、费希特、魏正格伦等人的观点，并且强调指出了马克思的天才发现——唯物史观——纠正了马克思以前那些用唯心主义观点分析社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根本错误。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

普列汉诺夫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规律的看法。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先行者、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问题很感兴趣。普列汉诺夫曾着重指出，这些人虽然提出了个别的唯物主义的推测，但是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未能掌握社会发展中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从而揭露出人类活动的思想动机的根源。普列汉诺夫指出，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对历史过程作了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以自然规律的力量和铁的必然性起作用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证明了那些往往不为人所预见，但必然要在人的行动之后出现的、社会关系的改变，是按照确定不移的社会生活规律进行的。

人的活动及其思想和观点不决定于偶然的机遇。普列汉诺夫认为它们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而要想发现这些规律，必须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事实。只有那懂得过去的人，只有那看到历史事件的承续性和联系、看到这些事件的制约性，而不是看到一大堆偶然事件的人，才能预见到未来。

普列汉诺夫非常重视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说，把

辯証方法应用于社会現象就可以引导到革命。“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我們把人类历史看做合乎規律的过程，是應該归功于辯証方法的。”^①

普列汉諾夫曾經說道：这就是說，社会环境的性質也和地理环境的性質一样，很少取决于人的意志和意識。他強調了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就是到自然界中探求社会規律是不正确的。

應該指出，普列汉諾夫对于直到如今仍然广为流行的伪科学的資產階級“理論”也不是沒有加以批判。这些理論把生物学上的規律应用于社会，从而把社会进步归結为生物学上的进化。他嘲笑了实証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以及所有一切幻想用自然科学和通过对生理学規律的研究来改良社会科学的人，称他們为空想主义者。普列汉諾夫曾經写道，用这一观点来观察社会的人，必然要陷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因为生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动物学不能說明社会发展的特殊領域。

普列汉諾夫論証了，并強調指出了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区别。达尔文解决了动植物种的起源問題，而馬克思則解决了各种社会組織的产生問題。普列汉諾夫写道，如果达尔文曾經想用自己的生物学理論来解释社会現象，那是錯誤的。因此，当普列汉諾夫自己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書中說到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应用的时候，这显然是一种措辞不当，并不足以表示他对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間的相互关系的真正看法。

物質生产的客觀規律，階級斗争的規律——这是理解社会过程的內在邏輯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的鑰匙。社会現象的原因正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29頁。

是應該从这里去找。普列汉諾夫解释說，就是其他社会生活現象，例如思想体系，也都具有自己的特殊規律性。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思想史是合乎規律的、必然的过程。人类思想的发展也受自己的特殊規律的支配。例如，任何人都不能把邏輯規律同商品流通規律混为一談。但是馬克思主义者并不象唯心主义者那样，認為从思維規律中可以找出人类思想发展的終极原因和基本动力。思維規律并不能解决什么东西决定着新思潮的产生和性質的問題。要解释这类問題，只有分析社会生活及其在人的意識中的反映。

普列汉諾夫反对唯意志論而保卫馬克思主义决定論的行动，具有原則性的重要意义。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做必然的、合乎規律的过程，同时也看做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生活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之間存在着相互依賴关系。历史必然性并不排斥人的行动自由。馬克思主义者既然研究人类物質生活的客观条件，从而也研究人們之間形成的关系，以及他們的意志、理想和趋向。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論者硬說，人的意志和行动是自由的、不以社会条件为轉移的。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意志只是“仿佛是”自由的，关于意志完全自由的想法是人的一种錯觉。意志自由本身并不存在，它不过是認識了历史必然性，認識了發展規律的結果。在普列汉諾夫看来，个人的自由不仅取决于对自然規律和历史規律的認識，取决于是否能够服从这些規律，而且也取决于是否善于巧妙地运用这些規律。

普列汉諾夫說，撇开人的实践活动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同样錯誤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硬說馬克思主义是絕对的、形而上学的决定論。他們断言，在馬克思看来历史必然性是在那里自行发生作用而不容許任何人的干預的，因为他既然承認客观必然性的作用，当然就沒有人的自由活动的余地。

普列汉诺夫深刻地揭露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捏造，駁斥了那种認為历史必然性的作用仿佛带有自动性的观点，証明了历史正是人类行动的结果。

他巧妙地駁斥了那种說什么人受铁的必然性这个規律支配，而人的一切行动都被預先規定等等的謬論。普列汉诺夫引証馬克思的話說：“不，既然我們認識了这个铁的規律，那末推翻其桎梏就決定于我們，把必然性变为理性的順从的奴僕亦決定于我們。”^①

辯証唯物主义不仅告訴我們抗拒經濟必然性是荒謬的，而且教導我們如何在實踐活動中利用它。这就消除了宿命論的观点，宣布了人的活动、人的智慧的不可克服的伟大力量，因为人在一旦認識了必然性的內部規律之后，就力求改造现实，使现实变得更加合理。“当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在人的背后起着作用而不为人所意識的时候，人类曾經是，而且應該是無意識地創造历史的。可是，这些动力一旦被發現，它們起作用的規律一旦被研究，人类就能够把它們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它們服从于自己的理性。馬克思的功績正是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动力，并且对它們的作用进行了縝密的科学的研究。”^②

普列汉诺夫說，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就是說明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合。但是，要想說明整个历史过程，必須坚持馬克思主义的一項原理，即首先弄清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这个基础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物質財富的生产。但是为了进行生产，人們必然要建立起彼此之間的相互关系，即馬克思所說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合又构成人們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据以确立的社会經濟結構。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过程

① 本卷，第768頁。

② 本卷，第495—496頁。

归根到底并不决定于人的意志，而是决定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关系的改变。因此，研究历史必须从研究某一国家的生产力状况、它的经济开始，因为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都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普列汉诺夫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卡列夫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智能的努力”仿佛在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发展中，在创造和使用劳动工具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制造工具的能力本身就在作用于自然界的进程中、在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人在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本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①

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所发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二者的统一，称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生产关系是结果和生产力是原因这一事实中，清楚地看到了二者发展的辩证法。但是结果也可以变成原因，生产关系也可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源泉和形式。

普列汉诺夫还阐明了自然界（按照他的说法是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自然前提）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虽然有时夸大了这种影响。例如，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曾经着重指出，社会关系较之自然条件对于历史过程发生远为强有力的影响。在他的另外一本早期著作《唯物主义史论丛》中曾经写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影响是有着自己的逻辑和不以自然环境为转移的规律的社会发展的原因，而这个内部的逻辑“甚至可能违反

^① 本卷，第683页。

环境的要求”。在这个地点，他讲到气候的间接影响，讲到民族的历史命运并不仅仅决定于地理环境，因为“地理远不能说明历史中的一切问题”。普列汉诺夫写道，地理环境与民族历史命运的可变性相比较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证实了这个结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意味着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一个变数，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改变的。他的另外一个说法也是对的，就是地理环境促进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普列汉诺夫就在他的这些早期著作中，已经透露出他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估计过高。他用地理环境的性质来说明生产力的状况。这是对社会学中的所谓地理学派的让步。

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中，普列汉诺夫讲到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人口的增长却并非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他引用马克思的一条原理说，只有动植物才有抽象的繁殖规律，而人类社会中的人口的增长（或减少）则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著作中，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并且联带着阐明和论证了无产阶级在革命的阶级斗争中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后来在1898年，他专门为这个题目写了一本著作。但是他还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就批判了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米海洛夫斯基以及其他民粹派分子在关于“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方面的反科学理论。这些人追随着鲍威尔兄弟，宣扬历史观中的主观主义，蔑视人民群众、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知识分子看做在社会发展中起头等作用的独立社会力量；在他们看来，群众不能进行自觉的有组织的活动，因为他们只能受人支配，只能盲目跟着“英雄”走。

民粹派的思想家认为，只有批判地思维的人，作为人类的一个最高级的特殊的变种，才能够使历史进步。批判地思维的人——这就是“英雄”，就是那种能够吸引与“英雄”对立的“群氓”的人。在民粹派分子的心目中，群氓“是没有任何创造因素的群众，好象是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头上谦逊地站着善良的‘批判地思维的’人物时，才能有积极的意义”^①。普列汉诺夫在另外一个地方指出，民粹派把千百万生产者叫做群氓，而这些生产者是“英雄们愿意把他们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的^②。这是一种流毒极深的对于个人、对于站在群众头上的“英雄”的崇拜。

在《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一种版本中，普列汉诺夫卓越地阐明了对于历史活动家的崇拜的害处。这些人物的活动往往被看做伟大历史运动的原因。“这样一来，‘摩西’、‘亚伯兰’和‘里库尔格’^③等的作用，就被夸大到霍尔巴赫和前一世纪一切‘启蒙运动者’的历史哲学中那种使我们震惊的难以置信的程度。人民的历史被变成了‘杰出人物的生活’史。”普列汉诺夫写道，因此，“宗教、风俗、习惯和人民的整个性格，都成了某一个人按照事先想好的计划来加以规定的东西。于是，关于社会科学、关于人在历史发展中所依归的规律的任何观念都消失了”。他着重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合乎科学的。

民粹派的思想家一般地说都不相信群众，而只承认单个的人与专制制度的“孤军作战”。因此，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他们采取了阻碍工人阶级和农民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极其有害的一

① 本卷，第672页。

② 本卷，第858页。

③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立法者，传说他所制定的法律，确定了斯巴达人的政治、经济制度。——译者

种策略——个人恐怖。脱离人民群众而靠个人英雄的力量来进行反沙皇制度斗争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把民粹派引向更严重的错误，引向进化和自由主义。普列汉诺夫因为自己清楚了解个人崇拜、“英雄”崇拜对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害处，所以他不仅批判了民粹派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站不住脚，嘲笑了他们的狂妄自大，而且做出了深刻钻研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的典范、理解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典范。

普列汉诺夫写道，“主观学派的大将”米海洛夫斯基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只应该说到“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自己发展”。普列汉诺夫对这个民粹派分子说：“如果你以为，按马克思的意见，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那末你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呢？这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们，它怎样能够发展呢？”^①普列汉诺夫肯定说，劳动群众——这就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人。

普列汉诺夫写道，如果在主观主义者看来是英雄起主要作用而生产者起辅助作用的话，那末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却是生产者起主要作用而不是辅助作用。社会的发展是只有靠生产者本身的活动才能实现的。

他用社会生活方面的例子来证明，历史是群众、是千百万生产者创造的，而不是“英雄”任意按照他们的幻想创造的。“目前正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并不是各种改革家的空想的计划所决定的，而是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所决定的。”^②

主观主义者把那种只有千百万群众才能实现的事业归之于个别的杰出人物；不是单个的人，而人民群众、各个阶级在历史发展中，在实现俄国的社会改造中起决定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写道，主

① 本卷，第759页。

② 本卷，第498页。

观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不能够从个别人物的作用，提高到认识群众的作用、各社会阶级的作用。民粹派分子也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一样，习惯于把伟大人物的政治活动，看做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动力。他们过多地重视帝王的家系，而不去注意人民群众的任何独创精神。

普列汉诺夫写道，历史学家必须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活。他强调指出，人民应该是历史的主人翁。一国的真正历史，应该是人民的历史、公民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运动每向前迈进一大步，都不仅不能没有人的参加，而且也不能没有多数人即群众的参加。”^①

普列汉诺夫指出，“当还有这么一种‘英雄’，以为只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就足以随心所欲地引导群众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众当作粘土一样，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在这样的时候，理性的统治仍然不过是漂亮的空话、善良的梦想。只有当‘群众’成为历史行动的英雄的时候，只有当在它这个粗野的‘群众’中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自觉的时候，理性的王国才会大踏步地走近我们”^②。

普列汉诺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跟那些认为人不能积极地活动而只能消极地感知现实的哲学流派不同，它号召人们发挥创造性。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这个必然要在现代社会中起伟大历史作用的阶级行动起来。马克思主义者是向无产阶级这个名符其实的革命阶级说话的。无产阶级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当作自己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可靠领路人。这个理论给无产阶级增添了无比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整套实践的哲学都归结于行动。普列汉诺夫称辩证唯物主义为行动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群众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的意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210页。

② 本卷，第770页。

义，但是却并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認為个人的作用等于零。

跟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和趋向的杰出人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完成巨大的社会作用；他可以用在群众中唤起主人翁的自觉的方法，以自己的进步活动加速社会的向前发展。所以“……发展知識，发展人的意識是思想人物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Licht, mehr Licht! ①这便是首先需要的。……不要把灯放在‘知識分子’的狭窄的書房里！……发展人的意識吧……发展生产者的自觉吧”②。

普列汉諾夫強調說，杰出人物的社会活动的意义，取决于他对社会发展条件的認識正确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接近人民、接近先进階級的程度。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强使社会保持那种已經不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关系。

因此，普列汉諾夫在九十年代中期卓越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個人崇拜，闡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說。普列汉諾夫的馬克思主义著作甚至在現在也有助于消灭依然存在的个人迷信残余的斗争。

普列汉諾夫在論証人民在历史上的极伟大作用的时候力图証明，只有人民、工人階級的革命运动，才能推翻俄国专制政体这个政治怪物，才能导致无产階級专政，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这对于在八十年代曾有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流行一时的俄国解放运动，是有巨大的意义的。普列汉諾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們的意見分歧》等書中，捍卫了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无产階級专政是社会革命的首要条件和标志。无产階級专

① 意思是“光明，更大的光明！”

② 本卷，第770頁。

政的任务不仅在于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在于组织社会政治生活。他强调说：“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经获得统治地位的阶级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改革。……”^①

后来，当普列汉诺夫走上孟什维克的立场之后，他虽然没有公开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但是却向往于改良主义的宪政幻想，避而不谈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普列汉诺夫所阐发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当中，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社会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相互作用问题，以及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等等，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正象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僵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历史中，思想、理论、政治制度等等，亦即整个上层建筑，也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产物。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中首先着重阐明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对物质生产的依赖性。他详尽而缜密地批判了思想“自己发展”的唯心主义理论，批判了那种认为思想和风尚的一般状态不仅造成不同形式的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决定着某一时期的工业以及社会环境的观念。普列汉诺夫断言，只有唯物史观才能从物质资料的生产中，正确地找出思想和风尚的某种状态的真实原因。

人们在社会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生产物质资料，创造经济基础，而在经济基础上面则形成国家制度、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

^① 本卷，第77页。

社会中的脑力工作的方向本身，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不否认外国对某一国家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影响的事实。除了研究一国之内的经济 and 思想的相互关系，弄清政治和思想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制度的依赖性以外，普列汉诺夫还研究了外国对某一民族的文化发展的影响。“法国哲学家很欣赏洛克的哲学。可是他们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这是因为，他们在法国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较之那个在洛克的哲学著作中表现了自己的意向的英国社会的阶级走得更远。”^① 由此可见，外国的影响并不能排除这样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是一国社会思想的特点和特征归根到底只能用该国发展上的根本内部原因来说明，亦即只能用该国经济关系的发展程度来说明。

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的形式对经济的反作用的原理的论证也是很令人信服的。政治对经济的依赖并不排除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排除政治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政治制度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它的发展。某一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政治制度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那末它就應該被消灭。

在剥削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对立着。普列汉诺夫解释说，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首先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间发生的关系。各阶级的关系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上面。这个斗争是各种政治理论和思想上层建筑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只有注意各阶级的斗争并且研究它，才能理解社会的精神史，才能得出这样一个正确的结论，就是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总是有着那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占统治地位

^① 本卷，第731頁。

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的无可争辩的功绩之一，是他出色地驳斥了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经济条件完全地（而不是归根到底地）决定着精神生活；任何理论都可以直接从某一经济状况中找出它产生的原因。这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庸俗的捏造，即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曾为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派主观主义者及西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传播过。

普列汉诺夫写道，米海洛夫斯基徒然无益地以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懂得经济的东西，“只靠弦线为生”。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撇开那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并影响着其后的经济发展方向的社会力量，来看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有关思想发展的问题上，甚至最通晓经济发展的专家有时也是束手无策的，如果他沒有了解社会心理发展的复杂过程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它对经济的适应、它跟思想体系的联系的某种艺术感的话。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和易卜生对于解释现代社会各阶级的心理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可以期望，随着时光的流转，将出现很多这类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理解‘弦线’运动的‘铁的规律’，另一方面，能够了解和指明，如何在弦线之上，并且正是由于弦线的运动，生长着思想体系的‘生动的衣裳’。”^①

普列汉诺夫证明，马克思从来也没有否认政治和思想（道德的、哲学的、宗教的、美学的概念）在人的生活中的极重要意义。他只是首先说明了它们的起源，并在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了这个起源。然后马克思又探究了经济的骨架如何为社会政治形态的

^① 本卷，第760页。

生动血肉所掩盖，以及最后，——这也是最有趣、最引人入胜的方面，——人的思想、感情、志向和理想如何产生和发展。

普列汉諾夫論証了思想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从而駁斥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关于思想绝对独立性的错觉。经济基础产生思想上层建筑的过程，是在人們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因此，思想关系跟经济关系的联系以及思想关系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就往往被忽略，前者取得了“自足的”性质，思想被錯誤地看成某种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东西。普列汉諾夫強調說，思想发展所以有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于每一思想形式的发展中的承續性。任何阶级的思想家都积极地对待前代的思想遗产，利用前代人的成就。这一事实就証明了思想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①。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开并产生出它们的对立性时起，就在精神生产中划分出一些特殊的分工部門。思想仿佛成为具有自己的发展所特有的内部倾向的相对独立的領域。这种現象的存在証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是现实的，是历史的事实。

普列汉諾夫写道，把这样一种思想强加之于馬克思主义是錯誤的，即認為某一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說明該社会的一切思想。在同一社会中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常常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普列汉諾夫关于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的深刻思想，甚至在現在也是具有浓厚的趣味的。在十九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民粹派及其完全脫离现实生活的空想，給群众的革命斗争带来很大的損害，因为他們硬說思想和理論是和社会经济生活无关的。普列汉諾夫在揭露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主观主义的时候，富

^① 本卷，第740頁。

有独创精神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思想和理论的作用的学说。

理想有崇高的和卑下的，也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普列汉诺夫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思想、理想总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只有适合经济现实的那个朝向进步的方面的理想才是正确的。形而上学者以为，如果说社会活动家必须依靠现实，那末这就意味着在劝告他跟现实妥协。反动派依靠着业已过时的现实，但是在这个现实里面正在产生着新的生活即未来的现实，而为这个未来的现实服务就等于帮助新东西获得胜利。

马克思主义者赋予思想、理想以巨大的意义，虽然民粹派的思想家也在这样做。思想可以转化为伟大的力量，但是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必须善于抓住现实、历史进程和各阶级的关系并加以反映。只有在这种时候它才是不可战胜的，能够为进步事业服务的。反之，它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当它们体现出最进步的社会趋向和当时最先进的思想的时候，只有当它们能够决定社会斗争的任务的时候，它们才可以被称为革命的。

普列汉诺夫称革命思想为“世界上任何爆炸物”都不能代替的“炸药”^①。

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坚持不懈地号召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付诸实现。他曾经提到革命理论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特殊作用。他写道：“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②他号召把最进步的社会力量所提出的先进思想传播到群众中去，认为这是促进进步的一个最伟大的因素。

但普列汉诺夫在实践上并不是这个观点的彻底的传播者。后

^① 本卷，第98页。

^② 同上。

来，当他成了孟什维克以后，他轻视革命运动的主观方面，贬低革命政党的作用，缩小社会意识对经济的反影响以及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
* *

在十九世纪末及其后资产阶级大肆进攻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情况下，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言论，是具有巨大的意义的。他指出，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旗号下发动进攻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反对唯物主义的进军的社會基础，归根到底是在于资产阶级对革命无产阶级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恐惧。

普列汉诺夫在保卫哲学中的正义事业的同时，也揭穿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貝克莱主义、休谟主义、費希特主义、康德主义、謝林主义、黑格尔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并且指出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的密切关系。

普列汉诺夫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坚决行动也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诋毁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力图把它从哲学进步发展的一般进程中排除出去。

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条件，揭示了唯物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继承关系。

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哲学观点中的基本的东西，就是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是对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的阐明。但是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明确表述他对哲学对象的想法。

普列汉诺夫捍卫了辩证法，探索了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的发展，

研究了哲学中的各种体系和学派。

同时，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对唯物主义者的观点的唯心主义歪曲，他们对唯物主义史的捏造，以及他们想避而不谈唯物主义的企图。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资产阶级学者用平列各种思想、亦即简单按各种体系的先后次序来叙述哲学史的方法的不科学性，指出了他们对思想史同社会史的联系的不重视。他要求同时考虑思想发展中的承续性，要看到各个哲学体系和学派跟以往思想材料的联系。

普列汉诺夫力图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探究唯物主义思想的承续性，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区别。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文献中还往往缺乏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同以前的唯物主义体系的区别的明确观念。而且，人们还往往把马克思的观点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的观点混为一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也被归之于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还流行着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是黑格尔左派的残渣。

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同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和联系，首先在于他们对唯物主义的捍卫。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系谱，上溯到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斯宾诺莎、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但是普列汉诺夫也有阐述得不确切的地方。他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斯宾诺莎主义的亲属。但如果认为他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同斯宾诺莎的哲学等同看待，那也是不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只是强调了德谟克里特——斯宾诺莎——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的联系的唯物主义基础。在他看来，这种联系就表现在这一些思想家都对哲学上的基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决，都证明了物质的东西先于观念的东西。

普列汉諾夫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書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表述得很明确的观点，即如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普列汉諾夫在宣传存在决定意識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时，一贯坚持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各种“綜合”即二元論。存在、自然界——这是基原，是决定生活一切方面的首要因素。

普列汉諾夫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思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派別。虽然与这两者同时总是有某些承認精神和物質各为独立主体的二元論体系存在着，但是二元論从来都不能令人滿意地回答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問題，即这两个并无共通之点的独立主体如何能够彼此影响。普列汉諾夫指出，对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任何綜合，都必然要导致折衷主义。从二元論的观点看来，历史現象的本質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二元論总是折衷的。他在闡明自己的思想时說：“当然，折衷主义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可以把一切东西結合起来。采用折衷主义的思維方法，不仅可以把馬克思同康德結合起来，而且可以把馬克思同中世紀的‘实在論者’結合起来。至于說到那些彻底地思維的人，那末，馬克思和康德哲学的非法同居，在他們看来完全是駭人听聞的。”^①

普列汉諾夫認為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哲学史上起着特別巨大的作用。他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对意識的看法是跟唯心主义对立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把意識看做“自然現象”，看做物質的特性；他們坚决反对把意識解释为超自然力等等的唯心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分析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倫理学，指出它在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并且反駁了庸俗的資產階級哲学史家对它所做的“非

^① 本卷，第541頁。

道德性”的指責。他非常重視法国唯物主义者对教会和宗教的斗争，同时也指出了他們的观点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但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却特別吸引了普列汉諾夫的注意。他特別詳細地敘述了法国唯物主义者如何企图用社会生活条件来解釋一定的思想和习尚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問題；同时，普列汉諾夫也強調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由于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所以未能克服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看法。

普列汉諾夫在同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家进行論战中，捍卫了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看法的彻底性，揭示了費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观点的相同之处，同时也看到了費尔巴哈哲学在輕視辯証法和缺少唯物史觀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但是普列汉諾夫在評价費尔巴哈、斯宾諾莎和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的时候，沒有充分強調他們所特有的局限性的特点即机械論的性質和直觀性等等。

普列汉諾夫写道，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最卓越的哲学体系，——是一元論的。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現象。甚至在心理学这門主要研究精神現象的領域中，“也只有在我们把自然界当做第一性的要素，而把精神現象看做物質运动的必然結果的时候才能取得巨大的工作成就”^①。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彻底解决了哲学的基本問題。它把外部世界当做第一性的东西，同时又把它看做发展着的和变化着的東西。

普列汉諾夫在給恩格斯的《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① 《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39頁。

一書所写的注释中，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質的永恒性、存在的基本形式、运动、空間和时间的一些基本原理。他駁斥了康德关于空間、时间和因果性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运动是物質的不可缺少的特性。为了运动，为了产生我們称之为感觉、思想的东西，物質并不需要超自然的推动者。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因为它符合自然科学的材料，并且跟神秘主义势不两立。

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闡明了認識的問題。認識的出发点是外部世界。我們关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和現象的觀念和概念具有客觀的內容。

物質的东西是精神和觀念的东西的基础。在人之外沒有思維，思維是腦的机能，是神經—精神过程的活动的結果。

在給恩格斯的《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所写的注释中，在《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一書中，普列汉诺夫批判了那些否認或怀疑外部世界可知性的不可知論者休謨、康德等人。

普列汉诺夫写道，外部世界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我們的印象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我們的結果，所以，印象符合于并且不能不符合于我們之外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事物的知識总是通过事物在我們身上所造成的印象获得的。对于存在于我們之外的事物的感觉、知觉是認識的基础。

同恩格斯的看法完全一样，普列汉诺夫認為康德和休謨关于外部世界不可認識的学說受到經驗和工业的最好的駁斥，因为“人的一切經驗和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人对外部世界的积极的关系”。科学証明，有許多現象都可以預見到并可以有意識地使之发生。这就是說，“自在之物”将在我們身上发生的作用也是可以預見的。普列汉诺夫令人信服地写道，如果我們能够預見“自在之物”在我

們身上所發生的某些作用，那就等于說，我們至少知道“它們的某些特性”。如果我們知道事物的某些特性，那我們就沒有權利稱這些事物為不可認識的。普列汉諾夫在許多著作中，特別是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中，清楚地解說了馬克思關於客觀真理的學說。他把承認外部世界的可知性同承認人能夠認識客觀真理聯繫起來。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和其他主觀主義者堅決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硬說凡是能夠滿足我們的認識要求的都是合乎真理的，也就是說真理是主觀的。普列汉諾夫在反駁他們的時候說：真理不在主觀性的範圍內，而只在全面觀察現實的客觀關係的結果中。

他在總結自己的論證時說，客觀真理是現實的正確反映。事物和現象、它們的特性和關係是在我們之外存在的。只有那些正確反映現實的各方面和這些關係的觀點才是真實的；而歪曲它們的觀點則是錯誤的。

普列汉諾夫寫道，主觀主義者以生活通過矛盾才能發展為理由來否認客觀真理是不能成立的。生活中有矛盾存在，並不能否定客觀真理，而只能導向客觀真理。但是認識的道路並不是直綫的。生活中的矛盾迫使人們更深刻、更全面地去觀察現實，結果關於世界的知識也就變得更加正確了。這些知識提供客觀的、絕對的真理，但是這個真理並不能排除認識的進一步發展和新的矛盾的產生。

強調認識絕對真理的可能性，也就是相信人的認識的無限性，相信人的思想不會停留在認識世界的中途，相信新的發現必將補充和証實馬克思的天才理論，正如天文學中的新發現補充并証實了哥白尼的發現一樣。

同時，也不能不指出普列汉諾夫在認識論問題上的某種混亂。

他用了这样一个跟休谟一致的说法，即人必须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列宁曾说这是一个不通的语句：“‘信仰’这个字眼，虽然加上了引号，借用自休谟，却显示着普列汉诺夫的术语的混乱……。”^①

1892年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注释中所表述的一个论点，即我们的感觉是象形文字，是他在认识论方面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这个论点的意思就是说，各种运动着的物质的作用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感觉，不能确切反映产生这些感觉的客观过程，不是外部世界的映象。这些感觉只是有条件地传达给我们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联系。“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②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赫尔姆霍茨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后来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只是犯了术语上的、修辞上的错误，并且理解了“这种不确切性的全部不妥之处”。但是列宁却认为必须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错误是脱离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公式，是对不可知论的让步。

普列汉诺夫尽管犯了个别严重的错误，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功绩还是很大的。普列汉诺夫暴露了反科学的和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穿了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者的观点的荒谬性，批判了折衷主义者和实证论者的混乱，捍卫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的。

* * *

普列汉诺夫热情捍卫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大胆地把它应用于

^①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4页。

^② 本卷，第560页。

社会生活，并且正确地把辩证法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成就。他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和新鲜之处，就在于它同唯物史观的天才发现一起，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别于他的唯物主义先行者的学说。普列汉诺夫揭示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各个方面，清楚地阐述了发展，进化和革命的相互关系，以及飞跃等等的理论。在这方面，他论证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跟黑格尔的方法的对立性，同时也考察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的作用。

在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中，普列汉诺夫写了许多著作来阐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问题，如《专制制度的新辩护人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1889年）（这是他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第一部精心著作）、《纪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唯物主义史论丛》，以及关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和反对伯恩斯坦、司徒卢威及其他修正主义者的文章。

普列汉诺夫称黑格尔为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巨人。他认为恢复辩证方法是黑格尔的伟大功绩。把现实看做绝对观念或宇宙精神的发展的产物的黑格尔思辨哲学，在研究辩证方法方面优越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黑格尔哲学提高了辩证方法的地位。黑格尔从现象的发生、发展和消灭来说明现实界的各种现象。普列汉诺夫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切有限的东西都注定要自行消灭。”

黑格尔的许多论敌都没有透过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反动外壳，发现他的辩证方法的进步的革新的内核——关于发展的学说。黑格尔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发生了有益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对于这一点做了极其精彩的阐释。他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诉诸绝对观念，却较之形而上学是一个进步，因而对人类思想做出

了巨大的貢獻。同时，普列汉諾夫还通俗地解释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之間的矛盾的論点，揭发了貫穿着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他还提到与发展观念、辯証方法相矛盾的黑格尔体系的保守性。如果說黑格尔的辯証方法要求发展，那末他的反动体系，正如普列汉諾夫所說，則是为当时德国的反动国家体制做辯护的。他的体系想要証明，德国当时的社会制度是“完美的”、“永恆的”。

普列汉諾夫認为黑格尔辯証法的局限性之一，就是它只面向过去。黑格尔写道：“哲学总是发生得过迟”，并且只能意識到业經发生的东西。普列汉諾夫嘲笑說，哲学当然不能使衰朽的过时的社会制度恢复生命力。但是难道說哲学就必须永远对新事物的产生过程不聞不問嗎？普列汉諾夫強調說，只有辯証唯物主义才能克服这种局限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沒有跟唯物主义結合，而是跟唯物主义背道而馳的。在馬克思的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直接的对立物。

普列汉諾夫在《紀念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写道：“卡·馬·恩完全有权說，他的方法是与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因为唯物主义者馬克思所了解的辯証法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完全不同。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証法肯定純粹思維的自发的运动，在实質上否定了自然界的发展、物質的发展。馬克思主义則与此不同，它使辯証法“头頂天脚着地”站起来了，在辯証法的基础上改造了辯証法，揭去了遮掩着黑格尔辯証法的唯心主义迷霧。

人們有时說，普列汉諾夫对待黑格尔哲学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一点是不應該加以夸大的。普列汉諾夫的功績，在于他明确地、令人信服地闡明了馬克思主义辯証方法跟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辯

証方法的对立性。

普列汉诺夫强调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中，辯証方法和唯物主义是彼此不可分割地結合着。因此，現代唯物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辯証方法。这是它跟十八世紀的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本質区别。正是唯物主义是关于发展的現代学說的巩固基础。普列汉诺夫称馬克思的方法为所有一切曾經使用过的方法中的最革命的方法。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是認識的不可代替的工具，靠了它就可以揭露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发展趋向。

在这方面，闡明辯証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解释现实的方法的根本区别的东西，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占着很大地位。馬克思的辯証法跟形而上学不同，它研究現象的矛盾发展，研究現象的直接联系和相互依賴关系，以及它們的不断的、永恒的运动。

普列汉诺夫站在唯一科学的辯証法的立場上，联系着認識的发展来历史地看待形而上学。他揭露那否認矛盾、飞跃、变革而只承認量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是反动的。

形而上学者——庸俗进化論者——給自己的学說增添了相当多的保守主义气味，甚至歪曲了关于发展的学說本身。

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所謂对世界的形而上学观点，就是說它只承認事物和現象的量变。在形而上学者看来，发展不过是被研究的現象的量的逐渐增加或减少。現象的消灭也是这样。在形而上学者看来，現象的消灭只是在現象还没有变成无影无踪以前的逐渐减少。但是，逐渐的增加和减少既不能說明事物的产生，也不能說明它的消灭。

馬克思第一个解释了并論証了辯証方法的本質。普列汉诺夫說明了量变通过渐进过程的中断、通过飞跃和革命变革而过渡到

质变的辩证法，并且集中火力批判了进化论观念的局限性。

前民粹派分子、叛徒吉荷米洛夫反对辩证的发展，否认自然界的社會中的“暴力变革”和飞跃，硬說在“科学的意义上”只应该說“某一現象的类型的緩慢变化”。普列汉诺夫在駁斥他时証明說，辩证法沒有忽略这样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即在变化的一切环节中始終有着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在起着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一系列的条件，而在这些条件下渐变必然要导致飞跃。

普列汉诺夫写道，在掌握了辩证方法的社会主义者看来，革命也和进化一样，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论证关于飞跃的辩证学說时指出，自然界随时随地都在駁斥形而上学者的观点，显示出現象的矛盾性、渐进过程的中断即飞跃；而且，在社会中也有由量到质的轉化、飞跃。

普列汉诺夫从人类历史中引用了大量的事实，非常精辟地分析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过程、飞跃运动的过程。一切飞跃都是由先前的发展做好准备的。沒有一种包括在先前社会生活进程中的充分原因，就不可能发生飞跃。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許多文章中，特别是反对吉荷米洛夫（在1900年代则为反对司徒卢威）的文章中，对于量变到质变（或质变到量变）的規律的作用問題做了正确的、一般理論上的解說。

普列汉诺夫曾經通俗地解释了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的規律。一切发展都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都是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結果。所謂一切現象的矛盾性，就是說現象从它自身自行发展出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或早或迟要結束这个現象的存在，把它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因为一切东西都是通过矛盾、通过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发展的。这是关于新旧事物矛盾的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伟大規律，是关于某种內容所产生的形式由于这个內容的进一步发展而

突破形式的规律。这个规律支配着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虽然把发展看做现实界的各种过程和现象的辩证矛盾，但是这并没有使他理解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普列汉诺夫虽然承认这个规律，但是并不认为它是辩证法的核心。他认为发展的飞跃性是辩证法的特征和真髓。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列宁在推崇普列汉诺夫保卫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功绩同时，也一再着重指出他对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重要规律，不够重视。列宁还曾指出，普列汉诺夫在解释辩证法的规律的时候，为了通俗而引用了一大堆例子，并没有把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予以应有的重视。

八十年代末普列汉诺夫为正确理解“否定的否定”规律而写的文章具有很大的价值；普列汉诺夫反对那些歪曲这个规律，认为它不过是人所尽知的黑格尔“三段式”的一种表现的人，如米海洛夫斯基，因为他抓住马克思的辞句，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黑格尔的“三段式”。普列汉诺夫在否定的否定这个一般规律中，看到了说明正在产生和正在消灭的东西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辩证法原理和特点。他坚决反驳了指责马克思犯了形式主义和模仿黑格尔的“三段式”等等的谰言。他指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结局的天才预见是依靠着“三段式”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三段式”从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论证的根据。马克思不是凭臆断，而是根据对现实的实际研究，弄清了发展中存在着的矛盾趋向。不是引用“三段式”，而是对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普列汉诺夫在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反对抽象公式这一点时说，“关于事物的一切现实性质的生动概念”都只能是这样形成的。

* * *

普列汉诺夫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风格卓越、充满论战的火焰和内容深刻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丰富财产。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方法、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原理所做的阐述是富有独创见解的。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势力和蒙昧主义，争取实现俄国的政治改造和社会改造，以及俄国和其他各国人民从社会奴役与社会压迫下的解放。这些著作宣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了俄国和西欧的革命运动的密切联系。因此，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不失其意义。

正是因为这个原故，列宁指示必须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主张把这些著作加以再版并列入《共产主义必读丛书》中。

伏·福米娜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¹

序 言

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可能引起许多误会或者甚至许多不满。同情《土地与自由》²和《黑土重分》³（这些都是我参加过编辑工作的机关刊物）的方向的人，可能责备我，说我放弃了所谓民粹主义的理論。我們革命党的其他派别的拥护者们可能不喜欢我对他们所珍视的一些观点的批评。因此，我认为，事先稍作说明并不是多余的。

在民間工作和为人民工作的志向，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身事业”的信念——我們的民粹派的这一实际的倾向，我还是同从前一样地珍贵。可是它的一些理論上的命题，我认为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错误的。在国外居留和对社会问题注意研究的那几年，使我深信，人民自发运动的胜利，有如拉辛的暴动，或者德国的农民战争，不能满足现代俄国的社会—政治的各种需要，我們人民生活的一些陈旧形式在其自身内部已含有自己瓦解的许多萌芽，而且没有强有力的和組織得好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对这些萌芽直接起作用，它們是不能“发展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所以我以为，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同时，俄国革命者至少必须竭力培养出一些要素，准备将来創造这样的党。在这一創造的活动中，由于必需，他們不得不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基地，因为《土地与

自由》的一些理想是和产业工人的情况不适合的。而且现在当俄国特殊的理论变成停滞和反动的同义语，而俄国社会的进步因素集合在深思的“西欧主义”的旗帜之下的时候，这是很适时的。

我现在转到我要说明的另一一点。在这里，首先我要为自己辩护，我所涉及的不是人而是一些意见，我同这一或那一社会主义小组的一些私人的分歧意见绝不减少我对一切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诚实战士们的尊敬。

此外，所谓恐怖主义运动在我们革命党的发展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对政府进行自觉的政治斗争的时期。在我们的革命家们中间的这种方向的变换使他们对从以前一个时期承继下来的一切见解有重新审查的必要。生活要求我们在进入新基地时重新审查一切我们的知识，而我把自己的小册子看作是对这一在我们革命文献中很早就已开始的批判工作的量力的贡献。读者大概还没有忘记热里亚波夫的传记⁴，它里面含有对“土地与自由”小组的纲领和活动之严厉的、而且常常是极真实的批判的评价。很可能的，我的批评的尝试或许不大成功，但是如果说它不大及时，怕不见得公道。

格·瓦·普列汉诺夫

日内瓦，1883年10月25日

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

卡尔·馬克思⁵

从俄国革命运动最后走上对专制制度公开斗争的道路的时候起，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的问题就成了我们的党最现实的、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为多年来共同实际活动所联系起来的人们的意见就有了分歧，因为它，许多小组和团体都解体了。我们甚至可以說，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暂时地分成了两个阵营，对“政治”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正如在类似的情形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事情难免不走到极端。有一些人认为政治斗争几乎就是背叛人民的事业，是我们革命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一些资产阶级本能的表現，是对社会主义綱領的純洁性的褻瀆。另一部分人不仅承認这一斗争的必要性，而且也准备为了所謂这一斗争的利益去和我们社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分子們作一些妥协。有些人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俄国阶级对抗的任何表現对于現時都是有害的。例如，热里亚波夫就抱着这类观点，他认为，如他的傳記的作者所說的，“俄国革命不单单是农民的解放，或者甚至(?)不单单是工人等級的解放，而是全体俄国人民的政治复活”^①。換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認識中是和工人阶级爭取經濟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合流在一起的；現時局部的、特殊的俄国任务掩蔽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般任务。意見分歧到了极

^① 參閱小册子《安德烈·伊万諾維奇·热里亚波夫》，第10頁。

端，于是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时间渐渐使各走极端的意见趋于缓和，使大部分争论的问题解决得双方都认为满意。逐渐地，一切人或几乎一切都承认，已开始的政治斗争必须继续到人民和社会中广泛的解放运动摧毁了专制制度的大厦（如象地震摧毁鸡笼）那个时候，如果可以应用马克思的有力的语句的话。但是在我们的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斗争直到现在好象是某种不得已的妥协，是“实践”对“理论”的暂时胜利，是生活对无力的思想的一种嘲弄。“政治家们”本人，在为自己辩护而来反对那些纷纷落在他们头上的责难时，避免诉之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却又引证现实之不可抗的要求。看来，在灵魂深处，他们也深深地相信，自己不完全和政治的趋势相称，但是可以以如下的想法安慰自己，就是说，只有在自由的国家他们才能讓死气沉沉的人埋葬自己的死者，在和政治最后清算以后，才能全心全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这一模糊的信念有时候引导到一些可笑的误会。在分析“俄国客人”在庫尔大会⁶上的演说，并企图为自己辩护以反对所谓政客手段的责难时，《民意》顺带也指出，它的同志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政治急进派，而只是“民意党人”⁷。恐怖主义者的机关刊物认为，在“西方”急进党人的注意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而社会主义者，相反地，却对“政治”一点也不愿意闻问。凡是知道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的人，都当然理解，对于他们多数人的这种认识是错误到怎样的地步。大家知道，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从来没有拥护过“不过问”政治的原则。它的同志们并不忽视“政治”。他们只是不把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看作“全体人民的复活”。他们竭力组织工人成为特殊的政党，把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分开，给经济的对抗以政治的表现。至于我们这里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以对政治的漠不

关心为条件的这个信念，这一与现实完全矛盾的信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席勒的戏曲中的瓦倫斯坦对麦克斯·皮可洛明尼說，人的智慧是广闊的，而世界却是狹窄的，所以思想在前者里面容易协调，而事物在后者里面則尖銳地互相冲突⁸。我們关于自己是否应当說，事物在实际上不仅十分协调，而且一般地說在相互联系之外是不可思議的，而关于事物的一些概念在我們的头脑中反倒不能和平共处呢？为了回答这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把我們革命者們中間在一些政治傾向发生的时期就已存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那些观念弄明白。認清了这些观念是錯誤的或者落后的，我們再看一看，那种連资产阶級敌人都不否認其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說对于政治斗争給予什么地位。在这以后，我們就只在我們的一般結論中作出为适应現代俄国現实的这些或那些特点所必須的一些修改，这样我們的主题就将談完了；而工人阶級与屬於这一或那一历史形态的敌人們的政治斗争，就将在我們之前完全显露出其与社会主义一般任务的联系。

—

社会主义的宣传对于各文明国家的思想发展的全部进程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几乎沒有一門社会科学，不这样或那样受到这一宣传的影响。它一方面打破了陈旧的学术成見，另一方面却把它們从幼稚的錯誤变成了詭辯。而社会主义宣传对于新学說的拥护者們自己，不言而喻，是影响得更加强烈。从前“政治的”革命家們的一切传统都受到了无情的批評，一切社会活动的方式都以“新福音”的观点加以分析。但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科学論証只是在《資本論》⁹問世以后才完成，那么不言而喻，这一批評的結果远不是时常令人滿意的。从另一方面說，因为在空想的社会主义中

存在了几个学派，就其影响說，几乎是同等有力的，那末逐渐就形成了某种中庸的社会主义，而拥护它的一些人既不是想建立新学說的人，又不是屬於以前所存在的学說的特別热心的拥护者。如弗·恩格斯所說，“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創立者的一些最公認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評意見、經濟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发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組成的部分在辯論的潮流中，象石块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鋒稜尖角，那末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①¹⁰ 这同一位作者又說，“这种中庸的社会主义，直到現在还支配着英法两国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头脑”^②。我們，俄国人，可以补充說，这样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謂“前进派”和“巴枯宁派”¹¹ 两个极端派别从而分化出来的一般的背景。前一派傾向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后一派是第一国际无政府主义集团的俄国版¹²。在这两派之間在很多的問題上，几乎在一切問題上都有分歧，可是說起来也奇怪，而在对“政治”持消极态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而且必須承認，无政府主义者們在这一方面比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更彻底。

从无政府主义的觀點看来，政治問題是任何一个工人綱領的試金石。无政府主义者們不仅不肯和現代的国家打任何交道，而且从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觀念中排除了足以使人这样或那样地想到国家觀念的一切东西。“自治公社中的自治的个人”，这是这一派別所有的信徒們的口号。大家知道，这一派別的奠基人，蒲魯东，在自己的机关刊物《La voix du peuple》¹³ 中为自己提出一个

① 參閱《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S. 18.（《社会主义的发展》，第 18 頁。）

② [1905 年版注] 現在在法国，馬克思主义已最后胜利了，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甚至也为若累斯的陣营中的“机会主义者們”所承認，虽說多少带些歪曲。

不十分谦虚的任务，即是“对于政府这一观念（他以之与国家观念混淆起来）要抱和康德对于宗教的观念一样的态度”^①，而他对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②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法国康德的经济学说中逻辑地得出来的。蒲鲁东从来没有把未来的经济制度设想为不是商品生产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须以在“构成价值”原则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换形式来修正和补充。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换形式之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生的债务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须有一些不同的契约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们来确定。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契约”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据蒲鲁东的意见，革命必须推翻“法律”，仅只保留“契约”。他在自己的《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③中这样说：“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页），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便简单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认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须遵

① 参阅《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Préface, p.4.（《一个革命者的忏悔》，序言，第4页。）14

② 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政治学》的第1卷第1章看出，他在那里说，“国家是社会性的最完善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至善”，所以它是一种“最足以称为自然的现象”，“而人是由自然预定使之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国家形式的一种动物”（1879年佐塞米尔编，德文版，第1册，第1章，第1—11节）。《政治学》的作者之“怀疑地”对待国家，正和蒲鲁东对待商品生产是一样的。前者不能设想有别的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如后者也想不到有不是商品的形态，而还可以在成员之间分配的产品。

③ 《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

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們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的时候，所巩固的只是开始“社会清算”时必须根絕的那祸害。国家必须“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組合”有頒布“自己的法律”和締結为它們所必須的“契約”的充分自由。假使无政府主义者不致在“清算”的时期耽誤時間，那末这些“契約”将根据一些“經濟諸矛盾的体系”¹⁵的精神来締結，于是“革命”的胜利将得到保証。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还更简单一些。“国家的毁灭”（在无政府主义的綱領中逐渐地占据了为蒲魯东所推荐的国家的“解体”）应当为俄国人民的“各种理想”的发展清除道路。而因为这些“理想”中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和手工业的組合組織占有很显著的地位，那末必須假定，有民主傳統的“自治的”俄国人将不是根据蒲魯东的互助精神，而宁可說是根据土地共产主义的精神締結契約的。因为“天生的社会主义者”的俄国人民很快地理解到，只是一个公社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还不能保証所需要的平等，所以将不得不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原則上組織“自治的公社”。

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至少是所謂“暴动派”色彩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大思索他們所宣传的人民革命的經濟后果的。他們認為自己的責任是——按照他們的意見——消除那些妨碍人民生活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但是他們并不問問自己，脱离了外部阻碍之后的发展，将循着哪一条道路进行。而且这种把曼彻斯特学派的著名格言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①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是排除了对我们社会—經濟生活作任何严肃評价的可能，而且也是使关于它的“正常”发展的概念沒有任何标准——这

① “听其自然”。

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民粹派”所没有想过的。象这样的评价，只要我们的革命家们的议论的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蒲鲁东的学说上时，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尝试。这一学说之最弱的一部分，他们的逻辑上的错误关键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也正是据以只能作出关于生产者们在未来经济组织中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结论的那些前提。从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看来，当代俄国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完全不排除商品生产的这种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内部的、必然的辩证法”没有一点的了解^①。所以他的俄国同道者也从没有想到问问自己，“自治的”人们的、一些公社和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够同商品生产的趋势来进行斗争，而这种趋势有一天会威胁着把“正当取得的”资本供给某一部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会把他们变成其余居民群众的剥削者。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否认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创造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革命的任务和条件。

我们在这里既不能详细地研究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能研究其中的“巴枯宁主义”^②。我们只想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如下的事

^① 参阅《Das Kapital》，2.Auflage, S. 607—608. [参阅《资本论》，第2版，第607—608页。]16

^② 我们只提醒读者注意瑞欽豪生对蒲鲁东所提的反对意见。这一不倦的人民直接立法论的宣传家说：“权力、政府连同其一切的形式只是所谓：社会在人对物的关系上和在人对人通过物的中介的关系上进行干涉的一种形式。我举出蒲鲁东先生向我说的作为他脑力劳动结果的如下结论：‘我们不需要人对物，以及人对人相互间关系的这样的社会干涉！’”见《Législation directe par le peuple et ses adversaires》P. 194—195. [《人民的直接立法及其反对者》，第194—195页。]瑞欽豪生以为“象这样提出问题，就是解答了它”，因为“蒲鲁东先生自己也承认这种干涉的必要性”。但是他没有预见到学生们比老师走得更远些，而且也没有预见到无政府主义的理論，最后将堕落成为“社会无定形主义”的理論。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們不承认社会对于个人的任何干涉，而他們在自己的某些机关刊物的篇頁中是屡次这样声明的。

实，就是无论蒲鲁东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为自己的实际活动的基本教条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生活的社会—政治结构，好象可以特别证明一切无政府主义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张是正确的。俄国的“居民”在进到政治鼓动的活动范围以前，必须变成公民，即是说为自己争取得一些政治权利，首先，不消说，就是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力。这样的任务在实践中就归结为“政治革命”，而西欧的经验对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明显地“表明”，这样的革命对于人民既没有带来、也将不会带来和不能带来任何好处。关于人民必须通过参加自己国家的社会生活来受政治教育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只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样的参加不是教育人民群众而是使他们堕落；它在他们中间发展了“对国家的信仰”，因此就是发展了国家组织的倾向，或者，如已故的米·亚·巴枯宁所说的，是用官方的一社会的毒来感染他们，而且，无论怎样，是转移他们对于现在看来是唯一有益和免除灾难的事业的注意、即转移对暴动的注意，哪怕这种转移只是暂时的^①。而且依照我们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的运动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反对国家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让我们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的力量汇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溃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我们的“暴动派”的整个纲领已表现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

^① 参阅极有趣的和有代表性的巴枯宁的小册子《科学与不可缓的革命事业》。

对于俄国革命者各派别的纲领所作的这种简略叙述，我们不应忽视弗·亨·雅科俾所表示的那些观点，即“各种宪法”只是魔鬼所干的或多或少的不利勾结，我们说，这样的见解不止是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所独有的。假如读者知道弗·恩格斯和彼·特卡乔夫的论争^①，那末，他大概记得，《警钟》¹⁸的主编，在和巴枯宁主义者关于实际斗争的问题上虽然意见分歧，但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基本看法却和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也是通过俄国的特殊性和“俄国人民天生的共产主义倾向”这种偏见来看这一状况的^②。要是一个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¹⁹，不消说，他不否认“政治”，但是却把政治只理解为一种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阴谋的形式。显而易见，我们当时的布朗基主义者眼睛里只看见了这个目的，这就使他们遭到了许多矛盾。如果是彻底的话，他们应当承认他们的活动对于进步事业之有益，仅仅只在于他们对于自己的目标打击是对准得没有毫发之差的场合。假使他们所考虑的夺取政权这件事不成功，假使阴谋被破获，或者革命政府将为自由主义的政党所推翻，那末俄国人民不仅得不到一点点的好处，而且，相反的，将要遭受很大的损失。特别是，在所假定的后一场合，就会遭到毁灭。自由主义者将成立强有力的政府，对它的斗争比对于现代的“权力无限而荒谬”和“荒谬而权力无限”的帝制的斗争要困难得多；而“经济进步的火焰”会摧毁人民生活的根本基石。在它的影响下，交换将发展，资本主义将巩固，公社的原则本身将被摧毁，总之，时间的洪流将把那赖以很快会达到共产主义天堂的基石冲走。如果失败，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就会使人民解放事业

^① 参阅《Offener Brief an Herrn F. Engels》。〔《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信》〕¹⁷

^② 为了相信这一点，我们只须比较一下上述的《致恩格斯的信》和上面所引的巴枯宁的小册子。

遭到可怕的損害，这样就陷入威廉·退尔拿自己兒子的生命作孤注的可悲处境。但是因为他們沒有神話式的瑞士“叛变者”那样灵活，俄国人民如果理解了他們（布朗基主义者。——譯者）对自己生活的“根本基石”的观点而且被邀請来对他們的綱領表示意見，他也就不会对他們喊出：

射吧！我一点不怕！^{①20}

这样狭隘和无希望的俄国历史哲学当然会合乎邏輯地引到那一令人惊异的結論，說俄国的經濟落后性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停滞应当作为我們的“最低綱領”的第一和唯一的一节显示出来。我們在《警鐘》1875年2月份这一期上讀过这样的话：“每一天給我們带来新的敌人，創造新的敌視我們的社会因素，炮火也漸漸接近我們国家的一些形式。現在它們是死气沉沉的，沒有生息。經濟进步喚起了它們的生命，貫輸給它們以新的精神，提供給它們以直到現在在它們里面还没有的力量和强壮的身体”，等等。但是假如，据聖經上的故事說，約書亞·納文路能将太阳停止在“第十級”上，那末，奇迹的时间已經过去，而且沒有一个政党能喊叫說：“停住吧，生产力，不要动，資本主义！”历史不注意革命家們的担忧，正如它不注意反动派的悲叹一样。“經濟进步”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不等待到无政府主义者們或布朗基主义者們实现自己的意願的那个时候。每一个在彼得堡建立的工厂，每一个为雅罗斯拉夫的手工业者所雇佣的多余的“小工”都在加强好象是对革命

① 这是指席勒的一部劇作《威廉·退尔》中的一段故事，描述十三世紀时瑞士的爱国者威廉·退尔在殘暴的总督盖思勒的命令之下，要他向离他八十步远的兒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事，在这样的距离中要不伤害他的兒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威廉·退尔毕竟做到了。引語中的話是威廉·退尔的兒子华德在他父亲迟迟不射出箭时向他父亲請的。——譯者

有严重后果的那种“进步热情”，因此也就是在减少人民胜利的或然性。难道能够把对于俄国各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看法称作是革命的嗎？我們認為，不能。如果要使自己成为實質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革命家，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和布朗基主义者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头脑革命化，而为了这样做，他們应当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要站在历史的前面，而不是請历史老嫗在原地踏脚，等着他們为她开辟新的、更直更广的大路。

“前进派”集团理解到了上面叙述的观点的不成熟性和謬誤性，但是它曾經有一个时候能在我們的革命者們中間获得起支配作用的思想影响。而这时正是实际經驗已相当破坏了旧的、无政府主义民粹派的基础，和所有它的拥护者感觉到他們的綱領需要加以彻底修改的时候。那时候对于所有他們的理論的和实践的原理的彻底批評可以把在运动中正逼近的轉折变成更坚决的和不能改变的。象这样的批評正是“前进派分子們”最适宜于担任的，因為他們既然几乎完全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就是完全摆脱了民粹派的一切传统。但是，为了有成就，他們的批評应当不是斥責、而是闡明和概括越来越把我們革命家們推上政治斗争道路的那些俄国生活中的要求。然而“前进派分子們”否認“政治”和无政府主义者們是一样地坚决。固然，他們沒有認為社会主义和对資產階級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干涉是不相容的，而且完全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綱領辯护。但是他們以为，在現代“法的”国家里公开組織工人階級成为特殊政党的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資產階級的最后胜利，与資本主义时期相适应的工人狀況的恶化。他們忘記了，在估計这一狀況时，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且也應注意到生产与交換的全部組織，不仅要注意为工人所消費的产品的平均数量，而且也應注意这些产品本身的形

态^①，不仅注意剥削程度，而且要特别注意它的形式，不仅注意工人被奴役的这一事实，而且也要注意在这一事实的影响下所诞生和可能诞生的那些思想和概念^②。他们怕很难同意工厂工人会比临时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更不会承认，例如，由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过渡会增加工人群众为自己经济解放而进行的自觉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历史部分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书中没有读过的一章；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宣传万能，所以就为它在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基础。而且，和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直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为止的全部后来的历史归结为这一宣传。在对问题的这样提出之下，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們在一起，能把蒲鲁东的有名的話炫耀一下，說 *la révolution est au dessus de la politique*^③。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把我们的运动从在七十年代末所陷入的那一沉寂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否認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不能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建立稍为强有力的工人政党。

这种赋予我们的运动以新的气魄的光荣，毫无疑问是属于“民意派”的。一切人都还记得民意派的倾向所引起的对它自己的那些攻击。本文作者自己也曾是这一派的坚决反对者，虽然现在完全承認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现代俄国的当务之急，但是直到现在还远沒有同意“民意派”的一些刊物中所提出的一切意見²²。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承認，当《土地与自由》临近瓦解时²³，在它的組織內所发生的一切爭論中，民意派分子，当他们还留在我們实际經驗

① 就是說，它們是商品还是为生产者的家庭，为它們的主人，或最后，为国家所消費，而完全不出現在市場上。

② 請注意，我們所說的不是《前进》²¹杂志的編輯部，而是在俄国活动的这一刊物的信徒們。

③ 革命是超政治的。

的基础上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经验即在那时候已经导致了一些可惊的和完全意外的结论，然而我们正是由于其意外性，也就不敢作出这样的结论来。“反对国家”的实际斗争的尝试实质上即在那时已经应该使人联想到，俄国的“暴动者”由于情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治鼓动不是用以反对一般的国家，而只是反对专制国家，不是与国家斗争，而是与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完全经济解放，而是为了废除专制的皇帝所加于人民的那些重负。当然，土地问题是一切的或几乎一切的人民不满的表现的根源。在农业人口中间，不是这样也不可能，那里“土地的权力”在私人和社会生活的一切结构和需要中都坚决地表现出来。这一土地问题坚持要求自身的解决，但是它没有引起政治上的不满。农民们以安静的信心期待着从上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暴动过”，不是为了土地重分，而是为了反对官吏的压榨，反对过重的捐税负担，反对用亚细亚方式来追缴欠税，等等。把多数场合的积极抗议概括起来的公式是“法的国家”，而不是“土地与自由”，如象所有的我们在当时所觉得的那样。但是假如是如此，而且假如革命家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参加许多个别公社的分散的和未经熟思的反专制政体斗争，那末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应当了解自己努力的意义，并以较大的适宜性来指导这些努力的时候吗？难道不是到了他们号召一切俄国进步的活跃力量去参加这一斗争，而且为它寻找出最一般的说法，在专制制度的组织中心对专制制度施以攻击的时候吗？在肯定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民意派”只是总结了以前若干年的革命经验；在高举政治斗争旗帜的时候，他们只是没有被这些总结吓倒，而且自觉地继续循着我们所走上了的道路进行斗争，而关于它的方向我们是曾经有过一种错误认识的。“恐怖主义”完全是从我们的“暴动主义”里逻辑地产生出

来的。

但是从《民意》出现的时候起，我们的革命运动的逻辑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它已不再能为美好的旧的、即是对政治利益疏远的时候的一些民粹派理论所能满足的阶段。实践超越了理论的例子，一般地在人类思想史中，特别是在革命的思想史中是不少的。把这种或那种变化放进自己的策略中时，使自己的纲领受这种或那种的改造时，革命家们常常没有想到，他们是把他们中间所公认的学说作了一次多么严重的考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这样死在监狱里或绞架上，完全相信他们是本着那些学说的精神活动的，然而实质上他们是在旧理论基础上的新倾向的代表人，但这些代表人已超越了旧理论，而且准备找寻新的理论表现。从“民意”的派别强固了的时候起，我们也发生这种情形。从民粹派一些旧理论的观点说，这一派别经不起批评。民粹主义对于任何国家观念，都采取激烈地否定立场；民意派指靠着国家机器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改良计划。民粹主义弃绝任何种的“政治”；而民意派认为“民主政治革命”是最可靠的“社会改良的手段”。民粹主义把自己的政纲建立在所谓农民的“理想”和要求的基礎上，民意派分子主要地必须求助于城市的和工业的人口，因此在自己的纲领中对于这些人民的利益给予广泛得无比的地位。总之，实际上民意派是对民粹主义之绝对的和全面的否定，而当争论的双方都诉之于民粹主义的基本原理时，“革新者们”就完全不对了：他们的实际活动和他们的理论观点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观点需要全部修正，以便给予“民意”的纲领以完整性和彻底性；他的拥护者们的实际革命活动至少应当与我们社会主义者头脑中的理论革命同时发生；在爆炸冬宫时，也应当同时炸毁我们的陈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傳統²⁴。但是“观念的进程”即在这里也落在“事物的

进程”后面，而現在还难以預見“观念的进程”什么时候把“事物的进程”追上。在不敢与民粹主义决裂时，新的派别必然应当訴之于一些仿佛可以解决它的綱領內所固有的矛盾的虛构。俄国特殊性的观念得到了新的整理，而假使从前它导致了对政治的完全否認，那么現在，原来我們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正表現在經濟問題已經而且必須通过国家干涉来予以解决这一点上。我們俄国对西方經濟史的极普遍的无知，使得这样一类的“理論”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异。人們把俄国資本主义积累时期和西方資本主义生产时期²⁵对立了起来，而經濟生活发展的这两个阶段的必然的不相似，被引用起来作为如下兩項最令人信服的証据，即第一，我們的特殊性；第二，为这一特殊性所制約的“民意派政綱”的合理性。

是否需要补充說，我們的革命作家們，正如大多数一般俄国作家們一样，是用怀恩伯格著名故事中的犹太小兒的观点来看“西方”嗎？在可怜的学童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俄国和外国”，而且值得注意的不同点，在他看来只是存在在地球的这两个“半个”中間，“外国”他認為是清一色的整体。俄国的“特殊的”作家們在这一巧妙的地理分类中只加进了一样新东西：他們把“外国”分成了东方和西方，而且，沒有多想一下，就把后者与扮演某种“中央帝国”角色的“人所共知的强国”相比。这样一来，意大利的历史发展，就与法国的經濟发展等同起来，拿英国的經濟政策和普魯士的經濟政策比起来，也看不出任何分別，柯尔柏的活动和里查德·柯布登的活动被攪混在一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特有的“爱国主义”面貌丧失在一群“西欧”政治經濟学家中間，这些政治經濟学家們，遵照着屠尔哥的劝告，力求“忘記在世界上存在有为各种疆界所划分了的国家和不同的組織”。正如所有的猫在黑暗中看起来都是灰色而且彼此完全相象一样，“西方”各种国

家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特殊性的反照中也失去了任何不同之点。明显的一点是：“法兰克人”已经“资产阶级化”好久了，而“勇敢的罗斯人”还保存了“原始人”的天真，而且作为选民，在走着去拯救自己的特殊的道路。为了达到可居住的土地，他们只需要百折不回地坚持走这一特殊的小路，而且不用惊异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不仅和西欧社会主义的科学原理相矛盾，有时还和自己的前提相矛盾！

一个有名的预言：只要我们争取到了普遍的选举权，在将来，俄国立宪会议中百分之九十的代表，将是社会革命的拥护者；这个预言是为使“民意”的实际纲领与民粹派的一些理论相一致而匆忙想出的一些虚构的典型小例子。在此，我们的特殊性理论已经达到了海古里斯的石柱^①，一越过它们，就经不起普通的常识的驳斥。具有“旧信仰”的民粹派分子们，虽然坚持“特殊性”的教条，然而还承认，这一特殊性还需要某种最后的修订。有一些人觉得，俄国人民的赘疣还在初生的状态……——罪过！——还有勇敢与独立的感觉，另一些人力求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的情绪实现在同样特殊的革命组织中。但是大家都一样地承认了民间准备工作的必要性。民意派的分子们则更进一步。在自己的刊物头几期的社论中他们开始发挥如下的思想，说这样的工作，第一，是没有成果的（“在民间的奋斗正象鱼撞冰那样”）²⁶，而第二，也是多余的，因为百分之九十的代表们是同情社会革命的，这对于实现民粹派分子的意图说已经是十分够了。“民意派”纲领的民粹派性质，不过是把民粹派世界观的一切特点弄到荒谬的地步而已。

民意派的一些虚构的消极功绩就在这里。他们唤醒了俄国革

^① 古代神话谓直布罗陀峡在欧非两岸的山，是海古里斯所树立的石柱。照古希腊人的想象，海古里斯的石柱是世界的极限，即是说，达到了绝顶的荒谬。——译者

命家們的批評的思想，向他們以夸张的形式介紹他們的民粹派綱領的“特殊性”的特点。但是这些虛构有什么积极的貢獻怕很难說。他們暂时地巩固了一些需要为自己的实际活动找寻理論根据的战士們的精神，但是，由于这种理論根据他們是沒有消化的，所以經不起严肃批評的最輕微的接触。而这些虛构的失敗就影响了在他們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那一事业的名誉。“民意派”对于正統的民粹主义的全部传统既給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貢獻很多，因此，它不可以而且也不应当在現代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为自己找辯解。但是，为了站在这一新观点上，它必須把自己的綱領作一次很严重的修正，因为这一綱領的理論上的缺点和錯誤不能不給它在实际行动中产生一定的片面性。

在說到应当在哪一种意义上从事修正以前，我們將努力——依照我們的計劃——闡明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階級政治运动的关系。

二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我們用这个名称，所指的是于四十年代之初一方面在黑格尔哲学和另一方面在古典經濟学的强烈影响下，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而研究出来的共产主义学說；那一学說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全部进程給予了真实的解释，无情地破坏了資產階級理論家們的詭辯，并以“本世紀的充分知識”出而保卫无产阶级。这一学說不仅完全明确地表明了社会主义敌人們沒有一点科学知識，而且在指出他們的一些錯誤时，也給了它們以历史的解释，因此正如某个时候海姆关于黑格尔的哲学所說的，“把每一个为他所战胜的意見都挂在自己的凱旋的馬車后面”²⁷。正如达尔文以可惊地簡單同时又是严格科学的物种起源論丰富了

生物学一样，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也向我们表明了在一些生产力的发展中和在这些力量反对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斗争中社会组织形态变异的伟大原则。至于这一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究竟是誰，这大概是不需要說的。这一功勋无疑地是属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他們的学說对文明人类的现代革命运动的关系，正如某个时候，——他們中間的一个所說的——先进的德国哲学之对于德国解放运动的关系一样：他們的学說是它的头脑，正如无产阶级是它的心脏。但是不言自明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完結，我們之不能停留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上，正如物种起源論我們不能認為是自英国生物学家的主要著作問世以后即已最后确定一样。为确定新学說的一些基本原理，必須繼續对与之有关的问题的細节进行研究，即是补充和完成《共产党宣言》作者們在科学中所实现的革命的那种研究^①。社会学中沒有一部門在吸收他們的哲学—历史的观点时，不获得新的和异常广大的視野的。这些观点的有益影响，現在就已經开始表现在法的、历史的和所謂原始文化的范围内。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我們俄国，知道的人还是很少，因此我們認為在这里引出马克思本人的話的几段向讀者介紹，将不是多余的。

科学社会主义虽說导源于“康德和黑格尔”，但仍然是唯心主义之坚决的死敌。它（指科学社会主义。——譯者）把它（指唯心主义。——譯者）从实証主义者們如此热烈地接待了它的那一最后隱藏所——社会学里逐出。科学社会主义須以“唯物主义历史觀”为

^①（1905年版注）后来“马克思的批評家們”責备我們是“正統派”，說我們反对任何进一步发揮马克思的思想的企图。讀者会看出，我沒有暴露过类此的反对倾向。但是不言自明的是：作为理解马克思伟大理論的意义的他的学生，我，必須反对任何以陈旧的、早已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一些“教条”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的尝试。而我是尽我所能地尽了自己的这一責任的。

前提，即是說，它必須以社会关系的发展（虽說是在周围自然界的影響下）来解释人类发展的精神历史。从这一观点看，正如从維柯的观点看一样，“思想的过程去适应物的过程”，而不是相反的（即物的过程去适应思想的过程。——譯者）。使它們朝这一或那一方向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状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經濟結構。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遭遇到了—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关系，即遭遇到了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或那一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識形式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与物質生活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制約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概念決定人們的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而是人們的社会生活決定人們的概念……法权的关系，以及国家生活的形式，不能由自己得到說明，也不是由人类精神的所謂一般发展來說明，而是植基于生活的物質条件中，这些条件的总和，黑格尔依照十八世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解剖是应当在其經濟中寻求的。社会的物質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的語言說，和它們迄今在其中旋轉的那些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财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对它們的束縛。那时候社会革命时期就来到了。随着經濟基础的改变，建筑于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改变。沒有一个社会形式，在它任其有足够充分的空間发展的一切生产力发展以前，就会自己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們存在的物質条件在旧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以前永不会占据旧关系的位置。所以可以說，人类总是只把能胜任的任务提出在自己的前面，因为，在仔細考察时，总会发觉，任务自身只是在解决它的物質

条件已经存在或正处在发生的过程中的时候才出现。”^①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轻蔑嘲笑的态度来批评四十年代末那些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²⁹，他们这些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消极态度，并且向“民众鼓吹，说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里，民众不仅是一无所获，并且还会丧失一切”³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学说是真正的“革命的代数学”，如象某个时候赫尔岑关于黑格尔哲学所说的³¹。所以他们同情“任何一种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热烈地同情使得俄国，如他们所说的，成为欧洲革命的先进队伍的俄国运动³²。

但是，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十分明确和没有歧义，而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领域中却引起了许多误解。例如我们常常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俄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是在西欧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从马克思的学说似乎得出这样一种可笑的结论，即是说，俄国必须通过与西方已经走过的完全相同的那些历史—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深信这一结论之不可避免性的影响下，已经不止有一个俄国哲学家，既不了解马克思，又不了解西欧历史，却奋起反对《资本论》的作者，攻击他的思想是狭隘和死板的。但是，不说，这是对风车作斗争。我们的吉訶德先生们不了解，马克思只是把西欧的各种关系的历史看作是在这一地带已诞生并在成长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史的基础。马克思的一般哲学—历史观对现代西欧的关系，正如对希腊和罗马、印度和埃及的关系一样。它们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有在它们一般的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不说，不论《资本论》的作者，以及他的有名的朋友和合作

^① 参阅《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Vorwort, S.S. IV—VI.（《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IV—VI页。）28

者（指恩格斯。——譯者）都沒有从自己的視野中排除这一或那一国家的某些經濟特点；他們只是在它們里面寻求一切它的社会—政治和精神运动的解释。說他們不忽視我們的土地公社的重要性，从如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就是說，还在1882年1月他們就已經認為对于我們的土地公社的将来的命运不能作絕對的預言。在为我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譯本所写的序言（1882年，日内瓦）³³中他們甚至率直地說，俄国公社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直接过渡到高級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形式”。这些情况，据他們的意見，是与在西欧和在俄国的革命运动的进展有密切关系的。他們說：“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話，那末現今俄国公社公共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共产党宣言》，參閱人民出版社版，第4—5頁）怕很难有一个“民粹派”会想到否認关于解决公社問題的这种条件性。怕很难有誰会硬說，現代国家的压迫是有利于发展，或者哪怕是保存土地公社的。同样的，怕难有一个懂得現代文明社会經濟生活的国际关系的人会否認，俄国公社发展到“高級的共产主义形式”是和西方的工人运动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原来，这样看来，在馬克思关于俄国的思想中沒有任何与很明显的现实相矛盾的东西，因此，关于他的极端“西方化”的愚蠢成見，就失去了任何合理根据的影子了。

但是存在着另一种誤解，这种誤解和我們所关心的政治斗争在社会关系的改造事业中的重要性問題是直接有关的，而且它是基于对馬克思对人类文化发展中經濟因素的作用的看法的錯誤理解。这一看法常常被許多人解释为这样的意思，就是：《資本論》的作者对于社会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是最不重視的，認為它是不值得注意的次要問題，它不仅不是目的，而且甚至也不是有益活动的手段。直到現在我們常常遇到这样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們正是

根据这点忽视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他们说，经济关系是任何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些关系的改变是任何政治改造的原因。为了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必须注意的不只是后果，而且也要注意原因，不仅注意政治的组织，而且也要注意社会的经济组织。政治的组织不会使工人离他们的目的近一些，因为当他们对有财产的各阶级的经济依赖没有被去掉的时候，他们的政治上的被奴役将一直是继续的。工人们所使用的斗争手段必须符合于斗争的目的。经济的革命只有通过在经济基础上的斗争才能达到。

在某种彻底性之下，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改变社会主义者们对于社会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看法，使他们回到蒲鲁东的著名公式：“政治革命是目的，经济革命是手段”。同样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使社会主义革命者和那些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自动性的“保守社会主义的”信徒们，至少在理论上，大为接近起来³⁴。这一社会主义最后的和聪明的代表罗伯图斯，过去不肯和拉萨尔合作，就是因为这一有名的鼓动家曾努力推动德国工人们走上独立政治活动的道路。不是马克思，而是罗伯图斯，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君主的社会主义否认工人阶级的“附在经济目的上的一些政治混合物”的意义。而保守党人很清楚地懂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但是那些想使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对“政治”的否认相调和起来的人们，那些向马克思暗中指点蒲鲁东的或者甚至罗伯图斯的实际倾向的人，明显地表明，他们不理解《资本论》的作者或者自觉地歪曲他的学说。我们说自觉的歪曲，是因为莫斯科教授伊万纽可夫先生的有名的书就是这样自觉的歪曲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出来的一切成果，而不是别的³⁵。这本书表明，我们俄国的警察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为了自己的反动目的甚至利用正进行着现代最革命的运动的理论。单是这一事实就使人

覺得有詳細闡明現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綱領的必要。我們現在正从事于这样的闡明,然而不是讓自己陷入与象伊万紐可夫那样的先生們的任何論爭,因为只須闡明这一或那一理論的真正意义,就已够駁斥对它的一些故意的歪曲。而且我們在这里所关心得多的是那些意图虽然十分誠懇,可是浸透了(或者这是不自覺的)无政府主义学說的革命家,他們一心想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只适宜于放在《十九世紀革命中的总观念》³⁶中的那些思想。对他們由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中所做出的一些結論的批評,合乎邏輯地把我們引到所謂夺取政权的問題,而且向我們表明那些把夺取政权認為是反对人类自由的观念的罪行的人們,以及那些相反地認為这一行为是整个社会—革命运动終始的人正确到什么程度。

我們且先看看,关于原因与結果的概念在应用到社会关系上时有怎样的意义。

假使我們用手或球棍触动台球,那末它就运动起来;假使我們用鋼去击石块,那末火花会出现。在每一个这样的場合,很容易断定哪一个現象是原因,哪一个現象是結果。但是解决問題这样容易只是因为它是板端簡單。假使不是并存的两个現象,我們看到的是一种过程,其中同时可以看到几个現象,或者甚至几种現象,那末事情就大大复杂化了。例如,燃烧洋烛,相对地說,是相当复杂的过程,其結果是光和热。因此,好象我們可以把由火焰发出的热称做是这一化学过程的結果之一,应当没有什么錯誤了。它在一定程度內也是如此。但是假如由于某一种方法,我們巧妙地把火焰所生的热消灭,燃烧馬上就会停止,因为我們所想知道的过程在通常的温度之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誰如果說热是燃烧的原因,他在一定的程度內也是对的。为了既不向这方面、也不向那方面离开真理,我們应当說,在現時是燃烧結果的热,在紧接着的以后一个时刻就是

燃烧的原因。这是說，就連續几个时刻的燃烧过程說，热既是它的結果也是原因，或者，換句話說，不是結果，也不是原因，而只是为这一过程所引起的一些現象之一，而且这些現象自身又是它所必需的条件。我們再举另一个例子。每一个，“甚至沒有在中学讀过書的人”，都知道，人的机体的所謂生长过程对于心理現象会起巨大的影响。精神的这一或那一情緒是有机体的这一或那一生理状态的結果。但是既然存在着一定的精神情緒，那末这些生长过程本身也常常在自己身上經歷着它（即精神情緒。——譯者）的影响，因此它也成为机体的生理状态的这些或那些变化的原因。即便在这里为了不在这方面或另一方面犯錯誤，我們必須說，机体的心理現象和它的生理生活是两种同时存在的过程，同时，其中的每一种都感觉到別种的影响。假使某一医生，根据人的精神情緒是他身体的生理状态的結果而忽視了心理作用，我們就要說学校的邏輯使他沒有任何能力来当好医生。

社会生活的特点比个人的身体更为复杂。所以在社会生活中更可看出关于原因和結果的概念的相对性。据古典經濟学的学說，工資的高度，在平均的統計中，是由工人的最不可少的一些消費品的水平来決定的。这是說，工資的某种高度是工人消費水平的一定状态的結果。但是，从消費这方面看，这些消費只有在工資提高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因为不这样，消費与工資水平的改变就沒有充分的原因。因此，工資的一定高度是工人消費水平的一定状态的原因。我們是不能靠了原因与結果这些学校里的范畴来摆脱这一邏輯的循环的。而我們在我們的社会学議論中却每一步都将陷入其中，假使我們忘記，“原因和結果是这样的一些概念，它們本身只在应用于个别的場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們如果从其对于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上来研究这些个别的場合，那末这些概念就溶化为普遍

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在这中間原因与結果互相交替，所以現在或此地是結果的，在別一地方在別一时候就是原因了，反过来看也是如此”（弗·恩格斯）^{①37}。

在作了这一項保留以后，我們現在試努力确定，在哪种意义上应当理解某一社会的經濟关系和政治制度之間的因果联系。

在这一場合，历史教导我們什么呢？它向我們表明，不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只要經濟发展过程已經引起社会中階級的分化，这些階級的利害矛盾就必然使得它們为爭夺政治的支配权而进行斗争。这一斗争不仅发生在統治階級的不同阶层中，而且也发生在一方面是这些階級和另一方面是人民之間，只要后者处在哪怕是对于它的智力发展很少有利的条件下。在古代东方諸国家，我們看見战士与僧侶之間的斗争；古代世界史的全部戏剧性就是貴族与庶民；望族与平民的斗争；中世紀产生了城市人，他們尽力在自己公社的范围里夺取政治的統治地位；最后，現代的工人階級同在现代国家內达到了完全統治的有产階級进行斗争。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政治权力总是一个杠杆，借助于它，已經获得統治地位的階級来实现为它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变革。我們不要說很久以前的事，只回忆一下“第三等級”的历史，这个階級由于在生活和思想的一切部門充滿了光輝胜利，是可以驕傲地看待自己的过去的一个階級。很难有人会想到責备有产階級在以最适当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缺少聰明和能力。誰也不会否認，它的意图具有完全确定的經濟性質。然而这沒有妨碍过它走上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治权力的道路。新兴的有产階級，有时拿着武器在手，有时通过和平的协定，有时候为了自己各城市的共和政体的独

^① 參閱《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 der Wissensch.》，S.6.（《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第6頁。）

立，有时候为了加强国王权力，在几个世纪的时期内同封建制度进行了不断的顽强的斗争，以致在法国革命之前好久就能够对自己的敌人們驕傲地指出自己的成就。一个历史家說^①：“城市人在反封建主們的伟大斗争中的机会是不同的，成就也不一样，不仅用暴力或者通过和平的协定获得的一些自由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在城市的同一政治形式中所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其程度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运动的意义到处都是一样的，标志了第三等级社会解放的开始，和世俗、教会貴族的沒落”^②。总地說来，这一运动使城市人得到了“市政的独立、选举一切地方机关的权利、各种稅額的确定”，保证了在城市公社內部的个人权利^③，在“旧制度”的等级制的一些国家中給了资产阶级以較高的地位，加之一些經久的胜利，就使得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統治。资产阶级为自己規定完全确定的社会—經濟目的（虽说有时候这些目的也变更），从自己已經获得的物質地位的一些利益中吸取进一步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方法，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达到的經濟进步的阶段在法的上面表现出来，相反地是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每一政治成果在經濟領域中获取新的胜利。还在不久以前时代，在本世紀的四十年代的中期，英国的“反粮食法同盟”，依据里查德·柯

① 參閱《Essai sur l'histoire du Tiers État》，par Aug. Thierry, P.33—34. (梯叶里：《論第三等級史》，第33—34頁。)

② 封建制度的拥护者們对于城市人們的那些目的与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的联系是理解得十分清楚的。吉貝尔主教說：“公社是一个討厭的新字，它是意味着：必須納貢賦的人們，对自己的主人應納的租稅每年只交納一次。當他們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們付給由法律規定的罰款，至于說到农奴們普通承担的現金租稅，那末，他們是完全被免除了。”Laurent, 《La féodalité et l'église》，P.546. (洛兰：《封建制度与教会》，第546頁。)

③ 《流其法令》以如下的有力語言來規定住屋不可侵犯的原則：“貧民在自己的住宅中是國王”，Laurent, *ibid.*, P. 548. (洛兰，同上書，第548頁。)

布登的聰明計劃，达到了加强自己在“伯爵轄区”的政治影响的目的，因为它（指“反粮食法同盟”。——譯者）所恨的和显然只具有純粹經濟性質的那种“垄断”废除了³³。

历史是最大的辯証主义者，而假使在其运动的进程中，如象糜菲斯托菲尔所說的，理智变成荒謬，而善行成为痛苦的来源，那末在历史过程中同样常見的是，結果可以成为原因，原因也可以成为結果。資產階級的政治权力，由于是从与它同时的社会經濟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其自身又成了而且也在成为这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現在，当資產階級在走近自己历史作用的終結的阶段，和无产階級将成为社会中进步意图的唯一代表的时候，我們可以看到与上述的相类似的现象，虽然也是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实现的。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先进国家中，在欧洲和在美国一样，工人階級正在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它如果越自觉地对待自己的經濟任务，它就越坚决地把自己形成一个特殊的政党。我們在北美社会主义工党的綱領中讀道：“現時存在的政党既然永远是为了有产者們的利益，为了保卫他們的經濟特权而活动的，那末工人階級必須組織成为一个大的工人政党，才能获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借助于它爭得經濟的独立，因为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由工人們自己来完成。”^①法国工人政党本着这同一精神，而且完全依照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也是这样說的，它承認无产階級必須力求“用一切它所能支配的手段，包括把由迄今为止的欺騙工具变成解放工具的普遍选举权”，来达到經濟的革命。西班牙的工人政党也是在努力“夺取政权”来除掉那些橫在工人階級解放道路上的障碍^②。

① Von Studnitz,《Nordamerikanische Arbeiterverhältnisse》,S.353.〔封·斯图德尼茨：《北美工人状况》，第353頁。〕

在英国，从宪章运动³⁹ 停止的时候起，无产阶级的斗争完全集中在经济的园地内，最近工人们政治意图又开始活跃起来。不过是几年以前，德国的经济学家路易奥·布倫坦諾在自己的《Das Arbeitsverhältniss etc.》（《論劳动的条件等等》）一書中郑重地認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英国完全消失了，他并以真正资产阶级的自滿情緒，深思地空談什么“英国在現在正在重新組成为統一的民族”，“現代的英国工人正在重新成为伟大的自由党的一部分”，而不是意图夺取国家政权，以便借助于它“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改造社会”（第110頁）⁴⁰。不久以前发表的英国“民主主义联盟”⁴¹的宣言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欢乐有点为时过早。民主联盟意图喚起被剝削者从剝削者的政治影响下脱离出来，号召这些“民族”中的第一个民族（即工人阶级。——譯者）夺取国家政权，以便达到依照工人的利益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宣言說：“已經到了人民群众必須把有关自己的事务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現在是寄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那些人的垄断物。占有上議院和充滿下院的地主和資本家們，只是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去掉这两个集团的有錢的寄生虫們，只指靠自己罢！”宣言要求联合王国“全体成年的男女都有完全的投票权”并要求实现“只会表明这一国家的男女們是自己家內主人的”其他的政治改革。下面列举出——作为英国民主联盟的最近的要求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都是为发展“健康的、独立的和有严肃教育的后一代，为准备組織每个人的劳动去为全体人服务，而且，最后，为掌握不再有阶级的区分和特权的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机器”所必需的。

④ 我們引証的这一綱領是根据馬隆的書《Le nouveau parti》，t. I, p.15.（《新党》，第1卷，第15頁。）

这样看来，连英国的无产阶级也重新走上好久以前其他的一些文明国家的工人们所已经走上的那种道路了。

但是正如资产阶级不仅是在已经存在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来同贵族斗争、而且也意图为自己的利益来改造这些关系一样，无产阶级也不把自己的纲领限于夺取现代国家这个机器。在无产阶级中间越来越传播着一种信念：“确定公民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关系的每种事物的制度是与特殊的统治形式相适应的，而这种形式是在同一个时候实现和保护这种制度的手段。”^①然而正如代议的（君主的或共和的）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一样，无产阶级要求人民直接立法作为能实现它的社会意图的唯一政治形式。工人阶级的这一要求在所有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政纲中占着一个首要地位，而且和它的纲领的其余各点有着密切的联系^②。不愿蒲鲁东的主张，无产阶级继续把“政治革命”看成达到经济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单是这一历史的见证就应当引起我们有如下的思想：不是错误的理论而是正确的实际本能是各种社会阶级的政治倾向的基础。假使同自己的敌人进行自觉的斗争的一切阶级，尽管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在自己的发展的一定阶段都会开始努力为自己取得政治的影响，而后再达到统治地位，——那末，显然，社会的政治组织绝不是对于它们的发展不关重要的条件。而假使我们看见，除此以外，达到政治统治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忏悔自己对“政

① 参阅《Sozialdemokratische Abhandlungen》Von M. Rittinghausen, drittes Heft, 《Über die Nothwendigkeit der direkten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 S.3. [瑞欽豪生：《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札记》，第3册，《论直接人民立法的必要性》，第3页。]

② 参阅德国的和北美工人政党的纲领。英国民主党的宣言也要求“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实行直接投票”。

治”关心的动机；假使，相反的，其中的每一个都只是在他們取得了政治权力以后才达到自己发展的頂点，那末我們必須承認，政治斗争是一种社会改造手段，其适合性是历史所証明了的。任何一个学說，如果与这一历史的归納相矛盾，就失去其一大部分的确凿性，而假使現代社会主义真是斥責工人階級的政治意图，認其为不合目的，那末单就这一点說，它就不能称为是科学的。

我們現在試以演繹的方法来检查我們的态度，把馬克思对哲学—历史的見解看作我們的結論的前提。

我們試設想一个社会，其中某一階級已取得完全的統治地位。它之达到这一統治地位是由于自己的經濟地位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根据我們的前提，为它开辟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其他成就的道路。作为統治的階級，它，不消說，要社会組織产生最有利于自己存在的条件，而且从这些条件中，彻底地去掉一切足以这样或那样削弱它的影响的那些东西。謝夫萊說得对，“每一特定时期的統治階級，也就是它的法和习俗的創造者。它的成員們在尽力巩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并力求使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住它的时候，不过是服从他們的自我保卫的本能，而且这也是維持他們的特权地位和剝削被压迫者所必需的……实体法中几乎沒有一部分不享有来自某一时候占統治地位的等級的尊敬；沒有一部分不被推崇为‘永恒的’制度，或者甚至是社会的神圣基础，象巩固等級法权和保卫階級統治的那一部分一样。”^①而当統治階級还是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担当者的时候，它所創立的制度会滿足社会发展的一切要求。但是只要某社会的經濟史提出前进运动的要素的时候，只要它的“生产力和現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

^① 參閱 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 Körpers》, B.III, S.S. 91 und 102, [舍弗利:《社会机体的构造与生命》,第3卷,第91和102頁。]

律上的語言來說——和生產力一直在其內部旋轉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的話”，該統治階級的進步作用也就完結。統治階級從進步的代表變成了進步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時，不消說，它將利用國家機器供自我保衛的目的之用。政治權力在它的手中變成了最有力量的反動工具。為了替社會生產力開辟自由的道路，必需去掉阻撓這種發展的一些生產關係，即是說，如馬克思所說的，進行社會革命。但是只要立法權還在舊秩序的代表們手中，換言之，當它還保衛統治階級利益的時候，這就是不可能的。所以，革新者們，也就是說，被壓迫的階級或諸階級的代表如果企圖從自己的敵人手里擊落這一可怕武器，並把這個武器指向反對他們，這是沒有什麼可驚奇的。事物的邏輯本身推動他們走上政治鬥爭和奪取國家政權的道路，雖然他們所抱定的也是經濟變革的目的。拉薩爾在自己的《既得諸權利的體系》一書序言中說：“凡法律的關係，在過渡到私法領域時，看來象是失去了和政治的任何聯繫，實際上，在這種法律關係中，是比在政治本身，還有更多的政治的東西，因為這些法律關係那時候就是社會的因素。”^①

在實際生活中，當然，事情發生得遠不象我們 a priori（先驗地）所假定的那樣快。被壓迫階級只是逐步地明白自己的經濟情況和自己在國家中的政治作用之間的關係的。它長時間地甚至不能理解自己的全部經濟任務。被壓迫階級的個別的人們為自己的日常的生存進行了艱苦的鬥爭，但甚至不想一下，是社會組織的哪幾方面促成自己的貧困狀況的。他們力求避開他們所受的各种打擊，而不問問這些打擊是從哪里來的和由誰指導的。他們還沒有階級覺悟，在他們反對個別壓迫者的鬥爭中還沒有指導的觀念。

^① 參閱《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Leipzig 1880, erster Theil, Vorrede, S. VII.（《既得諸權利的體系》，萊比錫，1880年，第1卷，序言，第VII頁。）

被压迫阶级还没有自为的观念；它将来会是社会的先进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没有成为这样的阶级。和统治阶级的自觉组织起来的力量对抗的只是一些个人的或者个人组成的个别集团的分散的、零星的努力。例如，即在现在工人特别仇恨厉害的剥削者，也不算稀有的事，但是他没有想到反对整个剥削者阶级的必要性和去掉人剥削人的可能性。

然而，慢慢地概括的过程产生了结果，被压迫者们开始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但是他们把自己阶级地位的特点还理解得太片面，整个社会机构的弹条和原动力还没有为他们的智力所发现。他们认为剥削者们的阶级是一些个别企业家们的单纯的集合体，而没有被政治组织的诸线连结起来。被压迫者这个概念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正如在洛伦茨·斯坦因教授的头脑中一样，还不明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们以为国家的权力是高踞在阶级对抗之上的，它的代表们似乎是敌视双方的天然的裁判者和调和者。被压迫阶级是充分地信任他们的，而当他们向他们请求援助的申诉没有得到回答时，他们就大为惊异。不必叙述一些具体的例子，我们只须提到，象这样对概念的混淆直到最近还可以在英国工人们中间发现，他们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了有力的斗争，而同时却认为有可能侧身在这一或那一资产阶级的政党中。

只是在发展的下一和最后一阶段，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被压迫阶级理解到，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哪样的联系，他们不再去向那代表那同一剥削的政治机关的人们申诉自己的剥削者们的自己的压迫了。它知道，国家是一个要塞，是保卫它的压迫者的屏障和防御物，是一个可以而且应当占有的要塞，可以而且应当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它改造的要塞，但是不能信赖着它的中立而回避它。如朗格所说，被压迫者们只是在指

靠自己时开始理解到“政治的自助是各种社会自助中的最重要的一种”。他们那时候力求争取政治的统治地位，以便借着它改变现在的一些社会关系并使社会制度成为适应于自己发展和繁荣的手段。不消说，他们也不是突然达到统治地位的；他们只是逐渐地才能成为排除敌人头脑中的任何抵抗思想的威胁力量。长时间他们只是获得一些让步，所要求的只是那样一些不会使他们达到统治地位、而只是给他们以机会生长与成熟起来实现将来的统治的改良；这些改良只可以满足他们最迫切、最近的要求，只可以稍为把他们的影响范围扩大到国家的社会生活上。只有通过取得个别小块敌人领土的严酷的锻炼，被压迫阶级才可以养成坚决战斗所必需的坚定性、勇敢和熟练。但是一旦被压迫阶级获得了这些品质，它就可以把自己的敌人看成已为历史所最后定罪的阶级；它就不怀疑自己的胜利了。所谓革命只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长剧中的最后一幕，这一斗争之将成为自觉的，只是因为它成为政治的斗争^①。

现在试问，社会主义者们如果根据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受它的经济的各种关系所制约的那种理由，来阻挠工人过问“政治”，这样做是否合理呢？当然是不合理的。他们就会剥夺了工人们所赖以进行斗争的据点，使他们没有可能来集中自己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打击对准他们的剥削者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要不是这样的话，工人们就只得同个别的剥削者们，或者，最多，同这些剥削者们的个别集团进行游击战，而国家的有组织的力量还始终是站在他们那

^① [1905年版注]这几行是十五年以前在反对伯恩斯坦先生扮演“马克思的批评家”角色以前写的。请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位“批评家”以及他的许多同志们说我们这些“正统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为简单的、几乎是顷刻的“突变”这一责备是否正确。

一方面。所謂知識分子出身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当“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有名的一些政治要求⁴²，而他們責备它时（在《土地与自由》第4期上），正是犯了这样的錯誤。《种子》杂志⁴³，当向工人們推荐在經濟范围内进行斗争以达到縮短工时，提高工資等等，甚至劝他們杀死特务、尤其是不为人喜爱的工长和企业家，而一句話也不說到俄国工人們的政治任务的时候，也是重复了这一錯誤。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缺乏对革命思想和綱領的綜合結論，不能不对他們的活动的結果产生最有害的影响。我們若把保存工人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作为他們的經濟要求的急进主义之最重要的特征时，我們从而是对現代的专制制度給予了間接的支持。此外，在我們的綱領正在需要对工人階級的社会要求作出政治总结的那个关键地方上，把它截断，我們就是在工人們的眼睛里縮小了这些綱領的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工人們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对个别的剝削者作散漫的斗争是毫无結果的。幸而，我們的工人运动很早就发展得高过了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对《土地与自由》編輯部的回答（見这个刊物的第5期）表明了，至少，这个协会的會員們比我們的“知識分子們”更早些地理解到，工人階級“不干涉政治”的完全不合理性⁴⁴。

所有这些都好极了，有的讀者会說，但是您的論据沒有击中目标。我們不否認工人階級会觉得获得政治影响和把政治权力夺在自己手中是有益的；我們只是断定在現時，由于許多原因这对于它还是不可能的。你們引証資產階級的历史是不能作为証据的，因为无产階級在資產階級社会中的地位与在“旧制度”的一些国家中的第三等級的地位完全不同。馬克思本人承認这一不相同，并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如下：“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也如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資产者曾能掙扎到資产者

的地位一样。反之，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向上升进，而是愈益降到本阶级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更快。”⁴⁵ 假使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的范围内每前进一步是有“相应的一些政治胜利伴随着”，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或别一阶级的物质生活的改善是它的政治影响增长的结果。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是以它的财富的增加为前提的，也正是这一事实，迫使人们把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看成是无希望的。越来越多的人变成“赤贫者”的时候，看来工人们一定要把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时所获得的一点势力，即是在“打击自己的敌人的敌人——君主专制的余孽、地主、非工业资产者”等等中所获得的势力丧失，所以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是不适宜的，因为，由于它的经济地位，它是注定地不会成功的。

虽然这一反对意见本身是完全站不住的，但是初看起来它好象是这样的坚决以致不能对它缄默。这种反对意见是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的信徒而又主张不干涉政治的理论的人的论据的最后根据^①。所以，如果把这一反对意见打消，不干涉的理论也将最后地破产，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也将显露出其真正的面目。

工人阶级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是在不断减少的，——这是一

^① (1965年版注)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理论正是巴枯宁作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出的结论而表述的。这种说法的热烈拥护者巴枯宁是这样谈论的：假如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以它的经济为基础，那末政治革命是多余的；它自身将是经济革命的结果。这一曾经当过黑格尔的学生，而且似乎应当是十分熟悉自己逻辑的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成为经济的结果的不仅是任何一定的、现成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有任何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当这个政治运动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后，本身又是改造它们所必需的工具。直到现在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者的一切最严肃的论据都是建立在这一误会之上的。

点也不可怀疑的。工人阶级不仅是日渐相对地、而且也是绝对地贫困，它的所得不仅不是同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所得一齐增加，而是减低了；现代无产者的实际工资（为他所得到的消费品的数量）是比五百年以前工人的工资要少些⁴⁶——这是罗杰斯、杜沙特尔⁴⁷和其他的人的研究所证明了的^①。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时的经济条件比他们在十四世纪时要不利一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对一个国家经济条件作这样一种估计，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所得的分配，而且，主要地，应注意到产品之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交换的方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财富，而且也在于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者。推动资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和保证它的政治影响的增加的不是它的收入的增加，而是它所唤起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既做了这一社会的进步要求的代表，它就把这社会的一切不满意分子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去反对那一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仇恨的制度。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的状况给它（新兴的资产阶级。——译者）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即在那时候已经是相当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是为实现这一作用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必需是受什么决定的呢？首先在于它不可能没有居民中低下阶层的帮助就可以进行破坏旧制度的工作。在这里财富就帮了它的忙。财富使它（资产阶级。——译者）在那一应当为它的统治而作战的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有财富，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势力，而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影响，它就不可

^① [1905年版注] 这是讲的“伯恩斯坦主义”时期的一些争吵所引起来的“贫困化理论”。关于这个理论，请看《曙光》第2册和第3册中我的论文《对我们的批评者们的批评》43。

能战胜贵族，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所统治着、并由自己的各种资本而得以号令的那一力量。现在试问，无产阶级能不能对于居民中的任何一个别的阶级发生这样的影响呢，而这种影响是否为其的胜利所必要呢？只需这样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从任何一个懂得工人阶级的现代地位的人那里，听到一个坚决的回答：“不必要”。无产阶级对于下层的各阶级不可能起影响，象某个时候资产阶级对它所起的影响那样，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还更低；它是现代社会的最后的经济形态。而且它也不需要获得这样的影响，因为它同时也是这一社会人口中最多的阶层，因为它正是和劳动人民的其他阶层在一起，其干涉总是决定了政治争论的那个中介。我们说“人口中最多的阶级”，是因为一切“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专为挽救他们这种中等阶级生存地位于灭亡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行将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为他们不是捍卫着他们现在的利益而是捍卫着他们将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抛弃他们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⁴⁹。

从前工人阶级胜利了，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胜利的，而工人阶级只是对那种几乎一切斗争的困难都落在自己身上，而几乎一切利益和胜利的荣誉都为它的同盟者所得的奇怪情况感到惊异。现在它不满足于当帮忙角色的作用了，于是把在某个时候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那种力量转而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现在这一力量是大为增加了。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资本集中和大生产扩张的那种规模而增长的，并且正在继续增长。此外，这种力量的增长也

是按照被资产阶级自己提到社会活动舞台上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验积累的速度进行的。难道可以怀疑，某个时候曾强大到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足以能破坏封建专制主义的无产阶级，有一天会强大到能主动地去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吗？资产阶级之战胜封建制度只是由于自己的财富，无产阶级之战胜资产阶级正由于它的命运——“贫穷”——将成为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的命运。

但是在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中，财富为它作了另一种、而且还是一种极大的“生产上的服务”，如一些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财富使资产阶级有了知识，使它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先进和最有教养的阶层。可是无产阶级能不能获得这样的知识，能不能够既是一切社会阶级中最贫穷的同时又是最发达的阶级呢？对于无产阶级我来，没有这一条件，政治上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权力！

我们已经说过，资产阶级自己开始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它关心无产阶级的教育，因为这对于同它的敌人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它在认为有削弱教会的政治重要性的必要的地方，就破坏无产阶级对宗教的信仰；它在认为需要以“自然的”法来对抗等级国家的成文法的地方，就扩大无产阶级的法的思想。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是经济问题，而政治经济学现在起的作用——如象一个聪明的德国人^①说的——是象十八世纪自然法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那样⁵⁰。资产阶级在研究了劳动对资本的关系这一全部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时，愿意做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吗？它甚至不愿意担当这一对自己有利的任务，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意

^① [1905年版注] 即罗伯图斯。

味着威胁到它的統治。而且它是否能象某个时候对待宗教和法制那样,来执行这一任务嗎? 不会的! 它的博学的代表們由于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所迷惑,已經有好久失去了对社会各种問題的任何客观的、科学的研究能力。这就是资产阶级經濟学現代沒落的原因之秘密。李嘉图是最后的、虽說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还有相当智慧理解到劳动与資本的利益的完全对立一个的經濟学家。西斯蒙第是最后的一个有相当感情、不是伪善地为这一对抗悲伤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在他們以后,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們一般的、理論的研究,大部分失去了任何科学的意义。为了深信这一点,我們只須回忆一下从李嘉图以来的政治經濟学史,观赏一下巴斯夏,克里,勒卢阿一波里埃的,或者哪怕是現代講坛社会主义者們的著作⁵¹。资产阶级的經濟学家們从和平的客观的思想家变成了資本的战士和卫兵,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用在改造科学体系使其适应軍事目的这件事上面。但是,尽管有这些战斗的演习,他們还是不断地退却,把在某个时候为他們不受监督地統治着的那个科学領域放弃給了敌人。在現在的时候,甚至完全沒有任何“恶意煽动”意图的人們,也說工人們对于經濟科学中的概念似乎“比任何一个普林斯·斯密或福赫尔还理解得”更清楚些。例如,一个其姓名在德国經濟学家們中間有很大声望,但是对他們却滿怀着輕視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这个人接着就說:“我們看工人們,就象看一些兒童,但是他們已长得比我們高出一头了。”^①

但是他的話里有沒有夸大的成分呢? 工人阶级理解現代經濟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抽象”問題,我們姑不說比那些受了几十年教育的人們要好些,但是能不能和他們一样的好呢?

① [1905年版注] 我又是指的罗伯图斯。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它是人类某个有闲暇的好心肠的人的臆测，还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或那样遇到的一些同样现象的概括，是决定我们在参加产品的生产、交换，或者仅仅分配的那些规律的说明呢？谁要按照最后的这个意义解答这一问题，那就是同意工人阶级有很多机会来正确理解社会经济的“最抽象的”规律，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抽象的原理。了解这一或那一科学的困难是由于不完全知道作为这些规律的基础的资料。在所谈的只是日常生活的现象的地方，在科学规律所概括的只是每一已知情况的地方，那里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不仅极好地了解理论的原理，而且有时也能教这些理论家们本人。试问一下乡村的主人关于遥远的市场对他的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或者土壤的肥沃对地租涨价的影响。试问一下工厂主，市场扩大对减低生产成本的影响。试问一下工人，他的雇主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您可以相信，所有这些人人都知道李嘉图，虽然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书的封面。而这些是以极复杂和“抽象”的问题闻名的；而且为了它们，已经流了象海洋那样多的墨水，写成了卷帙浩繁的书籍，因此在着手研究经济科学时可能会被这一大堆的印刷纸张吓倒。而在一切里面，在社会经济的一切部门里都是这样的情形！试拿交换价值的理论说罢。您可以用两句话向工人解释，它是由什么决定和怎样被决定的；然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生们直到现在不愿或者不能理解这一极为简单的理论，而在关于它的争论中却陷入如此重大的逻辑错误，以致没有一个算术教员对犯这样错误的“小学生”给以最低分数，会感觉难为情的。所以我们也以为，我们所引证过的作家，当他认为现在，在对待迫切社会问题上，只有由无产者或者是抱有无产阶级观点的人们所组成的听众，才是唯一智慧的听众的时候是正确的。而他们一旦掌

握了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就已没有什么困难；在这里，工人将只是遵循着自己的实际经验的指示。事情的这一方面已为马克思本人阐释得极明白。我们在他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读到：“如果无产阶级宣告整个现在制度的解体，那末只不过是以此揭示出自己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制度的实际解体。如果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制，那末只不过是把社会自身所已提升为它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任何协助，作为社会否定的结果而存在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①⁵²

由此，我们看见，无产阶级不需要物质财富，就可以发展到理解自己解放的诸条件。它的赤贫，不是由社会的贫穷和野蛮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组织的一些缺陷造成的，这样的贫穷，不仅不增加对这些条件的理解的困难，而是把它变得容易。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分配的一些规律是对于工人阶级极为不利的。但是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组织和交换形式第一次创造了解放劳动人民的客观和主观的可能性。资本主义扩大了工人的世界观，打破了他们从旧社会承受下来的一切成见；它推动他们去斗争，是在增加他们的人数和提供给他们以组织劳动王国的经济可能而保证了他们的胜利。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人对自然的支配，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那样的程度，使得强制的劳动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成员全面发展的阻碍，而是相反的，成为它的必须条件。同时，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社会化，为生产手段和产品的公共所有开辟了道路。股份公司，这一在现时工业企业的最高形式，消除了资本家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任何积极作用，把他们变成一些懒汉，他们的消灭，在这一生活进程中不会产生一点点的混

① 参阅《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 u. 2. Lieferung, S. S. 81—85, (《德法年鉴》第1册和第2册,第81—85页。)

乱。保守党人罗伯图斯說：“假使活动的族长們能在当年不費力地把懶惰寄生的王朝从宝座上推下来，那末为什么工人們（公司的職員就是熟練的工作者）的生气勃勃而有力的組織，为什么这样的組織不能在将来消灭这些变为單純收益人的所有者呢？……然而資本已經不能逃避这条道路，資本已經经历了繁荣的时期，也将变成自己的掘墓人！”

我們也同样要問，为什么那个工人組織本身将能“消灭已变为單純收益人的所有者”，为什么这样的組織不能夺取国家政权到自己手里，由此达到政治上的統治呢？須知第一件事是以第二件事为前提：“消灭”所有者們的只能是战胜了他們政治抵抗的那一組織。

但是还不止此；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将增加无产階級政治胜利机会的現象。

“工业的进步将統治階級中整个整个阶层抛到无产階級队伍里去，或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們也給无产階級带来大量的知識原素。”

“最后，在階級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統治階級内部，整个旧社会内部瓦解的过程便来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銳，致使統治階級中有一小部分人脱离出去而归附于革命階級，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的階級。所以，正如先前有一部分貴族分子曾轉到資产階級方面一样，現在也有一部分資产階級分子轉到无产階級方面来，而这便是已經进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那一部分資产者思想家。”⁵³

在北几里亚的黑人們那里有一个絕妙的傳說。依照这一傳說的說法，“上帝有一次呼喚人类第一对配偶的两个兒子到他面前。其中一个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上帝在他們的面前放了一堆黃金和一本書，命令黑色的哥哥从这些物品中任意选择一

种。他选择了黄金，弟弟因此就得到了书。没有人知道的一种力量很快把弟弟同他的书一齐带到辽远而严寒的国度里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书，他变成了学者和变得令人害怕和强壮了。哥哥依旧留在故乡，生活了相当长久，这才看见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

资产阶级某个时候也曾拥有知识和财富。它和黑人传说中的黑色兄弟相反，占有了金子，也占有书，因为人类社会的神、即历史，不承认未成年的诸阶级的权利，把他们交给他们的哥哥们去监护。但被历史待遇不公的工人阶级已经从童年长成一个大人了，资产阶级不得不与他平分家产的时候到了。他的手中还有金子，然而他的兄弟得到了“书”，由于有了书，尽管自己的地窖是多么黑暗和寒冷，现在已变得强壮和令人害怕了。渐渐科学社会主义把资产阶级的一些理论从这本魔书的篇幅里排挤出去，并且很快无产阶级就在它里面读到怎样为自己争得物质幸福。那时候他将把资本主义的可耻的镣铐打碎，对着资产阶级证明，“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

三

在第一章我们已尽力从历史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任何“政治”都是不相容的那种信念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看到了，这一信念所依据的，一方面是蒲鲁东—巴枯宁关于国家的学说，另一方面是七十年代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的某种不彻底性。除此以外，这一信念还遇到了上述这两种倾向所由产生的那一背景的一般色调的支持。这一背景，如我们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各种创始人们的各种学说的混合物所组成的。大家知道，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消极地看待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的，他们把这些运动看作“只是对新福音的盲目不信任”。这一对“政治”的消

极看法同烏托邦主义者們的学說一道帶給了我們。在稍为强有力的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前好久，我們的社会主义者曾准备——同四十年代末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們一样（参閱《共产党宣言》，）——“因循惯例地去抨击自由主义、代議制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言論自由、资产阶级的法律、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而完全忘記了，所有这一切攻击“所指的是現代资产阶级社会，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經濟諸关系和政治組織”，也就是說，正是在我們祖国所应当談論和爭取的那些条件^{①54}。

由于这一切影响，就得到了認為除了狹隘的和庸俗的革命斗争以外，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不适宜的一种坚定信念，因此我們是怀着成見去看那些西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因为它們認為，例如，选举的鼓动是教育和組織工人群众的强有力的手段。一切通过这一鼓动而得到的政治和經濟的成果，在我們認為都是不可寬恕的机会主义，是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魔鬼的极危险的勾結，等于放弃将来社会主义生活的幸福。我們自己也沒有觉察到，我們的理論把我們带进了一个許多不可解决的矛盾的絕境。我們認為土地公社是俄国社会—經濟发展的出发点，而同时我們拒絕政治斗争，我們自願地剥夺了自己用国家干涉这种方法来使这一公社免于遭受目前各种破坏影响的可能性。这样，我們就成为破坏那一基础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我們却曾打算在它上面建起将来的建筑呢。

然而，我們看見了，事变的邏輯把俄国的运动带到了另一条路上，迫使以“民意”党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力求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統治权，認為这是經濟革命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我們也看見了，我們的运动在走上这一道路时，是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各种

^① 不过以上所說，与在日内瓦出版《人民事业》的那一集团，即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对“不干涉政治理論”的否定态度的集团无关⁵⁵。

各样的蒲魯东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論竟对它是太狹隘和太不便利了。为俄国社会生活所特有的事物进程已和在我們的革命环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进程相冲突，因此喚起了新的精神潮流。

这一新的精神潮流，我們往下就要說，只要它还没有和无比地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現代社会主义潮流相汇合，就不能摆脱它現在所独有的那些矛盾。俄国的革命者应当抱定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与各种“暴动派”的理論决裂，正如几年以前在自己的綱領中采納新的政治因素时放弃“暴动派”的实践一样。如果他們努力掌握馬克思学說中关于政治方面的正确观点而且願意应用这一新标准对自己的斗争方法和当前任务重新加以审查，这将是不难做到的。

我們在第2章中已經看見現代社会主义的哲学—历史觀的前提引起了一些多么荒謬的結論。《民意》本身，显然沒有看到这些結論的錯誤性，而且傾向于“甚至替杜林的关于在社会制度中政治—法律因素对經濟因素占有优势的社会学观点”辯护，如象彼·拉·拉甫罗夫在描述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最近思潮时所說的那樣^①。只有靠这一傾向我們才能解释登載在《民意》第6期国内評論中的某些“反对馬克思历史理論的直率的解释者們”的那一論爭，这些解释者們的見解，如作者說的，“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有名的三段式”，而沒有“別的归納的材料”做自己的結論的根据，他們解释“黑格尔的規律，是根据下列意义：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②。只要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或法国集体主义者的綱領，我們就能看見“馬克思历史理論”的西歐信

① 參閱論文《对过去和現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1883年民意大事記》，第109頁。

② (1905年版注)后来这一胡說为我們的“合法的”批評家們——如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伙伴們，用各种調子重复。一般地应当指出，这些先生們在和我們爭論时，完全不能想出与在不合法的文獻中写出来反对我們的那些东西比較起来，有任何更新的东

徒們，以及“直率的解釋者”是怎樣理解“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就我們這方面說，我們可以告訴我們的俄國同志們，這些“解釋者們”決不是“根據壞東西單靠自己的板端發展一定會達到好東西這個意義”來理解“黑格爾規律”的，而他們只在研究德國哲學史時才利用“歸納的材料”，在德國哲學史里面這一規律占有極顯著的地位，而且從德國哲學史里面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一規律挖去，正如俗話所說的，不能把詞從歌曲中刪去一樣。我們所引証的一處幾乎完全是重複杜林的話，他責備馬克思，說在馬克思的歷史圖案中“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起了——由於缺少更好的和更明了的手段——助產婆的作用，借助她，未來將從現在的內部產生出來”^③。但是這一狂語已從恩格斯方面得到了應得的懲罰，他揭露了前柏林副教授的著作沒有絲毫科學價值。為什麼重複一些別人的錯誤，和在這樣動搖的基礎上對十九世紀的最偉大的和最革命的社会理論採取否定的態度呢？要知道，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名副其實的革命運動。任何一個力圖解放自己的階級，任何一個力求達到統治的政黨，只有在它代表最進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時代的最先進思想的擔當者的時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內容說，革命的思想是一種炸藥，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們的革命運動是在落后的或者錯誤的理論旗幟下發生的話，它將只在某几方面，但遠不是在一切方面有革命的意義。同時革命運動將在自己里面含有一些連自己的參加者也不知道的反動的胚胎，這些反動的胚胎將在或早或遲將要臨近的將來使它失去

西。誰如果想相信這一點，請讀一讀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民意導報》的第2冊中寫的論文（《我們從革命期待甚麼》），並比較一下在好多時以後他們在自己的書中駁斥別爾托夫所用的那些論據⁵⁶。我國的“不合法的”思想很早就跑到“合法的”思想的前面去了。

③ 參閱《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dritte Auflage, S.498.（《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第3版，第498頁。）

这一部分的意义，因为，海涅早就说过，任何一个人

在新的时候为新的事业
就需要新的服装。

须知最后，它，这一真正的新时代在我们的祖国也是将要到来的。

不过，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些或那些原理的不正确理解，还不是妨碍我们革命运动最后走上为西方工人阶级所已开辟的道路的主要障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最密切的了解将向我们社会主义者们指出，他们如果拒绝理解和掌握“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的学说，就等于使自己失去一个多么有力的武器。那时候他们会相信，如果俄国的民粹派分子们和俄国的民意派分子们，最后，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最高的观点把我们的一切现有的派别（这些派别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对的地方，因为，它们虽然有自己的片面性，其中的每一个都表达了俄国社会生活的一定的迫切的要求）都调和起来的话，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不受丝毫损失，而且相反地，会赢得很多东西。

我们的运动如果按照刚才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话，也是有另一种阻碍的。这种阻碍就是，我们缺乏政治的观察力，由于这种缺乏，从运动的一开始，就妨碍了我们的革命者们使自己的当前任务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而缺乏政治观察力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们的政治经验不够。不论我们出发到民间去是为了推广社会主义的出版物，或者我们定居在乡村是为了组织我们农民中间的反抗分子，或者我们直接去同专制制度的代表们斗争，我们会到处重复这同一的错误。我们始终夸大了自己的力量，从没有完全充分地考虑到社会中间对我们将发生的抵抗，

而且急忙地把环境造成的对我们暂时有利的行动方式认为是排斥了一切其他的方式方法的普遍的原则。我们的一切纲领，因为这样，就陷于完全不稳的平衡状态，连周围环境中的最小变化也会使它们失去平衡。我们几乎是每隔两年就改变一下这些纲领而不能站在什么牢固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始终是停在某种狭隘的和片面的东西上的。正象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俄国社会，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学，已经经历过所有的文学派别，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还没有变成我们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候，已经及时地尝试了各种各色的西欧社会主义。

“民意”担当起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即在把我们的革命家们推到更广泛的活动道路上，在迫使他们企求创造真正的政党时，毫无疑问的，对消除小组习气的片面性，做了有力的帮助。但是，为了停止不断的更换纲领，为了摆脱一些政治游牧人的习惯，和最后，获得智力上的定居，俄国的革命者们必须把随着他们之间的自觉的政治倾向而开始发生的批评工作贯彻到底。他们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那个纲领本身，因为它曾对以前一切的纲领和理论进行过必要的批判。“民意党”是过渡时期的产儿。它的纲领是在使得我们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因而也是合于规律的现象的那些条件中产生的最后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在扩大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视野时，本身还不免有片面性。在这个纲领里也看得出缺乏政治的远见，缺乏使党的当前目的与它的真实或可能的诸力量相适应的能力。民意党好象是一个在真实的路上走，但是对于距离还没有概念的人，因此相信他“马上可以一走就是十万里，在任何地方都不休息”。实践，不消说，破坏了他的幻想，但是这一破坏可能使他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好让他自己反省一下，七英里一步是不是属于幻想的领域。

我們所說的七英里一步的步伐所指的是已講过的我們所关心的綱領中的幻想成分，它在《民意》第2期上表現为对于未来立宪議會中的社会革命的（我們姑不說社会主义的）代表将占多数这个信念⁵⁷，而在第8—9期上表現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夺取政权”的一些談論⁵⁸。我們深信，这一空想的成分对于“民意党”自身是极端有害的。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它对“民意党”之有害，是因为它使“民意党”脱离了在俄国工人阶级中間的直接任务；作为担负我們解放运动主动者來說，它的有害是因为它永久会把許多为它在別的条件下能吸引的所謂社会中的人力和物力推开。我們試說得詳細一些。

“民意”在同专制制度斗争中在求助于誰？可以而且应当求助于誰呢？我們在《民意大事記》^①中讀到：“把从农民中間的、与‘民意’組織有联系的个别分子吸收到組織里面来，当然，是始終被認為有益的事⁵⁹……但是至于說到現時农民群众的組織，这在制定这一綱領的时代被認為完全是空想的，而假使我們沒有弄錯的話，更进一步的实践也不能改变我們社会主义者在这一方面的意見。”难道，“民意党”不是依靠我們劳苦群众的前进阶层、也就是城市工人嗎？它，确实极重視在他們中間的宣传和組織工作，它認為，“城市的劳动居民应当引起党對他們的严肃注意”。但是对这一事情的必要性的說明就表明——据“民意党”的概念——城市工人应当只是我們革命运动的因素之一。該文件向我們解釋說，他們“对于革命有特別重要的意义，这是無論就他們的地位，以及就其較大的成熟性說都是如此的，第一次攻击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工人和軍隊的行動”。这是說，行将到来的革命将不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革命，但

① 《党的准备工作》，第129頁的注（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是工人们必须参加在其中，因为他们“对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还有哪一些因素参加这一运动呢？我们已看见，“军队”也参加在里面，而在军队里，“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士兵中间的宣传是困难到这一步田地，以致我们不能对它寄予很多希望。便利得更多的是对军官阶层的影响：他们是更有教养的，更自由的，更容易受到影响的！”当然，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现在暂不研究这点，我们要进一步论述。除了工人们和“军官”之外，民意党心目中也有自由主义者^们和“欧洲”，对于欧洲“党的政策应当是力求使俄国革命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唤起欧洲公众意见对这一革命的同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党必须让欧洲知道，俄国专制制度对欧洲文明的整个毁灭性的意义，使它知道党的一些真正目的，使它知道作为表现全体人民抗议的我们革命运动的意义”。至于说到“自由主义者^们”，那末对于他们“应当不隐藏自己的急进主义，指出在各党现在规定的任务之下，我们的和他们的利益迫使着我们在反对政府上面采取共同行动”。

这样，我们看见，“民意党”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而且甚至主要地不是依靠这些阶级。它也注意到了社会、军官阶层，后者，实质上是和这同一社会“血肉相关”的。它要说服这一社会的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人，“在各党现在规定的任务之下”，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做些什么，才可以使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产生这一信念呢？它印发，第一，“执行委员会”的纲领⁶⁰，里面说：“如果是由自由、普遍选举所选出并接受选民训令的立宪议会，那么它将会很好地表达和执行民意”。在有名的“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执行委员会也要求“召集全俄国人民的代表来重新审查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现有形式，并要求按照人民的意愿来改造这些形式”⁶¹。这样的纲领，确实是和俄国自由主义者

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为了实现它，他们大概也会迁就“执行委员会”所不能不要求的普遍选举权。在这一切上面该委员会的纲领暴露了比在它以前的一切纲领所暴露的更为成熟的东西。但是，姑不说象要求集会、言论、出版和各种选举纲领的自由，只是“作为临时的措施”提出的这一重大缺点^{①62}。我们只须记着“民意”党的其他的一些声明。这个党的机关报急忙向读者预告说，立宪议会的多数代表将由急进经济变革的拥护者组成。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一信念不过是为了把民意派纲领中各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而想出的一种虚构。我们现在试从策略上的观点看看这一信念在出版物上怎样表现出来。试问，难道经济变革也是符合俄国自由主义的利益吗？难道我们的自由主义社会同情——照《民意》上所說的——农民代表们所将争取到的那一土地革命吗？西欧的历史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凡是“红色的幽灵”稍一带威胁形式的地方，“自由主义者”就准备着在不客气的军事独裁的怀抱里寻求保护。恐怖主义的机关报难道认为，我们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这一般规则的例外吗？如果是这样，它的信念是以什么为根据呢？难道他也认为，现在“欧洲舆论”如此充满社会主义的理想，以致会同情社会革命的立宪议会的召集吗？或者它以为，欧洲的资产阶级当在自己家里的红色幽灵之前发抖时，将为它在俄国的出现而欢呼吗？不消说，它没有想过这类事情，也没有忘记过这类事情。但是，假如是这样，为什么做这一类冒险的声明呢？或者“民意党”的机关报对于自己的预言必定会实现这一点，相信到认为必须唤起组织内的成员们采取适合于所期待的事件的重要措施吗？但是由于同一机关报宣布过在民间的活动是无结果的，我们认为，这一

① 参阅《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民意大事记》，第14页。

声明，宁可說是有属于安慰人心、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性質：人們是在期待着立宪議會中的社会革命的多数，尽管这种活动現在使人想起“但納依的无底的桶”①。

我們可以認為，这一声明，就其本身說，是不重要的，尤其因为“民意”自己，显然是放弃了对于未来俄国制宪議会的过分乐观希望。我們这样想是因为第8—9期的社論中說到經濟的变革，在民間缺少社会革命的主动性的場合，經濟变革必須由“临时革命政府”在召集立宪議會之先进行。社論的作者完全正确地看出只是这样的变革才能保証“在已召集的等級會議中將出現人民的真正代表”。“民意”的从前的幻想，因此是完全消散了。但是，不幸的是，它的消失只是為了讓位給新的、对于“民意”党本身的事业还更有害的幻想。綱領的幻想因素沒有被丟掉，它只是采取了新的形态，現在被称为“临时革命政府夺取政权”，它应当使党有可能完成已叙述过的經濟变革。不消說，这一新的“現在規定的各党的任务”无论怎样也不会使得俄国自由主义者們，也不会使得資產階級的欧洲想到他們的利益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俄国社会怎样受压制，怎样受欺侮，但是它完全沒有丧失自卫的本能，絕不会自願地去迎接“紅色的幽灵”；对俄国社会指出党的任务的这样“規定”——就是讓自己失去它的帮助和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究竟有多大，以致可以冒险推开这样的同盟者呢？我們的革命家們能不能真正把政权夺取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保持住它哪怕一个短时候呢？或者关于这点的一切談論不是别的、只是剝一个不仅未被杀死，而且根据实际情况，还是不該被杀害的野兽的皮呢？这就是革命的俄国最近所面臨的問題。

① “但納依的无底的桶”系指沒有完的和沒有成果的工作的意思。——譯者

我們应赶快再附带說一下。上面几頁应当能使讀者相信，我們不是在原則上反对革命政党夺取政权这样行为的人，按照我們的意見，它是任何一个階級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須开始的政治斗争的最后和完全不可避免的結論。达到政治統治地位的革命階級只有当它用国家政权这一有力的武器打击反动势力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保持得住这一統治，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比較安全地避免反动势力的打击。浮士德說 Den Teufel halte, wer ihn hält!①

但是階級的专政和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集团的专政是离得象天和地那样远的。这特别可以用来說工人階級的专政，它的任务，在現在，不仅是破坏社会的非生产階級的政治統治，而且也是消除現時存在的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并把社会—經濟生活的一切职能自覺的組織起来。仅仅理解这一任务就需要以有发展前途、具有政治經驗和教育、从資產階級的成見下解放出来，并能独立考慮自己情勢的工人階級为先决条件。这一任务的解决，除已經說过的一切先决条件以外，还需要在无产階級中間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还需要它覺悟到自己的力量和对胜利有信心，但是这样的无产階級是不会允許甚至最誠实的有善良心腸的人夺取政权的。不允許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它通过了自己的政治教育鍛炼，抱着坚定的志願，准备不論何时都可以完成这一政治鍛炼，并作为独立的活動家出現在历史生活的舞台上，而不是永远地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过渡到另一保护人那里；不允許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保护是多余的，因为它自己那时也能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允許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保护会是有害的，因为生产者們在生产組織的事业中的

① “誰擒住魔鬼，誰就不会放它”。

自觉参加不是阴谋家们的任何阴谋诡计、他们的任何豪迈勇敢和自我牺牲所能代替的。有一种思想认为社会问题除工人自己以外，不论谁都可以在实践中解决，这种思想表明对这一问题的完全没有理解，完全不看抱这一思想的是“铁血宰相”⁶³，或者是革命组织。已经理解了自己的解放条件和认定解放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把国家的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为了在结束自己的敌人以后不在只给它带来新的苦难的 *ан-архия*（无一政府）原则上，而是在让已成年的社会成员们直接参加社会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的 *пан-архия*（普遍的一政府）基础上建设社会生活。当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到能解决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它的拥护者们的责任就在于加速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在于消除妨碍它的力量和它的觉悟增长的那些障碍，而不在于发明一些社会实验和活体解剖的方案，这些东西的结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我们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革命中夺取政权问题的。在应用这一观点于俄国的现实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完全不相信俄国最近有社会主义政府的可能。

“民意”认为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是特别“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⁶⁴。我们同意，这种相互关系在俄国对于社会主义者比在印度、波斯或埃及要有利些，但是我们当然不可能拿俄国的和西欧的各种社会关系比较。而假使“民意”达到这样的信心，不是由于拿我们的制度和埃及的或波斯的对比，而是由于同法国的或英国的相对比，因此它就陷入了重大的错误。决定人民群众的愚昧和冷淡的乃是现代“俄国土地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什么时候这样的一些性质对于它的解放事业是有利的呢？“民意”以为，看来，这一冷淡是在开始消失，因为在人民中越来越“激发了对一些执政的特权阶层的仇恨，并坚定的努力于经

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但是这种努力又得出了什么结果呢？“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还是什么也没有证明；它并没有常常带来一点政治觉悟的光明。而且在现在，我们需要把阶层的觉悟和阶级的觉悟加以严格的区分，因为旧的阶层划分已经不符合俄国的经济诸关系，而且在准备让位给“法的国家”中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假使“民意”从农民的阶级和政治觉悟的发展观点看农民现在的世界观，那末它怕很难坚持，我们的社会因素是有利于社会变革事业的。须知“民意”根本不可能认为在农民中间流行的关于他们自己与政府作斗争的理由对于这一事业是“有利的”。不论这些理由多么有力地表现出“对统治阶级⁶⁵的仇恨”，但是因为农民们认为革命运动本身是贵族和官僚们的农奴制阴谋，当人民“开始从自己的年代久远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那里争取经济平等的时候”，“临时革命政府”就会陷入大的危险中。我们所关心的那些因素的现在相互关系，那时候大概会暴露出对暂时胜利了的一些阴谋家极为不利的特点。而“争取经济平等”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达到这一目的，难道剥夺大地主们、资本家们和企业家们，就算够了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难道不需要以一定的方式组织生产本身吗？假使说需要，那末现代的俄国经济关系对这一工作是否有利，或者换句话说，经济的因素使它有很多成功的机会吗？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而且有如下的理由。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以一定的、为它的目的与组织特性的性质所规定的东西为先决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也需要有这样性质的一些经济关系为先决条件，它（即性质。——译者）会使这一组织变为从国家过去全部发展中所得出的逻辑结论，因此它就具有一种极大的明确性。换言之，社会主义的组织，正如任何其他组织一样，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在现代的俄国是没有的。人民生活的旧基

础是太狭隘，种类太不相同而片面，除此以外，它还已经动摇得很厉害，而新的还只是刚刚在形成。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因此在生产者自身中还没有建立这一组织的意图和能力；我国农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解决这一任务。所以，“临时政府”要是它得到生产者方面的充分的服从，要是它不被人民运动的巨浪冲走，它所要做的就不是批准而是实行“经济变革”。

但是靠了法令是不能创造出与现代社会诸关系的性质不相容的那些条件的。“临时政府”只有迁就现在已有的东西，并拿现在俄国的现实所给它的那些东西作为它的改革活动的基础。而在这一狭窄的和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筑社会主义的组织，只有靠政府的手来建立，加入政府中的：第一，将是城市工人们，不过他们对于这样的困难的活动还很少准备；第二，是始终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的我们的革命青年的代表们；第三，是经济知识极令人怀疑的“军官阶层”。我们打算作关于和一切这些分子们在一起加入临时政府的，还有自由主义者这一完全可信的假设，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同情而是会妨碍社会革命所“规定的各党的任务”的。我们请读者只衡量一下上述的一些情况，然后再问自己：在这些情况之下开始的“经济变革”，其成就会很多吗？现有的“在俄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吗？说这一相互关系是有利的，这种信心难道不是属于从旧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派世界观中抄袭来的、而且会把完全不可能的极端带到新政党的纲领中的一种虚构吗？而党的“最近的直接任务”，正为这种虚构所决定，立即“夺取政权”的努力、吓唬我们社会和使得我们革命家们的全部活动带着片面性的努力正是以它为基础！

或者有人会反对我们说，“民意”就没有想着在夺取政权以后

从事組織社会主义社会，它所設計的“經濟激变”的目的只是教育人民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們試看看，这一假定是否可能，而假使可能，从它里面将得出什么結論？

《民意》第8—9期的社論說到人民将“爭来”經濟平等，而如果人民缺少主动性的話，經濟平等将为临时政府所建立。我們已說过，所謂經濟平等只有在生产的社会主义組織之下才可能。但是我們姑且承認：《民意》認為在别的条件下經濟平等也是可能的，据它的意見，經濟平等在土地和生产工具过渡到成为劳动人民的財產这个条件下将得到足够的保証。这样的意見不是别的，不过是回到《土地与自由》的一些民粹派的旧理想，而且从經濟的观点看，也許会暴露出这些理想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一些公社之間的个别的相互关系，公社社員們的劳动产品之变成商品以及与此有关的資本主义的积累会威胁着把这一“平等”变得极不安定！在执行委员会的綱領要求“作为經濟和行政单位”的公社具有独立性，“一切公职由选举产生的广泛的州区自治”和“土地屬於人民”实现的时候，中央政府将不致采取任何措施来巩固这一平等，即使假定它会想出不仅废除俄国帝国的成文法、而且废除商品生产本身的一些規律措施。而且它也不会想到采取这些措施，因为它是由那一“已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被解放的人民”的代表們所組成的，它的理想，在最好的場合，不过如《土地与自由》的話所表达的那樣，是不会对于任何一种国民生产的（我們姑不說国际的）組織給予地位的。

有鉴于这一危險，我們假定《民意》的“临时政府”是不把为它所夺得的政权交給人民代表們，而会把自己变成經常性的政府的。那时候它将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就是它对于为它所創造的“經濟平等”的緩慢的解体成为无动于衷的旁觀者，要就是它将不得不組織国民生产。解决这一难题，它将或者本着現代社会主义的精神，

而这是不論它自己的不实际性，或者是国民劳动及劳动人民自身的习惯发展到的现阶段都会妨碍它这样做的；要就是它将在“家长制的和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求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的不是秘魯的“太阳之子們”及他們的官吏們而是社会主义的閥閥。但是俄国人民即在現在已經是很进步的，不致于以在他們身上所做的这样一些試驗的愉快結局来自慰。无疑地是，除此之外，在这样的监护下，人民不仅受不到社会主义的教育，而且或者是完全失去任何再向前进步的能力，或者是由于經濟不平等（消除經濟不平等是革命政府的直接目的）的产生，而使这一能力得以保存。我們不用說国际諸关系的影响，也不用說甚至在十九或二十世紀的东欧的秘魯式的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了。

不过，为什么关于我們革命家們夺取政权的一些結果要說得这么多呢？这一夺取是可信的嗎，是可能的嗎？依我們的意見，是非常不可信的；是这样的不可信，以致可以認為它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的“有思想的无产階級”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已經做了很多事。他們动摇了专制制度，在社会中喚醒了对政治的兴趣，在我們工人階級中間撒下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种子。他們正在从社会的上等階級过渡到下等階級，具有前者的教育和后者的民主主义本能。这一情势使得他們容易进行多方面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但是这同一情势使他們对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陰謀之成功不能抱很大的希望。为了这种陰謀，光有才能、毅力和教育是不够的；陰謀者需要有和社会的联系、財富以及有势力的社会地位。而这正是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所缺乏的。他們只能靠与俄国社会上的其他不滿分子的联合才能弥补这个缺陷。我們假定他們的計劃将得到这些分子的同情，我們假定，参加这一陰謀的，有富有的地主們、資本家

們、官僚們、參謀和高級軍官們。陰謀的成功那時候將可靠些，雖說這樣的可靠性还是不很大的；我們只須回憶一下在歷史上有名的一些陰謀的大部分的結局。但是對社會主義陰謀的主要威脅將不是來自現政府方面，而是來自它自己的參加者方面。參加陰謀的是一些有勢力的和居高位的人，又是誠實的社会主義者，這只是一種“幸運的偶然”。關於這些人的大部分，沒有任何保證說他們不願意利用他們所奪得的政權來從事和工人階級利益毫無關係的目的。而如果陰謀者們離開了陰謀的社會主義目的，我們就可以認為這一陰謀對於國家的社會發展不僅沒有益處，而且還是有害的；因為不能由於對專制制度的仇恨就去同情那些——如斯切普尼亞克在其有名的書中所說的——會想去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陰謀的一些“現代賽揚們”的成就。由此，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抱着在最近將來奪取政權的目的所進行的陰謀，如果在有勢力的人圈子內得到的同情越多，即是說，它的外表的勝利如果越可靠，它的結果就越可疑；相反地，這一陰謀的結果，如果談到它的參加者們的意願，也就是說，如果它的圈子越只限於我們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話，它的愉快的結局將越發不可靠。所有這一切使得人不得不認為，在現在對於俄國社會主義陰謀更加有威脅的寧可說是第二類而不是第一類。

從所說的一切，我們認為，俄國社會主義者們的非空想的理想現在只能一方面是爭取自由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培養一些準備組織未來的俄國工人社會主義政黨的分子。他們應當提出民主主義憲法的要求，這一憲法和“人的諸權利”在一起，會保證工人以“公民權”，而且會通過普遍選舉權使工人有可能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在現在看來還很遙遠的“紅色幽靈”沒有恐嚇倒任何人的時候，這樣的政治綱領將會引起一切不是堅決敵視民主主義的人

們的同情；同着社会主义者們在一起，会有很多我們的自由主义的
代表們在这一綱領下面签名^①。虽然这一或那一秘密革命組織的
夺取政权始終是致力于它的計劃的一些組織和个人的事情，可是
为拥护这一綱領所进行的鼓动却成为整个俄国社会的事业，因为
这一鼓动将在这一社会中加强为政治解放而作的自覺的努力。那
时候自由主义者們的利益确实会“迫使”他們“同社会主义者們在
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政府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者們再不会在革命
刊物中遇到說什么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样的断
言。同时，自由主义社会的另一部分比較大胆的和比較清醒的人不
会再認为革命家們是一些抱定空想計劃的不实际的青年。社会上
从前不利于革命家們的这种看法就会改变为不仅对他們的英雄主义
而且也對他們的政治成熟性表示尊敬。逐渐地这一同情会轉变为
积极的支持，或者，更可靠地是，变成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最后，
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就会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这一解放运
动中会起一种极为光荣的和有利的作用。它的光荣的过去，它的自
我牺牲和毅力会使社会重視它的一些要求，因此，它至少会有一种
机会来为人民爭取政治发展和教育这样的可能，和为自己爭取公
开对他們呼吁的权利，并进而展开自己的宣传和把人民組織为一个
特殊的政党。

但是这还不够。更确实些說，如果不在同一时候和也在別的
圈子里进行活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沒有力量，就沒有权利。拉

^①（1905年版注）“社会”的同情对于我們是很重要的，而我們能——精确些說：我們有很多机会——获得它，一点也不改变我們的綱領。但是，不言自明，为了使这一可能变为现实必需有我們不是常常具备的机警。例如，有时我們任自己責罵《資本論》，所根据的正是——虽然，当然不完全是——它在“造反”这一理由。馬克思从沒有做过这样大的策略上的錯誤。他会觉得这种錯誤是与卡尔·格律恩和其他“真正社会主义者”相称的。

薩尔說得好极了：任何一个宪法，都是适应或力求适应“存在国内的各力量的现实的实际关系”的。所以我們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应当关心的是，还在宪政以前时期就改变俄国社会諸力量的实际关系，使之有利于工人階級。在相反的情况下，专制制度的垮台远不会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者甚至民主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相符合。人民的要求，即使在宪政的俄国也可能完全不被注意，或者只在为了加强人民的納稅能力的范围内予以滿足，因为人民的納稅能力現在几乎完全为国家經濟的掠夺性質所耗竭了。为自由資產階級爭得言論和活动自由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可能落到“特別”的情况中，如象現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一样。在政治上只是不可能期待别的比較严肃的东西的那种人，才期待昨日的同盟者們和現在的敌人們的感謝。

幸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們能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比較稳固的基础上。他們能够而且应当首先依靠工人階級。工人的力量，也正如任何别一个階級的力量一样，順便說說，是取决于它的政治覺悟的明确性，取决于它的固結性和組織性的。正是它的力量的这些因素，才必定会受到我們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影响。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应当在行将到来的解放运动中成为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对工人階級說明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之間的相互关系；应当培养工人階級在俄国的社会生活中起独立的作用。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必須用一切力量爭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初期，使我們的工人階級能作为一个带有确定的社会政治綱領的特殊政党而出現。我們应当把詳細拟定这一綱領的工作讓給工人們自己作，但是知識分子必須對他們闡明拟定工作的最主要諸点，例如，現代土地关系、稅收制度、劳动立法的根本修正，国家对生产者各种組合的帮助等等。要达到所有这一切，只有通过，至少是通过在

我們工人階級最先进的各阶层中間加强工作，通过口头的和文字的宣传和在工人們中間組織社会主义小組。誠然，这些任务始終在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政綱中占有或多或少的显著地位，而《民意大事記》可能告訴我們，即在同政府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它也沒有被忘記（參閱《党的組織工作》第3項，城市工人）。但是我們向任何一个了解我們的革命运动的人建議，請他們回忆和比較一下，破坏工作耗費了多少力量和金錢，又有多少力量和金錢是用在为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上面的。我們不責怪誰，然而我們認為各种革命力量的分配是太片面了。不过我們如果以革命力量自身的特点，或者以他們根据自己的綱領而需要影响的那一工人中介的特点，来解释这一片面性，将是徒劳的。象《种子》、《工人报》⁶⁶这一类刊物的出現及取得成就，表明我們的革命者們沒有丧失宣传的傾向，而我們的工人們对它也不是漠不关心的。这类的刊物，当然免不了有一些錯誤，而且有时錯誤是极重大的，但是只有什么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錯誤。主要的倒露的地方就在于在所出版的这些刊物中看不出有象在社会“知識分子”阶层中进行宣传的那种毅力；在于沒有新的印刷所起而代替已被封閉的印刷所；在于沒有因为在俄国不可能进行出版工作，而把它迁移到国外，等等。在所有国外的杂志中（我們有不少这样的杂志），只有《工人》⁶⁷以来自人民的讀者为对象，这就是它的出版者的最大功績。但是《工人》已停刊了好久，而我們关于这方面还一点也沒有听说有什么新的嘗試，哪怕他們所拥护的是另一种更适合于俄国社会主义者們的已变更了的見解的綱領。而我們除了《种子》、《工人报》以外，在俄国为工人們还出版了些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沒有。沒有一本小書，沒有一本小册子^①。而这是在革命运动引起了人們对自己普遍注意的时候，而如飢如渴地打听一切謠言和結果的人民却惊异地問自己：这些

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在这以后，难道可以惊异人民对这问题由于没有更好的回答，而有时不得不满意于那些荒谬的回答吗？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但是我们劝一切人都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以便及时地予以挽救^①。

这样，一方面是为政治自由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培养工人阶级去扮演它的将来独立的和进攻的角色，据我们的意见，在现时所能“规定的各党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想把象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实质上不同的事情联结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这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但是这两个时刻的接近是取决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效法德国共产党人的好的榜样，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他们应去“同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行动时”，同时，一分钟也不停止在工人中间努力培养尽量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敌对情形的意识。象这样做时，共产党人是要使“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⁶⁶。

各资产阶级社会的现时情况和国际诸关系对每个文明国家社会发展的影响，使人有权希望：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会很快跟

① [1905年版注] 由此看出，通俗刊物的这一理想在我们的文献中完全不是新的。但是这事实，不言自明地，不过不妨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许多同志看作是危险的新鲜事物，那时候我几乎是“火星派分子”中这一思想的唯一的拥护者。现在这一思想已经得到实际的——多多少少成功的——实现。迟些做总比不做好些。但是，读者，假如你听到了，还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有哪些可惊的结论被引用来反对我刚说的这一思想，你会象浮士德一样地惊叹：Wie weh, Wie weh, Wie weh! [多么痛心，多么痛心，多么痛心！]

② 我们在《民意的小刊物》第1期（1883年，第61页）的附言中读到如下的话：“在过去的一年，有一系列的罢工，但因为缺少工人的组织大部分都以失败而结束。”

在专制制度垮台后面发生。假使德国资产阶级“来得太迟”，那末俄国的还要来得迟些，而它的统治也不会长久。所需要的只是俄国革命者们自身不要在开始着手培养工人阶级的事业上来得“太迟”，这在现在已经成为完全适时的和不可缓的。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做一个保留。我们不抱如下的一种见解——宁可说，如我们已知道的，这是强加于马克思学派的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的——，按照这一见解，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农民还没有成为无土地的无产者和农村公社没有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瓦解的时候，仿佛是得不到他们的支持的。我们以为，一般说来，俄国农民对于凡是注意到所谓“土地国有”的任何办法，都是会寄以很大同情的。只要稍有可能在农民中间进行自由的鼓动时^①，不用说，农民就会同情立刻在自己纲领中采纳这一要求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但是我们不夸大我们社会主义者们的力量，而且也不忽视他们必然在自己的活动中须顾及的那些障碍和环境的阻力。因此，而且只是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必须在开头的时期，集中自己的主要注意于工业中心。生活在落后条件下的现代农村居民，不仅自觉的政治主动性比产业工人差，而且对于为我们革命知识分子所已开始的运动也不象工人那样容易感受。他们领会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比较难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和那些诞生这些学说的条件是太不相似了。而且农民现在正经历着严重危急的时期。他们从前经济上的“古老基础”正在崩坏，“不幸的公社也正在他们的眼中失去威信”，甚至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民粹派机关刊物，如《星期》⁶⁹（参阅该刊第39期N. Z.的论文《在故乡的许多地方》）也如此承认；劳动的和生活的新方式还刚在形成，而这个形成

①（1906年版注）也就是说根据宪法。

的过程恰好各工业中心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如冲刷和破坏一部分土壤的水在别些地方组成新的雨雪和沉积物一样，俄国社会发展的过程在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在破坏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古老形式和破坏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些新的社会形态在自身内部含有新社会运动的胚胎，只有这一个运动能结束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比农民受了更多的教育、有更高的消费能力和更广的视野的产业工人们，参加我们革命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以后，在达到政治自由后，就可以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在农民中间开始经常的社会主义宣传。我们说经常的宣传，是因为在农民中宣传和鼓动的个别场合，当然，即在现在也不应被忽视。恐怕不再需要补充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在农民中间发现了强有力的独立运动时，就应当改变在人民中间的力量分配。

生活本身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所提示的“纲领”就是这样。俄国社会主义政党将能实现这一纲领吗？它是否愿意放弃幻想的计划和意图（这些，应当承认，是很动人的感情和想象）呢？现在对于这点还很难有把握回答。《关于刊行〈民意导报〉的发刊词》说明革命政党的政治任务⁷⁰，只是用一些最空泛的言语。《导报》的编辑部称这些目的是“完全确定的”，看来，是不认为有在自己的发刊词中有再确定它们的必要。所以令人担心的是，关于下列问题《导报》不认为有问问自己的必要：俄国现时的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条件”是不是符合于民意党的“完全确定的”一些目的呢？在这样的场合，新机关报对于我们革命文献的最迫切的需要，即批判地修正陈旧的纲领和修正传统的行动方法的需要，是没有作满意的回答的。而我们希望它将能消除我们的顾虑。我们似乎以为，新机关报将清醒地注意到我们革命政党将来的命运所系的那些任务。社会生活对待它的一些当代的幻想是和对待我们的“暴动派”和宣传

家們一样的无情。最好是現在跟着它的指示，不要在后来以一些新的分裂和新的失望来偿付它的殘酷的教訓。

我們的意見分歧⁷¹

給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代序)

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維奇：

您不滿意于“劳动解放”社。在《民意导报》第2期上，您对该社出版物特別作了評論，虽然这一評論很短，但是它所占的两頁半篇幅，已足以表示您是不同意該社的綱領和不滿意該社对“民意党”的态度的⁷²。

我向来尊重您的意見，此外，我也知道，我們的各种色彩和各种派别的革命青年，是如何注意您的言論，可是現在我要來說几句话为一个我認为您对待得不十分公道的集团辯护。

我更認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您在您的評論中主要是談我的那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是这本小册子引起了您的責难，而由小册子的作者出来回答，自然是最适当不过的。

您認为这本小册子可分为两部分，按照您的意思，“对这两部分，应当分別看待。”其中一部分，“即第2章，是值得象对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問題的重要著作那样地予以注意的。”您說，另一部分，即小册子的大部分，都花費在反对民意党(您的杂志就是想做它的国外机关报)过去和現在的活动的論战上了。您不仅不同意我在我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內所发表的意見，而且就連“反对民意党的論战”这一事情的本身，您也認为是應該予以严厉斥責的。您以为“不

难向普列汉诺夫先生证明，他的抨击可以用极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反驳，尤其是——或者由于匆忙吧——他引证得不精确”。同时您又深信，我“自己的行动纲领含有的缺点和不切实际的地方也许比我所非难民意党的还要多”。但是您没有空闲的时间来指出它们，这是使我非常遗憾的事情。照您的说法，“民意党的机关报”是致力于反对俄国人民政治的和社会的敌人的斗争的；这一斗争是这样复杂，要求您拿出“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量”。您是“既无暇时，又不乐意”把您的出版物的一部分篇幅用在“论战上来反对那些自认为和‘民意’论战要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的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派别”。您既然期待着时间本身会对争论的问题作出有利于您的解决，因此，您就认为“公开打击一个其多数分子很快就可加入民意党队伍的派别”，来把您和劳动解放者们^①——您喜欢怎样称呼我们，就怎样称呼我们罢——的“不太大的意见分歧加以强调”是没有益处的。据您看来，使“劳动解放者”变为民意党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据您说，“普列汉诺夫先生本人，如他在他的小册子的序言中所表明的，在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信念中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演进”，而您“有理由希望”，我这方面“会朝这同一方向继续前进”。当我的“演进”到达了您所认为显然是现今俄国社会主义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时，您希望我可以体会到对共同敌人作战的社会军队中每一个集团的实际任务的另一方面：这就是说，体会到“可以破坏这一支军队的组织的——即使你看见或假定这支军队里面有某些缺点——也只限于或者是这

^① 关于您所想出的这个名称，我顺便表示如下的意见：“劳动解放”是我们社的名称和口号。但是以“劳动解放者”社一语来称呼“劳动解放”社便是有违字法，措辞不当。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您的同志们关于“人民统治”谈得很多；只要稍为遵循逻辑，他们应当同意，他们“党”的名称——“民意”，也不外是一个号召，表示要实现和人民统治一语有关的那种政治制度。但这是否说，他们可以自命为人民统治者呢？

一支軍隊的事業上的敵人（而您並沒有把我算在他們之內），或者是一個靠自己的活動、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在當前歷史時機能成為社會軍隊的集團”。但是，“勞動解放者”這一集團要起這樣的作用，按照您的意見，還“在遙遠的、而且大概有點成問題的未來”，因為他們本身還沒有完成自己的蛻變過程，現時還只是相當於民意黨的蛹或幼蟲而已。

可敬的彼得·拉甫羅維奇，這就是您關於我的小冊子所說的話的內容，我幾乎是一字不易地轉述的。或許，我從您寫的評論中引用這麼多，已經使您厭煩，但是，一方面我怕受到新的責難，說我“引証得不精確”，而另一方面我又認為不妨把您的話全部告訴讀者，因而使他們便於對我們的爭端作出最後的判決。您知道，讀者大眾是自由的“文壇共和國”內所發生的一切爭論的主要的、最高的審判員。所以雙方都應當採取一切措施來向讀者大眾說明爭論問題的真實性質，這是沒有什麼可怪的。

在述敘了您對我的小冊子的意見以及您關於“勞動解放”社對“民意黨”所採策略的一些看法以後，可敬的彼得·拉甫羅維奇，我現在就要作一些解釋，沒有這些解釋，要正確地理解那種使我和我的同志們這樣行動而不是那樣行動的理由，便是不可能的。

其實，我可以承認，一切關於這類理由的話實在是多余的，而讀者可能對它很不感興趣。何以見得呢？難道關於目前的任務、策略以及科學地論證我們革命者全部活動的問題不是我們俄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而最迫切的問題嗎？難道這個問題已經可以認為是最後地、無可爭辯地解決了嗎？難道每一個革命作家不應當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力量、所能集中的全部注意力來幫助闡明這個問題嗎？或者只有當這種闡明能使人相信俄國的革命者雖然不象教皇那樣永久都對，然而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中並沒有一個過失，在自

己的理論議論中也沒有一次大錯，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万事大吉”的时候，这样的闡明才算有用。或者沒有这种愉快信心的人就不該发言，而当他們每次拿起笔来指陈革命事业是怎样在进行，現在依他們的意見应当怎样进行，以期喚起革命者的注意时，他們动机的純洁就成了問題嗎？斯宾諾莎早在十七世紀时就說过，在自由的国度中，每个人都应当有愛怎样想就怎样想和怎样想就怎样說的權利，而在十九世紀末，在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間，那怕是欧洲最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党中間，这种權利竟被人怀疑，这是可能的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既在原則上承認了言論自由的權利，并把这样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他們就不能只讓那一自命为在当前革命运动时期有領導权的“党”派来享受这种權利。我以为現在，当我們的合法出版的書籍正在遭受着最无情的迫害，而我們祖國內思想領域以及一切其他活动領域中“所有活的东西、所有誠实的东西都在被鏟除”⁷³的时候，我以为在这样的时候，应当請一个革命作家解釋的，是他何以沉默，而不是他有某一著作問世。假如您同意这个意見，——而不同意是不大可能的，——那末，您也会同意，不能把一个为“人类言論自由的尊嚴”（赫尔岑的名言）而須冒重大牺牲的作家兼革命家逼成伪善。假使如此，那末他如果公开、老实而含糊地說出他对于革命活动中这些或那些綱領的想法，我們能責怪他嗎？我相信，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維奇，您对这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使得我这样相信的，除其他的一切之外，还有您署名的《民意导报》的发刊声明，在該报第8頁上我們讀到如下的話：“社会主义，和任何一个历史上的重要的思想一样，不免要在自己的信徒中間引起很多的，虽然不是特別重大的意見分歧，在它（社会主义）里面，有許多理論的以及实际的問題，仍然是有爭执的。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比較复杂，困难較多而且历史較短，

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間观点上比較显著的分歧可能就更多些。但是，我們重复地說，这正足以証明俄国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能在自己的拥护者中間激起思想上紧张的活动和强烈的信念的党，是一个不甘心把熟記的公式当做教条来信仰的党。”

我不明白在这一声明上署名的編者，何以会不高兴地看待一个他所認为和“民意”的意見分歧“不太大”（《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分，第65頁，倒数第10行）的集团的文章；我也不能設想，登載这一声明的杂志竟会仇視那些“不甘心把熟記的公式当作教条来信仰”的人。我們不能認为原来要写以上所引的一段話，只是为了向讀者解释“《民意导报》所提出的綱領，包括某种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样的一些观点”（《民意导报》发刊声明，第7頁）。同时也不能假定《民意导报》为自己定出这样一个“确定的綱領”，只是当“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間比較显著的分歧”，“不超出”这一“包括某种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样的一些观点”的綱領的“范围”时，才承認它們的重要意义。这等于說，只有对于自己“教会”里的分子才是可以容忍的，正如謝德林小說中的主人公們一样，他們承認反对派只是在不为害的时候才是无害的。从这样的自由主义、这样的寬容，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非国教主义者”⁷⁴是感觉不到什么安慰的，而他們現在显然不在少数，因为在您自己的評論中也說到“那些自認为和‘民意’論战更合时宜的派別”等話。从这些話里可以看出，这类派別至少有两个，而“想做俄国全体社会主义革命家統一机关报”的《民意导报》，迄今为止还根本沒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以为这样的挫折应当使《民意导报》的編輯部放寬而不是縮小自己容忍的范围。

您劝我不要“破坏”我們革命軍队的“組織”。但是，首先，我請問您，您所說的是哪种“社会军队”呢？假使您把这一“社会军队”

的譬喻了解为“民意党”的組織，那末，我从沒有想到我的小册子会对它起破坏作用，而且相信您第一个問到的民意党党员，也会劝您在这一点上放心的。假使您把“破坏社会军队的組織”了解为把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还站在“民意党”外面的人們吸收到我們集团里来，那末，这样的吸收对于“社会军队的組織”只有好处，因为在这“社会军队的組織”中間出現了（比方說新兵所組成的）新部队。此外，从什么时候起，把关于某种军队所走的道路的討論，关于相信另外有一条更快和更可靠地达到胜利的道路的表示，認為是“破坏这一军队的組織”呢？我以为只有在亚細亚专制国家的未开化人群中才能有这样概念的混淆，而在現代文明国家的军队中是絕對沒有的。誰不知道，对于某种军队所采取的战术的批評，所能損害的当然只是这支军队將軍們的軍事声誉，这些將軍們大概不反对把那些不謙虛的人的嘴“封住”。但是这与“军队的組織”有何相干呢？而且军队的統率者又是誰呢？您知道，这些統率者不外为士兵所选，或由上級所派。姑且假定执行委员会扮演我們革命军队的統率者的角色。試問，那些沒有参加过选举的人对他是否有服从的义务，而如果他是上級所派，那末，誰有这种指派的权力，而且又是什么样的权力呢？

您認為我們的集团是屬於那些“自認為和‘民意’論战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剝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的俄国革命社会主义的派別”。我請問您，您是否認為俄国人民的和“当前历史时机”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对俄国人民的剝削者的斗争”，无須传播表现这一斗争的意义和趋势的那些思想，也可以进行呢？如果沒有在一定的社会阶层中間传播最先进、最健全，总之最革命的和概念，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可思議的，这个道理，难道需要我这——过去的暴动者⁷⁵ 向您，《前进》杂志的前任編輯証明嗎？社会主

义——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表現的——是对人民的各種剝削者进行斗争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这一事实，还要請您注意嗎？而我的同志們的目的，如《現代社会主义叢書》的发刊声明所明白表示的，正在于宣传这两位作者的学說。說馬克思派社会主义和我們一般革命运动中，尤其是如“民意党”中“所表現的俄国社会主义”大不相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俄国社会主义”直到現在，背后还拖着一条很长的巴枯宁主义的辮子。說俄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因此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某些“熟記的公式”，往往不得不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很自然的；但是由此还絕不能說，他們宁願作反对革命者的斗争而不作反对政府的斗争。在《民意导报》上，有一位塔拉索夫先生坚决地駁斥了馬克思历史理論的基本原理之一^①。塔拉索夫先生的論文登在《民意导报》第2期第1版所謂头条的地位⁷⁷。这是否說，塔拉索夫先生認為，反对馬克思的論战“比对俄国政府、对俄国人民的其他剝削者作斗争更合时宜”呢？难道論战在杜林派、巴枯宁派、布朗基派分子們的笔下，便是适当的和“合时宜的”；而只要馬克思主义者一出来发言，就变成对俄国革命尊严的侮辱嗎？一个多次声明贊同馬克思理論的作者竟有这样的态度，这是对的嗎？或者說，这是可以說明的嗎？

^① 我还希望在塔拉索夫先生的論文登完之后，再来和他討論。現在我覺得，塔拉索夫先生既完全不懂馬克思，又不懂馬克思的“門徒”，他所天真地进行的論战，實質上反对的是小有产者乔治·摩林納里，而絕不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卡尔·馬克思。同样，塔拉索夫先生的“方法”也使我不解。可敬的作者的这一方法显然是从资产阶级的科学里，即是已經被他在《导报》第1期上不可辯駁地証明为“破产”了的科学里剝窃来的⁷⁶。正如资产阶级作家們为了証明自己的“自然法則”，通常总是想出一些除了幻想“儲蓄和积累資本”以外，不消說就沒有別的想法的“野蛮人”一样，塔拉索夫有意地忽視現代理論民族学的資料，也想出一些显然是布朗基主义者的和只求“夺取”支配自己邻居的“政权”的“野蛮人”。这样一种独特的归納法势必也要把塔拉索夫先生的杜林式的社会主义“科学”引向完全“破产”的地步。

我很知道，从馬克思理論的观点来解决我們革命党的任务問題，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理論的基本原理，老实說，只是三段論法中的“大前提”，因此，同样承認这第一个前提的正确性和伟大科学意义的人，彼此之間的結論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那是要看他們如何理解第二个前提即“小”前提；即是說要看他們如何估計俄国当前的现实而定。所以，我对于您之不同意我們的綱領，一点也不惊异，不过我以为您如果仍不失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的話，就不能向我“証明”，“我的”綱領中所有“缺点和不切实际的地方”，比我所“非难民意党”的要多得多。但是在对于目前俄国现实的估計上的意見的任何分歧，对我及我的同志們都說明不了您在您的評論中对我們所取的不公正的那种态度。

我現在要請讀者来主持公道。在《民意导报》編者的書桌上有两本“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小册子。一本是恩格斯著作的譯本，可敬的編輯称之为“最近几年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

第二本小册子，据同一編輯說，其中一部分值得“象对一切有关社会主义問題的重要著作那样地予以注意”。另一部分包括“反对‘民意党’过去和現在的活动的論战”，論战的目的在于向民意党証明，“民意派对于正統的民粹主义的全部传统既給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对于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貢獻很多，因此，它不可以而且也不应当在現代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为自己找辯解”^①。而“劳动解放”社一部分出版物中的这一部分，在《导报》的編者看来，是証明該社几乎专以“反对民意党的論战”为目的，而为了这一目的不惜放弃对政府的斗争。讀者只要稍为公道一点，一定同意这样由局部到全体的推論是这一全体的其他部分的性質所不能証实的。

^① 参閱《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第20頁（本卷第68—70頁）。

我不否認自己小冊子的“一部分”的論戰性，或正確些說，批評性。但是小冊子、甚至它的被指責的那一部分不是專以反對民意黨的論戰為目的，這已經可以從那一為您、彼得·拉甫羅維奇所忽視的情形看出，即是說我的批評並不限於俄國運動中的一個民意派時期。我在那里也批評了運動中的其他派別。而假使從我的已刊載的、並且說明了何以不同意這一或那一革命綱領的理由的文章中得出結論說，反對這一綱領的論戰，是我寫文章的主要目的，那末，為了符合事實，應當把對我的責難更加擴大。應當說，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舊民粹派、民意派，以及反對那些“不了解政治鬥爭在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中的重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進行的論戰，乃是我寫文章的主要目的。此外，還應當注意到，“普列漢諾夫先生的小冊子的另一部分是述及關於論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哲學及歷史方面的。”於是明白的，我的罪過似乎在於傳播我所信仰的那些革命見解，在於我和那些我認為錯誤的人論戰。但還不止於此。在慎重考察全部情況以後，也許可看出我的罪過是照着“早打好的主意”做的，因為還在《現代社會主義叢書發刊聲明》中我和巴·阿克雪里羅得已經坦白地聲明，我們叢書的任務在於：

(一)把馬克思恩格斯學派的最重要著作以及為不同教育程度的讀者所寫的有創見的著作譯成俄文，來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

(二)從科學社會主義及俄國勞動人民利益的观点，批判我們革命者中流行的各種學說，和探討俄國社會生活中的最重要問題。

這就是引起您不滿的“行為”的真實性質。如果要對作這種活動的人給予那怕是非常輕微的責難，就應當首先證明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來批判流行在我們革命者中間的綱領和學說，或者証

明，这一批判应当变为——如别林斯基某一时候（自然是就別一問題）所說的——“权威的恭順僕人，陈腐議論的諂媚的重复者”。但是我已經說过，恐怕难以找出一个作家敢于拥护这样一个前所未聞的主張，而絕不致于是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維奇会出来說：現在是我們的革命党“滿足于把熟記的公式当作教条来信仰”的时候了。假使是如此，那末

Wozu der Laerm? (为什么还激烈爭辯呢?)

不过，許多人虽然不敢完全否認批評在我們革命出版物中的重要性，但是总以为，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个人組成的集团有权利批判“行动的党”的学說和策略的。从我的小册子出版以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类意見。“行动的党”、“民意派的傳統”、“英勇的斗争”，这些都是用来掩盖稍微触犯我們革命信条中“熟記的公式”的那种恐惧心理的話。我有不同意“民意党”的权利，或更正确些說，有不同意它的言論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却完全不管誰是誰非，不管是我对还是“行动的党”的政論家們对而被否認了。当我听到对我的小册子这类的抨击时，我不禁想起：“沙拉曼克的学士”⁷⁸伊尼戈——与——美得洛佐——与——康波弟奥士——与——帕帕拉米恩多先生在有名的 *Controverse des mais* (用各种的“但是”进行的辯論) 中的論据。

这一辯論家說：“Mais monsieur, malgré toutes les belles choses que vous venez de me dire, vous m'avouerez que votre église anglicane, si respectable, n'existait pas avant dom Luther et avant dom Eccolampade; vous êtes tout nouveaux: donc vous n'êtes pas de la maison!” (“但是，先生，不管您所說的一切是多么漂亮的东西，您必須承認，你們如此可敬的英国国教教会，在路德先生以前，在愛柯兰巴德先生以前并不存在；您完全是新进，所以您不屬我們

的一家!”)而我自問：難道偉大的諷刺家對於他的最凶惡的敵人所提示的論據可以為俄國革命者們認真地應用嗎？難道天主教的“學士”的諷刺畫將變成革命團體出身的俄國辯論家的精確素描嗎？可敬的彼得·拉甫羅維奇，請同意罷，沒有比這樣的一種前景更可悲的，而且關於“組織”之是否完整的任何憂慮，比起這種可怕的智力衰退的憂慮來，是一點也不算什麼的。

最堅決地阻止我們的革命宣傳淪為革命的煩瑣議論，也是對民意派有益的。然而，可敬的彼得·拉甫羅維奇，您的評論寧可說是在支持，而並不是在削弱我們革命的“學士”們的情緒。您所表示的，“可以破壞這一革命軍隊的組織的，也只限於或者是這一軍隊的事業上的敵人，或者是一個靠自己的活動、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在當前歷史時機成為社會軍隊的集團”的這一信念，以及您關於我們的集團“要起這樣的作用，還在遙遠的、而且大概有點成問題的未來”的說法，都可以成為如下結論的藉口，那就是，據您的意見，仿佛我們的集團“就其年齡上”說，雖然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斷”，但是如果它和“民意黨”的這個或那個期刊編輯部的意見相抵觸的時候，它就應當極力保持緘默。不消說，從您所說的話做這樣的結論也許不正確，但是不應忘記，人們並不經常都是照着嚴格邏輯的一切規則來議論的。

在剛才所引用的幾行中您所說的原則，可以引起許多可悲的誤會。這幾句話對於那些“非國教信徒的讀者”可能成為完全“不合時宜的”avis(警告)。這幾行可能引起讀者們大致如下的想法：能成為“當前歷史時機的社會軍隊”的集團，是可以“破壞我們革命軍隊的組織”的。而革命的軍隊，作為有勳勞和有鍛煉的軍隊，更“可以”“破壞”那些“思想不同”的集團的“組織”，而這些集團的領導權，在這個社會軍隊看來，還是很遙遠的事情，“而且”還是“大概有

点成問題”的事情。《民意导报》的編輯部承認哪一个革命派別是社会軍队呢？大概是承認“民意党”自己。这是說……但是結論是清楚的，而且对于象我們这些直到現在都以为可以批評別人的見解而不能“破坏”別人的組織，最好同他們“并肩”而行，“相互支援，相互补充”的集团，結論是极为悲慘的^①。

您覺得我們集团的未来是值得怀疑的。我自己也准备对它怀疑，如果談論的是我們这样一个集团本身，而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些見解的話^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我們的革命运动現在是在危急的时期，这是誰都知道的。民意党的恐怖主义策略在我們的党的面前提出一系列极为现实和极为重要的問題。但是可惜，这些問題直到現在还没有解决。我們这里流行的关于巴枯宁主义派和蒲魯东主义派的理論知識，甚至用来正确地提出这些問題也是不够的。从前向一边弯曲的拐杖現在弯向另一边了。从前是毫无根据的对“政治”一味地否定，現在又是同样缺乏根据地确信秘密“政治活动”为万能。彼得堡的“民意”的綱領是倒立起来的巴枯宁主义，它拿斯拉夫主义^③的观点把俄国和西方对立起来，它把人民生活的原始形式理想化，它相信我們知識分子的革命組織能創造社会奇迹。綱領基本的理論原則沒有变，

① 參閱《現代社会主义丛書的发刊声明》第3頁注。79

② （1905年版注）現在甚至讀这些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将来的爭論时也是奇怪的。現在这种見解在革命者們中間很盛行，当然，如果在社会民主党自己內部沒有爭吵，或許还要厉害些。

③ 斯拉夫主义（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为十九世紀中叶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代表地主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坚持俄国有自己的特殊发展道路，其立論的基础，是俄国的乡村公社可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出現。其政治理想为团结所有斯拉夫人在俄国周围。当时与斯拉夫派对立的社会思想为西欧主义，强烈地批判封建制度，主张俄国应走西方国家的道路。——譯者

只是实际的結論和从前恰恰相反。放弃了不問政治态度的巴枯宁主义，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弧形圈子，以俄国式的布朗基主义姿态复活，把自己的革命希望寄托在俄国的經濟落后上面。

这一布朗基主义現在想創造自己的特殊理論，它在最近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⁸⁰中得到了十足的表现。这篇論文利用了俄国布朗基主义者所能掌握的整个武庫，为自己的綱領辯护。吉荷米洛夫先生沒有放弃使用武器的本領：他巧妙地拼凑对他有利的那些事实，謹慎地不提相反的现象，而在認為不可能影响讀者的理性的时候，就并非沒有成效地訴之于讀者的感情。他的武器已修理好、弄干淨并且磨鋒利了。但您注意地看一下，您就看出这武器正是巴枯宁主义和特卡乔夫主义的旧式刀剑，塗上新的标志：反动理論能手伏·伏·⁸¹制于彼得堡。我在下面将引用特卡乔夫《給恩格斯的公开信》的几段，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維奇，您自己将看出，您的同志只是重复十年以前《警鐘》杂志編者所說过而引起了恩格斯在您并不是不知道的一本小册子《俄国的社会关系》（《Soziales aus Russland》）中所尖銳地回答过的意見。难道十年来的运动一点也沒有教会我們的优秀作家更好的东西嗎？难道“民意党”不想理解它所遭受的牺牲的历史意义以及它的真正英勇的反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嗎？您我現在都侨居国外，关于在国内民意党人中間流行的情緒，都不能表示甚么确定的意見。不过就发生在“民意”組織以外的一些现象来判断，无疑地，革命运动是决不会在特卡乔夫的旗帜之下复活的。我們的革命青年正在徬徨动搖，他們失去了对旧式行动方法的信仰，而在他們中間出現的新的綱領和理論之多，正表示其中沒有一个能够特別概括了我們运动的所有真正利益及所有迫切任务。怀疑主义的产生就成为当然的事情。“民意”丧失了它从前的迷人的力量。

从3月1日事件^①发生三年多以来是俄国革命力量衰落的时间。这一可悲现象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以为，许多人把它解释得太肤浅了。有人說，我們的运动是在政府迫害的影响下削弱的。我过分相信俄国革命的“合于时宜”，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浅薄的解释。我以为俄国革命的潜能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而假使反动势力抬头，那只是因为我們不能把这一潜能变为动能。目前俄国的社会任务不能在布朗基主义传统的、阴谋的纲领内获得满意的解决。这一陈腐的纲领慢慢地会变成俄国革命的“普罗克勒斯第之床”^②。一切构成运动的力量、决定运动的影响的那些要素和行动方式，都将一个一个地为这一纲领的各种虚幻而奇特的目的所牺牲。恐怖主义的斗争、在人民和在社會人士中进行的鼓动、人民的自觉活动的唤起和发扬，所有这些在一个布朗基主义者看来，只有次要的、从属的意义。他的注意首先集中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阴谋。他不关心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不关心那种使旧制度不能复辟的一些新制度的建立。他只努力去拼凑社会上現成的各种力量。他无视历史，不求了解它的规律并适应这种规律而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他只想以自己的秘密活动的伎俩来代替历史发展^③。但因为俄国革命实力的增长尚无止境，因为这些实力还在des Werdens(形成的)过程中，那末，强暴地阻止这些力量的发展，就一定会产生极有害的后果，巩固反动势力的统治而不是服务于进步事业。于此可能发生的不外两种情形，或者是为实现所有阴谋中最空想的——“社会革命”——阴谋，不惜拿俄国革命前途作孤注一掷，或者是从反对

① 指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暗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事件。——譯者

② 普罗克勒斯第为古希腊传说中的强盗，他把俘虏縛在鉄床上，如身长过榻则断其足，如不及则强拉之使与床等长。——譯者

③ 一个明显的例子：所謂涅恰也夫派的党章中就有一条公开地说，“該組織的一般原則不是說服，換言之，不是培养力量，而是团結已有的力量”。82

派和革命派的俄國的內部，出現一個新力量，把“民意黨”推到後面，把我們運動的事業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鬥爭的領導權轉入我們的自由主義者之手，對於社會主義者就會是很不利的。他們將因此而很快失去從前的全部影響，在先進人民階層中建立社會主義政黨的工作也將因此而推遲若干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向我們的社會主義青年介紹我在我的小冊子中稱之為革命的代數學的馬克思主義，介紹這個教自己的信徒們為工人階級革命教育而利用社會發展每一步驟的“綱領”的道理。而我相信我們的青年和我們的工人小組遲早會領會這一唯一的革命的綱領的。在這種意義上說來，我們團體的“未來”完全不是“成問題的”，而我不了解在這種情形下，您這位作家的懷疑是從何而來的，因為不過在同一第2期《導報》上，您的文章還稱馬克思是“偉大的導師，他把社會主義引到了科學階段，並證明其歷史的合理性，同時又為工人的革命黨組織上的統一奠定了基礎”⁸³。須知，我們是不應當在口頭上承認“偉大導師”的理論原則，而在實踐上却又由這些原則得出巴枯寧主義或布朗基主義的結論的。

我重復地說，在估計目前俄國現實的問題上，最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也可能發生意見的分歧。所以我們絕不願以一個偉大名字的權威來掩護自己的綱領^①。而且我們事先就準備承認，綱領里面有許多“缺點和不切實際的地方”，它正如應用某一科學理論來分析極複雜及混亂的社會關係的一切初次嘗試一樣。但問題是，無論我或我的同志現在都還沒有有一個從頭到尾的最后定稿的綱領⁸⁴。我們只對我們的同志們指出一個方針，認為他們應當在里

① [1905年版注] 還在不久以前，完全是在最近，我這樣的聲明為《無產者》這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了解為表示對我的意見的正確性沒有信心。但是事情被解釋得有點兩樣。我從來不想 *jurare in verba magistri*（盲目地遵守老師的話）。

面寻求他们所关心的革命问题的解答；我们只是坚持一个真实和无误的标准，使他们靠它最后可以摆脱那直到现在还几乎完全地支配着我们思想的革命形而上学的残余；我们只是证明，“如果俄国的民粹派的分子们和俄国的民意派的分子们，最后，终于成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新的、最高的观点把我们的一切现有的派别都调和起来的话，我们的革命运动不仅不受丝毫损失，而且相反地，会赢得很多东西”^①。我们的纲领还须完成，还须在各地由那些将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的工人及革命青年小组来完成。对于这一纲领的补充、修正和改进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我们不害怕批评，而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批评，当然，不会象法慕索夫一样，遇到批评时塞住自己的耳朵。我们向俄国国内活动的同志提出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的第一个草案的时候，不仅不愿意和民意党竞争，而且再没有比我们更强烈地希望和这一党获致完全而彻底的协议的。我们以为，民意党只要愿意忠于自己的革命传统，愿意把俄国的运动从它现在所处的消沉状态中拯救出来，就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党。

我所说的民意党的革命传统，不单是指恐怖主义的斗争，不单是指一些暴行⁸⁵和政治性的暗杀。我说的是俄国运动的河床的加宽，这是这一斗争的必然后果，而且向我们表明了我們当时所宣传的一些理论是狭隘、抽象和片面到了何种程度。炸弹已经使亚历山大二世和这些理论同归于尽了。但是，不管俄国的专制制度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巴枯宁主义也好，都只是被炸死而未被埋葬。它们已经不复活跃，不复发展，但还继续在腐臭，他们的腐臭使整个俄国从它的最保守的到最革命的阶层都受到了熏染。只有马克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第56页（本卷第93—100页）。

思主义的健康气氛才能帮助民意党完成它已經光輝地开始了的事业,因为,如拉薩尔所說:“从科学的高峰比在日常的忙碌生活中可以早些望見黎明的曙光”。馬克思主义对我們的“民意党人”指出,他們应如何在吸引新的、几乎沒有为运动所触及到的阶层参加运动,而能同时繞过致命的片面性的暗礁,如何利用正在成熟的自由主义革命的进步方面,而能彻底矢忠于工人階級和社会主义事业。我們完全沒有那种狭隘的宗派气味,我們不是希望民意党失敗,而是希望它繼續获得成就,假使我們对它伸出的只是一只手来要求和好,那是因为我們另一只手在向它指着上面有“胜利之路”字样的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論。

不幸的是(斯宾塞說得很对)一个团体的保守主义往往和它的組織的完善程度成正比。对专制制度残酷斗争的实践,已經鍛炼出了一个坚强的民意党組織。这个完全必要而且极为有益的組織,也未能成为一般規則的例外,并且阻碍着民意党的理論的进步,它力求把那只有临时和过渡意义的綱領和学說变为教条,垂諸永久。我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結尾中曾希望《民意导报》对民意党綱領上的理論錯誤及活动中的实际缺点能采取批判的态度。我曾說过:“我們願意設想,新机关报将清醒地注意到我們革命党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将关系到党的前途。”我期待过日内瓦的《导报》要比彼得堡的“民意”进步一些。但是,假使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維奇,用心地讀一下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您就会相信那篇論文中所表示的意見甚至比起“民意”来,还后退了一大步。而这是很自然的。“民意”的旧綱領的理論前提是如此动摇和矛盾,依靠着它們前进,就无异于向下墮落。我們只有希望“民意党”的其他进步分子最后会大声疾呼,希望这个党内部的革命运动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已进行过的一样,即是說,是自

下而上地进行的。

而当这一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要不停地鼓舞我们革命者大家发表意见，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引起人们的多少抨击、责备和非难，不管如下的一种情况多么使我们难过，即是说，甚至于您，可敬的彼得·拉甫罗维奇，也对这一工作表示不满，而我们在不久以前似乎还希望得到您的赞许和同情的。我们和民意党人争论，是为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利益，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们。假使民意党人怀疑我们的诚意，把我们看成敌人而不是朋友，那末我们所能自慰的，就是认为自己的事业是合于正义的。我们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我们始终忠于我们导师的嘉言，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别人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吧⁸⁶。

紧紧地握手。

诚实敬仰您的 格·普列汉诺夫

日内瓦，1884年7月22日

导 言

(一) 人們怎样責备我們

我上面所說的人們對我們的抨击、責备和非难并不是一句空話。“劳动解放”社的成立还很不久，然而我們已經听到許多的反对意見，这些意見的发生仅仅是由于人們固执地不願思考我們的綱領的實質；由于人們只想把我們所从来沒有想到的一些思想和意向加之于我們，因此不知引起了多少誤会！有人直接地、也有人間接地用一些暗語或半暗語来形容我們为无聊的書生，教条主义者，說我們为了自己在書斋里想出来的那些理論的完整性与諧和性而决意牺牲人民的快乐与幸福。他們避免給我們“公开的打击”，不提我們的名字，但是却引用我們的語句，胡乱地解释我們的思想。他們宣称我們的理論是舶来品，認為传播这些理論之有害于俄国，实不亚于英国輸入鴉片之有害于中国。把这些混乱的概念加以肃清，把这些多少是真誠的誤会解释清楚的时候早已到了。

我現在先从最重要的誤会說起吧。

我在我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第1章里面，曾譏笑过一些革命家，他們害怕“资产阶级的”經濟进步，必然得出“令人惊异的結論，說俄国的經濟落后性是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而停滞应当作为我們的‘最低綱領’的第一和唯一的一节显示出来”。我在那本小册子里說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和布朗基主义者为要成为“實質上，而不是名义上的革命家”，只有“把自己的头脑革命化，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要站在历史的前面，

而不是請历史老嫗在原地踏脚，等着他們为她开辟新的、更直更广大的大路”^①。

我在那本小册子第3章的結尾，力求使讀者相信：“推翻专制制度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联結为一，想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把社会发展的这两个环节在我国的历史中合而为一——这是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来的时刻都推迟。”^②接着我又表示了这样的意見，說“生活在落后条件下的現代农村居民，不仅自觉的政治主动性比产业工人差，而且对于为我们革命知識分子所已开始的运动也不象工人那样容易感受……”。我繼續写道：“而且农民現在正經歷着严重危急的时期。他們从前經濟上的‘古老基础’正在崩潰，而不幸的公社也正在他們的眼中失去威信。甚至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民粹派机关物，如《星期》也如此承認，劳动的和生活的新方式还剛在形成，而这个形成的过程恰好在各工业中心表現得最为强烈。”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論給人們一种借口得出結論說，仿佛我和我的同志們既深信我国在最近的将来是屬於資本主义的，所以就准备把俄国的劳动人民推进資本主义的铁箍，而認為人民为求經濟解放所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是“不合时宜”的。

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中，在叙述其綱領“和生活失去联系”的社会活动家“滑稽作用”的时候，特別詳細地描写了那些認為“要造成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物質条件，必須先使俄国通过資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者的“可悲处境”。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描写中，这种处境簡直是絕望的，在它里面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第12—13頁（本卷第62—63頁）。

② 同上書，第70頁（本卷第115—116頁）。

無論走哪一步，都令人可怕！

我們的社會主義者不得不“忙着創造一個階級，他們願意代表它來活動，為此只得希望那些實際上存在而不幸並非無產者、從而在社會進步的科學公式中不起作用的幾百萬勞動群眾被迅速地解除職業”。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學究們的罪過還不限於在“忙着”和“希望”而已。Wer A sagt, muss auch B sagen！（誰開了頭就得接着說下去！）“社會主義者因為是徹底的，是置革命利益於個人道德純潔之上的，所以在这里就應當和那些進行原始積累的騎士們公開地結成聯盟；這些騎士們殘酷無情地增殖各種‘剩餘價值’，把工人們團結在唯一能得救的赤貧無產者的地位上。”這樣一來，革命者就變成了勞動剝削的擁護者，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完全“適合時宜地”質問道：“那末，社會主義者和有產者的分別究竟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可敬的作者在这里指的究竟是哪些“社會主義者”。很明显地，這位作者根本不喜歡“公開的打擊”，因而沒有指出自己的敵人，只簡單地告訴讀者，據說“某某些人”有這樣的一些想法。讀者會完全莫名其妙，所謂某某些人是誰，以及他們是否真如吉荷米洛夫先生代他們所說的那樣想呢？我也不知道他的讀者對他所批評的社會主義者的處境是否如同他一樣的感覺可怕。但是他所涉及的問題是這樣地有興味，他對於某幾個社會主義者的非難，和人們屢次對我們提出的非難又是這樣地相象，而他對於資本主義問題所作的否定的解答，又是這樣地決定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整個綱領和他所有“對於革命的期待”，於是他的論文正給我們以機會，好讓我們來更徹底、更全面地闡明這一問題。

那末，俄國是“必須”還是“毋須”經過資本主義的“學校”呢？

這一問題的解決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之正確提出有極大的重要意義。所以俄國的革命者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是不

足为奇的。直到最近时期，他們中的絕大多数都倾向于对这問題作坚决否定的回答。我也十分重視这一普遍的傾向。在《土地与自由》第3期的社論中我竭力說明：“历史决不是一个單調的机械的过程”，資本主义只有在“土地公社早已毀于对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斗争中的西方”，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先行者；而在公社“构成我們农民对土地关系的基本特点”的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以完全經過別的道路来达到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可以作为根据社会主义原理組織人民各方面的經濟生活的出发点。“所以，我的結論說，我們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战斗的人民革命組織，以便尽可能地在最近的将来实现人民革命的大变革。”⁸⁷

这样看来，还在1879年1月我就拥护吉荷米洛夫先生現在所主张的这一論点了，誠然

Mit ein bischen anderen Worten⁸⁸,

現在是1884年，吉荷米洛夫先生說：在“历史巨流波濤汹涌的神秘境界”后面，說简单些，就是在現代社会和政治制度崩潰之后，“等待着我們”的并不是如“某几个人”所硬說的資本主义的統治，而是“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建立“战斗的人民革命組織”的必要性，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他所推崇的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秘密活动組織，这类組織必須夺取政权，以此来发出人民革命的信号。在这一点上，他的意見和我从前的意見不同，一如“民意”的綱領有別于“土地与自由”社的綱領一样。但是吉荷米洛夫在这一問題的經濟方面所犯的錯誤，却和我在上述論文中所犯的錯誤几乎是“相同”的。因此，在駁斥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时候，我必須常常修正我曾經一度認為是完全可使人信服和无可辯駁的那种論据。

单就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观点不以新鮮和新穎見长的这一点来

說，我就不能只以批評他的論据为限，而必須尽可能充分地考察一下對我們所感興趣的這個問題，在他以前作否定回答的人講過些什麼。過去幾十年的俄國著作比《我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一文給了我們更有價值的批判材料。

(二)問題的提法

實在說來，吉荷米洛夫先生甚至不會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

吉荷米洛夫先生不去盡他所能來指陳有利於在俄國現代社會政治制度廢墟上奠立“社會主義組織始基”的可能性，却在論文中幾乎以一整章來批評那些相信“俄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人們所有的“自慰心情”。他不知怎麼太快而且出人意外地，甚至不是轉移，而是根本脫離了他在第1章開頭所持的那種客觀觀點。他在第1章開頭曾經證明，“歷史的邏輯以及事變的歷史進程等等”是“一股自發的力量，誰也不能使它離開它已經選定的道路，正因為這一道路的本身不是由它任意選擇的，而是表現着由一些力量結合起來所形成的合綫，除開這些力量外，社會就沒有什麼真實的能以產生任何行動的東西”。試問，這“一股自發力量”難道會因為顧慮到俄國社會主義者無以自慰而就停止行進嗎？顯然是不會的。可見，在分析資本主義如果勝利，俄國社會主義者會怎樣以前，應當如象這同一吉荷米洛夫先生所開導我們的，力求為自己形成一種“關於這一力量及其方向的正确觀念”，這種觀念是“每一社會活動家所必須有的，因為他的政治綱領如果不順應這一力量，就不能有任何的重要性”。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自己却寧願採取相反的方法。他首先就盡力吓唬自己的讀者，而後，在“以下諸章”才“大略”指出，使得我們能相信俄國有避免資本主義可能的那些“我們革命的目的與手段”。現在一點不說他想吓唬他的社會主義讀者們的

企图已有几许成功，我只须说，这样的论证方法在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时，是不应当使用的。

由于某些这里不便加以考察的原因，俄国有知识的人不得不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给予极大的注意。关于这一“讨厌的”问题曾有许多人写过文章，在好些小圈子里谈得更多，然而直到现在，俄国的社会活动家常常甚至不会分开必然领域和愿望领域的界限，因而有时准备去和历史争论，如象黑列士达可夫^①和酒店堂馆争论一样。不朽的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黑列士达可夫说：“我总得要吃些东西呀，这样下去，我是会完全饿瘦的。”而另一个受了吉荷米洛夫吓唬的读者大概会嚷道：“我这样一来还成什么社会主义者呀？这样，我只好直接去和那些从事原始积累的骑士们结成同盟罢！”不过我们应当希望，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历史的逻辑”之不可克服的力量的议论，将大有助于消除这一大的“思想不成熟的”“错误”。

“劳动解放”社的观点，在我看来，是足以从自己方面消灭这种滥用“社会学中主观方法”的现象的。我们认为，愿望的东西是从必然的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议论中不等于必然的东西。我们认为，个性的自由就在于通晓自然界——顺便说，连历史也在内——的规律，在于善于服从这些规律——顺便说，也善于最有利地配合它们。我们深信当“社会循着自己运动的自然规律所示的途径前进时，它既不能跳越自己发展的那些自然阶段，也不能以命令废除它们。但是它可以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⁸⁹按照我们的意见，深信“俄国资本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者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缩短和减轻生育的痛苦。”他们引以

^① 黑列士达可夫为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中冒充钦差大臣的人物。——译者

自慰的，也应当是能够減輕这些痛苦。吉荷米洛夫先生所强加于他們的彻底性，如我們在下面还要說到的，乃是一种对于社会发展的辯証法沒有絲毫理解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性。

但是我們且不要离开我們的題目。

(三) 赫 尔 岑

早在五十年代的初期，赫尔岑于証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时，在日漸成长的俄国民主主义力量面前，已經提出了一个

永远令人不安的和新的問題，

这問題从那时候起

困扰过多少深思的头脑……

帶給了他們多少痛苦

而且也成为我們“和民意党論战”的导火綫。

赫尔岑在其《給林頓的信》⁹⁰ 中問道：“俄国必須經過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別的法則来前进呢？”^①

这位著名的作家急忙回答說：“我完全否認有这些重复的必要，大概我們必須受我們先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困难和痛苦的考驗。但这正如胎兒在出生以前通过动物生存的所有低級阶段一样。已完結的工作和已得到的成績成为一切能理解的人的公共財產，这是进步的連环保証，是人类的嫡长繼承……。每一个学生都必須自己来寻求欧几里得几何学命題的答案，但是在发现这些命題的欧几里得的劳动和我們今天学生的劳动之間是何等悬

^① 伊斯堪吉尔：《旧世界和俄国》，第31—32頁。

殊！”……“俄国是在欧洲的班級中完成自己的胚胎发育的。我国的貴族和政府代表着斯拉夫国家內的欧洲的国家。我們也通过了所有阶段的政治教育，从德国的立宪主义，从英国的文牘主义的君主政治开始，一直到崇拜九三年^①为止。……俄国人民不需要重新开始这一辛苦的劳动。……不用說，他們是不需要为达到一些不彻底的办法来流自己的血的，其实我們早就走过了这些不彻底的办法的阶段，它們的重要性只在于我們通过它們而遇到了一些別的問題，达到了一些新的意图。我們已經代人民完成了这一沉重的工作，我們为它所付的代价就是絞架、牢獄、充軍、破产以及所过的不可忍受的生活！”

赫尔岑認為，俄国人民所賴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联結的环节、桥梁，当然，是公社和与之相关連的为人民生活的諸特点。他說：“人們只是在1830年革命以后，才开始認識俄国人民。他們惊异地看見对一切政治問題漠不关心并且沒有政治能力的俄国人，却在生活方面比所有欧洲各国人民还更接近于新的社会組織。”……“保存公社和給个人以自由，普及村和乡的self-government（自治）于城市和整个国家，保全民族的統一——这就是关系俄国将来的問題之所在，也是西方思想家力求解决和感觉苦恼的同样的社会矛盾的問題之所在”^②。

固然在赫尔岑的心里有时也怀疑俄国人是否特別接近于“新的社会組織”。在同一封“信”中他問林頓道：“关于这点你或許會說，在这方面，俄国人民类似亚洲的一些民族，并指出和我們的公社足够相象的印度人的乡村公社吧？”他虽不否認俄国人民和“某些亚洲民族”有不值得恭維的相似之点，但是他看出了它們中間有

^① 指法國大革命中的1793年。——譯者

^② 伊斯堪吉尔：《旧世界和俄国》，第31—32頁。

一些极重要的差异。“使亚洲民族停滞不进的并不是公社組織，而是他們独特的民族性，他們的不能脫离宗法制度，不能从氏族中解放出来；而我們就不是这种情形。斯拉夫民族……有很大的适应性；他們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語言、风俗、习惯、艺术和技术。他們無論在北冰洋或在黑海沿岸都能住得慣。”这一使斯拉夫人能“脫离宗法制度、从氏族中解放出来”的“很大的适应性”，按照赫尔岑的意見，就解决了全部問題。当时赫尔岑的威望是这样高，他的縮短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建議是这样富誘惑力，因此六十年代的俄国知識分子很少怀疑他所寻得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显然完全沒有想一想以下的問題：这一历史的道路通过一些什么地方，以及誰来領導“对一切政治問題漠不关心并且沒有应付能力”的俄国人民去走这条路？这些知識分子当时所認為重要的，首先是替自己的坚决願望找到某种哲学上的認可，他們第一次滿足于那种抽象的想法，就是說世界上是沒有任何哲学能强迫他們去和资产阶级的“一些不彻底的解决”妥协的。

但是，如果要制訂实际的行动方式，定出稍为适当的方法来和周围的环境斗争，这种抽象的想法自然是不够的。解决这一新任务所需的材料必須在历史哲学之外去寻找，即使它比赫尔岑的哲学更严密、更科学。在哲学的抽象公式和社会生活的具体需要之間，有一道大鴻沟，只有靠一連串新的、越来越具体的公式方能把它填滿，而这些公式又要求熟悉一連串的越来越复杂的現象。不过哲学在这里对于俄国思想界也有一种間接的帮助，它向俄国思想界介紹了辯証法，教給了俄国思想界一个后来多次被人遺忘的真理，那就是說，在社会生活中“一切在流”，“一切在变”；社会生活中的諸現象只有在运动中，在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沒落过程中方能被理解。

（四）車尔尼雪夫斯基

《对反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的文献中运用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的最光辉的尝试⁹¹。大家知道，这篇文章对于教育我们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多么大的影响。它加强了他们对公社的信心，证明了这种土地所有制可以在某些条件下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形式。但是，严格说来，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以及他的信徒们从《对哲学偏见的批判》中所做出的一些结论，远比前提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为广泛。車尔尼雪夫斯基所找到的关于公社命运问题的解答，实质上纯粹是代数学的，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因为他必须以此与他的论敌们的纯粹代数学的公式相对立。俄国的曼彻斯特学派证明公社土地所有制必须到处渐渐让位于土地私有制。这是他们所提出的财产关系发展的公式。首先，車尔尼雪夫斯基证明，第一这个公式并不包括整个的发展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的某一阶段，公有制必将重新成为支配的形式；其次，他完全有根据地指出以下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替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和依照共产主义原则而自觉地改造社会的时代之间历史的间隔期，规定一个永恒不变的、一劳永逸的一定时限。一般地说，这一间隔期是一个 x ，这个 x 在每一个别国家里所具有的特殊算术意义，是以决定该国历史发展的内外诸力量的结合为转移的。因为这些力量的和，必然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无怪使我们发生兴味的 x ，即私有制统治时期的长短，在某些地方会是一个无穷小的数，换言之，可以没有大错地说它等于零。这样就证明了由原始公社直接过渡到“最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的抽象可能性。但是正因为论据的抽象性，这一哲学和历史辩证法的一般结果对于一切保有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国家和民族，由俄国到新西兰、

由塞爾維亞人的大家族到紅種印第安人的某一部落，都同樣可以適用^①。所以它是不足以作為預言（縱然是大約地預言）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國家之內的公社的未來命運的根據的。抽象的可能性還不能算是具體的或然性；因此，更不可以在說到歷史必然性的地方，把它算作最後的理由。為要稍微認真一點來談歷史的必然性，應當從代數轉到算術，證明在我們所關心的場合（不論它是俄國或阿尚地人^②的國家也好，是塞爾維亞或是溫哥華島也好）， x 將真正等於零，即是說，私有財產還在萌芽中就必須滅亡。為此，就應當注意統計，注意估計該國或該部落的內部發展過程以及外部對它們的影響，所注意的已經不是一般的類，而是在其下的某一種甚至於亞種，不是一般的原始集體的不動產，而是俄國的或塞爾維亞的或新西蘭的特殊的土地公社，注意那一切於它們不利或有利的影響以及當時它們由於這些影響而產生的狀態。

但是在車爾尼雪夫斯基批判“那些搞哲學的聰明人”的《對反對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哲學偏見的批判》一文里，我們甚至找不到一點要作這種考察的暗示。在別的一些場合，當他不得不和“搞經濟的聰明人”爭論而打破他們的那些“由於不理解、不記得或不知道有關人的物質活動、生產、勞動及勞動的一般法則的共同真理”所生的偏見時，他在這些論文中也是只一般地說到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各種利益。這樣，結果仍然只是一些代數的公式，只是一些一般的經濟定理而已。^③

不過，就他說來，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這位密勒的批評者，

①（1905年版注）那時還沒有徹底弄清楚，俄國的農村公社和原始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點。現在這是無可懷疑的了。

② 在非洲。——譯者

③（1905年版注）參閱我的論文《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⁹²，載《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第1期，日內瓦1890年。

可能只看到改革前的，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状态的和因为受农奴制平均影响而彼此相似的公社。这一影响自然没有消除农村公社所固有的“各种经济矛盾”，却使这些矛盾处于隐蔽的状态，从而把它们实际意义贬低到微不足道的最低限度。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能够满足于如下的想法，即认为我国“人民群众直到现在还把土地了解为公社的财产”；认为“每一个俄国人都有故乡，也有分一块故乡土地的权利。假使他本人放弃或丧失了这一块土地，他的子孙仍能根据公社社员的权利，为自己单独要求一块”。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清楚：农民的解放将把他们放在完全新的经济条件下；“迄今很少参加经济活动的俄国，会迅速地参加，而至今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各种经济法则（它们只是在经济和贸易活动加强时方显露自己的威力）影响的我们的生活，将开始很快地服从这些法则的力量”；并且，“连我们也可能很快被卷入竞争法则充分起作用的圈子之内”；由于他懂得这些，所以他关心的只是保存那种能够帮助农民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开始新的经济生活的土地所有形式。还在1857年4月他就写道：“无论希望俄国进行什么改革，但是我们总不可侵犯我们过去生活所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神圣的、有益的习惯，单靠这一宝贵遗产，就可绰绰有余地抵偿我们过去生活中的贫苦，——我们总不可去侵犯公社的土地使用制，去侵犯这样一种良好制度，即是现在西欧农民阶级为了过幸福的生活所须实现的制度。他们的实例要成为我们的教训。”

我们这里所写的不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所持的一切见解的分析，而只是努力表达他这些见解中的最显著的特点。我们并不牵涉和这里没有关系的一些细节，而只说，他所期待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一些利益，可归纳为两个主要点，其中一点是属于制度的范围，另一点是属于农业技术的范围。

关于第一点，他用哈克斯特豪生的話說，“俄国的公社組織，对于俄国，尤其在現时，在国家制度方面說，是无限重要的。西欧所有的国家現在都患着一种病，想把这病治好，至今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任务^①——这种病就是赤貧状态和无产階級化。俄国就不知道有这种灾难；因为公社的組織使它免于灾难。每个俄国人都有故乡，也有分一块故乡土地的权利。假使他本人放弃或丧失了这块土地，他的子孙仍能根据公社社員的权利为自己单独要求一块土地”^②。

关于第二点，車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上述哈克斯特豪生的話，描述了烏拉尔的哥薩克人的生活，說“他們的整个区域在經濟、軍事、民事关系上都是一个公社”之后，就指出說：“假使烏拉尔人依照現在自己这种組織一直生活到采用机器耕田的时候，那末，烏拉尔人那时候将很快乐，因为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許使用机器的制度，而这些机器是要求数以百俄亩計的广大面积的农場的。”同时他又指明，他的議論只是作为例証來說明，“烏拉尔的哥薩克人在将来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想法，至于这一时候究竟何时到来还是不知道的（虽说机械学和工艺学的进步无疑地証明这样的时候是終归要来的）。其实我們用不着去管那太过遥远的将来；我們的玄孙的玄孙們大概不用我們关心，都是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来生存在世界上的。我們只要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們就够了”^③。

当然，讀过車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讀者知道，他的这种保留态度是絕沒有阻止他对将来想得很多和“关心”得很多的。薇拉·巴夫洛夫娜^④的一个梦明显地向我們表明，他在他的想象中把“遥远

① 重点是我加的。

② 車尔尼雪夫斯基：《論公社土地所有制》，載《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日內瓦〕，1879年版，第5卷，第135頁。

③ 这是車尔尼雪夫斯基著名小說《做什么？》中的女主人公。——譯者

的将来”⁹⁴的社会关系描画成什么样子，而他的这个女主人公的实际活动又给我们关于那些可以促进这一幸福时代到来的方法的某种概念。”所以，如果说《做什么？》的作者没有把他重视的现代农民土地所有形式和关于将来（虽是遥远的，但是有希望的，而主要的是不可避免的将来）的一些理想联系起来，便是奇怪的。而他关于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论文确也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考察了这种形式的财产关系对农民的性格及习惯的影响。他自然不同意那种“公社消灭人的积极性”的说法。这样的思想是“绝对和历史及心理学上的已知事实相矛盾”的，这些事实相反地证明了“人的智力和意志在团体中增强起来”。但是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优点在于维持和培养一种团体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未来的合理经济是不可思议的。“在西欧，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大大地为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所妨碍……人们是本来就不容易放弃，那怕是极小一部分他所习于享受的东西的，而在西方，个人已经习惯于无限的私有权。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无所牺牲的，因此它的建立很困难。它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国是空想的东西，在别国却是事实。……在英国人和法国人想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觉得无限困难的那些习惯，在俄国人方面则作为他们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西方现在须经过如此困难的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已经是我们乡村生活中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习俗……我们看见，西方由于失去公社土地所有制产生了何等悲惨的后果，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的损失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事例我们不当忽视”^①。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16—19頁。

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公社土地所有制對俄國人民現在及將來經濟生活重要性所作的評價。我們雖然十分尊敬這一偉大作家，但不能不看出這一評價的某些缺點和片面性。例如，在五十年代末，在《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已出版了多年以後，就難以承認“治好”西歐國家“無產階級化的潰瘍”，是一件“不能解決的任務”。使車爾尼雪夫斯基驚駭的“病”，不僅是可以“治好”，而且連它的歷史意義，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到現在仍然是經典的著作中充分地並且證據確鑿地給指出來了。但是這位俄國經濟學家，正如各方面所看出的，沒有讀過這些著作，而他以前時期的一些社會主義的空想對於很多理論與實際的問題自然沒有給予任何滿意的解答。空想主義者世界觀的主要缺點，是“他們根本沒有看見無產階級方面的歷史自動性，根本沒有看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政治運動”；他們還沒有站在階級鬥爭的觀點上，而且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只是作為一個最受苦的階級”存在的^①。當他們“以自己發明的社會組織來代替逐步前進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組織”，同時關於這一將來社會組織的基礎及其性質問題彼此又意見分歧的時候，他們自然會使俄國讀者們認為西方最先進的思想家還解決不了社會問題。而且由於這些空想主義者“把今後世界的歷史歸結為一部宣傳和實現他們的那些改良計劃的歷史”，所以他們的這些學說自然不能滿足象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極富批判能力的思想家了。他必須獨立尋找使西歐工人階級得到解放的真實的“歷史諸條件”，而且他找到了這些條件看來是在恢復公社土地所有制中。我們已經知道，按他的意見說，“這樣一種良好制度，即是現在西歐農民階級為了過幸福的生活所須實現的制度”。

^① 《共產黨宣言》，第36—37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頁）。

但是不管人們对于俄国公社的历史意义有怎样的看法，可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認的是，公社在西方国家中的作用，已一去不返地完結了；西方各国人民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和現在都是由公社經過私有制，而不是相反地由私有制經過公社。我以为，如果車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对于西方走向“經濟諸关系上的較好制度”的“困难的和漫长的道路”有更清楚一些的了解，如果他，除此以外，更能精确地决定这一“較好制度”的一些經濟条件的話，那末，他就会看出：第一，“西方”所努力的是变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制而不是公社所有制；第二，他就会了解，“无产階級化的潰疮”本身就会产生自己的藥剂。那时候，他就会对无产階級的历史作用有更好的評价，而这一点就使得他有可能来更广泛地看俄国公社的社会一政治意义。現在且來說明一下。

大家知道，对于任何社会关系的形式，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考察。即可以从它所給予这一代人的利益出发去考察它；也可以因为不满意这些利益，而去关心它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级的、更有利于經濟繁荣和人的智力与道德发展的社会形式的能力；最后也可以在这过渡到更高级的形式的的能力本身上，看出它的消极和积极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消极方面，它对于这一过渡不予阻碍；积极方面，它具有活的內在力量，不仅能够完成这一过渡，而且把这一过渡当作自己存在之必然后果而促使其到来。在前一种場合，我們观察某一社会形式是从抗拒外面引起的进步着眼的，在后一种場合，我們观察某一社会形式是从有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着眼的。一个历史哲学家或实际的革命活动家所視為重要的，只是那些能多多少少做点这种有益工作的社会形式。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正在于每一阶段的社会靠自己内部的自动性能单独地創造出一种力量，来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形式，并在其

廢墟上建成新的更好的社會建築物。一般說來，對於向更高發展階段過渡的阻礙的多少，是和這一活的力量的大小有密切關係的，因為這種活的力量，正是舊社會形式瓦解的結果。瓦解的過程進行得越厲害，它所解放出來的力量就越多，而衰朽的社會關係的穩定性就越小。換言之，歷史家或實際的革命家所關心的，不是靜態而是動態，不是保守的方面而是革命的方面，不是社會關係的諧和而是其矛盾，因為這些矛盾的精神正是這樣一種精神，它

Stets das Böse will und stets das Gute schafft⁹⁵.

直到現在都是這樣的！但是，不消說，事情不應當總是這樣，而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將排除一個“鐵的和殘酷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社會關係的矛盾只能暫時獲得解決，而這一解決又將成為新混亂與新矛盾的泉源。但是，要使所有變革中的這一最偉大的變革，即是最後必須“使人們成為他們社會關係的主人”的革命完成，如果沒有那種由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矛盾所產生而為革命完成所必需的和足夠的歷史力量“存在”，便是難以想象的。在現代文明世界的先進國家里，這一力量不僅存在，而且每小時、每分鐘都在增長。所以這些國家的歷史是社會主義者的同盟者，它以經常增長的速度使他們接近所追求的目標。這樣，我們又一次地——但願這是最後一次——看見，“甜的”東西只能從“苦的”東西裏面出來，歷史為了完成好“事”，應當，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把壞的“主意”暴露出來。在分配方面完全“不正常和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倒是“正常”得多，而在產生如詩人所說的願意和能夠“在地上建立天國”⁹⁶的人才方面，還更要“正常”得多。資產階級“不僅鑄好了給自己以致命打擊的武器”，換言之，不僅把先進國家的生產力引到了這樣高度的發展，以致使它們不能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相調和，而且“還產生了使用這一武

器的人，即现代工人，无产者”。

由此可見，为了完全估計某一社会形式的政治意义，所必須考虑的，不仅是它能帶給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那些經濟利益，不仅是它在受到某种有益的外力影响时消极的改进能力，而主要地是考虑它朝着适当方向繼續独立发展的内部能力。如果没有这种全面的估計，社会关系的分析总是不完全的，因此也是錯誤的；某一社会形式从这些观点中的某一观点看来可能完全合理，但是同时从另一观点看来，就可能完全不滿人意。这种情形在我們不得不考察的那些落后的还没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主人”的人民时，每次都会遇到。只有这些关系本身的客观革命性可以把落后的人民引上进步的道路。假如某种公共生活形式显露不出这样的革命性，假如这一形式，从制度和生产品分配的观点上看来多少是“公平的”，同时又是以很大的守旧性为特色，而缺少向一定方向自行改善的内在意图，那末，社会改革家要就只有放弃自己的計劃，要就訴之于别的足以补充某一社会内部自动性之不足的外部力量来改革它，虽然不見得违反其成員的意志，但无论如何是沒有他們积极而自觉地参加的。

說到車尔尼雪夫斯基，那末，他似乎已忽視了西欧的“病”（赤貧状态）的革命意义。如果說，在他論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几篇論文中所不得不一再提到的那位哈克斯特豪生，只看到了“赤貧状态一无产階級化”的坏的一方面的話，那是絲毫不足为怪的。哈克斯特豪生的政治見解就是：他絕不能同意把无产階級在西欧社会史中的革命意义看成屬于这一“潰疮”的积极的有益的方面。因此，他当然就不免要兴致勃勃地来描写那足以“預防无产階級化”的制度了。但是在某一个作家的文章中是完全可理解的和彻底的意見，在別一个作家的論文中遇着的时候，就常常会使讀者奇怪。老实說，

我們對於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哈克斯特豪生的下面一段話包含着什麼意思是不明白的。“他是一個老練的人，他在1847年曾經很正確地預見到西歐無產者方面的可怕的爆發事件的逼近；我們不能不同意他所說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原則是造福於人的，它保護我們農村人口免患無產階級化這一可怕的潰瘍。”^{①97} 這裡所說的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經濟底貧困，俄國農民的貧困何嘗比他們好些；這裡也一點沒有說到俄國農民的社会習慣，而西歐產業工人的集體勞動的和各種各樣的團體生活的習慣，無論怎樣，也是可以比得上俄國農民的社会習慣的。不是的，這裡所說的是“無產者方面的可怕的爆發”，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這方面，甚至認為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原則是“造福於人的”，“保護我們免患無產階級化這一可怕的潰瘍”。這位俄國社會主義之父竟會同伯爵哈克斯特豪生一樣驚懼地看待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是不能設想的。不能認為，無產階級起義的事實本身竟會吓住了他。我們只好假定1848年工人階級所遭受的失敗會使他惶惑不安，他對這一階級的政治運動的同情，已為那種認定政治革命沒有結果、資本主義制度有害無益性的思想所毒害。這樣的解釋雖不十足可靠，但至少是很可能的。如果讀一讀他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時代法國的黨派鬥爭》⁹⁸ 一文的幾頁，即是講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努力方向的分別那幾頁，即可明白。他說：“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根本願望以及根本動機，都是大不相同的。民主主義者所注意的，是尽可能推翻上層等級在國家機構中對下層等級的支配地位，一方面減少上層等級的實力和財富，另一方面給予下層等級以更大比重和物質福利。至於用什麼方法來在這方面變更法律和維持新社會組織，在他們看來幾乎

① 《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第100頁。

橫豎都是一样的^①。反之，自由主义者絕不会同意把社会中的优势讓給下层等級，因为这些等級，由于自己沒有受教育和物質上的貧穷，是漠不关心地对待自由主义党派所視為高于一切的利益，即言論自由和立宪制度的。民主主义者認為：平民过着好生活的我們的西伯利亞，比起大多数人民極感匱乏的英国來要高得多。民主主义者在所有政治制度中不可調和地仇視的只是一種政治制度——貴族政治；自由主义者几乎总是認為，只有在貴族政治发展到了某一阶段，社会才能达到自由主义制度。因此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主义者恨得要死……自由主义把自由了解成极狭义的和純粹形式的。他們把它看成抽象的权利，看成紙上的允許和法律上不加禁止。他們不願了解，法律上的允許，只有当一个人有物質資料來享受时候，这种允許才对他有价值。对于我或对于你——讀者，並沒有誰禁止使用金的食器來進午餐；可惜，不論你我都沒有，而且也許永不会有錢來滿足這一奢侈的想法，所以我坦白地說，我一点也不珍視自己可以有金的食器的权利，而願以一個銀卢布或甚至更便宜些的代價把這一权利出讓。自由主义者所忙于爭取的所有那些权利，在人民看来，也就是这一类的权利。人民是无知識的，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他們的多数是不識字的；他們沒有錢來受教育，也沒有錢讓自己的子女受教育，他們怎么珍視言論自由的权利呢？匱乏和无知剝奪了人民的任何了解國事和過問政治的可能，請問，他們會珍視，他們能運用國會里一些辯論的权利嗎？……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民不是對那些成為自由主義者的願望和忙碌對象的权利漠不关心的。因此自由主义到处都注定了軟弱无力的命运，不管怎樣議論，只有那些為人民群眾所擁護的意圖才是有力的，只有那些為人民群眾所擁護的制度才是巩固的。”^{②99}

以上所引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文刊出后不到十年，歐洲无

产階級便經由自己的先进代表們宣布了，它認為达到自己伟大經濟目标的手段，就是自己的政治运动；“工人階級的社会解放，沒有它的政治解放是不可想象的。”工人階級政治权利不断扩大的必要以及它必須最后取得政治的統治，都曾为国际工人协会所承認。协会的第一个宣言說道：“工人階級的首要义务在于为自己取得政治权力”¹⁰⁰。不消說，英国的劳动人民比西伯利亚的“平民”，距离政治权力要近一些和更长于运用它，单就这一点說，除蒲魯东主义者以外，沒有人会在六十年代說“西伯利亚高于英国”的。但是，就在車尔尼雪夫斯基写他的論文时的五十年代之末，也可以看出，那存在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的“无知識的和不能識字的人民”中間的一整个阶层（即仍然是同一的无产階級）之所以不享有“言論自由的权利和在国会里辯論的权利”，完全不是对这些权利漠不关心，而仅仅是由于1848年以后，反动势力籠罩了全欧洲的緣故，这一反动势力首先关心的就是排斥人民，不使人民享有这些“抽象权利”。无产階級有如在全綫上被击潰，被反动势力打击得暈倒，对于自己的从資產階級政党出身的急进派和“民主主义”的同盟者表示失望，因而真正陷于仿佛暫时的麻痹和对社会問題缺乏兴趣。但是当它对于这些問題感觉兴趣的时候，它就仍然把政治权利的取得及其合理的运用看成是自己解放的强有力的手段。甚至以前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的那些社会主义宗派里，已經有許多宗派正是在五十年代之初开始对政治表现很大的兴趣。例如，法国的傅立叶主义者就曾經和瑞欽豪生一起，竭力宣传人民直接立法的原則。至于德国，那末，無論“民主主义者”約翰·雅可毕及其信徒，或馬克思、恩格斯派的共产主义者都不会說：在他們看来，要减少上层等級的实力

① 这段引文中的重点都是我加的。

② 《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时代法国的党派斗争》，《俄国社会民主丛書》第3册，第5—8頁。

和财富和保证下层等级的幸福，无论“用怎样的手段来变更法律几乎横竖都是一样的”。他们有完全确定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所不可调和地敌视的”，远不止是“一个贵族政治”。

西欧的农民确实常常对于各种“抽象权利”漠不关心，有时大概宁愿选择西伯利亚的制度，而不选择英国的制度。但是，问题却在于真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亦即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面向农民而是面向无产阶级的。他们把作为所有主的西欧农民，看成居民中的“中间阶层”，这些阶层之所以“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行将落入无阶级的队伍，是因为他们不是捍卫着他们现在的利益而是捍卫着他们将来的利益，是因为他们抛弃他们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阶级的观点”^①。这一差别很重要。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在学会了分析“人民”这一概念，开始分开它的革命阶层与保守阶层的时候，才算脱离了政治上的形而上学的无结果的领域。

为了把公社土地所有制问题研究得很完全，車尔尼雪夫斯基正应当从这一最后的、社会与政治的观点来看问题。他应当表明，公社土地所有制不仅能预防我们患“无产阶级化的溃疡”，不仅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来发展业农技术（即以机械耕种大片土地），而且也能在俄国创造出同西欧无产者一样活泼的、一样敏感的、有毅力的和革命的人民。但是，他把西欧“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当作是无知的和在多数场合对“抽象的”政治权利漠不关心的、“目不识丁的”一群的看法，妨碍了他这样做。在他的观念中西欧无阶级的政治作用是不够突出的，因此不能在和俄国农民和公社社员的政治未来相比较时被想起来。凡不期望西方工人阶级有很高政

① 見我譯的《共产党宣言》，第14頁，101

治独立性的人,对于俄国农民的消极与政治冷淡也将无动于中。这就是卓尔尼雪夫斯基在研究公社土地所有制时,只限于考察制度、产品分配及农艺方面,而不研究公社对国家以及国家对公社的政治影响的問題的原因之一。

这个問題一直就这样沒有弄明白过。因而关于由公社土地所有制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主要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的各种方式問題,也沒有弄明白。現在的农村公社将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公社,或怎样融化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呢?革命的知識分子怎样才能促进这一过程呢?这类知識分子“做什么”呢?拥护公社土地所有制和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举办如薇拉·巴夫洛夫娜的手工縫紉作坊一类的生产团体,希望有一天这些作坊和农村公社都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利益而努力促其实现嗎?姑且假定如此,但是走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很长,可以保証这条道路在其全程中都是笔直和平坦的,在路上遇不着预料不到的障碍及意外的曲折嗎?假如政府将对社会主义宣传进行迫害,禁止結社,将社团的成員交警察看管和充軍,那又怎么办呢?和政府斗争,爭取言論、集会、結社的自由嗎?但是那时候,就应当承認西伯利亚不高于英国,而“自由主义者所忙于爭取”的“抽象权利”正是人民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总之,就应当开始政治斗争。但可否指望这一斗争之有利的結局,可否爭得稍为巩固些的政治自由呢?要知道“不管怎样議論,只有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意图才是有力的,只有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制度才是巩固的”,而这些群众,假使不是在別国,至少是在俄国,是一点也不重視“言論自由的权利”,而且关于“在国会里进行辯論的权利”問題,更是一点都不懂的。假使自由主义正是“因此注定了軟弱无力的命运”,那末,社会主义者要为那些“成为自由主义的願望与忙碌对象的权利”而斗争时,又从哪里去寻找力量呢?怎样摆

脫这一困难呢？把經濟改良的具体要求和政治自由的“抽象权利”一起載入自己的綱領中嗎？但是这就需要人民認識这一綱領，換言之，又需要进行宣传，而进行宣传时，我們又将遇到政府的迫害，政府的迫害又推动我們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由于人民的漠不关心，这一政治斗争又是沒有希望的，如此类推。

从另一方面說，很可能的，“烏拉尔人假使在現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活到采用很有力量的机器耕田的时候，他們将很快乐，因为他們保存了那种允許使用机器的制度，而这些机器是要求数以百俄亩計的广大面积的农場的”。同样可能的，那些“在現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活到采用机器耕种的”农民社团也“将很快乐”。不过，“在現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活不到那时候的农民又有什么快乐呢？那些受雇于公社社員当长工的乡村无产者将有何快乐呢？这些社員会把劳动力剝削得和在私人經濟中剝削的程度一样的强烈。俄国的“人民”这样就分成了两个阶级：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者的个人。这一新的賤民阶级的前途怎样呢？如果說由于資本集中而队伍不断在增大的西欧无产者可以靠今天是奴隶、明天将成为独立而快乐的工人的希望来自慰，那末，因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而人数增加得很慢的俄国无产者可否以这样的前途自慰呢？难道沒有希望的奴隶状况

沒有胜利，沒有調和的

严酷斗争不是正在期待着他嗎？我們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在这斗争中要参加在哪一方面呢？假使他們拥护无产阶级，那末，他們难道不应当毁灭过去所崇拜的一切，难道不应当把公社当成小资产阶级剝削支柱而将它踢开嗎？

車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是关于废除农奴制度以前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假使他的头脑中沒有发生上述問題，并且可能希望，經過

某种立法的規定而使乡村不可能发展无产階級，那末，在知道了臭名远揚的二月十九日改革性質的七十年代我們革命者之前，所有或几乎所有这些問題就是必然应当发生的。不管要想出一些保护公社免于瓦解，同时对于我們工业生活整个进程不加以难于忍受的压迫的法律是多么困难，不管要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集体主义和貨幣經濟及所有产品（也包括公社本身的农产品在內）的商品生产結合起来是多么困难，但是关于这一切，在1861年以前还是可以談論和可以爭辯的。农民改革对于这类的爭辯及談論，应当給予完全确定的內容了。我們的革命者們在展望多少是有問題的将来的領域时，就应当从現在的不可爭辯的事实出发。而这一現在的事实，是和旧的、亦即哈克斯特豪生及車尔尼雪夫斯基所熟悉的改革以前的农民生活情景是很少有共同之点的。“二月十九日条例”已使公社失去了自然經濟的稳定的平衡，使它受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法則所支配。农民的贖地，如我們在下面将看到的，必須在敌視公社土地所有制原則的基础上来进行。除此以外，我們的法律既为国庫的利益保存了公社，然而又給三分之二的农户以权利，使他們把公社土地完全分割为各戶私有。土地重分也变成困难了，而末了，还对“自由农民”加上了他們支付能力所完全不能胜任的捐稅和劳役負擔。农民对“新农奴法”的反抗都被用鞭笞和刺刀鎮压了下去，“新”的俄国已为貨幣投机的热潮所席卷。铁路、銀行、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上面所引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說俄国面临着“重大經濟改革”的預言，在这位青年的伟大导师还未到达他的充軍地时就實現了。亚历山大二世是資產階級的沙皇，正如尼古拉是軍人及貴族的沙皇一样。

七十年代之初，“到民間去”进行社会革命宣传和鼓动的我們革命青年，是应当重視这些不可辯駁的事实的。当时值得注意的，

已經不是地主的农民摆脱农奴的依赖地位，而是俄国的全体劳动人民从各种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当时所谈论的问题已经不是农民的“改革”，而在于“农民团体的建立，这个团体里面将没有我你之分，将没有利润，没有压迫，而只有为共同利益的工作和全体之间的兄弟般的互助。”^①¹⁰²为了建立这类“农民的团体”，所应当求助的已经不是政府，不是编纂委员会^②，甚至不是“社会人士”，而是农民自己。在进行这种属于“劳动人民自己”事业的劳动者解放的工作时，就应当更精确地考察、确定和指出人民生活中的革命因素，而为此就应当把前几十年进步书籍所定出的抽象的、代数的公式改为算术的语言，把俄国生活中起着好的或坏的影响的那些因素作一总结，而所开始的事业的进程及其结局，是以这些影响的总和为转移的。但因为我们的青年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就已经知道了“人民群众迄今都理解土地是公社的财产，而公社所有的土地数量……是这样的多，就是从公社里面分出来成为个人完全有权处理的许多地段比起公社所有土地来是不关重要的”。那末，研究俄国生活中的各种革命因素，正应当从公社土地所有制开始。

“二月十九日条例”的那些自相矛盾的决定是怎样影响到公社呢？公社是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来和不利于它的货币经济条件作斗争呢？我们的农民生活的发展是否已走上“自己运动的自然法则”的道路，以致无论严厉的法律或知识分子的宣传都已经不能引誘它（公社）离开这一道路呢？而假如还不曾这样，假如我们的农民—公社社员直到现在还可以不大费力地领会社会主义的理想，那末，这种消极的领会是必须要有有力的，需要和对许多障碍作斗

① 見《巧妙的机构》，1877年版，第47—48頁。

② 編纂委员会是俄国政府于1859年設立，其任务为拟定废除农奴制度的法律。

爭的实际行为作后盾的；我們农民的生活条件有助于培养他这种积极的毅力嗎？須知沒有这种毅力，他心里的所有“社会主义”倾向都是无用的。

我們运动中的各种派别对这些問題各有不同的回答。大部分革命家都准备同意赫尔岑的話，說俄国人民对政治是“漠不关心，沒有应付能力”的話。但是我国社会主义者是很倾向于把人民理想化的，而且他們也弄不清楚社会生活的各不同方面的相互联系，因之就把这种“对所有政治問題”沒有应付能力看作好象是人民不会贊成资产阶级的“不彻底解决”的一种保障，看作好象是人民大有正确解决經濟問題能力的証明。对政治的兴趣及应付能力被認為只是政治革命所必須，当时我們所有的社会主义文献都把政治革命看得是和“社会”革命相对立的，有如恶与善之对立、资产阶级的欺騙与人民靠流血牺牲而換得完全的等价物之間的对立一样。照我們那时候的概念，在农民申訴地少而稅重的請願書中，所看出的对社会問題的兴趣，就相当于“社会”革命。人民由覺悟到自己最切身的痛苦而达到理解“工人社会主义”的任务，由沉痛地申訴自己生活的貧穷到社会主义革命似乎不是一条要走很長時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仍然要通过公社。公社在我們看来仿佛是屹立的岩石，所有經濟运动的浪潮在碰到它时都是会被粉碎的。

但是正如一个点不能确定一直綫在平面上的方位一样，我們全体社会主义者所一致加以理想化的土地公社，也不能决定他們的綱領的一致。所有的人都感觉，不論在公社本身，以及在公社社員的世界觀及习惯中是含有許多因素的，其中一部分是不成熟的、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理想，一部分直接和社会主义理想相矛盾。消除这些缺点的方法就成了我們各派別間爭执的焦点。

不过，即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个特点可以認為是我們一切革命

派别所共同的。

他们全体所有的这一共同特点，就是相信我国革命知识分子能对人民起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我们的革命计划中，知识分子扮演着对俄国人民施恩的上苍的角色，上苍的意志决定着历史的车轮向这一或那一方向转动。不管革命家中间的任何人怎样解释现代俄国人民的奴隶状况，不管他说这是由于人民的理解不够，或是由于他们缺乏团结精神和革命毅力，或是，最后，由于他们完全没有政治上的主动能力，但是每一个人都以为知识分子一出来帮助人民就会去掉他所指出的使人民陷于奴隶状况的原因。宣传员们深信，他们不费多大力量就会使得农民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暴动派要求立即在人民中间成立“战斗”组织，没有想想这种工作是会遇到某些严重障碍的。最后，《警钟》杂志的拥护者们以为，只要我们革命者一“夺取政权”，人民就立刻能学会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知识分子的这种自信心是最无私地把人民理想化，和“劳动者的解放必须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的信念（至少我们多数革命家是抱着这种信念）相并行的。大家认为，只要我们知识分子把人民看作是自己革命影响的对象，那末，上述信念的公式就算得到完全正确的应用。至于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的这一基本论点有另一种所谓哲学和历史的意义，说某一阶级的解放只是当这一阶级内部出现了争取自己解放的独立运动的时候方可成为它自己的事业，——关于这一切，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完全不去想，而另一部分人却有很奇怪的想法。例如，为了证明我们人民自己，即使没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也已经开始了解使自己获得真正解放的那些条件，有人就举出人民对于1861年的改革表示不满来作例子。为了证明人民独立进行革命运动的能力，人们通常引证我们的“农民战争”，引证拉辛的和普加乔夫的暴动。

我們的革命家很快地从痛苦的經驗里認識到，农民由抱怨土地太少而进到培养出一定的階級意識这一过程，是无限地遙远；由一百和二百年以前的暴动，还不能得出人民現在也准备起义的結論。七十年代我們的革命运动史，正是对于許多仿佛是最实际和沒有錯誤的“一些綱領”感觉失望的历史。

但是我們現在所感兴趣的是革命思想史，而非革命企图史。为了我們的目的，需要总结一下以前几十年作为遺產留給我們的所有社会和政治的見解。

在这种場合，且讓我們看看，七十年代几个主要派別中的每一派給我們留下了一些什么遺言。

對我們最富教益的，要算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理論。把后来俄国的全部历史一直到革命发生时为止都归结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的所謂宣传家們的綱領，是有太显明的唯心主义缺点的。他們向俄国社会主义者所建議的宣传，和他們有时向波兰、塞爾維亞、土耳其、波斯社会主义者——总之，向那些沒有可能組織工人为一个公开政党的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建議的宣传，沒有一点两样。我們在上面曾經引过赫尔岑的話，他把社会主义思想将来的发展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的命运相比較，这样比較成了他們辯护自己綱領論据的典型榜样。他們是抽象地和片面地了解这一个按本身說是足够冒险的比較，就是說，人們只需有自己的主觀邏輯，無須社会关系的客觀邏輯来支持，就能一下子領會已經形成的一些社会政治概念。他們在分析俄国的社会关系时所犯的錯誤很少，只是因为他們几乎沒有从事这种分析。

(五) 巴 枯 宁

巴枯宁的想法就不是这样。他認為，革命知識分子对人民所

以能起作用，只是由于有某些历史的条件存在，只是由于人民自己内部有或多或少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意图存在。所以他先把人民的理想和我們知識分子（自然是无政府主义派）的理想作一比較。

照他的意見，在俄国人民内部最广泛地存在着两个原素，我們可以把它們作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指出来。巴枯宁說：“他^①可以自夸的，是过分的贫穷和标准的奴隶地位（原来如此）。他的苦难是无穷无尽的，而他却忍受着，不过不是耐心地，却是以深刻而激烈的絕望情緒忍受着的，这种絕望情緒已經在历史上表現了两回，即两次可怕的爆发：斯捷潘·拉辛的暴动和普加乔夫的暴动，以及到現在还表现为接連不断的局部的农民暴动”^②。俄国人民之所以不能完成一次胜利的革命并不是由于“缺乏一种会使人了解人民革命的意义和給革命以确定目标的共同理想”。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如果这种理想在人民意識中，至少在它的主要特点上，沒有培养出来，那就应当放弃对俄国革命的任何希望，因为这样的理想是从人民生活的深处涌現出来的，必然是人民受历史考驗的結果，是他們的意图、痛苦、抗議、斗争的結果，同时也一定是象征的和人人易于明白的，永远是简单的东西，是他們的真正要求和希望的表现……假使人民沒有从自己内部培养出来这种理想，那末，誰也不能把它給予他們”。但是“无疑地”，这样的理想是存在于俄国农民的意識中的，“甚至不需要太深刻地研究我国人民历史的意識，即可确定这种理想的主要特点”。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的作者举出了俄国人民理想的六种特点：三种好的、三种坏的。且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这种分类吧，因

① 指俄国人民。——譯者

②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注A，第7頁。

为巴枯宁的世界观对于那些从来不是他的信徒甚至是他的反对者的我們許多社会主义者的見解，都是有它的影响的。

“第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全民的信念，認為土地，所有一切的土地都屬於人民所有，屬於那些用自己的血汗来灌溉它，并用自己的劳作来使它肥沃的人民所有。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特点，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屬於个人而屬於整个公社或村社，由它暂时分配給个人；第三个和前两个同样重要的特点，就是仿佛絕对的自治，公社的自治，因之公社对国家取坚决仇視的态度。”

“这就是成为俄国人民理想的基础的三个特点，就其本身的實質來說，它們完全相当于最近在拉丁国家的无产階級意識中所培养出来的理想，这些国家比起日耳曼国家来，現在距离社会革命是要近得多的。然而俄国人民的理想却为其他另外三个特点所掩盖，这些特点歪曲了它的性質和非常（注意）阻挠并延緩了它的实现……。这三个阴暗的特点是：（一）宗法思想；（二）个人为村社所吸收；（三）信仰沙皇……我們也可以加上对基督教，不論是对正教或对小教派的信仰，作为第四个特点……但是這個問題在我們俄国絕不象在西欧那样的重要。”^①

俄国革命家也应当对人民理想中的这些坏的特点“用所有的力量”来斗争，而这样的斗争“之更为可能，是因为它在人民自己内部已經存在”。

認為人民自身已經开始了反对自己理想中坏的“特点”的斗争的这个信念是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整个綱領中极可注意的“特点”，是他們所抓住的一根救命的草，想借以把他們从自己的前提所得的邏輯結論中和巴枯宁所做的人民理想的分析的结果中拯救出

^①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注A，第10頁。

来。“不能把个人、社会、人民里面不仅没有萌芽甚至连某种程度的发展也不存在的东西给予他们”，我们在上面已引过这样多次的“注 A”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人民自身没有发现自己理想中的“阴暗的特点”，如果他们对这些特点的不满没有达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既然是彻底的，就应当“放弃对俄国革命的任何希望”。所以俄国的“暴动主义”之父的所有辩证力量之应当向着这一方面发挥，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还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巴枯宁关于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各种可能性的问题距离正确的提法还不很远，而且他对于我们人民的性格与“理想”也是保持着相当严肃的批判态度的。而俄国社会活动家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批判的态度。令人感觉惊讶的是，连赫尔岑也缺乏关于俄国人民某种确定的和为大家所接受的评价。“有人只说沙皇万能，说政府的专制，说臣民的奴隶精神；反之，另一些人认定彼得堡的帝国主义不是人民的，受政府和地主双重专制压迫的人民，虽受到束缚，但决不妥协，人民不是渺不足道的而只是生不逢时，同时又说，这一压迫他们的庞大帝国的统一和有力量，正是人民自己所给予的。有人接着说，俄国人民是可鄙的一群醉汉和蠢才；另一些人相信，定居在俄国的，是能干而秉赋优厚的人种”^①。

以上我所引的这一段话从写出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然而直到现在，不仅赫尔岑所说的那些外国人，甚至俄国国内的一些社会活动家对于俄国人民性格和“理想”的估计，也抱着完全相反的观点。任何党派都想夸大人民对自己意图的同情，自然是不足怪的。但是无论在法国，在德国以及任何一个别的西方国家，都遇不

^① 《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103，伦敦，1858年版，第7—8页。

到象我們在俄國所感到的對農民的看法上的這種矛盾。這一矛盾立刻引起一些極有趣的誤會。方向最相反的人們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不同，往往只取決於他們對“人民理想”的理解不同。例如卡特柯夫先生和阿克薩柯夫先生會同意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話，說“政治綱領……必須照人民現在是什麼樣子就看待他成什麼樣子，只有這樣才能對他們的生活發生影響”。其次，那位《露斯》報的編輯也許承認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我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一文中相信，我國“一萬萬居民中”“只有八十萬工人為資本所聯合在一起”；《莫斯科時報》的編輯或者會認為這個估計太低，會指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統計的計算很不精確¹⁰⁴。可是他們兩位都會十分同意如下的意見：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所作的社會關係分析”的結果並不適用於俄國；談論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要性是可笑而糊塗的；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真正可悲的處境”是注定了的；而最後所謂“現在是什麼樣子”的人民，正應當是指我們的農民而言。不管我們這兩極端（方向不同）黨派的代言人的世界觀“包括着某種程度上”彼此相同的“觀點”、可是他們從自己的前提所得出來的結論竟是完全相反的。吉荷米洛夫先生關於人民寫道，我國人民“對沙皇專制失望之後”，就“只會走到人民專制”，“在革命的時候，如果問題是在於國家政權的基本原則方面，我們的人民在政治上是不會渙散的。同樣，在經濟方面，關於土地問題，亦即關於俄國現代生產的基本問題，他們也將是完全一致的”（原來如此），我們讀到這幾句話時是很高興的。當讀到下面一段時，我們的心里更充滿了愉快：“不論就精神的力量和社會自覺的顯明程度以及由此而生的歷史的穩定性來說，我們是不能把我們社會中的任何一個階層拿來和農民及工人階級相提並論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是沒有錯的，在現今政治關係混亂狀

态最后结束的时刻，虽然尽管是被称誉（被誰称誉？）的资产阶级，可是人民将能更加团结地行动起来。”¹⁰⁵

我們看見，人民“是要好的”，如象某个时候一位俄国作家¹⁰⁶曾經使法国人相信的一样，当我们充滿着喜悦，已經准备朗诵：“响罢，胜利的雷声；高兴罢，勇敢的俄罗斯人！”^①时，突然我们的眼帘映入了《露斯》报，我們又从天上跌到地下。原来，人民所“要的”是十分不体面的。他們崇拜沙皇、拥护体罰，一点也不想到任何的革命，只要得到了一封有关爱人民者^②先生們的“急电”，就可以馬上把这些先生們毀掉。引証现实，甚至引証历史，在这里，都和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一样，是不嫌少的。这是多么奇怪呀！且讓我們去請教一个以公正不偏著名的人民生活調查者，如象烏斯宾斯基先生吧，但我們的失望要更甚一些。我們知道，我們的人民是处在“土地的权力”¹⁰⁷之下的，这种权力使得他們很合邏輯地推論到专制制度的結論，甚至沒有作过渡到“人民专制”的暗示。这位烏斯宾斯基先生使我們相信，不仅在象阿克薩柯夫和吉荷米洛夫先生那样两个极端的人中間，而且即使在見解上大体一致的人們中間，对于人民的看法都是完全相反的。

象这一切語言的分歧和概念的混乱是怎样发生的呢？

巴枯宁对于“人民理想”不同方面所作的分类，对我們提供了一种很可靠的解释。原来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社会和政治的言論所依据的，是这一理想的某些优点（就是那些“就其本身的实質來說，完全相当于最近在几个拉丁国家无产阶级意識中所培养出来的理想”的特点），即：“全民的信念，認為土地，所有一切的土地都屬於人民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屬於个人而屬於整个公社或村社，由公

① 俄国詩人捷尔沙文在俄国人民战胜拿破仑以后所写的詩句。——譯者

② 指民粹派。——譯者

社或村社把土地暫時分配給個人。”雖說“我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一文的作者並不很喜欢那“和前兩個同樣重要的”第三個特點，即“對國家取堅決仇視的態度”，但這種仇視在巴枯寧式的分類中，只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所寄予許多希望的“公社的自治，彷彿是絕對的自治”的後果^①。關於人民理想的“陰暗的”各種特點（宗法思想，個人為村社所吸收，“人民的迷信自然是和人民的愚昧”、貧窮等等伴隨而來的），我們的作者或者是一點也不知道，或者一點也不願意告訴自己的讀者。阿克薩柯夫先生則恰恰相反。他的論據正是建立在最後這幾個“特點”上面，遺忘或者根本不提相反的特點。烏斯賓斯基的論文也不足使我們驚異。他把奧爾茂茲達和阿里曼¹⁰⁸，人民理想中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並列，以致走進了一個“土地的權力”的陰沉的狹巷，從那裏面，顯然，無論農民以及農民所背負的俄國（如象“三隻鯨魚背負着”的大地）都沒有了出路；他所形容的愛人民者，也是有的只看見了人民性格和人民理想的光明的特點，有的只看見“不幸的”特點，因此不能達到任何一致的意見。這一切是完全可理解的。我們不能不感謝已故的巴枯寧給了我們這把鑰匙，幫助我們了解無論是他自己的信徒們以及我們的大部分民粹派的片面性。

但是巴枯寧有個時候曾經研究過德國哲學，這不是徒勞的。他明白，他所提出的“人民理想的特點”的分類——不管我們只取其好的幾點也好，或取其坏的幾點也好，或最後，好的和“坏的特點”都取也好——都只解釋了問題的靜的一面。他明白，看待人民不應當單單看他們“現在是什麼樣子”，而還要看看在一定的歷史運動影響下，他們努力要變成和將變成什麼樣子。在這一場合，巴枯

^① “農民會自行組織自治，會接受村社土地所有制，并集體支配土地”，載《民意導報》，第2期，第225頁。

宁离黑格尔要比离吉荷米洛夫近得多，他不滿意于人民理想就是“現在的这种样子”的說法，而所关心的，是从这一理想的“各种特点”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来加以研究。我在上面說过，他在这一点上，离开問題的正确提法是不算太远的。假如他能适当地应用辯証法于解释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世界观，假如他能更好地領会了已为“馬克思所証明为正确，且为人类社会、各民族与各国家的全部过去及現在的历史所証实的真理：經濟的事实在过去和現在都先于……政治制度”，因此亦先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假使他及时地想起了“証明这一真理，正是馬克思先生的主要科学功績之一”^①，那末，我就大概可以用不着和吉荷米洛夫先生有什么爭論，因为那时候連“巴枯宁主义”的一点痕迹也不剩了。

但是，辯証法背叛了巴枯宁，或者更正确些說，他背叛了辯証法。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的作者在分析俄国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时，并没有从“經濟的事实”出发，沒有期待由人民經濟生活中的新的傾向来影响旧理想的改造，而是把人民理想中的“許多缺点”定出一个完全任意的等級，力求找出这些理想中“不幸的”“特点”的某种結合，使得其中一个可以为別一个所中和，或甚至完全消灭。这样就把他的全部論据变成一些完全任意的定义的游戏。本来是离真理不算太远的作者，突然又离开真理无限的远了，原因很简单，他只感觉到有辯証地评价人民世界观的必要，但是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去做这种评价。由此我們所看到的是詭辯，而不是所期望的辯証法。“巴枯宁主义”得救了，但是，闡明俄国革命知識分子任务的工作沒有前进一步。

^①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第 223—224 頁。

人民理想的各种缺点的等級是这样定的。“个人为村社所吸收和对沙皇的崇拜，本来是作为自然的結果而从……宗法思想中产生出来的”。公社本身竟“只是家、族的自然的扩大”^①，而沙皇則是“全俄罗斯的总族长、祖宗、慈父”。正“因为如此，他的权力是沒有界限的”。由此可以明白，宗法思想竟是“主要的、历史性的恶”，我們对它必須“用所有的力量来斗争”。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既沒有“意願，而且也决不乐意把从書本上讀到或自己想出来的任何社会制度的理想强加于我們的或別国的人民身上”，那末，他怎样对“历史性的恶”斗争呢？沒有別的办法，只有依靠人民理想的历史的发展。但是俄国人民理想的发展能否帮助他們去掉宗法思想这一阴暗的特点呢？无疑地能够，正是这样的方法：“反对宗法思想的战争現在几乎在每一村、每一家庭进行，而公社或村社現在变成仇恨人民的国家政权及专横官僚的工具竟达到这样程度，以致反对后二者的暴动，将变成反对公社和村社的专制制度的暴动。”^②作者对于反对公社的专制的斗争不能不动搖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原則竟无动于中，認為問題已最后地解决，說“剩下对沙皇的崇拜”的心理，可是人民的这种心理在“最近十年或十二年已經异常淡薄，他們已十分讨厌这种崇拜了”，甚至不是因为“宗法思想”已动搖，而是“由于寬宏大量的亚历山大二世英明的和爱人民的政策”。俄国人民在經過許多考驗之后，“开始懂得了他們的敌人沒有比沙皇更凶恶的”。

① 巴枯宁显然沒有猜想到公社在历史上是早于宗法制度，在連“宗法思想”的影子也沒有的各民族中即已存在。不过，这也是他和他同时代的許多人如罗伯图斯，甚至拉薩尔所同犯的一个錯誤，拉薩尔在其所著《既得权利体系》（第1卷，第217—223頁）中描述的所有制史的图式完全沒有提到原始公社。

（1905年版注）我重复地說，俄国农村公社和原始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初这还是沒有确定的。——格·普·

②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注A，第19頁。

知識分子只有拥护和加强人民思想中这一反沙皇的傾向。結論是，向那些知識分子建議，还有一个为前面所列举的人民理想的各特点中所沒有提到的“主要缺点”，要对之进行斗争。这一缺点“直到現在使俄国人民的总起义瘫痪和不可能，这就是公社的閉塞性，农民村社的孤立和分散”……假使注意到“农民村社的分散”是由于“每一公社都是一个閉塞的单位，因而任何一个公社都沒有，而且甚至不感觉^①有必要来与别的公社发生任何独立的有机联系”，由于“它們相互間只有經過沙皇慈父，才能和他的最高的、父亲般的政权联合起来”，那末，不得不承認，知識分子所負的任务是不輕的。“使全村、全乡、乃至尽可能使全省的优秀农民都互相联系起来，……而且在凡有可能的地方，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間也求实现一种有机的联系”，……做到“使每村、每乡和每省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認識所有其他各村、乡、省的同样的农民”……“使他們相信，人民內部有不可摧毀的力量存在，只有团結和同时行动起来才强大无比，……而直到現在它还没有团結起来”；“按照一个总的计划和全民解放的統一目标”，来联系和組織“諸村、諸乡、諸省”。总之，这需要給人民性格和人民理想加上几个新的、很好的“特点”，去掉几个根本缺点——这真是只有泰坦神族才能担当的事业！而为了担当这种伟大事业又必須抱如下的信念，即是說，“只有蠢才或不可救藥的教条主义者才設想可以把什么給人民，贈送給他什么物質的幸福，或新的智力或新的道德內容，或新的真理，随意地給他的生活以新方向，或者，如象……已故的查达也夫所說的，在人民身上，象在白紙上一样，爱写什么就写什么”^②……难道可以設想在“綱領”的理論前提和“綱領”所定的实际任务之間有比这更惊人的

① 重点是我加的。

② 《国家制度与无政府》，注 A，第 9 頁。

矛盾嗎？

凡是不願意和邏輯完全決裂的人，只有或者放棄這一綱領的實際部分，而保持它的基本前提，或者追求它所提出的實際任務，而為這些任務努力尋求新的理論根據。後來這種根據也真產生了。

(六) 特卡喬夫

除開內部含有腐朽因素的巴枯寧主義以外，還存在着另一思潮。它極端仇視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然而在估計現代俄國現實方面，——如我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小冊子中所說的——又和巴枯寧一致。同時，這一思潮得以避免《國家制度與無政府》作者的許多錯誤，可說是由於它的野心較小，自己的論據的邏輯的形式較低。

巴枯寧企圖在人民的世界觀發展過程中為自己所提出的行動方式找尋辯護理由，但是，由於他運用的標準不適當，於是不得不以自己思想上邏輯的跳躍來代替俄國社會生活的歷史發展。我們現在所要談的另一思潮的創始人，特卡喬夫，一點也不想對於我們的社會關係作辯證的分析。他直接從這些關係的靜態得出自己的綱領。他以為現代俄國生活的狀態，仿佛是有意為社會（按照他的術語說，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發明的。在他看來，談論進步、發展，簡直等於背叛人民事業。他的機關報《警鐘》的口號是：“要就是現在，要就是很慢，或者永遠不會！”他在自己的小冊子《革命宣傳在俄國的任務》中發表出同樣的思想，它也貫串在《給恩格斯的公開信》的每一行中。由於他不是走困難的辯證法的道路，所以他沒有那些巴枯寧的不正確的邏輯，而且它們是他在自己的《思想的無政府》一書中所辛辣嘲笑的。他能更堅定地把握自己的前提並由前提作出更合乎邏輯的結論，在這意義上說，他比巴枯寧更徹底些。

倒霉的地方，只是不仅他的这些前提而且他在得出这些前提时所根据的观点，都比巴枯宁的要差些，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前提只是简单化了的巴枯宁主义，这一巴枯宁主义一点也不肯尝试建立自己的俄国历史的哲学，而且认为这样的尝试就是背叛革命的立场。从特卡乔夫著作中摘引几段，即足以证实以上所说的话。

讓我們先引《給恩格斯的公开信》。

这封信的目的，是在“纠正”恩格斯的“无知”，向他证明：“实现社会革命在俄国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每一分钟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表示一致的革命抗议”^①。他证明这一论点的方法对于“贫乏的俄国思想”发展史是这样地特殊，这样地明显，对于了解与正确估价“民意党”的纲领是这样的重要，以致预料到了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所有论据，因此值得读者最严重地注意。

按照特卡乔夫的意见，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这是幼稚的梦想。俄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不容许这样做。他对恩格斯说¹⁰⁹：“也许您知道，象你们在西方，尤其在德国所具备的那些为革命服务的斗争手段，我们在俄国一样都不具备。我们没有城市的无产阶级，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代表会议，没有一件东西可使我们希望把无知识的劳动人民大众联合（在现代经济情况下）在一个组织、纪律都很好的工会中。”……“在我们这里，为工人出版书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能出版，也不会有益处，因为我们的人民多数是文盲”。由于警察决定对于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任何接近都施以迫害，要想由个人对人民发生影响也不可能。公开信的作者告诉恩格斯说，但是一切这些不利的条件“不应使您以为社会革命在俄国比在西方更成问题，更少把握。绝对不然！……固然

^① 《公开的信》(《Offener Brief》)，第10页。

我們沒有你們那里的某些机会，可是我們也可以指出許多你們所沒有的那些机会”。

是些什么机会呢？为什么我們可以期待革命，而且我們从革命必須期待着什么呢？

“我們沒有城市的无产階級，这自然不錯；但正因为如此，我們也完全沒有資產階級。在我們这里，在受苦难的人民和压迫他們的专制国家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等級；我們的工人只須和政治力量斗争，資本的力量在我国还在萌芽中”……

“我們的人民无知，这也是事实。但是他們的絕大多數都深信公社所有制的原則；他們，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在本能上、在傳統上都是共产主义者”……

“由此可以明了，不管怎样无知，我們的人民比西方国家的人民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虽然西方的人民比我們的人民有教养些。”

“我們的人民习惯于受奴役和服从，这也无庸爭辯。但是您不应当由此得出他們滿意自己的处境的結論。他們是在抗議，是不断地在抗議这种处境。不管这些抗議是以何种形式出現，究竟是以宗教的宗派分裂的形式呢，还是以抗稅的形式呢，或者以起义及对政府公开抵抗的形式，無論怎样，他們是在抗議，而且有时还很激烈”……

“固然这些抗議是狹隘的和零碎的。虽然如此，它們还是充分証明，人民对于他們的处境已經不能忍受，他們利用每一个机会发洩积蓄在他們胸中的憤懣和仇恨。所以俄国人民可称为本能的革命者，不管他們外表上是怎样愚蠢，不管他們对自己的权利怎样缺乏明了的意識”……

“我們知識分子的革命党，人数不多，这也是事实。但是他們

除了社会主义理想以外，不追求任何其他理想，而他們的敌人几乎比他們还更无力，敌人的无力是对他們有利的。我們的上层等級不是任何力量，不是經濟上的力量（在这方面說，他們太穷），也不是政治上的力量（他們太愚蠢，太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信賴警察的聰明）。我們的牧师沒有任何的重要性，……我們的国家只有从远处看才是力量。实际上它的力量是表面的、想象的。它在人民的經濟生活中沒有紮根。它不体现任何等級的利益。它对社会的各階級同等地压迫，而他們都同等地仇視它。他們容忍国家，漠不关心地忍受着它的野蛮专制。但是这种容忍，这种漠不关心……是产生于一个錯誤：社会人士关于俄国国家的力量替自己造了一种錯觉，而受这种錯觉的魔术式的影响。”但是要使錯觉消散并不很难。“两三次的軍事失败，許多省份的农民同时起义，和平时期元首所在地的公开起义，这一錯觉的影响就会立时消散，政府就会发觉自己孤立和被一切人所遗弃。”

“这样，我們在这方面比你們（一般地說是西方，尤其是德国）有更多的机会。在你們那里，国家絕不是虛构的力量。国家依靠着資本；它体现了一定的經濟利益。拥护它的不象我們这里只是軍隊和警察，資產階級关系的整个制度都使它巩固……在我們这里……則恰恰相反，我們的社會形式的存在系得力于国家，得力于，比方說罷，悬在空中的国家，这一国家和現存的社會制度毫不相干，是紮根在过去而不是在現在。”^①

这是特卡乔夫的社会—政治哲学。

假使排字工人因为馬虎而在以上所引的摘录下面錯排为引自“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那末，恐怕吉荷米洛夫先生

^① 《公开的信》，第4，5，6頁。

自己也很难发现这一錯誤：1884年4月問世的副本和十年以前出版的原本是多么相象。但是看吧，最初的发现又有何光荣呢！？吉荷米洛夫先生对于自己的老师連一个字也不提！《給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作者也認為不需要引証1873年即已出版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虽然在这本書里对于俄国社会关系作了同样的說明和同样的断定，說俄国农民在“本能上和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給特卡乔夫的复信中說，后者的論据是建立在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詞句”上，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巴枯宁主义对于通过直接的影响来消除人民理想的“不幸的特点”的可能性已失去了信仰和集中了注意于如下的幸运情势，即是我們的国家是“悬在空中”，“和現存的社会制度毫无共同之点”，而“实现社会革命沒有任何困难”，那末它将导致到什么呢？导致到什么是很明白的。“假使資本在我国还是在萌芽中”，而“工人只須和”沙皇的“政治力量”斗争，假如人民方面“总是在准备着”起义，如象普希金的奥涅金总是在准备着决斗一样，那末，革命斗争就仅仅是“政治”性的。此外，又因为我們沒有可能“把受压迫的无知劳动人民大众联合在組織、紀律都很好的团体中”；沒有可能出版工人的書报，甚至出版也无用，那末，結論是这一政治斗争絕不应当由工人来领导。关于这点，应当由那一个“人数不多的知識分子的革命党”来关怀，它的力量即在于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它的敌人的軟弱无力。但是这一因別人无力而自己才有力的少数，按照現在俄国的条件，和按照它和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間关系的实質來說，除了成立秘密的組織，进行 coup d'Etat(政变)的准备，期待有利于坚决打击的俄国的“軍事失敗”，“在几省的同时暴动”，或“元首所在地起义”等情况的到来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办法。換言之，对于“进步”已經失去信心的巴枯宁主义，最直接地引我們到用阴谋

来推翻现政府、夺取政权，准备靠这一政权和靠俄国农民“天生的、传统的”共产主义倾向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一切还没有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论文中成熟以前，我们在特卡乔夫的著作中早已看见过了。

但是，为了完全认识特卡乔夫的——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所有我们革命知识青年中勇敢、聪明、坚决的分子所属的派别的”——纲领，我们应当看《警钟》编者的其他著作，因为《公开的信》只是断言“（俄国）历史的现代时期最适宜于完成社会革命”，指出纲领的“一般特征”，有如“直接号召人民”¹¹⁰，建立坚强的革命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从《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才知道他那一独到的思想，说“暴力革命只有当少数人不愿等待多数人觉悟到自己的需要而决定（比方说罢）强迫多数人这样觉悟的时候才可以发生”。最后，在以“思想的无政府”¹¹¹为总题而出版的《特卡乔夫评论集》中，我们在反对《前进》杂志的和《告俄国社会革命青年》¹¹²小册子的纲领的那一章，已经公然遇到如下的抉择：“必须两中择一：或者知识分子必须在革命以后把政权夺在自己手里，或者他们必须抵抗革命，拖延革命，直到已不再有‘人民爆发’危险的美满时候，即是说：到人民会领悟世界思想的结果，获得他们所得不到的知识的时候。”由于知识被承认为“人民所得不到”的，所以特卡乔夫的同情向着哪一边是显然的。

组织阴谋以夺取政权，成为以前是日报、后来是杂志的《警钟》宣传的主要实际任务。与此平行进行的是对恐怖的宣传和推崇“所谓涅恰也夫式的阴谋”以代替宣传者们的诸小组。“我们革命者不愿继续坐视人民的苦难，不能继续容忍自己的可耻的奴隶境遇，我们不为形而上学的囁語所蒙蔽，深信俄国革命和任何别国的革命一样，不能没有絞架，不能不把宪兵們、檢察官們、部長們、商

人們、神甫們槍決，總之不能沒有‘暴力的革命’，對於我們唯物主義的革命者，整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奪取那現在是反對我們的政權的力量”。在1878年刊載出來的^①，即是在誰也沒有想到創立“民意黨”的時候刊載出來的這幾句話，足夠明顯地表明，應當在哪里找尋民意黨自身所擔任宣傳的那些實際的思想的來源。所以我們以為，當《警鐘》編輯部於1879年斷定“到民間去”的運動要“徹底失敗”時，按自己的立場說它是对的，它自豪地接着說：“我們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失敗的必不可免，我們是頭一個……要求青年們離開這一有害的反對革命的道路，重新回到直接的革命活動和戰鬥、集中的革命組織的傳統（即是涅恰也夫派的傳統）上來。而我們的聲音並不是沙漠中的呼聲。”……“把革命的力量戰鬥地組織起來，瓦解政府的權力和對它施行恐怖手段——這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綱領的基本要求。而在現在，這些要求終於在實踐中實現”。編輯部醉心於恐怖活動，甚至宣稱：“我們現在唯一的任務是實行恐怖和瓦解政府的權力”^②114。

（七）結 論

我們在下面將看出，以上我所作的摘錄對於“我們的意見分歧”問題有如何的意義。現在我們試從純粹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所敘述的幾個綱領，並且問問自己——它們關於俄國公社狀況、關於俄國人民自覺地為自己經濟解放而鬥爭的能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能使我們滿意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已經看見，無論巴枯寧和特卡喬夫關於俄國農民的共產

^① 參閱《警鐘》雜誌，1878年（第幾期和月份並未指出），《論革命的宣傳》一文，第50頁。113

^② 《警鐘》雜誌，1879年，第3, 4, 5期合刊，第2—3頁。

主义本能的话都讲得很多。引证这些本能是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出发点，是他们相信俄国有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的主要根据。但无论是“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的作者，或者《警鐘》的编者，大概一点也没有想想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深信公社土地所有制原则”，公社才存在，还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土地集体所有条件下，才“深信”这些“原则”（即是，习惯于公社）呢？假使他们更注意地看待这一个问题，看待这个对它的回答是无可怀疑的问题，那末他们得把他们论据的重心由谈论人民的“本能”和人民理想的方面转入研究人民经济的范围中。那时他们就得注意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以及原始民族一般的所有权的历史，注意狩猎、游牧及农业部落公社中个人主义的发生及其逐渐的发展，注意这一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个人主义新“原则”的社会—政治的影响。他们应用这种研究结果于俄国时，必须估计使公社瓦解的那些条件，从废除农奴制的时候起，这些条件的意义已经特别增加了。这种估计会逻辑地引他们到企图确定俄国现代农村公社经济中个人主义原则的力量及意义。再者，因为这一原则的意义——在敌视集体主义的条件的影响下——是不断增加的，那末他们就应当知道个人主义侵犯公社社员们的权利及侵犯他们的经济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速度。他们在当时既然尽可能精确地确定了这一速度，所以就应当进而研究他们认为不仅能阻止个人主义胜利、能恢复农村公社的原始形式、而且能给公社以新的、更高形式的那一力量的种种特性及发展。同时就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如我们已看见过的问题，即是说，这一力量是公社内部生活的产物，还是上层诸等级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在我们所假定的第二个场合，我们所关心的力量，对于公社说，就是纯粹外部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就应当先问自己，单靠外部的一些影响就够改造某一个阶级的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生活吗？解决了这问题后，就必

須立即注意另一問題，就是，应当在哪里运用这一力量，是在我們農民的生活条件的範圍內，还是在他們的思想習慣的範圍內？他們就应当在結論里證明俄國經濟生活中擁護社會主義的人的力量比個人主義的力量增加得更快。只有使得这一情勢至少是可能的，他們才能證明，據他們的意見，在俄國不會遇到“任何”困難的社會革命才是可能的。

在上面所舉的無論哪一個場合中，他們所應注意的不是我們社會關係的靜態而是其動態，“看待”人民不是看“他現在的情況”而是看他將變成什麼情況，所考察的不是俄國生活的不動的情景，而是其依照一定規律進行的過程。他們也必須應用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最抽象地研究公社問題時所用的辯證法。

不幸，不論巴枯寧或特卡喬夫，如我們已看見的，都不能從這一最重要的方面去考察社會革命在俄國的諸可能性問題。他們滿足於我們的人民“在本能上，在傳統上都是共產主義者”的信念，可是假如巴枯寧也適當地注意人民“傳統”及人民本能的弱點方面，假如特卡喬夫也看見了要消除這類弱點不是靠邏輯的理由而是靠制度的改變，那末，這兩個作家中的無論那一個終究沒有把分析工作進行到底。他們對我們的知識分子提出號召時，單期待着知識分子的活動會產生社會的奇蹟，而且以為他們的忠誠將代替人民的主動性，他們的革命毅力將佔據俄國社會生活中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在趨勢。我們農民的國民經濟、生活方式和思想習慣被他們看得正象一幅靜止的情景，一個完備的整體，一直到社會革命發生的時候改變都是不大的。在那些當然不會拒絕承認與他們同時的人民生活是歷史發展的結果的作家們的表象中，歷史仿佛“停止了自己的進行”。從《國家制度與無政府》或《給恩格斯的公開信》出版的時候起，一直到“革命以後第一日”或“第二日”，依照他們的意

見，乡村公社应当停留在自己現在的形态中，由这一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好象是不怎么远的。全部問題在于我們要赶快干起来，走应当走的路。“我們不許有任何的展期，任何的延誤……我們不能而且不願等待……讓每个人快些收拾自己的什物，赶快上路罢！”《警鐘》的編者这样写。虽然关于这条道路的方向問題在巴枯宁和特卡乔夫中間有根本的意見分歧，但是，无论怎样，他們中間每个人都相信，假如青年走他所指示的路，那末，还能看得見公社是在适当巩固的状态中。虽然“每一天都給我們带来一些新的敌人，創造一些敌視我們的新的社会形式”，但是这些新形式并不改变俄国社会生活中諸因素的相互关系。資产階級仍然不存在，国家仍然“悬在空中”。我們要是把《警鐘》敲响些，要是更毅然决然地担任革命工作，还来得及挽救俄国人民的“共产主义本能”，而且依靠着他們对“公社土地所有制原則”的留恋，将能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特卡乔夫是这样地主张，《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的作者也是这样或几乎这样地主张。

我們的青年讀了这两位作者的著作，而且在分成几个派別之后，真是忙着工作。初看起来有点奇怪，在已經受过車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教育和单就这点說应能养成更严密的思維习惯的知識分子中間，何以特卡乔夫的或巴枯宁的綱領还能找到信徒。但是問題——在實質上說来——很簡單，而且一部分可以由車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影响来解释。

黑格尔在自己的哲学中給有关方法的問題以这样重要的地位，不是徒然的，而西欧的那些很得意地“自認为黑格尔和康德的嫡系”的社会主义者对于研究社会現象的方法比由方法所得的結果重視得多，也不是徒然的^①。結果里面如有錯誤，在进一步应用正确的方法的时候一定会被發現和被糾正，至于錯誤的方法則相反，

只是在罕有的个别场合可以得到与某一个个别真理不相矛盾的结果。但是严肃地对待方法论上的问题只有在受过严肃哲学教育的社会才可能。俄国的社会从来不能自夸为受过这样的教育。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树立了对于自然科学的崇拜的我们的“有思想的现实派”¹¹⁵，开始残酷地排挤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时候，我们即痛感哲学发展的不够。在这种反哲学的宣传影响之下，卓尔尼雪夫斯基的信徒们没有学会他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而只集中自己的注意于他的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由于这些研究，就产生了我们的公社能直接过渡到更高的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形式的信念。这一信念因为它的抽象性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凡忠于卓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其文字的学生们，自然应当不延迟地，如我在上面所说，由代数转到算术，由一般的抽象的谈论某些社会形式到另一些社会形式的可能的转变，进到特别地详细研究现代俄国公社的状态及它将来的可能命运的具体问题。所谓“俄国的”社会主义这样就会被安放在完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幸我们的革命青年甚至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导师还有一种特殊的思维方法。他们颇满意于他的研究的结果，于是把凡是拥护公社土地所有制原则的作家都看作是他的同志，虽然《对哲学偏见的批判》的作者本人绝不会和如象夏波夫^②这样的人一致，而我们的青年则把夏波夫的历史著作看成只是拥护自己导师的意见的新例证和新论据。他们更不会严格地批判新的革命学说。他们把特卡乔夫、巴枯宁看成和卓尔尼雪夫斯基完全是一流的人。黑格尔的学生们把他的哲

① 恩格斯说：“我们远不需要一些单纯的结果，因为在研究中，我们已经从黑格尔的时候起就知道，没有导向那些结果的发展，结果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在它们上面就停止研究，如果它们不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它们比无用还更坏。”

② 参阅阿里斯托夫：《夏波夫的生平及其著作》，圣彼得堡，第89—92页。

学体系彻底破坏，却严格保持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所传给他们的方
法。他们保持的是他的学说的精神而非其文字。車尔尼雪夫斯基
的信徒们甚至不敢想批判地对待自己的导师的意见。他们严格保
持他的文章的每一个字，而对他的文章的精神则一点也不理解。
因此，他们甚至不会纯粹保持車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结果，这些结
果和斯拉夫派的倾向一混合，就組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論混合物，从
它里面后来就产生了我們的民粹派。

由此，以前的社会主义文献遺留給我們一些应用辯証法解决
俄国社会生活最重要問題（后来連模倣者也沒有）的嘗試，还留給
我們几个社会主义的綱領，其中的一派建議作社会主义的宣传，認
为俄国农民和西欧无产階級一样地能接受它；另一派主张組織全
民暴动；第三派認为宣传和組織都不可能，却指出革命党夺取政权
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

从理論上提出革命問題，从車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不仅沒有向
前进步，而且在許多方面有倒退的趨勢，退到赫尔岑的半斯拉夫派
的观点。七十年代初的俄国革命知識分子，沒有增加任何一个重
大的論据来支持对赫尔岑已提出过的問題：“俄国必須通过欧洲发
展的所有阶段嗎？”的否定回答。

第一章 一些历史資料

(一)俄国的布朗基主义

从七十年代的那几个最重要的綱領出現的时候起，到現在已經过去十年了。十年来的努力、斗争和有时候是痛苦的失望，对我们青年們表明了：在现代俄国的条件下，在农民中組織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巴枯宁主义和民粹主义，作为革命的学說是已經过时了，它們現在只能在保守的民主主义文人陣营中受到欢迎。它們的前途不外是：要就完全喪失自己的特点，而与新的、更有益的革命思潮合流；要就凝結在自己的旧形式中，而成为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势力的支柱。我們的旧式宣传家現在也早已离开了舞台。但是特卡乔夫的理论則不然。虽然整整十年的期間，“每一天都給我們带来了一些新的敌人，制造了一些敌視我們的新的社会因素”，虽然社会革命在这时候“遇到了”几个并非不重要的“阻碍”，然而俄国的布朗基主义現在还是特別有力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依然相信“現代的历史时期是特別有利于进行社会革命”，它依然責备所有那些“思想不同的人”为稳健和守秩序，同时以新的說法重复自己的旧調：“要就是現在，要就会很慢，或者永远不会！我們沒有等待的权利，讓每个人收拾自己的什物和赶快开步走路罢”等等。凡是想对現時存在于俄国革命者中間的“意見分歧”发表意見的人，就必須批評这一变坚强的了的和(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变年青了的特卡乔夫主义。在研究“俄国資本主义命运”的問題时，就必須更加注意特卡乔夫主义。

我已經一再說过，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只是特卡乔夫的社会—政治見解的新的、补充的翻版，同时在許多方面比头一版还更坏些。假使我对于俄国布朗基主义特点的認識沒有錯誤，那末“民意党”的文字工作只是以各种說法重复了特卡乔夫的学說。差別只在于特卡乔夫的“我們所处的时机”是指的七十年代之初，而“民意党”的政論家“所处的时机”却是七十年代之末和八十年代之初罢了。俄国的布朗基主义由于完全缺乏德国人所称的“历史感”，所以把特别有利于社会革命的“时机”的概念，很随便地由一个十年展延到另一个十年，而且將繼續地展延下去。布朗基主义在八十年代既被証明了是假的先知，而經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却以值得有更好的遭遇的頑强性重作自己的預言，一直到工人階級終于理解了自己的社会解放的条件，并以禁不住的哈哈大笑来迎接它的說教的时候为止。除了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外，每一个历史的时机对于布朗基主义的宣传都是有利的。

但是現在是更精确地确定我所用的术语的时候了。一般的布朗基主义是什么呢？俄国的布朗基主义又是什么呢？

我們已經說过，拉甫罗夫希望“‘劳动解放’社的‘多数社員’，說不定今明天就会加入民意党的队伍”。他硬說：“普列汉諾夫先生本人在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信念中已經有了相当大的演进，使得我們有理由希望他朝这同一方向繼續前进。”¹¹⁶如果民意党是站在布朗基主义的观点上（这是就“民意党”的文学作品上可以这样判断的），那末，結果是我的“演进”也是“朝这同一方向”的。于是我現時所宣揚的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滌罪所，我的社会主义灵魂必須通过它来在布朗基主义的怀抱中获得最后的安息。是这样的嗎？这种“演进”将是进步的嗎？从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又将

怎样来看这个问题呢？

恩格斯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说¹¹⁷：“布朗基首先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在感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情人民的痛苦，但没有自己的特殊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提出任何确定的改造社会的办法。他在政治活动方面主要是所谓‘行动家’，深信为数不多而组织得好的人，既选定了适当的时机和进行革命的发动，就可以靠一两个胜利而把人民群众带动起来，这样就能完成一个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普统治时期，他自然只能把这一核心组织成为秘密团体，那时就发生进行阴谋常有的情形。参加阴谋的人们为永远地保持沉着，和常听到快要起事的不兑现的诺言而疲惫，最后就失去了一切耐心，不再服从，这时候就不外两者之一：要就是让阴谋流产，要就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理由时也开始革命的发动。他们也真作了这样的发动（1839年5月12日），而它在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不过，这还是布朗基的唯一的没有被警察发觉的一次阴谋。”

“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设想为人数很少的革命者的 Hand-streich（爆发），于是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就是自然的；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阶级的专政，而是完成了爆发的少数人的专政，而且他们在政变以前就已经服从了一个或几个优秀分子的专政。”

恩格斯继续写道：“读者会看出，布朗基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的这类关于革命事变进程的一些观念，对于德国工人政党说来是已经太陈旧了，连在法国也只得到最不成熟的或耐心最小的工人人们的同情。”

由此我们看出，最新的、科学派的社会主义者把布朗基主义看作已经陈旧的了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布朗基主义，自然不是不可能，——世界上有什么事不可能呢？——但是恐怕没有一个

馬克思主义者会承認自己的同志中，有誰这样做就是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信念”的进步罢。只有从布朗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演进”可以承認是有进步性的。而假如《民意导报》的可敬的編輯不肯根本改变自己对馬克思学派社会主义的一些見解，那末他关于“劳动解放”社的預言，一定使得每个公正讀者完全莫名其妙。

此外，从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話，我們可以看出特卡乔夫对“暴力革命”的理解是把它当作少数人“强加于”多数人的一种东西，这种理解正可称为道地的布朗基主义，如果《警鐘》的編輯^①不想証明在俄国人民的多数“在本能上、在傳統上”都是共产主义的，已經不需要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他們。

这样看来，俄国的这一变种的布朗基主义的特点，只是从巴枯宁那里剽窃来的对俄国农民的理想化。現在我們再来談談吉荷米洛夫先生的一些見解，看看它們是合于这一定义，还是屬於“俄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

（二）吉荷米洛夫

我断定，在这些見解中除了一些历史的、邏輯的和統計的錯誤以外，絕對沒有新的东西。

但这些錯誤只对于吉荷米洛夫先生世界觀說来，是新的、独特的、显明的东西。無論一般的布朗基主义或俄国特別的布朗基主义，的确对于这些錯誤的发生及其特殊的“演进”都沒有起过任何的作用。

这些錯誤的出現純粹是由于消极性質的原因，即是知識的缺乏，一般地說，在我們知識分子的社会—政治概念形成过程中，知識的缺乏是显而易見的，而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中則已經达

^① 指特卡乔夫。——譯者

到過分的程度。

讀者如果肯費工夫同我們在一起來解开我們作者的“獨特性”論中纏成一團的和在許多地方中斷了的綫，將不難証實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讓我們從俄國的和西方的革命思想史開始罷。

吉荷米洛夫先生說：“還在不多幾年以前，社會主義者從他們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導師們所作的社會關係的分析出發，承認了政治的活動毋寧說是有害於人民群眾本身的利益的，因為他們斷定憲法在我國也和現在在歐洲一樣，將是資產階級組織的工具。根據這樣的想法，在我們社會主義者中間甚至可以遇到這樣的意見，說，在兩害中間，專制的沙皇對於人民究竟比立憲的沙皇要好些。另一派別，即所謂自由主義的派別，其性質則恰恰相反”云云^①。

俄國社會主義者“從他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導師們所作的……分析出發，承認了政治活動毋寧說是有害的……”。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說的是哪種“分析”呢？他所指的是哪些導師？他“是描畫的誰的象，在哪里聽到的這些談話”呢？大家知道，西歐的社會主義思想，“從……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所作的……分析出發”，過去和直到現在，只有“兩種對於政治活動問題的態度”。蒲魯東的信徒們宣傳不問政治，勸人遵守這一主張，一直“到革命以後的第一天”。在他們看來，“政治革命是目的，經濟革命是手段”。所以他們要求從經濟變革開始，認為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政治活動“是會有害於人民群眾本身的利益的”，而且憲法只是“資產階級組織的工具”。另一派別的“性質則恰恰相反”。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¹¹⁸已概略地擬定了工人階級

^① 《民意導報》，第2期，第231頁。

的政治任务。1847年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中写道：“不要說社会运动排除着政治运动。没有一个政治运动不同时就是一个社会运动。只有在一个既无阶级更无阶级对立的秩序里面，社会进化将不再变成政治革命。”^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又回到这問題上，証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且最辛辣地嘲笑“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們正和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意見一样，認為宪法“在欧洲”只“是资产阶级組織的工具”。照《宣言》作者們的意見，社会主义如果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就“失去了它那种迂腐的天真”，而成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势力的工具。这同一的思想，后来也在《宣言》的作者們本人的以及他們的信徒的其他著作中重复了許多次。可以說，每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每一个报纸，几乎每一期都在这样或那样地重申这一思想。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者曾尽了一切力量闡明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并指明蒲魯东主义者的《綱領》的无根据性。

而在这样的光輝的写作活动以后，在这种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活动以后，我們竟听到說，俄国社会主义者否認政治斗争的合理性，只是因为“从他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导师們所作的分析出发”！現在难道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含的分析以外，还可以認真地說有不論別一种对于西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嗎？这样的說法，只有在一本論述馬克思的前輩們的錯誤和片面性的历史著作里，还可以說是适当的。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或者完全不熟习馬克思主义的文献，或者是同伊万紐可夫先生那样来理解这些文献，然而伊万紐可夫的“破产”是《民意导报》第1期已宣告和部分地証明了的¹¹⁹。俄国社会主义者說政治活

^① 《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第177—178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52頁）。

动有害，不是因为他们一般地从“西欧”的“社会的关系分析出发”，而是因为他们从蒲魯东的錯誤的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出发。但是难道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都是蒲魯东主义者嗎？难道所有他们都拥护这一个說起来是蒲魯东主义的改革者的巴枯宁的学說嗎？誰不知道，絕不是所有的人！特卡乔夫和所有西欧的布朗基主义者都一样，都絕不是从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作的分析”出发，而是从法国雅各宾主义的傳統出发，他们都最严厉地抨击了“不問政治”的原則。难道特卡乔夫不正是“还在不多几年以前”写文章嗎？难道他的意見不应当載入俄国的革命思想史中嗎？吉荷米洛夫先生对这一問題作肯定的回答时，就是走了很危險的一步：如果人們看出他的哲学竟是特卡乔夫哲学的新版又作何感想呢？須知每一个讀者都是很容易加以比較的。

但是“还在不多几年以前”，在俄国革命运动中难道只有巴枯宁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嗎？难道沒有别的派別嗎？难道沒有过作家知道宪法“在欧洲”……不仅“是”资产阶级的“組織的工具”，而且也是另一阶级的“組織的工具”嗎？而这另一阶级的利益正是不叛变自己旗帜的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忽視的。我看，是有过这样的作家的，并且正是在特卡乔夫的反对者的陣营中，他們反对特卡乔夫是因为特卡乔夫虽然反对政治活动“是会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的思想，却要求或全有或全无，要就是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要就是俄国的政治停滞。当特卡乔夫本此理由想以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宪法的魔影来吓唬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时候，以下就是一位俄国有名的作家，在告我們的《社会革命青年》的小册子中所作的回答：“有人对你們說，俄国要就現在必須革命，要就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他向你們描画我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情景，并对你們說：随着资产阶级的發展，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革命将是不可

能的。这位作家如果以为你们会接受他的论据，那就是很看不起你们的思想的灵活性了”……“如果真的在俄国建立了和外国相似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俄国就不可能呢？难道不正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唤起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吗？难道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不都是在响亮地发出迎接逼近的社会革命的号召吗？难道资产阶级没有意识到那种从工人方面来，而且愈益逼近地威胁它的危险吗？……我们的青年还没有和世界如此地隔绝，以致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形，而那些想使青年们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我国将不可动摇的人们，在对他们描绘出一幅虚幻的欧洲情景的时候，过分地估计青年们缺乏知识”。

很明显的，写这一段文章的作者绝不会象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说的，认为宪法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组织的工具”，如它在“现在的欧洲一样”，这位作者对，或者不对，让吉荷米洛夫先生自己喜欢怎样判断就怎样判断吧，但如果说到我们知识分子“对待”政治活动问题的态度的“典型”时，我们就不能不提这个作者。假使我们所引的这个作者——吉荷米洛夫先生现在的编辑同事，拉甫罗夫^①——的话也没有承认政治斗争在俄国的合理性，那末，决不是因为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关系”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分析“出发”。吉荷米洛夫先生方面这样对自己可敬的同事的文章的不注意，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不过，我们应当公正一些，努力找出一些可以减轻吉荷米洛夫先生过失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的不注意呢？何以他把不久以前俄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列入巴枯宁主义者的名单，而对拉甫罗夫的文章却一字不提，在偷运《警鐘》杂志进俄国的私运者的“鞋子

^① 参阅他的小册子《告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20，第22—24页。

還沒有跑破”的現在，就已經忘記了特卡喬夫呢？這原因很簡單。懷疑派硬說：“在月光下什麼東西都不是新的”。假使不能承認這思想是無條件地正確，那末，在“俄國社會主義”的許多綱領里“什麼東西都不是新的”這句話却是絕對正確的。然而這些綱領的擁護者总是很愉快地宣稱，他們的那一派別正是某種某種“意識”的第一次“公開表現”。為使自己得到類此的安慰，就只有忘記一些俄國革命運動史中的事情，同时又自己添上一些事情。那時候將很明了，在這一綱領還未出世的時候，“我們知識分子的思想”是某種迷途的羔羊；但是從這一綱領的作者說出自己的“要有光”^①的話的時候起，就開始了“紅日的莊嚴上升”，如黑格爾關於法國革命的時期所說的¹²¹。適當的觀點已被發現；迷惘已經消散，真理已經出現。如果一些樂於自欺而不重視“無數苦的真理”的人，竟為這樣的前景所誘惑，在忘記了自己的前輩和同輩的人們的時候，把一些往往不僅不是自己的黨所發現、而且甚至沒有為它所正確理解的鬥爭方法，說成是自己的“黨”所發現的，這難道有什麼可奇怪嗎？

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迷戀的正是這老一套的歷史研究方法。他想表明，雖然“俄國革命知識分子的大部分”，違反著名的“分析”，“不能棄絕反政治壓迫的鬥爭”，但是這一切“只是不由己地和自流地在進行。只是在民意派（我們的作者對第一個字母特用大寫以表感謝）出現以後，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真正平等的觀念才在黨綱中得到明白的和廣泛的承認”^②。吉荷米洛夫先生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於是將只為巴枯寧主義者所贊同的觀點強加到所有的俄國社會主義者頭上。因為這些巴枯寧主義者認為政治活動“毋寧

① “上帝說‘要有光’（Да будет свет）就有了光（и стал свет）”，見舊約《創世記》。——譯者

② 《民意導報》，第2期，第232頁。

說是有害”，而民意党人承認了政治活动毋宁說是有益的，那末很明显的，初次发見政治活动为有益的光荣是屬於“民意党”的了。提起特卡乔夫是不方便的，因为那时将会显出他所鼓吹的，正是这种仿佛“只是在民意派出現以后”，“在党綱中才得到明白的和广泛的承認”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平等”。提到他的編輯同事的著作，吉荷米洛夫先生也觉得不“合时宜”，因为为了批評和評价这些著作，他就只有站在一个他所完全不习惯的观点上，他直到現在仍設想着除了蒲魯东和蒲魯东主义者、巴枯宁和巴枯宁主义者“所作的”分析以外，就沒有別的对西欧的“社会諸关系的分析”了。

吉荷米洛夫先生“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来頌揚自己的党，甚至于抓着了事实上有点不可能的东西。例如，他硬說“过去‘平分土地’社的創办人”某个时候也是一些“宪法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但如果他在历史探討中所寻求的是真理，而不是“党派政治”的利益，他就不会忘記在《平分土地》的第1期，在《給以前的同志們的信》¹²²中所发表的对宪法的观点，是和他所想象的該杂志的“过去創办人”的观点絕不相合的。这封信的作者說：“同志們，請不要以为我是根本反对宪法，反对政治自由。我太尊重人的个性，所以不会反对政治自由……說政治自由的观念是人民所不懂得、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不是理由。它为人民所必需，正和为知識分子所必需一样。差别在于这种需要在人民那里是和其他更迫切的和基本的經濟性質的需要結合在一起。如果每一个社会革命的党願意政治自由有完全的保障，免于为敌視自由的分子所曲解和篡夺，那末这些需要，就应当被認為是合理的。”

在这几句话里，說法上有些不精確，概念的定义上有些不正确。但是从它們里面得出結論，說“‘平分土地’社的創办人”是“宪法的反对者”，而且还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的，只能是要就完全丢

掉邏輯，要就為了自己“黨派”的利益故意抹煞事實的人，或者：最後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實，即是完全不知道俄國革命思想的历史，而“以一個淵博的專家的樣子”來論述這历史的人。

但是《平分土地》社的創辦人或者後來改變了自己對憲法的觀點嗎！且讓我們來看看。這些“創辦人”編輯的機關報只出了兩期。我們已知道第1期中關於政治自由的那些見解，第2期里又怎樣說呢？

在這一期的社論里我們讀到：“我們否定對人的任何從屬，自然，不會為俄國專制制度的傾覆而悲哀；我們和現存制度作鬥爭費了多麼大的氣力，忍受了多麼慘重的損失，自然不會願意它的延續。我們知道政治自由的代價，並且只會惋惜俄國憲法沒有給予政治自由以足夠廣泛的地位。我們歡迎任何為人權而進行的鬥爭，這種鬥爭進行得愈有力，我們就對它愈同情……但是除掉政治自由一定會帶來的許多利益之外，除掉爭取它的任務之外，還有其他的利益和任務；而在社會關係極緊張，因此也是必須準備應付一切的現時來忘記它們，便是不可能的。”¹²³

“憲法的最激烈的反對者”會說這樣的話嗎？

在“平分土地”社的綱領里自然有極重大的錯誤。在它里面的錯誤並不比“民意黨”綱領中的少些。但是只有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而決不是從《民意》政論家的觀點，才能有效地批判這些錯誤。這些政論家和“‘平分土地’社的創辦人”曾經有的缺點一樣：即是不会批判地看待我們人民生活的社會—政治諸形式。不過容忍把這些形式理想化和在這一理想化的基礎上定出自己的實際計劃的人們，那在推論到《平分土地》社的綱領時，要比簽名在“民意黨”的綱領之下會顯出更大的徹底性。

且讓吉荷米洛夫先生試作相反的證明，證明民意黨的綱領更

彻底吧。

不过，恐怕他没有时间这样做。他需要先表明：他的革命世界观和特卡乔夫的世界观有什么不同，《我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的社会—政治哲学和《给恩格斯的公开信》的社会—政治哲学有什么不同。当他还没有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时候，他关于“民意党”的历史意义的那些议论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读者可以承认“民意党”人的行动英勇，而他们的理论则很糟糕，并且主要的，是这些理论完全不是新的；换言之，他可以說恐怖分子的民意党人是英雄，但是民意党的作家则是……不胜任自己任务的人。即使有人引証这一事实，說“社会主义者在民意主义中算是第一次发展成了一个党，而且或者是国内最有势力的一个党”。这样的引証也不能动摇这个結論。即使这些话没有丝毫夸张，那末从它们也只可做这样的結論，即是說常有这样的時候，一些强有力的政党不管理論上如何錯誤和不成熟，也能“发展”到在国内占优势的地位。但仅此而已。只有那些完全不熟习历史的人，才能从这个或那个政党的影响推論到它的理論的无誤性。“民意主义”甚至在他的思想远远落在它自己所“干”的“事情进程”之后这一方面，也不是新奇的。不懂自己活动的历史意义的政党难道还少嗎，与“党的”行动意义完全不符合的假設难道还少嗎？从独立教派¹²⁴也暂时“发展成了一个党的意义，……或者是国内最有势力的一个党”，我們还不能得出結論說，它的宗教学說比其他政党的学說含有更多的常識和邏輯。何况独立教派已成功地“夺取政权”，而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現在还只是約許着这样做呢。

当我們的作者还在搜集材料，以便更加实在地頌揚“民意主义”的政治哲学的时候，我們將有足够的时间来仔細研究《我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和全面地确定吉荷米洛夫先生的世界

觀¹²⁵。

我們已經知道：他對於現代一般的社會主義史，特別是“俄國社會主義”史，或者是自己知道得不够清楚，或者是不讓自己的讀者知道清楚。現在我們轉到他關於一般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歷史的一些議論罷。

他在這些富有教益的議論中牽涉到如下的意外理由：

他說：“政治鬥爭已經成了俄國生活中的不容分辯的結論，以致誰也不敢否認它。但是某一部分的社會主義者雖不敢否認這一結論，同樣也不能把這結論和已經習慣了的一些理論的觀點聯繫起來，而在尋求這種聯繫的一些企圖中得出一些人造的體系，來完全曲解‘民意黨’所從事的政治鬥爭的意義。”

這“某一部分社會主義者”是指哪些人，他們“已經習慣了”的觀點又是些什麼樣的觀點呢？在吉荷米洛夫先生論文頭幾頁里，我們已讀到：“還在不多幾年以前，社會主義者……承認了政治活動毋寧是有害於人民群眾本身的利益”。我們那時以為，按照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意見，所有俄國的社會主義者“還在不多幾年以前”都是巴枯寧主義者，因為他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其他的派別。我們也知道了，“民意主義”看出了俄國社會主義者的錯誤，和幫助了他們“了解俄國歷史發展的性質”。現在，原來俄國社會主義者的“某一部分”不能含棄自己“已經習慣了的觀點”，得出了“完全曲解”民意黨活動意義的結論。顯然地，吉荷米洛夫先生是指的還沒有“了解俄國發展的性質”的俄國巴枯寧主義者罷！邏輯上應當這樣說，但是我們的作者完全不這樣說。

“他們（即是屬於已說過的‘某一部分’的社會主義者）從俄國好象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方能領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思想出發，竭力誘導俄國革命者走純粹政治鬥爭的道路，仅仅

爭取宪法，把任何和政治变革同时应该达到或多或少程度的經濟变革的思想，当作不可能的幻想而加以抛弃。”

“怎样的一個大轉弯啊，多亏上帝帮忙！”我們不禁要用謝德林的話來慨嘆了；可惜情感的发作不能解决苦恼我們的“这些討厭的問題”。試問，如果“还在不多几年以前”所有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否認政治斗争的合理性，这某一部分俄国社会主义者是从哪里出来，——而更奇怪的——他們是从哪里得到自己“已經习惯了的观点”呢？不重視这一斗争的人們怎样能够“从俄国……必然要經過資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出发”呢？这一思想可能是正确的，可能是錯誤的，但無論怎样，它是新的思想，絕對不屬於任何“一部分俄国社会主义者”“已經习惯了”的理論观点，这是一般的关于俄国資本主义問題的历史以及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的历史的引証所向我們証实的。而假使这一思想是新的，那末它大概是根据某些新的、为“还在不多几年以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所不知道，或者不同情的“理論观点”罢。而假如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发生了新的趋势，那就应当說出它的名字，确定它的意义并指出它的起源，而不是以某些在这里什么也不能解释的“已經习惯了”的理論观点”的半暗示來支吾搪塞。

不过，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吉荷米洛夫先生不喜欢“公开的打击”，一点不象斯維亞托斯拉夫于要进攻自己的某一个敌人的时候，先对他說：“向你攻击”。吉荷米洛夫先生沒有預先宣战，就“攻击”自己的敌人。这自然是他的风格，而关于各种风格，如所周知，是不爭論的。

我們虽然了解不透我們的作者“为何这样”动作，但是必須运用“自己的聪明”來达到對我們非常有兴趣的、关于俄国社会主义中新思潮的問題的解答。我們自己放弃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許多

旧的、“已經習慣了的理論觀點”，誰知道，或許我們也和吉荷米洛夫先生所研究的革新的分子的意見相合吧。固然，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描画中，他們是丑惡的，但是“世人不知受過多少次的勸告”，應當也听听反方面的意見呀！

(三)“劳动解放”社

依照“這一派社會主義者”的意見，經濟變革的意圖“只是有害的，因為它是以‘紅色魔影’來吓唬自由主義者，並使我們在為憲法而鬥爭的時候，得不到他們的幫助”。

關於“紅色魔影”的話聽起來有點熟，好象在哪一篇論文或哪一小冊子中見過的！啊！原來我在自己的《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小冊子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在那里說：民意黨人以紅色魔影吓唬我們的社會人士。

如果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說的一切不過是一個譬喻，在這里面所謂“某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就是指的“劳动解放”社，而所謂“已經習慣了的理論觀點”就是指的該社社員的觀點，又怎樣呢？但是不會罷，這未免太滑稽了。

實際上，難道“劳动解放”社什麼時候放棄過“任何想和政治變革同時，還要達到或多或少程度的經濟變革的思想”嗎？這簡直是胡說！我們只是不相信那一特別的理論，認為某一階級的事業可以靠一個小團體“或多或少程度”地完成。我們只是說，假使律師可以在法庭上代表自己的當事人，那末，任何委員會——不管它是執行委員會也好，還是管理委員會也好，或其他名稱的委員會也好——不能在歷史中代表工人階級；這一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它自己的事業，而且它為了完成這一事業，需要受政治教育，需要理解 and 掌握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以為工人階級經濟解放的可能性

与这种教育和掌握的过程的速度及强度成正比例地增长着。我們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如果打算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經濟变革，便是幼稚，然而他們在培养工人来实现“工人等級的总理想”¹²⁶时，便是对他們帮了不可估价的大忙。“劳动解放”社已經在它的第一个文献中，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明白地說过，我們的知識分子“在行将来臨的解放运动中，应当成为工人階級的領袖，应当向工人階級解释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的相互关系。他們应当关心在頒布宪法以前的时期，改变俄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实际关系，使之有利于工人階級……他們应当用一切力量来爭取在俄国宪政生活的第一时期，就有一个代表我們工人階級提出明确的社会和政治綱領的特殊政党出現。詳細拟定这一綱領的工作应当讓工人們自己来做，但是知識分子应当向他們解释綱領中的要点，例如現代土地关系、賦稅制度及工厂立法应如何彻底修正，国家应如何扶助生产組合等等”^①。这一切是否象放弃“和政治变革同时，要达到或多或少程度的經濟变革的思想”呢？我希望，这不象；而因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是一个很聰明的人，不致不懂得这些簡單的事情，他又是一个很誠实的作家，不致有意歪曲这些話的含义，所以，显然，他所謂“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不是指的“劳动解放”社，而所謂“已經习惯了的理論观点”不是《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所叙述的那些看法罢。

想必，連他所提到的“紅色魔影”也不是从我的小册子中引来的。假如是的，那末我可以不无理由地責备吉荷米洛夫先生“引用得不精确”。我談到“紅色魔影”时，并非劝我們的社会主义者放弃“达到或多或少程度的經濟变革”的意图。我只是劝他們如果关于

^①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第84—85頁（本卷第112—114頁）。

真正實現經濟的變革什麼事也不做或做得很少，而關於這類變革快要到來的信念又只是根據人民最幼稚的理想化時，那末，便應當放棄這一空談經濟變革要臨近的“意圖”。我是主張真正為工人階級經濟解放而工作的，這未免和關於“紅色魔影”的空談相對立，凡是讀過我的小冊子第 71 頁及以下諸頁的人都可以相信這一點，我在那裏面也順便指出 1848 年德國共產主義者的榜樣¹²⁷。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責備馬克思自己某一時候也放棄“與政治變革同時，要達到或多或少程度的經濟變革的思想”嗎？假定說，我們的作者，如從各方面所看出的，關於西歐社會主義的文獻知道得太少，但是這樣驚人的無知已經完全是不能原諒的。不，顯然，吉荷米洛夫先生所指的不是我的小冊子和我所說的關於“紅色魔影”的話罷。

但既然說到這一魔影，就不妨詳細解釋一下我在我的小冊子中是怎樣提起它來的。

在《民意》第 6 期社論的結尾有如下的話，是告我們的所謂社會人士的：

“我們為社會的利益而行動的人，現在要勸社會人士，最後，不要再畏縮冷淡了；我們懇求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為人民的利益，為拯救自己的不斷被迫害和被屠殺的子弟們的生命而呼喚。”^①

在《民意大事記》上¹²⁸，我讀到如下的話：“對自由主義者的態度，應當是不隱藏自己的急進主張，同時指出在現在所提出的各黨派任務的布置之下，我們的利益和他們的會迫使這兩方面共同行動來反對政府。”^②

同時，吉荷米洛夫先生認為，俄國在專制制度傾復以後，代之而起的將是社會主義組織的始基的這一信念，並不是“民意黨”第

① 引用的是海外第 1 版。

② 《民意大事記》，第 129 頁。

一次“公开”表示的希望。不过这里所說“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不是指的馬克思所称为工人最低綱領中劳动經濟对資本經濟第一次胜利的那些成就，而是指的《警鐘》风格的“社会革命”。为了使讀者相信这样一个革命的可能，就想出了一种在俄国基地上政治的和經濟的因素的对比仿佛特別有利于这一革命的学說。

最后，“民意党”所“从事”的恐怖斗争对“社会人士”所起的鼓动影响，要比对狭义的“人民”所起的影响大得多。

有見于这一切，我也自問，“民意党”在欺騙誰，是自欺还是欺騙“社会人士”？必須是怎樣的詭辯家才能說服“自由主义者”，說“現在提出的党派任务的現代的布置”即是特卡乔夫风格的社会（我不說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迫使”他們（自由主义者）和民意党人“共同”行动反对政府呢？这样天真的、看不出这一詭辯背后的意图的“自由主义者”又是在哪里聚居呢？無論怎样，不是在俄国。“民意”想“說服”我們的社會人士，“最后，不要再畏縮冷淡”，同时使他們相信，在不再冷淡和打倒专制的时候，他們就是直接地为社会革命的利益而工作。照我想来，“民意”的宣传在我們的社會人士中是不会有成效的。

从另一方面說，恐怖主义的斗争固然无疑地重要，但是和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毫无共同之点。“民意”为准备实现这样的組織做了些什么呢？它在人民群眾中組織了秘密革命小組嗎？但是为什么关于这类小組我們毫無所聞呢？它在人民中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嗎？但是它为人民出版的讀物又在哪里呢？除了編得不好的《工人报》¹²⁹以外，我們一点也不知道。这就是說，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虽然沒有受到民意党的任何邀請，也还是等待着民意党的。恐怕很难指望历史的这样的好意罢。“民意”是准备着收割它所沒有下种的东西，寻找社会革命，如象寻找野生植物一

样。它对一只兔子开枪，却想打死另一只兔子。它所期待“于革命”的，完全和它为革命所做的事不相符合。假使如此，现在难道不是到了使結論和前提相符，并了解恐怖主义的斗争，除了争取政治自由以外没有更多的意义的时候吗？现在难道不是到了承认这一斗争，主要是“为社会的利益”（如象《民意》第6期所承认）的时候吗？现在难道不是到了承认停止以“紅色魔影”的出现吓唬社会人士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紅旗是绝不会从那一方露面的）吗？关于这一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出现的謠传之有害，不只因为这样就使得我們“在为宪法而斗争”的时候，“得不到”自由主义者“的帮助”。这类謠传又使我們毫无根据地相信，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管我們一方面努力不努力，总在等着我們，使我們的注意反而离开了最重要的一点：組織工人阶级来和它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敌人斗争。我关于‘紅色魔影’所說的話的意思就是如此，而且也只是如此。”

在法国，在1870年战争的前夕，就有人只叫喊，法国军队在到达柏林的途中是不会“遇到阻碍”的，而不想到士兵的武装及粮食供应問題¹³⁰。法国那时又另外有些人說，以“大汗”的魔影吓不倒誰，应当首先从事于組織国家的軍事力量。試問，誰对自己祖国的利益了解得更清楚呢？

但是我的解释使我离开了主题。我原想研究吉荷米洛夫式的历史哲学，却轉到了关于“紅色魔影”的解释。

“某一部分的社会主义者”应当靠自己的自由主义綱領和自己的“已經习惯了的理論观点”把我們引到真实的道路上和回到我們所关心的“主题”上来。

这“某一部分”还說了些什么，吉荷米洛夫又怎样打击他們呢？

我們的作者說，这“某一部分”的人几乎只限于在自己的論据中所引的关于宪法和可怕魔影的一些議論。它甚至也不想說明一

下自己“对宪法的过分的偏好”。这一有害的偏好“有点不可解，正如一般地说，所有这一切（这一切是指什么？）綱領整个地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說得不透彻，說得不完全确定一样。然而这些綱領都是从一个总的、已經完全确定的观点产生的”。縱然这样也好，但是到底是哪一观点产生“所有这一切綱領”，即是产生“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的綱領呢？是一个很坏的观点，因为它“造成一个趋势”，“对革命党起腐化的影响”。

“我們所說的就是那一認為俄国資本主义是历史上不可免的趋势，它在和这一好象不可免的事实妥协的时候，就以俄国如果不通过資本主义的学校，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

我們肯定，这不是新趋势，因为在前一頁我們已讀到“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从“俄国似乎必須通过資本主义发展的阶段”的思想出发等等。“产生所有这些綱領”的总的观点，原来就是这些綱領中之一的出发点。但是假如这不是新的而且也不是都合乎邏輯的話，它无疑却是有趣的。現在漸漸明了我們的社会主义者的某一部分“对宪法的过分的偏好”的原因。吉荷米洛夫先生問道：“老实說来，我們为什么需要宪法呢？并不是为的給资产階級以新的手段靠夺人土地、罰款、打耳光来組織工人階級和維持紀律的呀。由此可見，只有那些对俄国資本主义的这一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完全拜倒的人，才肯直接跳进深水里面去”。“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是拜倒在这一不可避免性之前的，他們的思想既已这样錯誤，就不能停留在罪过和敗行的斜坡上。不仅如此，他們还暴露出那种在每个忠实的巴枯宁主义者眼中看来是可耻的“对宪法的偏好”，他們正开始或者不久将开始寬容地看待“夺人土地、罰款、打耳光”等現象，而和不要资产階級，不要夺人土地，不要罰款，不要

打耳光的吉荷米洛夫先生对立起来。但是“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为什么需要所有这一切的吓人现象呢？事情很明白。“在俄国的、俄国资本主义的、俄国工厂工人的现在情形之下，政治斗争的宣传一定暂时使得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历史的不可避免性的人完全放弃社会主义。有实行阶级专政能力的工人几乎不存在。所以不要把政权给他们。暂时地完全丢掉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于最近的和必需的目的无益而有害的障碍，不是有利得多吗？彻底而能自我牺牲的人是这样地考虑”。现在，大家知道，罚款和打耳光是从哪里来的了，不过还不完全明了，它们是注定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受惊的想象中存在呢，还是真正转到了“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中呢？

下面我们将努力解答这一重要的问题，现在且让我们赶快回头来谈，这位要和那些坚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可避免性的社会主义者进入总的战斗的吉荷米洛夫先生。

(四)在和“劳动解放”社斗争的吉荷米洛夫先生

他问读者说：“难道它的拥护者们（大概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罢）的论据不是基于一系列的诡辩吗？”

“他们对我们指出法国和德国（为什么就不指出英国呢？‘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真是连大象也看不见了），资本主义在那里联合了工人。由此，为了联合我国工人，资本主义也是必需的。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也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提出论证的。他们也指出奴隶制度在原始社会史中的作用，它在那里使野蛮人习于劳动，使人能守纪律和加强了劳动生产率。这一切都是完全对的。但是，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中非洲（让我提醒吉荷米洛夫先生，奴隶制度在那里早就存在）的传教士就该致力于把黑人变成奴隶，或者

教师該用强迫奴隶的办法来教育兒童呢？”

讀者自然急忙地同意說，不“应当”，而对于讀者的回答早有把握的吉荷米洛夫先生繼續自己的議論說：“人类历史有时候会走最令人想不到的道路。我們已經不信有所謂上帝的手，在指导人类的每一步驟，对人类指出最迅速和最确实的进步道路。恰恰相反，这些历史道路有时候是所能想到的所有道路中太曲折的和最冒险的。自然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在某几方面是有害而且阻碍人的发展的历史事实，在另外几方面，相反地，却服务于进步的事业。奴隶制度的意义也是如此。但是这不是最好的也不是唯一的学校。现代教育学証明了对奴隶的强迫，是所有訓練劳动的方法中最坏的一种……关于发展大生产問題也恰恰是一样的。我們可以怀疑，在这方面的历史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而对于所有民族說，它永远都是唯一不变的道路。……完全不錯，資本主义在欧洲有些民族的历史上，制造了許多罪恶和灾祸，然而它的后果中也有某种好处，就是創造了大生产，通过大生产，在相当程度內（?!）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基础。但是由此决不可以說，別的国家，例如俄国，就沒有別的发展大生产的道路。……一切使得我們認為，資本主义所能实现的劳动社会化的方式是最坏的方式中的一种，因为它虽然在許多方面确实准备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同时在其他几方面又大大推延了这一制度到来的时机。例如，資本主义除了机械地团結工人以外，一面还在他們中間发展相互竞争，破坏他們的精神一致；同样，資本主义力求把工人們限制在比一般文明状况所許可的为低得多的那种发展水平上；同样，資本主义簡直不肯教工人們对于整个生产过程实行任何的监督等等。資本主义式的劳动社会化的所有这些有害的方面，沒有把一些好的方面的意义完全抹煞，但是無論怎样，它們向历史車輪投擲了許多障碍，无疑地延緩了历史

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

我从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文引了这么多，不是漫无目的的。由这几頁中可以看出，我們这位作者的哲学—历史理論的独到的一面。特卡乔夫在和恩格斯爭論的时候，对于自己在西欧的这位論敌算是泄漏了“西方”的秘密。“你們的理論以西方的关系为根据，我的理論則根据俄国的情形；就西方說，你們是对的，就俄国說，我是对的。”他的《公开信》的每一行都这样說。吉荷米洛夫先生則更进一步。他从自己“純”俄国理性的观点，批判了西欧发展的过程，对于“向历史車輪”投擲的，“无疑地延緩了历史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的“許多障碍”进行了整个的检查。他所抱的信念大概是这样：历史总是独立地“向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完全不管在这一或那一时期——現在是資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那些关系。因此資本主义在这一“历史的运动”中的作用是次要的，甚至有无作用还相当成問題。資本主义“虽然在許多方面确实准备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同时在其他方面又大大推延了这一制度到来的时机”。但是这一“运动”告訴历史什么呢？須知吉荷米洛夫先生“已經不信有上帝的手”会成功地解决他的历史哲学中的一个致命的問題，就是“第一推动力”的問題。多么可惜，这一独到的理論“給人以某种說得不够透彻，說得不完全确定的印象”。

咳，这位吉荷米洛夫先生！看起来，他喜欢談重要問題！实在說，这一“历史有时候会走最令人想不到的道路”的信念，認為这些“道路有时候是所能想出的所有道路中过于曲折的和最冒险的”信念，难道是笑話嗎？他多半很快就会替西方想出（假使还没有“想出”的話）別一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比誕生了牛頓、黑格尔、达尔文、馬克思的这些国家所已走过的为較少曲折和較少冒险的道路，可惜这些国家是太輕率地离开了神圣的罗斯以及它的独特

的理論。吉荷米洛夫先生宣称：“我們可以怀疑，在这方面（即过渡到社会主义方面）历史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等等，显然不是无意的。不要因为这一謙虛的怀疑而惊异！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此涉及一个著名的問題：我們的世界是一切“所能想出的”世界中最好的呢？还是也有某种“冒险”的缺点呢？不能不惋惜的，是我們的作者把关于de optimo mundo（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研究只限于历史領域。他大概要使自己的讀者对于我們行星的发展过程是“所能想出的”一切中最好的过程，发生善意的怀疑。我們很想知道，班格罗斯教师，过去的維斯法里亚省的通捷尔·秦·特隆克城堡的形而上学—神学—宇宙学教师，現在是否还活着？¹³¹如所周知，这位可尊敬的博士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証明“历史的道路”是“所有能想出的道路中”最好的道路，并非沒有成就。对于羅馬文化史是否沒有賢淑的卢克萊茨亚¹³²被强奸就不行的这一有名問題，他的答案自然是認为不行。吉荷米洛夫先生是一个怀疑派，認为班格罗斯对这一問題的回答是否正确，“可以怀疑”。塞克斯特的行为，在他看来，大概也是“冒险的”，是所有“能想出的”事情中間最坏的事情。这样的意見分歧也許会提供一个借口引起对于后一代人极有教益的哲学爭論。

我們对于可能的欧洲的可能的西方的可能的历史是很少兴趣的，而且已經完全不关心这位或那位有閑的形而上学者所“能想出的”某些历史道路，我們在此所視為重要的就是吉荷米洛夫先生不了解现实的欧洲的现实的西方的现实的历史的一个最重要时期的意义和价值。他所作的对資本主义的估計甚至不能使早已从自己东方立場，咒詛整个西方历史的最极端的斯拉夫派滿意。这一估計充滿了最可惊的邏輯上的矛盾。在《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論文的一頁上面，我們讀到关于“欧洲伟大的文化”的話，說这

种文化“提供了千百种方法来刺激未开化人的求知欲，发展他們的欲望，在精神上推动他們”等等，而在次頁，被这几行“在精神上推动了”的我們俄国的未开化人，立刻又被上述的怀疑主义浸入冰水中。原来，“資本主义制造了許多罪恶和灾祸，然而它的后果中也有某种好处，就是創造了大規模生产，借此在相当程度內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一切都“迫使”吉荷米洛夫先生認为資本主义能够使劳动社会化的方式，是最坏的一种方式云云。〔总之，吉荷米洛夫先生在資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这一問題之前躊躇起来，正如某一有名的將軍在地是球形的問題之前躊躇起来一样：

人家說，地是球形的，
我也准备承認，
不过，坦白地說，我必須生活在球上，
是多么沒有道理……〕^①

受了这一怀疑主义哲学的影响，我們发生了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自問，“歐洲的伟大文化”在前資本主义时期就存在了嗎，假使沒有，那末，它的发生是否得力于資本主义，假如得力于它，那末为什么吉荷米洛夫先生只是順便提到大規模生产，說它只是“机械地联合工人”呢？假如埃及的法老刻奥普斯为了建筑金字塔而“机械地联合”几十万工人，那末，他在埃及史中的作用和資本主义在西方历史中的作用相象嗎？我們觉得差别只是在量的方面，假定說，刻奥普斯所能“机械地联合”的工人要少得多，可是他一定“制造”的“罪恶和灾祸”也少些吧。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这点是怎样想呢？羅馬的大庄园“机械地联合”了带鐐铐的工人，“制造了許多罪恶和灾祸”，大概也“在相当程度內”为古代社会“打下了”过渡

^①（1905年版注）括弧中的几行我曾依照查苏利奇的劝告刪去。现在可以希望，它們的尖锐性对任何事也不会有害，于是又把它们在这里恢复。——格·登·

到社会主义的“基础”吗？吉荷米洛夫先生对我们又怎样说呢？在他的论文中我们没有找着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于是

Die Brust voll Wehmuth,
Das Haupt voll Zweifel……133

我们不禁想去求教西方的作家。他们会解答我们的怀疑吗？

（五）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

《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吉荷米洛夫先生，难道不是吗？）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凡是它已达到统治的地方，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朴的关系一一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把人们系缚于其‘天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发的宗教虔诚、义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揭示出，中世纪时代那种深受反动势力赞赏的蛮勇举动，原是以懒惰逸乐习气为其自然补充的。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底活动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它创造了根本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以及哥特式教堂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完全与民族大迁移以及十字军东征异趣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先前所有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要始终不变地保全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地变革，一切社会关系接连不断地震荡，恒久的不安定与变动，——这便是资产阶级时代与先前所有一切时代不同的特征。一切陈旧凝固的关系，都连同那些与

其相当的历来被尊崇的見解与观点破坏下去；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是等不到凝結就成为陈旧的了。一切等級制的和凝固的东西尽行消散，一切神圣的东西概被褻瀆，于是人們到底也就只好用冷靜的眼光来看待他們自己的生活境遇和他們彼此間的相互关系了。

資产階級既已榨取着全世界市場，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底生产和消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抽掉了工业借以立足的民族基础。旧有的民族工业部門已被消灭，并且每天还在繼續被消灭下去。它們被新的工业部門挤倒下去，采用这种新的工业部門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問題，这些部門加工制造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最遙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們所出产的制造品已經不只是供本国内部消費而且是供世界各处消費了。旧时的需要是专用国貨就能滿足的，而新有的需要却一定要仰給于距离极远国度和气候悬殊地带所出产的貨物来滿足了。先前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閉塞状态以及单靠本地出产品来維持生存的状况已經消逝，現時各个民族都已經是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在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底精神活动成果已成为共同的享受物。民族的片面性和偏狹性日益失去立足的地位，于是从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中便形成出一个全世界的文学。

資产階級既將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底漩渦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頑强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資产階級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謂文明制度，即变为資产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創

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颇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愚昧的乡村生活。正好象它已使乡村屈服于城市一样，它同样又已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度屈服于文明的国度，使农民的民族屈服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屈服于西方。

“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众多。自然力的被征服，机器的采用，工农业上化学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交通，电报的传达，一洲一洲大陆的垦殖，河川的通航，好似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从前哪一个世纪能料想到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沉眠在社会劳动里面呢？”¹³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逻辑上和情感上都是革命者”，他们是这样了解资本主义的意义。聪明的和有教养的保守党人又是怎样了解它呢？

几乎是同样的。例如，罗伯图斯在给鲁·麦耶的一封信上说：“股份公司（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吗，吉荷米洛夫先生？）……有其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必须帮着上帝来做事情，在全能者忘记（或者认为不合时宜）挖通地峡的地方来挖通地峡，经由海底或通过海面来连接为海所分隔的国家，或凿通高山，如此类推。埃及的金字塔和腓尼基的石建筑决不能和股份资本所完成的相比”等等¹³⁵。

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的文化和历史的意义。至于它对于工人，对他们的智力，对他们的道德习惯，又起什么影响呢？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所遇着的是哪些工人呢？恩格斯论及英国织布工人时说：“不难猜到这一阶级的智力和道德是怎样的一

種性質。他們和大城市隔絕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住得離城市很近的老人，當他們的收入還沒有為機器所奪，還不需要到城市去找工作的时候，從來就沒有到過城市，——他們和種地的人的道德的和智力的水平是一樣的……他們看自己的老爺如同自己的天然尊長，有事即向他求教，凡是自己的小爭論都提請他解決，對他所表示的尊敬，正是這些宗法關係所造成的……簡言之，那時候的英國工業工人的生活和思想正和我們現在在德國某些地方還能遇着的情形差不多^①：落后和脫離外界，沒有智力活動，生活也沒有大的變動。他們中間識字的人不多，會寫的更少，他們按時候去教堂禱告，不關心政治，不作秘密活動，不去思想，歡喜勞作，以最大的虔敬來听朗誦聖經，由於自己的毫無所求而能和社会上的上層階級非常和睦地相處。但是正因如此，他們在智力上是死板的（听呀，听呀，吉荷米洛夫先生！），只為自己的一些小的和私人的利益，忙着自己的紡車和小園子，對於當時人類發生的大運動完全無所知。他們過着那種枯燥的生活已經滿足，如果沒有工業革命（即是說，資本主義，吉荷米洛夫先生），他們絕不會脫離這一幻想的和感性的世界，但不是人所應當過的生活。他們不是人，而只是直到那時候在歷史中還起着領導作用的少數貴族手中的工作機器；工業革命只是使他們脫離了這種境況，它雖然完全把工人變成了機器，剝奪了他們獨立地位的最后的影子，但是同時却喚起他們趨向智力活動和爭取人的生存。”¹³⁶ 它，這一英國的工業革命，把工人“從對於一般人類的事情冷淡无情的狀況中”救了出來，並“把他們卷入了歷史的漩渦”^②。

① 這是在四十年代之初寫的。

②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第13-14頁。

这是恩格斯所说的，而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总是责备他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描写得太好，而把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描写得暗淡无光的。例如，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所著《现在的和未来的政治经济学》（《Die Nationalökonomie der Gegenwart und Zukunft》）里就充满了这种责难。

但是，阿克萨柯夫先生会说，西方以及它的假先知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末，我们试听听摩西和其他先知们的意见，读读巴枯宁本人的文章吧。

“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时候起一直到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是由于正在生长的资本主义呢，或者不是呢，吉荷米洛夫先生？）假如不是在德国，那末，在意大利、法国、瑞典、英国、荷兰，都是历史上的主角和革命的天才的代表。从资产阶级内部产生了十八世纪大部分的自由思想家，前两世纪的宗教改革家以及主张人类解放的使徒们，这里也包括上一世纪的德国的活动家。只是它这一阶级，自然是依靠着相信它的人民所发出的伟大力量，干成了1789年和1793年的革命。它宣布了王权和教会垮台，宣布了各民族的亲睦，宣布了人权和公民权。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它们是不朽的。”^①

而东方的人，即是吉荷米洛夫先生，面对着西欧资本主义的这些不朽业绩，却不能放弃他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轻视心理，而是懒惰地打一下呵欠便宣布说，这一发展道路终究不是所有“能想出的”道路中的一条最好的。他在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中只看见“许多罪恶”和“机械地联合工人”。他认为“大生产”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一“联合”。在说起奴隶制度时，他还提到了它所引起的劳动

^① 《上帝和国家》（《Dieu et l'Etat》），日内瓦，1882年版，第92—93页。

生产率的提高；一轉到資本主义，他甚至也不暗示那些“象被魔术所創造的雄伟的生产資料”，只有这些生产資料才能准备着无产階級的胜利！关于資本主义对哲学、公法、私法、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等学术发展的影响，他更是一片概念也沒有。然而这一影响是无可怀疑的，而且有过一个时候，俄国作家們也理解到了社会中間階級关系（而現代社会中的階級关系，如果不是資本主义所創造又是誰創造的呢？）对于一般学术、尤其对于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影响。車尔尼雪夫斯基說：“政治理論以及一般哲学学說，总是在它們的作者所屬的社会情况的最强烈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每一个哲学家往往是他所屬的当时为爭取对社会的支配地位而奋斗的某一政党的代表。”^① 这些哲学体系滲透着体系的作者們所屬的那些政党的精神。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資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的和哲学的体系不如中世紀的那些相应的体系嗎？或者他以为資本主义所特有的一些理論比他自己所能“想出的”那些理論坏嗎？如果是这样，讓他随便“想出”多少理論，讓他繼續忽視西欧文化史罢！反正，在《民意导报》編者和西方的这一爭吵中，前者要受很大的損失，后者是毫无損失的。

不过，不应把吉荷米洛夫先生看为这一爭吵的发起人。我們的作者关于这一問題只是重复了伏·伏·先生在各种論文中所写的罢了。伏·伏·先生，如所周知，向来傾向于縮小西方資本主义的文化—历史意义，相反地，夸大現代俄国“政权”的意义的，說这一政权“在社会中沒有厉害的敌人”，因此“不会害怕那些西欧各国政府对之进行了不断战争的进步的因素”^②。試仔細地重讀一下那充滿了无穷重复，因此是够厚的《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一書，除了

① 《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則》，第2—3頁。137

② 《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序言，第6頁。

在里面談“劳动社会化”，而这种“劳动社会化”又等于“联合了工人”，等于在工人中发展为伏·伏·先生所同情的这些或那些情感以外，就看不到资本主义还有其他意义。这种狭隘的、片面的估計，完全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搬到自己的論文中，以之作为他所期待“于革命”的根据！我們的作者显然忘記了拉薩尔对自己的一个論敌的絕妙忠告：“学习呀，学习呀，但是不要根据杂志上的一些論文。”

俄国的作家們不滿意于自己的、狹隘到了荒謬地步的关于資本主义历史的哲学。于是他們自己来分析这一生产形式，說起来是靠自己的聪明来找出它所固有的矛盾。但是看看是哪一些矛盾呢！这些矛盾不是由历史的辯証法，經過新社会形式代替旧社会形式的办法来解决的，这一新社会形式是在旧社会形式的母胎內，根据着它的原則之显然是最彻底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这不是其历史意义为歌德的名言

Vernunft wird Unsinn, Wohlthat Plage. 138

所道破的那些矛盾。这是一些沒有任何历史意义，而只是从小資产階級观察者对待他所观察的对象的那种态度所得出来的矛盾，这种态度可以用“多番計量，一次剪裁”的話来表达。这是一种折衷主义，在一切事物中看見好的和坏的方面，称許前一面，痛斥后一面，毛病就在于看不見某一历史时期的“光明”的和“黑暗”的特点之間的任何有机联系。資本主义可以拿費尔巴哈的話对这些批評家們說：“你痛斥我的缺点，但是要知道我的一些优点正是以它們为条件的。”俄国的作家們在此場合是把蒲魯东的方法应用于各种历史的范畴的，蒲魯东認定辯証法的任务是指出每一个經濟范畴的好的和坏的方面。馬克思批評他說：“Il veut être la synthèse, il est une erreur composée”（“他想要变成綜合，其实他是一个合并起来的錯誤”）¹³⁹。

人們說，蒲魯東有個時候是巴枯寧的學生。他和俄國許多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者所共同使用的方法是不是從一個共同的老師那里學來的呢？

這位吉荷米洛夫先生也可以作為這一“複雜的錯誤”的方法的光輝代表，他于指出資本主義的好的方面——聯合工人——以後，即進而指出他的一些陰暗方面。我們已經看見，他對資本主義的“贊揚”和實際的情形有多少符合。不足怪的是如果他的責備也毫無根據。

“資本主義機械的聯合工人同時，還在他們中間發展破壞他們精神一致的競爭……”

吉荷米洛夫先生顯然要“想出”一條不知有競爭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我們現在且不談叫做交換價值的，把各種專門勞動化為人類簡單勞動（沒有這種概念，自覺的共產主義傾向是不可思議的。）的這一經濟範疇存在中競爭的作用問題，我們且注意我們的作者所指出的競爭的壞的一面罷。在此我們首先指出，可以“破壞”的只是在實際上已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同情和“期待”中存在的東西。工人的精神一致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存在過嗎？我們已經知道，是不存在的。在行會生產最繁榮的時候，只存在了一個公會的工人們的“精神一致”，或最多，在一個小地方範圍以內的一行業勞動的工人們的“精神一致”；關於工人（作為工人說）所意識到的整個生產階級的一致的這種概念，是從來不存在的^①。資本主義破壞了、毀滅了、消除了有專利權的專門家的“精神一致”，創造了“全世界的無產者們”的精神一致來代替它，這也

^① 西門說到中世紀的工會時說：“雖然全體工人，不論他們屬於那一行業，實質上只有一種利益，因此應當組織在一個總的工會中……但是，由於對抗的精神占了集體的精神的上風，在工人中間，界限還是劃得很清。各個不同工會里的會員間的相互爭鬥，是從這些工會發生的時候就有的。鑒於這一決死的爭鬥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我想到

是资本主义通过了竞争来达到的。为什么吉荷米洛夫先生这样攻击竞争呢？我們已經看見，据他的意見，历史有一种独立的、抽象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这一“运动”既然存在，那末，对于那些最初导致先进人类“必須用冷靜眼光来看待他們自己的生活境遇和他們彼此間的相互关系”的一切发动机和弹簧，已經可以随便“批評”了。

资本主义“力求把工人們限制在比一般文明状况所許可的为低得多的发展水平上”。

这句话似乎是从德国講壇社会主义者的爱森納赫大会的纪录中抄来的，按照他們的意見，社会問題就是如何提高工人到更高的“发展水平”的問題。但是講壇社会主义者虽然知道他們所要求的是什么，不过直到現在，不管自己怎样努力，他們还不能决定怎样才能得到所要求的東西。他們了解現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意义，而想用自己的一些治标办法来破坏这一意义，想以罗伯图斯的“monarchisch, national, sozial”（“君主的、民族的、社会的”）口号强加于工人。他們所謂的較高的发展水平，就是指工人阶级的比較高的和有保障的工資，偏狹得多的眼光和少到无比的同情心。他們知道，工資“鉄律”¹⁴⁰是現代社会的死刑判決，所以并不反对把这法則鍍金来废止这一判決。他們預見到，假使事情和現在一样的繼續不变，那末，无产阶级很快地会把所有东西都拿走的，所以他們尽力迫使无产阶级接受扁豆湯来放弃它未来的优先地位。他們所要的是沒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要什么呢？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哪一个历史时期，工人阶级处

一个哲学家所說：人对人象狼一样，正是指这些相互敌視的工会的會員說的。（西門：《关于同业工会的历史及道德的研究》（《Etude historique et morale sur le compagnonage》），巴黎，1853年版，第43—44頁）应当承認，资本主义“破坏”先于它的那个时期的这种“工人的精神一致”，并不是很困难的

于比現在更高的發展水平嗎？是在古代世界，在奴隸制度時代？還是在中世紀，在農奴制度時代呢？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拿資產階級社會和“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嗎？假使如此，那末，在“將來全世界歷史性的時代”的社會制度會使得人的發展更適合于文明所創造的生產力的意義上，他當然是對的。但是，姑且不說，怪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是等于不了解社會主義的歷史的起源，我們向吉荷米洛夫先生指出，他照例是混淆了術語。社會主義的社會沒有勞動者自然是不可思議，但是一定可以說，這一社會里不會有工人，因為有工人就必須有企業主、資本家、地主等等，正如有奴隸必須有奴隸主，有農奴必須有封建領主一樣。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警句，在這裡，就可歸結為一可驚的論點，就是說，現代工人是停留在比完全沒有工人的那一社會里的工人為更低的发展水平上。

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拿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的狀況和那種所“能想出的”、作為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的那些社會關係下的工人的狀況相比嗎？假使如此，那末，讓他一路平安地“想出”這些關係吧，我們將很感興趣地讀他的“臆想”。但是他且不要太陶醉于這種臆想，讓他不要忘記，應當把文化的程度和文化的類型加以分別，假使現代無產者的物質文化的程度很不高，但是，無論怎樣，這一物質文化仍是到現在為止所存在的所有文化中最高的一个類型。何況這一階級的智力的和道德的文化的發展，比以前所有各時期的生產階級的文化高得不可比擬呢。讓吉荷米洛夫先生嚴肅地注意這一發展，它不是原始形式的土地占有和原始形式的生產，也不是在平民知識分子^①的革命組織里面這些或別些“委員會”所建

^① 平民知識分子是俄國十九世紀自由資產階級和民主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屬於貴族，而出身于教士、官吏、小市民或農民。——譯者

立的严格纪律所能代替的。

资本主义“同样”“简直不肯教工人们对于生产总过程作任何监督等等”。

资本主义可以用俄国的谚语“愿尽我的所有来招待你”回答这一意外的责备。资本主义不能教工人们监督“生产总过程”，因为连它自己也不知道这种监督。而工业的危机的发生也正由于没有这一监督。但是，请问，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外，这类监督是可以思议的吗？且让吉荷米洛夫先生证明是可以思议，我们就同他谈得更详细些。现在我们重复地对他说，怪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就等于怪历史没有从一开始就直接实现《共产党宣言》的纲领，还要经过“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

许多读者也许认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意义的争论是完全多余的。他们说，我们所关心的是俄国，而不是关心西方，为什么要老停留在对西方的历史发展的评价上呢？也许吉荷米洛夫先生在这问题上忽略了点什么，弄错了点什么。这对于我们的家事有什么关系呢？

有最直接的关系。吉荷米洛夫先生“批评”西方资本主义，是抱着为俄国社会革命的政党制订纲领的完全确定的实际目的的。而且他是根据自己对西欧历史的评价，来“期待”“于革命”有某些利益。这一评价如果正确，他的期待就很有根据；相反地：这一评价暴露他完全不懂西方历史，不懂现代哲学—历史批评的方法，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那些“期待”本身也就变成极轻率的。所以我也花了许多页篇幅来说明《民意导报》第2期的两页（第238和239页）上面所载的那些混乱说法。在说明以后，我们就可以转到俄国问题上来。

(六) 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發展

吉荷米洛夫先生從自己對歷史—哲學的考察返回來以後就高聲喊道：“不要替自己造一個私有企業資本的偶像，尤其因為這種資本能否在俄國做到象西方那樣的事業（1）還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目前的形勢和歐洲各國在私人資本基礎上開始組織國民生產的時候的形勢大有差別。在那裡，私人企業家在自己的面前有廣大的市場，沒有那種自己所特別畏懼的競爭。而我們則幾乎完全沒有市場，私人企業家在每一個事業里都遇着自己力不能勝的歐美生產的競爭。”¹⁴¹

我們作者所有這些想法又不是屬於他自己，而是從伏·伏·先生那裡抄來的。但是現在姑且不說這些想法的淵源，且看看它有多少根據。這裡我們面臨着的又是一件困難而不討好的任務，即是把一些關於事實和概念的異常混亂清理出一個頭緒來。

首先，我們問吉荷米洛夫先生，何以他這樣攻擊“私人”企業資本而一點也不提別種的企業資本呢？何以他，如羅伯圖斯所說的，喜歡黑髮的人而不喜歡黃髮的人呢？難道他以為在鐵血宰相手裡的國家企業資本就勝過波爾茨格或克虜伯的私人資本嗎？

或者他以私人資本來和工人社團的這樣的資本對立嗎？但是他為什麼不聲明，他對於不屬私人的企業資本的同情只限於這一種資本呢？而且沒有新的和重要的保留難道可以同情這種資本嗎？

德國¹⁴²社會民主黨要求國家對於工人社團給予信貸，但是社會民主黨從經驗知道要使這些社團有成就，換言之，不墮落為剝削別人勞動的剝削者，就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原則來予以嚴格監督。這一監督的代表人可以而且應當是工人的社會主義的政黨。由此，誰

要說国家对工人团体給予信貸，那末，他或者是在談巩固工人政党的影响，或者是建議一种足以引起无产阶级内部分裂，和巩固资产阶级或政府的影响的办法。伏·伏·先生不害怕后一結果，所以他勇敢地把自己的改良主义的方案提出于“当权者”之前。吉荷米洛夫先生是专制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敌人，而又非常怀疑我国有发生资产阶级制度和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可能。所以他的建立工人工业会社的計劃——对于这些計劃，因为他用的術語混乱，我們只能加以揣測——是屬於或多或少的遙远的将来，要到“革命者夺取政权”成为“革命的出发点”的时候。而因为我們关于这一夺取及其可能后果在后面还要談得很多，所以，我們將不在这里考察使俄国工人工业会社得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那些条件。現在我們既已指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經濟術語不明了和不确定，請再进而研究他所說的一些历史的对比。

說“我国現在的形势和欧洲各国在私人資本基础上开始組織国民生产时候的形势大有差別”，这一思想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应当表达得更适当些。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历史上沒有两件事是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发生的；所以每一国家的每一历史时期，和任何别一个国家的相应的时期自然“大有差別”。但是正因为这样，可以臆断地說，如果不附以一系列的保留、修正和补充，而把俄国和西方死板地对立起来，就失去任何意义，因为所謂西欧并不是指的一个国家，而是包含着許多极不相同的国家。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認為不需要这一类的补充。他把“俄国的目前形势”和“欧洲史中各国在私人資本基础上开始組織国民生产”的“时刻”对立起来。但是，姑且不說，“在私人資本基础上組織国民生产”是不可能，因为資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完全无政府的，即是沒有任何組織；我們也暫且不提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这些邏輯上

和術語上的大錯，我們問他，“在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果真是一個“時刻”的功夫奠定基礎的嗎？難道不是恰恰相反，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歐洲各國”有多少，就有多少“時刻”嗎？果真如此，這些歷史上的“時刻”不是一國同別一國同樣地“大有”差別嗎？英國資本主義的開始和德國資本主義的開始難道相象嗎？就我們所知是完全不相象，如此不相象以致當時在德國也產生這樣一種意見，好象這個國家完全沒有可以發展大的加工製造業的條件，只能永久是農業國家。持這種意見的人正是借口他們“當時”德國的情勢和別國的情勢是“大有差別”的一類話。關於這個問題，尤其關於這些假的先知，吉荷米洛夫先生對我們又怎麼說呢？

我在《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小冊子中曾說到那些竟成為溫柏格的小說中猶太小孩所創立的地理學派信徒的俄國作家。我說：“在可憐的學童看來，俄國的特殊的作家們在這一巧妙的地理分類中只加進了一樣新東西：他們把‘外國’分成東方和西方，而且，沒有多想一下，就把後者與扮演著某種‘中央帝國’角色的俄國相比。”當我寫這几行文字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這種謬論會為有拉甫羅夫任編輯的機關報的篇幅所重復。現在我看拉甫羅夫先生的編輯同事原來是猶太小孩的追隨者，把許多極為複雜和“大有”分別的各種各樣的歷史現象歸在他所“想出”的一個“時刻”。這樣看來，《民意導報》一定是大大辜負自己讀者的期望了！

不過，吉荷米洛夫先生在這一場合有可以被原諒的地方。他的錯誤是由於他深信，在“歐洲各國”，在為我們所已知的歷史的“時刻”，“在私人企業家面前有廣大的市場，沒有那種自己所特別畏懼的競爭”，而“我們則幾乎完全沒有市場”。假使這是正確的，那末，他把俄國和西方對立確有充分的理由。不管“歐洲各國”的每一國資本主義誕生時的條件彼此如何不同，但是在它們中間也許有一

个极为重要而为现代俄国所不再重复的共同特点吧，那就是说，有可供销售的“广大的市场”存在。这一就“欧洲各国”说来是很幸运的情况，应当使得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完全两样。倒霉的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或者，更正确些说，使他产生这一信念的某一论文的作者都是大错特错了。在上面所说的国家中，私人企业家在自己的面前完全没有“广大的市场”。资产阶级创造了市场，而不是遇着了现成的市场。在资产阶级以前的封建手工业时期，不仅没有“广大的市场”，而且连现代意义的市场也根本不存在！那时候所交换的只是剩余的生产品，即是生产者本人消费以后所余下的；手工业者是按照某地方的某一个人的定货工作，而不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谁要是稍为懂一点中世纪的经济关系，他就不会反驳上面所说的。同样，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在中学上过学”，也懂得需求以及和需求在一起的市場，只有和生产在一道发展，为生产所引起，自己又引起生产。“大多数需要都从生产中发生，或从一个建筑在生产上面的一般状态中发生出来。世界贸易差不多专围绕不是个人消费的种种需要，而是生产的种种需要来旋转。”① 现代的、真正“广大的”全世界性的市场的特点正在于：在这市场上，不是消费引起生产，而是生产引起消费。“大工业，已受它所使用的工具所强迫，不得不越弄越大规模地生产，来不及等待需求，生产走在消费之先，供给强制着需求。”②

说西欧在资本主义发生时期没有“特别畏惧的竞争”，简言之，是可以认为无须争论的，虽然当时东方工业品被禁止输入“欧洲各国”，正表明西方的制造业害怕亚洲的竞争。但是西欧生产者“所特别畏惧的”竞争者还是那些同一的西欧的生产者。如果我们想起，

① 《哲学的贫困》，第16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48页（同上书，第88页）。

資本主義在“歐洲各國”并非如吉荷米洛夫先生所想，是在同一個“時刻”開始發展，那末這就不是什麼怪論。當這些國家中一個國家的工業發展達到某種強度的時候，當資本的代表人有了這樣的力量和影響可以使立法機關成為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的時候，他們就發現了“私人企業家在每個事業里都遇着自己力不能勝的從鄰國方面來的“競爭”。那時候就開始了贊成國家干涉的鼓動。在十七世紀的歷史中關稅稅率之成為外交談判的主題，商業戰爭之需要在當時說來是大量的支出，都顯明地向我們表明，“歐洲各國”需要做何等巨大努力來獲得這些好象是現成的市場。問題還不僅在於爭奪國外的市場，而且還在於保護國內的市場。難道還須要舉例來說明這一似乎人所周知的歷史嗎？由於我們國內土著的和特殊的經濟學家的孤陋寡聞，這大概將不是多餘的。我們先講法國。

柯爾柏“認為法國從國外輸入的貨物比它向國外輸出的超出很多；不管有都爾和里昂的製造業，而意大利仍繼續供應絲織品、綢緞、絲綫；威尼斯每年還靠對法國輸出鏡子和花邊而收入數百萬；英國、荷蘭、西班牙供給法國以毛織品、香料、顏料、皮革和肥皂……他認為……里希留企圖開辦的大公司和經營的殖民地都破產了，而且法國所有的海上貿易都受英國人和荷蘭人的操縱。為了阻止這種海上貿易侵入法國商港，福克就規定了外國船隻運來每一噸貨物須納稅五十蘇^①，荷蘭人關於此事的經常申訴，對柯爾柏證明他的前任大臣給了他們以何等沉重的打擊。這是當時的情勢。柯爾柏想把這一情勢變得更有利於法國，想使法國脫離任何商業的依賴，用發展工業的方法來把法國提高到富強國家的水平”

① 法國銅幣名，值二十分之一法郎。——譯者

等等^①。他热心地干起来，1667年的税率简直是要“消灭”荷兰的貿易。“英国人和荷兰人也以同样措施来报复；关于税率的爭論是1672年战争的导火綫，最后，宁未良和約¹⁴³使法国恢复了1664年的税率。”^②

由此可見，法国“面前”完全沒“有”广大的市場，而須借助于适当的經濟政策、外交談判、甚至于武器来爭取。柯尔柏只指靠“時間和勤勉”，他認為靠这两者，法国就可以充当“那些曾經教过它的国家的老师”。

大家都知道，法国的保护政策和禁止政策不因柯尔柏影响的停止而停止，正如这一政策也不是由他所首創一样。只有在凡尔賽和約¹⁴⁴以后，法国政府在1786年才向自由貿易的方面走第一步。但是，这一嘗試的結果对于法国工业是不利的。根据1786年和英国締結的条約，对于毛織品和棉織品、磁器、粗磁器、陶器、玻璃制品，締約两方都从价征税百分之十二，对于鋼、鉄、銅等五金制品稅率为百分之十；对于亚麻和大麻織品都按对于最惠国所定的稅率征税；但是因为英国比法国工厂主生产所有这些制品能便宜百分之三十、四十、五十，所以英国很快在法国市場取得了支配地位。所以1789年，法国选民們几乎一致要求对法国工业采取更有力的保护政策。复辟后的政府和七月帝制也实行严格的保护稅率。为保証法国商品的銷售，殖民地除和宗主国以外，被禁止和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貿易。只是从1860年才开始一种有利于自由貿易的轉变，但是即使这一轉变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对，且为蒲魯东

^① 列瓦歇尔：《法国劳动者階級史》（《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第2卷，第174—175頁。

^② 參閱法南：《法国由柯尔柏到屠尔哥的内國工业政策》（《Die innere französische Gewerbepolitik von Colbert bis Turgot》），第17頁。

所斥責。最后，不过 1877 年，法国对英国竞争的畏惧心又起，使得保护主义者組成“保卫民族劳动协会”。1882 年的稅率是要求保护的一些要求和自由貿易的一些意图之間的一个妥协，而自由貿易的意图主要是由商业資本的代表所暴露出来的^①。

这就是屬法国資本家支配的“广大的市場”历史。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它曾經听說过什么嗎？

但是“某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对我们作者所“指出”的德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这里的情形也不見得好些。在这里也是“私人企业家在每一个事业里”都遇着“自己力不能胜的”先进国家的“竞争”。大家知道，德国資本主义的兴起較迟。德国不仅在头几世紀，甚至在本世紀也不敢想望和法国或英国竞争。試举普魯士为例。1800 年普魯士完全禁止了外国絲織品、半絲織品和棉織品的輸入。在此以前的八十年，政府单对柏林、波茨坦、奥德河上法兰克福、克彭尼克等地的一些絲厂，就花費了一千万以上的“泰勒”（从这件事吉荷米洛夫先生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只是一个俄国政府努力于“在資產階級的原則下”組織“国民生产”）。但是法国和英国的制成品远优于普魯士的，以致对外貨輸入的禁令为走私所逃避，它不是任何严厉的法律所能禁絕的。拿破仑的胜利使普魯士无法在禁止性的稅率的“壁垒”之后挽救自己的制造业。随着法国軍队的侵入，法国貨开始充斥在被占領的那些地方。在 1806 年 12 月初，征服者要求所有法国貨于繳納很低的關稅以后，得以在拿破仑軍队所占的普魯士各地通行无阻。普魯士政府向征服者申訴本地工业經不起法国工厂主的竞争，也是枉然。普魯士政府証明，柏林工厂所以直到今日还

^① 參閱伯利哥：《法国商业史》（《Histoire du commerce français》），巴黎 1884 年版。

能維持都是由于保护稅率，如果把它取消，人民就絕對要穷，工厂工人只有行乞，这种証明也是枉然。資產階級法国的胜利的將軍們回答說，法国貨的輸入是征服的“自然后果”。这样看来，除开各政府間的政治斗争外，还有各国人民間的經濟斗争，或更正确些說，是那些当时掌握着生产資料的国家的人民阶层間的經濟斗争，和軍隊的斗争并行的，有工厂主的斗争；和將軍們間的敌对同时存在的，有商品的竞争。法国的資產階級需要获得新市場，普魯士的資產階級就想尽力保住由于保护稅率而掌握着的市場。在此所謂現成的“广大的市場”又在哪里呢？当普魯士的工业家随 1813 年的宣战而最后摆脱了法国的竞争的时候，他們又遇着新的还更危险的敌人。大陆制度^①的崩潰把欧洲市場对英国商品开放了。大量英国貨物泛濫于普魯士市場。英貨的价格低廉，加以普魯士当时对于友好及中立国家貨物所課的稅率不高，就使得本地生产者无法和外貨竞争。普魯士工厂主的申訴重新迫使政府限制对普魯士的輸入，至少是棉織品^②的輸入。从那时候起，直到現在，普魯士政府，而且也是全德国的政府就不敢放弃保护稅率，担心“不能”和更先进国家“竞争”。而俄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假使在俾斯麦还活着的时候就取得了政权，那末，铁血宰相多半不会拒絕把自己商业政策的秘密告訴他們，而且会說服我們的新聞記者，“广大市場”从来不是，現在也不是在树上长起来的。

我們再看美国。

“北美殖民地，在工业上曾为自己的宗主国置于这样一种完全隶属的地位，以致那里除家庭生产和普通手工业，不应有任何种工

^① 大陆制度是十九世紀初，拿破仑征服欧洲大陆諸国以后，严禁欧洲諸国与英国通商的制度，規定凡輸入大陆的英貨一經发觉，一律予以沒收。——譯者

^② 摩里茨·麦耶博士：《最新政治經濟学》（《Die neuere Nationaloekonomie》）。

业。1750年，在麻薩諸塞州成立了一家制帽工厂，使得英国国会这样的注意和引起了它这样的妒忌，于是一切种类的工厂（自然是在殖民地的）都是被宣布为有害的机关。还在1770年，伟大的查坦姆因为看见在新英格兰新开办了一些工厂而不安，宣称“連一个釘子也不应当在殖民地制造”¹⁴⁵。在独立战争的时候，由于和英国决裂，“各种工厂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这又影响到农业上，使地价上涨。“但是因为是在巴黎和会以后，各州的宪法妨碍了整个貿易制度的制訂，因此英国工厂主又得以自由进入，北美的新兴工厂支持不住他們的竞争，于是美国的工业消逝得比它的繁荣还快得多。关于这一危机，后来一个演說家在美国国会里說，由于新理論家的忠告，我們在可以买最便宜东西的地方买东西，于是我們的市場为外貨所泛滥。我們的制造业者破产了，我們的商人破产了，所有这些原因也对农业发生了有害的影响，使得地产普遍跌价，以致我們的地主也破产”¹⁴⁶。

由此可見，別国对于美国的生产当时也曾有过威胁，而現在美国的生产威胁俄国的“私人企业家”，使他們感到“不能竞争”。美国人当时想出了哪些避雷針呢？难道他們因此就相信他們的情势“和欧洲国家在私人資本基础上开始組織国民生产的时刻的情势大有差别”嗎？他們放弃了大工业嗎？絕對不然。他們受了痛苦經驗的教訓，只有重复保护自己国内市場抵抗外国竞争的旧历史。“各州向国会的請願書如雪片飞来，要求采取保护当地工业的一些措施”，在1789年即已宣布了新稅率，在这方面对于本地工厂主作了很大的讓步。1804年的稅率在这一方向中更进一步，最后，在經過了几次朝着相反方向的搖摆以后，1828年的严格保护稅率終于保證了美国生产者能够抵抗英国的竞争^①。

我們再問，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說的“广大的”市場又在哪里呢？

我完全同意他所指出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应当被認為是更“直接”和“冒险性”最小的：“私人企业家”在自己的面前有“广大的市場”，还有什么可以冒险的呢？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方面也应当同意，这种发展进程是他（或更正确些說，是他的老师）为了教条而“想出的”，和西方的真实历史毫无共同之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如此不同，甚至李斯特定出一个特殊的法則，根据这个法則，每一国家只要在本国国内市場上获得支配地位，使自己的工业巩固以后，即可以出现在世界市場上进行斗争。按照他的意見，“每一个民族由野蛮状况过渡到畜牧，由畜牧过渡到农业，以及在农业社会走最初几步，最好能在自由貿易的影响下进行”。以后，“各农业民族要过渡到农业—制造业—商业的民族这一級，只有在自由貿易的条件下方可完成，即是說，在以发展制造力为使命的所有国家内，同·一·的·生·活·过·程·在·同·一·的·时·候·进·行，各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不互相設置任何障碍，它們不以战争和关税制度来相互破坏各自的成就方可实现。但是，由于那些在制造业、商业和海运业中取得优势的国家，把自己的成就看为在別的国家取得和巩固政治影响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它們（先进的国家）即力求創造这样的一些制度，它們过去是，現在仍是被打算着使这些国家得以保障自己在制造业和商业中的垄断，和妨碍落后民族的进步。这些制度的总和（禁止輸入和对輸入征收关税，限制船运，出口奖励等等）即称为关税制度。比較落后的民族，由于受了其他国家的比較早的成就、外国关税制度和战争的影响，不得不在自己内部寻求由农业过渡到制造业的办法；他們必須以自己的关税制度来限制和先进国

① 參閱李斯特：《国民政治经济学体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842年第2版，第1卷，第9章。同时可參閱爱森哈特：《政治经济学史》（《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第3册，第2章。

家的貿易，因為和先進國家的貿易妨礙這種過渡。因此，這種關稅制度完全不是思辨家的玄想，如象某些人所說，而是一些國家意圖保障自己的生存和進步、或甚至保障自己優越地位的穩固性的自然結果。但是這種意圖，只有當它對那要求經濟發展的國家不加妨害，而是，恰恰相反，促進這一發展，並且不和人類更高尚的目的——將來的世界聯邦——相抵觸的時候，才可以被承認為合法合理的”^①。

對於當時德國資本主義的利益了解得很清楚的李斯特是這樣的，他的罪過只是在估計將來的，“人類的更高尚的目的”的時候有某種的高調，在資產階級看來，這些不歸結為“世界的聯邦”，而是在世界市場上的激烈的鬥爭。李斯特不因為有人責備他的見解落后，不因為有人指出德國在未來世界市場爭奪戰中沒有前途而惶惑不安。對於第一個非難，他回答說，他絕不是無條件地反對自由貿易，而只是要求對之作些臨時限制，而且在德國關稅同盟的範圍之內，他是擁護自由貿易的。對於第二個非難，他以批評關於市場的理論本身的批評，或者，正確些說，對奪取市場的一些條件的批評來回答。他指出，落后國家可以，而且應當在自己之間締結同盟，來共同對付更強的敵人的這一情況，這些落后的國家應當關心自己的殖民地的經營。“每一工業國家應當力求和熱帶國家直接的交易，而如果第二等的製造國了解自己的利益，它們就應當這樣地行動，使得沒有一個國家在殖民地的占有方面具有優勢”^②。新殖民地的經營的可能性他以如下的指示來証實，即是說，直到現在，熱帶還有極適當的地方，沒有在這方面為歐洲人所利用。

當李斯特進行自己的鼓動的時候，很多人都懷疑德國有大的

① 《國民政治經濟學體系》，第 18—19 頁。

② 同上書，第 560—561 頁。

制造业发生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怀疑这一点了，然而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纲领直到今日还没有完全见诸实行。德国只在现在才提出经营殖民地的問題。现实超过了他的期待。为了巩固德国大工业，只须实现他的纲领的一部分就够了。

现在不仅没有一个怀疑派問，李斯特的祖国有没有发生大的制造业的可能，而且人們还对吉荷米洛夫先生“指着”“德国，资本主义联合了工人”，并且在那里“私人企业家”似乎在自己的面前有“广大的市場”。人們把这一国家的最初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困难步骤，忘記到这样的程度！而现在离李斯特写書的时候难道很久嗎？总共只有半世紀，只相当于俄国布朗基主义者进行无结果的“夺取政权”的努力的时间的五倍。而假使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满怀信心說应当照“人民現在的样子”来看待人民，說四十年代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依照吉荷米洛夫先生漂亮的說法，应当“刚刚需要創造一个阶级，以便代表它而活动”，假使我說，馬克思、恩格斯嫌弃“西方”，和决定了德国社会革命的“起点”必須是以当时“共产主义同盟”¹⁴⁷的力量“夺取政权”，情形会变到怎样呢？假使他們把自己的一切活动都指向这一目的，又会怎样呢？德国社会民主党会走得远嗎？須知关于这样的“夺取政权”的問題，并不只是俄国运动所独有的一个特点。甚至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里面它就被提出了，使該同盟分成了两派：一边是馬克思、恩格斯，另一边是維利希、沙培尔。

这一分派的历史如此富于教益，不妨向讀者叙述一下¹⁴⁸。

“从 1848—1849 年的革命失敗以来，在大陆上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被剥夺了在这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出版、言論、集会的自由，即組織政党的合法手段。1849 年以后，和在 1848 年以前一样，在无产阶级前面只有一条道路，即秘密結社的道路……这类秘

密团体的一部分，以推翻当时当权的政府为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合适的，因为无产阶级在那里已被资产阶级所击败，而对当时的政府的进攻，就等于进攻资产阶级的进攻”。这些秘密团体的另一部分是在象德国的这样一些国家活动，“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受半封建的政府的压迫，在那里，因此，反对当权政府的胜利的斗争，不应当剥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把统治地位移交给资产阶级之手，或移交给所谓中等等级之手”，——在这类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们在不拒绝参加行将到来的革命的时候，把自己的最近目标却不看作是夺取政权，而是准备未来的工人的政党。这也是顺便地说，主要作用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所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阴谋叛变者的团体，而是努力于秘密组织无产阶级的团体，因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处在禁令之下，被剥夺了最简单的自由即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不用说，这类“目的不在于培养未来的政府党，而在于培养未来的反对党”的活动，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而没有耐心的人，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于是“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出一个派别，它要求的如果不是真正的阴谋，至少也是阴谋的外表，以及和当时民主的英雄们直接结成同盟”。为许多人归之于它们的领袖之间的个人争吵的两派破裂的原因，为这些事变的参加者，说明如下。

根据马克思说：“少数派（维利希和沙培尔一派）以教条的世界观代替批判的世界观，以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代替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少数把自己的意志当作主要的革命动力来代替现实的关系。而我们则对工人们说：你们还应当经历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战争和人民运动，不仅是为了改变现存的关系，而且也是为了重新教育你们自己，使你们自己变得有统治的能力；少数派说的恰相反：我们必须现在取得统治的地位，否则我们就无事可做。而当

們正对着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的不发达的状态的时候，你們則最浅薄地逢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民族情感和等级成见^①，这自然是受人欢迎得多的手法。……你們和民主主义者相似，以一些革命的术语来代替革命的发展”，諸如此类。

而沙培尔方面則这样表述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实在说过在这里受攻击的意见，我是热心地拥护这一意见的。全部问题在于，是我们杀别人的头，还是让别人杀我们的头。开始是工人们在法国起义，以后就轮到我们在德国这样做。假使不这样，那末，我真就无事可做。但是如果我们的计划实现，那末我们可采取保证无产阶级统治的办法（正如吉荷米洛夫先生答应采取种种办法来保证俄国实现‘人民统治’一样，我们附带地指出）。我狂热地坚持这一观点，而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派）所要的正是相反的东西”等等。

这一争论发生在1850年9月15日，那时这两派就最后分裂了。每一派都各自进行工作。維利希和沙培尔开始准备夺取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准备“未来的反对党”。过了十五年，这一“未来的党”开始威胁着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作者们的观点为成千成万的工人们所掌握。而維利希和沙培尔做了什么呢？他们立即“夺取政权”成功了吗？大家都知道，没有成功。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妄想的”沙培尔应当很快地证实了自己的一些计划的不能实现性，甚至在“許多年以后，在临死的时候，在死的头一天”，說到自己未成功的计谋时，不能不感到“辛辣的讽刺”^②。

^① 可是，即使是沙培尔的一派也不见得发表那种类似用小俄罗斯文发表的关于反犹太人蠢动的有名宣言。而《民意》编辑部对于这一宣言竟声称完全赞同，因此它正是对于俄国人民的民族成见的浅薄的奉承。149

象維利希和沙培尔那样的派別，是社会关系不发达时候的自然的结果。这样的派別是在无产阶级还在很不发展的状态，和在它为自己的解放进行最初的一些企图的时候出现的，而且能有某些成就。“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出现的革命文献，在内容上不免是反动的”——《共产党宣言》这样说。当着先进国家，在更为发达的关系的影响下，终于拟訂出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时候，这样的文献在视自己的落后为象征“独特”的国度里，一部分被或多或少地加以特殊的改造，另一部分则提供出不正确的解释和实际反动綱領的借口。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波兰以及一般地在整个东欧，我們即在現在也还遇着，或可能遇着象維利希和沙培尔风格的“社会革命家”^③。不消說，欧洲东部以后的发展也将破坏他們“对革命的期待”，正如它已在德国破坏了維利希和沙培尔的期待一样。

② 參閱馬克思：《关于科倫审讯共产党人的揭发》（《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cess zu Köln》），第2版，以上各节都是从該書引來。

③ （1905年版注）这几行是我們还弄不清楚《国际社会革命党机关报》（《Walka klas》150（“階級斗争”）的方針的时候写的。現在，在这一机关报已出了三期之后，可以有把握地說該报是以宣传維利希和沙培尔风格的“理論”为自己的主要任务的。不过，我們应当很謹慎地來說这一派別所特有的一些理論，因为如馬克思所說的：“Partei Schapper-Willich hat nie auf die Ehre Anspruch gemacht eigene Idee zu besitzen. Was ihr gehört ist, das eigentümliche Missverständniss fremder Ideen, die sie als Glaubensartikel fixirt und als Phrase sich angeeignet zu haben meint”（“沙培尔和維利希的党从来不以有自己的思想为荣。这个党所有的，只是对他人的思想之特殊的缺乏理解，它把他人的思想定为信条，并且作为空話来領會”）151。

第二章 俄国資本主义

(一) 国内市場

我們現在知道，每一个落后的国家在初期、在国内市場飽和之前，都可以用关税制度来消除从自己的更发达的邻国来的为自己所“力不能胜的競争”。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我們几乎完全沒有市場的想法，因此就失去其大部分的根据。对于落后国家，問題只可以这样地表述：在还没有讓位給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之前，西方資本主义制度会把落后国家卷入自己的漩渦中嗎，而且会卷入到什么程度呢？为要回答这問題，就需要仔細地衡量一下个别国家現在的状态。就我們一方面說，我們将在下一章来这样作，而現在且回头到吉荷米洛夫先生，并看一看他是怎样作这一分析的。

凡是注意最近时期我們的社會思潮的人，自然知道我們的“私人企业家”也正是朝着保障国内市場的方向努力的。这一努力在获得政界、报界以及只有根据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特殊術語才可以不承認为“知識分子”的那一群人的支持。我們不少的教授和学者都集合在这一旗帜之下。然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却認為，俄国資本主义的事业“如果不是完全沒有希望”，至少也很困难。根据他的意見，“工业是勉勉强强地在发展。它在經常抱怨有知識的和有能力的人手缺乏”。在某种程度上說，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种情况是表示“俄国資本主义傾向沒有希望”嗎？俄国工业的“勉勉强强的发展”，难道不是受到現在政治压迫的影响所决定的嗎？說自由的制度是資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必要条件，这是無論在

“歐洲”或者在俄國的每一個人都早已知道了的；在俄國，還在五十年代就已經聽到了為工業的諸成就而要求自由的呼聲。吉荷米洛夫先生如果讀一下已故的巴布斯特于 1856 年 6 月在喀山大學的校慶大會上所宣讀的一篇《論促進國民資本增殖的某些條件》講演詞，就會得到很大的益處。這一篇演說會幫助他了解，最初在“專制君主庇護”之下隱藏着的資本主義，後來怎樣慢慢地和專制君主的利益發生了矛盾，而開始表示不滿，不過說，這種不滿是依自己的方式，溫和地和適度地表示的。這位經濟學家說：“很難設想，腐敗的行政、安全的缺乏、苛捐雜稅、勒索掠奪以及種種惡劣的制度，對節約、積累以及國民資本的增殖發生破壞作用達到何種程度。內戰、政黨的鬥爭、外患、瘟疫、飢饉等等，對於人民的財富都不能有象專橫暴虐的行政所有的那種致命的影響。小亞細亞那些幸福的國家不管忍受了些什么痛苦，不管他們經歷過哪些革命，只要土耳其政府不來束縛它們，還可以不斷地重新變成地上的天堂。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是怎樣呢，那時候，壓在農業人口頭上的是毫無道理的稅收制度，還加上每一官吏可以用稅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和為所欲為地進行掠奪。懲治盜賊有警局，但如政府的高級官員和機關把自己的地位當作了肥缺，又有什么辦法呢？這裡，人們就喪失對勞動的積極性，對於自己的未來，對於自己生活的改善的任何關心……各位先生，只有替資本的活動开辟完全而自由的道路以後，資本及資本的積蓄方能執行自己的真正任務”。吉荷米洛夫先生徒勞地引証了“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時，帝制政府曾全盤地試圖按資產階級原則(?)來組織俄羅斯，以恢復自己的鞏固性”，作為說明俄國資本主義傾向沒有希望的論據。法國的君主專制史，從亨利四世開始也幾乎是“全盤地試圖”“按資產階級原則”來組織法國，以維持舊國家制度的鞏固性。早在 1614 年三級會議開會的時

候，贵族們毫不含糊地抱怨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路易十四的那位部长^①何等关心法国工业的发展。在十八世紀革命的前夕，法国还形成了一个經濟学派，宣揚資本主义和君主专制利益的一致，宣布“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自由放任”）的資產階級原則，同时指出中国是政治制度的模範。帝制政府力求在不放弃专制政权的条件下适应新的情勢。1789年三級會議开会的时候，帝制政府已瀕于死亡的邊緣，但是还假口于路易十六痛斥“幻想”，答应滿足国民的所有“合理”的要求。但是事物无情的邏輯很意外地——甚至对于許許多多資產階級分子也是意外地——表明国民最“合理的”（虽然不是人人都意識得到的）要求，就是顛复专制政体。重农学派¹⁵²的政治理想竟成了最难實現的空想。其实，和重农学派同时的人中間已有很多人理解到专制政体和資產階級进一步的发展是不能相容。我們可以指出社会主义者馬布利和他的著作《对哲学家、經濟学家的質疑》（《Doutes proposées aux philosophes économistes》）就是一个例子。在他那时候，資產階級作为一个階級，还没有想到要“夺取”国家的最高政权；但是馬布利并不象吉荷米洛夫先生，他不說，“假使它（資產階級）已有足够的力量，它現在就这样做了”。他知道，常有这样的历史时期，在这时期里面，某一階級的力量和政治覺悟发展起来会象解冻后的河水上涨一样的迅速。他也知道，每个階級的力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为它的前驅者的衰落程度和它的后繼者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由于人民的程度不够，法国資產階級是唯一有統治能力的階級。专制政体妨碍了法国在資產階級领导下向前发展，所以注定了复灭的命运。資產階級起来反抗它先前在其“庇护”下发展

① 指柯尔柏。——譯者

到了可以“造反”程度的专制政体。馬布利預料到这一結局，虽然他的理想是共产主义，他仍認為最近的将来是屬於資產階級的。

假如說社会的各階級，甚至哲学的和政治的理論，因为有时往往在和它們进一步的发展不相容的原則庇护下发展，所以它們就不重要甚至沒有前途，那末我們只有否認所有的人类文化，只有另外去为人类文化“想出”新的和不大“冒险的道路”了。难道哲学不是从神学内部并且依靠神学誕生出来嗎？“統一、服从、自由是基督教时期的哲学对教会神学經常发生的三种关系”，弗里德里希·宇伯威希在其哲学史^①中是这样說的，而知識和信仰的相互关系的这一次序，我們可以認為是普遍的規律，不过必須补充一句，就是“自由”为自己清除道路，只有靠进行最激烈的生存斗争。每一新的社会的或哲学的原則都是在旧的和它对立的原則内部——因此也是靠了旧原則的营养液——誕生的。由此而得出新原則的前途是“无希望的”这种結論，是等于不懂得历史。

实在說来，我們的独特論者們的历史知識真正是太差了。俄国本国的社会学家听到曼彻斯特派¹⁵³說政府干涉是有害的这类議論，同时又知道俄国資本家很願意有象保护稅率、補貼、保障等类的干涉，于是得出結論說，我国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和西欧的完全相反：在西方，資產階級只說“不干涉”，而我們則只說補貼和保障。但是伏·伏·之流如果不相信曼彻斯特派經濟学家的話，并且甚至暂时脱离自己的“独特論”的根源，那末他們就会知道，西欧的資產階級并不是永久和处处都拥护本国的不干涉的原則的，更不会拥护对殖民地不干涉。他們在知道了这点以后，就会看出象这样把俄国的和西欧的資產階級对立起来，是几乎沒有任何意义的。

^① 《哲学史大綱》(《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3卷,第2頁。

人人都知道，曼彻斯特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错误，正在于他们把只有暂时意义的原则提高为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俄国的许多独特论者固然是不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将来的“期待”，却深信这些经济学家关于过去的见解是正确的。他们相信在西方历史中资产阶级从来不需要国家的干涉和政府的支持，两者除了带给资产阶级以损害之外，没有带给他别的东西。这样的信念是我们那些独特论者的理论和纲领的主要缺点。伏·伏·先生相信曼彻斯特派的话，认为无需涉猎欧洲经济史。吉荷米洛夫先生相信伏·伏·先生的话，把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对于最近二十五年来经济政策日益增加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在位时，帝制政府曾全盘地试图”云云），看作俄国资本主义软弱无力和死气沉沉的主要象征。

伏·伏·先生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因之也是最凶恶的反动派，不值得我们一谈。但是，坦白地说，以一个革命机关报的编辑，对他的话竟如此轻信，这是使我们很难过的。

说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现在已和专制制度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稍微注意最近十年来俄国生活发展的人都知道的^①。如说这同一资产阶级，因为能从现在的制度获得利益，因此其中某些阶层不仅支持这一制度的某几方面，而且甚至完全拥护这一制度，这也是不足惊异的。某一社会阶级的发展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过程，不可以从几个局部的方面来断定其整个的趋势。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嬗变：它已经长了肺，要求象政治上的自治这样气氛中的清洁空气，但同时它还没有失掉鳃，仍须借助于鳃来在腐败的专制制度泥水中继续呼吸。它的根还深

^①（1905年版注）俄国资产阶级的行为证明，我所指出的这一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

深地植在旧制度的土壤中，但是它的上端却已經发展到有移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时候了。富农們靠了我們国家經濟的掠夺性，直到現在还繼續在发财；但是大工厂主、大商人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却已經覺悟到，获得政治权利是他們經濟繁荣的必要条件。最近十年来，我們的大工商业者已經向政府呈递了不少請願書，即足以向我們証实这一点，其中的一份請願書，甚至請求政府在沒有和大資本的代表商量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財政措施。这一請願書代表什么傾向呢？它不是表示专制制度的危害已經最明显地反映在各工商业公司的收入上而为它們感覺到了嗎？它不是告訴我們，从前个别企业家私人 and 部長們和各部打交道的那一套办法——各种“呈文”，“爱国主义”捐獻和公开行賄——現在已經不够和行不通，所以他們力求讓工业階級有組織地、合法地参加国家的管理嗎？波里亚科夫可能直到今天还認為他所收买的部長們比起那些負責的、立宪的部長們来要略胜一筹¹⁵⁴。但是，那些和他竞争失败了（因为他行賄、捐納）的人一定不是他那样的看法。对于某几个人有利的政治制度，对于整个企业家階級往往无利。这一階級的代表們自然不会到街上示威，不会筑街垒，甚至也不会散布秘密传单。資產階級一般是不喜欢这类“冒险的”手段的。甚至在西欧，它也只是在稀有的場合才首举义旗；資產階級大部分只是逐渐动摇它所痛恨的制度，而收获人民“对自己敌人^①的敌人^②”斗争所得的胜利果实。說到秘密的政治宣传，那末，資產階級如果不懂得分工的道理，它又算得是什么資產階級呢？它讓所謂知識分子去进行这类的事情，自己則絲毫不分心于发财以外的任务。它知道它的事業是“正当的”，為我們知識分子所开始的政治斗争迟早是为

① 指資產階級。——譯者

② 指专制制度。——譯者

它的統治开路。难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不是讓革命者为自己从火中取政治解放和統一之栗，难道它現在不是靠这些栗子所养活的嗎？

而假如革命者“夺取政权”，干起社会革命来呢？资产阶级是不相信这一点的，而且革命者自己很快也要不相信的。很快他們都会懂得，人們是在下雨的时候张伞，可是不能說，张伞就能引起下雨；他們很快会相信，“夺取”政权原是工人阶级，发展的必然后果，如同任何其他阶级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还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从特权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只要一夺取政权，就使得俄国的劳动人民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我們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很快会懂得，只有准备和组织人民去为这些利益进行独立的斗争，才能为人民利益服务。

但是沒有比我們的某些革命者相信资产阶级是軟弱无力的那种想法，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是更有利的。资产阶级自己也許准备重复他們的这种論調。它甚至只要一有机会就这样重复。試拿我們产业工人人数問題來說罢。我們的作家說，在俄国，“一亿人口中，只有八十万工人为資本所联合”；而且我国这一比較不足道的工人人数……“不是在增加，或者，甚至于(1)完全停頓在一个数字上”。我們指出“不是在增加”也正是“停頓在一个数字上面”的意义后，再看看这一信念形成的过程罢。

(二)工人人数

吉荷米洛夫先生在这里是重复了伏·伏·先生的話，后者是指出我們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停滯的第一人。在伏·伏·先生看来，資本主义的整个意义是“联合工人”；他何以要費很大的气力来証明我們的工人人数“停頓在一个数字上面”，是显然的。一旦这

一論点得到証明，也就可以証明資本主义無論在任何意义上都沒有促进俄国文化进步的能力。凡是知道資本主义的作用并不限于只是“联合工人”的人，也知道伏·伏·先生所肯定的事实即使实在，也是什么都不能証明的。但是，凡熟习現代俄国統計的人，也知道連这一事实本身也是不实在的。伏·伏·先生又是怎样証明这一事实呢？他从《欧洲导报》的一篇論文中“抄到以下一个关于俄国不負担消費稅工厂的历史的表”¹⁵⁵：

	工人人数	工厂数	产值 (单位卢布)	每一工人的生产量 (单位卢布)
1761年	7,839	200	2,122,000	約 300
1804年	95,202	2,423	26,750,000	
1842年	455,827	6,930	97,865,000	
1854年	459,637	9,444	151,985,000	約 330
1866年	393,371	16,451	342,910,000	約 870

从这些材料，伏·伏·先生得出結論，認為自 1842 年以来，換言之，即从英国准許自由輸出机器，而主要是从 1854 年以来，俄国生产开始依照他所發揮的“規律”发展，換句話說，“和資本周轉的增加同时，工人人数却在减少，生产是向深度而不是向广度扩大”^①。是这样的嗎？不完全是的。

为了寻找俄国生产发展的“規律”，应当注意整个俄国生产的情形，而不仅是其中的几部分。为什么伏·伏·先生单从“不負担消費稅的工厂”的資料来求得結論呢？关于这一点，不仅我們不知道，恐怕連这位不加批判地人云亦云的吉荷米洛夫先生也不知道。而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回答，則伏·伏·先生所找到的“規律”就和只有一只脚似的站不住。在西欧資本主义史中，也可以找到不

① 見《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第 26—27 頁。

少的“生产是向深度而不是向广度扩大”的例子。在法国，据摩罗·德·浪涅斯說，羊毛业产品总值在1811—1850年这一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四，它所用的車床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但在业人数却“减少了一万五千人”^①。难道这証明从1811年开始，法国工人人数是“停頓在一个数目上”或者甚至在减少嗎？绝对不是；在一个生产部門內他們的人数减少了，就是其他生产部門內的人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認为1850年以前的四十年期間，资本主义无疑地吸收了很大数量的工人参加生产，不过沒有給他們以适当工資。伏·伏·先生应当証明这类現象在俄国沒有发生，尤其是因为我国負担消費稅的几个生产部門正是在四十年代有了迅速的发展，所以他更应当作这样的証明。

他这样做了嗎？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所引用的数字不适于得出任何重大的結論来；例如，1842年的数字和六十年代后半的数字簡直不能相比；这些数字是由一些不同的机关用不同的方法搜集来的，所以可靠的程度也不一样。1866年以前的統計，主要是根据财政部的材料，是工厂厂主們供給的，大部分都很不精确。1861年以前，負担消費稅的工厂完全沒有算在里面。最后，只在1866年，由于中央統計委员会的努力，才得到了較精确的数字。伏·伏·先生如果不根据这些不可靠的“統計”来得出什么規律，他才是較为謹慎的。但是，姑且不說这点，他所引的数字根本和中央統計委员会的資料不符，而后者才是唯一稍稍值得信賴的資料。据这个委员会的材料，在欧俄（不算波兰王国和芬兰）的“制造业”中就业工人的总数是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七十三人。这一数字在各生产部門的分配如下：

^① 《法国工业統計》（《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de la France》），第34頁。

	工人		工人
纖維品制造业	294,866	化学工业	13,628
木材加工工业	14,639	烟草工业	26,116
畜产品加工工业	38,757	食品工业	262,026
矿产加工工业	49,332	其他工业	3,052①
金屬工业	128,058		

“这些数字謳歌什么呢”？我們用伏·伏·先生的話来发問。首先是，即使在不負担消費稅的生产部門，1866年的工人人数也比他所拿来証明他的“規律”的数字超出得多。

但是連这些数字也是不精确的，比实际的要少。《軍事統計彙編》出版者在論制造工业一章的附录中承認，“在展覽会（1870年）的指南中，和在季米里亚捷夫的表册中”，他“遇着在以前的資料中找不到的許多工厂”。以很小和极密的字排印的彙編的第913—914頁，便完全印的是这类工厂的名称。在这个新的統計表里面所提及的只是生产不低于二万五千卢布的企业，其中大部分是生产超过十万銀卢布的企业。但是連季米里亚捷夫的表册也不完全。据斯卡里柯夫斯基先生在和“許多工厂主”談話以后声称，登在这表册中的数字甚至在阿拉夫佐夫和亚历山大罗夫两位先生对之作了补充以后“还是距离实际很远”②。

而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正是从1842年起，即是从英国准許自由輸出机器的时候起，我們許多“不負担消費稅”的生产部門不論在“广度方面”和“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我們棉紡业的发展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一发展，“部分地也靠了1841年我們对进口紗提高關稅的帮助”。縱然这种进口稅于1850年被廢除了，但是当时俄国紗业的成就已經获得保証，本国紗已越来越

① 參閱《軍事統計彙編》，第4册，俄国，圣彼得堡，1871年版，第322—325頁。

② 參閱《全俄工厂主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組會議速記录》等，第37頁。

有力地排挤进口紗了。我們的棉紗业在这四十年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种革命，可以从下面的数字来加以判断：

1824—1825年	进口	74,268	普特原料
		2,400,000	普特紗
1844年	进口	590,000	普特原料
		600,000	普特紗
1867年	进口	3,394,000	普特原料
		186,804	普特紗

至于这一“革命”是1842年以后我們的资本主义工业扩张，而且也是向“广度”扩张的结果，則从我們的許多織布厂、造纸厂以及其他工厂都是新近开办的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来的。“紡紗业的发展也反映在对棉紗的进一步加工上。农民的織机开始逐渐从狭小的茅屋里迁到可以容纳十架以上織机的宽大的小作坊，在里面工作的除老板以外，还有雇工。……最后，連漂白、染色及印花等工作也完全改观。现在的真正工厂都是从这些家庭的和手工业的作坊形成的，其中有些工厂在短期間内就发展到能和外国工厂相比拟的程度”^①。在“莫斯科省工业最不发达的一个县”，克林县，据爱里斯曼先生說：“現有的小型織布厂的絕大多数都是在六十年代之末和七十年代之初創办的。巴林及馬克罗夫合办的紡紗厂（男女工人四百三十二人）成立于1840年；考林、卡普斯丁及克拉斯諾戈罗夫合办的自动織布厂（男女工人七百七十六人）成立于1849年；佛兰登的綢緞和地毯工厂（工人二百七十五人）成立于1856年；卡沙也夫的自动織布工厂（工人五百到七百人）成立于1864年。火柴业的生产是从1863年建造扎哈罗夫的第一家工厂开始的（在他的两个工厂中一共有九十個工人；在施特拉姆工厂有

^① 《軍事統計彙編》，第4册，第378頁。

六十个工人)。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已經开始了的制革业由于在斯切辛建立了几个新厂而大有扩充。說到这个县里的工厂工业在七十年代发展的情形,我們可以从下面的数字来判断,这些数字表明我們所参觀的、人所共知的 1871 年以后才建立的工厂的数字:

織布厂	16	机械厂	1
漂染厂	3	糖漿工厂	1
染色厂	3	馬鈴薯粉厂	1
皮革厂	3	火柴厂	1
鏡厂	6	化学工厂	1
木厂	1	皮靴工厂	1
繆絡工厂	1		

实际上, 1871 年以后建立的工厂, 尤其是 1870 年左右創辦的一些小織布厂, 較之在这里列举出来的要多得多。因为, 第一, 我們沒有参觀所有的小厂, 所以一点也說不出它們开办的年月; 第二, 即使在我們参觀过的工厂中, 我們不是总能得到关于它們成立年月的精确材料。

此外, 还应指出, 即在現在(1880 年), 在克林县还正在建立新的工厂。例如, 卡沙也夫公司就在建立紡紗厂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扎哈罗夫在克林县城建造了一个新的火柴厂; 在特罗依茨乡削金村出現了一家新的制篩厂, 属于农民尼克佛尔·巴夫洛夫所有; 在莫斯科—彼得堡鉄路上的扎維多夫車站的机器鋸木厂也扩大了生产; 最后, 在日山車站也建立了一个制造車輪用油的弗里希馬克工厂”①。

从莫斯科省工业最不发达的一县的經濟生活中所引来的这些

① 爱里斯曼:《克林县工厂調查》, 莫斯科, 1881年版, 第7—8頁。《莫斯科省統計材料彙編》, 《卫生統計部分》, 第3卷, 第1册。

事实“謳歌什么呢”？这絕不是說，工厂工人人数是“停頓在一个数字上”。这些事实首先謳歌的，是我们的独特論的作家們未免过分地用他們的特殊方法来証明俄国的特殊了。这是就一般而言，他們还向吉荷米洛夫先生說明，他的綱領的基础是对我們現代工业状况的过于肤淺的了解。吉荷米洛夫先生如果真以为我們的“工厂工人的人数不超过八十万”，他就大錯特錯了。照官方的材料，欧俄的（自然不算波兰王国）这种数字是真的“不超过”吉荷米洛夫先生所指出的数字的：1879年，它等于七十一万一千零九十七人，可是这里并不包括釀酒工厂的工人。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又忘記了这一“数字”仅指制造工业而言，完全沒有算上矿业工人。就在1879年，采矿工业的工人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五十九人，次年（1880年），这一数字又几乎增加了一万。总計起来是一百万零三千一百四十三人。但是可否承認这一数字就很接近实际呢？不要忘記，这是官方的数字，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所搜集的，而它們自己就嘲笑地称呼它为“衙門的数字”。我們已經知道，《軍事統計彙編》的出版者就指出过，这样得来的数字“大部分是不完全，而且比实际的数字要少”。在1870年5月29日“全俄工厂主以及有关祖国工业人員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三組會議上，有人曾經指出，“現在完全靠地方警察填写定期的报告表来搜集关于工业統計材料的方法是令人不滿意到极点的”，而这样搜集得来的統計数字要比实际的数字小得多。依照伊林的意見，“我們沒有工业的，也沒有商业的統計，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①。統計的这样不完全和不精确，即在現在仍然是一桩不可爭辯的事实。在已經引过的爱里斯曼的調查的第6頁上，我們讀到，据他所搜集的材料，“真实的工人人数要

^① 參閱《全俄工厂主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組會議速記》，第47、54頁。

比县警察局的报告表上所填写的多出一倍”。据他說，这“主要是由于工厂主在官方向他們調查厂中人数的时候，几乎总是把人数說得比实际的少得多”。有什么理由相信，在作更精确的統計調查时，我們在俄国别的省县不会遇着同样的情形呢？而假使是会遇到，那末，工厂工人的总数应当增加几乎“一倍”。这一假定并不怎样夸张，是可以从上面所說的“工厂主代表大会”中所进行的討論看出来的。据布申先生說，有些工厂主“对他坦白地承認，他們把实际情况說少一半”。俄国一家最大公司的代表摩罗佐夫先生說：“当警察来搜集材料时，大工厂主就囑咐屬員：填写象去年一样的数字；因之十年来警察所得到的一件和一件，一年和一年的相比，都是一些相同的材料，而实际上不論制品的数量和工人的人数都是在不断改变的。官僚們的报告总說，人家不告訴他們实情，他們不知道实情”。据栖罗姆亚特尼柯夫說：“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少报一半的，并不是小生产者，而是很大的生产者，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有时候所陈报的只有实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十分可靠的事实。”請讀者不要忘記，所有这些揭发都出自工厂主本人，而象这样的把戏，在他們看来总是一个“微妙的问题”。这些材料的不确实是事先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如果有些作家不仅根据这些材料来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論，甚至在工厂主們亲自向他們解释这一現象的很簡單的原因以后，而仍繼續地說，“工厂工人的人数是停頓在一个数字上”，关于这些作家，我們又当有何感想呢？說好一点我們应当承認这些作家是不懂得他們所談的事情的！

但是工厂主們为什么要玩这种滑头呢？布申回答說，“大部分是由于害怕加稅加捐而有意說謊。……有些人坦白地說，有些地方自治机关是按照車床、工人等等的数目的比例来抽稅的，因此，少报就有直接的好处”。当統計調查員到厂里来的时候，“工厂主就

說，他們大概是地方自治机关派来的罢，一定是想按照工人的人数来加什么稅，于是吩咐将工人少报一半”^①。

由此，显而易见，我們的革命者以为俄国资产阶级在經濟上是軟弱无力的信念，对资产阶级是多么有利。我們的“私人企业家”因害怕所得稅，害怕任何其他侵犯他們資本的办法，力求隱藏自己生产的真实規模。我們的革命者十分天真地相信他們的叹息和訴苦是真的；一点也不怀疑他們所提資料的精确性；根据这些資料而臆造出“俄国国内的實力对比”的整套理論来，而在我們的青年中間，传播关于剝削俄国人民的各种形式的錯誤認識。我們的革命者就这样不自覺地为“原始积累的騎士們”和資本主义的生产效劳。

不过，如果責备《民意导报》故意传播这样的錯誤認識，就不免有失公平。該报的主要錯誤在于它經常自相矛盾，如福音上所說的，他的右手不知道他的左手干的事情。吉荷米洛夫先生使讀者相信，俄国的“工业是勉强勉强地在发展”。而在《民意导报》同期（第2期）上所載《根据亲自观察》撰写的《烏拉尔矿工和工厂工人狀況》的一篇論文中，我們却遇到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見。这篇文章的作者“相信”，如果他的讀者什么时候能看見“在我們俄国，靠我們工人能自己制造各种火車头、播种机、风車等等大机器”时，他們，即《民意导报》讀者中間很多的人一定会惊叹地說：“怎么呀！！說来鬼也不信！俄国是大踏步地在前进着！說起来，昨天在这方面，俄国不仅什么也做不好，甚至做得稍为象样都不会。……五十年前，据我們計算，全俄不过只有十个工厂，而現在呢，現在单一个烏拉尔鉄工厂就几乎有二百；而在彼得堡、莫斯科等等地方究竟还有多少呢？只要給我們自由，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有了自由以后，在

^① 参閱《全俄工厂主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組會議速記录》，第21頁。

随便哪个十——十五年内，我們的工厂就会增加一倍，生产和技术都会大大改善”^①等等。这篇文章的作者以为这一有点拉得太长的“惊叹号”是“真实地”表现了实际情形的。据他說——而他的話，我們知道，是根据“亲自的觀察”的——我們“在最近的时候，在这方面（即在工业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工厂数目在不断增加，技术也在改善（这就是所謂“勉勉强强地在发展”吧！）。从我們最近一次展覽会¹⁵⁶可以看出，我們有些金屬工厂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头等工厂并駕齐驅”^②。且讓我們研究一下这种混乱說法！我們究竟相信誰呢？是相信吉荷米洛夫先生，还是相信對我們的工业发展“亲自觀察”过的人呢？末了，我們要指出，当这位亲自觀察过的人“不得不讀一讀”“我們的某一学者或非学者的作家”并非憑亲自觀察所写的“关于我們工人状况的那些論文时，那末，它們除了引起他的苦笑以外”，恐怕“不会引起別的反应”罢。我想象到他讀了吉荷米洛夫先生說我們工业是在“勉勉强强地”发展的話以后所发出来的諷刺的笑声！

但是我們且丢开《民意导报》的經濟矛盾，再回头來談吉荷米洛夫先生：因為我們現在對於局部比對於全体更感兴趣一些。

我們已對我們的作者指出过，他所提供的資料甚至也和“官方統計”不合。此外，我們引証了一些資料，使得我們有根據相信这一“官方統計”本身也是不合实际的。現在我們要告訴他，他對於在他手上的不正確統計數字也簡直不会处理，因為他所运用的是一些完全不能互相比較的數字。据他說，在“我国一亿居民中只有八十万工人為資本所联合”——这是對於我国工业極為不利的一个比例。但是一亿的數字（更精確些說，是一亿零一百三十四万二

① 不待說，我們對於引文修辭的奧妙是不負責任的。

② 《民意导报》第2期，第155—156頁。

千二百四十二人)是表示全帝国的人口,换言之,不仅包括欧俄的(七千六百五十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五人),而且包括波兰王国的(七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人),芬兰的(二百零六万七百八十二人),高加索(喀拉及巴統两省在内)的(六百二十五万四千九百六十六人),西伯利亚的(三百九十六万五千一百九十二人),中亚细亚的(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四人)居民在内。吉荷米洛夫先生所引用的工人人数系根据警察局统计,这一统计又只限于欧俄,而且是完全指的“制造工业”。关于这种比较统计调查法,我们又有什么话可说呢?

(三)家庭手工业者

但是还不止此。他引用的数字是指那些为“资本所联合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一类的工人。他知道这一类工人的人数比真正工厂工人人数的大概数字要多得多吗?有一大批手工业者几乎完全丧失了独立,为资本家很成功地“联合”起来,也是处于这样的从属地位。1871年出版的“军事统计彙編”已经指出这种情形。对于这种情形,更近的调查也完全予以证实。例如,普鲁加文先生告诉我们:“在一个莫斯科省,家庭手工织布工人就达五万人。然而从莫斯科省的广大织布区携有出品参加展览会的一共只有十二个家庭手工业者……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绝大多数家庭手工织布工人不是为自己而劳动,而是替那些比较大一点的老板们劳动,后者把生产的原料分给农民,让他们在家中工作。总之,在织布业中是家庭大生产的制度很普遍”^①。在弗拉基米尔省,“种类异常复杂的”家庭手工织布业在该省人民的经济

^① 普鲁加文:《参加1882年展览会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版,第9页。

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亚历山大罗夫县的一个先前的阿帕林乡，单是“从事羊毛业生产的，就有二十二村，在其中工作的工人有一千二百九十六名”。家庭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出品每年值十五万五千卢布。难道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多完全不依赖资产阶级吗？不幸，并非这样。“我们考察这一业的经济时，首先遇到的事实是大批家庭手工业者已经失去独立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地位，而是替师傅或工厂主工作的”。在这方面的形势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独立的家庭手工业工人比从属的工人收入要多百分之五十的染料生产中，为自己劳动的生产者人数，只占全体家庭手工业者人数百分之九”^①。

羊毛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走上资本主义“自然运动的道路”，可以从这一业的“经济”本身以及从它在农民中间造成的不平等看出来。“随着羊毛业从完全停滞到战时活跃的急剧转变，使得他们（家庭手工业者），至少是那些较大的生产者，懂得了工业投机，懂得投机的一切好处，懂得很快的发财和更快的破产……发财的厂主^②首先就忙着建造每层九个到十五个窗户的大房子。在科里泽夫村就有一半是这样的房子。在阿帕林一区，要是看见一所石头房子或是一所大一点的房子，你就可以断定这里住的就是师傅—厂主。”^③

在弗拉基米尔省，棉织业最发达。“在波克洛夫一县，就有七千多台织布机工作，每年产值二百五十万卢布。在亚历山大罗夫县，从事织布业的有一百二十个村子，织布机在三千台以上。”就是在这里也暴露了上述的家庭手工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制的过

① 普鲁加文：《参加1882年展览会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版，第10页。

② 请注意，他们都是出身农民。

③ 普鲁加文：《参加1882年展览会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年版，第11页。

程。普魯加文說：“研究这一业由小家庭手工业生产形式逐渐过渡到大的自动織布机的生产形式，是很有意思的。在这两种生产的經濟形态中間存在着許多种过渡形态；現在來談它們，就等于对家庭手工織布业資本主义化的逐步过程加以考察。例如，在波克洛夫县，我們在織布业方面就遇見有各种形式的生产单位。直到現在，在农民家中进行手工业的这一形式还很普遍。目前在波克洛夫县，在家里面进行生产的織布机有四千九百零三台，在自动織布厂的織布机有三千二百台。过渡的一級是小作坊，共有織布机二千三百三十台，由拥有六台至十台織布机的小作坊到拥有織布机达一百至一百以上的真正工厂規模的作坊不等。在这些手工业的大作坊里面，織工对厂主的从屬性表現得更加鮮明，在里面工作的手工业者比較在小生产单位的工人所賺的純工資要少，工作条件也較坏。再进一步，我們就到了自动織布机生产的領域，在这里，手工織布工人已最后变成了真正的工人。在波克洛夫县，大作坊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其中一部分在最近已經过渡到采用自动織布机。小的独立手工业織布工人人数已經很少了。在亚历山大罗夫县已經完全沒有。在波克洛夫县，他們的人数已不过五十人。虽然大作坊和小作坊在實質上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然而这些作坊的規模之大以及不断增加，無疑地指出了棉織业的純粹手工业生产形式已傾向于、而且事实上也是逐漸接近于大工厂形式，即国民劳动的資本主义組織形式。”^①

現在我們再来看看同是弗拉基米尔省的別几个县的情形。

同是这位普魯加文先生在另一著作中有下面的一段話：“尤列也夫县棉織业的經營組織，一般地說，和我們在亚历山大罗夫县和

^① 普魯加文，《參加 1882 年展覽会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882 年版，第 13 頁。

波克洛夫县所看到的很相象。正和我們在上面考察过的两县一样，棉織业的經濟条件在这里也采取了家庭大生产制形式……尤列也夫县所生产的全部棉織品百分之九八点九五^①是家庭大生产制度的出品，只有百分之一一点零五的份額是屬於“……，你以为是独立手工业者嗎？不是的，“是屬於独立的小工厂主”^①。

一般說来，在弗拉基米尔省整个西北部，“紡織工厂几乎雇用了全体自由工人，这里的人口几乎全变成工厂工人了。小的手工业生产在这里不过是曾經盛行的家庭手工业的最后残余。自然，由于事实上这一边区的农民还拥有土地，所以他們还保存得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在那些土地肥沃的地方，但是他們之隶属于資本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沒有家的工厂工人。許多純手工业者，虽然表面看来在生产中是独立的，但是完全依靠着包买商，这些人實質上也是定貨工厂主，只是沒有公司牌号而已”^②。

在苏伊的棉織业区，早在六十年代之末和七十年代之初，“由于开办了新的机械織布厂，农村人口很快就集中到了大工厂里来，变成了純粹的工厂工人阶级。这样，农村的織布工人的劳动，终于失去了从前在那又矮又臭、摆着許多織布机而又挤滿了老老少少的男女工人的‘小作坊’棚舍里独立劳动的最后影子”^③。

如果以为上述事实只发生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那就錯了。在雅罗斯拉夫尔省的情形也完全一样。斯图根伯尔格在他

① 尤列也夫县的織布机总数为五千六百九十台，其中有五千六百三十台是替大老板进行生产的，替小工厂主工作的有六十台。剩下多少屬於独立生产者呢？参閱《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的乡村公社、手工业和农业》，莫斯科，1884年版，第60—61頁。

② 参閱《俄罗斯帝国統計杂志》，第3册，《俄国手工业及手工劳动研究資料》，圣彼得堡，1872年版，第198頁。

③ 同上書，第200頁。

的“雅罗斯拉夫尔省素描”^①中說到維里柯伊村織布工人的情形。据他計算，他們有一万人，都是独立生产者。他这書是根据杰尔所搜集的有关四十年代的資料写的。那时候以及“1850年以前維里柯伊村的麻布生产純粹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的性質。每一农家都是一个麻布工厂。但是到1850年，这村里的农民拉卡洛夫装置了織布机，开始从都拉省买紗，把一部分分給农民去織布。后来有許多人模仿拉卡洛夫，这样就有許多的麻布工厂开办起来。維里柯伊村的工厂每年除了把自己的紗分配給农民以外，还把科斯特羅馬省的和弗拉基米尔省的紗分配給农民，共达三万普特之多。1867年单在維里柯伊一村，农民所制麻布就有十万匹。……以前在維里柯伊村从事麻布生产的几乎都是妇女，但到了現在，由于采用了自动梭（改良織布机），織布业几乎完全成了男子和十岁以上兒童的职业了”^②。最后的这一变化，意味着在农民家庭成員中間分配职业的时候，織布业已經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而这也是实在的。紡麻和織麻現在是“圍繞着維里柯伊村地区农民的主要工艺”。工厂在农民的家庭手工織布业中所占的地位如何，下面的情形就足以說明：“随着当地发展了麻紡和整麻的工厂以及設立了用化学方法漂白麻布的工厂以来，亚麻工业就一年年地在发展”^③。

在科斯特羅馬省，不論过去和現在，“男女农民都是靠”紡麻、織麻“来掙工資，尤其在肯涅色姆、涅列荷特、科斯特羅馬、优列維茨这几个县的乡村是如此”。但是即在这些地方，不幸的是“随着麻紡工厂发达，用家庭所紡麻紗来制造麻織品几乎完全絕迹了，农民

① 《斯图根伯尔格統計文集》，第10篇，《雅罗斯拉夫尔省素描》，圣彼得堡，1858年版。

② 參閱《俄罗斯帝国統計杂志》，第3册，第149—150頁。

③ 參閱《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员会報告書》，附录一，第2部，第166頁。

們認為要想和工厂所紡的紗來競爭，簡直不可能，他們只有把麻制作得更精細點拿出去賣，不再紡成土麻紗，也不自己織麻布了。”

不要忘記，家庭織布有時候可以使一家農民全家在一年之內有九個月，即一年的四分之三的時間有工作。現在，“隨着採用自動織布機和用機器紡紗，手工織布和用手工上漿的工作比以前已經減少了一半以上”。那末這一家的勞動力用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用到的地方是很明白的。“農民都寧願到最近的工廠去工作而不願在自己家裡織布”^①。

卡盧加省的幾種手工業生產部門好象出乎我們所指出的通例。該省農民所辦的織布廠居然在競爭中戰勝了商人所辦的大工廠。例如，緞帶和錠帶的生產，“由於馬流金在1804年在馬洛雅羅斯拉夫縣開辦了一個棉織錠帶工廠就開始了，那年的生產值二萬盧布，而到1820年，由於裝置了羅舍式織機，一個工人在它上面可以一下子織五十條帶子，竟達十四萬盧布。但是當附近農民所辦的織布廠也裝置這樣的機器時候，馬流金工廠的生產在1860年就落到了兩萬四千盧布，最後這家工廠就完全倒閉了。”我們的獨特論者由此得出結論，說俄國的家庭手工業不怕資本家的競爭。但是這樣的結論正和他們建立某種經濟“規律”的另一一些企圖是一樣輕率的。第一，即使獨立的手工生產者真戰勝了馬流金工廠，那末，我們還須證明這一勝利能長期地維持下去。該省的手工織布業更令人懷疑這樣的一個前途。1830年在谷賓的莊園上所開辦的第一所織布廠也不能支持鄉下生產者的競爭，手工業一直繁榮到1858年。但是“從這時候起，機械自動織布機工廠開辦了，它們有蒸汽發動機，開始排擠手工織布的勞動了。例如在梅丁縣，從前有一

^① 參閱《欽命調查農業現狀委員會報告書》，附錄一，第2部，第170—171頁。

万五千台手搖机在进行生产，而現在只有三千台了”^①。誰能對我們担保，在錠帶和縲帶生产方面，技术上新的改良不会使大資本家重占优势呢？須知工业进步的結果，必然是不变資本的相对增长，极端威胁着小生产者的生存。再則，如果以为在我們上面所說的場合，竞争的两方面是独立生产者和資本家，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錯誤。谷宾工厂的倒閉并不是独立生产者和它竞争的結果，而是“农家開設的小織布作坊”和它竞争的結果，因为它們馬上也降低了“工厂的計件工資”。竞争是在大資本和小資本中間进行，后者的胜利是靠对工人增加剝削得来。在縲帶、錠帶的生产中，情形也是这样。罗舍式織机是掌握在“师傅們”的手里，而不是在独立的家庭手工业者手里。織布工人、縲帶工人、錠帶工人連点独立性的影子也越来越沒有了，因为他们只能在当地工厂主和“师傅”之間有所选择，“这些‘师傅’們从莫斯科的工厂主那里拿来經紗，在自己的家庭工厂中，論俄尺計酬来織布，或者将經紗分給农民織布，織好以后就把成品送給工厂主”。这些师傅中有許多人自行經營着相当大的事业，而且也变成了真正的“工厂主”。在馬洛雅罗斯拉夫县有两个“手工棉織厂”，雇佣的工人就有四十名；在奧夫欽宁乡，涅桀林乡有农民办的五个棉織錠帶厂，有机器一百四十五台，工人一百六十三名；在奧夫欽宁乡有一家棉織縲帶厂，有机器七台，工人八名，諸如此类^②。在莫斯科省的“手工”錦緞业中，有“周轉金以十万卢布計的农民办的錦緞工厂”^③。

事实和“这些数字說明什么呢”？它們使普魯加文确信“手工織布业命定地，虽然也是緩慢地，在轉变为大生产形式”。但是这

① 《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员会报告書》，第2部，第158—159頁。

② 同上。

③ 《俄罗斯帝国統計杂志》，第3册，第308頁。

个結論是否只限于一个織布业呢？看吧！有不少其他部門的手工业生产，里面的过程都是同样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

就拿弗拉基米尔省亚历山大罗夫县的制鞋业來說罢。在这一业“生产中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占相当大的数額，以及小作坊的作用微不足道，大工厂中实行的严密的分工和流动資本总額中用在購買劳动力上的开支很小——这一切都极其明显地証明現在的生产是已由专门手艺的阶段过渡到工厂手工业的阶段了”^①。

又如手工制革匠的“人数是越来越减少了”，减少的原因是大工厂方面的竞争。“无论在物質的和技术的条件上，工厂都比較优越一些，因之它們的出品比手工业的就要好些和便宜些。无可怀疑，手工制革匠很难支持住工厂生产的竞争，因为后者更能滿足时代的要求”。

最后是馬鈴薯淀粉和糖漿的生产。在莫斯科省“这种手工业集中在四十三个村子里面，有一百三十个作坊，其中有一百一十七个是淀粉作坊，有十三个是糖漿作坊。在这里还没有如我們在織布区所見到的那种大工厂，但是手工业生产在这里也开始带有資本主义的性質。在这一业里面，雇佣劳动的作用頗为显著：例如所有作坊中有百分之二九点八的劳动力就完全是雇佣劳动，在百分之五九点七的作坊里雇佣劳动和老板的家庭成員^②一齐参加生产，只有百分之十的作坊才几乎完全没有雇佣工人。雇佣劳动占优势的原因是由于这一业需要相当大的固定資本，是多数农民担負不起的”。

① 普魯加文：《參加 1882 年展覽会的手工业者》，第 28 頁。

② 关于在这些老板的家庭里的工人生活情况，爱里斯曼說道：“我們問鏡子作坊的小老板，他是否也做在玻璃上擦水銀的工作，他的回答是：‘不，我們不干損害自己的事情’。”（爱里斯曼：《克林县工厂調查》，第 200 頁）

诺夫戈罗德省、特维尔省的打铁业和在农民生活中稍占重要地位的其他一切省份的打铁业，以及尼惹戈罗德省所有金属业小生产，都表明生产者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任何独立^①。家庭手工业者在这里还不怎么感到大工业资本的竞争，但是已经深切地感到了他们自己的农民兄弟或商人的剥削，因为生产者须从这些人手中领取原料，并且将成品交给他们。

在尼惹戈罗德省“有不少这样的地方，整个的社会阶层都靠手工业生产生活，而且就生活条件说，和工厂工人很少区别。这就是巴夫洛福、福尔斯马、波哥罗德、里斯科福等几个有名的村子，和谢阔诺夫、巴拉赫宁两个县里面的几个乡和村的情形”^②。这里的工人没有为资本所“联合”，但是他们无疑地都为资本所奴役，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非正规军。他们之列入正规军只是时间问题和老板的算盘问题。

手工业工人现在的情形是很不稳定的，他们所感到的丧失独立的威胁，往往完全是由于生产方式改善的结果。例如，一个手工工人柯斯梯里科夫发明了四个机器来生产梳子。这些机器能大大增加劳动生产率，而且机器卖得也并不很贵。然而普鲁加文先生真正担心这些机器，“将在梳子生产的经济组织方面产生颇为巨大的变化”，这当然是指破坏生产者的独立而言。普鲁加文先生以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当去帮助制梳工人，使得机器能为他们集体所有”。能这样做，自然很好，但是问题就在于真的会这样做吗？如所周知，现在当权的人很少同情“集体主义原则”，而我们也绝不知道同情这些原则的人是否很快会在我国当权，例如，将奠定“俄国社

① 参阅前引《报告书》中关于诺夫戈罗德省切列波维茨克县乌洛姆乡打铁业的论文。

② 《俄罗斯帝国统计杂志》，第3册，第83页。

会主义組織始基”的“民意党”是否很快会当权。而当这个政党专门在空谈夺取政权的时候，事情是只能变得更坏的；今天本是候补无产者的一些人，明天就将完全变成无产者了。难道可以在研究现在俄国经济关系的时候忽视这一事实吗？我国的手工业工人有好几百万，手工业的部门有几部分是已经过渡到，有的是正在过渡到家庭大生产制度。根据早在1864年所搜集的材料，“在乡村中为工厂主把紗織成布的工人（只是这一类的工人！）大约有35万”。在这以后，却說我們的工人人数不超过八十万，这只是靠衙門里的書記、警察局长和区警察所长等人的統計来研究俄国罢了。

（四）家庭手工业和农业

直到現在，我們的家庭手工业者还是农民。但这是哪些农民呢！在許多地方，手工业生产已由所謂副业变成了农民的主要收入項目。这使农业处于依賴的、从屬的地位。我們工业的一切波动，它的发展中的一切变动都反映在农业上。就是这位普魯加文先生也說，弗拉基米尔省織布工人的“农民經濟的瓦解”是我們工业危机的必然后果。由于农业这样依賴工业劳动，无須什么預言家就可料到織布工人的农民經濟最后崩潰的时期；它和“家庭大生产制”过渡到工厂制度是同时的。先前的手工业者今后必須把他的职业丢掉一种，才不致两种都被剝夺。他自然願意丢掉土地，因为在俄国的工业地带靠种地絕不能偿付由于有土地而发生的种种租稅。农民放弃农业的事現在已經屢見不鮮了。

据伊沙也夫先生說，上面說到的維里柯伊村“早已不是一个农村了。全村七百家农戶中只有十至十五戶还在种地，多数連木犁都沒有，甚至鐮刀也沒有……这十至十五个农戶主和附近諸村的农民承租維里柯伊村所有的公地，耕地一俄亩租金一卢布（我們順

便指出：由于‘地租’这样高昂，完全放弃土地也是不难的）。农业生产是低落的，畜牧的情况也同样很坏：几乎三户人家才有一头牛和一匹马……維里柯伊村的村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面貌了”。

难道只在維里柯伊一村，我們可以看到农民丧失自己面貌的过程嗎？《軍事統計彙編》曾指出手工棉織业“在許多地方是副业，但是也有些地方是主要的职业，甚至是唯一的职业”的这一事实^①。普魯加文先生告訴我們，同样，“制鞋业現在也是基姆尔农民的主要生活手段，把农业推到了次要的地位。在基姆尔区，荒蕪的田地之多引起了調查員的注意；农业的衰落清楚地印入了眼帘。”普魯加文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民粹派，他安慰自己說：“这不应当怪手工业本身，而应当怪那些农业劳动者所遭遇的不利的处境”，而且多数手工业者“还没有最后丢掉土地”。但是，第一，已經引过的《欽命調查农业现状委员会报告書》正和普魯加文先生相反，指出基姆尔区的多数农民都已最后“丢掉土地”^②。而且第二，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說的也是很可怀疑的自慰。不管农业衰落是誰引起的和什么原因引起的，它总是一个存在的事实，由于这一事实，許多手工业者能很快完全地掙脫“土地权力”的支配。自然，現在如果把农业安置在較好的条件中，还可以延緩这一过程。但是这里又发生一个问题——誰来把它安置在这些条件中呢？现在的政府嗎？它不願意。靠革命党嗎？它还不能。而在太阳出来之前，露水是会損害眼睛的，在我們革命者有力量实现自己的改革計劃之前，許多地方的农业只剩下回忆了。

^① 《軍事統計彙編》，第384頁。

^② “这个村全体农户和无地农户共为六百七十戶，务农者只有七十家，耕种屬於这个村所有的土地”（他們已經不制皮鞋了）。《报告書》第2部，第153頁。这些材料都是由“基姆尔乡的乡长和农民”供給的。

农业的衰落和农民村社旧“基础”的瓦解是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必然后果。这里自然是指的在現在现实的条件之下，而不是指在我們的馬尼洛夫^①們所借以自慰、而誰也不知道何时到来的那些可能的条件之下来說的。例如，在莫斯科省，由于“（手工业者）和莫斯科商业界常常交往的結果，习惯法上的一些关系就被破坏了。村社对于家庭分田的事情完全不管，而是由乡长或乡法庭‘依法’批准，父亲則用遺囑把一家的田地分給小孩子们……丈夫死后沒有兒子的寡妇是沒有权利承繼丈夫的不动产的（房屋），該把它讓給男家的亲屬，寡妇自己只能得到七分之一”^②。手工业在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以后，怎样去破坏农业，从淀粉和糖浆的生产的例子就可看出。“在該手工业区有一桩可注意的事实，就是农户之間的份地分配得极不平衡。例如在布朗尼茨县的齐宾諾村，划分給一百六十六家农户的全部土地百分之四四·五都到了只十八个从农民出身的工厂主手中，其中每户所分以人口計算的份地为一〇·七，而五十二家光景好的农户一共只有一百七十二份按人口計算的份地，即每户只有三点三份地。很明显的，手工业的收入越增加……工厂主就越想把更多的土地攫取到自己手里来，那些現在雇人耕种自己份地的三十五家农户，等到地租一提高，很可能发觉不耕自己的份地而把它轉讓給工厂主更为有利。在其他村子里，只要淀粉和糖浆手工业多少有些发展，也会遇着完全同样的情形。”

（五）家庭手工业者和工厂

但是，我們已經講得够多了，我們并不是要写俄国家庭手工业的調查。我們只想指出那些不可爭辯的、不可抹杀的事实来証明我

① 馬尼洛夫是果戈里小說《死魂灵》中的人物，以一味癡心妄想出名。——譯者

② 普魯加文：《參加 1882 年展覽會的手工业者》。

們国民經济的过渡状态。当一些以保卫人民利益为自己一生主要任务的人閉着眼睛不看有最重要意义的現象的时候，資本主义却走着自己的路，繼續打击独立生产者，使得他們連自己不稳固的地位也保持不住，用它“在西方”实行得最有效驗的同样办法来在俄国創造工人的队伍。“在旧自耕农民遭受剝夺而与他們的生产資料分离时，又有农村副业的破坏，有工厂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相并行。可是真正的工厂手工业时期，还没有引起任何彻底的改革。我們要記住，工厂手工业是漸漸掌握了国民的生产。城市的手工业与农村的家庭副业是它的基础。如果它在某些地点，在某些生产部門中，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的話，那末它会使它們在其他地方生存，因为它需要它們在原料上加工……因此它創造了一个新的农村小生产者階級，他們以农业为副业，以工业劳动为主业，而把生产物直接或經過商人的手卖給工厂手工业者……只是拥有机器的大工业才給予資本主义的农业以稳固的基础，才彻底把大量的农民剝夺，才完成农业与农村家庭工业的分离。”^①我們現在正經歷着这个工厂手工业逐漸普及在我們全国工业里面的过程。正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喚起”了許多小手工业部門或至少使它們暫時活跃起来，于是伏·伏·先生及其伙伴們似乎能成功地証明我国沒有发生“家庭手工业的資本化”^②。手工业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得的工資是微不足道的，这現象就延緩了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轉变。可是无论如何，这一現象以及其无疑的后果都不能算是什么特殊的发展。“通过妇女劳动及未成年人劳动的单純的濫用，通过一切正常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单純的盜掠，而使劳动力变得便宜，終久会碰到不能再跨过去的自然限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① 《資本論》(《Das Kapital》)，第2卷，第779—780頁(參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945—946頁)。

起来的商品便宜化过程，和一般資本主义的剝削是相同的。达到这一点，……采用机器的时候就到了，分散的家内劳动(或手工制造业)急遽轉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候就到了。”^③ 我們已經看見在雪伊棉織业区的几县，这一时候是已經到了。在别的工业区它亦将迅速到来。把工作分到“家里作”，只有在工业劳动是手工业者的副业劳动时对于资本家才是有利的。农业方面的收入，使得工作者能满足于从副业劳动賺得的低得令人不能相信的工资。但是，只要这种收入一旦停止，只要工业劳动最后把农业劳动排挤掉，资本家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大家都公認的工人最低需要的水平上。那时候，他就觉得在工厂剝削工人是更有利的，因为工厂工人劳动的集体性足以提高劳动的生产率。那时候，大机器工业的时代也就到来。

如所周知，棉紡和棉織生产是现代資本主义工业最先进的部門。此所以在某些其他生产部門中还刚开始或甚至还完全没有开始的过程，在紡織生产部門几乎可說是已經完成了。同时，在最完善的工业部門中所发生的現象，可以而且必須認为对于其他部門是預告性的。昨天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今天、明天或者最近的将来

② 这一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凡是了解家庭大生产制度实質的人都是懂得的。我們可以隨便举几件事来加以說明。“印花布厂主普遍都是接受旁人的訂貨，替别人的布印花，或者买了紗来分給各地去織好布以后，再在自己的布上印花”。印花布厂主的业务如果順利，一定要把紗多“分給各地”去織，因此也就发展了小的手工业。手工棉織业生产在許多商人資本家的参加下，达到了广泛的发展，他們买好棉紗，或者在自己的作坊做好經綫以后发給織布工人，或者不做好經綫即交給師傅，这些专做經綫和把棉紗分給农村去織的師傅，就是资本家和織布工人之間的中間人。(《軍事統計彙編》，第4册，第381、384—385頁)。“薩瓦·摩洛佐夫公司”雇用长工一万八千三百一十人，此外还有“厂外”工人七千四百九十人，这些“厂外”工人正是靠大工业方能生存的手工业者。象这样一类的事实，其中的資本主义关系是最明确不过的，可是民粹派却高兴到忘記了政治經濟学中最簡單的真理。

③ 《資本論》，第493—494頁(參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575頁)。

在这里也可能发生^①。

（六）俄国资本主义的成就

吉荷米洛夫先生不承认俄国资本主义有什么成就。我们也准备对我国的资产阶级说：“要做什么，就请赶快做罢”。但是“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资产阶级是不要别人催促的。伊沙也夫还在批评俄国《国家社会主义者》一书的时候，曾唤起读者对我们制造工业的注意¹⁵⁷。依照他的意见，对于那以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好象是可悲的、因而过早地表示高兴的人们，不久以前举行的全俄展览会便是最好的回答。他说：“只要看看纤维生产的部门，就可知道其中出产以百万卢布计的工厂已不在少数。单就麻的纺织这一项来说，我们有不少工厂每年的生产就有一百万——一百五十万卢布。而棉纺织业的出产，一百万是完全不足道的数字。且尼洛夫制造厂每年出产一百五十万；古布涅尔厂三百万；卡勒特尼科夫公司五百五十万；巴朗诺夫的两个公司一千一百万；雅罗斯拉夫尔制造公司六百万；普罗何洛夫公司七百万；克伦荷姆制造厂达一千万等等。某些糖厂也是年产五、六、八百万卢布的大生产。甚至烟草业里面也有百万富翁为自己的代表……而1878—1882年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俄土战争的一年曾经动摇的生产，有了大规模的扩张”。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事实使得伊沙也夫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是不停地在发展着的”^②。而且不只是伊沙也夫先生一人持这种观点。最近一次的全俄展览会使得别佐布拉佐夫先生也相信我国工业“在过去十年间（从1870年彼得堡

^① [1905年加注] 后来我的这些思想为杜岡—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某些研究中发挥得不坏。

^② 《有关经济书籍的消息》，载《法学导报》，1883年1月，第102页。

的展覽會算起)有顯著的進步;比起二十五年前的情況來,我們的工業(尤其是工廠手工業)的這一進步是大得驚人的,我們的工業在許多方面都不可辨認了……隨着我們的出品在品質上的改良,還應指出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們工業所有各部門的巨大擴張。這一擴張在最近十年,即是因農奴制廢除和對土戰爭所引起的危機完結以後的十年中,是特別顯著的。為了明白這點,只要比較一下我國工廠主的貨品表和我國財政部最近公布的官方統計材料就夠了。這項統計是關於1877年的。比較1877年和1882年製造業出品的數字(1882年數字是根據貨品表),就可看出在這五年間出品的急劇增加;在許多大企業里它增加了一倍^①。有很多工廠是在這五年內建立的。製造纖維質物品(絲綢、呢絨、麻布、棉布)的工業占第一位。我國的棉織業已有巨大的發展,其中有些出品可以和歐洲最完美的出品並列^②。學者們的這些結論也為我們上面所引《民意導報》的那位通訊員親自看見的大生產在我国的“巨大進步”的事實完全証實了。最後,過去和現在報導俄國情況的許多外國人也是這樣說的。他們拿我國工業中的幾個部門和西歐的工業部門相提並論。愛·德·摩林納里曾說,我們的糖的生產居《au premier rang de l'industrie de l'Europe》(《歐洲工業的第一位》)^③。1877年,俄國的塊糖甚至出現在國外的市場(正是在法國的市場)上。除了這些事實以外,外國的生產資本正力求向我國輸

① 在比較時自然應當注意到上述我國官方統計的不精確和不完全之處,而1877年的生產量即是根據這一統計決定的。但是,一般說來,別佐布拉佐夫的結論也為他親眼所見的事實所証實。他說:“我在莫斯科工業區旅行時,即能斷定我們製造業的這種增加”。

② 《法國經濟學家》(《Economiste français》),1882年8月26日,別佐布拉佐夫的《俄國通信》(《Lettres de Russie》)。

③ 參閱《經濟雜誌》(《Journal des Economistes》),1883年7月,《俄國的制糖工業》(《L'industrie du sucre en Russie》)。

出，而且实际上也已流入我国，这就正确地标志着资本主义把俄国当做自己能在那里生长的沃土。我们知道，外国资本家对于俄国表示很亲切的关怀，不愿放过在俄国建立新工业企业的机会。如果真象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设想的，工业的发展真是“勉勉强强”，外国资本家的企图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问题就在于吉荷米洛夫之坚持这样的主张，主要是为了教条，我们的独特论者们想使教条胜利，不惜忽视许多意义毫不含糊的事实。“勉勉强强地发展”与其说是俄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无宁说是我们某些革命者的特点，他们的纲领一点也不和我们现时的实际情形相适合。

至于资本主义的蓄积，国内的货币流通，信贷业务又怎样呢？它们的成就实在是巨大的。到1864年为止，我们几乎完全没有私人的信贷机关；在这一年，“国家银行的资本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卢布，各种存款为二亿六千二百七十万卢布；其中用在商业方面的总共只有四千二百万卢布（二千三百七十万用于贴现，而一千八百六十万用于有价证券的抵押贷款）。”过了十三年，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到1877年，所有信贷机关的资本已经是一亿六千七百八十万卢布，而各种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等等）为七亿一千七百五十万卢布，换言之，资本已增加了百分之一、〇一八，活期、定期存款等增加了百分之一七三，资本和存款合在一起，增加了百分之二二〇，因此，总数增加到三倍多。同时，这些存款的用途也完全改变了。1864年，总额中只有百分之十五用于贷款和贴现，到了1877年，几乎完全用于贷款和贴现的，达到百分之九十六……贷款由1864年的一千八百六十万增至1877年的三亿三千七百九十万卢布，或者说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二九。在这期间，贴现的业务，即与商业关系密切的业务，增加得更为惊人，由二千三百七十万卢布的期票贴现增加到五亿卢布，即增加了百分之二、〇〇四！！随着貯蓄

貨幣總數的增加，周轉也增加到兩倍以上。1863年存款總額周轉不到兩倍，而在1876年，它已經周轉了四點七五倍”。

“信貸和鐵路把自然經濟加速地變成了貨幣經濟。貨幣經濟——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因此，不論信貸和鐵路都加速了生產的經濟條件的革命，即是由生產者是生產工具的所有者的經濟條件變成了生產者是僱傭工人的條件。”^①

(七) 銷 場

對於上面所引的事實已無需再有所評論。這些事實都很明顯地，足以使人信服地指出，至少就製造工業來說，現在已經是睜開兩隻眼睛注視現實的時候了，已經是相信那種成為我們運動中民粹派時代特征的天真幻想和實際情形很少共同之點的時候了。現在已經是有勇氣承認在上述範圍內，不僅我國最近的將來，而且現在也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時候了。所有的商業條件，所有一切生產關係的形成，越來越對資本主義有利。

至於說到銷場，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問題並不象伏·伏·先生及其門徒們所想象那樣不能解決。各國在由自然經濟過渡到貨幣經濟的時候，國內市場必有巨大擴張，毫無疑問的，我國的這個市場將完全為我們的資產階級所獲得。但是還不止此。精於打算的資本家已能預先看到這個市場勢將飽和，所以急於獲得外國市場。有些俄國商品自然要在西方尋求銷路，另一些商品則運到東方，跟在那些負有“鞏固我國在中亞細亞勢力”愛國使命的“白色”將軍們和其他將軍們的後面。最近我國工廠主代表大會上討論了“和巴爾干半島發展貿易關係”、“和亞洲各國訂立商約”等措施的問題，并

^① 尼古拉一遜：《我國改革後社會經濟概論》，載《語言》，1880年，第10期，第86、135頁。

不是徒然的。朝着这一方向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努力，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努力会失败。和东方交往，对于俄国企业家并不是一件新的事情，虽然国外竞争常常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以为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就能垄断而且能够永远地垄断最廉价的运输、最便宜的生产 and 商品的最优良品质，使得后来的国家不能发展，这种想法是很错误的。法国走上这一条道路比英国为迟，然而它已经在世界市场上替自己争得了一个荣誉的地位。如果拿德国和法国比较，情形也是一样，如此类推。在“西方”有许多国家也和俄国一样，在和最先进的国家作工业竞争的时候很觉吃力，然而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家却没有一个会象我们的民粹派一样想到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性”。固然，现代的生产力的增长已远远超过了销路扩大的可能，世界市场已快达到最后的饱和，周期的危机快要变成一种慢性的全盘的危机。但是在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以前，任何东西都阻挠不了新竞争者出现在市场上，他们所凭借的，是本国某些自然条件或本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如廉价的劳力和廉价的原料等等。还可以说，这类竞争者的出现，正促进在最发达的国家内资本主义灭亡时间到来。自然，工人阶级在英国或法国的胜利必然会影响到整个文明世界的发展，缩短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统治的时间。但是这都是属于将来的事情，和我们相隔有比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可能成为，而且如我们所说的，亦将成为俄国的全权主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不论行将到来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将来会带给我们什么，但是我们今天的迫切问题，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①。

^① 【1905年版注】由此可看出，我从来没有同意过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所想出的那一理论——而且从他们的著作中甚至转到了《大英百科全书》——按照它，俄国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这一国家没有市场。我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在《我们的意见分

跋》出版以后不久就为我在另一处以如下的話叙述出来：照民粹主义的理論家伏·伏·先生的學說，“在全世界市場上一些新國家的新競爭者的出現，从现在起应当認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市場已为一些比較先進的國家所最后占有了”。所以伏·伏·怀疑俄國資本主义的将来。……伏·伏·的理論不乏一定的聰明，但是，不幸的是，暴露了他对历史的彻底无知。曾經有过一个时候全世界市場几乎完全为英国所支配，而这一支配推延了英国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坚决冲突。英国的垄断为法国和德国在全世界市場上的出現所破坏了，而现在西歐的垄断也为美国，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的竞争所破坏，当然，这也使歐洲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間相互关系尖锐化。我們由此看出，伏·伏·先生的理論完全沒有得到事实的真实进程的支持。伏·伏·先生以为，在工业方面比較发达的國家既然在全世界市場上达到了統治地位，它們就对比較不发达的國家完全封闭对它的出路，从而推动这些國家到社会改良的道路上，这样的改良也应当为仿佛超然于阶级利益之上的政府所担当，例如为全俄专制皇帝陛下政府所担当。一些事实表明的是完全相反的，它們告訴我們，比較不发达的國家不是停止在一个地方的，而是逐步地为自己肃清到全世界市場的道路，并以自己的竞争推动一些比較发达的國家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这一革命将为意識到自己的阶级任务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夺取了政治权力在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来完成”¹⁵⁸。

现在我补充說，我的想法是全世界經濟后来的发展所証实得最好不过的，而且我們可以从英国的藍皮書有关这問題的以及从英国的一些領事的报告中引出許多資料来証明这些想法。我也指出，从另一方面說，我从来不是如下关于一般市場的和关于危机的理論的拥护者，这一理論在九十年代象傳染病一样地在我們的合法的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流行。依照这一理論的意思（它的主要宣传者我們应当承認是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先生）¹⁵⁹，生产过剩原来是不可能的，而危机被解釋成为生产資料分配中的簡單的不平衡。这是资产阶级很喜欢的一种理論，它之所以达到这一愉快的信念，是因为資本主义社会永不会失去它所特有的那些生产关系。因此无足惊奇的是，現代资产阶级的最好理論家之一，維尔涅尔·桑巴特先生在自己的1903年9月15日在漢堡“社会政策协会”代表大会上宣讀的报告中（見《社会政策协会关于1900年从事航海的工人的情况以及德國經濟生活的扰乱的討論》（Verhandlungen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über die Lage der in der Seeschifffahrt beschäftigten Arbeiter und über die Störungen im deutschen Wirtschaftsleben während der Jahre 1900 ff），萊比錫，1903年，第130頁）以很大的温情对待它。可驚奇的只是，維·桑巴特先生認為卓越的俄國學者杜岡—巴拉諾夫斯基为这一仿佛新的理論之父。这一完全不新的學說的真正父亲是讓·巴蒂斯特·薩伊，在他的“教程”中它被十分完全地叙述出来。很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资产阶级的經濟学是在回到庸俗經濟學家的观点，而又避免这样称呼它，好像是对可贊美的害羞感的退讓。除杜岡—巴拉諾夫斯基外，我國有弗拉基米爾·伊林先生在《市場理論問題評述》（《科學評論》，1899年1月）和在《俄國資本主义的发展》中宣揚这一理論。在后一本著作中弗拉基米爾·伊林先生順帶地也暴露出明顯的折衷主义，証明在他身上馬克思主义者的理論良心不是始終緘默的¹⁶⁰。

第三章 資本主义与公社的土地所有制

(一) 农业中的資本主义

但是伏·伏·之流总是說，我們社会經濟的主要的、唯一的基礎是农业。公社妨碍着农业中資本主义經濟的发展，妨碍“私人企业家的資本”投在土地上面，公社过去是、現在仍然是反对資本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堡垒。我們的大农业不仅沒有把小农业排挤掉，而且相反地，越来越讓路給小农业了。大地主和佃主們只是利用提高地租来投机，把整个的农业經營都交給了农民。而农民的經營一定会促进农民的而非資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的胜利。

虽然在这一整套論据里面錯誤和真理相当紧密地糾纏在一起，但是里面所含的真理無論如何是沒有說服力的。农业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是国民生产中的最落后部門，是資本主义只有在真正的所謂工业中站稳了脚之后才开始掌握的部門，因为“只有大工业及其机器才給資本主义农业以穩固的基础”。所以，以資产階級生产关系还没有普及到农业方面去为理由來說在某一国内沒有，或甚至完全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便是不合邏輯的。例如，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看来，在大革命时期法国資产階級的势力曾大到足以妨碍人民专政的实际建立^①。然而一直到革命的时候，无数封建关系的残余还是妨碍了“私人企业家的資本”投在土地上面，农业那时候可怕地衰落，土地所有者們宁願生活在城市，按“对分制”把自己的地

^① 《民意导报》，《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第251頁。

出租給无地的农民，或者出租給資產階級出身的租戶；这些資產階級出身的租戶們，和我們現時的“拉祖瓦也夫老爷們”一样，完全不去想怎样正确地經營农业，而是自己又把租来的土地轉租給农民，只关心尽可能得到更有利的轉租条件^①。这种情形难道說妨碍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义在法国的胜利嗎？假如沒有，那末，为什么这种情形在俄国对于所有我們的生产关系不仅起更有力的而且——如象民粹派所想的——还是决定性的影响呢？是因为法国那时候已經沒有公社嗎？很好。但是無論在法国和在整個“西欧”，都曾有封建制度，都曾有严重妨碍資本主义发展、并“限制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的行会。然而这些“鎖鏈”並沒有停止社会經濟发展的行程。“应当把它們打碎，它們果然被打碎”的时候到来了。俄国公社靠什么避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呢？

尼古拉一逊先生是熟悉我国改革以后的經濟的，关于这一經濟，他比所有俄国的革命的和保守的独特論者加在一起所知道的还更要确实得多。他毫不躊躇地承認，关于脱离农奴身份的农民的“条例”本身在我国是“旧生产过程訣别的哀歌”，而条例頒布以后的立法活动却是走的正相反的方向，且比农民改革，“就結果說，对于整个人民的經濟生活还发生更重大的影响”。照这一作家的意見，“我們的‘条例’給了生产者以劳动的工具，是妨碍資本使用在土地上，妨碍了資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改革后的整个国家一經濟的活动，則帮助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然而資本主义的趋势显然占了上风。所有的材料都証明：越来越多的生产者被剝夺。我們看見，在产品中生产者所占的份額減少了，資本家所占的份額增加了，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抛弃土地，并不是把土地‘耕好’。

^① 卡列也夫：《十八世紀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的农民及农民問題》，莫斯科，1879年版，第2章，第117頁及以下各頁。

而且連在公社內部也发生极为奇怪的现象：公社对于不事经营的农户开始給以坏地（反正是不耕的），对于经营的农家重分土地的时限越来越延长，由此我們眼見土地由公社使用变为个人使用”^①。吉荷米洛夫先生完全忽視尼古拉一遜先生卓越的研究的結論，而执拗地断言，我国“直到現在有一亿二千零六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俄亩的土地是屬农民所有的”^②。他忘記了，問題的本質不在于法律上的规范而在经济上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許許多多地方的公社已为不利于它的影响所歪曲了，以致它由从前的保卫生产者反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手段，一变而为現在的助长資本主义剝削的强有力的工具。为了不落空談，我們再来就人民的“本来面目”来看看現代俄国的现实。

現在，且先来談談关于原始农业共产主义历史的几种一般的意見。

（二）公 社

假使听信我国的民粹派分子的意見，那末，真会以为俄国公社，就其穩固性說，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組織了。一个情緒最容易激

① 尼古拉一遜：《我国改革后社会經濟概論》，第132—136頁。

② [1905年版注]当我写这几行的时候，尼·一遜先生的研究只印出了第一部分。它的完整的形式只是在1893年才問世，它远沒有証实我对它的期待，而且——讀者馬上会看出——这也不止是我一人的期待。尼·一遜先生，最后說来，竟是和伏·伏·，普魯加文，吉荷米洛夫等先生一样的空想主义者。固然，他所有的資料比他們所有的要无比的多些，但是对这些資料的整理是片面到了极点，而且只是用以証实那些基于对馬克思的价值理論之完全不正确的理解而生的一些先入的空想的观念。尼·一遜先生的著作对于很有好感的恩格斯产生了极不愉快的印象。恩格斯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說，他对于尼·一遜先生所屬的俄国人的那一代已失去任何的希望，因为，不管这些人說什么，他們必定談到“神圣的罗斯”上面，即是暴露斯拉夫主义者的一些成見。恩格斯对尼·一遜先生的主要責备是說他不理解俄国所經歷的經濟变革的革命意义161。

動的民粹派分子克一恩先生在關於《俄國人民的土地占有形式》一書中說“不論封建時期的內訌，或蒙古人的壓迫，不論伊萬雷帝的流血時期，或無君主的混亂時期，不論大彼得和葉卡特林娜把西歐文化輸入俄國的改革，都沒有能夠動搖或改變這一農民生活中的可貴的制度，農奴法沒有能把這制度消滅；不管是農民自願遷移到新地方，或被強迫遷移，也都沒有把它摧毀”云云，總之，

時光不停地向前奔流，一切都在向着幸福追求，
世界上的一切都變換過多少次¹⁶²，

而俄國的公社依舊是不變的和不可改變的。不幸，這樣的贊美，雖然十分動聽，可是什麼也不能證明。鄉村公社在沒有脫離自然經濟條件的時候，表露了它的無可懷疑的生命力。“這些用自己產品自行滿足的，不斷以同一形態再生產出來的，而如遇有破壞時也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發生的公社的簡單生產有機體，對我們揭開了亞細亞社會不變情況的秘密，亞細亞社會是和國家與王朝的不斷改變激烈矛盾的。亞細亞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結構，在政治風雲的浪潮里，是依然照舊。”^①

但是在這些野蠻社會里，同一的最基本的因素，雖然經得起政治革命的风暴而能屹立不拔，在經濟進化的邏輯之前却變得無力和不能自衛了。貨幣經濟和商品生產的發展已經在慢慢從根摧毀公社的土地所有制^②。此外還得加上國家的破壞作用，國家由於

① 《資本論》，第2版，第371頁（參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432頁）。

② 貨幣經濟對於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分化的影響，伊萬諾夫（烏斯賓斯基）先生在敘述一個家庭公社的變化時說得最清楚。

伊萬諾夫先生說（《鄉居日記》，載《祖國紀事》雜誌，1880年，9月號，第38—39頁），“現在，在農民家庭生活里有許多不能解決的困難問題，如果農民的大家庭制（我指的是城郊區）還是牢固地保持的話，那也只是遵守外表的儀節，而內在的實際情形已經不是從前那樣了。我和一個這樣的農民大家庭接觸得相當多。這一家的家長是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婆，身體強壯，也有自己的一套聰明和經驗。但是她的所有經驗都從農奴

环境的压力而不得不支持个人主义的原则。国家本身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那些与公社原则有利害冲突的上层等级的压力使得国家走这样一条路。货币经济的发展原是生产力发展，亦即社会财富增加的后果，这引起了新的社会职能的发生，靠先前征收实物税的制度来维持这些职能便是不可能的。财政的困难，迫使政府支持一切那些能使金钱多流入国内的措施和支持一切那些加速社会经济生活脉搏的社会经济的原则。但是社会经济的这些抽象原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只是某一阶级——就是工商业阶级——的真实利益的总表现。这一阶级（一部分出身于从前的公社社员，一部分出身于其他等级）极愿意把不动产及其所有者都动员起来，因为这些所有者本人是劳动者。公社的土地占有原则对于达到这两

制中得来，而且只限于农业经济方面，他们全家参加农业劳动，全部收入都归老太婆掌管，而她则照自己的意思和大家的同意来分配收入。但是这里有公路了，卖一桶蔬菜给马车夫，忽然比一个人一整年在田里的劳动赚的钱还多了。这已经是明显的违反了同样劳动得同样工资的原则。后来有火车了，小牛的价钱开始大起来，首都需求很多。一个儿子当马车夫去了，半年之内赚的钱比全家在村中劳动一年赚的还多。另一个儿子在彼得堡当清道夫，每月收入十五个卢布，这是普通一年都难赚到的数目。而弟弟和妹妹们一整个春季，一整个夏季剥树皮，还赚不到一个马车夫赚的两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因此，这一家虽然表面上无事，大家都“同等地”拿出自己的劳动成果给家里，但是实际上不是这回事：清道夫对妈妈“隐瞒了”四张红票（指纸卢布。——译者），而马车夫隐瞒得更多，而又怎能不这样呢？看这女孩一整个夏天剥树皮，剥得手出血，只能赚五个银卢布，而马车夫只要一夜由十二点钟到天明陪着老爷们游彼得堡，他就可以赚二十五个银卢布。再则，如果家庭收入完全出自农业劳动，那末，老太婆的权威还很大。她在农业劳动中真是有权威的。但是，试问，她怎能想得到马车夫的、清道夫的和和其他新工作的工资呢？她关于这些懂得什么，能指导什么呢？所以她的权威纯是有名无实的，假如说是有点，也只是对于留在家中的媳妇们，而媳妇们也知道得很清楚，她们的丈夫对老太太只是外表的恭敬和服从，因为她们详细知道自己丈夫的境况，知道谁对老太太瞒了多少，而且自己对这些秘密也諳莫如深。家长的威权有名无实，也就是所有家庭公社的关系有名无实；每个人对于代表这些关系的老太婆都有点东西瞒着，都是为自己而瞒着。老太婆一死，这一大家庭照现在这样子连两天都维持不住。大家都愿意有更诚实的关系，这就必然产生另一个愿望，让各人靠各人的收入生活，谁赚多少，谁就享受多少”。

个目的中的任何一个都是障碍。所以它成为新兴资产阶级起先憎厌的，后来又是比较坚决地攻击的对象。但是连这些打击也没有马上把公社破坏掉。它的灭亡是逐步实现的。公社成员的外部关系，看起来是长时间完全没有改变，而公社的内部性质则经历着严重的嬗变，以致最后使公社完全分化。这一过程，有时候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的，但一旦达到某种强度，就不是任何一个秘密社团的“夺取政权”所能停止。只有那些在公社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力量，才能对于这一正在胜利的个人主义予以唯一认真的抵抗。在财产状况、权利义务上从前曾是平等的那些公社社员，由于这一过程而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倾向于城市资产阶级，力求和它合流为一个剥削阶级。所有村社土地都慢慢集中在这一特权阶层手中。另一阶层，一部分被抛出公社之外，由于脱离了土地而到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一部分形成一种新的公社贱民，而公社组织所提供的一些便利正有助于对他们的剥削。只有在历史的情况已创造出新的经济基础来为这一下层阶级的利益改造社会的地方，只有在这一阶级开始自觉地对待自己被奴役的基本原因和对待自己解放的重要条件的时候，只有在这种地方和这样的時候，才可以“期待”新的社会革命而不致陷于馬尼洛夫主义。这一新的过程也只是慢慢地在进行，但是它一旦开始，就要同天文现象的确切不移一样，一直走到自己逻辑的终点。在这样的过程中，社会革命所依靠的不是阴谋家“可能的”成就，而是依靠社会进化的真实的和不可克服的进程。

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 narratur(寓言改換一下名字，就是說你)，我們对俄国公社也可以这样說。我国的公社直到最近还表現得很穩固，直到現在还繼續为思想能力薄弱的人所喜爱，正可以拿俄国货币经济发展得不久来说明。在废除农奴制以前，俄国几

乎全部的社会经济和一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都是自然经济，都是极有利于土地公社的保存的。所以不论俄国封建谓彻^①时期，或莫斯科集权时期，大彼得改革时期，以及彼得堡几个专制君主的“开明”时期的政治事变都不能破坏这一公社。这许多事变不管对人民的福利发生怎样严重的影响，但是，无疑的，这些事变本身，最后说来，并不是社会经济根本变革的前导，而只是个别公社间的那些相互关系的后果。莫斯科专制制度的基础正是我国民粹派分子所赞美的“人民生活的永恒基础”。不论反动的哈克斯特豪生男爵，还是革命的煽动家巴枯宁，关于这一点都是同样了解得清楚的。假如使俄国离开西欧经济的、生活的和政治的影响而孤立起来，那末，我们很难预见历史终于在什么时候会破坏俄国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国际关系的影响把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发达的天然的，虽是较慢的过程加速了。二月十九日的改革是对于新的经济潮流的必要的让步，而且使这个潮流增加了新力量。公社不会而且也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它的机体受了损伤，只有眼睛瞎了的人现在还看不出它分化的一些征兆。这里是一些事实。

（三）我国公社的分化

我国乡村公社的分化，甚至也反映在它的外表上。兹拉托弗拉茨基先生说：“我长久地站在一个村寨门口，注视着这个（位置在山坡上的一片）村子的外貌。这是多么不同的景色！这边是一片屋舍，显而易见的是一些破旧而盖着草的两窗屋。……那一边，对面是一些新的三窗屋，它们中间还有广大的胡同，屋顶是木板做的，而在它们中间甚至还闪烁着绿色的铁屋顶，烟筒上还有风标。第三

^① 谓彻(Вече)——俄国中古时代的人民议会。——译者

处是象蠕虫一样弯曲的长列房屋，和殷实富农的大屋并排的，还立着比地面稍高象棚子又象狗窝的屋”^①。象这种外表上生动如画的复杂景色，是和表现各农家的不同生計的一些数字相合的。据茲拉托弗拉茨基先生說，他所选来研究的公社“虽然不大，却含有一些經濟不平等的极端情形，由坐食利息，整天砸胡桃吃的人，一直到带着一群小孩子过苦日子的輕騎兵的寡妇；而且这一乡村很明显地分成光景好的一边和貧寒的一边”。然而这一公社不过“是现代新农村中的一个中間型，一般的俄国农村是朝这同一方向发展，有些是力求赶上它，有些是超过了它很远，总之是朝着破坏那代表劳动原則和經濟平等的旧农村基础的方向发展”。茲拉托弗拉茨基先生知道，还有这样一些农村，“而且它們的数目不少，你在这些农村中感觉到和看見”旧公社生活的“强固的，牢不可破的基础”。“但是这些乡村的多数比起現在是过去了”^②。現在，在乡村中越来越流行的正是《平凡的日子》作者所称为“乡村的欺詐和伪善的气氛”，正是公社分化为几个利害完全不可調和的阶层的必然后果。

一方面你所看見的是良好的善于經營的农民，“他們只有一个人的份地，然而耕种着沒有力量再勉强生活下去的伙伴們的三份、四份甚至五份份地”；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力量薄弱的”农民、“貧农”等人，他們“或者在自己的佃戶那里当佣工，或者是把自己屋舍的門戶完全釘上，出外謀生，不知何往，甚至以后永不再回自己故乡的公社来”。而这样的貧农也是不少的。在今年4月18日的《新时代日报》（第2922号）上有如下的很有意义的一段报导：“这是官方所証明的一个十分可靠的事实。俄国乡村公社的九百零七万九千零二十四戶（維斯拉河沿岸边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边区除外）中，

① 茲拉托弗拉茨基：《乡村里平凡的日子》，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9頁。

② 同上書，第191頁。

約有二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戶是无馬的。这就是說，在四个农戶中就有一戶无馬。但是沒有馬的农民就不可能是独立的农戶。这就是說，俄国乡村人口中有四分之一不应列入独立經營农业的农夫之內。”^①不能独立經營农业的农民是无产者的候补人，而且在很快的時間就能成为正式的无产者。这样的农民現在还没有受到大企业資本家的直接剝削，然而已經是完全依賴乡村富农的、或甚至依賴普通“聰明主人”的小高利貸資本了。“聰明的善于經營的农民”怎样对待公社的貧穷的同伴，从上面引过的茲拉托弗拉茨基先生的書中可以看出。

“‘这些釘上門的房屋是屬於“无地立足的”人嗎？’”作者对于同自己談話的一些人发問。

對話的人微笑着說：“‘无地立足的人……說得完全对呀！’”所以他象鳥一样的飞了！他总厮守着自己的田亩，总是忍耐着，想尽方法应付着，以后，呼！飞了……他請邻居不要压住他的通行証，

^① 这些材料是报纸从《1882年馬匹調查》一書中引用的。

此处所指出的平均数为私人就个别省县所做的調查所証实。例如，甚至在一般說来比較富裕的唐波夫省，我們所得的材料如下：

	斯巴斯基县	切姆尼克夫县
无馬戶	21%	21.6%
一馬戶	41%	42.9%
二馬及三馬戶	33%	31.3%
	驟尔山斯克县	波里索格列布斯克县
无馬戶	21.6%	18%
一馬戶	28.9%	28%
	} 50.5%	} 46%

(參閱格里戈里也夫著《地方自治局关于唐波夫省的統計調查》一文，《俄国思想》杂志，1884年，9月号，第79頁。)在弗拉基米尔省的波克洛夫县(苦德金区)，“无馬戶占全体农戶的百分之二四，在同省的尤列也夫县，无馬戶的百分比虽不太大，但是只有一馬的农戶极多。而这类家庭无疑是应当算是耕作能力薄弱的农戶的”。不过在同一县的几区(尼苦尔乡)，无馬的农戶构成全体农戶百分之十九(地主的农民)到百分之二四(国家的农民)。在斯巴乡亲身耕作土地的农戶，占百分之七三。

承租他的份地，他用上帝和基督的名義祈求，請鄰居吃酒，答應一定寄錢回來找補，只是請作好事，把地接過來罷！田地為我們這些善於經營的農民接下來了……有時發生這樣的事，這農民後來回來了，想把地收回，但是沒有力量，於是就在承租自己地種的農民那里當雇工，……這都是上帝的安排！……’”

讀者，你喜歡這類“善於經營的農民”的公社嗎？假使喜歡，那末你的愛好在這個場合和“用上帝和基督的名義祈求”脫離土地的“無地立足的人”的愛好未必相似罷。請你注意，這些“人”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你的和他們的同情所以不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你所同情的公社和“無地立足的人”所必須發生關係的公社是完全不象的。在你想象中所描畫的是那種理想的公社，它可能在革命以後出現，合於民粹派和民意派的理想。無地立足的人所發生關係的是那種現實的公社，在里面他們的不可調和的敵人，“善於經營的、聰明的農民”已經站穩了腳，自滿地說道：“我們這兒貧農是維持不住了，……他們在我們這兒連喘息都不可以了，如果不是他們，難道我們能活嗎？如果不是這些無地立足的人，我們就要很感困難。……而現在無地立足的人脫離了村社，我們在村社就覺得自由了”……①。貧農脫離了的村社是富農和剝削者的村社。“喘息”都不可以的無地立足的人從村社逃跑，如象擺脫了羈絆一樣。

但是聰明的農民總不是白白地攆走“貧農”的。他把從前同村破產的人的“四份份地合為一份份地”時，還向後者要求“找補”。由此發生了一些奇怪的合同，有如奧爾洛夫先生所保存下來的以下的一種：“1874年，11月18日。本人願將三個人的份地交給苦爾文那公社公用，由本人每年負責交納二十一盧布，此款每年于4月

① 茲拉托弗拉茨基：《鄉村里平凡的日子》，第203—204頁。

1 日前寄出，护照另寄，并附护照寄费，特此具结不误。莫斯科省，伏洛科兰姆县，苦尔文那村，格里戈里也夫(签字)”。这类事情并不是唯一的，如果拿农民份地应支付的款项和从它所得的租金来比较即可看出。据莫斯科省十二县统计的平均数字，每一口人的份地应支付十卢布四十五戈比，每一份地的平均租价不超过三卢布六十戈比。这样，每一份地的主人于租出地以后还须找出六卢布八十戈比。奥尔洛夫先生说：“自然也遇见这样的情形，就是谁出的价格能偿清份地应支付的款项，地就让给谁。但是这样的事情极稀少，因此可以视为例外，通常总是对于份地的租价或多或少的给一些找补。现在可以理解，何以农民们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不羡慕村社的土地了。”^① 凡是知道杨生先生关于农民的份地和应行支付款项的绝好调查的人，都知道俄国大部分地方存在着如奥尔洛夫先生所说的每人份地的收益及其应行支付的总数之间的差异。这一差异往往达到极可惊的程度。在诺夫戈罗德省，“各付款人每一俄亩土地的支付额对每一俄亩土地所得正常收入之间的比例如下：

在国家农民的土地的比例 160%

在农民所有者的土地的比例：

以前的食邑农民 161%

以前的地主农民 180%

临时的义务农民 210%^②

在情况不利的时候，换言之，在农民所有者须格外交纳款项的时

^① 《莫斯科省统计材料彙編》，经济统计局編，第4卷，第1册，莫斯科，1879年版，第203—204页。

^② 国家农民指国家所有的土地上的农民；食邑农民指皇族所有的土地上的农民；临时义务农民指以前属于领主而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在未向地主付清贖金以前，继续为地主服力役或交代金的农民。——譯者

候，在份地少和在临时义务农民的一般貢賦重的时候，这些支付的款項：

已繳納贖金的农民达到 275%

临时义务的农民达到 565%”。^①

总之，尼古拉一遜先生于比較了搜集在《賦稅委員會報告書》第 22 卷中的材料和农业委員會報告中的材料以后，发现“歐俄三十七省（因此，沒有計算西部几省）的国家的食邑的农民从土地所出的純收入中交納了百分之九二点七五，換言之，从土地收入中他們只剩下百分之七点二五作一切其他的用途。以前的地主农民的支付額对于他們从土地所得的純收入的比例为一九八点二五，換言之，他們不仅交出自己从土地得来的全部收入，而且还必須从一些副业收入中找补这么多”。由此，“脱离村社的”貧农在多数場合如果要得到放弃份地和自由移动的权利，必須每年支付一定的金額。在农民經濟关系稍被注意地研究了的地方，这一不可辯駁的結論到处都为事实所証实。例如，在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的沙土地区，据普魯加文說：“瘠瘠的，收获很少的份地的土壤对于农家是一个負担，土地成了农民的繼母。这里的份地不仅贖不回它所負担的那些款項，而且出讓土地的人每一块份地自己还須找补八——十卢布，因为在这一区每块份地每年的平均租金为四——五卢布”^②。乡村“貧农”为重稅所压，为土地“繼母”弄得破产，陷于最无出路的情境。一方面，貧农因缺乏資金，不能耕他自己所有的地，另一方面，現行法律又禁止他放弃他除亏损以外一无所获的地产。这种情形怎样了結呢？很明白的。据奥尔洛夫先生說，抛弃自己土地的所

^① 《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員會報告書》，第 3 部，第 6 頁。

^② 普魯加文：《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乡村公社》，莫斯科，1884 年版，第 3 章，第 93—95 頁。

謂弃地戶被划分为特殊的一类，和成为好象是被唾弃的和被逐出的人；公社分裂为两部分，其中每一部分敌視另一部分；农戶看弃地戶为一种沉重負担，因为由于連环保关系，他們必須大部分負弃地戶的責任，但从弃地戶方面却往往是什么也拿不到的；至于最后破产而不再种地的弃地戶，往往不得不同自己的家庭一起出外謀生，他們虽不种自己的份地，也須支付該地所負担的稅款，否則村社就不給他护照而且还在乡公所“鞭打”他們；很明白地，村社在弃地戶眼中是一个包袱，一种痛苦，一个障碍。当然，“公社的上述两部分之間的联系純粹是外表的、人为的、国庫的；这一联系一旦消灭，即必然发生上述两类人的最后分裂：公社将只由种地的人組成；弃地人由于沒有資金重新經營农业，和漸漸不习于种地。最后就变成无地的人，事实上他們現在也就是这种人。”①

在公社分化的某一阶段，几乎必然要有这样一个时日到来，就是公社社員中最貧的阶层要起而反对那已成为它的“痛苦、阻碍”的土地占有方式。在法国，在十八世紀之末，最貧的农民常要求“瓜分公社的土地，因为或者他們沒有牲畜在公社的土地上放，或者希望独立地經營农业，但是在这种場合就有大农們和那些赶牲畜到这些地上放的独立农戶們出来反对他們”②。固然有时候也发生相反的现象，即是，貧农願意保存公社的牧地，而富戶則把它攬为自己独享，但是，無論怎样，乡村公社无疑是各种物質利益最残酷斗争的場所。在它里面，对抗代替了原始的团结③。現在我

① 奥尔洛夫：《統計材料彙編》，第 55 頁。

② 卡列也夫：《十八世紀最后二十五年法国的农民及农民問題》，第 132 頁。

③ Une commune est presque toujours divisée par la différence des esprits qui la gouvernent et qui opposent leurs vues particulières au bien général（公社土地几乎总是因为統治上层以自己的私利和全体利益相对立的结果而被瓜分），見前引卡列也夫一書，第 135 頁。

們在俄國鄉村，如我們所說過的，也看見這種對抗，而且貧農脫離公社的意圖在它的分化的更早階段就表現出來。例如，在莫斯科省，耕地還沒有變成私有財產，而最貧的農民就因為國家捐稅的壓迫對公社取仇視的態度。“在那些還沒有具備有利於農業經濟……的條件的公社，中等境況的農民贊成維持村社的土地所有制；極端境況的農民，即是最富的和最貧的，則同情於以農戶繼承來代替村社所有的主張”^①。富農和“棄地戶”同樣要求和公社脫離關係。

這種傾向普遍到什麼程度呢？我們已經知道，這一傾向表現在那“還沒有具備有利於一切農戶的農業經營的條件的地方”，表現在那種地方，在那里，“一部分農戶漸漸窮了，沒有力量了，以致後來完全結束了自己的農業經營，不再種地，完全轉向其他職業，因此和村社土地脫離了直接關係”。凡遇到這種情形的地方，貧農是這樣自然地企求脫離公社，以致這種企求或者已經成為事實，或者是最近將來就要實現。凡是有原因的地方，結果也快表現出來。

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多數公社不僅是處在不利的而且簡直是不可能的條件下。我們的經濟，不論是國家的或者特別是人民的，現在都寄托在最不可靠的基礎上。要使這個基礎破壞，既不需要奇跡，也不需要一些意外事情；事物的最嚴格的邏輯，我們現代社會經濟有機體的機能的最自然的發揮，即足以引導我們達到這一步。這一基礎會崩潰，只是由於建築在它上面的建築物的重量和它的各部分失去均衡的緣故。

公社的最貧社員們的經濟多麼快地失去平衡，一部分可從上面所引關於無馬農戶的數字材料看出，一部分——而且是更清楚的——也可從下面有很大意義的幾件事看出。在波多爾斯克縣

^① 奧爾洛夫：《統計材料彙編》，第289—290頁。

“据1869年统计，在三万三千八百零二人的份地中有一千七百五十人，即占百分之五的份地是荒废的；说成俄亩数，就是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四俄亩可耕地中荒废了三千五百六十四俄亩。1877年只有三个乡搜集有关于未耕份地的确实数字，荒地计为百分之二二点七。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乡村是例外，所以假定该县其余乡村的荒地和该三乡差不多^①，我们发现未耕地由三千五百俄亩上升到一万五千五百俄亩，换言之，增加到四、五倍。而这是在八年之间发生的！这种荒地的大约估计也在关于未耕自己份地的农户数字材料中获得证实”^②。而真的，在1869年，这类农户只占已得份地的农户百分之六点九，在1877年它已增至百分之十八，这是全县的平均数字。在个别地方，不从事耕作的农户数还增加得快些。在克伦诺夫乡这一数目，由1869年的百分之五点六增加到了1877年的百分之三七点四！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数字。在调查员作为例子举出来的十一村，我们发现上述期间牧畜业缩小了百分之二〇点六，抛弃农业者由百分之十二点三增到百分之五四点三，换言之，“人口中的一半以上在1877年被迫须在农业以外找生活。在同县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即是，在那些据调查员们说，农业‘兴盛’的村子，荒地的百分数还增加了一倍以上，由1869年的百分之四到1877年的百分之八点七。这样看来，这种相对的‘兴盛’，只是延缓了农民的脱离土地，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现象。我们国民经济中，一般的，对农民说来是致命的倾向，仍旧是不变的。

但是，或许这一县是一般规则的例外吗？未必吧。莫斯科省的其他各县以及欧俄其他各省都和它的情形差不多。在舍卜何夫

^① 读者马上会看见，这一假定是完全有根据的。

^② 《从自治机关统计员报告书中看莫斯科省》，载《祖国纪事》，1880年，第5期，第22页。

县,不种地的农户数已增加到百分之十七,在維列县則增加到百分之十六。在斯摩棱斯克省的格沙特斯克县‘有些村子的土地荒弃了一半或甚至四分之三;……一般地說,該县农民的耕作縮小了四分之一’。”^①我們縱然不再用引語、摘錄來填充篇幅,至少也可以對於半个俄国勇敢地应用奥尔洛夫先生关于莫斯科省所說的話:“农村人口财产状况的尖銳对立已經发生:占絕大一个百分比的农民漸漸失去任何独立經營的可能,变成一群沒有地沒有房子的人,同时占百分比不大的农民却一年比一年发起財来”^②。这是說,至少俄国有一半的农村公社是它們的社員們的一个負担。

民粹派自己也深知这一結論的不可辯駁性。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我們已經引用了N·Z·先生的話,他認為,“不幸的公社在人民眼中丧失了威信”^③。茲拉托弗拉茨基先生也在某一处說过,公社現在只为农村老人和城市知識分子所珍視。最后,伏·伏·先生本人也承認“作为自願結合的公社是在瓦解,只剩下行政意义的‘公社’,即是为連环保所強制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群人,即是說,每个人都必須为全体納稅人的有限能力来負責,为国庫的不能了解这种有限性来負責。公社曾經給人的那一切利益都沒有了,現在只剩下因屬於公社而产生的一些不便”^④。所謂人民生活的牢不可破的基础,是每天地、每小时地为国家的压力所摧毀。資本主义大概可以不用和这一“无敌艦队”¹⁶³进入积极的战斗;它已經因为地少稅重而在瓦解了。

但是,民粹派由于嫌弃現代的、现实的公社,于是不停地歌頌

① 这些材料还是关于1873年的。參閱《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员会報告書》,附录,《論农业》一文,第2頁。

② 奥尔洛夫:《統計材料彙編》,第1頁。

③ 參閱《星期》,第39期,1883年,《在故乡》一文。

④ 《俄国的經濟衰落》,載《祖國紀事》,1881年,第9期,第149頁。

抽象的公社，歌頌 an und für sich（自在的和自为的）公社，歌頌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可能的公社。他們硬說，公社为外界的、它不能控制的环境的影响所破坏，它的分化不是自願的，并且将随着現代国家的压力的消除而停止。对于他們論据的这一面，現在我們也应当予以注意。

我們的民粹派在絕大多数場合下，都表现出真正可爱的温和。他們很願意把公社从現代“埃及的俘囚”中解放出来，并以此屬望于那个正是把几乎整个俄国弄得現在这样貧穷的政府。我們的合法的“公社热爱者”把政治看作“资产阶级的”把戏而討厌它，把立宪的活动看作和人民的幸福不相容而輕視它，努力說服政府，說維持这一有名的“基础”对它本身如何有利。不消說，他們的聲音仍然是荒野中的呼声。伐絲卡这一只猫^①一面吃，一面听，有时附和一下报纸杂志对它說的而为其已經灰煩的言論，如說它“应当正确了解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一个有名的寓言中所含的无可爭辯的道德含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是一个自明之理。

因此，关于农民經濟应当摆脱不利于它的条件的問題，是俄国摆脱专制制度的压迫的問題。在我們看来，我們祖国这样的政治解放，只是在人民的各种力量重新分配以后才是可能的，我国一部分农村公社的分化，无疑地将引起和已經引起了这一分配。但是关于这点我們下面再說。現在我們姑且对民粹派讓步，先忘記现实的公社而来談談可能的公社罢。

（四）民粹派的理想的公社

我們前面所有的論据，都是基于一个假設，就是俄国公社将长

^① 參閱克雷洛夫的寓言，一个厨師爱他的伐絲卡（猫名），任其偷食而不加干涉，只在旁边劝它不要再食下去。——譯者

時間地負擔着它不勝負担的重稅和長時間地缺少土地。現在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一問題。我們姑且假定，由於某些原因，公社能擺脫這一負擔。試問，已開始的它的分化那時不會停止嗎？那時難道它不會如果戈里小說中的三匹馬駕的車迅速地 and 不可遏制地向共產主義的理想狂奔嗎？

現在農民份地所負擔的支付總額，在多數場合都大大超過這些份地的收益能力。因此一部分農民就自然發生一種想脫離土地的意圖，因為土地只給他們帶來不利的地租。現在讓我們想象一種相反的情況。假想我們的租稅制度有了真正的改革，農民土地所負擔的支出比它的收益能力低得多了。我們所假定的這種一般的情況，現在是作為一些個別的例外而存在着的。即在現在，有些公社內，土地已經不是農民的負擔，恰恰相反，土地能替農民賺得某種收入，雖然數額不大。從這些公社所表現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所有公社都處在這樣比較有利的條件下，我們農民的土地占有的舊形式會有怎樣的命運。我們試看看，這些有特權的公社的榜樣會引起我們哪些希望和期待。

在《莫斯科省統計材料彙編》中我們發現以下的極為重要的一個現象。“村社土地所負擔的支付額愈高，它（支付額）與土地的收入額之間的差異愈大，村社土地普遍重分的次數就愈多。假如那些支付的价值不超過村社份地的收入，那就要經過一些長的間隔期，延長到十五——二十和更多的年份才來重分；假如，相反的，那些支付額超過土地的收入額，那末重分之間的間隔期往往較短，而且其他條件若相等，土地的那些支付的价值與其收入額之間的差異愈大，則重分的次數愈多。”^①李奇可夫先生在梁贊省也看到同樣

^① 奧爾洛夫：《統計材料彙編》，第4卷，第200頁。

現象。这一現象的意义是容易了解的；它向我们表明，农民土地所负担的支付額减少，就使他们願意延长重分的时限。說精确些，应当說，支付額的减少只会加强这一願望，因为这一願望即使在現在也还是存在的。“試把各县表示普遍重分之間的間隔期的那些平均数和重分的次数加以比較，这一比較就指出重分期限延长的傾向，因此，也就指出重分次数减少的傾向，即占有的时限更加延长的傾向”^①。农业委员会关于欧俄其他省份的“报告”也指出这同一傾向。我們的民粹派有很多人很同情这一傾向。据他們的意見，这一傾向将能消灭或削弱由于彻底重分公社土地而必然发生的某些农业上的不便。这是不错的，但是倒霉的，是这些由公社原則所产生的一些不便，固然是去掉了，但是所用的正是破坏这一原則本身的一些手段，很象那种用割掉头来治好头痛的办法。重分时限的延长是公社行将分化的征兆之一。無論在什么地方，如果因为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的压力而这一土地占有方式不得不消灭，那末在它消灭之前，公社是經過了一个時間頗长的适应过程的，适应个人对于不动产日益增加的要求。在这里也和在一切地方一样，事实的关系先于法律的关系；本来是整个公社财产的土地，越来越久地留在耕种它的那一家庭之手，一直到最后，重分时限的延长为那些已經过时的法律规范的完全废除鋪平道路。这一現象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在稍稍注意地研究不动产个人化过程的时候，是容易被发现出来的。

乡村公社不过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分化中的一个阶段^②。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不能不在那些不知有任何其他种所有形式的社会里发生。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說得很对：“历史家人种志学家要寻找

① 奥尔洛夫：《統計材料彙編》，第4卷，第158頁。

② (1905年版注)我重复地說，我們公社的国庫的起源現在是已被証實了的。

財產共有的最古形式，是不应当在已經定居的部落而是应当在游蕩的捕兽人和捕魚人那里寻找的，并且应当看見定居部落的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不过是在个别的一些部落中在还是以猎場和漁場为唯一謀生手段的那时代所发生的那些法权观念和制度之向不动产上面的移植”^①。由此看来，原属于动产的“一些法权的观念和制度”，对于不动产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动产已經为个人所私有的时候，这一影响不仅沒有削弱，而且还更为增长，不过现在取了相反的方向。从前动产力图使不动产具有集体性质，因为动产自身不屬於个人而屬於整个部落。现在，相反地，动产破坏不动产的公社所有制，因为动产本身不屬於整个公社，而屬於个人。凡是經濟事业如农业本身的实质要求同时使用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地方，則这种动产对不动产的影响便是很大的。种地的人，第一，需要土地，而这只在一定时期归他使用，第二，需要肥料、种子、役畜和劳动工具，这些却是他的私有财产。在两种财产接触的一点上，个人主义的破坏作用达到了最高程度，在农作中如果动产（私有）物品的重要性愈增大，换言之，如果某种公社土地所要求的劳动、肥料和照料越多，那末，个人主义的倾向就胜利得越快。所以人們对于菜园和宅旁园地耕作得最出力，这些土地也比別种土地更早地轉为农户私有，而牧場和荒地則屬公社所有的時間也比較长，其实只需要在它們上面围上篱笆，保护放牧的牲畜就够了。在这两极端之間，公社的別种土地被处置的先后視耕作它們的复杂程度的增減而定。

由此看来，重分时限的延长是土地耕作日趨細密的自然結果。
以下我們举几个例來說明。

^① 《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其瓦解的原因、經過及其后果》，第27頁。

在外湖村社（諾夫戈罗德省）“所有适宜耕种的土地都分成两种，即（一）分級田，（二）可耕田”。分級田只是在举行人口調查以彻底重分土地的时候才由一个农户轉移到另一农户之手；第二种田，可耕田，“每年到秋季的时候在农户中間重分”。这一差别是由于“分級田普通都施糞肥”，“农民們很滿意于在两次重分之間的間隔期間比較长些”，因为，据他們自己說：“应当从土地得到好处，如果明天，地就为別人得了，今天我还要在自己的地上去好好劳动，那又何必”。土地耕作得更精細，就使得农民能更长时间的占有，这种占有自然又会推广到其他种类的一些公社土地上，它們在农民心目中由于某种理由价值很大，而在耕作上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費用。在这同一的外湖村社，刈草場和田一样，都分成了几級；而且最好一級的刈草場，沿霍林卡河的“广大的肥沃草場”，“只在彻底重分时才列入”①。

我們在都拉省的托尔何夫公社，也遇到同样的而且表现得还更突出的現象。公社中那些“在自己地上已經施肥”的农户，“坚持保有这些地，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肯把它們讓給别的农户”。

在梁贊省的米海洛夫县，“农民們不分已施肥的田”。

在奥尔洛夫省的姆成斯克县，“在重分时，有一段地是不分的，以便每个人都可对它上肥。这叫做糞地。这类属于每个农民的永不重分的糞地为五沙繩”②。

在辛比尔斯克省的苦尔咪希县“近年（写于七十年代之初）实行土地重分需要較长期間，因此农业有了改进，大家都用糞施起肥来”③。

① 參閱《研究乡村土地公社材料彙編》，“自由經濟及俄国地理协会”編，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257—265頁。

② 俄丈，每一沙繩約等于二点一三公尺。——譯者

重分的時限的延長和田地耕作的改善之間的聯繫，已經由上述幾個例子顯然說明了。無可懷疑的，是農戶極不願和那些在耕作上需要他們任何特殊的費用的田地分離。如果公社所有成員在物質條件上對自己的田都有同等的施肥的可能的話，那末，這種想把已經作為份地而得到的田長久保留在自己手中的意圖，會大大地減弱。莫斯科省的農民們對奧爾洛夫先生說：“假如大家或至少是大多數的農戶，都能把田耕種得一樣好，那末，各地段之間的差別不會很大，對於土地的普遍重分誰也不會感覺麻煩了”。但是這樣的平等在鄉村公社中是不穩固的，因為在村社土地上是實行的各戶的經營，每一個獨立的公社成員都是自己負責耕種自己的份地。牲畜的數目，農具的品質，家庭的勞動力——都是可變量，使得各戶的收入大不相同。在公社周圍或公社內部的工業的發展為農民开辟了新的賺錢的道路，同時也是新的不平等的來源。一個農戶完全沒有可能“做旁的工作”，另一農戶卻從旁的工作來取得自己收入的大部分。一個農戶主從事手工業，成了“師傅”，成了自己公社成員的剝削者，別一個就落到人數很多的被剝削的隊伍中。所有這些，自然反映在各戶的經濟能力上。最後，並不是所有農戶都同樣容易地負擔得起國稅的。這樣公社自然就分裂為“光景好的”和“貧寒的”兩邊，分裂為富的、“善於經營的農民”的階層和慢慢變成“棄地戶”的貧農階層。那時候，土地重分對於光景好的農戶極為不利。這些農戶變得“不是替自己勞動，而是替自己的無力的和光景不好的鄰人勞動了”。不消說，富裕的農民盡力避免這一個對自己說來是悲慘的必然現象；他們開始很不同情重分。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公社存在的比較早期必然發生的不平等，也必然會引到重

③ 《欽命調查農業現狀委員會報告書》，附錄一，第1部，第2章，《公社所有地及私有地》。

分时限的延长。

但是事情不会停在这里。随着重分时限的延长，公社成员间的不平等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是更加强了。有可能把自己份地耕作得更好的农户主们，现在不害怕他们的地“明天”会转入别人之手。他们将更卖劲的种它，将为耕好它而不吝惜费用。这些照料自然会有更好的收成作为报酬。好光景的农家耕作得好的田地，比那些勉勉强强耕了的贫农的份地带来更多的收入^①。由此，在公社中重复着关于有才能的人的寓言所说的那一个老的但又永久是新的故事。光景好的农家变得光景更好；贫农更贫。富裕的农家组织攻守同盟来反对贫农，后者在决定村社事情时还有表决权，能够要求重分。富裕的农民想不管怎样把耕作得较好的公社土地保留在自己的手里，又不敢或不能确立农户私有制，于是他们就诉之于以下的很聪明的手段。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划为特殊地段，份地只分给光景好的农家。“村社的田地分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一部分为优良地，作为份地分给光景好的农民，由他们耕作；另一部分为劣地，作为份地，分给无主户，任其荒蕪。”^②这样，贫农就再没有随时从其幸运邻人手中获得较好的耕地的任何希望了。公社大大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从前是自己最穷社员的靠山和支持者，现在变成他们完全破产的泉源。重分时限的延长原为公社社员间不平等的结果，它只有引起更大的不平等和乡村公社的完全破坏。

我们的改革家们在力求实现自己的要求时，以为他们是在努

^① 在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的斯巴乡，“种十二升黑麦，每人可收六百捆，一百捆可打粮五升”。这是平均的收成。个别说来，这种收成随农民生活境况不同而不同。收成最多的“是富裕农民，每人可收一千捆，每百捆可打粮六升”，最少的是“无地农民，二三百捆，每百捆打三、四升”。普鲁加文：《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乡村公社》，第15页。

^② 奥尔洛夫：《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诸形式》，第55页。

力巩固“永恒的、經得起考驗的制度”等等，把这种民粹派的話譯成普通話，就是努力保存公社的土地所有制。但是生活中却出了不少對他們說是最不愉快的意外事情。份地的增加和捐稅的減少，使農民們開始“珍視”起土地來，而在土地被“珍視”的地方，人們就不喜重分，力求延長重分的時限；而在重分時限被延长的地方，公社社員間的不平等就更增長，事物的邏輯已經把農民培養得慢慢習慣于農戶私有了。總之，那種作為保存公社的手段而被推薦的辦法，只有使得它更不穩定，這種不穩定已經使公正的觀察者感到驚奇了；這種辦法對公社說來好似達奈伊茨人的真正禮物^①。應當承認，只是靠了很熱烈的幻想和十分的無知，才可以在處於這樣無出路和矛盾情勢中的不穩定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去建立什麼改革的計劃。

這一社會形式所含的矛盾也必然而命定地反映在它的擁護者們的思想方式和他們的行為上。我們的合法主義的民粹派是這樣地會想辦法來維持和巩固“俄國人民生活的永恒基礎”，却沒有看出他們事實上越來越代表那一部分擁護個人主義原則和富農發財思想的農民的利益。

關於人民信貸的談論和對於所謂“村社”租進領主土地的高興，可以說是對公社利益近視態度的新的例證。實質上說，無論是公社租地以及小額土地貸款絕不能巩固我們民粹派所珍視的“基礎”，而且甚至直接破壞公社原則。我們還要談到這一問題，但是首先我們認為必須說完我們所已經觸及的公社分化的其他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農民為了把地耕得更好些而主張延長公社土地重分的時限。他們不願在那快要落於別人之手的土地上“好好

^① 達奈伊茨人於公元前四世紀久攻特洛伊城不下，偽以木馬贈與特洛伊人，木馬內裝伏兵，遂進城後星夜外合始將該城攻下。——譯者

劳动”。土地的好好耕种不仅需要耗费劳动者的活的劳动，而且还要耗费劳动者过去劳动的僵死的物品，即那些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

这些“资本”耗费要在比较长一点的时期方能收回。有些要经过一年或经过几年才以土地上的收入增加的形式完全还给原主；另一些恰相反，要求很长的周转时间。头一种可称为流动资本的支出，第二种是固定资本的支出。不用说，农业中固定资本的支出愈增加，那末富裕农民愈想延长把份地保存在自己手中的时间。对土地施肥的支出本不算什么，然而我们知道它已经使得某部分农民对于重分采取敌视的态度。“这是胡闹，因为：我有三头牛而他只有一只公鸡”，这是尤列也夫县申纪列夫乡¹⁶⁴的农民对于土地重新分配的反应^①。如果采用了更合理的经营方法，集约耕种制、多段轮种制将怎样呢？公社土地所有制，无疑是这些办法巩固的严重障碍。即在现在它导致了这样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象农民拒绝在耕地上施肥。在卡卢加省，某些“农民几乎把所有肥料都运到麻田里，而对于自己的田施肥很少，因为耽心重分时，已施肥的地会转移主人”。莫斯科省“田地重分以前三年，即停止施肥”。在科斯特罗马省的肯涅色姆县“有富裕农民出卖积肥的事例”，他们由于上述原因不肯把肥料运到田里去。在都拉省，“一些还没有贖出土地而负着缴纳免役税的农民的田地，由于不上肥料而年年耗竭了，这是因为肥料不运到田里已经是第十年了，他们要保存着肥料等待分地的时候”。最后，在辛比尔斯克省的西兹兰县“从关于租地价格的许多材料看出，属公社所有地的租价（在整批的份地出租时），平均比私人所有土地的租价要低一半。这是无疑的事实；在

① 普鲁加文：《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乡村公社》，第40—41页。

乡公所保存的册籍、契約和合同中都容易証明这一点。

这一事实是因为每一农户所分到的那些不大的一块块的份地，耕作起来极不方便；农民中最富裕和聰明的一部分人都充分意識到这一点，而这一事实本身又引起两个現象，它們在估計农民的土地所有現狀时应当認为是最具有特征的。第一，在有些乡村（在克拉夫科夫、在戈罗文、在費得林和查加林的一部分村落）已經決定划分公社土地为各戶地段。第二，在极多乡村里，个别农户贖买自己的份地，要求把它們从公社的土地中划出来。类此的情形在如下各村：列比約夫卡、沙莫伊金、奥苦洛夫卡和其他許多村可以遇到；如果在农村行政机关里事情办得更有条理的話，这类事情还会发生得更多，現在的法律上的某种不明确之处由于农村行政机关的一些缺点所加强，不自觉地阻碍了贖地的机会”^①。

但是这还没有把公社的土地所有制的不便說完。与这一所有制相連的強迫的作物輪种，也妨碍农业的改进不小。

例如，都拉省的托尔何夫公社，“对于無論在自己的田上围篱，或改变耕种方法都是不許可的”，又如科斯特羅馬省的波戈列洛夫公社，三田制的耕作法是大家必須实行的，在象这样的一些地方，农业的根本改善是可能的嗎？这类的公社絕不是一些例外；相反地，在它們内部存在的制度可以認为是一般的規則，这一規則所根据的简单的理由，是如果公社一个社員在田地上围篱或改变耕作方法，那末，“为了一人这样做，全体在休耕地或墮地牧牲畜就不方便”^②。据卡卢加县吉洪諾夫乡的乡长和农民們的声明說：“沒有一种生产活动是能够依照着一个农家自己所願意的那样进行的；当

^① 《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员会报告書》，附录一，第1部，第2章，《农民經濟的几个条件》。

^② 《研究乡村土地公社材料彙編》，第161、234頁。

所有的人的休耕地只耕两次时，就不能许可他耕三次，因为休耕地是放牲畜的场所；依同样原因，一个人也不能比别人早种冬黑麦；他也必须和别人在同一时候刈草，因为不得在分划草场以前割草，而在别人以后割也不可以，因为需要从休耕地把牲畜赶到那里；在所有工作中都绝对遇到象这一类的障碍”。实行新作物的栽培更谈不到。这是不可能的，假如它们“下种比我们的作物为迟，在收割时，公社的牲畜把它们都践踏坏了”^①。所以可以说在一边是公社，另一边是把改变耕作方法认为有利，而且有这样做的必需资料的公社社员之间，斗争是不可免的。不难预料，胜利将属于哪一边：“富人总归压倒穷人”——农民们说；在现在这种情形下，有钱的少数人将用历史上从未创造过的最可怕的武器，即是改良了的生产工具，来“压倒”穷人。

我们的民粹派写了很多东西来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公社本身，也就是它所根据的原则，实质上，都是不敌视任何农业中的改进的。他们说，只要该公社的全体社员担当起这一类的改进工作，或者更好些是实行土地的集体耕种，那末事情不仅不会变困难，而是相反地，由于没有土地私有制，而会更好办些。这自然不错，不过可能的事情难道很少吗？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变为现实，而这些条件在现时却是不可能的。

咳，要是霜花不打在上面，

冬天里百花也能盛开！

歌是说得对的。但是在我们的气候区里，冬季竟会没有霜？不是吗？那末，冬季的花，除了在温室里就不能开。我们的农民也许会吃牡蛎和喝醉香槟，假如……假如他们有钱的话。这一讨厌的钱

^① 《致命调查农业现状委员会报告书》，《农民经济的几个条件》。

的問題等于冷水，把我們的馬尼洛夫式的热烈的幻想澆凉了。假如所有我們的农民都有錢来不仅用改良的工作法耕自己的地，而且能維持传统的三田制經營，那末，我們也就不会发生為我們的民粹派先生們所热烈而又无結果地鑽研以求解决的土地問題了。现实告訴我們，我們农民中絕大多数沒有这种款項，既然沒有，那末，不論是个別农家，或者是整个的国家都不会願意，也沒有理由把农作物的改善推到多数公社社員“康复”了的时候，因為我們古老的木犁在我們和美国人爭夺市場的时候，本来把我們已經害得够苦了，何況美国人并不等待平等博爱的黄金时代到来才采用汽犁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只要不出什么奇迹，使得“农民改革”后的現代农村中已經存在的不平等一下子消逝的話，那末，改良的农耕方式的采用便是我們公社分化的新因素。但是关于奇迹，下面再說。

然而这一农业的改进又是什么呢？它是社会发展中不利的条件，是耕作者周围不利影响的产物呢，还是相反地，它是这些不利影响的消除的結果，是农民物質福利水准提高的后果呢？我們以为第二个假定比第一个更正确些。現在多数的农民很穷，而連环保制度甚至使他們中間少数的富裕戶也有破产之虞。很明显地，他們現在談不到集約的耕种。但是，把他們放在更好的条件里，解除压迫他們的捐稅——連連环保制度也不再威胁富农；貧苦的公社社員少，——替他們担的責任也少了。富裕农民对于自己的未来既有信心，就要考虑認真的改善农耕。但是那时候他就和公社发生冲突，那时候他得和公社进行决死的斗争。在我們前面因此又发生这样的結論：农民物質生活的改善将增加土地的公社所有制的不稳定性，使例如現在唐波夫省发生的現象成为更加常見，即是說：“发财的农民建立地段所有制，他們穷了的时候，就坚持有田地

可重分的公社所有制”^①。我們的病人是可怜，很可怜！他現在精疲力尽到了这样的地步，正在活活地腐烂，而同时为我們的合法的民粹派一順势疗法医生所推荐来恢复他的力量的一切营养物只能加速那已开始的腐烂过程。

但是难道不是我們把公社結束的时候嗎？我們不是已經指出促使它分化的所有因素嗎？沒有！这类的因素很多，很多。現代經濟的一切原則，現代經濟生活的一切动力都和公社发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希望它将来“独立”发展是这样的奇怪，正如希望被拖到岸上的魚可以活得长久和蕃殖一样的奇怪。問題不在魚是被什么釣餌釣上来的，而是魚的呼吸器官能否适应周圍的大气。現代貨幣經濟的气氛破坏我們古老的土地所有形式，从根本上摧毀了它。要举例說明嗎？下面就是。

我們已經看見，貨幣經濟对于家庭公社如何起了破坏的影响。現在我們試来寻找貨幣經濟对于真正所謂乡村公社发生影响的事例。

（五）贖地办法

現在我們要來談那个准备在俄国創造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新的农民阶层的贖地办法了。有些公社已經贖买了自己的土地，这对于它的內部組織起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奇可夫先生說^②：“还在《唐波夫省統計材料彙編》中，奥尔洛夫先生已經順便地指出，贖地的方式非常強烈地影响推翻农民間重分土地的消灭，在农民中确立和传播一种把被贖地看做个人的，不可剝夺的财产的观点。……这样的現象也是，我和我的同事們在

① 《欽命調查农业現狀委员会報告書》，附录一，第2部，第178頁。

② 參閱李奇可夫：《破坏公社的贖地办法》一文，載《事業報》，第11期，1881年。

搜集統計材料的時候，也在梁贊縣看到的。”

應當承認，李奇可夫先生已注意到一個極有意思和富於教益的現象。如他說：“在梁贊縣，準備贖地的農民，在把地看得貴重的一些公社里是完全不去重分自己的地的，而臨時義務的農民，特別是國家的農民們則進行土地重分。土地所有者只是在把地看得不貴重的地方分地，也就是說，在那些地方分的不是土地而是它所帶來的負擔。……極可注意的是，在所有已贖地的公社里、土地按人口分配的公社中，這種分配不是在地已贖了之後，而是在贖地之前或正在贖地的時候進行（通常是為了以後永不再分）。在贖地以後，沒有在一個公社，除開在那些壞地只足以增加農民負擔的公社，我說，沒有在一個公社重分過土地，不管土地分配的不平衡是多麼明顯。不論這是多麼可悲，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個事實以及其他的事實所表現的完全不是說明農民們的利益之村社的心情，我們之必須這樣承認，是因為對於任何事實都應當予以正視，而不應當拿有害於事業的空話來粉飾它”。

農民將自己所贖土地變為私有的——正確些說，按戶所有的——財產的傾向，不僅可以在梁贊省一省看出。同樣現象在別的地方也發生。

在諾夫戈羅德省的克列斯切茨克縣“有近半數從前的領主的農民，在贖地以後，由村社決定將全部土地按人口交錯地分配，並且永遠廢止重分。”《農業委員會的報告》關於卡盧加省也指出同樣的現象。在都拉省的斯塔路亨諾村，“公社的土地從改革的時候以來就沒有重分過。”但在局部重分的場合，“在改革時候得到份地”的人口數，就成為分地的標準。甚至“在分家的時候，計算的還是那同樣數目的人口，而不考慮幼年的人。宅地完全不重分而是移到家庭。”公社的原則如我們知道的，在這個土地所有者農民所組

成的乡村，对于个人主义作了不少的讓步，尽管如雅庫什金娜女士所說，他們認定土地的公社所有制是“使农民的土地不被剝夺的唯一办法”，事物的客观邏輯究竟胜过个人主观的邏輯。但是在这里，在这两种邏輯之間还是发生了斗争，存在着分歧的意見，而在从1864年即进行贖地的波罗克公社（普斯科夫省），其多数社員的主观邏輯和貨幣經濟的客观邏輯早已最密切的联合起来。对于貧农們要求新的重分的回答往往是：“虽然現在拥有多余份地的人并非有权（不是按照人口数）占有份地，但是他們总算把这些份地应納的貢賦（贖金）都付清了，因此，夺取他們的这些份地是不公道的。”^①在同一地方的另一村也发生了这样一件可注意的事情：一个农民收了一个弃嬰，請村社在公地上割給他一块份地；后来該义父以一百卢布买了这块地，換言之，即該地永不再被重分。在这里，土地的贖买也是敌視公社的土地所有原則的。

这一情况使我們面临一个不是整个公社而是其个别社員贖买份地的問題。这类事情为法律所許可，而且事实上也常发生。有时候，最后贖买了自己份地的农民，繼續根据从前的村社原則拥有份地，但是有时候他們反对重分，那时候村社不得不把他們看成所有者。在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的索罗古申村“有三家最后贖买了自己份地的完全的所有者，其中有两家无条件同意彻底的重分及其一切后果（靠抽签来改变土地位置，份地的縮小等等），而一家則要求补足自己的份地，村社只有从每一块田的边緣上划分一块来补他不足的土地”^②。在同省的霍洛舍夫加乡和尼古拉也夫村，“有些完全的所有者，村社願意照他們贖买的面积，把他們的完全的份地提出來給他們，虽然也是交錯的”^③。有时候相反地，村

① 參閱《研究乡村土地公社材料彙編》，普·季諾維也夫先生的論文，第308頁。

② 普魯加文：《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乡村公社》，第19頁。

社阻碍着所有者脫离，那时候贖地就变緩慢了。例如，在唐波夫省，“許多农民都願意单独贖回自己的份地，但是公社不許可这样的贖买，为了不使富农摆脱連环保”。有时候，村社对于贖买自己份地的农户，給以較远的和不适当的土地。所以在哈尔科夫省，“农民們宁願購買別人的土地，而不贖买自己的土地”④。

这些事实足够表明，公社关系的平衡由于贖地而变得不稳定到了如何的程度。不錯，土地最后在法律上过渡到农户永久私有制，不仅不是贖地的必然的直接結果，相反地，只是比較稀有的現象。农民一般說来是保守，尤其是在对土地的关系上。但是这并不改变問題。贖了自己土地的公社社員間的相互关系，不过是在名称上叫人想到这是一些好的，旧时候的、自然經濟、农奴制度和缺少任何交通联系时候的“村社”。实际上，土地的分配已經不是根据这一或那一农户对土地的需要，也不是根据他家庭里劳动力的多少，甚至也不是根据稅捐和徭役了。新烏唱新歌。土地所有者的农民不喜欢重分，并不因自己邻居的貧乏而不安。乡村里的老头們嘆息和抱怨人民“受縱容”，知識分子則更为感伤，看見“敗坏的风俗”已不可遏阻地侵入乡村而悲痛。知識分子只希望革命，希望革命会治好一切毛病，把一切弄得很平，使公社回复到戈斯脫昧斯尔时代⑤那样的新鮮。但是乡下“老头”和首都民粹派所同声嘆息的这种現象又有什么可怪的呢？一点也沒有可怪的。“风俗”并没有敗坏，而只是有了别的經濟內容。从前的时候土地是沙皇的，是“上帝的”，随便你怎么說，但是只是不能买卖。农民們只要为公

③ 普魯加文：《弗拉基米尔省尤列也夫县乡村公社》，第48頁。

④ 《欽命調查农业现状委员会報告書》，第2部。

⑤ 戈斯脫昧斯尔为俄国历史傳說中的斯拉夫人逃出的大公，以智勇著称，曾驅逐侵入的伐里亚基人，时在九世紀。——譯者

社接受，即可得到使用土地的权利，有时候只受他自己的劳动力的限制。而公社完全是它所占有的土地的主人，凡它的斧头、镰刀和木犁所及之地，它也就实行支配。农奴法束缚了和侮辱了种地的人，但是没有改变他对土地的关系。农民们对领主说：“我们是属于你们的，而土地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农民不再属于主人的那一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土地也不再属于农民了。他须要赎地，须要付钱。什么是钱呢？首先钱是商品，而且是一种完全特殊性质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要用它来购买，并且是这些商品价值的尺度和表现者。不用说，这一特殊的商品也不被排除在商品生产及流通的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之外。相反地，它是这些规律的担当者，无论这一种或那一种偶然的交换行为把它抛到那里，他就在那里扩大这些规律的作用。但是商品生产的诸规律又是什么呢？商品是什么和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在生产资料，因此也就是只有在产品成为生产者私有财产的社会，商品生产才发展；没有这一条件，任何分工都不足以促其发生。由此看来，商品生产是私有财产发展的后果。从商品交换中自然成长起来的货币，必须先有私有者，正如一般说来，整个商品生产的过程必须先有货币一样。公社的个别社员只在用他们私有的这些或别些物品进行交换时，方能得到货币，那怕这类私有财产是从耕作公社土地得来的产品。农民现在正必须以这些货币来支付赎金。

但是“货币生货币”，也就是说，用货币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加工的物品本身都已经是交换价值，是等于为它们所付出的货币额，而且能够依所有者的意思来重新变成货币。因此，凡为某人所购买的物品，必须是他的私有财产。这是货币经济的无可争辩的逻辑。正是这一逻辑和公社的土地所有制的传统发生了斗争。赎地的方式把农民村社导向矛盾，这只有靠公社的完全破坏来解决。由于

习惯，由于传说，一部分也由于自觉的信念，它（村社。——譯者）企求保持土地的集体所有的旧原则，这是在取得这土地的方式已经完全是基于货币的和个人主义的新原则之后。不用说，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能把个别农户的私有财产交换得来的物品转为村社的集体财产。

李奇可夫先生说：“虽然按照赎地条例，农民份地在赎出以后是公社所有，可是，赎金依照习惯（换言之，依照比任何法律规范有力，更比任何含有矛盾的法律有力的一些事实），在多數的公社里，都是由公社内的社員按照自己的地亩数来支付的。赎金的数额因为支付而每年递减。于是就发生这样的后果：热心支付赎金的人（这样的支付有时候要延长二三十年），可能在重分的时候失去其所赎土地的大部分，相反地，一点钱也不付的农民可能白白地得到土地。换言之，交納赎金的人，每次新交一部分赎金，表面上虽然增加了他对所赎的土地的权利，可是在重分公社土地时，他却因而接近了失去这一为他的血汗所赢得的权利的时候。很明白的，农民不能不看出这一实际的矛盾。”我们已經知道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取消重分和把土地确定地给予那些已对它付过赎金的公社社員。

截至 1883 年 1 月为止，已赎出的农民土地为二千零三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七俄亩。而因为一般认为属农民所有的全部土地为一亿二千零六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俄亩，所以，根据以上的数字，我们可以说，农民土地中已经有六分之一因为赎地的关系而处于和公社的原则不相容的情况。

土地的公社占有原则和赎地或者和拿钱买地不相容到什么样的程度，看以下的事实就可明白。在莫斯科省，有些农民公社除了份地以外，还有“赠予地”，就是在获得自由的时候从自己先前的领主所得到的赠予。除了只有一个乡村以外，“赠予地到处都是公社

所有的”。如果是农民公社购买領主的土地，“則每戶所得份額的所有权都是規定永远屬於該戶的，因之每戶都有权自由处理并以出賣和贈予等方法讓渡自己份額的一部及全部。由此看来，参加买地的每一戶的地亩份額是不再改变的”^①。

同样在普斯科夫省，如果是农民“購置地产，而这类事情又是不少”时，則这些地产的所有权都被規定为“不屬於公社”。

但是事情还不限于此。尼古拉一遜先生公正地指出：“贖地迫使生产者把自己劳动产品的越来越多的部分变成商品，因此是越来越巩固資本主义經濟的基础”。

从上面所說，可以明白，民粹派把对农民小額土地信貸的发展，看成是使公社巩固的手段，是对資本主义斗争的手段，他們是何等天真了。他們所推重的，通常正是只能加速他們所痛恨的資产阶级关系的胜利的那些办法。从一方面說：“力求以信貸改善生产者物質状况的一切方案，不仅不能改善这一状况，而是完全相反地，在改善少数人状况的时候，就把多数人的状况恶化了。”从另一方面說，購買的土地总是归置产者个人所私有，贖买的土地也时常是这样，贖买的土地越好就越是如此。

如果是承租領主的土地或官地，农民村社也变成互相負責的股东公司，其中租地的分配决定于所出的錢的多少。这又是什么公社呢？这又是什么“永恆的基础”呢？

不过不止一些和平的民粹派为这些意义极为可疑的事实所感动，連恐怖主义者也可以自夸为对这些事实有这样的“高尚情感”。例如，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和那些深信“俄国資本主义为不可避免的”人們作战时，指出：“屬於农民的土地的数量，是在緩慢而不断

① 奧尔洛夫：《莫斯科省农民土地所有制形式》。

的增加中。”他似乎認為這一個事實是如此的意義深長，以致沒有對之加以任何評述。但是在我們說過貨幣經濟在公社分化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後，我們有理由認為屬於農民的土地的增加，至少，是一個含義很模糊的事實。現實完全証實我們的懷疑。

在莫斯科省，農民購買土地的数量，“在十二年間由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俄畝增至五萬九千七百四十一俄畝”。這樣，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正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所說的“緩慢而不斷的”增加了。好的，但是這些新地是怎樣分配在農民中間呢？五萬九千七百四十一俄畝中，有“三萬一千八百五十八俄畝只屬於六十九個所有者，換言之都超過了農民經濟的範圍，而一萬零四百二十八俄畝是由超過一百俄畝一戶的田產組成的”^①。應當怎樣來了解這樣的“農民的土地所有”呢？難道它證明資產階級制度在俄國不能發生嗎？這裏可以拿蒲魯東曾經說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吉荷米洛夫先生：他能看見而不能理解，他能敘述而不懂自己的敘述的意思！

現在是我們結束談論公社的時候了。我們對於它的一般的歷史、特別是對它在俄國的狀況的看法已經敘述過了。我們以事實和例子來証實自己的話，常常使得民粹派自己來替我們發言。我們的研究必然是簡略而膚淺的。我們不僅不能列舉為調查的人們所已經指出並且証實我們思想的一切現象，而且由於本書篇幅所限，我們甚至也不能指出現在在農民生活中很重要，而其發展又和公社原則不相容的一切傾向。儘管有這一切，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論點不是無根據的。所引的諸例和所指出的諸傾向，完全足夠來辯護我們的論點。嚴重的懷疑是不可能的。每一個沒有成見的觀察者都看得見，我們的公社正經歷着嚴重的危機，而這一危機快要

① 伏·伏·：《資本主義的命運》，第136頁。

完結，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准备讓位于个人的或农戶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种类是很多的，它常在习惯了了的公社关系掩护下，在农村中生根。但是旧的形式不能改变新的内容；这一形式必須适应这一内容，否則将完全消灭。而这一进行得越来越强烈的革命，这一每天都在向“广处”和“深处”发展，蔓延到越来越广泛的空間的分化过程，使农民的习惯和世界观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当我们斯拉夫派革命者以我们的工厂工人的“四分之三”“完全不是无产者，而其中半数只是临时工，几乎出于偶然”^①的想法来自慰的时候，农民們自己很清楚，現在的公社完全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农人越来越和土地分离。茲拉托弗拉茨基先生的《农村中平凡的日子》中的农民們說：“我亲爱的朋友，青年們都跑了，都不要土地了……城市在吸引着他們”。确实，城市越来越使乡村隶属于自己，把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对利潤的追求，自己的貧富間的对立都带进了乡村；他提高一些人的地位，降低另一些人的地位，創造“有教养的”富农和大队“无地立足的人民”，不顧乡下老头們的嘆息，把我们如象旧日重农派那样的一些改革家和革命者的立脚的基础无情地破坏了。在此，在对于根本改造我們乡村“基础”的这一过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痛斥为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无力。“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此的研究对象，它們应当各别的、彼此不相关联地研究。形而上学者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維着，他的話即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在他看来，任何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的某一事物，不能同时等于自己又等于其他事物。”¹⁶⁵这正是吉荷米洛夫先生的

^① 《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第228、236頁，載《民意导报》，第2期。

世界觀和思想方法。在他看來，“人民”是固定的、不變的、永久都一樣的概念，在他看來，公社“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在他看來，公社社員的農民“不能同時等於自己又等於其他事物”，這裡所謂“其他事物”，就是指他是個人主義原則的代表，是不自覺而又无情的公社破壞者而言。吉荷米洛夫先生“在絕對不能相容的對立中思維着”，他不懂怎樣可以承認資本主義的有益作用，而同時又組織工人來對它鬥爭，怎樣可以擁護集體主義原則，而同時又把具體表現這一原則的東西的分化看作是進步的勝利。我們的形而上學家，是“徹底的而能犧牲自己的人”，他們以為深信“俄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人，就只有去為“原始積累的騎士們”服務。他的論據可以稱為典型的形而上學思想。“能實行階級專政的工人幾乎是不存在的。所以用不着替他爭政權。社會主義是對於最近的和必要的目的之一種無益而有害的障礙，把它暫時完全放棄，不是有益得多嗎？”吉荷米洛夫先生不了解，不能實行階級專政的工人可以一年年地，一天天地變得越來越能實行，這一能力的增長大半要靠懂得歷史發展意義的人去起推動的作用。我們作者的語言，“即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話”。

“我們初看起來，這種思維方法好象是很有理的，因為它正是合乎所謂常識的。可是，人的常識，在家庭四壁之內的生活範圍中，雖是極可尊敬的伴侶，但一踏上廣大的研究的世界時，它就會立刻經歷最可驚的變故。”¹⁵⁶

我們已經知道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常識在前提探討方面的游歷中經歷了哪一些“可驚的變故”，可是這種常識連一點痕迹都沒有留下來。不過這一常識的歷史，歸根到底，也是辯證的歷史。常識是同時不存在而又存在的。它在前提方面已經碰壁，雖然如此，它正如復活了的羅坎波爾^①一樣，又神氣活現地更平凡的推理的

路上出现了。

我们自然将不放过和这一快乐的伴侣重逢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停留一下以便回忆我们照着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创议所已经走过的道路的方向。

(六)小土地所有制

我们已经知道在加工制造业方面资本主义大生产现在是在“不停地”发展；它以资本和现代技术的威力武装起来，越来越排挤掉小生产者，战胜和征服了他们。我们后来又说过国内市场是完全准备为大生产的利益而服务的，而且即在国际市场上，也并不是所有出路和道路都对于大生产关闭起来。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这方面不仅最近将来，而且连现在也属于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记得，在国民劳动的主要部分直到今日主要是用在农业的我国，民粹派是把公社看成我国反对资本主义的牢不可破的堡垒的。于是我们去考察公社，努力研究它现在的状况。这一研究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公社是在捐税重压下垮台的，是在货币经济及由此而生的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下分化的，在俄国许多地方，公社远远离开了自己从前保卫和保全自己社内所有成员（无一例外）的利益的使命，变成了富农的公社，这一公社如果被破坏，对于为富农们所奴役的乡村贫农只有利益。我们并不满意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曾力求明了我们的爱人民者所提出并寄以莫大希望的那些改革，如果实行起来会有多大意义。我们坚信这些改革的实施，只有使公社内部已经开始的分化更加厉害，公社绝不能成为一个堡垒以对抗那些现在已使它负了许多不可治疗的创伤的生产条件。我们现

① 罗次波尔(Rocambo)为法国小说家 Ponson du Terrail(朋松·迭·特尔列衣)小说中的主角，做了许多不可信的冒险。——译者

在关于小农农业說两句話，以便有权利就資本主义問題作最后的結論。

所謂“大农业的消灭”将使得我們免于資本主义的这个想法，是一个大錯誤。第一，这一“消灭”可能只是临时的、过渡的現象，而第二，小农业本身也力求发展为資產阶级的农业。那同一的美国的竞争，不仅使得我們的大地主在它的前面感觉沒有办法，而且也在农民身上印下自己的印記。在把我們的农业改变成了粮食商品的生产的时候，它(竞争。——譯者)就使农民的一切关系都隶属于鉄面无情的商品生产的諸規律。而这些鉄面无情的規律会使得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对生产者的剝削，造成企业主資本家和工人无产者两个阶级。由此看来，在俄国，关于小农业和大农业的問題只能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胜利的問題。农民經濟的旧基础不仅不因“大农业消灭”而臻于巩固，而是相反地，由于商品生产的所有矛盾完全移植到农民中而受害更大。农民这一等級更快地分化为两个敌对的陣营：少数的剝削者和多数的劳动者。

(七)結 論

假使，在上面的話講完以后，我們还再問，俄国將經過資本主义的学校嗎？那末我們毫不躊躇地用一个新的問題来回答，为什么它不在它已經进了的学校里毕业呢？

我們社会生活中所有最新的，因此是最有影响的那些潮流，我們生产和交換范围内一切具有最重要意义的事实，都只有一个无疑的和不可争辯的意义：它們不仅为資本主义肃清道路，而且本身也是資本主义发展中必要的和极为重要的环节。拥护資本主义的是我們社会生活的整个动态，是在社会机构运动时发展着的，同时

其本身又决定社会机构运动的方向和速度的所有那些力量。反对资本主义的，只是某一部分农民的多少成问题的一些利益，是那种时时使得每一落后的农业国家有文化的人痛苦地感觉到的惰性的力量。但是农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到能保卫自己的真实利益；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常常是不够关心积极拥护自己共同生活的旧原则。俄国资本主义的主流目前还不怎么大；在俄国还没有很多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完全符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公认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地方；但是从各方面流入这个主流的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河流和小溪，流入的水量很大，主流湍急而高涨是无可怀疑的。这人们是不能把它停止的，更谈不上使它干枯；我们只有调节它的流量，假如不愿它只给我们损害，假如我们没有抛弃那种那怕是使盲目的自然力局部地隶属于人的理性活动的希望的话。

但是，假使是如此，那末向来以为我们祖国拥有历史给它的独特性的特权（虽然谁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功劳才得到这样的特权）的我国社会主义者又将怎么办呢？

回答这一问题是不难的。

所有的未被了解的社会发展规律都以自然的诸规律那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盲目的残酷性发生作用。但是认识自然界的或社会发展的这一或那一规律，就是：第一，能避免和它发生冲突，因此可以避免白费力量，而第二，就是能这样调节其应用，使得人们可以从它得到益处。这种一般的思想，完全可以应用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为了革命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应当利用在俄国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时候开始的。

我们不当忽视的是这样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情况，就是俄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不是斯拉夫派或斯拉夫派化的革命家所想出

的，它是不可爭辯的和誰也知道的事實，這一事實對於我們工人階級的事業將帶來極大利益，只要俄國社會主義者不枉費自己的智力和精力去建立象封建—“謂徹”時代那樣的空中樓閣。

第四章 資本主义及我們的任务

(一) 行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質

上一章末了所說的話需要作一些解釋。最明确的見解往往被人作錯誤的解釋，只要这种解釋能够為誰的“綱領”辯護。我們必須在 i^① 上面打上一點，因為我們的論敵在看不見這一點的時候，可能由於“誤會”而把 i 認成 *фита* 或 *ижица*^② 的。從自己的前提由自己來得結論，在這類場合總比依靠別人的善意為好。再則，俄國綱領上的一些問題是完全和我們的“獨特性”不可分的，以致我們不能把從如下的觀點去考察這些問題的企圖看作是浪費時間，從這一觀點看來，獨特性只是斯拉夫派思想，不管它是“忠誠無諂”¹⁶⁷ 的一派，或是造反謀叛，跑到革命陣營中的一派都一樣。這樣的觀點是對或者不對，持這一觀點的人的議論是正確或者不正確，無疑地如果責備他們是在重復大家所早已知道和許多人所早已厭倦了的“理論”，便是不公平的。

這樣說來，深信“俄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某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究竟要怎樣辦呢？俄國社會主義的運動差不多發生在古老的良好的經濟制度崩潰的時候，我們怎樣利用這個情形來為俄國工人階級的事業謀真正的利益呢？這些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我們不會忘記這一回答的義務。但是發言權現在還不屬於我們。請記住，它還屬於吉荷米洛夫先生，他應當依照教會的和世俗的所有法規來充分利用這一權利。我們已經十分簡單地和得益很多地介紹了他的哲學—歷史以及社會—政治理論的一般原理。吉

荷米洛夫先生为了說服那些不懂的人和打击那些“思想不同”的人，不惜把历史老嫗及其“难以置信的道路”，西欧及其資本主义，最后又是母亲罗斯及其中国式的停滞和土地公社都搬了出来，在我們面前炫耀。他向我們解說了過去和現在。但是我們能滿足于这些嗎？我們能不展望将来嗎？

俄国的前途到底是怎样呢？

我們以为，首先将是資產階級的胜利和工人階級政治及經濟解放的开始。鉴于許許多多的事实，我們以为这样的結局是最可能的。我們已經研究过我們国民經濟的現狀，認定任何改良都拯救不了这一国民經濟的陈旧基础。但是我們这样的判断是由于忘記了“人类历史有时候会走最不可信的道路”。吉荷米洛夫先生牢記住他的哲学和历史理論中的这一基本原理，因此在論述将来的时候，对于他所描述的情景的不可信是不在乎的。我們試跟着他走，看看民意派主张的革命，究竟是否比民粹派主张的改良更现实一些。

首先，在我們的道路上，有很愉快的消息期待着我們。俄国面临着革命，“我們正走向剧变”。这使人很愉快，不过当吉荷米洛夫先生以捷尔沙文老头子所喜欢的那种夸张的“笔調”来解說本来已够森严的情景的意义时，我們又不禁感觉恐惧。政府阻挡国内革命运动的企图，“只会加速那一可怕的和胜利的时机的到来的，那时候俄国将声势浩大地（！）走进革命的破坏时期，有如江河的奔騰”等等。吉荷米洛夫先生写得很好！但是拿寓言是喂不飽夜鶩的③，那怕是克累洛夫老头子的寓言。不用說：“革命的破坏时期”会是我

① 系已作廢的一个俄文字母。——譯者

② 均系已作廢的俄文字母名。——譯者

③ 俄国諺語，即甘言无济于事之意。——譯者

們祖国历史中的快乐时期；但是我們总想知道革命将給俄国带来什么，“在历史之流的汹涌波涛的神秘綫后，期待着我們的是什么。”

吉荷米洛夫先生回答說：期待着我們的是“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而不是如“某一部分”人的意見，以为是“資本主义的王国”。

命运是何等的不可捉摸！这一历史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老嫗！她領導了，領導了“西方”走尽千辛万苦的“道路”，然而直到現在还不讓它脱离資本主义的生产；她在几世紀以来，一直沒有管我們，沒有推动我們一步，而現在一下子就想在自己的学校里把我們提升到高級班。这是因为我們有哪些美德呢？还是因为我們在这时期一直是規規矩矩地坐着，对她不提出“自由言論的”西方所最长于提出的那些不客气的问题呢？

不过我們自己現在已經开始了那种不可允許的“自由言論”。我們这种怀疑是完全不适宜的，因为历史有时喜欢走难以置信的路，象黑列士达可夫有时喜欢“讀点滑稽的东西”一样。Credo, quia absurdum!¹⁶⁸

我們固然承認怪想很多的历史老嫗的最难置信的怪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总想問問，历史拥有哪些手段来实现吉荷米洛夫先生代她所作的諾言呢？引导我們到“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的路要經過哪些地方呢？

我們的作者怎样回答这一問題，他所編的《导报》怎样地說呢？

請讀者不要忘記《民意导报》的綱領“所团結的是彼此間一些意見不大一致的分子”。其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拥护自己的生存，力求自己活着和发展，并不是永久地对自己的反对者沒有一点損害。由此就有矛盾，由此我們关于这一杂志的綱領就得出一个清楚的概念。只有一件事很明白，就是吉荷米洛夫先生不仅不为自己的編輯同事所說的話所約束，而且甚至在当独唱为二重唱所代替，

当他的声音以外还有可敬的拉甫罗夫的声音加入的时候，也不受他自己所說的話的約束。例如：据拉甫罗夫說，“民意”党“把所有自己的力量^①（重点是我們加的）都指向反对主要的敌人，而敌人是妨碍任何稍为合理的着手去解决任务的”¹⁶⁹。这一任务曾为我們集团里的一个分子^②表述如下：“帮助我們的工人阶级锻炼成为自觉的社会力量，在工人阶级历史經驗不足的地方予以某种程度的补充，同它在一起为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假如现实和“历史的書信”的可敬的作者所說的相合，那末，“民意”党现在的任务可以归结为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将来肃清道路。而且民意党的作用竟是純粹消极性的。它不是准备各种成分来組織俄国工人党，而是“把所有自己的力量都指向反对主要的敌人”，敌人不仅妨碍人去解决、而且甚至妨碍人着手去解决类似的任务。拉甫罗夫先生所指的是哪种敌人呢？每个人都同意現時这样的敌人只能是专制制度，它束縛着俄国所有的活的力量；民意派分子更应当这样的承認，因为他們在出版物上不止一次表示如下的思想：在我国不是政治制度憑借某种經濟关系，而是相反地，这些經濟关系的存在得力于专制制度。假使是这样的話，那末“民意”党的斗争，不多不少，只是为了求自己祖国的政治解放，而“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自然要被推到俄国工人阶级終于成为自觉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了。換句話說，首先“民意”党主要是一个立宪的政党（即使它不純粹是这样的党），因为它“现在把所有自己的力量都指向”摧毁专制的制度。似乎是这样嗎？或者“民意”党也許并不特別象这样“偏好宪法”呢？但是，那时候又将怎样了解那种为在将来“可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而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斗争的活动呢？有些民

① 參閱《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第67頁。

② 薇·查·170 对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小册子俄譯本的序言，第9頁。

意派的作家的确对宪法一詞不象有何偏好，他們說，他們的党力求实现“人民統治”。但是在民主主义宪法与人民統治之間的差別和 калоши 与 мокроступы^① 之間的差別一样，都不过是用一般人都知道的外國字来代替笨拙的俄国本国語罢了。而且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民主主义或是人民統治，又必須以人民有某种政治教育为前提，只要“人民統治”不是指一小撮人假借民意来統治的話。这是說，連民主主义的宪法也并不是一个能在短期间內实现的目的，也只有靠团結生产阶级为一个特殊的民主政党方能达到。但是在我們俄国“主要的敌人”甚至妨碍着“任何稍为合理的着手”去解决工人阶级社会政治的任务。这是說，打倒“敌人”！政治自由的“偏好”万岁，因此也是宪法的“偏好”万岁！“民意”党的活动是具有明了而确定的意义的。

我們讀了拉甫罗夫的書評以后，得到这样邏輯的結論。这里一切都很明白，虽然或許不是一切都博得这个或那个讀者的同情。不幸，書評不足以表明一个《社会-政治》杂志的傾向，而我們在这里談到拉甫罗夫先生的書評，亦只因为它里面有对于我們集团的直接回答罢了。《导报》的指导性論文以及它的編輯部的直接声明，只有使人弄不清楚这一刊物的真正方針問題。拿它的发刊《声明》來說吧，讀一下它講实现社会主义一般目的的方法的几行¹⁷¹，你以为你是在讀一个“信仰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文章。編輯先生們說：“达到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共同目的只能通过一条道路（讀者，注意这一点！）：工人阶级（城市的和乡村的）必須逐步地团結和組織起来成为一个有共同利害和追求共同目标的社会力量；这一力量在团結过程中必須逐漸破坏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通

① 这两个俄文字都指“套鞋”，后者只是土称。——譯者

过斗争本身而巩固自己的組織和发展到强大无比，一直到它最后推翻現存制度的时候”。《声明》的作者甚至接着說：“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在意識到这一道路的必要性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認為，“民意”党所表現的“俄国社会主义”，不多不少，正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了。《声明》說明民意党的任务，看起来，比拉甫罗夫先生的書評說得更明白些，而且比它更接近全世界文明国家“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的觀點。然而大家知道，俄国人在估計社会現象的时候常常是有两个尺度、两个标准的：一个用于“西方”，另一个用于国内。俄国人从来不拒絕同情欧洲最先进的理想，然而，他常常是狡猾地对于自己所信仰的这种人类的共同信条加上一个有最重要意义的“但是”，使得他所珍視的“理想”变得面目全非。不消說，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声明》沒有这样的“但是”也不行；同样明白的，我們关于《导报》的綱領，在这綱領还没有完成那一个由西方到东方的困难的过渡的时候，也絕對說不出什么确定的意見来。讓我們从这一成問題的方面来看看《声明》吧，而且要注意地看它，因为它的作者們都是些俄国人，而且只要是俄国的东西，对于他們大概都不是陌生的。

《声明》的第5頁說：“但是俄国社会主义的綱領，在現在的一分鐘，在現在的条件下不能限于这些共同的社会主义傾向。历史在今天、在每一个社会团体之前都是根据各种环境的經濟、法律和文化条件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提出这些相同的任务的。民意党深信在俄罗斯帝国的臣民之前，現在提出这些任务，必然是如下的形式：必須改变俄国政治制度，以便每一个进步的党，包括（重点是我們加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內都有可能向前健康的发展”……所以“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綱領里面，与构成綱領實質的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并列的，还有关于最近任务的規定：准备和加速俄国政

治制度的改变”。

应当承認，跟着述說“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共同的社会主义目的”的第一个“但是”的特点就是一个大的不明白，不确实。真是一个带許多未知数的方程式！讀者完全不明白，編者是怎样了解“俄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呢？”是吉荷米洛夫和克·塔·172先生們所說的“人民統治”呢，还是顛复“主要的敌人”等等，換言之，乾脆是专制制度的垮台呢？而为什么这一“最近任务”是和“共同的社会主义諸目的相并列”，而不是从它們里面作为邏輯的彻底性而推断得出来的呢？关于这一切只可以猜測。我們的猜測有許多是可能的，但是沒有一个是絕對無疑的。实际上，編者說，他所願望的“改变”应当是給“每一个进步的党，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政党在內，向前健康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其他的进步的党是哪些党呢？显然是些資產階級政党。但是資產階級政党在政治方面的“健康发展”沒有与之相应的在經濟方面的“向前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說，資產階級的发展将是俄国的进步的現象嗎？大概从編者的話正应当得出这样的結論吧。至于我們呢，那末，我們准备附以重要的保留来同意这一意見。但是問題不在我們，而在《声明》的作者之一的吉荷米洛夫先生，他，如我們已知道的，劝自己的讀者們“不要把私人企业資本当偶像来崇拜”。从他关于究竟“这一类的資本在俄国能做什么”所說的話看来，資產階級的諸政党“向前健康的发展”大概对俄国純粹是一种損失。而且《声明》急忙接着說，社会主义的政党（正如所有其他政党一样，我們順便指出）認為自己是真正的和唯一可能的进步的代表人。就是說，沒有任何其他的进步諸政党嗎？那末这里为什么又說它們的“向前健康发展”呢？

如果，据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見，“俄国政治制度的改变”必須合于諸进步政党的利益，而同时除社会主义政党以外，其他进步

的政党就不存在，那末，所謂“改变”純粹是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利益了。換言之，行将到来的革命必須至少要达到上述的“人民統治”的胜利，即是“工人階級(城市的和乡村的)”的政治統治。但是須知“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在意識到”如下的真理上是一致的：工人階級只能“逐漸破坏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因此也就是，“逐漸”接近自己的統治的时辰。同样，据編者說，“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家”都同意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条道路”，即是逐漸团結和組織工人階級为“一个社会的力量”等等。或者，《民意导报》認為这样的組織工作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嗎？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在現代的俄国，据拉甫罗夫先生的意見，存在着某一个“主要敌人”，他妨碍着“任何稍为合理地着手去解决这样的任务”。而这一任务一日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人民統治也不可能。那末，編者所說“俄国政治制度的改变”不是指的这两者嗎？但是編者究竟是怎样了解这种神秘的改变呢？是指吉荷米洛夫先生“有点不大了解”人們何以如此“偏好”的那种宪法嗎？“民意”是在为哪些进步的政党創造“向前健康的发展的可能性”呢？难道不是指的“私人企业資本”的政党嗎？

在“西方”一切是何等光明，而在东方一切是何等昏暗！而这种昏暗只是跟在描述“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之后的一个“但是”所产生的。在这两个字眼里面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呢？

問題是很簡單的。

正在我們所感兴趣的这一点上，开始了一种过程，由于它而《导报》綱領的組成分子竟“彼此間有一些(甚至是很大的)不一致”。在敘述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的”及导其实现的唯一道路以后，东方就和西方发生斗争。而这一斗争，开始时是暗中进行和无声无臭的，在《我們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中就到了白热化的

地步。在这篇论文里西方被“怀疑”。关于它的历史，吉荷米洛夫先生发表了一些十分“冒险的”冗长议论，谈到一般的历史的一些“冒险的”和“难以置信的”道路，而最后为《发刊声明》所指出的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道路，就变成已停刊的《警钟》的纲领的翻版；补充了一些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独特性的例证。在用了一个小小的“但是”以后，一切都面目全非，都变成和自己相反，编者的世界观中的西方领域和东方领域被分隔开了，或者更正确些说，编辑先生们所共有的见解和吉荷米洛夫先生所私有的见解被分隔开了。而这样的变质，完全是靠了从特卡乔夫论文中拖出几个新的“但是”来完成的。不用说，在《警钟》编者口中没有说服力的论据，在《民意导报》的篇幅中不见得更有说服力。但是同老朋友会见总是愉快的，单就这一点说，我们禁不住想引起读者对于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论据的注意。

作为布朗基——或更正确些说，特卡乔夫——的真正信徒，吉荷米洛夫先生着手讨论这些或另一些革命问题时，首先就力图以自己的意志来代替历史的发展，以委员会的主动来代替阶级的主动，把国内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变为秘密团体的事业。在那些稍受过现代社会主义宣传影响的人，和哪怕是一半相信“工人的解放必须是工人本身的事业”的人的面前，是不容易玩这样的把戏的。所以我们的作者力图证明，执行委员会的事业不仅在利害方面说，而且在意志和意识方面说，也将是全民的事业。他既不得不同意俄国民族的历史发展至今为止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及革命的（不只是叛乱的）诸倾向的形成很少帮助，于是他更热心地拿俄国生活及俄国世界观的史前期各种形式的稳固性、不可动摇性来说服我们。

经济革命，在西方是经过长久而困难的运动以后才临近的，竟由于我们长期停滞的关系也离我们很近了。但是因为稍微通晓历

史的讀者就会怀疑这样的可能，所以就告訴他們說，历史的道路“有时候是所能想到的一切道路中的十分曲折和最冒险的”。我們的巴枯宁主义者所喜爱的俄国社会发展公式的特殊性这样就好象成为这一公式的可能性的某种保證。使工人要求經濟解放的斗争具有階級性質的这一必要性，也因为这样而被忽視。

拿俄国和西方来对比，即在这里也成功地解决了所有困难。在西方有階級存在，这些階級在經濟上的界限是划得鮮明，在政治上是各自团結和有力量的。国家本身在那里就是階級斗争的結果和胜利者手中的武器。所以在那里要掌握国家政权，只能在階級和階級对立，只能在战敗胜利者以后。在我国就不是这样，我国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和西欧的完全相反。在我国不是階級斗争决定国家的現存制度，而是相反地，某些階級的存在，它們的斗争和对抗乃是由这一制度所喚起。假使国家决定改变自己的政策，那末上层的那些階級在失去了国家的支持以后，就注定了灭亡，而人民的原始集体主义的各种原則，就获得了“向前健康发展”的可能性。但是罗曼諾夫王朝的政府不願而且不能抛弃自己的貴族資產階級的传统，而我們既願意，也能够这样做，我們是受了經濟平等和“人民統治”等理想所鼓舞的。所以打倒罗曼諾夫王朝，我們的委员会万岁！这是俄国的一雅各宾的論据的不变公式，不管它在原本中、即《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还是在抄本中、即《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中都被人遇見。

我們已經說过，特卡乔夫綱領的基本前提，是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从而汲取自己的政治智慧的那同一的来源中剽窃来的。巴枯宁的理論是这两派学說的基础。但是大家知道，巴枯宁的影响不限于这两派。他在“西方”，即是在那些他如此乐意地用以与俄国对立的那些国家，也有一些学生。而妙的是，《国家制度与无

政府》的作者的西方追随者們在自己的“西欧”階級关系的历史中正給国家以那种优越的作用，如象特卡乔夫和吉荷米洛夫先生們只归之于俄国，而且認出这是使它“有别于”其他的东西。阿尔图尔·阿尔努对法国工人們說：“推翻政府的专政吧，那时候，你們就只是彼此相似的人了，就只剩下其平衡由于靜力学的简单法則而很快可以恢复的經濟的力量了。……由此看来你們的貧穷和无力，和你們敌人們的有力和蛮橫一样都是国家，而且只是国家所造成的”^①。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場合，要比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和特卡乔夫主义者談論得勇敢些和彻底些。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中，其重要性为他們弄得等于零的那一經濟因素，据他們的俄国“伙伴們”的意見，只是在俄国才注定不起作用。俄国独特性的特征，这样一来，就变成象征无政府主义者之无知的世界主义的魔影。所謂一个国家发展的客观条件，原来是所有文明国家“某部分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觀認識的缺点和邏輯推理上的失算。

俄国的雅各宾主义者的議論，虽然因为这样而失去自己的大部分的独特性，然而並沒有失去自己的教益性。在关于应当怎样看我們的现实，沒有說什么新意見的时候，他們的例子却生动地表明，不应当怎样看待它，不应当怎样解释它的一些特点。

吉荷米洛夫先生照着俄国雅各宾主义者平常的那种习惯努力向自己的讀者証明說——如象特卡乔夫在某个时候所說的——“我們目前所处的时刻，特別有利于社会革命”。他把在俄国土地上的一切社会力量的現时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得出从行将到来的革命里，除了“俄国的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以外，不会出現其他的东西的結論。他无須走多远去找証明。《給恩格斯的一封信》是

^① 《国家与革命》(《L'État et la révolution》)，第65頁。

俄国的一雅各宾的論据的結晶，这一論据在整整十年来对于許許多多的讀者一直就保持着美妙的新鮮性和新穎性。只需把这結晶放在修辞学的热水中溶解，就可以得出一切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所特有的对革命的期待。我們进而看一看这一个簡化的調制“新”綱領的方法，我們从政治的“因素”开始吧。

关于这点，特卡乔夫是怎样說呢？

讀者自然会記得我們在前面所引的《給恩格斯的公开信》里面的几大段。讀者沒有忘記掉特卡乔夫的信念，他認為虽然“我們沒有城市无产階級，但是我們也完全沒有资产階級。在我們这里，在受苦的的人民和压迫他們的国家之間沒有任何的中間等級”。这一资产階級的缺乏也就是吉荷米洛夫先生全部政治議論的基础。

据他說，我們的资产階級在經濟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在政治方面是軟弱无力的。至于說到人民，那末，“在有几点上面，內部是不会分成集团的，而是相反地，将永久完全一致”（第 251 頁）。这几点中的第一点竟是“关于最高政权的观念”。問題是，“依照人民的意見，最高政权是全民的、而絕不是階級的代表机关。只是靠了这样的信念的牢不可破的穩固性，沙皇們的政权才得以維持”。正是关于我們最高政权是全民的性質这一信念，也加强了吉荷米洛夫先生对于人民統治不久会胜利的信仰。由沙皇专制过渡到后者，“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国的人民正是从能够說 *l'état c'est moi* (朕即国家) 的专制国王的观念，沒有困难地(?)过渡到 *peuple souverain* (专制的人民) 的观念的。在那里由于资产階級的力量，专制的人民的統治事实上沒有建立起来”；我們沒有资产階級，所以，沒有东西能阻碍人民統治在我国的胜利，“只要专制政治不致維持得长久，足以使资产階級有時間巩固，而达到在資本主义原則上組織我們全国生产必要的程度的話”。但是“象現在这样混乱状

态的俄国，恐怕很难等到资产阶级自身会发展到能从混乱中产生出秩序的时候，哪怕是资产阶级的秩序”……。所以，“假如我们得以活到在这以前看见现存制度的崩溃，那末，资产阶级将没有任何夺取政权的能力”。

我们由此看见，“我们目前所处的时刻”的确是很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一方面“俄国恐怕很难等待”，而另一方面除人民，或者，大概可说，除革命政党以外，绝对没有别人夺取政权。特卡乔夫在说：社会革命“要就是现在，要就是很慢或者永远不会”，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是这样，拉甫罗夫在称说这一信念是利用俄国读者的头脑简单的时候，就不对了。

我们也看见，关于“政治因素”的问题，特卡乔夫的激昂议论没有给吉荷米洛夫先生添许多麻烦。他只是用个别例子来补充特卡乔夫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强，俄国资产阶级弱的一般议论。连大革命，由于它而法国人民大概会变成专制的，假如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妨碍，也是他所举的一个例子。

車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有绝对原则的人是幸福的。他们不需要观察事实，也不需要思考：他们对于各种病症都事先准备好了药方，而且对各种病症都用同样的药方，如象一个有名的医生要对每一个病人说 *purgare et clystirizare*（服泻药和灌肠）一样。……这一类的符咒许多人都有。比方，对于阿加克·阿加克维奇^①因为大衣被偷而向之申诉的那个‘要人’，他的符咒就是‘申斥’。落后学派的经济学家的这一符咒，就是有名的口号‘国家不干涉’。”最后，让我们接着说吧，对于同等落后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学派，“资产阶级”就起这样的符咒的作用。引证它弱或者说它完全不存在就

① 阿加克·阿加克维奇为果戈里短篇小说《外套》中的主角。——译者

解決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一切最困難的問題。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握有這種點金石的幸運的人中間不是占的最後的一個位置。為什麼在法國沒有建立“人民的專制”呢？因為“資產階級的力量”妨礙了它。為什麼在我國當人民“對於沙皇專制失望”以後，就能建立它呢？因為我國的資產階級弱。為什麼在西方，實現“所有社會主義者的共同目的”的唯一道路，是緩慢而漸進的組織工人階級（城市的和鄉村的）“為自覺的社會力量”，而在我國卻“有時候說”：“革命家的奪取政權”可以成為革命的出發點，而革命又成為“俄國的社會主義組織”的出發點呢？又是因為在西方強的資產階級在我國很弱。Purgare et clystirizare 這種醫學的理論是多麼簡單，醫術的實踐是多麼容易！不幸，社會問題要比醫學問題稍微複雜些，因此甚至於和莫里哀的醫生相似的政論家們應當儲存一些更巧妙的符咒。可以打賭說，“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所掌握的鑰匙為他們開啟不解決許多歷史問題的門戶。為什麼西班牙人民對於“皇帝專制”失望以後不能“沒有困難”地過渡到人民專制的思想呢？假定說，西班牙是歐洲最“西方”的一個國家，但是，連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也不敢把西班牙的（尤其是本世紀初的）資產階級說成有多大的力量。何況，如盧契茨基不久以前進行的研究所表明的，“公社的土地所有制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在西班牙比在任何其他異教國家更為普遍呢¹⁷³。無論怎樣嘗試，吉荷米洛夫式的鑰匙開啟不了這個門戶！

且讓我們來幫助處在這種困難情境中的“俄國的社會主義者”吧。假使兩個人的智慧加起來比一個人的多，那末，有同樣的權利可以說兩個符咒比一個哪怕是很好的符咒強。這樣說來，他們為什麼不在“資產階級”之外還加上任何一個同樣有吸引力的詞，比方說，天主教、新教，或者是一般非正教的宗教呢。假定這個符咒

不是新的，而且已在保守一派的斯拉夫派人手中簡直被磨損了，但是它未必不比“資產階級”更万能些。因為我們是否真沒有資產階級，假使是有，它是否真比所有西方國家的所有“人民對皇帝專制失望”的各時期的資產階級“弱些”，這都還是大問題；而正教則無疑地是“真正的和十足的俄國的”特征，是西歐所完全沒有的。借助它可以很容易地解決在完全沒有強有力的資產階級的二十年代的西班牙是什麼東西妨礙了“人民專制政權的實際建立”的問題。只要指出天主教起妨礙的作用就夠了。先生們為何不試試呢？

不過我們絕無意思輕視吉荷米洛夫式符咒的意義，我們不僅知道它對於他的價值，而且自己也想在實際上嘗試應用它一下。為什麼西方的“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了解他們所說的事情，而沒有把吉荷米洛夫式的混亂引入他們所研究的問題里面呢？難道不是因為“西方的”資產階級比我們強些嗎？很象是這樣！在資產階級強的地方，國家的經濟就很發達，所有的社會關係也就很清楚和確定。凡是社會關係清楚的地方，人們就不會憑幻想來解決政治問題；此所以“在西方”只有那些智力方面不可救藥的人才具有那種“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而這種狀態甚至是俄國“信仰堅定的和有思想的社會主義者”所常有的特征。由此，假如說吉荷米洛夫先生寫的政論很拙劣的話，那末，在這一點我們不應當怪他，而應當怪我們的資產階級弱。讀者看出，我們作者所喜愛的鑰匙有時候也能開啟很奇怪的匣子。

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論據雖然沒有什麼“新奇”，然而其“冒險性”却使人驚異。吉荷米洛夫先生怎樣得出結論說：人民把最高政權理解為“代表機關”呢？我們直到現在都以為現在的“人民關於最高政權的一些觀念”，是從他們絕對不理解代表機關而得到說明的。波斯的夏赫^①、埃及的赫迪夫^②和中國的皇帝的臣民們，關於

自己的最高政权也同俄国的农民們一样，有一些荒謬的成見。由此應該說波斯人、埃及人和中國人也同樣容易地轉變到“*peuple souverain*（專制的人民）的觀念”嗎？假使是這樣，那末我們越到東方就越接近人民統治的勝利了。再者，為什麼吉荷米洛夫先生認為我們的人民既然“對皇帝專制失望”，就只能夠成為自己的專制的擁護者呢？難道關於專制制度的實質的錯誤的理解在什麼時候保障過一個人或一整個民族不會對君主立憲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實質的認識發生錯誤嗎？吉荷米洛夫先生說“千百萬人民將一致地起來反對階級的国家，只要它的階級性質被弄得稍為明顯一點的話”。但是，問題也在于認識現在的缺點，還不能使人民正確地理解將來。難道我國的君主專制不是和各地一樣的都是“階級的国家”嗎？連吉荷米洛夫先生自己也承認在我國歷史中至少是從頒布“自由敕書”¹⁷⁴以來，“貴族已經是作為真正統治的等級而存在”了。難道人民不正是拿貴族和官僚的影響，和甚至他們的直接陰謀的結果來說明我國所有對他們不利的法律和所有行政上的專橫和壓迫嗎？假如是這樣，那末，我們帝制的階級性是很明顯的。我們假定對階級国家的抗議象一根紅綫一樣地貫串了我們的全部歷史。的確，“千百萬人民起義”反對過它，不過不幸，遠不是如象吉荷米洛夫先生關於將來所預言的那樣的“一致”。這些抗議產生了什麼結果呢？它們推翻了“階級的国家”，它們引導人民相信了現實的“最高政权”不符合於他們的政治理想嗎？假使沒有，那末，有什麼保證可以在君主立憲下面不會繼續這一可悲的歷史呢？人民對於“皇帝專制”失望了嗎？但是這種失望使人民擺脫了什麼？這種失望又妨害了什麼？須知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弱點，據

① 夏赫系波斯王的稱號。——譯者

② 赫迪夫系埃及王的稱號。——譯者

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說法，是在結論而不在前提。假使相信我們的作者，那末，俄国人民是很知道最高政权应当是怎樣的；他們要求，这一政权应当是“全民的代表机关”，而只是当他們需要确定，現在这种国家制度符合他們的理想嗎？只是在这些場合，他們才弄不清楚。他們看出了一個錯誤以后，可能陷入另一个同等可悲和粗野的錯誤。他們可能不知道在哪些条件下，他們自己的最高权利不再是空話和伪善的話，不再是掩护上层階級政治統治的帷幕。吉荷米洛夫先生是否承認俄国人民真的可能不知道这些条件呢？說到我們，那末我們对于这个问题絕不躊躇地作肯定的回答，不仅可能不知道，而且甚至多半不知道。假使不知道，那就犯錯誤，假使犯錯誤——和因为犯錯誤——吉荷米洛夫所归之于他們的那些理想就不能实现，換言之，他們将不会是专制的。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人民的这一类的政治失敗只有在“西方”才可能，而在他所喜爱的东方，在那些受着历史的热心关照，免除了資本主义的潰瘍的国家是不可能的。这也許是有道理的和能使人慰借的，假如人民的政治观念不和他們的經濟发展密切地联系着的話。不幸，这种联系是无可怀疑的，只有在人民的經濟关系失去其原始性，多少变成資產階級性的地方，人民才“对皇帝专制”失望；但是与此同时，資產階級也开始获得力量，換言之，直接过渡到人民专制也变成不可能了。不錯，吉荷米洛夫先生曾以俄国发展的独特性的想法来安慰我們。但是第一，一国历史的任何特点都不能使該国逃出一般的社会学規律的作用，而第二，我們已經知道現代俄国的經濟现实完全証实不了《民意导报》編者的政治怪論。人民对皇帝专制的失望只在开始象是可信的，而日益增长的公社分化和資產階級的原則在人民生活中的日益深入，已經是无庸怀疑和不可爭辯的事实。假使这样的平行关系在将来也維持着又将怎样

呢？要知道，到人民和沙皇制度完全决裂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变成万能的。那时候“人民統治”在我国将怎样产生呢？

我們要向吉荷米洛夫先生指出，我們拿人民专制和资产阶级統治来对比，只是为了他的方便。實質上我們以为这样的对比只是一些特殊場合才有意义。人民的政治上的专制絕不保障他們免于經濟上的奴役，而且也不排除一国資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苏黎世州是瑞士最民主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最有势力的一州。只是当經濟关系发展的自然过程使得上层阶级的繼續統治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民主的宪法方成为社会解放的手段。例如，在先进的国家，生产越来越变成集体性的，同时企业家个人占有生产品，則在整个社会經濟机构中，引起一連串的病态震动。人民开始了解这些震动的原因，因此，多半或早或迟会利用政权以求自己的經濟解放。但是，我們試設想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設想一个国家，在它里面大工业还只是在企求統治；同时它的經濟的基础还是商品的生产；換句話說，我們轉到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这种場合专制的人民”必須解决哪些經濟任务呢？首先而且唯一要解决的，就是保証个体小生产者的利益的任务，因为正是这一阶级构成人民中的多数。但是，在朝这一方向进行时，既逃不掉資本主义，也逃不掉大资产阶级的統治，因为商品生产的客观邏輯本身就是要把个体小生产者在一方面变成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变成资产阶级的企业家。当这样的轉化正在进行的时候，工人阶级当然要运用所有的政治手段来同资产阶级作决死的斗争。但是那时候，社会各阶级間的相互关系将变得界限分明，工人阶级将占据“人民”的地位，而人民的专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

由此看来，某一民族关于实现真实无伪的民主主义成熟到了什么程度，是被这个民族的經濟发展的程度决定的。經濟关系的

明确性决定政治派别同样的明确性，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引起了工人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一斗争渐近完结和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在所有“西方的”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形。

但是，斯拉夫派化的革命家先生们不愿俄国也是这样。正象俄国农民不喜欢成文法律，力求依照自己的道理、“随心意”来办事一样，俄国的知识分子也害怕历史的规律而诉之于独特的发展，诉之于“社会学的主观方法”等等，实质上也是诉之于同一的“心意”。从“心意”这一观点考察起来，历史就得到完全是特殊的色调。它不过是一连串的恶人反对好人的阴谋，只是由于恶人的力量大和好人的力量弱才妨碍“天国”降临到地上。不消说，恶人正由于自己坏而不能在自己中间建立牢固而持久的联合。他们不仅和好人斗争，而且在自己中间也斗争，组织各种党团和派别¹⁷⁵，互相夺取“政权”。恶人阵营中的这一内争自然有利于好人，对他们特别有利的就是那一个“时刻”，即是当恶人内部的一派已经无力掌握政权在自己手中，同时其他几派的力量还不够夺取政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好机会的临近，好人方面只要稍作努力，就至少能建立“人民的统治”。“俄国社会主义，如它表现”在特卡乔夫和吉荷米洛夫先生论文中的，实质上是善良的，富于感情的，它喜欢以如下的希望来安慰自己，即是说在“我们目前的时刻”，俄国正处在恶人和坏人的统治的空位期^①，即是专制制度在衰竭而资产阶级也软弱无力的时期。

我们在前面几页里已费了不少力来打破俄国革命的世界观这一幼稚和乐观的方面。但因为吉荷米洛夫先生宁肯同意自己的老

① 即旧君出缺新君尚未登位的空位期。——译者

师特卡乔夫而不会同意我們，即他的政敌，所以我們就拿我們的作者的《民意导报》的編輯同事的权威来对抗《警鐘》的編者的权威吧。拉甫罗夫先生大概不会放弃对第 27 期《前进！》上的社論中所发表的思想的拥护吧。这是一篇好极了的論文，作者在里面說：“在俄国，資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后果是在蓬勃而迅速地发展着”，“这是不論現制度的拥护者以及其反对者都不否認的”，又說，最后，社会主义者看这些現象只是“一个宿命的过程，只有靠一个办法来医治它：資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发展必然喚起和准备一种扫除掉这一制度的革命”。拉甫罗夫先生可以完全有理由地問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倫敦《双周評論》出版时期，无疑存在过的俄国資本主义和俄国資產階級，現在到哪里去了呢？而假使他能說服自己的同事，說資本主义不是一根針，不是可以在俄国生活忙乱中丢掉的，那末吉荷米洛夫先生自己会看出，威胁着似乎应当直接代替沙皇专制的人民統治的危險是从哪方面来的。凡在“資本主义制度及其一切后果是在蓬勃而迅速地发展着”的地方，資產階級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妨碍——例如在法国，据吉荷米洛夫先生說，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专制的人民的統治”的实际建立。

假使我們所引的《前进！》第 27 期論文的作者，談到資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的話是正确的，那末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正是我們現在的經濟关系异常有利于“在我們祖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奠立的可能的話就不正确了。他这样的議論，只是特卡乔夫和巴枯宁思想的略加变化的說法而已。

我們知道，特卡乔夫写信給恩格斯說：“我們的人民无知，这……是事实。但是他們在絕大多数場合都深信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原則；他們，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在本能上、在傳統上都是共产主义者。”

吉荷米洛夫先生十足地附和特卡乔夫，他說：“在人民的思想 and 习惯里存在着足够的一些因素，使人民的力量能成功地組織起来。农民能組織自己的自治机关，能接受土地为村社所有和集体地使用土地。”①《警鐘》的編者从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在俄国存在的这个事实作出我們的人民不管怎样无知，总比西方的各民族离社会主义要近很多的結論。《民意导报》的編者不敢跟随自己的老师达到这样极端的結論，但是他，自然，仍不断提醒自己的讀者，“我們的农民認識人民对土地的权利以及这一劳动工具的社会性，正如欧洲无产者認識他們对厂主工厂的权利一样的清楚。”吉荷米洛夫先生对于現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的知識太差了，所以无论如何他不能了解一个簡單的真理，即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重要的不仅是“欧洲无产者对厂主工厂的权利”的認識。羅馬的无产者某一时候也足够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对于富人的大庄园“的权利”，这些大庄园是靠了掠夺国家土地及沒收小所有者而发生的，但是他們即使能实现了自己的权利，也絕對出現不了任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靠这个或那个所有方式，而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組織来准备和促进的。資本主义的历史准备的意义实际是在赋予生产組織以社会性，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則用伏·伏·先生的話把这个意义說成“机械的联合工人”。不論特卡乔夫，伏·伏·先生，吉荷米洛夫先生，最后，不論民粹派和巴枯宁派中的誰都不肯費力气来向我們証明，俄国人民同“欧洲无产者”一样，是“清楚地了解”生产的社会組織的必要性的。然而整个問題就在这里。吉荷米洛夫先生应当永远記住，不是法律规范决定生产的組織，而是生产的組織决定法律规范。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历史都向

① 《民意导报》，第2期，第255頁。

我們証實這一點，甚至未開化和獨特的民族的历史也不例外。假使是這樣，假使在我們這裡真的沒有發生資本主義，那末，在比較俄國和西方的時候，應當不是拿結果而是拿原因來作出發點，不是看土地所有的支配的型式，而是看農業的占優勢的性質，看農業的組織及其行將發生的變化；須知土地所有的各種形式的命運正以這些變化為轉移。且讓吉荷米洛夫先生試向我們證明，在我國農業中現在支配的和在資本主義國家大機器工業中是同樣的傾向，即是說，至少是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計劃性的組織的傾向。假使他的這一嘗試成功，那末，他對於革命的經濟方面的期待將有頗為嚴重的意義。不然的話，所有他的政治—經濟意見和所有他的那些比較，又是歸結為那老一套的，比方說吧，用排除資產階級的方法來解決我們的所有社會問題；“俄國社會主義組織”的始基就失去和那“離我們不遠的時刻”行將到來的“劇變”的任何聯繫，而又將被推到多少是看不清楚的遠方。

我們所說的算夠了嗎？假使不夠，那末我們又要求助於可敬的拉甫羅夫。第27期《前進！》上好極了的一篇論文說：“極大多數的俄國人民所承繼下來的公社的或各種形式手工坊的團結精神，是局限在最狹小的界限之內的，在界限之外就有另一個領域，在它裡面在飢餓的和在各方面都受壓迫的人群之間開始相互為生存而競爭和鬥爭。在這一多数的人民中存在的土地屬農民的古老傳統，對最直接剝削人民勞動的人的古老仇恨，……不能表述為對經濟共產主義必要性的意識，這一多数不會明白，將來的社會會有什麼巨大的差異，假如在人民騷動成功的時候，經濟革命只限於財產（應當說是生產資料）的重新分配，而不是無條件地承認其共有。”我們所引証的作者正確地認為“財產如果只限於重新分配，而不是共有，必然會形成新的階級區分、新的剝削者，因此是在新形

式中重建资产阶级社会”。而的确，所谓“全民对土地的权利”一点也不含流动的生产资料共有的意义，因此就是允许了这些动产分配的不平等和富者对贫者的剥削。正是这种动产私有的腐蚀性的影响，促进了集体主义的原始形式的解体。

《前进！》的前编辑关于这一问题现在是怎样的看法呢？他还是继续承认刚才所引证的论据的正确性呢，还是他“本人的社会政治信念有了”如此“重大的演变”，而现在赞同了和这一论据不相容的特卡乔夫和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观点呢？

对于这一问题之直接而坚决的回答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假使人民认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不能成为奠定“俄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始基”的足够稳固的基础，那末，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所有的实际结论就丧失了一切的理由和意义。假使人民对于为自己经济解放所最不可缺的一些条件没有清楚的认识，那末这种解放本身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者的夺取政权也不能“成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所期待的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可见，应当说的，不是“我们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而是我们应当为革命作什么，如何对人民阐明革命的任务，如何避免资产阶级的胜利，或者使这一胜利有利于人民，如何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发展唤起和准备一种扫除这一制度的革命”？

“某部分的社会主义者”劝我们的“革命青年”在产业工人中从事宣传。吉荷米洛夫先生利用我们警察局的统计员的所有错误和完全无知来证明这一忠告的不实际性。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人数是少得使我们不能对于劳动居民的这一阶层寄予任何社会革命的希望。从他关于这一问题所谈的话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作者是站在旧民粹派忽视城市、颂扬乡村的观点。但是这种揣测也只是一部分的理由。吉荷米洛夫先生确实颂

揚鄉村，但是每一個細心的讀者馬上會了解，鄉村“一定會因這一類的夸奖而吃虧的”。其實，理想化是有各種各樣的，而且導致各種各樣的實際結論。不久以前的民粹派把人民理想化，一部分的目的是為了推動自己和我們整個知識分子群到人民中間去進行革命活動。把這種理想化更進一步的發展，你就會得到一種信念，認為人民由於自己的公社傾向，完全用不着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對他們起什麼影響。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作用，在這種場合就是純粹破壞性的，歸結為除掉那些妨害實現人民理想的外界障礙。我們在吉荷米洛夫先生論文中所遇到的，正是這樣的把人民理想化。我們的作者認為：“在革命的時機，如果說到國家政權的基本原則，我們的人民看來是不會分裂渙散的。同樣，在經濟關係方面，關於土地問題，……他們也將是一致的，為了集合群眾成為一個巨大的力量，圍繞於這兩點的周圍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宣傳，只需要使人民知道進行的是什麼工作就夠了”。把人民理想化表現到極端，就使得民粹派的活動也失去任何理由和意義。然而謀叛的重要性就正因此而更增加。謀叛家議論說，社會革命是由於現政府的影響而被阻撓的。去掉這個影響吧，由於你們破壞活動的結果，“俄國社會主義組織的始基”就一定會出現。在政治鬥爭中“政權屬於能在一定時間為保衛自己的事業而拿出最大有生力量的人”。不需要探問這一力量是從哪一個階級出來的。“得到”這一個力量，“供自己支配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甚至於可以“收買自己的戰士，或者靠使用某種經濟壓力，驅使他們來保衛自己”^①。更可以從社會里隨便什麼階級中招募他們。事業的成功只取決於巧妙的指揮已經“得到的”力量，使之適合於謀叛者的目的。所以吉荷米洛夫先生

① 《我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第250頁，載《民意導報》，第2期。

“有时候說”到革命家們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出发点”。这是从我們的作者的所有前提中邏輯地得出來的結論。

一切不幸在于，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前提經不起批評，在人民內部甚至关于“两个主要点”的問題，也不是百事大吉，而且还有其他各点，如果予以忽視，就会使得革命家們只有厉害地失望的。当然，为吉荷米洛夫先生所珍視、却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很少帮助的一些結論，也是会同前提在一起失效的。虛妄而夸张地把人民理想化的感情之霧，一經消散，现实就連同自己的迫切要求又呈現于我們之前。我們知道，如果沒有在人民中間的“特殊宣传”，就不能希望俄国革命运动会有成功的結果。我們深信，我們的革命家們是不可能滿足于特卡乔夫的綱領的，他們不妨記起一下《前进！》杂志的綱領。但是我們還沒有解答，他們和我們的布朗基主义傳統決裂会有多大的好处。在这种困难的場合，我們很願意确实知道拉甫罗夫先生的权威意見。

（二）“夺取政权”

不过，我們可以部分地猜到这种意見。对于吉荷米洛夫先生“有时候說到革命家們夺取政权作为革命的出发点”，可敬的編輯大概不会贊許。特卡乔夫也有一种习惯，“有时候說”到这种夺取，而这就引起了拉甫罗夫先生方面的严厉責难。《前进！》的編者甚至認為需要警告我們的革命青年不要和假朋友們在一起。他写道：“有些革命小团体認為，它們要求人民的福利，它們想通过革命，但不是人民的革命，来实现这一福利。”在这类的小团体看来，革命的全部哲学当然是夺取政权。“另一些人要求只是临时的专政，以便解散軍隊，撤換上层的反抗者，然后退出舞台，讓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第三种人梦想在做完自己的事以后，把专政的政权移交給人

民代表組成的縉紳議會或地方議會等等。這一類革命家的共同主張，是革命由少數人來干，再由少數人在或長或短的時間內繼續專政”。拉甫羅夫先生以編者的資格宣稱，他的雜誌永遠不能在自己的篇幅中不加反對地就登載少數人革命專政的理論，即所謂雅各賓的理論。他是根據以下的很正當的理由來排斥這一理論的。

“歷史證明了，而且心理學也告訴我們，任何無限的權力、任何專政都能把最優秀的人敗壞，甚至天才的人們在想着以命令造福人民的時候也是不能作到這一點的。任何專政必須擁有強制的力量，擁有使人盲從的工具。任何專政都須以暴力不僅鎮壓反動派，而且也鎮壓那些只是單純不同意它的行動方式的人們；凡是爭奪來的專政用在為維持政權而同它的政敵鬥爭上面的時間、努力、精力，必定比用在借助這一政權實現自己綱領上的時間、努力、精力為多。說到某一政黨用暴力實現專政以後會放棄專政（也就是說，專政只是‘革命的出發點’，不是嗎，編者先生？），這只有在奪取政權以前才這樣夢想；在各政黨為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在各種明顯的和秘密的陰謀互相激蕩中，每一分鐘都喚起保持政權的新的必要、重新表現出丟掉政權的不可能。只有新的革命才能從專政者們的手中奪取專政的權力”……“難道我們的革命青年同意去做幾個專政者們的寶座的柱石嗎？這些專政者即使最願意忘我犧牲，只能成為社會災難的新的源泉，何況他們多半還不是忘我犧牲的狂信者，而只是熱情洋溢的野心家，為政權本身而渴求政權，為自己而渴求政權呢？……”。

可敬的編者繼續說，“假使我們的一部分青年的確擁護專政，擁護少數人奪取政權，那末，《前進！》永遠不會是這一部分青年的機關報，……且讓俄國雅各賓主義者作反政府的鬥爭；我們將不妨礙他們，但是只要他們中間的一個快得到那屬於人民而不再屬於

任何个人的政权，人民的社会革命的党将永久是他們的敌人”^①。

拉甫罗夫的預言，果然精确地实现了。《前进！》杂志果然“永久不是”俄国雅各宾主义者的机关报。不错，拉甫罗夫本人做了“这一部分青年”的机关报的編輯。但是这是另一回事，和我們这里没有关系。

我們目前所感兴趣的是如下的想法。《历史書信》的作者从未在任何地方宣称过他关于夺取政权的見解已有改变，所以，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说，《民意导报》的編者之一对于这一类的夺取政权的态度是极端否定的。这样的信心使我們欢喜，和知名而可敬的作家意見一致是愉快的，而我們可以说，我們完全同意他关于夺取政权的思想，不过是通过稍为不同的道路来达到自己的信念的。我們总想喚起人們集中地注意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方面，不是注意个别人物的思想、感情——哪怕这些人物有独裁者的称号——而是注意这些独裁者所須考虑的社会条件，注意他們所要解决的社会任务的涵义。我們反对夺取政权不是因为“任何专政能把最优秀的人敗坏”，这一問題还很难說已为“历史和心理学”最后地解决。但是我們以为，假如“工人的解放必須是工人自己的事业”，那末在“城市的和乡村的”工人阶级沒有准备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任何专政都作不出任何事情来。而这样的准备普通是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組織的发展相并行的。所以我們提出如下的問題：俄国現代的經濟关系証明那些努力夺取政权，并打算借助政权以实现一連串社会-政治奇迹的人的綱領正确到如何的程度！这些人比精卫填海有更多实现其諾言的物質可能嗎？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小册子中我們詳細地解释

^① 《前进！》杂志編者：《告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倫敦，1874年，第40—43頁。

过，何以我們認為这一回答是現時唯一可能的答案。吉荷米洛夫先生不正面地研究我們的理由，也在他的那篇論文中談這一問題，用我們所用的一部分術語來回敬“某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但是我們的作者的論據照例是很沒有說服力的，而且他也不求有說服力。有時候他完全不去證明而只是斷言，也可以說發表這些或別些論點，仿佛他已經“奪取了”支配着自己讀者頭腦的“政權”。例如，他大聲叱罵那些認為靠現在革命政党的力量奪取政權實際是不可能的人們，斥責他們是“混淆概念”以後，以如下的……聲明來駁斥他們的理由：“不容懷疑，用任何革命的力量來奪取政權的問題，首先決定於現在的政府是否已經充分地瓦解、動搖和不得人心，假使這一切條件都存在，國家的變革就不是不可能，甚至也不是特別的困難。”^①他對這一有意思的問題不再作何解釋，即直接轉到討論我們革命者們“維持政權”的可能性問題。一切“思想不同”的人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遷就作者的異乎尋常的簡短語句。我們也只得遷就，尤其因為作者這次的幾個論點的真理性真的“不容懷疑”。但甚至在這樣的場合，問一下是誰“混淆概念”，是吉荷米洛夫先生，還是他的論敵？也是極適當的。第一，“國家的變革”和“以任何革命的力量奪取政權”絕不是一回事情。在“現政府瓦解、動搖和不得人心”的地方，國家的變革不僅“不是不可能”，而且簡直幾乎不可避免，因此，自然不是“特別”困難。但是這還不是說，“任何革命的力量”都能代替那已被推翻的政府，奪得它所失去的政權。國家的變革可能由彼此之間互相仇視，然而對於現在制度都採取革命立場的許多“力量”的行動的總和所完成。那時候“政權”也不為這些力量中的一個力量，而為它們的合成力所得，體現為一新的，臨

^① 《民意導報》，第2期，第255頁。

时的或正式政府。就这些力量中的每一个个别力量说来，“夺取政权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反为如下的结局所复杂化：这些力量已经不是和软弱、不得人心的敌人，而是和新鲜、勇敢、还没有为斗争所耗竭，而且还有一部分人民拥护的劲敌来争取政权。这一切都极为明白。而假使这是明白的，难道可以认为，现在的政府既不稳定，国家的变革多半会发生，于是我们所关心的“民意党”夺取政权就不成问题了吗？象这样意义和内容完全不同的概念的混淆难道是可以的吗？

但是人们对我们说，你使“国家变革”所具有的那种意思，完全不是吉荷米洛夫先生用那一名词所表示的意思。他所了解的“国家变革”，不仅指现政府的垮台和新政府的组织；他假定这一整个的革命，是由一个有名的、确定的、为他所同情的革命党经过一个成功的谋叛来完成的。谋叛是一个秘密的事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让所有在变革后可以与谋叛者们争功的那些人知道的。当拿破仑计划自己的“国家变革”时，他绝对不会把他的意愿告诉奥尔良派或正统派^①，更不会请他们帮忙。为波拿巴派的力量所得到的果实，完全归于波拿巴派；他们的政敌们只有气愤和失悔自己没有想到与完成这一勇敢的事业。这一有名的侄子所能做的，诚实的革命党人也能做。难道只有做坏事的人才享有胜利的特权吗？难道在政治冒险家手中证明适用的武器，对于诚实地谋求祖国人民幸福的人们就不适用了吗？

假使吉荷米洛夫先生真照后一意思了解“国家变革”，那末他仍是“混淆概念”，比我们以前所想的还更坏了。他有什么权利这

^① 正统派是法国1848年革命后第二共和国时期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一派，奥尔良派是拥护奥尔良王朝复辟的一派，波拿巴是拿破仑第三或小拿破仑，为拿破仑第一之侄。——译者

樣意外地和厚顏地用一定的具体的现实来頂替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呢？难道在一般意义上說是可能的，在应用于这个或那个个别的場合时不是往往变成不可能嗎？再者，难道可以在对俄国革命党推荐謀叛的道路时，只限于一些如下的空話，說組織成功的謀叛在政府瓦解和不得人心的地方，是不“特別困难”嗎？难道俄国的革命家只是一些一般的、沒有骨和肉的謀叛者，是一些脫离了一切条件（这些条件使对于某一些人是可能的事物，对于另一些人就是不可能和幻想）的謀叛者嗎？难道謀叛成功的机会不决定于它的参加者所屬的那一环境的特点，难道环境的特点不影响謀叛者的意图和目的嗎？只要从这一观点来看我們的革命环境，于是謀叛成功并不“特別困难”的話就丧失任何意义了。

我們的革命家的大多数，过去和直到現在，都属于哪一个階級，哪一个社会阶层呢？屬於所謂有思想的无产阶级。关于这一阶层的政治特性，我們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已詳細說过，我們很惋惜吉荷米洛夫先生認為沒有駁斥我們想法的必要。我們說过：“我們的有思想的无产阶级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已經做了很多事。他們动搖了专制制度，在社会中喚起了对政治的兴趣，在我們工人階級中間撒下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种子。他們正在从社会的上等階級过渡到下等階級，具有前者的教育和后者的民主主义本能。这一情势使得他們容易进行多方面的鼓动和宣传工作。但是这同一情势使他們对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阴谋之成功不能抱很大的希望。为了这种阴谋，光有才能、毅力和教育是不够的；阴谋者需要有和社会的联系、财富以及有势力的社会地位。而这正是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所缺乏的。他們只能靠与俄国社会上的其他不滿分子的联合才能弥补这个缺陷。我們假定他們的計劃将得到这些分子的同情，我們假定，参加这一阴谋的，有富有的地主們、資本家

們、官僚們、參謀和高級軍官們。陰謀的成功那時候將可靠些，雖說這樣的可靠性还是不很大的；我們只須回憶一下在歷史上有名的一些陰謀的大部分的結局。但是對社會主義陰謀的主要威脅將不是來自現政府方面，而是來自它自己的參加者方面。參加陰謀的是一些有勢力的和居高位的人，又是誠實的社会主義者，這只是一種‘幸運的偶然’。關於這些人的大部分，沒有任何保證說他們不願意利用他們所奪得的政權來從事和工人階級利益毫無關係的目的……由此，社會主義知識分子抱着在最近將來奪取政權的目的所進行的陰謀，如果在有勢力的人圈子內得到的同情越多，即是說，它的外表的勝利如果越可靠，它的結果就越可疑；相反地，這一陰謀的結果，如果談到它的參加者們的意願，也就是說，如果它的圈子越只限於我們的社会主義知識分子的話，它的愉快的結局將越發不可靠。”¹⁷⁶ 以上所說的明白嗎？我們說，我們的虛無主義背叛者，作為社會中革命的酵母是很有益的，但是並不奪取政權，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妨礙了這一點，我們是否對呢？拿破侖不是虛無主義者，而他為了實現他的國家變革必須在當初居共和國政府的首位。其次，假使虛無主義者也把足夠數量的有勢力和占居要職的人物拉到自己一面，假使跟在這些人物之後走的是各種的“白色將軍們”，那末，不是虛無主義者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而是他們利用虛無主義者的忘我犧牲的精神，把整個的陰謀變為達到自己個人目的的工具，難道這不是更可能些嗎？人們或許對我們說，高級的社會地位並不永久使人無可救藥的腐化，即使穿着將軍制服的人，也可能有一顆忠於人民的心。我們完全承認這點，但是仍然害怕達賴伊茨人¹⁷⁷。革命家關於參加謀叛的地位很高人物的忠貞和誠實將有些什麼保證呢？這些先生們的个人聲望能夠給與中央委員會保證嗎？委員會怎樣使我們相信自己的選擇沒有錯誤呢？

在如象整个国家的工人階級的命运的这样重要問題上，我們能滿足于这样的保證嗎？在这里就发现了一边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另一边是布朗基主义者之間的观点的差异。前者要求自己事业成功的客觀保證，他們認為这些保證是在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发展他們的自动性和发展他們的組織；后者滿足于純粹主觀特点的保證，把工人階級的事业交付于个别人物和委员会之手，使他們所珍視的理想之胜利取决于对这些或那些陰謀的参加者的个人品質之信任。陰謀者是誠实、勇敢而有經驗的人，社会主义就胜利；他們如果缺乏决心或本領，社会主义的胜利就会暂时被推延，如果有新的更有本領的陰謀家出現，則時間可能短；如果没有这一类的陰謀者，時間可能无限期地长。这里一切都歸結于偶然，歸結于个别分子的聪明、本領和意志^①。

請不要對我們說，現在的俄国布朗基主义者不否認在工人階級中間准备工作的重要。在《民意大事記》宣布了城市工人“对于革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130頁）以后，关于这一点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世界上难道有一个政党不会承認工人階

^① 不过，并非完全如此。有时候陰謀者認為某些自然的或天气的作用构成胜利的客觀条件。例如，《警鐘》有一期登載一篇关于馬勒將軍陰謀178的論文。这篇論文說：1812年法国沒有发生革命，只是因为那一年10月22—23日的那一夜完全出乎意料地和不巧地下了場大雨。讀者認為这是不会有的事嗎？請讀讀以下的一段，自己加以判断吧。“当一切弄好了的时候，馬勒想立刻出发到最近的一个軍營，但是天下着傾盆大雨，而陰謀者想等到雨住。他們只得等到三點鐘，这是一个致命的錯誤。陰謀在那一夜有完全成功的可能，因为民政机关和軍事机关是不会有時間在自己之間商量好的。陰謀者錯過了一个适当的片刻”，因此，而且仅仅因此，陰謀才沒有成功。

不管是誰看对于各民族历史命运的这样解释，毫無疑問地是，我們不能由这样的解释对于社会現象作任何清醒的預見，換言之，这就排除了严肃討論綱領問題的任何嘗試。

我們已經知道，吉荷米洛夫先生式“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将来也許会因为天气不好而被废弃。一般說來，大雨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越发有害，如果后者事业越是依賴于这个或那个委员会的成就，越是脱离該国工人階級的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

級在达到这一政党的目的上可以給它以重要的帮助嗎？铁血宰相现在的政策明白地表明：甚至于普魯士的封建地主也有这样的認識。現在大家都求助于工人，但不是大家說同样的話，不是大家都在自己的政綱中把工人放在同样的地位。这一差异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們的身上也可以看出。民主主义者雅可毕認為成立一个工会比起薩多瓦之战¹⁷⁹来，在文化—历史意义上說还更为重要。布朗基主义者当然完全同意这种意見。但是他的同意只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进步的主要动力，不是战争而是革命的阴谋。假使你对他提出工会和“悔过的贵族”¹⁸⁰的某师长，請他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舍前者而取后者。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工人“对革命”何等重要，但是位置很高的阴谋者还重要得多，沒有他們就不能前进一步，阴谋的整个結局常常可能系于这一或那一“大人”的行动^①。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看来，現時真实的革命运动只有在工人階級中才有可能；从布朗基主义者的观点看来，革命只是部分地依靠工人，工人对于革命有“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意义。社会民主主义者以为革命对于工人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布朗基主义者以为工人对于革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求工人自己完成自己的革命；布朗基主义者要求工人支持那被別人，比方說被軍官先生們，代替工人們并且用他們的名义所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有如十二月党人的阴谋之类。因此，活动的性質和力量的分配都有改变。一派主要是在工人中間活动，另一派只是附带地和工人发生关系，而且是在当这关系不妨碍工人以外开始的阴谋的众多的、复杂的、沒有預見到的和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有巨

^① 《警鐘》所报导的馬勒將軍謀叛史，詳細闡明了“部队”长官或甚至普通軍官“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为了执行他所想的計劃，馬勒至少需要得到两个能干的、机警的、热忱的、象他一样仇恨皇帝的軍官的帮助”等等。

大的实际重要性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可以说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布朗基主义者的阴谋的妄想的仇视态度。

(三)“人民”革命的可能后果

但是讓我們迁就一些吧。讓我們容許不可能的事情，讓我們假定“政权”真落在我們当代的革命家手中。他們这样的成功将导致什么呢？

我們听听我們的作者的意見。“胜利的临时政府的迫切的和首要的任务，就是出面援助人民革命。被夺得的国家政权必須用来到处使人民群众革命化和組織他們的政权，而这是革命家們很有把握能够完成的一种任务。在这里临时政府甚至也不去創造什么，而只是放任人民内部已經存在的和甚至是处在最紧张状态的力量……临时政府在此既沒有必要去强迫人民群众，也不需要教育他們。它只是在純外表上帮助他們罢了。”①

吉荷米洛夫先生談到“不得不夺取政权的临时政府”的作用的时候是这样地說。

他深信这种对人民的“純外表上”的帮助将达到“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的結果。假使我們回忆他的宗譜，那末，我們將看出他的这一类的信念是毫不足奇的，是依繼承法传給他的。巴枯宁“生”特卡乔夫，特卡乔夫生吉荷米洛夫及其弟兄們。假使我們的作者的文坛最近前輩所抱的見解是“人民时刻准备着”社会革命，那末这些前輩的后代相信人民有这样的准备，至少在“我們現在所处的时刻”是完全自然的。应当惊异的不是吉荷米洛夫先生，他在不好意思公开承認自己的渊源的时候，始終虔敬地保藏着自己的思

① 《民意导报》，第2期，第255—256頁。

想前輩的遺教。应当惊异的是那些抛弃了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理论的讀者，还想象着吉荷米洛夫先生对他们提供了更新的、更严肃的和更可以实现的东西。对于这一类的讀者，批評是徒托空言，而彻底性也是最无内容的概念！

凡是真正地到最后地抛弃了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妄想的人，就会看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上述信念是绝对没有什么根据的。这些人了解，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有一系列的措施，以便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組織工作。单就这一点說，我們也絕不能承認革命政府在“純外表上的”援助，就足够使这样的革命成功。此外，社会主义的組織需要有两个条件，沒有它們“存在”，就不可能担当起这种組織来。其中的第一个条件具有客觀性，并且包括在国家的經濟关系中。另一个条件具有純粹的主觀性，并且属于生产者本人。光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觀的經濟的可能是不够的，还需要使工人階級理解和意識到这个可能。这两个条件是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的。經濟的关系影响到人們的經濟概念。人們的經濟概念影响到他們的行动方式、影响到社会的关系，因此也影响到經濟的关系。因为我們已經“不相信”有“神力”，又不相信思想是天生的，那末，我們只有假定“思想的条理是决定于事物的条理”，人們对于他們周围的經濟现实的看法，是决定于这一现实本身的特性。这些特性也决定各階級的傾向，决定这些傾向在一个历史时期是保守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是革命的。某一階級只是当圍繞它的现实本身“有了分化”，当这现实内部暴露出某些矛盾的时候，才反抗这一现实，渐渐与之发生矛盾。已开始的反对这现实的斗争的性質、过程和結局是被这些矛盾的性質所决定的。在資本主义国家，主要的經濟矛盾之一，是一方面生产的社会性，和另一方面生产工具、生产資料，因此也是产品为企业家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完全不

可能放弃社会性生产組織的情形下，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法律规范适合于經濟的事实，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交给社会所有，由社会按照劳动者的需要来分配产品。而这个矛盾以及需要解决它的迫切必要性，越来越促使受它痛苦的人们觉悟，工人阶级越来越倾向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我們已經屢次的重复过为馬克思所証明的真理，即是說上述的矛盾在商品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要发生。但是商品生产和世界上的一切一样，不仅有結尾，而且有开头。商品生产不仅由于它所固有的矛盾，在准备着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它本身在某个时候也是一个新东西，它本身也是从自己的先行者的矛盾中发生出来的。大家知道，商品生产的先行者是自然經濟和原始集体制。在原始公社中，矛盾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它所特有的那种不許可把共产主义原則应用于公社相互間关系上面的局限性。这些关系引起交換的发达，社会劳动的产品成了商品，由于自己的这种新性質，就对于公社内部的組織产生了分解的影响。我們称为乡村公社的原始集体制分化的那一个阶段的特点，如我們所知道的，就是在公社的公地上，由个别农户来經營农业的这一个矛盾。这就导致私有财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新的增强，同时也导致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那些矛盾的发生，换言之，即导致資本对劳动的剝削。由此，商品生产，由于社会性的生产組織和个人的占有方式之間的矛盾，就临近末日。相反地，商品生产，由于經濟的个人性和最主要生产手段之一——土地——的社会占有性之間的矛盾，却是向前发展的。現在我們問吉荷米洛夫先生，俄国現在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呢？它的經濟关系所特有的是我們上述的哪一种矛盾呢？假使是第一种，那末，把俄国和西方对比是沒有意义的，因此，俄国那些“社会革命”綱領的特殊性就沒有意义了。假使是第二种，那末，革命政府用什么方

法停止商品生产的繼續发展呢？革命政府用什么方法解决我們乡村公社所特有的那些矛盾呢？

革命家們夺取政权可能有两个結局。

或者是临时政府对于人民真限于“純外表的”帮助，对他们不施以任何的教育，不行任何强制，讓他們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經濟关系。

或者，临时政府不信赖人民的智慧，把已夺得的政权握在自己之手，自己担任起社会主义生产的組織来。

我們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已經說到这两个結局的每一个。現在，我們只有重复和发挥那里所表示过的思想。

吉荷米洛夫先生已經使我們沒有必要詳細解說我們上面所假設的第二个前途。他对于“共产主义政府的专制”連听也不要听。他所要求于临时政府的，是“在純外表上”“帮助”人民，是“暂时地和只在当时条件下，能实现人民专制的程度之內組織人民”。不管这后一句話多么含糊，假使它有一点意义，那就是意味着坚决拒絕“夺取了政权”的秘密組織用命令来普及社会主义的任何企图。最后，我們的作者公开宣称，临时政府必須使用权力，“当然，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当然又是一片胡說，因为，社会主义的——哪怕是临时的——政府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建設社会主义制度，这便是一个可笑的政府。但是，不管那里怎么样，显然地，吉荷米洛夫先生是深信临时政府不需要“創造什么，而只是放任人民內部已經存在的力量”的。我們現在看一看这一类“放任”的活动会引起什么結果。

我們的作者沒有解釋，临时政府将需要好长的时期来“組織人民群众的权力”，他也沒有說这个組織从他的党的神秘的“方言”譯成俄文的标准語究竟是什么意义。他关于已夺取政权的“民意党”

的政府如何为“人民所选举、所监督和可以罢免的”政府所代替也一字不談。所以我們只好自己从所有可能的猜測中选择一個最可靠的。东方的国家一直是以宮庭革命或缺少自觉政治行动的人民运动著称的。为了稍微清楚地設想俄国革命的可能道路，我們不禁要假定俄国革命不管怎样特殊，終归是照西方的样子(哪怕是部分地)来进行的。而在西方，事情通常是这样发生的。为革命所推动的临时政府，在繼續支持革命以抵制反动派进攻的时候，召集了立宪會議，把国家的命运交給它决定。立宪會議于制訂新宪法之后，成立了正式政府以符合全国的或該国几个階級的最坚决的要求。不消說，新的政府之为正式的，只是到新的革命发生的时候，或者到国家的宪政机构有新的改变的时候为止。

現在讓我們設想“民意党”于取得政权后，仍旧信守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諾言，不强制俄国的人民做什么，便召集他們的代表来开立宪會議。又假定，选举是在最有利于革命家們的条件之下进行，只是在“人民的經濟独立获得保障”之后，换言之，在剝夺了大地主和大企业家之后才着手。我們甚至假定临时政府規定等級的和階級的选举資格，只承認农民、手工业者和腦力的及体力的劳动的无产者們的政治权利。最后，又假定临时政府能够捍卫，而立宪會議也能够巩固人民的“政治独立性”。这后者将越发是困难的事情，如果吉荷米洛夫先生所預言的革命时刻来得越快；我們从同一的吉荷米洛夫先生这里知道，即使資產階級軟弱无力，人民統治也只有人民对于沙皇专制十分失望之后，才是可能的。由此說来，假使到革命爆发的时候，这种失望还不十分强烈，那就不会有人民統治，而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华帝国或秘魯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但是，我們并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們考虑到俄国“很难等待”，

而且假定我們的祖国有鑒于这样的絕境，而急忙推翻专制。我們是如此讓步，准备承認最好的結局是最靠得住的；准备承認我們將建立最純粹的“人民統治”，即是說，人民直接的立法。我們只問，可以“期待”专制的人民立即奠立“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嗎？

我們早已知道：

…Wo die Begriffe fehlen,

Da stellt ein Wort zur rechten Zeit sich ein.¹⁸¹

但是我們請讀者好好想想社会主义的生产組織几个字的意义，并且为了更加明了起見設想一下俄国的专制人民关于这一点的可能的決定。

代表會議將不得不請专制的人民来复決所有的重要立法問題。

代表會議問人民，他們是否同意和批准临时政府剝夺大有产者的財產呢？他們当然作肯定的回答。土地、矿山、工厂将被認為国家的財產。

但是所有者的改变还不是生产組織的改变。剝夺的問題就引起被沒收的財產的利用問題。

专制的人民需要依新方式来組織自己所有的經濟，組織自己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他們承認哪种組織是必需的呢？我們农民的多數会贊成共产主义嗎？

連吉荷米洛夫先生自己也不做这样的“期待”。人民处在現在的，或者离現在不远的阶段不願、而且也将不能建設共产主义的經濟。

甚至在农业方面，人民大概会維持現存的生产組織。在公地上，农业会依旧为个别农戶經營。而我們已經知道，这一矛盾会发

生什么結果。它造成不平等，促進商品生產的發展，因此也促進與商品生產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的新矛盾。公社分化的歷史和各種社會階級發生的歷史都會以新的形式和在更廣大的範圍重復。我們的民粹派和民意黨人通常是把公社的分化認為應當由敵視公社的等級的和“階級”的國家來負責的。但是在上一章關於這點所說的一切以後，我們就用不着駁斥，或者——說得更好些——闡明這一見解的真實意義。關於不平等是在原始公社組成為國家之前就發生在這些公社內部一點，現代科學認為毫無懷疑的余地。國家本身在歷史上遠非不平等發生的最初原因，而是不平等的結果。後來國家當然也開始對經濟關係發生作用，開始破壞原始共產主義。但是，凡想根除不平等的人（而不願意這樣的人，也就不能成為社會主義者），必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基本的而非派生的原因上。如果有人力圖推翻使不平等強化的某一種國家而把產生不平等和“階級”國家的那些經濟關係保留不動，他就是很不徹底的。但是社會主義的臨時政府正犯了這一不徹底的毛病，因為它既不“教育”人民，也不“強制”人民去進行社會主義的組織。臨時政府把這種組織工作交給毫無準備的生產者去做，並且只限于“在純外表上”幫助人民的時候，最好也不過是把樹干砍掉，留着支持樹干的根不動。這樣的政府的舊成員們如果看見在舊的樹干已經腐爛以後還長出了新的、更強而結實的樹干就驚奇的話，這只表現他們太幼稚了。

讓我們重復地說，假使我國真建立了人民統治，那末，專制的人民對於自己要不要土地，應不應當從地主那里奪取土地的問題，會回答說要，而且接着也把土地奪取了過來。對於他們是否需要“社會主義組織的始基”的問題，最初的回答會說，他們不懂所問的是什麼，後來在費力地懂得是怎樣一回事以後，一定回答說，不，

我們不需要这个。而因为剥夺大地主絕不等于“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所以，革命家們由于夺取政权的結果，并沒有任何社会主义^①。結果会是象吉荷米洛夫先生所无心而言中的那样，临时政府使用自己的政权“絕不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那时候在我們面前的也就是和我們現在一样的乡村公社。全部差异只在于革命以后的公社所有的土地相当于現在的三倍，或者分化得慢些，因此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扫清道路也慢些。

至于公社以后的独立发展呢？它的发展就是它的分化！誰否認这个，誰就应当証明相反的方面，应当向我們指出，假使不是乡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公社的历史实例，那末，至少，也是这样过渡的傾向，不是在我們民粹派头脑中的傾向，而是在公社組織本身和在公社的农业經濟动态里面的傾向。我們知道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是在哪些地方、怎样和为什么变成个别农戶戶主的公社的。但是我們还不知道我們俄国的公社为什么要过渡到和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社。由于我們喜欢偶而和民粹派分子們談談，所以当然不能不知道我国三分之二的公社实行集体耕作的事实。以这样的美德著称的格列科夫卡的田庄一时为所有“人民之友”^②所談論，仿佛这一例子解决了俄国的整个社会問題。但是假如这一有名田庄的农民不論什么时候被控有共产主义傾向而受到迫害的話，那末，这些农民的辯护人不难証明，检查官是絲毫不理解共产主义学說的。土地共耕比共服劳役，比尼古拉·巴夫洛維奇^③时期靠刺刀和鞭子强迫农民实行的“共耕”离共产主义不見得近很多。不管这

① [1905年版注]我們的現在的尽力复活我們的旧“革命”成見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至今还是不愿理解这点。

② 即民粹派。——譯者

③ 即尼古拉一世。——譯者

一“难忘的”皇帝何等愚蠢，他决不会想到共耕会引起公社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独立运动来。问题的重心不在农户户主如何劳动，在一起还是单干，而是在于个体经济是否存在，它们是否想合并成一个共产主义整体。格列科夫卡的田庄没有表露出这样的倾向。组成它的农户户主仍然是那些产品所有者，他们把产品变成了商品。如果他们不消灭自己产品的商品特征，那末可以精确地证明，这一公社的最有势力的倾向，是向着资本主义而决非共产主义方面的。

土地的集体耕作制是一件很好和很有益的事情；但是以为它能成为现在的公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之间的主要桥梁，就很奇怪了。它诚然只能起一个小的“补给支綫”的作用，而这条支綫却通往另一个方向的大道。它在西方会有很大的作用，它在西方的意义就是使农民习于集体劳动，以减少他们对于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阶级所倡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阻力。但是它所提供的利益亦仅此而已。在一切历史的运动中，如同在机械的运动中一样，动力的一部分是用来克服阻力的。减少阻力即是解放出用来克服阻力的那一部分力量，也就是加速运动。把污浊的街道加以翻修，在机器上擦油，你就减少了拉货车的马的劳力，你就减缩了用于燃料的必要开支。但是，没有一个工匠会想象机器之能开动，只是因为它的各部分的摩擦减少了，没有一个马车夫会想到马车到了好马路上就可以把马从车上卸下来。象这样想或者这样做的人大家一定认为是个疯子。这样一种判断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对。为了引起运动，所需要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是良好的而不是恶劣的条件。公社的情形也是如此。当积极的力量、即是能唤起和加速公社过渡到更高级社会形式的力量存在的时候，土地的集体耕作制是好的。在西方无产阶级会起这种力量的作用，它是完全在另一領

域里，即在大生产和大农业、在工厂和大农场的领域里开始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是由完全确定的经济关系所创造和指导的，这些关系存在于公社之外而且与公社无关。至于在我国，在民意党革命所创造的农民国家里，我们从哪里找到这种积极的力量呢？从农民内部吗？我们已经知道，吉荷米洛夫先生认为历史本身就具有某种独立的“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他甚至以为这样的独立的“运动”也在农民内部发现。但是我们抛开吉荷米洛夫先生，来同不很轻信别人的话的读者们谈谈吧。这些读者至少会同意每一个阶级的经济倾向，是这一阶级生活在其中的那些经济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农民是生活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而在商品生产中，产品是支配着生产者和迫使他接受自己的规律的。而商品生产的规律，首先是促进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而完全不是促进共产主义倾向的发展的。我们的农民的共产主义倾向又从哪里发生呢？

难道这还不明白吗？让我们由议论转到比较吧。顿河哥萨克人现在所有的土地和我们的农民在人民（也就是民意派的）革命之后将得到的土地一样多。他们每人将各有近三十俄亩。这种土地不属于个人，甚至不属于个别的公社，而是属于整个的“光荣的军队”。现在试问，顿河哥萨克人表现了经营共产主义农业的倾向吗？就我们所知，在他们内部越来越抬头的，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倾向。也许这应当由“国家的腐化的影响”来负责吗？但是，曾经有个时候，这种影响几乎等于零；为什么那时候他们不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军事生活妨碍了他们吗？试设想哥萨克人完全脱离了军役，完全献身于和平的职业，那时候又将怎样呢？我们对你们说吧：那时候存在于哥萨克人中间的原始共产主义残余会加速地解体，那时候哥萨克资产阶级的王国会来得更近……

土地多并不能使哥薩克人中間避免发生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富人剝削穷人的現象。完全相反，土地多的現象本身正有助于不平等的发生^①。已故的教授別里亞也夫，不管他的斯拉夫派的色彩多么浓厚，却很了解土地多的現象在階級发生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說：“当然，在古代俄罗斯，土地很多，比当时所需要的多得无比，每个人只要願意，就可以自由占領一大片无主的处女地和森林，当然那些有财力的人也就是这样做了。”^②但是各个人的财力不一样，所以各个人不能占領一样多的土地；有一些人因为完全没有开垦和耕种土地的财力，甚至完全没有占領土地。由此就发生收入的不平等，穷人从屬於富人。同样无疑地，在某些場合“自由的占領和耕种土地，很快地产生了土地财产的概念”。問題的这一方面，为柯瓦列夫斯基在他論述公社土地所有制一書中闡釋得很明白¹⁸²。直到最近，在頓河軍隊的土地上存在过——而在庫班州或者現在也还存在——对于沒有耕种过的土地得自由占領的权利；正是这一权利允許了富人更富，它将階級斗争的最初萌芽带到了这种处女地上。

但是另一个讀者会說，我們的国家經過革命改造以后是会阻碍事情象这样进行的。

很难預先就說，人民的国家在这种或那种具体場合下会作些什么，但是，关于多数公民生活的經濟条件既有了一种概念，便不难預見国家經濟政策的总方針。依照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的“期待”，为革命所創造的国家将主要是农民的国家。不願意和不能在自己的公社里奠立“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的农民，也不能和不願

^① [1905年版注] 这里所說的已为几年以后鲍罗金先生关于烏拉尔的哥薩克軍隊的卓越的調查所証实。

^② 《罗斯农民》，第2版，莫斯科，1879年版，第19頁。

意在更广大的国家范围内进行这样的組織。人民国家的經濟政策也就会和組成国家的那些个别农民公社的政策一样，都很少是共产主义的。不消說，国家将努力鏟除一些在分公地給私人或給私人的团体耕种时所可能发生的一些舞弊行为。但是它决不肯夺去更殷实农戶的所有貯备物資和工具。同样，国家認為只以农民的劳动和資料（当然是指屬於他的私有财产）为标准来限制他对土地的权利是公正的而且是很自然的。假使农民真的有某些社会組織的理想的話，那末，土地的辽闊无疑地在这些理想中起重要的作用，由于土地的辽闊，使每个人在他的“斧头、镰刀和木犁所及的地方”都可以到处占領空着的土地。“人民革命”縱然給了部分实现这一理想的可能，可是它的实现，如我們所知道的，却会引起农民之間的不平等。不平等既受到这样的推动，当然会走到自己邏輯的尽头，把“人民革命”的一切效果化为“烏有”。

其次，农民的国家当然不仅不侵犯商业的資本，而且在頗大程度上也不侵犯工业資本。連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似乎也承認这一点，他認為人民革命只是削弱“本来已經衰弱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削弱”并不等于推翻。商业和工业資本的存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难道还需要再談嗎？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同一的人民政府又会妨碍这些后果的暴露。但是我們告訴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認為有害的那一切在农民的心目中，因而也就是在农民政府的心目中也会認為是有害的。同时，我們和吉荷米洛夫先生一般地都反对“私人企业資本”，而农民所反对的只是資本主义原則的某些应用，在實質上一点也不反对这一原則。农民完全承認私人企业家賺錢的可能。假使如此，那末，“人民的”政府对于这样的賺錢一点也不反对。在最好的場合，人民政府的急进措施虽然足以对工厂主的大資本作斗争，但是关于一般地限制“老板的”剝削，这个政府連

想也不会想到。因此，这已经是革命所创造的“相对的不等”解体的第二个因素。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这个因素将因为“土地被置于剥削领域之外”而被削弱。但是，我們已经知道土地将不会被“置于”这范围之外：人民政府既允许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也允许从破产的农户中雇用“小工”的可能。农民的“各种理想”是容易和雇农制度妥协的。此外，凡是在行的人都知道只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希望用“削弱”资产阶级或者是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生产资料“置于剥削范围之外”的办法来帮助人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之抱有这种希望，只是因为他所关心的“人民”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有从“削弱”大资产阶级赢得利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改良主义的计划不触动商品生产。但是由此也就发生了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完全软弱无力。现时真正的革命工人运动和小市民的怯懦的妄想毫无共同之点。不幸，“如表现在”……吉荷米洛夫先生论文中的“俄国的社会主义”，在这场合离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比离工人的社会主义要近得多，他和前者一样，也没有使自己的那些革命方案走到消灭商品生产的地步。他让将来的、革命后的“俄国国家史”去关心这件事情。他在分析自己的革命前提时完全忽视经济进化的重要性，而在一讲到他所推荐的革命的结果时，对于经济进化又寄以夸大的希望。在沒有先前的进化，革命就是不可能的地方，他却出来号召革命；在沒有根本的经济革命，进化就不可能的地方，他却要求进化。他很想主要地作一个革命者，而实质上成了不彻底的和不合逻辑的人^①。我們很快就会知道他是从哪里取得这一特点的，这一特点把他所有的革命术语都化为乌有了。

^① [1905年版注] 这又可以整个地应用到现在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家”身上。

吉荷米洛夫先生于努力使讀者相信，人民的政府将能消除行将到来的經濟革命之不彻底的有害后果时，是这样地描述了俄国将来社会发展的或然进程：

“負責推动国务、关心国家繁荣的政府（它自己的声望亦系于这一繁荣），无疑地将被迫采用一些提高劳动生产率^①的措施，而且也将組織大生产……大生产的利益和必要非常明显，而在許多場合，它甚至是必然的。人民群众很容易了解这点。此外（这一点特别有意思，讓我們指出一下）^②，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受了挫折的私人进取心将从各方面（想想这是多么美妙！）^③都轉向对人民解释公营生产的利益和便利……我們还不說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对人民的影响……为什么通过这样的道路，不能慢慢造成由公社到組合的过渡，造成各公社与各公社同盟之間的交換的組織，造成为这种或那种生产而組成的几个公社的联合，一直到社会主义制度慢慢地发展和越来越排挤私人經濟，以至終于掌握国家的所有的职能的时候为止”。其次，“假使不是全欧的，那末，至少是在欧洲几个国家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将使俄国几乎无条件地必須在同一的（即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組織自己的国际交換，这样几乎迫使我們連在國內的交換范围内也实行社会主义的組織”（第258—259頁）。吉荷米洛夫先生“觉得”这个問題是这样。从實質上考察这个問題以前，我們先表示两点意見。

我們的作者对于俄国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和西欧工人革命的影响寄予很大希望。我們也承認这种影响的重要，但是不認為这一影响是絕對的。第一，吉荷米洛夫先生有什么根据說：我国在农民革命以后，将“无阻碍地产生”，不仅社会主义知識分子，而且一般

① ② 这两处括弧中的話，从文意看来都是普列汉诺夫加的。——譯者

还有現在意义的任何种“知識分子”呢？我們今日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知識分子主要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商人及神甫中間，換言之，出身于視教育为升官发财手段的上层階級。我們的大学在培植升官发财主义者时，附帶也培植了革命家。但是升官发财主义者和革命家都是官僚国家和上层階級存在的产物。这是如此地无可怀疑，因之我們的革命家們于意識到自己“資產階級的”出身时，一方面不得不談自己“对人民的义务”，而另一方面不断地以自己和人民相对立。“社会主义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不过是官僚和“階級”国家的总树干上生长的树枝之一。吉荷米洛夫先生想砍掉这一树干，而同时希望他所珍視的树枝不仅不枯萎，而且将“无阻碍地”生长。这好似是关于小俄罗斯人的一个有名的笑話，他把支持着他的树枝割断，而很奇怪自己会掉了下来。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也許以为“人民革命”后，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将从农民中間“无阻碍地产生出来”嗎？假使如此，那末，我們恐怕他是錯誤了。

为他所“期待”的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土地革命、剝夺大地主，是使农民能得到比今日多两倍的份地，是取消捐稅压迫。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这种份地的增加将使农民相信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这一增加就能使他們自己遣送自己的子弟进大学，能使他們的政府維持和創立高等教育机关嗎？

大量土地使农民的情形如此簡單化，使他家中剩余的劳动人手的重要如此增加，于是他是既不觉得有必要而且也无可能去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去受高等教育。

官僚的国家，資產階級、貴族需要大学，最后，无产階級也将需要它，无产階級沒有高等的科学教育就不能管理归他們支配的生产力；在农民公社的范围中，大学是奢侈品，对于那些講求实际的

农户主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假定农民“容易了解”高等教育的重要。此外，我们还想起，在“人民革命”以后，还有资产阶级和贵族；再假定这两个阶级将同被“削弱”，使得他们在经济上不危害人民，而有可能送自己的子弟进高等学校。何以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这些学校将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养成所呢？在瑞士我们所看见的，一方面是殷实的农民，另一方面是十分“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在确有不少农民子弟学习的瑞士学校里，出来了很多的社会主义者吗？

但是瑞士农民“容易了解”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利益吗？

你瞧这是容易的，但是他们不了解！他们连听也不要听社会主义，即使是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和有名的制造干酪的劳动组合对他们也无济于事！

社会主义生活的各种利益如此明显，似乎每个人都“容易了解”它们了。但是只有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不知道，对社会主义的真正的理解只是和迫切的经济上的必要相并行的。而在农民的国家中，只是很偶然地能感觉到有这种必要。

读者会问，但是现存的知识分子呢？难道他们经历了人民革命以后不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来“为人民服务，来组织人民的劳动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吗”？

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多吗？请原谅，他们自己懂得很多吗？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来反对商品生产的无情逻辑呢？

西欧的革命会对他们的努力予以帮助吗？关于西欧的革命，我们现在也想谈一谈。

西欧革命的力量是伟大的，但不是万能的。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要对别国能起很大的影响，必须有些传导者来传导这样的影响。“国际交换”是有力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传导者。欧洲国家和

中国之間的商务很发达,但是很难相信西方的工人革命很快会“迫使”中国“連在国内交换范围内也实行社会主义組織”。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社会結構”是很妨害欧洲的思想 and 制度对它发生大影响的。关于土耳其、波斯等国也可以这样说。而土耳其帝国的“社会結構”又是什么呢?首先这是农民的国家,在該国不仅保存着乡村公社,而且也有大家族制度,依照我們民粹派的公式說来,它距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尽管如此,尽管在土耳其帝国境内发生那些“人民”革命,却不能設想,欧洲无产阶级可以不費力地以社会主义“强加于”土耳其公民,即使是斯拉夫族出身的土耳其公民。在这里又需要把推动人民到社会主义去的环境的积极力量,和只是有助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消极条件加以区别。农民国家内部关系的客观邏輯,完全不会把“在国内交换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組織”“强加”于这些国家;从“純外表上”来强迫是不可能成功的。欧洲的工人革命会无疑地和很有力地影响所有那一些哪怕只有几个阶层的公民就自己的經濟地位、政治教育和思想习惯說,将和欧洲工人阶级相似的国家。相反地,在沒有这样一些阶层的地方,它的影响将是比較薄弱的。二月革命^①几乎在所有那些自己的“社会結構”和法国相似的国家中都发生了影响,但是它所掀起的浪潮,在欧洲农民国家的門坎前面就粉碎了。当心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会重复同样的情形!

“故事的意义是这样”,就是說,西方是西方,而俄国是俄国,換句話說,“不要垂涎別人的蛋糕,赶早起来做自己的去”吧。不管欧洲革命可能的影响如何伟大,但是我們必須关心創造那些使得这一影响能确实发生的条件。吉荷米洛夫先生的不彻底的农民小市

^① 指 1848 年的法国二月革命。——譯者

民革命，不仅創造不出这些条件，而且甚至要破坏現在已經存在的这类条件。

在这个場合也和所有其他場合一样，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期待”充滿了矛盾。西方对俄国的影响之可能，在他看来，是由于“国际的交換”。由此可見，这一交換愈发达，那末，西方就越快地把“国内交換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組織”“强加于”我們。但是，我們国际貿易关系的发展必須以我們的商业，即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前提。而商品生产愈发展，那末，成为人民革命結果的“相对的經濟平等”将越被破坏，于是，在“国内交換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組織”就越困难，至少暂时有困难，即是在商品生产发展还没有达到自己的邏輯的尽头以前会感觉困难。但是在这样的場合，已完成的“人民革命”就丧失任何的意义了。

由此看来，假如在“革命”以后我們回到了自然經濟，那末，我們將实现“相对的平等”，但是同时西方也将不能影响我們，由于国际交換的薄弱。假如，我們发展商品生产，那末西方将很难影响我們，因为我們的“相对的平等”将大为动摇，而俄国就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吉荷米洛夫先生对西方的期待，必然陷于絕境。这就是形而上学者的結果，这就是把問題“一个个地和彼此孤立起来”考察的結果！

Mein theurer Freund, ich rath'euch drum

Zuerst Collegium logicum.¹⁸³

而正是那个把欧洲整个現代史怀疑为“冒险”、“难以置信”的人却抱着这些对西方的矛盾的希望！实在的說，邏輯学对于吉荷米洛夫先生会是很有益的！

除这些意見外，現在我們来談談上面所引各段的主要內容。

(四) 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布朗基主义 和巴枯宁主义之間的搖擺

吉荷米洛夫先生在他的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一些草案中，表現出是一个最純粹的巴枯宁主义者。不錯，他沒有消灭国家，但是他的国家是“从純外表上”来帮助社会主义組織的过程的，国家并不去創造这一过程的因素，它“只是支援它們”。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最近的一个文壇前輩特卡乔夫，以为少数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須“迫使”多数人实行社会主义。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政府“不用任何暴力”来促进人民組織社会生产，而且“所帮助的只是这样一种运动”，它“在國內不能不独立地发生”。吉荷米洛夫先生在他关于現在的一些議論中，是特卡乔夫的忠实信徒。他对于将来的“期待”，是一种思想上的隔世遺传，即是恢复了更遙远的思想前輩的理論。

我們知道，无政府主义者阿尔图尔·阿尔努說过，消灭国家吧，經濟的力量由于简单的靜力学規律会得到平衡的¹⁸⁴。吉荷米洛夫先生說，消灭現代的国家吧，剝夺大有产者，俄国的經濟力量就开始“独立地”得到平衡。前一人訴之于“靜力学的規律”，后一人則訴之于“人民的概念和习惯”，也就是我們从巴枯宁著作中所知道的“人民理想”。阿尔图尔·阿尔努虽瞄准了“国家”，却沒有想到他“批評”的只是現代的、資产階級集权的国家。吉荷米洛夫先生想建立“人民的”国家，发明一个新型的小資产階級国家，这一国家并不完全抛弃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自由放任) 的原則，換言之，即什么也“不建立”的时候，就能“支援”我們祖国独立的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的运动”。

巴枯宁主义并不是一个体系，这是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分

配在巴枯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先生們中間，他們各依自己的“概念和习惯”的总和来分摊一份。

我們的作者选择了退化为特卡乔夫“綱領”的那一种特殊的巴枯宁主义。

但是他对于这一綱領并不忠实到底。他对于“第一个老师”的訓示还記得很清楚，他沒有忘記，虽然我們的人民“明显地需要援助”，但同时“必須是一个大傻瓜”才“企图教育人民什么，或力图給他們的生活以一个新的方針”。于是他就想出这样一个“从純外表上”帮助人民的革命政府，它“既不强制人民群众，也不教育他們”，仍然能够把人民的事业順利完成。

我們曾問过吉荷米洛夫先生，他的論文的社会—政治哲学和《給恩格斯的公开信》的哲学究竟有什么分別呢？現在我們自己将不难回答这个問題。分別在于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思想平淡无奇，胆怯畏縮，想調和那种不能調和的东西。据恩格斯的說法，假如原本只能吸引那些“不成熟的中学生”，那末，关于微暗的抄本，还有什么可說呢？

巴枯宁宣传不可調和地仇恨任何国家，并劝告我們的革命家們不要夺取政权，因为任何政权都是見鬼。特卡乔夫認為他們应当夺取政权并长久执掌政权。吉荷米洛夫先生选择了中庸之道。他以为夺取政权“容易成为有益的和必需的事”，但是他同时認為革命家不应当无定期地掌握政权，而只应当在人民革命开始以前維持这政权。

从这种坐在两个椅子中間不舒服的情况，只能有两个出路。我們的作者或者完全上巴枯宁的椅子，或者完全上特卡乔夫的椅子，他可以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做特卡乔夫的坚决信徒（而不只是一个秘密的学生）。但是他很难把真正新的内容注入“民意党

的綱領”里，很难証明这个或那个新思想之得到了“承認，只是在民意派出現以后”。无內容的折衷主义还从来没有产生过新的有力的理論，畏縮的猶豫不决的在两个“旧綱領”之間的搖摆，無論在这一个或別一国家的革命思想史中永不会开辟一个新的时代！

于是，吉荷米洛夫先生在“革命的头一天”是特卡乔夫的信徒，而革命的蜜月一完結，就会馬上变成巴枯宁主义者。

但是巴枯宁主义在应用到“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革命后的第一天”）又是怎样呢？我們重复地說，巴枯宁主义不是一个体系。这是“拉丁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論和俄国农民的一些“理想”、蒲魯东的国民銀行和乡村公社、傅立叶和斯捷潘·拉辛的混合物。

吉荷米洛夫先生向我們祖国推荐的那“一种劳动社会化的过程”正是这种混合物，它不仅过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沒有存在过”，而且将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关于这个“过程”，可以不夸张地用法慕索夫的話說：

假如不是欺騙，这里一切都有！

这里有公社，也有“由公社到組合的过渡”，也有“各公社与各公社同盟之間的交換的組織”，甚至除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为这种或那种生产而組成的几个公社的联合”；总之，有名的巴枯宁式无政府主义的“自下而上的生产者的組織”都整个地归結到这里。假使讀者对于这一“組織”理解的話，那末，他关于吉荷米洛夫式的巴枯宁主义就不需要有更多的証明了。假使他还不了解无政府主义（这自然也不是什么大損失），我們就劝他讀一下某一时候出名的希尔奥姆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Idées sur l'organisation sociale》（《社会組織的观念》）。他在讀了这本小册子里所說的“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以后，将看出俄国独特論者的革命理論是和欧洲无政府主义

者的理論极为接近的。

俄国的知識分子是很难脱离“西方”的影响的。俄国的社会活动家宣布了欧洲最先进的理論“不适用”于自己的国家，可是沒有因此而保全住自己的独特性，只是把自己对严肃范例的好感轉为对諷刺画的好感。伏·伏·先生原来是皇帝—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亲兄弟，吉荷米洛夫先生是倒立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

但是，我們的作者这种不舒服的地位，对他的思想的彻底性是很少帮助的。所以他达不到巴枯宁某—时候达到的那些結論。吉荷米洛夫先生甚至在他的最勇敢的“革命狂想”发作时，也沒有想到要消灭企业家的利益。在組織“社会”生产时，“企业家作为发起人和能干的管理人（連巴斯夏本人也不会否認这个理由），总得到一些利益，当然比現時所得的要少一些，但在当时却是只有他才能得到的”^①。“俄国社会主义組織”計劃草案的这一部分，不禁使人一方面想起小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对于大企业家的大“利益”之妒忌，另一方面想起傅立叶所主张的将收入分配于劳动、資本和才能之間。由此我們說某几种“俄国社会主义”是傅立叶和斯捷潘·拉辛的混合物，并不是无故的。

然而，讀者的心里会想，在这一切里面，至少是沒有什么欺騙的。

欺騙的确是沒有的，但自欺是有的。甚至于連最少的坏意向也沒有，但有的是大量的天真。天真之处无非在于“社会主义的交換組織”的談論。每个了解問題的人，都会把这一社会主义交換組織看成是笑話、“胡扯”。只有小資产階級的蒲魯东的小資产階級

^① 《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載《民意導報》，第2期，第258頁。

信徒們才可以把这种胡扯当成某种可能的和有益的东西。可是有人談到蒲魯东時曾說，他之懂得辯証法正如樵夫之懂得植物學一樣。無產階級所創造的社會制度不能和交換有任何共同之點，這一制度將只知道按照勞動者的需要分配物品。有些不徹底的共產主義者，認為按照工作者對生產的貢獻分配，是更方便些。發現這樣的要求的弱點是不難的^①。然而，甚至提出這種要求的人過去和現在都了解“交換”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是不可能的。

誰要談到交換，就要談到商品；誰要保留商品，誰就必須保留屬於商品的一切矛盾。而且又只有無政府主義者才可以從蒲魯東的話想到，有一種哲學的煉金石能夠從“社會主義的交換”里消除包含於普通交換里面的一切“資產階級的”矛盾。

這種煉金石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因為交換是和資產階級生產根本脫離不開的特點，而資產階級的生產又是交換的必然後果。馬克思還在五十年代之末就把問題的這一方面闡明得很清楚，因而使得各種各色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巴枯寧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理論遠遠地落在科學的現代的運動後面¹⁸⁵。不懂得革命社會主義入門的人，才把自己對“革命的”期待寄托在社會主義的交換組織上。

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曾經不得不談到這個問題^②，但是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不妨把已經說過的話再重復一下。為了使人們最容易明白，我們這次拋棄科學的抽象公式，只限於舉出簡單而明顯的例子。

社會主義的交換是不用貨幣的交換，是按照耗費在它們生產

①〔1905年版注〕不消說，這一要求只是作為理想才是站不住腳的，而作為過渡的措施，它是完全適當的。

②〔1905年版注〕我在這裡指的是自己對羅伯圖斯的經濟學說的敘述和批評。

上的劳动量来进行的产品直接交换。蒲鲁东所想出的这一交换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在这里不过是重复了他很早所犯过的错误。

现在假定“在革命以后的第一天”，我们的巴枯宁主义者能够说服我们已经熟知的都拉省的托尔何夫公社，使他们明了社会主义交换组织的种种利益。公社社员们决定为这样的组织“奠基”，而将他们的决定发表在某些《人民新闻》上。响应了他们的号召的，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诺夫戈罗德的金匠、基姆雷的鞋匠、都拉的制茶炊的人和莫斯科的裁缝，这一切人都是劳动组合里的、“平凡的”人们。这些人也是在“没有阻碍地产生出来”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影响下，充分信仰交换的新原则的。说到的都做到了，“合同”签订了，需要的只是实行。麦子收割完，我们的农民蒲鲁东主义者就着手交换。他们运了几斛麦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从那里得到了鱼；装了几车马铃薯到基姆雷，从那里运回皮靴。他们给裁缝送黍，给金匠送米，如此类推。这些产品的发送都不是随意的，而是根据预先定好的条件。这些物品是运得很远而且很小心地运的，大概也可以在邻近市场上把它们更有利地卖出，但是我们的“庄稼汉们”是有思想原则的人物，愿意拥护新的交换原则，虽然这种交换使得他们“吃了亏”也不要紧。于是，交换完成了，我们的公社社员有了钉子、鱼、皮靴、茶炊和现成的衣服。但是问题在于这些产品远不足以满足农民的一切需要。他们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消费品，需要农具、肥料、牲畜等等。而所有这一切东西的生产者们都不想加入社会主义的交换，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著作而笑蒲鲁东的经济“发现”呢，还是因为没有成熟到蒲鲁东那样的聪明而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商品生产者呢，不得而知。须知连吉荷米洛夫先生本身也预料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只是“慢慢地”发展的。

那末，我們的托爾何夫的蒲魯東主義者將怎麼辦呢？他們將如何滿足那些不能以“社會主義的”交換來滿足的許多需要呢？他們只有一條出路：只有購買所缺乏的物品。裁縫就是處在這樣的情境中的，他們當然不能光靠黍米生活，釘匠也不能光靠米來生存。一句話，和“正的”、社會主義的交換並存的，將有舊的、所謂邪的用貨幣的交換。甚至在蒲魯東主義的信徒之間的交易中，也必須用這些“討厭的金錢”(maudit argent)。假使基姆雷的鞋匠只需要體現在X勞動日中的數量的馬鈴薯，而托爾何夫的農民們所需要的若干雙皮靴又只能够在加倍的日期內才做得出來，如果基姆雷人不要燕麥、干草、麥稈和任何其他農產品，那末這些差額只能够用金錢來抵補了。這樣的事很容易發生，如果普魯加文先生的預言不錯，連基姆雷的鞋匠們也去搞農業，而且“改善它的條件”的話。結果是怎樣呢？蒲魯東主義的生產者在只是“慢慢地”組織時，就有一大群舊經濟信仰的生產者和他們反對起來，而靠“社會主義的交換組織”所達到的微不足道的“進步”，將永久為“相對平等”中的退步（這是商品生產和普通“資產階級”交換的必然後果）所大大超過。惡勢力會擊敗善勢力，資產階級的關係將占得蒲魯東的社會主義的上風。這些蒲魯東主義者為小資產階級的多數所包圍，勢將趨于“腐化”，尤其因為他們自己的財富將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舊的“剝削”一類的金錢所組成的而更是這樣。基姆雷人受了發財的思想所引誘，可能把用硬紙作底子的皮靴運給托爾何夫人，而托爾何夫人一定會用半爛的“馬鈴薯”還敬他們。一般地說，“敵人是強的”，而在現在的場合里，敵人的“強”將依靠着商品生產的不可克服的邏輯，這種生產甚至於在加入了“社會主義交換”的公社中間也占到支配的地位。很費力地創立起來的那些團體將要瓦解，蒲魯東主義者變成了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生產者，受巴枯寧主義教育的知識

分子須要一再着手宣传自己的新經濟原則的徒劳无益的工作。这是一个老說不完的故事，是息息法斯的工作^①。而吉荷米洛夫先生之所以将这一息息法斯的工作交給俄国社会主义者去作，只是为了尽可能地早些到达社会主义的王国，为了到这一王国不走緩慢而困难的資本主义道路。这真是急急忙忙，招人耻笑了。

关于在“国内交換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組織”問題，正和关于国际貿易的問題一样，应当看到两个前途：或者是人民革命使我們回到自然經濟去，那时我們的“社会主义交換”将发展得很慢，因为一般地說，交換將是很弱的；或者它保存着現在业已存在的越来越多的分工的傾向，农业和工业完全分离的傾向，那时一国的生产机构就变得很复杂，因之，社会主义的交換組織將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務。然而社会主义的交換組織的緩慢发展，甚至使它的拥护者們看到的那种意义也失掉了。为了单单使一个乡村公社和貨幣經濟的腐蝕影响相隔离就要使这公社得以和一切生产者——他們的产品是适合于該公社的各种不同的需要的——組織社会主义的交換。否則这个公社的畸形的貨幣—社会主义的有机体就要在自己的矛盾中被窒息。但是一个公社决不能拿农产品来供应它所需要的一切消費品的一切生产者。这些生产者或者必須購買一部分自己所需要的原料，因而就要經營奇特的貨幣的—非貨幣的經濟，这就是擱置起他們的社会主义計劃；或者等待到蒲魯东主义的乡村公社的数目增加到必需的和足够的水平的那一美好的时候。随着这一个美好的时节的到来，就有了組織第一个最低限度的生产—交換的細胞的可能。但是，在俄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的經濟有机体里面，一个这样的細胞又算什么呢？在包围它的竞争的氛

^① 希腊神話，息息法斯王因侮辱天神被貶下界罰作搬运巨石上山的劳役，而石头一搬上山又掉落到深渊中去。——譯者

围中，它自身将被窒息。它将是一桶柏油中的一滴蜜。在它旁边和反对它的将是一切异教生产者；“贵族和资产阶级”虽然“已被削弱”，但是还未被“人民”革命消灭，也将步步和它为难。讀者，你以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终于掌握国家的所有职能”会很快嗎？我們以为至少是很慢很慢的。然而——我們重复地说——吉荷米洛夫先生指出“这种劳动社会化的过程”，纯粹是着眼于争取速度和对历史猛攻。他认为全世界文明国家的社会民主派所选择的道路，是太“稳健和按部就班”了。我們的作者走了一条“直路”和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的泥坑，这些改良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彻底性、創造性或者勇敢性的。

但是我們不要离开本題。假定社会主义的交換組織事业进行得迅速和順利。且讓我們来看看它的原則的实际应用将产生什么結果。

托尔何夫的乡村公社和基姆雷的鞋匠組合組成了一个联合。它們的产品交換是在“构成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价值的尺度乃是劳动，而且只是劳动。蒲魯东得意了。但是老練而“誠实的”托尔何夫“农户主”們提出一个問題：哪一种劳动应当作为价值的尺度呢？富于理想的基姆雷人（鞋匠們总是一些小小的哲学家）不难回答这个問題。他們說，作价值尺度的应当是一般的劳动、人类的抽象劳动。然而“自由的农夫”不服。他們說，他們不知道这样的劳动，虽然它或者可以存在于“書本”上，但是他們現在所应付的是彼得、伊万、費多尔的具体的、确定的鞋匠劳动或者是彼得、伊万、費多尔們的整个团体。“资产阶级的”怀疑使他們激动起来，他們認為如果鞋匠做靴子花的时间越多，給他們的粮食也越多，这便是奖励无能、迟緩和笨手笨脚。为农夫的迟鈍而引至絕望的鞋匠們，于是丢掉蒲魯东，他們認為应当引証馬克思。他們說他們的产

品的价值尺度必须是“社会必需的劳动”，即是在当时技术发展条件下生产靴子所必需的平均劳动。但是，连这一论据也不能克服托尔何夫人的固执。他们不懂得怎样可以确定，正是有多少这样的社会必需劳动包含在附着于靴子上的鞋匠的劳动中。那时候鞋匠们又去求救于罗伯图斯，郑重地把他的小册子《Der Normalarbeitstag》（《标准工作日》）以及他和斯威灵的建筑师彼得尔斯的通信带回来。波麦郎的经济学家^①证明一个中等工人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可作多少和必须作多少永远是可以确定的。这一个平均劳动生产率就应当被认作社会的必需劳动。谁超过这个定额，就多得多些，谁达不到它就要少得多些；似乎问题是完全解决了。然而，本来犹疑不定的托尔何夫人喊叫说：不行。假如确定你们的和我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可能的。我们希望“促进”社会主义的交换组织的国家来担负起这个工作吧。假定说一双皮靴需要两个劳动日。但是在你们组合旁边存在着大批其他鞋匠。他们是为出卖而生产，并且你们一年运三十双皮靴给我们，却会运几千双到市场上去。试假定，皮靴的供应超过于对它们的需求，那时它们的交换价值将要降低，因为每双皮靴将只代表社会必需劳动的一日半或四分之三日。你们以为我们会给你们从前那样多的粮食吗，这对于我们很不利，而你们知道，自己的衬衫是最贴身的。假使相反地，皮靴制得太少，那末，你们依照从前“公道的”、社会主义的价格把它们卖给我们也没有好处。我们觉得，一般说来，公道的基础是功利的原则，如果使一方受损失的交易就不能算作“公道”。在现在的商品价格上涨落之下，没有任何的可能来把我们的相互利益均衡起来，因为个别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或者整个生产者组合的全体劳动——对

^① 即罗伯图斯。——译者

社会必需劳动的关系是只靠这些涨落来确定的。所以，只要是商品市場来决定我們的社会主义的交換条件时，我們的整个“合同”就是无聊的空忙。我們从它得到的益处也就等于我們同意用羅馬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記帳一样。你們，鞋匠們，很早就以醉酒和很喜欢狂想出名；而我們是喜欢打算盘的农夫，我們是不想把時間花在胡扯上的。

鞋匠們回答說，但是“社会主义交換的不便，将只存在到所有生产者还不同意那样交換的时候。一旦这个时机到来，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社会主义的交換掌握国家的所有的职能。

这等于蝸牛走路，什么时候走到呢，——农夫反对說。假使大家都同意，那末我們也不会反对。而現在呢，我們却办不到”。

“合同”的执行，这样就被推延到不可知的时候，在这期間商品生产就按步就班地走自己的路，暗中破坏“相对的平等”。

由此可見，“国内交換范围中的社会主义組織”只有在能够把上述国内交換的所有矛盾除掉的时候才会到来。而这一点将只在每一个个人的劳动采取社会性質的时候才有可能。并且只有在整个社会生产机构成为一个有計划的整体的时候才能实现这种組織。但是那时候“交換組織”就成了大馬車上的第五个輪子，因为只有当社会的生产机构由个别的、并非有机联系的部分組成时，即是生产者的劳动沒有社会性而有个人性时，任何交換才有意义。無論氏族公社或家庭公社都不知有“內部的交換”，而且也不需要这样的組織，因为它們的基础是有組織的生产。假使說它們缺乏什么，那也仅仅是缺乏某些分配标准；但是，在現代生产力发展之下，这些标准是能够和一个原則，即人类的需要原則同时发生的。我們在“社会主义交換組織”的道路上閑溜了以后，又回到自己的出发点来了。我們又遇到了这一个问题，俄国的社会主义生产組

織將怎樣出現呢？我們已經知道，無論臨時的或正式的人民政府是不會去處理它的；我們也知道了，無論公社占有土地，或者公社共耕也不會引起這個問題。此外，我們現在確信“國內交換範圍中的社會主義組織”也不能引起這個問題。然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對我們預言過“俄國社會主義組織的始基”；他的“民意派”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此。他的預言將如何實現呢？

吉荷米洛夫先生叫喊著說，應當信仰，信仰“人民、自己的力量、革命”。

“我信仰，主啊，如果失去信仰，就請幫助我恢復吧！”我們知道，信仰是很好的東西，“航海者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一個輕舟，願受變化無常的浪潮播弄而舍棄最堅硬的陸地，他是受了信仰的推動”。但是這一位受上帝啟示贊揚宗教的神甫可以敘述宗教在和理性發生矛盾的時候是變得怎樣的動搖不穩吧。吉荷米洛夫式的“信仰”的大缺點就是這一致命的矛盾。他信仰自己的、半巴枯寧式的、半特卡喬夫式的革命，只是因為他的理性能完全為特卡喬夫—巴枯寧主義哲學所滿足。但是只要他的理性的要求一提高的時候，他的這一信仰就不剩一點痕迹了。那時候他會了解，以一個一點不懂經濟學入門的，不懂貨幣、商品和交換的概念的人，而自認為可以高談經濟革命，便是大錯特錯了。

不過關於最後這一點，我們無需特別責備我們的作者。我們說，他的信仰拯救了他。他錯誤了，只是因為“信仰了”特卡喬夫和巴枯寧；這不該怪他而該怪他的“引誘者”。

從上面一切所得出的一般結論對我們是重要的，這一結論可以表述如下：所有吉荷米洛夫式的期待“于革命”的，只是一連串的誤解和使前進的俄國思想回到巴枯寧主義的老路上。但是，如民歌上所說，“過去的，已成過去，而將來是什麼，那將不是照老樣子”。

而是照新樣子”。巴枯寧主義在七十年代已喪失了威信，不會在八十年代活躍起來。比吉荷米洛夫先生更為“聲名赫赫的”“雄辯家們”也不能復活它。

那些認這個結論有說服力的讀者，可以對我們提出一個新的和最後的相反理由。他們可以對我們說，所有我們的論據都基於一個假定，即是說，吉荷米洛夫先生只是暫時掌握着政權，而不是長時間地保持住政權。假如革命家們依從特卡喬夫的而不是吉荷米洛夫的指示，假使拉甫羅夫在十年以前所說的“只有新的革命才能從專政者們的手中奪取專政的權力”的話正確，那將怎樣呢？

(五) 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的可能後果

那時候將怎樣呢？呵！那時候將發生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最可恥的失敗！它不得不擔任這樣一種為它力所不勝和理解不夠的“組織”工作。一切條件都會結合在一起來擊敗它，有如：它自己的沒有準備，上層等級和鄉村資產階級的仇視，人民對它的組織者的計劃冷淡，我們經濟關係一般的不發達等等。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將只是提供一個新的史例來証實恩格斯就德國農民戰爭所發表的意見。“能夠落到極端派的領袖身上來的最不幸的事就是：當運動還沒有成熟到足以使這個領袖所代表的階級取得統治並貫徹一些保證這種統治的措施的時候，却不得不去奪取政權。這種領袖所能做的事，不是取決於他的意志，而是取決於不同階級的利益的對立程度，而這種對立程度又取決於物質生活條件、生產和交換關係的發展程度。另一方面，這樣的領袖應該做的事，即他自己的黨要求他做的事，也不取決於他，但也不取決於階級鬥爭的發展程度及其條件，因為他受以前的理論和要求束縛，這些理論和要求不是從社會階級在當前的相互關係中產生的，不是從暫時的、多少有些

偶然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产生的，而是由这一领袖的对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的理解能力决定的。因此，他必然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他所能做的事，跟他的以前的一切行为、他的原则及其党的直接利益相矛盾；他所应该做的事，也不能成功。总之，他不是维护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而是迫不得已维护这样的阶级，即运动已经成熟到足以能保证其统治的阶级。正是为了这种运动的利益，他不得不维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言和诺言来敷衍自己的阶级，不得不断言异己阶级的利益即自己的利益。要是谁陷入这种荒唐的地步，谁就是不可救药地堕落了。”¹⁸⁶

由此可见，以为革命者夺取政权会成为“革命出发点”的吉荷米洛夫先生，是大大地错了。完全相反：这样的“夺取”只会成为反动的信号。这一夺取不会巩固国内先进力量的影响，而只是使这些力量在第一次的、无结果的图谋中衰竭之后，保证了保守的和反动的各政党的胜利。俄国革命不仅不会走我们的雅各宾分子所珍视的和唯一能了解的法国革命的路，而且它的进程将与法国革命的完全相反。在法国革命中，在某一个时候以前，每一个新的浪潮会把新的更极端的党派推到历史舞台的前面，而我们土著的雅各宾分子却把俄国革命中相应的时期化为乌有。他们被击败和威信扫地以后，只会在敌人无情的攻击和嘲笑之下离去舞台，而留下来的没有领袖、没有秩序和不团结的人民群众就抵挡不住自己敌人的不断进攻。人民起义的结果，在最好的场合，也不过是以推翻旧制度的残余而完结，却不能为劳工阶级带来和他们的利益最直接攸关的那些改良。

马克思说过，大事变在历史中重复两次，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¹⁸⁷。法国雅各宾主义者的历史是最伟大的和充满热烈的兴趣的悲剧。最新式的布朗基主义者（包括俄国的和

外國的)的各種陰謀計劃的歷史，盡管其個別人物十分英勇，但仍然是滑稽劇，這種滑稽劇所具有的悲喜劇性質在於演員們完全不了解行將到來的工人革命的意義和性質。

第五章 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真实任务

(一) 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打耳光”

这样说来，“象民意党中所表现的俄国社会主义”，如果不肯坚决抛弃自己在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特卡乔夫的布朗基主义之间的中间地位，即是说，不肯承认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理论体系的徒劳无益，它和欧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因为这个体系是想复活我们美好的旧时代的革命理论之最后的、绝望的尝试，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在提高到这样的承认以后，就不再是“俄国的”，而是和那“象”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部分地在拉萨尔的著作中“所表现的”世界的社会主义合流了。

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就会了解：

一、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现时差不多所有我们革命家所宣传的那种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出来。

二、乡村公社，就它内部的组织性质来说，首先是力求让位给资产阶级的共同生活方式，而非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

三、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时，乡村公社所起的不是积极的作用而是消极的作用；它不能推动俄国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它对于这个运动的抵抗力只是比小农经济小一些罢了。

四、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只能由我们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担任起来。

五、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己自觉的努力才能达到。

“从特权环境出身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如果懂得了这些简单

的真理，就会丢掉夺取政权的意念，而讓我們将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去做。那时他們的努力方向，是創造这样的党并消灭不利于这个党成长和发展的一切条件。

不消說，这样的活动和那种靠“夺地、罰款和打耳光”来团結工人阶级是毫无共同之点的，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却把它說成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現時唯一可能的起点¹⁸⁸。单是这样的一个杜撰，就足以使我們的作者的文名永垂不朽，假如这种杜撰，和他的其余的結論一样，不是以完全沒有創見为特点的話。我們的作者在这里也只是重复了我們的合法的和秘密活动的民粹派所早已說过和出版过的东西。甚至于那些“农民派”傾向的小說家也是在自己作品中把馬克思主义者描写为某种資本主义的走卒的。两年以前，爱尔杰尔先生在《歐洲导报》上登了一篇小說“福尔康的姑娘”¹⁸⁹。在这一篇很有趣的作品里出現的人物，有自由主义的地主，有开明的有产者，有一面从事收集歌曲、一面和小說的女主角講恋爱的民粹派，最后是在自由主义地主的庄园里致力于农业改良的馬克思主义者。爱尔杰尔小說里的馬克思主义者固然不喜“罰款和打耳光”，但是，他一想到地主得到某种新机器，就不禁狂喜，更不必說开办工厂了。他是这样地拥护資本主义的利益，以致当上面說的开明有产者去訪問他的东家的时候，他就和这位开明的有产者訂立密切的和兄弟般的同盟。这样的“綱領”的确是丑恶的，但是这怪不了馬克思主义，尤其怪不了那位馬克思主义者。后者只能随爱尔杰尔先生的意思要他想出什么綱領，就想出什么綱領。早就有人講过，苹果掉下来是不会离苹果树很远的，小說中的主角决不会比小說的作者聰明很多。可以举出一个新証据来証实这个旧真理，就是这位爱尔杰尔式的民粹派說了許多毫无意思的話，例如他在和馬克思主义者談話中，使馬克思主义者相信，現在馬克思“已瀕

于灭亡”，因为在俄国某些杂志上发表了某些新的論文（是不是伏·伏·先生在《祖国紀事》中的論文呢？）。假使讀者注意到这一个事实，那末，他既赦免了“馬克思主义者”的罪过，就应当更宽大地看待馬克思主义本身，后者的罪过不过在于沒有能使俄国的独特論者理解它和重視它罢了。

只要稍微仔細地看問題，就可以明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永不会是資产階級奴役工人的同盟者，而且相反地，只有他們才能对資本主义的剝削組織認真的抵抗。我們再举一个实例來說明。試想手工織布工人現在的情形，并且看一看社会主义的各派別能够和应当對他們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我們用不着說很多。他們会劝手工工人“以行动来宣传”，劝他們炸坏这个或那个酒店，把这个或那个工厂主打成残废。以否定任何邏輯的連貫性、任何体系为主要特点的綱領，是不可能指示出任何有系統的行动方式的。我們認為更有兴趣的，是布朗基主义者。在布朗基的祖国，在法国，这一卓越人物的信徒們只是因为他們的綱領失去了自己的特質而和工人党的綱領合流，便成为进行有系統的活动的人，如象我們在选举运动里、在階級斗争宣传中和其他地方所看見的。在布朗基主义者仍旧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标志”原封不动的那些地方，他們的行动方式就失去任何主导的綫索，而只是归结为一个公式“叫囂，老兄，叫囂罢！”¹⁹⁰今天他們鼓动用手枪对待別列佐夫斯基¹⁹¹，明天要求取消常备軍，后天为了《贖罪的教堂》一書而发脾气，如此类推。不消說，俄国的布朗基的信徒們，也就是《警鐘》的明显的或秘密的拥护者們做这类“叫囂”的活动是不可能的。在俄国，布朗基主义者的鼓动活动必然最主要地归结为“恐怖”；他們的組織活动归结为建立陰謀者的秘密团体。現在試問，手工工人，就他自身說，即是不混

在知識分子中間而是繼續做他的手工的人，在历史所强加于他和資本的一切关系之下，能起什么作用呢？参加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只能是些个人。邀请手工工人团结成一个工人的政党，现在是不适时的，因为能够实行阶级专政的“工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不要给与”他政权等等。織布工人們始終是指望着将来，始終是支援革命党努力夺取政权，希望这样夺取的结果将是“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始基”：

看，老爷快到了，

老爷是会替我們作主的！¹⁹²

但是，“老爷”可能迟到，可能根本不来，可能来了以后，还来不及奠定有名的“始基”，立即就被赶走。革命运动能够替手工工人带来什么实际的、直接的利益呢？革命运动能对他们解释他们自己的情况，能教育他们友爱地、有组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吗？

不，不会教育的！而假使教育，也只是偶然的和順带的，因为布朗基主义者主要的努力完全不是用在工人中間的社会主义宣传上面。我們已經知道吉荷米洛夫式的革命，是希望把人民的力量集合在那些“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宣传”来予以解释的“几点”的周围。然而为了手工工人同他們的剝削者进行認真的和真正順利的斗争，却正需要“特殊的宣传”。由此可见，俄国布朗基主义者虽然极願意把“人民是什么样子就看待成什么样子”，仍不能不忽視他們的許多实际的需要和要求。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常常是被人們固执地指摘为狂妄而不切实际的，他們对待手工工人是什么态度呢？社会民主主义者知道，工人的解放必須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資本主义的剝削程度也为被剝削者的要求和发展水平所决定，所以就尽力喚起工人进行反对資本家的独立斗争。因为个别工厂和作坊工人的分散的努力不

能保證这样的斗争成功，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須使斗争带有阶级性。为此，他們必須坚决而有力地进行被称为社会主义宣传的“那种特殊宣传”。但是我們已經知道：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所以我們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宣传必須立即带有社会政治的性质。他对工人說：“你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国家方面的坚决干涉之下才是可能的。对于你們中間几乎已經完全成了工厂工人的一些人，国家是可以而且应当帮助的，首先，靠了在立法上保护成年工人、妇女和兒童的利益。你們中間那些有独立的小生产和資本主义作斗争的人，只能靠国家給予工人团体以信貸来巩固你們自己的地位。但是，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肯这样帮助你們的。只是当这一国家完全是你們的、工人的国家时，才会完全站在你們一边。所有你們的努力也应当朝着这一个目的。只要这个目的还未达到，你們就必須迫使甚至敌視你們的国家对你們讓步。而且不要忘記你們越坚决地要求某些讓步，你們的党越强，这些讓步也就越大。創立这样的党，团结成为一个伟大的和有紀律的力量罢。当你們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你們就完全摆脱了資本的压迫，在此以前，你們要努力使資本受某些限制，至少預防自己和自己的兒童免于体力、精神和智力的墮落。你們在你們現在的情况下只有两条出路：要就是斗争，要就是完全服从資本。我号召那些願意斗争的人同我在一起！”

讀者，你怎么样想呢，这种活动难道不是所有可能的活动中最实际的一种嗎？你說它的成功将是十分緩慢和靠不住的。假定是这样罢；但是别的种类的一些活动的真正成功的可能还更少。不管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以行动作宣传”，或者是布朗基主义者的阴谋叛变都不能推动俄国的阶级斗争前进一步，而工人的解放是只由这一斗争的进程来决定的。

社会民主主义者当然只作他所能作的；但是，他的处境的优点，是比起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来，能够替工人作的要多得多。他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没有这种觉悟，和资本家开始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工人一旦有了这种觉悟，他们使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力量、持久性和强度，不是停留在旧“纲领”之内的人所能梦想到的。

請注意，我們社会民主主义者完全不需要去“忙于（这是俄国人所特有的說法！）創造一个自己願意为之而活动的阶级”。只有对于現在俄国經濟关系完全没有知識的人，才不知道这一无可爭辯的情况：无情的社会发展过程已經部分地創造了、部分地越来越快地正在創造这一阶级。資本的历史作用是把一切都鏟平，只有完全不了解这种作用的人，才可以把我們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多少是特殊的我們的“贵族”的地位来比較¹⁹³。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国的亲英派沒有能把英国的贵族制度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但是法国的工人党却可以一点也不陷于空想地和英国民主同盟拥护一样的纲领。差別在什么地方呢？如果吉荷米洛夫先生仔細讀一下“共产党宣言”，他便会不費力地发现这一秘密。我們在向他推荐这一卓越著作时，关于“認俄国資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的一派”，也就是我們自己所屬的一派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还要講几句话。

反对这一派的最普通的理由——这种理由如果不是“从理性”，那就是从感情来的——是說，如果俄国革命运动的机会只依靠俄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和力量，这一运动在俄国的迅速发展就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一方面使人傾向于独特論的各种纲领，另一方面就引起了上面說过的那种耽心，認为革命家大概必須得为俄国的資本服务。人們当然很快就把这个理由提出来反对我們的

論据。

因此我們認為使讀者注意一些人的奇怪的不彻底的意見，并不是多余的事，就是那些人使我們听到类似刚才所举出的种种反对理由。正是这种不彻底性才显然表明了許多所謂車尔尼雪夫斯基的門徒們只理解了自己老师的研究的一些結果，而一点也沒有了解他的方法。

当人們說到俄国資本主义可能的命运，或者說到它对我們政治关系的影响时，民粹派普通总指出一个好象是无疑的情势，即我們的資本主义正处在如象一百多年前它“在西欧”那样的发展阶段。从此得出一个結論，要使資本主义在我們的历史中发生如象它在“西方”历史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們还得整整过一百年。这是太久了；而因为我們的知識分子向来已习惯于拿自己的革命意志来代替革命的发展，于是他們把自己的視綫轉到了公社，并且引証了車尔尼雪夫斯基所証明的那种它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可能。这样，他們所以訴之于完全去掉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的或然性，大部分是因为他們不懂得把这一阶段的时间縮短的可能性。他們从沒有想到完全去掉某一历史时期，只是縮短这个历史时期的个别場合，以及我們在証明第一个可能性的时候，从而也更加有力地証实第二个的或然性。

我們在上面，已經就特卡乔夫的例子看出，我們的布朗基主义者的綱領是以这一邏輯的大錯誤为根据的。但是，不幸，重复这一錯誤的不只是一些布朗基主义者。

很多很多的人以为社会革命在俄国“要就是現在，要就是很慢或者永远不会”，換言之，要就在我們現在的經濟关系基础上，要就在有待于遙远的将来去創造和巩固的那种制度的基础上。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而这也是西欧的历史教导我們的——資本主义所

感觉困难的只是第一步，而它由“西方”到东方的不断运动是以經常增长的速度在进行的。不仅俄国的資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象从前在英国发展的那样慢，而且它本身的存在也不会象在“西欧各国”那样久。我們的資本主义的花，还来不及完全盛开，就要萎落，这是国际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向我們保証的。但是，說事业总是在走向它的多少是完全的胜利，这也是不可能怀疑的。不管是空洞的否認已經存在的事实，或者是对于旧的、“永恒的”人民生活方式沒落的感叹，都不能停止国家“循着自己发展的自然規律前进”。但是这一个发展可以多少慢一些，它的生育多少痛苦一些，这是某一国家一切社会的和国际的关系的結合所决定的。这样結合或多或少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性質，又是取决于那些懂得他們国家未来演变意义的人的行为的。資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遇到了比在英国或在法国有更高度发展的工人階級，因此在这一国家，对資本主义剝削的抵抗也来得迅速、坚定一些。德国共产主义者决沒有想到去为資本主义服务。他們知道工人階級的迟早快来的胜利，也取决于那些了解历史发展意义的人們对这一階級所发生的影响。这些人在工人中間积极地从事宣传，得到的成績超过了他們的期待。为什么我們不可以学他們的榜样呢？

有厂主无工人是不可能的，正象在古代据亚里士多德說，有“主人”而无奴隶是不可能的一样。资产階級的发展必須以工人階級的发展为前提；資本主义的历史的生长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而且在其每一方面都集合着相应的社会階級。整个說来，这些階級中的每一个階級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比伏尔坎把普罗密修斯用鎖鏈縛在岩石上还牢固些”。在資本主义社会，商品支配着生产者，規定着他的行为。但是个别的人还是有可能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間作自觉的选择的。我們的所謂“知識分子”就是屬於这类人。

他們对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这种或那种态度是被他們自己道德的和智力的发展所决定。任何詭辯都不能为投到剝削者陣营的社会主义者作道义上的辯护。而且在这种場合中各种所能作的詭辯，是这样的可怜和无力，以致一点也說服不了那怕是那些只会作三段論法推理的人。

只是因为我們的独特論者的見解是那樣的耿直性和笨拙性，所以才有社会主义者个人参加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邏輯上是必要的那些談論。独特論者慣于以自己的意志代替历史的发展，慣于滿足以教条的世界观代替批判的世界观。他們的議論是这样：资本主义作为过渡的阶段既不可避免，所以就需要有創造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人。然而我已不能为原始积累的騎士們服务，我不能“昧着良心努力地去掠奪工人”。假如象我这样的人很多又怎么办呢？假使一切人都抱着我的見解，又怎么办呢？那时候就不会有作为过渡阶段必然发生的资本主义，如此类推。可怜的独特論者这样就陷入真正的邏輯的前提循环圈里，而在这个循环圈之后就是新的同心的結論的循环圈。“假使资本主义是如此绝对必要的話，暂时放弃社会主义而使用自己的力量于扩大和巩固资本主义”，不是更好些嗎？吉荷米洛夫先生說：“我們何苦拿社会主义的理想来教育工人，轉移这一阶级中的优秀力量，使之不去追求资本主义的騰达（其实誰也赶不上这些从工人出身的人能更順利地騰达起来）呢？”¹⁹⁴当资本主义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我們是来得及回到社会主义的，如此类推。独特論者永久生活在現成的、十分确定的事实和概念的世界中，絲毫沒有关于这些事实和概念发生过程_·的观念。所以，当他随便个别处理每个这样的概念和事实时，就完全看不见它們之間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性。

他是从沒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不可能成功地传播社会主义

思想的假定出发的。但是当他想尽快地把他的論敌的見解变得荒謬的时候，他很快就忘記了这一假定，而开始講出，迅速的传播社会主义的思想就妨碍資本主义的发展了。他同意承認一个現象是后果，另一个現象是原因；但是他耽心后果出現得早于原因，因此就妨碍原因發揮作用，即是說，妨碍它引起这一后果。我們的独特論者就这样自己墮入到一个他努力替他的論敌們挖掘的胡說八道的泥坑里去了。这些論敌們只有用如下的极为簡單的議論把他从坑里拉出来。

他們对他說：假如可以設想在全体人民群眾中間順利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是不需要在生活的各种关系上有一种为資本主义所引起的根本变革的話，那也就用不着还談什么我們社会发展的任何过渡阶段了。这些阶段对于我們之有意义，正因为能为社会主义的宣传清除基地。所以，耽心我們現在的宣传会停止資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是滑稽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說，放弃这一宣传也未免愚蠢，因为宣传的所以可能，也就指出，历史已經为宣传准备好了一部分基础。我們打好这个基础越快，我們的历史的发展就越快，我們的人民在完成他們前面的道路时所需要的努力和牺牲也将越少。我們不想与历史背道而馳，但是我們也不願落在它的后面一步。用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話說，我們对于过了时的东西一点也不惋惜；但是我們一分鐘也不願延擱現在已可看出是适时和可能的那种事业。我們着手宣传我們的思想时，能够精确地証明，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使这些思想胜利的时日迫近和減輕我們未来的工作的。

我們和你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当現代經濟关系的发展使你們离开你們的公社理想越来越远的时候，由于这同一的发展，我們的共产主义理想却离我們越来越近。你們好象一个想到北方却乘

上了到南方去的火車的人，而我們是知道自已的道路的，我們所乘的历史的火車，正开足馬力載着我們駛向我們的目的地。固然你們不滿意我們所选择的的方向，你們認為社会主义者不能同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发展。但是这是因为你們的邏輯已經是太独特的緣故。

你們認為，社会主义者为了忠于自己的理想，必須在任何地方都阻碍資本主义的发展。这里，你們的議論又是最簡陋不过了，你們說，妨碍資本主义的发展等于損害企业家的利益；而因为后者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絕對相反的，所以凡是有害于資本的东西，就有利于劳动。你們一点也沒有猜到，資本主义不仅与历史发展鏈条中在它后面的那一环节相对立，而且也是和在它以前的那一环节相对立的，它不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企图斗争，而且也和貴族与小市民的反动倾向斗争。你們对資本的仇恨是深的，准备無論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只要方便，就下手攻击它。这样的热心常使你們同情那些只能有利于反动派的資本主义的失敗。在这場合，你們的“俄国社会主义”的綱領就和德国“社会保守党”的綱領正相符合，于是綱領中的那些进步倾向就一点痕迹都剩不下了。为了避免这种可怜的嬗变，最后，你們应当完全相信辯証的历史观。你們应当支持資本主义对反动派的斗争，同时又要在它和工人的未来革命斗争中成为这一資本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敌人。只有这样的綱領才配自認為是这一世紀最前进思想代表者的党。为了拥护这个观点，你們又須抛弃現在介于各阶级中間的那种地位而和工人合流。

（二）在工人中間的宣传

但是这样的合流在現時可能嗎？在現在的政治条件下，在工人中間宣传，一般地說，是可能的嗎？

不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場合。困难有时候也变成不可能,这些困难不外两类。一类困难是决定于社会活动家的个人品質,决定于他們的那些占主要地位的意图、見解和傾向的性質。这一类困难是社会环境通过个体的媒介来造成的,因此这些困难是各色各样的,正如个性是各色各样的一样。哥尔登柏格認為困难的,热里亚波夫認為容易。具有某种性格和某种信念的人認為不可能的,具有另一种习惯、另一种見解的人看来就是必需,因而是可能,虽然或者是困难的¹⁹⁵。被宣布为不可能的,常常不是那种事情的本身不可能,而只是某人的意見認為这事情所带来的利益不足以补偿他所費的力气。对于某一政治事业所带来的利益的估計,完全决定于活动家本人对这一事业的看法。伏·伏·先生深信政府自身將負責組織他——伏·伏·先生——所希望的国民生产,当然就会認為現在在工人中間进行宣传所出的力量和所做的牺牲是多余的和不适宜的。同样,一个阴谋者主要是指望着这个或那个“委员会”来完成革命,他的内心不需要經過很大的斗争,就会宣布在工人中間作宣传为不可能,依照他的意見,工人只是“对于革命”重要,但絕不是革命的唯一代表¹⁹⁶。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不是这样思考,他們深信,不是革命需要工人,而是工人需要革命。他認為,在工人中間宣传將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他如不考驗过他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和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决不放弃这个目标。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对真正社会主义观点体会得越多,他們在工人中間的活动就越是可能和容易,这是因为他們想去从事那种活动的心情越发强烈的緣故。

我們不想而且也不能欺騙任何人。誰都知道,我們的宣传家和人民鼓动家在工作上将会遇到不知多少困难和迫害。但是也用不着夸大这些困难。我們的所有各种革命活动,現在都无例外地因警

察的迫害而大受阻挠，但是，这还不是說白色恐怖会达到自己“根絕叛乱”的目的。作用引起反作用，迫害引起忘我的牺牲，不管政府的反动措施如何坚决，革命家只要朝着这一方面发挥适当的力量，总是能够逃避这些措施的。有个时候，革命家自己也認為爆炸冬宮和在小薩多瓦雅挖地道是空想，是不能实现的事情¹⁹⁷。但是，后来也有人实行了不可能实行的事、实现了不可能实现的事。难道这类頑强精神就不能表现在革命活动的其他范围中嗎？难道跟踪“恐怖主义者”的特务比起防备我們工人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邪說”影响的特务，本領差些和人数少些嗎？只有那些不管怎样总想摆脱自己認為不愉快的工作的人才是这样地断定的。

說到工人群众的特点，那末，他們是完全和我們的悲观派暗淡的預言不相符合的。实在說来，我們几乎从来还没有連續不断地和有系統地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过宣传。然而經驗表明，甚至于几十个人的分散的努力也足以对于我們工人階級的革命主动性給予有力的推动。讀者試回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它的社会民主主义綱領和它的組織（就一个秘密会社說来范围算是很广的組織）。这个协会瓦解了，但在責备工人以前，我們的知識分子應該想想，他們为了支援这个团体尽了很多的力嗎¹⁹⁸？而支援它是可能的，并且完全不怎么困难。协会的代表們在“給‘土地与自由’編輯部的信”中，甚至指出了哪种帮助是他們所希望的和他們所需要的。他們請求协助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来出版工人的报纸。“知識分子的”“土地与自由”社認為实行这个請求是不适时的。我們的“知識分子”社会主义者那时候的主要努力，完全集中在另一方面。这些努力的结果，并没有支援工人，而是加强了警察的迫害，也連帶打击了工人的組織。在自己所不习惯的秘密活动中完全靠自己力量的工人协会，被打碎成了几个更小的部分，中間沒有統一的計劃和行动相联

系，是无足怪的。但是这些小组和小团体的社会主义工人在我們的工业中心，直到現在仍然存在；只須稍为信仰坚定，热情和坚持就可以再把他們团结成为一个巨大的整体。

不消說，秘密工人团体还不是工人的党。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說我們的綱領是比較更指靠着将来而不是指靠着現在的人，是完全对的。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結論呢？这是說我們不应当立即着手实现我們的綱領嗎？象这样議論的独特論者又会墮入毫无出路的推理的循环圈里。一国的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必須以自由制度的胜利为前提，哪怕是一部分的胜利和暂时的胜利。但是爭取这些自由制度，沒有人民中最先进的阶层的政治上的支持，又是不可能的。出路在哪里呢？西欧的历史是靠对工人阶级緩慢地进行政治教育来打开这一絕境的。但是我們的革命家是最怕細心的老嫗式的緩慢的。他們要求尽快的和不顧一切的革命。因此，我們只有惊异他們何以不記得要享乐就得先工作的这句俗話，这句俗話的政治意义可以归结为一个不可爭論的主张，即是凡願意赶快获得自由的，就应当努力使工人阶级关心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是反对“主要敌人”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这个敌人妨碍着任何稍为合理地”依照西欧样式来“着手”建立我們的工人政党。实在說来，历史家所断言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或者——几乎一样——社会，在某一国进行了反专制制度的斗争，是什么意思呢？不多，也不少，正是說资产阶级推动了和領導了工人阶级去斗争，或者至少，指望他們的支持。当资产阶级沒有得到这种支持时，资产阶级是怯懦的，因为他們軟弱无力。当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各有应得地失去了法国工人阶级的支持的时候，它是怎样反对拿破仑第三呢？他們只有在絕望的英勇斗争和伪善地贊許既成事实之間抉择。在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资产阶级

什么时候表现过英勇呢？是在工人阶级已在街垒上占优势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还不能指望得到工人这样的支持；它甚至还不知道叛乱的工人把自己的武器对着谁：是对着专制君主政体的拥护者呢，还是对着政治自由的拥护者？因此，它畏缩和动摇；因此，它现在是气馁、难过，而且绝望。但是，把情势改变一下，只让城郊区保证给我们的“社会”以支持，你们就会看见，“社会”知道它所要的东西，并且能够对当局以合乎公民身份的那种语言讲话。让我们回忆一下1878—1879年彼得堡的罢工吧。关心这些罢工消息的，不仅是一些社会主义者。这些罢工成了日常事件，几乎整个彼得堡的知识界和有思想的人都关心它们¹⁹⁹。现在你可以设想，在罢工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个工厂的雇主和工人的利害冲突，而且也表示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和沙皇专制正在开始的政治争执。警察对待罢工工人的态度，给了这种争执的爆发以不少的机会。你可以想象，新纱厂工人们不仅为了自己要求提高工资，而且也为了所有俄国公民要求一定的政治权利。资产阶级在那时候认为它应当比从前更严肃地考虑工人的要求。此外，所有那些经济利益不受罢工者胜利直接威胁的自由主义阶层，将感觉他们的政治要求终究有了坚实的基础，感觉工人阶级的支援使得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获得胜利的结局更有把握。工人的政治运动会在所有政治自由拥护者的心中鼓舞起新的信念。民粹派分子自己可能注意到人民出身的新战士，大概不会再无结果地和无希望地为他们所珍贵的“基础”^①的破坏而伤心了。

现在试问，假使不是革命的知分子，谁能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呢？在1878—1879年罢工时期，这些有自信心的知分子

^①（1905年版注）最近一年的事变是这里所说的一切的光耀的证明——无产阶级唤醒了俄国“社会”的政治觉悟。

决不会認自己的政治覺悟是很高的。所以罢工者关于工人階級經濟利益及其政治权利的联系不能从他們那里听到什么有益的意见。即使在現在，在我們的“革命青年”的头脑中也是有好多混乱思想的。但是我們希望这种混乱思想終究会讓位于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不致把我們革命运动的成就瘫痪起来。一旦这一幸运的时日到来，那末，一些工人小組也会很快地站在正确的政治观点上。那时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为工人群众所支持的、我們“社会”的先进部队的政治要求，終将得到它所期待已久的滿足。

假如接着亚历山大二世之死在俄国的各主要城市发生了工人騷动，那末，它总会产生一些重大的結果……但是事先沒有在工人中間的广泛鼓动，沒有事先尽可能地多建立一些秘密組織，来培养工人的思想和領導他們的运动，便是不可能的。所以可以說，沒有在工人中間的認真的活动，因此也就是沒有从秘密的工人組織一方面来的自觉的支援，那末恐怖主义者最勇敢的事迹不过是一些漂亮的袭击。“主要的敌人”将只是为他們所击败，并不是被他們消灭；而这就是說，恐怖主义的斗争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这一斗争的唯一目的应当是完全地和无情地推翻专制制度。

这样說来，現代俄国的政治形势，不仅不迫使我們放弃在工人中間的活动，而是相反地只有靠这样的活动，我們才能摆脱专制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压迫。

現在我們从另一方面来看看这个問題。以上所說，又一次地對我們証实了一个真理，即是工人階級“对于革命”是很重要的。但是社会主义者所首先应当思考的，是怎样使得革命对于本国劳动人民有益。現在我們暂时抛开农民，就会发现工人階級对于他們的經濟需要和政治权利之間的联系越明白，他們从自己的政治

斗争中得的益处就越多。“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常常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下和资产阶级的最高领导下反对专制制度。由此他们就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依赖自由主义领导者，信仰自由主义的口号是完全神圣的，相信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可侵犯的。在德国就需要有象拉薩尔那样的毅力和雄辯，才能破坏工人和进步人士的精神联系。我們的“社会”对于工人阶级沒有发生这样的影响，而社会主义者重新創造这一影响，既沒有需要，也沒有好处。社会主义者必須向工人指出他們自己的，工人的旗帜，給他們以从工人自己内部出身的领导者，簡言之，必須注意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而是秘密的工人組織对工人的思想取得支配的影响。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将因此而大大加速，如果它还在幼小的时候，就促进了专制制度的傾复和政治自由的胜利，它也将能在其他政党中間爭得荣誉的地位。

由此可見，为了促进俄国工人阶级智力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我們的革命家就無須訴之于任何一些矫揉的办法，無須站在某种虛偽的或含糊的立場。他們只須深信現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則，而且，在不限于政治宣传的时候，要經常开导自己的听众：“經濟的解放是一个伟大的目的，任何政治运动都是从屬於它的一个手段”。我們的工人阶级在掌握了这一思想以后，就不会左右为难，就会撇开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反动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經濟詐騙而前进。

我們的革命家在促进工人党的組成的时候，将是做了一件对現代俄国“先进人士”所能指出的最富成果的、最重要的事业。只要有一个工人党就能解决現在陷我們知識分子于理論上、实际上都軟弱无力的一切那些矛盾。我們已經看到，現时这些矛盾中的最感觉得到的一个，就是推翻专制制度在現时的必要性和在沒有人

民的支持下这样做的不可能性。秘密的工人組織当它把人民中最觉悟的阶层吸引到政治斗争中时，就能解决这一矛盾。但是这还不够。俄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自由制度的保护之下发展和巩固起来时，将解决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矛盾，这次是属于经济性质的。大家知道，现在的乡村公社应当让位于共产主义，或者是完全解体。同时公社的经济组织又没有足以推动自己走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动力。公社在使我们的农民比较容易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却不能赋予他实行这样的过渡所必需的主动精神。相反地，商品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破坏旧的公社原则。而我们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也没有可能依靠一次有力的运动来消除这一根本的矛盾。在他们眼中，乡村公社的某一部分是在垮台、破坏，将成为最贫穷的一部分社员的“负担和阻碍”。不论他们觉得这一现象是多么可悲，但是他们现在对公社完全是爱莫能助。在“人民”与爱人民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分化的公社是自愿自的，它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同情者也是自愿自的，不论它或其他的人都不能结束这种可悲的情况。如何摆脱这一矛盾呢？难道我们的知识分子只得把任何实际活动看得没有希望并以乌斯宾斯基式的“乌托邦”自慰吗？绝对不然！我们的民粹派只要愿意诉之于我们社会发展的辩证法，至少还可以拯救某一部分乡村公社。而这样的申诉也只有靠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帮助才有可能。

我们公社的分化是无可争辩的和无可怀疑的事实。但是，这一过程的速度和强度在俄国各地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民粹派为要在公社还保持最大活力与巩固性的地方停止这一过程，必须利用在工业最发达的省份的公社解体的时候所解放出的那些力量。这些力量就是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他们，也只有他们能成为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之间连结的环节；他们，也只有他们能将“人

民”和人民中有“教养的”一部分隔开的那一历史的深渊填平。通过他们和得到他们的帮助，社会主义的宣传终将深入俄国农村所有的角落。在适时地团结和组织为一个工人政党以后，他们就能成为要求实行那种防止公社普遍分化的经济改良的社会主义鼓动的主要支柱。而当工人政党对上层等级最后胜利的时辰到来时，又是它，而且只是它能够主动担负起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国民生产的任务。在它的影响下，——有时是在它的压力下——保存下来的乡村公社就真正开始过渡到更高级的共产主义形式。那时候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所提供的利益才成为真实的，而不仅是可能的，而民粹派关于我们的农民独特发展的梦想，至少就其某一部分来说就能实现了。

这样，在俄国某些地方公社分化所解放出来的力量，能预防它在别的地方的完全分化。所需要的只是能正确地和适时地利用和指导这些力量，换言之，尽可能把他们迅速地组织到社会民主党中。

但是，独特论者反对说，小土地所有者是会强烈抵抗工人政党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不错，他们是会抵抗的。但是同时也将有人和这种抵抗斗争。小所有者阶级的出现是符合于革命无产阶级人数和力量的增长的，而无产阶级终将赋予我们的笨重的国家机器以生命和推动力。抵抗在具有能够战胜抵抗的历史因素的地方，就是不可怕的；同样，相反地，所预料的抵抗之不存在于人民不能开始社会主义运动的地方、不存在于个别人物的英勇努力由于蒙昧无知的群众的惰性而遭到失败的地方，也远不是一件可以高兴的事情。

此外，应当注意，这同一的工人党在我国将是西方影响的传导者。工人对于欧洲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会充耳不闻，而农民就很可能

易是这样。国内和国际运动联合的力量，将能綽綽有余地战胜小所有者的反动意图。

因此，重复一次：尽可能迅速地組成工人党，是解决现代俄国所有經濟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段。在这条道路上等待着我們的，是成功和胜利；其他的道路只有导向失敗和軟弱无力。

民意党人喊叫說，但是恐怖呢？另一方面，民粹派分子也喊叫說，农民呢？有些人結論說，为了你們的远大計劃，你們准备和現存的反动势力妥协；另一些人惊吓地說，作为狹隘的教条主义者，你們为了你們的教条胜利，却牺牲现实的利益。但是我們請自己的論敌們忍耐几分鐘，我們將努力回答對我們的紛紛的責难，哪怕只回答一部分。

第一，我們絕不否認恐怖主义的斗争在現代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斗争是从我們社会政治条件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它同样自然地应当促进这些条件向較好的方面改变。但是所謂恐怖，就它的本身說来，只能破坏政府的力量，对于把敌視政府的力量自覺地組織起来很少帮助。恐怖主义的斗争并不扩大我們革命运动的范围；相反地，它把这一运动变为少数游击小組的英勇行动。在几次光輝的胜利之后，我們的革命党会因为极度紧张而显見的削弱，如果不从人民的新阶层中汲取新力量，就不能恢复元气。我們建議它面向工人階級，即是現代社会所有各階級中最革命階級。这是不是說，我們劝革命党暂时停止对政府积极斗争呢？不仅不是，而且相反地，我們对革命党指出使这一斗争的范围更广泛，更多方面，因此更順利的可能。但是不消說，我們不能仅从工人“对革命”是重要的这一观点来看工人运动的事业。我們要把革命的胜利变为对我国劳动人民有利益，因此，我們認為必須促进劳动人民的智力发展，促进其团結和組織。我們完全不想使秘密的工人

組織变成培养工人出身的恐怖主义者的秘密养成所。但是我們很了解，俄国的政治解放是完全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一致的，因此我們以为工人中間現有的革命小組必須靠宣传、鼓动、有时候也靠公开的街道上的斗争来帮助我們知識分子的政治斗争。把解放运动的所有困难完全堆在工人階級的肩上是不公道的，但是，順便說說，把工人也吸引到这一运动中来，是完全正当而适宜的。

人民中还有别的阶层，能方便得多地担任对政府进行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是除了工人以外，沒有别的阶层能在决定的片刻把为恐怖主义者所打伤的政治怪物推翻和消灭。在工人中的宣传并不消除恐怖主义斗争的必要，而是为它創造新的前所未有的机会^①。

以上是对恐怖主义者說的，現在我們来同民粹派分子談談吧。

所有那些沒有把在农民中的革命活动放在主要地位的綱領，都使民粹派分子伤心。但是尽管他們自己的綱領是以这样的活动为全部内容，然而，由于这一情况

人民赢得的利益并不多，
他們現時也不轻松！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換言之，从“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以来，在农民中間的革命活动不仅沒有扩大而且越来越縮小了。現時我們可以不致大錯地說它等于零。然而在这整个時間，認為我們整个革命运动的重心应当立即放在农民中間去的人是不不少的。这一矛盾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怀疑民粹派不活动、怯懦和不坚决是不公道的。我們只有認為他們为自己提出了在現在条件下不可能實現的

^①（1905年版注）后来有人以这一地方为根据說，“劳动解放”社同情了“恐怖主义”。但是这一社从自己存在的最初时候起已認為恐怖主义对于工人們是不适当的；反对知識分子的恐怖主义斗争当时是絕對沒有益处的；知識分子是象信仰上帝一样的信仰恐怖。

任务，我們的知識分子不应当从农民来开始和人民实现革命的合流。而我們确实是这样想的。但这絕不是說，我們不重視农民中的革命活动。我們先确立事实，和努力去了解它的真义，深信我們的民粹派，在理解自己失敗的原因以后，将来就能避免失敗。我們認為正是組織工人党，才可以使我們擺脫那一矛盾，由于这个矛盾，在最近七年的期間在俄国只能存在着有完全和人民生疏的民粹派。

工人党怎样办到这一点，从以上所說的話已可以看出。但是关于这一点不妨再講几句话。

为了影响那些众多的无知的群众，必須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力量，否則，个人的一切努力会沒有絲毫結果。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並沒有掌握着这必須的最低限度的力量，所以，他們在农民中間的革命活动，几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我們對他們指出，产业工人，是一个能够幫助他們和“人民”合流的中間阶层。这难道說我們忽視农民？絕对不然。相反地，这是說，我們是在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农民。

其次，除了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之外，为了影响某一部分人，必須在这一部分人的性格和那些向他們呼吁的活动家的性格之間有某种共同之点。我們的革命知識分子，無論就思想习惯，或就体力劳动的能力說，都和农民沒有任何共同之点。产业工人在这方面也是介于农民和“大学生”之間的，所以，产业工人应当成为他們之間的連結的环节。

最后，还有一个絕不是不重要的情况也不应当忽視。关于現代俄国似乎是純粹农业的性質，不管有怎样說法，然而无疑地，“乡村”不能吸引我們革命知識分子的所有力量。知識分子的力量并不集合在乡村，而是集合在城市，甚至由于在农民中間进行宣传而

遭警察迫害的革命家，也不是在乡村而是在城市中寻找避难所，单就这一点来看，那种说法就已是不可思议的了。所以我们的主要城市是一些常常拥有较多革命知识分子的中心。不用说，知识分子不能不感受到城市对自己的影响，他们不能不过城市的生活。从某些时候起，城市的生活就是带政治性的。而我们知道，尽管有真正“民粹派”的纲领，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抵抗不住潮流，不得不从事政治斗争。在我们还没有工人党的时候，“城市”里的革命家就不得不向“社会”呼吁，因此，事实上他们就成为了“社会”的革命代表。人民被推到次要的地位，而这样不仅延缓了人民和知识分子联系的建立，而且也破坏了从前存在的“乡村”和从知识分子出身的“城市”革命家中间的联系。由此就发生互不了解、意见分歧和分道扬镳的情形。如果城市的政治斗争主要具有工人的性质，情形就不会是这样。那时候，城市的和乡村的革命者的区别，只是地方的不同，而完全不是自己活动的实质不同，两者都只是人民运动的代表，代表它的不同的方面，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必要为了和自己的观点不相容的“社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一致，并不是不能实现的空想。在实际中实现它，是很不难的。现在我们不能数出十个民粹派分子是由于自己的纲领，由于为革命服务的义务住在农村的，那末，不少有学问的和诚实的民主主义者之生活在乡村是由于为国家工作，由于自己的职业而住在乡村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不同情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政治斗争，而同时也不在农民中间进行系统的革命工作，只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一个可以与之共同努力的政党，大家知道，单单一个人在战场上不成其为战士。在工人中间开始社会政治运动罢，你会看见这些乡村的民主主义者慢慢会过渡到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成为城市和乡村的连结的环节。

那时我們的革命力量將作如下的極簡單的分配：到鄉村去的是一切那些因為職業關係而不得不到鄉村去的人。不消說，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同時有可能住在城市和工業中心的人們，就把自己的活動集中在工人中間，努力從他們中間產生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大軍的先鋒隊。

這就是我們的綱領。它不是為了城市的利益而犧牲鄉村，也不是為了產業工人而忽視農民。它規定自己的任務為組織城市中社會一革命的力量，以便把鄉村吸引到具有全世界歷史的運動的河床中來。

第六章 結 論

現在讓我們對讀者說幾句做結束語。

在一切有關我們觀點的辯護上，我們想訴之于理智，而不是訴之于感情。我們特別珍視真理的利益，甚至在真理和我們最寶貴的信念相違反的時候，我們也將能遷就它。所以我們只請求讀者一件事情：請他以我們所談革命問題應得的那種注意來批評我們的理由。不管他贊成或者不贊成我們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無論如何，俄國革命的思想從重新檢查自己已達到的成果中，只會得到益處。

但是問題還有一面，不是有關我們見解的實質，而是有關我們所選擇的敘述方式。人們可能責備我們——或者最好說是我——對於那些對革命事業有過相當重要的貢獻，因此無疑是值得尊敬的黨派不該過於嚴厲，不該取敵視的態度。

我所熟識的“學士們”可能更進一步指責我仇視整個的俄國革命。

在有關這一問題的一切上面，我認為訴之于讀者的那種被稱為公正的和正義的情感，將不是多餘的。

現在，在結論一章正如在代序“給彼·拉·拉甫羅夫的信”中一樣，我可以極誠懇地重復說，我所希望的決不是“民意”失敗，而是它進一步的成功。假使我嚴厲地批評了它的代表者之一的文章，那末，這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這和仇視革命或者仇視革命派別中的任何一派絕沒有共同之點^①。

首先应当注意的，革命家不是革命；革命家的理論絕非永遠能而且也絕非所有的各部分都能称为革命的理論。

我决不否認民意党人所干的革命行动的重要的和有益的意义；但是我对这些行动的解释并不象“党”的正式代表所作的解释一样。我以另一种眼光来看这些行动，这就很不愉快地激怒了民意派的政論家們。我对这些行动的意义看法，还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小册子中就充分闡释过，我在那里說过：“《民意》除了在現代科学社会主义里面以外，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在別的地方寻找根据。”

关于这个問題，吉荷米洛夫先生如果乐意，可以发表另一种他認為是更正确的和更革命的看法。

他因为在“某些阶层的社会主义者中”……“政治的民主的思想”……“采取了曲解它的實質的一些形式”而感慨，他決定改正情况，而在“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中，努力使自己党的活动以巴枯宁的及特卡乔夫的理論为根据。由于这样一种轉变，“民意党”的正式理論已不再是革命的理論，我們应当严厉加以批評，而并不絲毫損害革命，正象我們应当批評現在越来越厉害的俄国反动著述界的一切其他的表現一样。

反动的理論一般是丑恶的；但是它們如果只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出現，并不是危险的。它們一旦拿革命的旗帜作掩护，就成为有害的毒素，真正的精神上的毒藥了。这时候革命的敌人并不是那把反动理論的革命假面具摘下来的人，而是那对于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伪乱真的文章繼續漠不关心的旁观者。

① [1905年版注]还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点。我已知道得很清楚，早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問世以前，他已对“民意”的政綱完全失望了，所以他的堅持这一綱領帶有极令人憤慨的伪善性質。

我不能而且不想这样地漠不关心。一般地我恨反动派，但是当他們以革命的名义作号召的时候，我尤其恨他們。如果人們不向我証明以下两点，就不能承認我对吉荷米洛夫先生犯了过分严厉的錯誤：

一、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理論不是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学說的新版。

二、后两人的学說比起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不能被認為是反动的学說。

我的論敌們且不忙攻击我侮辱俄国革命的尊严，而努力来証明这两点罢。假使他們的理由有說服的力量，我就自己宣布自己的严厉是不應該的。

但是要做到这点，还必須拿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那些引起我对他进行論战的論点作爭論的基础。《民意导报》的总方針，是这样地不明白和不确定，因之《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一文的巴枯宁—特卡乔夫主义的傾向，不能妨碍其他同人的論文，甚至——无論期待这一点是如何困难——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新的論文表現馬克思主义傾向。我們的作者想起《导报》綱領中致命的“但是”一詞那一边的一部分，而写出很漂亮的几頁，叙述达到一般的“社会主义目的”的唯一道路，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但是这种陣綫的变化，并不削弱我們所討論的論文的反动意义，而且只是証明，我們的作者沒有任何确定的見解。

我請比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辯护人更为公正的讀者記住，不仅可以一般地衷心同情革命，而且也可以特別同情革命的“民意党”，同时要想到这一党的最迫切的任务，它的首要的最必要的成就，应当是和自己的現今的一些理論无条件的决裂。

“民意”的拥护者們如果以为这样的决裂就忘掉俄国恐怖主义

斗争的英雄們，这种想法便是徒然的。最卓越的恐怖主义者对于那些他們当时所公認的革命家的“綱領”开始取着批判的态度。为什么追随他們的人，对于自己时代的一些“綱領”，不同样采取批判的态度；为什么他們以为热里亚波夫的批判的思想应当停止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教条主义世界觀的面前呢？

这就是值得我們年青的民意党人思索的一个問題^①。

^① (1905年版注)我这样也沒有等待到对自己的这本书的严肃的回答。固然，在《民意导报》的第5期上出現了一篇图書短評200，其中說到，要反駁我首先就是要談我的个人。除这一显然是恶意的短評外，《导报》的編輯部几乎一点也沒有說什么来替吉荷米洛夫式的那些对革命的期待辯护，而在几年以后，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宣称，这些期待是作不到的，并承認了，从他到国外以后，他已認为自己的“党”是一个死尸。这是出乎意外的，但却是我們整个爭論的极其重要的結論。我只有把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的《必然的轉变》論文和在1889年日内瓦出版的《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煩惱》小册子所做的結論作一个总结 201。

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綱領²⁰²

“劳动解放”社所抱定的目的是在俄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培养組織俄国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些成分。

它的一些观念的实質可以用如下的不多几句话来表达^①：

(1) 工人阶级的經濟解放将只能通过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轉变为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和把社会—經濟生活的一切职能組織得符合于社会需要才能达到。

(2) 文明社会的技术的現代发展, 不仅給了这样的組織以物質可能, 而且也使它成为解决阻碍着这些社会之平靜的和全面的发展的那些矛盾所必需的和不可免的。

(3) 这一激烈的經濟革命将引起社会的和国际的关系的全部体制中的最根本的变迁。

在通过消灭阶级本身以消除阶级斗争的时候；在通过消除商品生产和与之联系起来的竞争使个体經濟斗争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的时候；简言之，在消除諸个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之間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的时候，它使在多世紀来为生存而斗争中作为武器而发展的一切那些社会机关成为多余的。

^① 为我们提出来供同志们批判的綱領，我們絕不認為是完全完整的、不得加以任何局部的改变和补充的东西。恰恰相反，我們准备在它里面采納任何修正，只要它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而且符合于由这些概念所得出的有关俄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实际結論。

在不陷入关于将来的社会和国际的組織的一些空虛幻想时，現在已經可以預言社会内部慢性的斗争中的最重要的机关——即国家的消灭，它是一种与社会对立的政治組織，而且主要地是保卫它的統治部分的利益的。同样，即在現在已經可以預言行将到来的經濟革命的国际性質。現代产品的国际交換的发展使得所有文明社会参加这一革命成为必要。

所以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承認現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質和宣布生产者們的国际团結的原則。

“劳动解放”社也承認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原則，而且承認所有文明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4) 在現在为盲目的經濟必要性所支配的地方加入自觉性，在以生产者对出品的支配代替現代产品之对生产者的支配时，社会主义革命将使一切社会关系变为简单明了，同时給予每一个公民以真实的可能直接参加一切社会事务的討論和決定。

公民們对于一切社会事务管理的直接参加須以废除現代的政治代表制度并以人民的直接立法代替它为前提²⁰³。

社会主义者們在自己的斗争中应当注意到这一必需的政治改良，并使用由他們来决定的一切手段以促其实现。

由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自我教育和政治統治构成它的經濟解放的必需的先决条件，这更加是必要的。只有完全民主的国家才能完成那种符合于生产者們的利益、和要求他們在組織和調节生产中的合理参加的經濟激变。

現在，先进国家的工人階級对于上述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必需性，越来越認識清楚了，而且正在組織自己成为敌視剝削者們的所有政党的劳动的特殊政党。

在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則改进了自己以后，这一組織，还

是要首先注意在各該国以内由工人爭取政治的統治地位。“当然，每一国的无产阶级应当首先清算自己的有产阶级”。

这在不同国家的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政綱里添进了多样性的成分，迫使其中的每一个党須适应自己国家的社会条件。

不言自明地，社会主义者的实际任务，因之，也就是他們的綱領，在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在其中占支配地位，和劳动群众还处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和衰頹的家长制經濟的双重压迫之下的那些国家是应当有比較特殊的和复杂的性質的。

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者們不得不同时組織工人阶级来同有产阶级进行斗争和进行反对有害于不論是工人阶级的发展以及全体人民的幸福的前资产阶级的旧社会关系残余的战争。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們正是处在这样的形势中。俄国的劳动人民直接承担着警察专制国家的巨大机器的重担，而同时遭受到为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所特有的一切灾难，而有些地方——在我們的各个工业中心——他們已經历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压迫，这种生产还没有为不管是任何坚决的国家干涉或者是工人們自身的有組織的抵抗所限制。当代的俄国所遭受到的——正如馬克思关于欧洲大陆的西部所說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痛苦，而且也感到这一发展不够的痛苦。

生产的这种落后状态的最有害的后果之一，过去和直到現在都是中等阶级的不发达状态，它在我国就不能負起主动地和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責任。

因此，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不得不主持当代的解放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任务应当是在我們祖国建立自由的政治制度，而且社会主义者在自己一方面应当力求給工人阶级以可能来积极而有成果的参加俄国的未来政治生活²⁰⁴。

为达到此目的的首要手段应当是为了民主的宪法进行鼓动，它保証：

(1) 任何公民，未因犯有法律严格确定的某种可耻行为^①經法院判处丧失政治权力能力者，都有选举和被选举进立法会以及省的和公社的自治机关的权利。

(2) 給予人民代表們以法律所規定的金錢報酬，使得人們能从人口中的貧苦階級中选出他們。

(3) 公民的人身和住宅的不可侵犯性。

(4) 信仰、言論、出版、集会和結社的无限自由。

(5) 迁移和职业的自由。

(6) 一切公民，不論其宗教和种族的出身，完全平等^②。

(7) 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替常备軍。

(8) 修改我国的全部民法刑法，消灭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等級区分和懲罰。

但是，如果专制政体傾复的时候，工人們是在完全无准备、无組織的状态中的話，这一目的将是不能达到的，工人們的政治独立性也将是不可設想的。

所以，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負有組織工人和量力的准备他們不論同当代的政府制度，以及同将来的有产階級的政党进行斗争的責任。

他們应当立即从事組織我們工业中心的工人，——作为俄国

^① 能被列入这一类行为的，包括例如，在选举时的行賄，雇主对自己工人們的虐待，等等。

^② 这一点邏輯地包含在(4)中，那里附带地也要求信仰的完全自由；但是我們認為需要更明显地指出它，因为现在在我国存在有整整的一些阶层，例如，犹太人，他們甚至沒有享受到甚至給予了其他“居民們”的那些可憐的“权利”。

全体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們，——成为相互間联結起来的秘密小組，具有符合于全体俄国生产者階級的当代需要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的明确的社会政治綱領。

在理解这一綱領的細节只能在将来制訂出，而且只能由負有参加政治生活的使命和团結为一特殊的政党的工人階級所制訂的时候，“劳动解放”社認為工人政綱的經濟部分的最主要的各点应当是如下的要求：

(1) 彻底改变我們的土地关系，亦即改变贖买土地和以之分給农村公社的那些条件。对于凡是認為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等等对自己有便利的那些农民，就赋予他們这样做的权利²⁰⁵。

(2) 取消現在的稅收制度和建立累进所得稅制。

(3) 立法調整工人們（城市的和乡村的）和雇主之間的关系，并組織各級有工人代表参加的检查机关。

(4) 对于农业的、矿业的和加工工业的各种各样的部門（为农民們、矿工們、工厂工人們、手工业者們等等）所組織的生产組合应当由国家予以帮助²⁰⁶。

“劳动解放”社深信，不仅俄国工人階級的成就，而且这样的經過思考的运动本身也是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賴于知識分子在它中間的工作的。

但是上述的社認為，知識分子們自身应当事先站在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之上，民粹主义的傳統只有在不与社会主义的原理相矛盾的地方才予以保留。

有見于此，“劳动解放”社以致力于在俄国宣传現代社会主义和准备工人階級自覺地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为目的；它把自己所有的力量貢獻給这一目的，号召我們的革命青年們予以帮助和协助。

在尽自己的力之所能来追求这一目标时，“劳动解放”社同时

承認反对专制主义政府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必要性²⁰⁷，它和“民意”党只是在关于革命党的所謂夺取政权諸問題上和关于社会主义者們在工人階級中間直接活动的諸任务上有意見的分歧。

“劳动解放”社一点也不忽視构成俄国絕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部分的农民。但是它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特別是在現在的社会政治斗争的諸条件中，首先应当在这一人口的更成熟的人群中，即是产业工人中来进行。在預先取得这一阶层的有力的支持以后，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才可以有大得多的希望把自己的影响普及到农民身上，特别是假使社会主义的知識分子到那时候获得鼓动和宣传的自由的时候。而且不消說的是，假使在农民中暴露独立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我們社会主义者的力量的分配就应当有所改变，而且甚至在現在的时候，一些和农民有直接关系的人們，也能以自己在他們中間的活动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作重要的效劳。“劳动解放”社不仅不推开这些人，而且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在政綱的基本諸原理上和他們一致²⁰⁸。

日內瓦，1884年。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綱領第二草案²⁰⁹

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們，和其它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們一样，致力于使劳动从資本的压迫下获得完全的解放。这样的解放只有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轉变为社会所有才能达到，这一轉变将引起：

(a) 現代商品生产(即是产品在市場上的买与卖)的废除和

(6) 以一种新的社会生产体系来代替它，这一体系是根据預先拟定的計劃而且注意到在当前生产諸力量所許可的範圍內滿足整个社会的以至其每一个成員的欲望的。

这一共产主义的革命在社会的和国际的諸关系的整个制度中将引起最根本的改变。

在以生产者对产品的支配来代替現在产品对生产者的支配的状态时，共产主义革命在現在由盲目的經濟必然性支配的地方导入自覺性；在使所有的社会关系变为簡單明了的时候，它同时給予每一个公民以现实的經濟可能来直接参加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討論和決定。

公民們对于社会事务管理的直接参加必須以废除現代的政治代表制而用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它为前提²¹⁰。

除此以外，現在已經可以預見行将到來的經濟革命的国际性。在国际交換的現代发展的状态之下，这一革命的巩固只有在所有的，或者至少是，几个文明的社会之参加下才是可能的。由此就发

生所有国家的生产者的利益的一致，这还是国际工人协会所承認和宣布的。

但是因为工人們的解放应当是工人們自身的事情，因为劳动的利益一般是与剝削者們的利益正相反的，而且因为上等階級将永远妨碍社会关系的上述的改造，——那末它的必然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人階級在各該国内的夺取政权。只有工人階級的这一临时的統治才能把反革命者們的努力陷于瘫痪和結束現存的階級和他們的斗争。

这一政治任务在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綱領中添进了多样性的成分，适应于其中每一国的社会条件。

在那些現代資本主义生产刚刚在力求成为支配的、而且劳苦群众处在正在发展的資本主义和衰頹着的家长經濟的双重压迫之下的国家，实际的任务，因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們的綱領，天然地是应当具有更复杂的性質的。在这样的一些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們不得以求达到这样的、即在諸先进国家已經存在，而且对于工人階級政党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需的一些社会制度形式，作为过渡的阶梯。俄国現在正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資本主义在它里面从废除农奴法的时候起已完成了巨大的成就。自足經濟的旧体系讓位于商品經濟，从而为大工业开放广大的国内市場。农业的家长式的，公社的形式是在迅速地解体，公社变成把农业人口提供国家奴役的手段，而在許多地方它也是富的公社社員剝削貧的社員的手段。在那时，在使絕大多数部分生产者們的利益适合于土地的时候，它是阻碍着他們的智力的和政治的发展，把他們的眼界局限在乡村傳統的界限之內。其胜利首先会有利于农民的俄国革命运动，几乎沒有得到他們的任何支持、同情和理解。专制主义的最主要的支柱正寄托在农民的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和智力的落后上面。

这种情形的必然后果就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无力和怯懦，它们的物质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利益是和现时的政治体系相矛盾的。当它们为人民而大声疾呼的时候，很惊异地看见，人民对它们的号召是冷淡的。由此就发生——我们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的不稳定，而有时是灰心和完全失望²¹¹。

事情的这样的情况会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如果俄国经济关系的上述运动没有为劳动者阶级的保卫者们创造新的成就的机会的话。公社的分化在我国创造着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新阶级。这一阶级是更易感受的、灵活的和更发育的，它比落后的农业人口更容易接受革命者们的号召。而正当公社社员理想是落在后面时，在沙皇专制是其必需的政治补充物的那种家长经济的一些条件下，工业工人的命运只能由于最新的、更自由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而得到改善。以这一阶级为代表，我们的人民第一次陷入一切文明民族所共同的经济条件中，所以以后只有通过这一阶级，它才能参加文明人类的先进意图。根据这一点，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第一和主要的职责就是组织革命的工人党。然而这样的党的生长和发展在现代俄国专制主义的身上遇到厉害的障碍。

所以反对这种障碍的斗争甚至也是未来俄国工人党的雛形的那些工人小组的义务。推翻专制主义应当是他们的第一个政治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工人小组的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进行鼓动和进一步地在他们中间普及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组织。在把它们紧密联系成为一个严整的整体的时候，这些组织不自满于和政府的局部冲突，将在便利的时刻很快就转到对它进行总的、坚决的攻击，而且不会停止在所谓恐怖主义活动之前，假使认为为了斗争的利益这是必需的²¹²。

工人党同专制主义斗争的目的是争取民主的宪法，它保证：

(1)任何公民，未因犯有法律严格确定的某种可耻行为而經法院判处丧失政治权利能力者，都有选举和被选举进立法会议以及省的和公社的自治机关的权利。

(2)給予人民代表們以法律規定的金錢报酬，使得人們能从人口中的貧苦階級中选出他們。

(3)普遍的、非宗教的、免費的、义务的教育，而且国家应当供給兒童們以伙食、衣服和教科書。

(4)公民的人身和住宅的不可侵犯性。

(5)信仰、言論、出版、集会和結社的无限自由。

(6)迁移和职业的自由。

(7)一切公民，不論其宗教和种族的出身，完全平等。

(8)以人民的普遍武装代替常备軍。

(9)修改我国的全部民法刑法，消灭与人的尊严不相容的等級区分和懲罰。

根据这些基本的政治要求，工人的政党提出²¹³一系列的最近的經濟要求，例如：

(1)彻底改变我們的土地关系，亦即改变贖买土地和以之分給农村公社的那些条件。对于凡是認為放弃份地和退出公社等等对自己有便利的那些农民，就賦予他們这样做的权利²¹⁴。

(2)取消現在的稅收制度和建立累进所得稅制。

(3)立法調整工人們（城市的和乡村的）和雇主之間的关系，并組織各級有工人代表参加的检查机关²¹⁵。

(4)对于在农业的、矿业的和加工工业的各种各样的部門（为农民們、矿工們、工厂工人們、手工业者們等等）所組織的生产組合应当由国家予以帮助²¹⁶。

这些要求对于农民的利益和对于产业工人們的利益都是这样有利的；当它們見諸实现时，工人的政党就会为自己和农业人口接近开辟着广闊的道路。作为公社的贫穷了的农民而被拋出农村的无产者将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鼓动者而回到农村中去。他扮演这一角色的出现，将改变现在看来是无希望的公社的命运。公社的分化只是在这一分化本身还没有創造出新的人民的力量能結束資本主义的統治的时候才是不可避免的。

注：如从上面所說可看到的，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們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特別是在社会政治斗争的现在的条件之下，应当是首先放在如象产业工人們的那一更有教养的劳动人口的阶层上面。在从这一阶层方面取得有力的支持以后，社会民主主义者們可以对于也在农民上面传播自己的影响有大得多的希望，特別在当他們获得鼓动和宣传的自由的时候。不过，不言自明的是，甚至在现在的时候，和农民有直接接触的人們，会以自己在他們中間的活动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予以重要的效勞。社会民主主义者們不仅不把这样的人們推得离开自己，而且将尽一切的力量，使得和他們在和自己的基本原则和活动的方法方面能取得一致²¹⁷。

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或 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烦恼²¹⁸

(对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的回答)

作者的话

提出的这本小册子比应该出版的时间要迟些。生病妨碍了我及时地完成它。然而我还是出版它，因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错误直到现在对于许多读者还继续是当前的重要问题。

波吉，1889年3月3日。

假使吉荷米洛夫先生有象赫罗斯特拉特那样的特点，不择手段地追求光荣，那末他，当然，也许会感谢他脑子里想着要写《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小册子的那一日子和时辰。这本小册子引起了对他的普遍注意。他以前的不小的名望也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增高了。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不在以疯狂的希腊人²¹⁹的光荣为满足的人之列。他力求教人，而不使人惊异，或者，假使您愿意的话，他需要以自己历史的教益性和自己的政治倾向的非常成熟性，以那些完全形成的关于社会秩序和坚强的国家权力的观念（这些都是“好久以前”就使他在革命环境中“特出”的）^①来使读者惊异。当

然，連他也不反对为自己过去的革命錯誤而抨击自己。象这样的反对是把革命者引上真理道路的“完全形成的”礼仪所不容許的。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极灵活地完成不可避免的自我抨击的仪式。在装出要打自己的样子的时候，他是在巧妙地鞭打自己过去的同志们，即打击一般的革命者们，打击那一可以暂时“束縛和限制”甚至他这样一个卓越的人的革命的“小组习气”。体面是完全被保持着，而同时自我抨击不仅沒有給我們的忏悔的作者以任何疼痛，而且还是他的一个愉快的練習，讓他能在公众之前炫耀自己。諸原則的别的庸俗的动摇者以完全沒有受好教育的人的粗暴的天真忏悔着。“我，在自己狂怒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称呼皇帝陛下的神圣个人为蠢才”，——例如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的一个被告这样說。这不是十分雅致的，也是十分不謹慎的。他的陛下听完象这样的自白难道愉快嗎？但是須知整个的問題就在于引他发慈悲。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动作却与此不同。他一生不是徒劳地写作很多的；他能擅长于語言。他如此不自然地写自己的忏悔的圣歌，这同时又是吉荷米洛夫先生制止住革命的多头蛇时候的胜利的歌……和歌頌俄国专制的贊歌……而且也是，凑巧，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自我的贊歌。被感动的和願意迁就的帝王只有把自己的浪子抱在自己的至尊的怀抱里，把他的从前有一时候可爱的激烈头脑挤压在自己的肥胸前面而且吩咐以他作为在胜利的节日献祭的肥犢。“我們的兄弟，一个俄国人是騙子！”——別林斯基有一次感叹地說²²⁰。他应当接着說，“我們的兄弟，一个作家是騙子！”

在严肃地說的时候，我們不知道，准备为了順便激发吉荷米洛夫先生心中忠实感情而屠宰的牡犢是肥到什么程度。但是已經在

① 《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第11頁。

作过节的某些准备——这是使得善良的、从来不反叛俄国帝王的兒子們迷醉的妒忌心所表明的。这种感情已在《俄国通报》²²¹的篇頁中获得了表现，它固执地不愿和吉荷米洛夫先生妥协，而且愤怒地对着“彼得堡的办公厅”狂言，因为他们对过去的恐怖主义者的态度是太迁就了。这是說，連恭維卡特柯夫也沒有用的！应当以为，监护的領導很快就劝导該杂志的編輯部，对它提醒了关于浪子的隱喻的道德。然而《俄国通报》的狂妄行为还是使得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和“坚强的权力”調和的愉快时刻感觉扫兴。

假使不是《俄国通报》，那末吉荷米洛夫先生也許会認自己是凡人中的一个最幸运的。他对于自己的蜕变也許会异常的滿意。他“請动搖的和不坚决的人們”要很大的注意这一蜕变，而且，在預先确信会得到他們狂喜的称許的时候，他贈給他們一系列的含有极为独到和有道理的思想的忠告。他对他們說，应当学习，思想，不要为空話所吸引，諸如此类。我們試設想，我們是在“动搖的和不坚决的人們”之列，而且“注意”到我們的作者所感受的蜕变。这一蜕变的历史是在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中叙述的。

二

吉荷米洛夫先生說，“在我們这里，而且也不仅在我們这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好象我們是生活在某一种‘破坏的时期’，它，如大家信仰的，将以可怕的流血成河的和有劈裂炸弹声等等的变革来完結。以后——应当是——开始一个‘建設的时期’。这一社会的概念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如已經指出过的，简单地是居維叶的，和突然的地質的灾变論这一学派的一些旧观念的政治反映²²²。实际上，在实际生活中破坏和建設是并肩前进的，而且一个若沒有另一个甚至是不可思議的。一个現象的破坏，其实，是由于

在它里面，在它的位置上，在創造着某一种別的东西，而相反的，新現象的形成，不是別的，只是旧現象的破坏”①。

从这些話里面含着的概念显不出很大的明了性，但是無論如何它們的意思可以約为两个論点：

(1)“在我国，而且不仅在我国”，革命家們一点也不理解进化，不了解“諸現象类型的改变”的逐漸性，如象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另一处所責罵的。

(2)假使他們理解进化，理解“諸現象类型的改变”的逐漸性，那末他們不会設想，“好象我們生活在不知是什么一种的破坏时期”。

讓我們从开头就看看，关于这点不在我国，即是說，在西方的情形是怎样。

如大家知道的，現在的时候在那里有力爭自己的經濟解放的工人階級的革命运动。現在試問：这一运动的理論代表者們，即是社会主义者們达成了使自己的革命意图和不論哪一种的滿意的社会发展理論相符合嗎？

对这一問題，任何一个不論关于現代社会主义有哪一种概念的人，都将不躊躇地作肯定的回答。在欧洲和美国所有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們坚持馬克思的学說，而誰不知道，这一学說首先是关于人类各种社会的发展的学說呢？馬克思是“革命活动”的热烈拥护者。他深刻地同情志在反对現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任何一个革命运动。假如願意的話，可能不同意这样的一些“破坏的”同情；但是从它們的存在，不能得出說馬克思的想法是“固定在一些暴力的激变”上的那种結論，說他忘記了社会进化，忘記了緩慢的，逐漸的发

① 《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第13頁。

展。馬克思不仅沒有忘記了进化，而且，相反地，却发现了它的許多最重要的規律。在他的头脑中人类的历史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匀整的非幻想的图景。他第一个表明了，經濟的进化会导致政治的革命。由于他，現代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清楚地定下来的目标和严格制定的理論基础。但是假使这是如此，那末为什么吉荷米洛夫先生設想靠了几句关于社会“創造”的不相联系的空話，他能表明“在我国，而且也不仅在我国”革命的努力是站不住脚的呢？难道不是因为，他沒有費过力去了解現代社会主义者們的学說嗎？

吉荷米洛夫先生現在感觉得厌恶一些“突然的灾变”和“暴力的激变”。最后說来，这是他的事情：在这一事例中他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人。但是他如果想着“突然的灾变”不論在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中都不可能，他这样想就是徒劳了。第一，类似的一些灾变的“突然性”是一个相对的表象。对于一个是突然的对于另一个可能完全不突然；日食在无知的人看来是突然的，对于天文学家却不是突然。革命也是这样，这些政治的“灾变”在无知的人和大多数自滿的庸俗人看来是“突然地”发生的，但是对于明了了解他周围的社会現象的人就常常不算是突然的。第二，假如吉荷米洛夫先生嘗試着从他現在学会的理論的观点来看自然界和历史，那末就会有一整系列的最可惊的出乎意外的事在等待着他。他牢固地記住了，自然界是不作一些跳跃的，而且，在抛弃革命的空想世界和下降到现实的园地上时，可以“从科学的意义”上只說“某一現象类型的改变”的緩慢性，然而自然界，不听反对“突然性”的任何痛罵，是在跳跃的。吉荷米洛夫先生清楚地知道，“居維叶的一些旧观念”是錯誤的，而且“突然的地质上一些灾变”不是別的，只是学究的捏造。他漠不关心地生活，讓我們假定，在法国的南部，沒有預見着任何忧虑，任何危險。而突然发生了地震，和两

年以前在那里发生的差不多。土地在震动了，一些房子破坏了，恐怖得不得了的居民们在跑，一句话，发生了真正的灾变，意味着在母亲——自然界里面是不可信的轻率！受到了辛苦经验的教育，吉荷米洛夫先生注意地检查他自己的一些地质学的概念，于是得出一种结论，就是缓慢的“现象诸类型的变化”（在当前的情况中是地球状态的变化）并不排斥“各种激变”，它们从一定的观点说，大概也能出现为“突然的”或者“暴力的”^①。

吉荷米洛夫先生在烧还不失其为水的开水，它在它没有从零度热到八十度的时候，不为任何的一些“突然性”所吸引。但是它热到致命的界限和忽然——啊，可怕！——“发生突然的灾变”：水变成了蒸汽，仿佛对它的想象是“被固在一些暴力激变之上的”。

吉荷米洛夫先生让水冷却，而这里又是重复着同一奇怪的故事。水的温度在逐渐改变，而且水仍不失其为水。但是水的变凉达到了零度，于是水变成冰，完全想不到“突然的激变”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吉荷米洛夫先生观察经历着变态的一种昆虫。慢慢地蛹的发展完成了，暂时它还是一个蛹。我们的思想家由于满意而搓着手。他心里在想，“这里一切都进行得不错。不论社会的，或者动物的机体都没有经历过如象我在无机界所观察到的那样的突然的激变。在提高到创造活物体的时候，自然界变稳重了。”但是很快地他

^① 从科学还没有驳斥了居维叶的地质学说，还不能得出结论，说它（科学。——译者）一般地表明了地质上的一些“灾变”或者“激变”的不可能性。它不能表明这点，并不和已为众所周知的这样的现象，如象火山爆发、地震等等相矛盾。科学的任务在于说明这些现象是自然界的那些自然力累积的活动的产物，这些力量的缓慢的影响是我们小规模的说来也能在任何一个时候观察到的。换一句话说，地质学应当说明地球表皮借助于这一表皮的进化所感受到的一些革命。社会科学也不得不重视这样的任务，而且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也和地质学一样成功地解决了它。

的快乐就讓位給忧愁。有一天蛹完成了一次“暴力的激变”在世界上变成了蛾。这样，吉荷米洛夫先生不得不相信，有机的自然界也保不住沒有“突然性”。

同样地假使吉荷米洛夫先生不論哪个时候認真地“注意到”自己的“进化”，那末他，大概，也在它里面找得到类似的轉变或“激变”之点。他将記忆起，正是哪一滴超越了使他快乐洋溢的那些印象之杯，把他从“革命”的或多或少的动搖的辯护人变成或多或少的誠实的敌对者。

我們同吉荷米洛夫先生在一齐試作算术的加法。我們試取数字五，如象可信賴的人一样，对它一个一个数地逐漸地加：六、七、八……。到九的时候一切都是順利的。但是只要我們决定把最后一个数上面再加一位，對我們就发生了不幸：我們的单个

突然地，沒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

变成了十。我們在由九十轉到百的时候也将經歷这同样的煩惱。

我們完全不准备和吉荷米洛夫先生研究音乐：在那里有許多各种各样的“突然的”变化，而这一情况可能导致我們的一切“概念”的瓦解。

对于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暴力的激变”的一些糊塗議論，現代的革命者們可以用句簡單的問話来得意地予以反駁：請吩咐怎样对待已經在“真正生活”中有过的那些变革，而且無論如何它們也是“破坏的时期”呢，是对我們宣布它們的 *nuls et non avenues*①，还是認為这是空虛的和要爭吵的人們的事情，对于他們的行為，严肃的“社会学家”不值得加以注意呢？但是要知道不管怎样看这些現象，应当承認的是，在历史中是发生过暴力的激变和政治的“灾

① [不实际的和沒有发生过的]。

变”的。为什么言荷米洛夫先生以为，推想在将来有象这样的现象的可能就是有“错误的社会概念”呢？

历史是不做跳跃的！这是完全对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同样对的也是，历史作过许多“跳跃”，完成了极多的暴力的“激变”。这样的激变的例子是不计其数的。这个矛盾有什么意义呢？它只是意味着，这些命题中的第一个表述得不完全精确，因此为许多人理解得不正确。应当说，历史不作没有准备的跳跃。没有一个跳跃如果在社会发展的以前过程中不含有充足的原因就能发生。但是因为这一发展在向前进步的一些社会中是永久不会停止的，那末可以说，历史是在不断地准备跳跃和革命。它辛勤地和始终不渝地在做这一事情，它工作得慢，但是它工作的结果（跳跃和政治的灾变）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

法国的有产阶级的“类型的改变”也是在缓慢地进行。摄政时代²²³的城市人和路易十一时候的城市人不相像，但是整个说来它还是忠于旧制度的有产者的类型。它变得有钱些了，有教养些了，要求高些了，但是仍不失其为始终和到处需要对贵族让路的roturier^①。但是1789年到来了，有产者骄傲地抬起头来：再过几年，他就成为形势的主人，须知是怎样成为的！——“由于血流成河”，由于鼓声如雷，由于“火药的爆炸”，假使不是由于炸弹的爆炸，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它迫使法国经历真正的“破坏时期”，一点也不关心，将来会找得到，可能是，一个学究，会宣布暴力的激变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俄国的一些社会关系的“类型”也在缓慢地变。封建诸侯是在消灭，大臣们完全服从沙皇的政权，和变成官吏阶层的普通成员。

①（革命前的无特权的庶民）。

莫斯科在征服韃靼王国，在获得西伯利亚，在并吞一半的南俄，但仍旧是旧的亚細亚的莫斯科。彼得出现了，在俄国的国家生活中完成了“暴力的激变”。俄国历史中新的欧洲时期开始了。斯拉夫主义者責罵彼得一世是反基督的，正由于他所干的激变的“突然性”。他們硬說，他在自己的改革家的狂热中忘記了进化，忘記了社会制度的“类型的变迁”的緩慢性。但是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容易考虑到，彼得一世的革命正为俄国所经历的历史的“进化”所必需，是它所准备的。

逐渐积累的数量的变化，最后，轉变为質量的变化。这些轉变是以跳跃来完成的，而且不能以别一方式完成。形形色色的政治渐进改革主义者，如莫尔恰林之流的人，在把穩健和准确提高成为教条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个早已为德国的哲学所极好地闡明了的情况。在这一場合中如在許多其他的場合中一样，回忆一下黑格尔的見解是有益的，当然人們难以責备他对“革命的活动”有偏好。他說：“当人們想理解不論哪一种东西的发生和消灭的时候，普通都是設想，通过对于这样的发生或消灭的逐渐性的表象，是会对自己弄清楚事情的。然而存在的变化不仅通过由一个量轉变到另一个量，而且也通过一些質变为量，以及相反的，通过使渐进中断，拿另外一个，和第一个現象完全不同的現象来代替它的那种轉变来进行。渐进性学說的基础是，发生的是在实际中已經存在的，只是因为自己小而沒有被觉察到。同样地，在說到逐渐的消灭时，是在設想着，仿佛某一現象不存在，或者那一应当代替它的新現象，是已經存在的，虽然現在还没有被觉察到……。但是这样就是消除了关于发生和消灭的任何理解。……以变迁的渐进性來說明发生或消灭，是等于把一切事情归结为枯燥的同义反复，而且是为自己設想，发生的或消灭的都是現成的形态，即是說，已經发生的或者已經

消灭的。”^①这是說，假使您需要說明国家的发生，那末您須单纯地設想一个微細的国家組織，它在逐漸改变其規模时，最后，使得“居民們”感觉到其自身之存在。同样地，假使您需要說明原始的氏族諸关系，那末您試費力地設想这些关系之小小的不存在，事情就順利完成了。不言自明的是，象这样的思想方法在科学中是走不多远的。黑格尔的最伟大的功績之一就在于他把关于发展的学說中象这样的一些胡說都肃清了。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怎么說得上黑格尔和說得上他的学說呢！他一劳永逸地記牢，西方的各种理論对我们是不适用的。

违反我們的作者关于暴力的一些激变和一些政治灾变的意見，我們有把握地說，在現在的时候历史在先进的諸国家是在准备异常重要的激变，关于它，有一切理由認為，它是暴力地完成的。它将是改变产品的分配方式。經濟的进化創設了巨大的生产力，它們在应用起来时，要求一定的生产組織。它們只能在以集体的劳动，以社会的生产为基础的巨大的大工业企业中才能应用。

但是和这种生产的社会方式尖銳矛盾的是产品的个人占有，这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中，在小工业和小农业耕作的經濟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工人們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这样就成了企业家們的私有物。在现代社会中所看到的一切其他的社会和政治的矛盾就是由这一根本的經濟矛盾决定的。而这一根本的矛盾是变得越来越强烈了。企业家們不能放弃生产的社会組織，因为这是他們的财富来源之所在。相反地，竞争迫使他們把这一組織推广到一切从前在里面沒有发生过的其他工业部門。大的工业企业主消灭小的生产者們，这样就增加工人階級的人数，因此也增加它的力量。

^① 《Wissenschaft der Logik》224, erster Band, S.S. 313—314. 我們引証的是1812年紐倫堡版。

决定性的結尾快接近了。为了消除对他们为有害的在一方面是产品生产的方式和另一方面是它們的分配方式之間的矛盾，工人們应当掌握政治权力，而它現在是掌握在有产阶級手中的。假使喜欢的話，您也可以說，工人們必須完成“政治的灾变”。經濟的进化注定地导向政治的革命，而这一后者又将为社会的經濟制度变更的源泉。产品生产的方式緩慢地和逐漸地采取社会的性質。与之相应的占有它們的方式将是暴力革命的結果。

这就是不在我国，而是在西方发生的情形，而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西方的社会生活是沒有任何“概念”的，虽然他曾經从事过对“伟大的法国文化的观察”。

暴力革命，“流血成河”，斧头和断头台，火藥和炸弹——所有这一切都是极为可悲的“現象”。但是假如它們是不可避免的，那末您将吩咐怎样做呢？在新社会誕生的时候，暴力永久扮演着产婆的角色。这是馬克思說过的，而且象这样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历史家施洛塞尔曾深信，只有“火和劍”能完成人类命运中的伟大的激变^①。这一可悲的必然性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誰的过失呢？

或者真理的力量

不是地球上所有的人能認識到的嗎？²²⁵

不会，目前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識。而所以是这样，是由于社会中一些階級利益的差別。在一个階級看来，以已知的方式改造

^① 对于历史的充分的知識，看来，甚至使施洛塞尔倾向于接受居維叶的一些旧的地質学見解。这是他直到現在都引起市儈們的伤感的关于屠尔哥的改革的草案所說的話：“这些草案里面包括有法国后来通过革命所获得的一切重要利益。只有靠革命才能达到它們，因为屠尔哥的内閣的一些期待暴露出了性子太急的——哲学的精神：它希望，违反經驗和历史，单靠自己的一些指示就能更換在時間过程中形成和被一些牢固联系联結起来的社会制度。彻底的改造，不論是在自然界以及在历史中，在以火，宝劍和破坏推翻了一切之前是不可能的。”（《十八世紀史》，俄文譯本，第二版，圣彼得堡1868，第3卷，第361頁。）吉荷米洛夫先生會說：这一博学的德國人是一个可驚的空想家。

一些社会关系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重大的必需。在另一个阶级看来，抵抗这样的改造是有益的或者甚至是重大的必需。对于一个阶级所许诺的是幸福和自由，另一个阶级就感到这是威胁着要废除它的特权地位，是完全取消有特权的阶级地位的威胁。而哪一个阶级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哪一个阶级没有自卫的感觉呢？这一社会制度对于一个阶级有益，在它看来不仅是正当的，而且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按照它的意见，企图改变这一制度——这就是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它认为自己负有保护这些基础的使命，哪怕使用武器。由此就有“血流成河”；由此就有斗争和暴力。

不过，社会主义者们，在思索到行将到来的革命时，可以用如下的思想安慰自己，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破坏的”学说传播得愈广，工人阶级愈成熟，愈有组织 and 纪律，必然的“灾变”所要求的牺牲将愈少些。

同时无产阶级的胜利，在终结人对人的任何一种剥削的时候，因此，就是终结把社会分为剥削者阶级和被剥削者阶级的区分的时候，将使国内战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甚至简直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人类将靠一个“真理的力量”来运动，而且将不会有借助于武器来进行辩论的必要。

三

讓我們再来談俄国。

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们信奉着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革命者们中间一直到最近是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们占优势。西方社会主义者，即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的区别在于，前者面对着工人阶级和只依靠工人阶级，后者——很早已經只面对着“知识分子”，即是说面对自己，和只依靠知识分子，即是

說，只依靠自己。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感到的沒有比陷于孤立的，因此是虛伪的地位为更可怕，在这种地位中他的声音不再达到无产阶级的群众，竟成为在沙漠中呼号的声音。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在人民中既沒有任何的支持，甚至也不疑心到自己的地位的錯誤性；他自願地退到沙漠，只关心他的声音飞到自己的耳朵里和安慰他自己的心。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是强大的、永恒地灵活的、不停歇的力量，单只它这一个力量也能领导着社会走上进步的路。在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看来，人民是蠢笨的、有无限潜伏力量的勇士，只能在自己的馳名的“諸秩序中”繼續着几百年不动。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沒有看出我們的伊里伊·穆罗蔑茨^①的不动性是他的缺点，却認為这是大功劳。他不仅不为它而悲叹，而且請求历史給一个恩惠：不要把俄国勇士推得离开他已十分牢固地坐在上面的那些秩序一直到那一快乐的时候，那时候，他，善良的社会主义者——民粹派分子能控制好資本主义、沙皇制度和其余的有害“諸影响”以后，滿足的和呈現喜色的，出現在伊里伊·穆罗蔑茨之前和恭敬地报告說：Monsieur est servi! 吃的东西已端上了！勇士为了刺激胃口只有一口气飲乾一桶綠酒的三分之一和安靜地坐着等待为他准备的社会的飲食……。社会民主主义者注意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規律和进程。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关于人民的发展甘願梦想許多，这是某一时候在那一世界，“在革命后的那一天”所开始的，不願意知道那每一天和每一小时发生在現代俄国的不是杜撰的經濟进化。社会民主主义者順着历史的潮流游泳。相反地，历史的潮流把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帶得愈来愈远地离开他的“諸理想”。社会民主主义者依靠着进化；

① 神話中大勇士的名字。——譯者

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用尽一切可能的詭辯来不承認它。

还不止此。两百年以前公社比起现在来，真是永远地巩固的，所以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是非常想偷偷把历史的时鐘拨轉退回一百年或二十年去^①。

由此可見，在应用到俄国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們身上的时候，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評語是真实的；他們真的不能把进化和革命这两个概念相調和。

只是我們的作者沒有認為有必要补充，說它（評語。——譯者）是我們的革命党內这一方向之最主要的、最有成果的文字的表現。他在自己的一些論文中长久地和頑強地反对在俄国革命者們的一些要求和俄国社会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之間确立合理联系的任何嘗試。一方面是农村公社，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这些始終是限界的概念，越过它們而前进是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革命主义”所办不到的。

但是不言自明的是，某一国家的革命家們是不能不受懲罰地忽視它的进化的。痛苦的經驗很快就对俄国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表明了这点。他們不是永久只号召自己，不是永久把自己的指望只寄托在“知識分子”身上。有过一个时候，他們企图了发动“人民”，他們所謂的人民当然是指农民，这一公社諸理想的担当者和公社团結的代表人。但是，正如所应当期待的，农民对他們的号召是充耳不聞的，由此他們不得不用自己的力量来嘗試革命。但是他們用这些力量能做些什么呢？他們永不会有絲毫可能进入对政

^① 我們所說的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們是指所有那些認為公社应当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經濟基础的人們。在这一意义上，也应当承認“民意分子”是民粹分子。而他們自己也是这样地承認。在“执行委員會的綱領”中他們也坦白稱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226

府的公开斗争。七十年代的后半时期的政治示威极有说服力地使“知识分子”感觉他们的力量甚至在战胜扫院子的人和城市人方面也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和在俄国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们的上述见解之下，他们除了我国的所谓恐怖，或者如吉荷米洛夫先生所咒诅的个体的反叛以外，没有别的道路。但是“个体的反叛”不能推翻任何一个政府。我们的作者毒辣地指出，“政治的暗杀的辩护人人们，我以为，很罕有地觉悟到，俄国恐怖主义的真正力量是在于革命的软弱无力”。而这是完全对的。只是他设想，应当要有他的“创造的”智慧才能发现如此简单的一个真理，这就是无理由的。我们的革命者们中间想维持“土地与自由”的政纲的人在里柴蒲和渥隆涅日大会的时期已指出了它来。他们说，在沒有人民群众（哪怕是一部分）支持的时候，任何一种革命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说是完全对的²²⁷。但是，在坚持旧的，民粹派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关于哪一方式的活动能保证我们的革命党对群众影响能有成果，而因此预防它免于在恐怖主义斗争时所必不可免的软弱无力，这是他们甚至连最模糊的表象也是沒有的。同时恐怖主义的斗争比起所有的旧纲领来有一个优点：事实上它无论如何是争政治自由的斗争，而这是旧派的革命家们连听也不愿意听的。

既然走上政治斗争的园地，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们就面对面地碰着进化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者，政治自由的争取不可能是他的革命活动的最后一步。为现代议会主义保证给公民们的一些权利在他的眼中不过是在达到他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经济诸关系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在争取政治的诸权利和改造所說的诸关系之间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时期。现在试问：俄国社会生活在这一中间站的时期中难道不会变化，而假使是会，那

末将发生哪一种意义的变化呢？宪法的制度会不会导向旧的，为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們所珍視的农民生活的基础的破坏呢？为了满意地回答这一問題，必須把民粹主义的最主要的諸論点拿来批評一下。

不难指出在我們的革命文献中想弄明白俄国革命与俄国进化之間的关系的必需性的觉悟，終于是越来越增长了。如人們所已經告訴过我的，吉荷米洛夫先生是我們的旧信仰的革命者中的最頑强的一个，他最热心地保卫着为他所消化了的民粹主义教条以抵制任何新思想的侵犯。甚至吉荷米洛夫先生也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这一过渡时代的影响。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一个革命者》在里面含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极不含糊的指示。在叙述他所經歷的变迁的历史时，吉荷米洛夫先生提到一篇他为《民意导报》第5期所写，不过沒有为该出版物的同事們所贊同，因此沒有刊登的論文。据他的話，他在这篇文章中發揮了如下的論点，就是“只有人民生活中一定的进化才能为革命活动創造园地”……“我的革命主义，——他說，——正是找寻了这一进化，找寻了这一类型的变迁的历史过程，以便按照着它而活动”^①。

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革命主义找到了什么呢？

“我要求党和国家的統一”，我們的作者武断地說。“我要求消灭恐怖和建立伟大的民族的党……但是那时候陰謀、起义、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显而易見的，我所忙碌着要建立的这样的党也将能制定出一套办法实现一些完全可能的和明显地有成果的改善，因此会找得出力量和能力也对政府来表明这一点，而它所要求的也只是由自己来領導这一改革”^②。

① 他的小册子的第13—14頁。

② 同上，第12—13頁。

显而易见的是，在“寻找”进化时，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革命主义”，在“忙碌”时无意中說出了在他的現在的一些看法中找不出任何痕迹的革命。这是可悲的，但是在这里就有了自己的必然的邏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願放弃把俄国乡村中陈腐的經濟关系理想化的人，天然地是以上述关系的这一自然果实的沙皇制度的理想化来完結的。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現在的一些看法不过是他始終認為从不可爭的社会主义者——民粹分子們的諸理論論点中得出的邏輯，哪怕是极不好看的結論。

但是，从另一方面說，无疑地也是，这一結論和不論哪一种的进化絕沒有任何共同之点。

吉荷米洛夫先生想要寻找的进化，是在从沒有发生过，所以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找的。

“党和国家的統一”是什么意思呢？在任何一个脱离了幼年年龄的国家，存在着各种阶级或各种等級，它們的利益一部分是不同的，而一部分也是完全对立的。沒有哪一个党能使这些利益調和；所以沒有哪一个党能和整个的国家統一起来。任何一个党只能是一个确定阶级的或者确定等級的利益的表达者。当然这不是說，任何一个党在政治中注定了只代表这一个或那一个阶级的自私的利益。在每一个历史的时代有一个其胜利和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利益相联系起来的阶级。只能在帮助这一阶级使其胜利的时候才算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因此，“党与国家的統一”只能有一个合理的意思：党与在这一时候成为进步的担当者的阶级統一起来。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話完全沒有这样的意思。他始終是，而現在更加是否認我們祖国不論甚么阶级的存在的。

各种阶级利益的差別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历史的进化所造成的。理解阶级利益的差別——这是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而相反

地，不理解它就是关于历史发展沒有一点的理解，就是留在那种理論的昏暗中，在它里面一切猫都是灰色的和象两滴水一样的彼此相象。而假使处在类似的昏暗中作家仍旧向你們談进化論，那末你們可以相信，他是把进化看成与它完全相对立的一种东西。

但是，甚至把一切这些考虑丢在一边，我們不能不对吉荷米洛夫先生提出如下的一个有意思的問題。为什么他以为，党能够与国家“联合起来了”，政府“所要求的也只是由自己来领导这一改良呢”？我們的作者大約記得，大概在約一百年以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形：一个国家的第三等級的代表們表达了它的人口的大多数的利益；他們“制定出一套办法，实现一些完全可能的和明显有成果的改善”。但是这一国家的政府不願意“领导这一改良”而是开始“忙碌”，如何借助于外国軍隊来镇压它（国家。——譯者）。这当然不妨碍改良实現在生活中，但是政府的一些“忙碌”是以对它最可悲的結果来完結。不过，看来，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这样独特的国家如象俄国的政府，在类似的情况中会走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所以别一些国家的榜样对我們不是命令。

我們的作者寻求了党和国家联合起来的道路，而且由于錯誤走上了引他和专制制度联合的道路。但是在俄国的发展和专制政体的諸利益之間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我們在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的第 25 頁上讀道：“我是这样的看专制政权的問題。首先它是俄国（如它現在这样）的現象，討論它是完全沒有益处的。这是俄国历史的結果，它不需要誰的承認，而且当国内存在着成千成万的不知道政治而且不願意知道其他东西的人民的时候，誰也是不能推翻它的。”

吉荷米洛夫先生力求理解俄国“进化”的意义。为了有成效地解决这一任务，他需要使自己明了的不仅是，現在的俄国的样子，

而且主要的，它将变成什么样子，它的社会諸关系是在怎样的意义中“改变类型”。誰不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他只有說停滯而不是說发展的权利。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正是对这方面沒有予以注意。所以同他发生了和一切有守旧方向的人所发生的一样的事情。他們想象，他們所看到的是“現在的样子”的“国家”，而实际上他們的智力的眼光是集中在某一时候曾經是过的那一“国家”，而它現在的时候在很大的一部分已經不是那样的了。他們的保守的“梦”是建立在对于旧的、已經过时的經濟和政治諸关系之理想化上面。

同吉荷米洛夫先生談談俄国的經濟諸关系罢。他对您說：“公社是俄国历史的結果，这样的結果是不需要誰的承認的，当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知道經濟而且也不願意知道任何別的东西的时候。”但是在这一小小的“时候”的詞中包含有問題的全部實質。善于夸张的解說进化的人，不应当限于引証現在的时候。假使他願意使我們相信，公社有巩固的未来，他应当表明，上述的“当……时候”从沒有（或者，至少可以說，长时間地将沒有）在里面含着自已解体的成分。同样地，假使他願意使我們相信未来俄国专制制度的巩固性，他应当表明，在我們的社会諸关系中，沒有这样的一些，在其影响下“成千成万的人們”，或者，很快关于专制制度連听也不願意听的因素。“当……时候”——这是一极不确定的說法，这是一个“X”，它可能等于一百万，也可能距离零不远。确定“伊克斯”的特性是我們的“进化主义者”的任务。但是象这样的任务是他所不胜任的。由于为“特殊性”装得滿滿的，他和从西方到我們这里来的科学始終处在这样紧张的关系中，因之他絕沒有力量来严肃地解决不論哪些問題。

在确定俄国人民的政治見解的时候，吉荷米洛夫先生說到俄

国的现实是什么样子，或者，說得更好些，在他看来它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眼光是无轉圜地集中在过去，当他过渡到如下的問題，就是专制政体的存在是否妨碍俄国文化的諸成就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沒有成見的或者沒有陷于詭辯的人，这一問題只能这样表述：現代的专制主义，“如象它現在的样子”，是妨碍还是促进俄国进一步的发展呢？吉荷米洛夫先生宁願把問題作另一个提出。他指着专制主义，据他的意見，在某一时候曾經是过的样子。“可不可以忘記自己国家的过去到这样的田地，以致叹息道：‘在沙皇下是怎样的文化工作！’（使吉荷米洛夫先生难过的是，有許多俄国人是这样地感叹）不过难道彼得一世不是沙皇嗎？而在全世界的历史中难道有更迅速和更广闊的文化工作的时代嗎？——我們的作者着急地說。——难道沒有叶卡特林娜女皇嗎？难道不是在尼古拉的統治下发展了直到現在俄国社会还賴以活着的那些社会思想嗎？最后，在二十六年的时间中象亚力山大二世做过那么多改善的共和国是很多嗎？对于所有这些事实我們只有这样一些可怜的空話，有如，这是‘违反专制政体的意思’做成的。但是即使是这样罢；不管是‘由于’或者‘违反’，只要是进步，而且还是很迅速的，这样的可能，难道对于您不都是一样嗎？”①

但是，請允許問問您，啊，最聰明的进化論的拥护者，难道您不理解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是現在可能不象过去，而且彼得一世的，叶卡特林娜的，或者甚至亚力山大二世的榜样，完全不是对亚力山大三世或者尼古拉二世的命令嗎？彼得一世竭力使俄国成为一个开明的国家；亚力山大三世想使它回到野蛮的状态。俄国可以为彼得一世建立二十个新銅象而同时也发现，对亚力山大三世只应

① 他的小册子，第25頁。

处以絞刑。为什么当我们談論的只是肥胖的亞力山大时，却轉到彼得大帝那里呢？

此外，怎样理解对尼古拉統治时代的引証呢？“在尼古拉时期发展了直到現在俄国社会还賴以活着的許多思想”。这是实在的，但是請不要动气，吉荷米洛夫先生，請允許我問您，尼古拉的角色，这一“一切反动势力的近卫軍首腦”，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試設想一下，在猫鼠之間发生了战争。老鼠們发现猫兒們严重地損害它們的幸福生活，于是竭力想結束猫的問題。突然出現了萊因涅克一里斯，在狡猾地搖晃着自己的多毛的尾巴时，以这样的演說来对老鼠們說：“缺乏理性的和忘恩的老鼠們，我絕對地不理解，难道可以忘記自己的历史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会喊叫：‘在猫下面有什么幸福嗎？’但是难道瓦斯加不是雄猫嗎？难道瑪斯卡不是雌猫嗎？但是难道不是在瓦斯加下面你們的数目繁殖到你們住的房子的主人会留心着要买捕鼠器的地步嗎？不錯，瓦斯加竭力地毀灭了你們，但是你們总算繁殖了，你們是由于瓦斯加或者是违反他而繁殖了，难道对你們不是一样的！”老鼠們应当怎样回答这一逢迎者呢？

“文学的最伟大的进步和专制的帝制是相容的”，吉荷米洛夫先生告訴我們（第26頁）。但是这，实在說，是已經太过于不……講礼貌了！或者他以为他的讀者們不知道俄国文学的多难的历史嗎？但是誰不記得体会到开明的叶卡特林娜的毒手的諾維可夫和拉吉舍夫；为“幸福的”亞力山大所放逐的普希金；被“永远不忘的”尼古拉杀害的波列莎也夫；因为写了里面沒有含着对于“基础”的一点点危险的詩而被放逐的萊蒙托夫；穿着士兵的大衣受苦不堪的舍夫琴柯；沒有任何一点过失最初被判处了死刑，后来受到了“特赦”，被流放服苦役，关在“死屋”^①內，在那里有两次受到肉刑的

陀思妥也夫斯基；只是由于死才逃脫了和宪兵們相識的別林斯基？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他的讀者們忘記了对夏波夫，对死在西伯利亚的米哈依洛夫，对留在那里有二十年的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放逐；忘記了把自己一生的最好年代消磨在要塞中的皮薩列夫；忘記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現代俄国作家中很罕見地可以遇到不受到警察的管制或者沒有住在程度不同的辽远的远方的独立的人；最后，忘記了俄国檢察官的一切狂暴（而关于他們的一切故事，凡是不知道我国“专制的帝制”的人們是不肯相信的）？对于各种生动的思想的无情的迫害，构成通过我們俄国帝国的全部历史的一道紅綫，我們的文学以空前昂貴的代价偿付了自己的“違反”帝制的发展。这是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知道的，因之我們忠告吉荷米洛夫先生可以宣传他喜欢的不論什么东西，可以写关于“胜利的鼓声，响罢；高兴罢，快乐的俄罗斯人”的得意頌歌，但是不要攪扰俄国文学。我們只須回忆到它，就会对我們的君主們感到最激烈的仇恨！

有过一个时候，格列奇在反对居斯丁談尼古拉时代的俄国的一本書时，曾断定，在彼得堡可以象在巴黎或在倫敦一样的自由地写作²²⁸。吉荷米洛夫先生关于在专制政权的保护之下俄国文学的繁荣，也不过是格列奇的勇敢的思想之进一步的发展。在小册子《我为什么不再是革命者》出版以后許多人想着，吉荷米洛夫先生把自己装成一个新的有比已故的《莫斯科新聞》的主笔更带“創造性”的优厚秉賦的卡特柯夫²²⁹。但是这是一个錯誤。在更注意些地看事情的时候，明白的是，格列奇的光榮沒有讓吉荷米洛夫先生睡着。而应当意識到，吉荷米洛夫先生的作家的一切风格使人想

① 即監獄的別称。——譯者

起格列奇。他沒有注定做最新的卡特柯夫，但是他有一切的条件作成最新的格列奇，当然气派要比較小一些。

“违反”或者“由于”沙皇們我們的社会发展完成了，这对我們难道不都是一样！不一样，吉荷米洛夫先生，远不一样！假如我們的教育机关是交給托尔斯泰們，杰里雅諾夫們，魯尼奇們和馬格尼茨基們支配，这对于我們不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进入它們里面是有限制的，或者奉沙皇的命令，在每一分鐘都能把它們完全封閉，使得在它們里面学习的青年成了“伏尔泰的上士們”，这对我們不完全是一样的。如果北方和东方的各边疆为我們的学生們所住滿，而如果在現在的时候，父母們在放走了他們的兒子进高等教育机关以后，把他看作是已經死亡的，对于我們不完全是一样的。假使在我們的专制—警察的国家每年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們”在征税的时候受到体罰，对于我們不完全是一样的。假使为了最小的一点反对地獄的工厂制度，工人們受到行政方面的非法迫害，而当我們的君主突然想起的时候，那么可能把他們交給軍事法庭，如象不止一次地在尼古拉时候发生的那样，这对于我們不完全是一样的。一切这些对我们远不是一样的。我們因专制君主們的胡行妄为所付的代价是太大了。有过一个时候，这对于你們也远不是一样的，*吉荷米洛夫先生。而您知道是为什么嗎？假使在我們里面还保存稍微一点的人性，您不禁要不顧您的“进化”还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一时候，您的生活中的最高贵的时辰。

据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意見，假使我們的学习的青年为諸危險所包围着，那末这只怪把他們牵引到“政治”中的那些“挑拨者”。“学生的干預政治产生了一些最有害的后果，即各种示威那时候几乎是整个二十四小时都为了一些不值錢的反对不幸的学监的抗議，牺牲了国家的几百个青年的，不可代替的力量”。我們指出，第

一，“学生干預政治”是一回事，而所謂学生的历史，又是一回事。对于学生們除了和学監的斗争外，还有其它的“干預政治”的方式。第二，我們最恭順地請吉荷米洛夫先生告訴我們，这些真正可贵的和实在不可代替的力量的牺牲应当怪誰呢？难道在这里面不应当怪那不惜袒护“不論哪一个不幸的視察員”以致使成百的青年人“不得不抗議”的政府嗎？可注意的是，甚至在吉荷米洛夫先生的想象中我們的专制主义是象某一种神話中的有翼蛇身而凶惡殘暴的怪物，对待它，全部政治智慧仅在于不要陷入它的魔爪。

呵，当然，“在国家看来”，假使我們的青年能安靜地学习和发展，那会好一百万倍！誰爭論这一点呢？但是，不幸，当那一在現在毀坏它的青年力量的政治制度沒有最后毁灭以前，青年將沒有这样的可能。政府永远不会寬恕他們的“干預政治”，而他們也永远不会放弃这样的干預。学习的青年們到处都是最积极地参加爭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庸俗的人們因为这而斥責他們。乔治·桑已經有好久和完全正确地反对說：假使所有最好的和最高贵的青年都反对現在的制度，那末这就是它的无用的最好証明。

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不只想引誘青年学生离开政治斗争。他劝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最年长的讀者們也忘記它，并向他們指出“文化工作”……（須得到領導上的允許），作为出路。按照他的話，不論哪一个部門对于象这样的工作都不能加以阻撓和妨碍。他說，“不論是哪一种的政府能从人民夺去它所能随便想到的一切，但是不能夺去文化工作的可能，假如人民有这样做的能力的話”。这是令人愉快的；不幸的一点是：我們無論如何猜想不到，这样一种的工作，它，比方說吧，不会为蠹虫咬，也不会生鏽，而且甚至在政府夺去我們的“它所能随便想到的一切”的情況下，我們將能安靜地从事的，这又是怎样可惊的工作呢？知識的传播是，例如，所

有文化工作中最文化的。但是政府任何时候都能“夺去”这一工作，而且吉荷米洛夫先生本人，当然，也知道許多这样夺去的例子。文字活动也应当被承認为文化工作。但是这也是吉荷米洛夫先生知道得很清楚的，政府对于我们中間的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地禁止他从事这工作。我們的作者說的是哪一种“工作”呢？是說的修建铁路，說的“祖国工业”的一些成就的順利实现嗎？但是即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取决于官僚是否专断。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不允許你的企业或者以重稅或愚蠢的運費以及其它来摧残它。如果政府“夺去所能随便想到的一切”，我們所剩下的还会多嗎？（老实地說，它〔政府。——譯者〕現在离这一地步已不远了。）

我們以为，吉荷米洛夫先生对自己的讀者們应当更坦白些，而且要沒有任何含糊地以一些苦行主义者們某一个时候对奴隶們所說的那些安慰人的話来对他們說：你們的主人們能从你們拿走所随便想到的一切，但是他們沒有力量剝夺你們的“我”的内部自由；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只有这一内部的自由有价值。大概，許多人会理解这一哲学想法的完全正确性。

假使俄国“知識分子”經歷过政治上热烈的青年时代，而且假使他在年龄更大些的时候想到休息和舒适地生活，那末他开始回忆“文化工作”。它应当是什么——这是連他自己也知道得不大清楚的。从他的不得要領的解释中普通能理解的只有一点：将来的“工作”的极大一部分是用在保护和保存他的“文化人物”的声誉。請寬恕罢，我国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是有前途的，——将来的文化的担当者会說，不过却避免直接看着你。換句話說，他的“知識”是好和有益到这种地步，以至在看到他时，俄国人民已經从而医好自己的許多病，如象犹太人在沙漠中看着銅的惡魔化身的大蛇会医好自己一样。吉荷米洛夫先生正是向自己的讀者們介紹怎样把自

已装成俄国铜的蛇身魔鬼的“工作”。一个从前某个时候醉心于罗伯斯庇尔的和圣茹斯特的光荣的人现在作出一种样子，是在醉心于模范的地主康斯坦若格洛的英勇榜样或者天使般善良的包税者穆拉佐夫²³⁰。

但是在说到这样的工作时，他是不应当引证历史的。在对读者们提起彼得一世，叶卡特林娜和亚力山大二世时，我们的作者大大地粗心了一下。读者在研究了他举出的那些榜样的意义以后，可能对自己这样说，不管在上述那些人中的这个或那个统治的时期“文化工作”是多或是少，但是因为它“在国内”确实有过，它的内容就是针对着那时候的令人愤恨的贫困情形来改造社会的诸关系。现在试问：现在的沙皇制度，“如它现在的样子”能不能按照我们的时代的一些需要的作出重新改造社会诸关系的有益创举呢？有人说这些关系之最必需的改造就在于限制沙皇的权力。沙皇会担任这一“文化工作”吗？这是危险的思想，吉荷米洛夫先生！对自己提出象这样的问题的读者，是离开十分不良的居心不远的。但是这还不算什么；有些读者可能走得更远些，陷于这样的一种“破坏的”思想：亚力山大二世的改革是由克里米亚的失败引起的，他以作为俄国的自我保护所绝对需要的一些改革的纲领强加于我们。一切其它改革的基础那时候是消灭农奴制。它着手实行它，除一般的经济考虑以外还由于农民的反叛每年都在增加，使人不得不担心人民的起义。由此得出，显而易见的，这一结论，就是，当我们想迫使沙皇着手“文化工作”时，我们必须以起义来恫吓他，而且还必须是，当然，很厉害的恫吓，即是说，不以言语为限，而是真正地准备着起义。而这是说，革命的活动是那样一种的“文化工作”，但只是从另一方面发出的。而这最后的一种“文化工作”实质上对于君主们也是有利的。他们警惕于起义的危险，将很容易的变成“解放者们”。

为了讓亞力山大二世想起一些改革，需要俄国处在那种使尼古拉不得不以自杀来完結自己的絕望状态。革命者們使沙皇們迁就“文化工作”的必然前景；那时候連沙皇們的自杀，可能竟是多余的。

格列奇先生，您看到您把自己的讀者引到甚么魔途沒有？您这样做是經過思索的嗎？而且您还以那种“积极性的印記”自夸，好象这始終是您的“特点”呢！您为什么去搜索历史呢？最好限于頌揚您所心爱的“文化工作”，它一点也不涉及社会諸关系，而且它甚至在专制主义如果夺去了勇敢的俄罗斯人一切“所能隨便想到”的那种不幸的場合也是百倍地补报我們的。

我們的最新的格列奇連自己也承認，在历史的“文化工作”的活动範圍內俄国的君王們暴露了他們如何不爱劳动。所以他想對我們的爱国主义起一种作用，指出俄国的一些“民族任务”，据他的意見，只有巩固的政府才能解决这些任务。在一定的意义上說，我們的沙皇主义是从来不缺乏“穩固性”的，但是这一情况對於我們的文化任务的解决帮助得很多嗎？讓我們回忆一下哪怕是离我們最近的东方問題的历史。

人們對我們說，我們的“民族任务”要求摩尔达維亞和瓦拉赫亞的解放。我們为这一解放斗争过了，而当它實現了的时候，那时我們的专制主义把羅馬尼亞人变成了我們的仇敌。唆使他們反对俄罗斯——难道这是帮助俄国的“民族任务”的解决嗎？

人們對我們說，塞爾維亞的解放，有見于我們的“民族任务”是必要的。我們协助了它的解放，而沙皇的政策推动塞爾維亞人到了奧地利—匈牙利的怀抱。难道这是推动上述諸任务的解决前进嗎？

人們對我們說，为了俄国的利益必須解放保加利亞。俄国人的血为这一事情流得不少了，而現在，由于我們的“強固的”和“穩

固的”政府，保加利亚人把我们当成自己的最恶的敌人来仇恨我们。这难道对于俄国是有利的吗？²³¹

为了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任务，首先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它的政府的政策和它的民族利益应当是一致的。而在我国这样的条件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我们的政策是最完全的依赖至尊的皇家的幻想。叶里札维特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作战——俄国就有责任想，这是为它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战争。但是彼得三世登极了，他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以背叛的行为对待俄国，于是反对弗里德里希战斗刚完的俄国士兵们，很快就转到他的那一方面，难道俄国的居民们有责任想，他们的民族利益要求这样的转变吗？如果没有这样的责任，且让以为俄国的最主要的民族任务就在于无条件的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吉荷米洛夫先生记忆一下保罗一世或尼古拉的一些恶作剧罢。俄国从进兵匈牙利获得了甚么呢？在这一出兵以后几年，永不忘者，在同一个波兰人谈话的时候，问他，谁是扬·索别斯基以后的最愚蠢的国王呢？而当他的谈话人不知怎样回答时，他就说，是我，因为我也是不适当地拯救了维也纳的。但是须知他的陛下，波兰国王和俄国皇帝的愚蠢不能不最有害地反映在俄国的民族利益上面。

我们的所有民族利益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争取自由的政治制度，由于它我们祖国的实力终于不致再成为任何一个加冕了的克特·格推奇²³²手中的玩具。在说到俄国的民族任务时，专制政治的赞扬者首先正是在无意地使它想起这一任务。

我们的作者写道，只有“革命家们的绝望的浪漫主义”才允许他们“轻视俄国的继承的一些君王们，如象得到许可地轻视不论哪一个篡夺者一样。俄国的沙皇不是盗窃了自己的权利，他是从胜利地选举出来的诸祖先那里得到的，而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人民

沒有吭一声地表明自己要從羅曼諾夫朝奪去他們所授予的那些權力。”為了還更多些地展覽出沙皇權力的尊嚴，吉荷米洛夫先生指出如下的情況，就是，為絕大多數人民所承認的俄國的教會以“對自己的世俗的首長的稱呼”來使沙皇“神聖化”^①。

首先，我們試提一點小意見：不是教會以自己的世俗首長的稱呼來使沙皇神聖化，而是俄國沙皇由於自己的沖動和為了自己的政權的利益決定了自己呈獻這一光榮的稱號的。在這點沒有什麼大的罪過，但是為什麼吉荷米洛夫先生歪曲歷史呢？

其次，他以此是說的哪些羅曼諾夫的君王們呢？有過一個時候，在俄國的王位上，確實是坐著了羅曼諾夫的君王們。我們不能說，這一王朝是由於不論哪些特別“莊嚴的”考慮而被選出的。某些歷史家們說，仿佛高級貴族們之擁護“米哈依爾·羅曼諾夫”是由於他是“軟弱小兒的理性”，他們希望操縱他。有人也在談論，仿佛當選了的沙皇自己一方面也給了“莊嚴的”諾言尊重“國家”的諸權利。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們連一點確定的東西也不知道，而就羅曼諾夫之當選我們只有用阿·托爾斯泰伯爵的話說：

這是在夏季完成的；
但是是否有勸說，
關於這一點歷史
直到現在還緘默²³³。

不管怎樣，羅曼諾夫們確實是被選舉出來了，而俄國的沙皇們會引証人民的選舉，如果他們確實是屬於這一朝代。但是它早已是不存在的。在叶里札維特死了以後彼得·霍斯坦因—霍托爾普就即了位，而由於他與安格爾特—柴爾布茨基公主的婚姻，在任何

① 他的小冊子，第16頁。

情況下都不可能生出罗曼諾夫們，甚至縱使假定保羅一世的出身是合法的，而這是叶卡特林娜在自己的“札記”中所堅決否認的。在選舉彼得·霍斯坦因中，“國家”絕對沒有任何的參加，固然根據女的一系他在戚屬的關係上是屬於已消滅的王朝，但是須知如果在這一基礎上可以把他和他的後代尊稱為罗曼諾夫，那末也應當這樣稱呼例如愛丁堡公爵的小孩們，而這，好象誰還沒有這樣想過。對於俄國的革命家們，不論把誰，是把罗曼諾夫們還是霍爾斯坦們從寶座上推倒下來都是一樣的，但是再說一遍，為什麼要歪曲歷史呢？

不能把俄國的沙皇們當作篡竊者一樣地藐視！這真是新聞！而我們始終是認為除了把他們當篡竊者以外是不能有別的看待的。我們這樣想是因為，俄國的沙皇們自己也不是稀有地把自己的先人們當篡竊者一樣地藐視。吉荷米洛夫先生記得十八世紀的歷史嗎？他是否記得叶里札維特和叶卡特林娜二世的登極呢？不外兩者中的一個；要就是 Ces dames^① 篡竊了沙皇的政權，要就是，假使她們做得是合法的，那末她們的前輩也是篡竊者。保羅一世始終是稱叶卡特林娜的行動為篡竊，而且說尼古拉也同意他關於這點的意見。吉荷米洛夫先生難道不記得保羅一世的被殺嗎？難道他不記得在這事件中是應當責備“幸福的”亞力山大，至少是，“知道了而且不告發嗎”？對於一個借助於反對自己的父親和皇帝的陰謀來達到登極的人應當怎樣的稱呼？當然，對於俄國革命者們，是同靠了“上帝的仁慈”的沙皇們還是同靠了“擲彈手”和其他近衛兵的仁慈²³⁴的沙皇們打交道，事情都是一樣的。但是，再，再重復地說一句，為什麼要歪曲歷史，為什麼說是從“祖宗們”的政權的合法

① 〔這些太太們〕。

讓渡，为什么把被一切可能的罪行塗污了的皇位“幻想”为神圣性的呢？

或者吉荷米洛夫先生以为，他的讀者不知道俄国的历史，而在利用他的无知，或者他自己也不知道俄国的历史，这真是所說的，沒有問好渡头的时候，就請不要涉水（即不要輕率从事之意。——譯者）。

經驗丰富的男子，你的勇敢在把你断送！

而《俄国通报》是不理解和不珍視象这样的一个勇敢辯护人的！他告訴說，吉荷米洛夫先生沒有告訴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从哪里拿新的东西，如果你們，先生們把可以对专制主义有利的一切都絕對地說完了呢？而且何况，《俄国通报》上的話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在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里有一种恐吓人使其不参加革命活动的完全新的手法。这里就是吉荷米洛夫式的可贵的新奇的水果。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的第18頁上說，“生活方式本身的影响对于恐怖主义者—阴谋家是异常不利的……。支配着一切的意識——就是这样的一种意識，即不仅是今天或者明天，而且連每一秒鐘他应当准备着死亡。在这样的意識之下，生存的唯一可能，就是不要想許多事情，而如果想成为一个有教育的人的話，是应当想到它們的。不論对哪一种东西的严肃的怀念在这种状态中真是一种不幸。对于不論哪一問題，社会的現象等等的研究是不可想象的。渐渐复杂起来的，渐渐广泛起来的行动計劃，甚至不能来到头脑中。对于一切人（除掉五个到十个同志以外）都应当从早晨到黑夜予以欺騙，对一切人都隱瞞，对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敌人”。一句話，阴谋者—恐怖主义者的生活是一个“被追逐的狼”的生活，而他的反对政府的斗争是“卑屈”他自己。

这是怎样的一种比較呢？說的話不愚蠢嗎？我們用涅克拉索

夫的話問道。試想想這些理由的意義，您就會看出，吉荷米洛夫先生不是如人們常常表面看他的那樣簡單。在俄國存在着有嚴酷的無情的力量，它壓迫着我們和從我們拿走“所能設想的一切”。我們是在孤單地反抗這一力量，它在把我們碾成碎粉。我們是在組織自己，以便不斷地鬥爭，而由於這一我們最初以為應當是解放我們的鬥爭却得到我們自己的卑屈。教訓是顯而易見的：假使你不願“卑屈自己”：不要抗議罷，服從由上帝規定的權力，“遷就些罷，驕傲的人！”

這一結論，看來，只直接應用於一些恐怖主義者，但是假使他的前提是有根據的話，那末俄國任何革命鬥爭都應當被承認是卑屈的，因為一切革命者沒有區別地必須和特務鬥爭和遷就有可能“不僅在今天或明天，而且是在每一分鐘”都會喪失生命的思想。然而我們的作者是正確的嗎？幸而，他是不正確的，遠不正確，不僅不正確，而且說的是完全違背真理的話，讀者只須予以不大的注意，就可以使吉荷米洛夫式的詭辯象煙灰一樣的飛散。

讓我們從一個不大的，但是必需的糾正開始。革命者們不是同特務們而是同政府作鬥爭，因為政府是借助於“沙皇的眼睛”，密探們和奸細們來迫害他們的。這樣的反對革命者們的手法正應當使政府感到最屈辱。關於這點吉荷米洛夫先生是緘口不談的，但是這是本身自明的^①。至於說到革命家們，那末密探的迫害能對他們起怎樣的影響呢？首先，在其中的每一個人身上應當支持一種

^① 只須回憶一下蘇杰依金的葬儀，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沙皇們在反對革命者們的鬥爭中把密探們安放在多麼樣的接近於屈辱人的地位。亞力山大三世在著名的加特欽的“避難”235中（我們不記得已經在哪一報紙上讀過）說至尊的家庭……為了皇宮警察的官員們安排了聖誕節樹。皇后最厚待的甘願以自己的手分送贈品給這些官員們。在對於公開的警察這樣的客氣以後，誰也不會驚異如果在復活節周在報紙上出現了如下的消息，就是他們的陛下弟兄般地向秘密警察的代表們，或者不客氣地，向密探們，向自己的最親近的同志們為復活節祝福而接吻。

覺悟，就是為了自己的信仰“不僅今天或者明天，而是每一秒鐘他必須準備着喪失生命”。不是個個人都能受得了象這樣的思想的經常存在的。在任何一个國家的秘密社會的歷史中，可以找到一些軟弱，怯懦，“卑屈”和甚至完全頹廢的例子。但是，對於專制主義不幸的是，並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這樣。對於比較堅強些的人們不間斷的迫害往往發生完全相反的影響：它們在他們中間培養出的不是對迫害的害怕，而是完全的和經常的在為正義的事業爭鬥中準備死亡。連這一準備在他們中間支持着這樣的一種情緒，關於它是永遠不會在一個密探那里引起嫌疑的和平的庸夫俗子們不會有一點大約近似的概念的。所有個人的，自私的東西，都退到次要的地位，或者，更正確些說，完全被忘記，——剩下的只是一般的政治興趣，“只是權力的思想，但有着火焰似的情緒。”人的情感高漲到英雄主義的程度。而這樣的一些人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是不少的。請看看，坎南認識了在西伯利亞的我們的流放者們以後寫的什麼。他在自己的有一封信里（這些信為 Dawes^①在1888年八月號的《The Century》^②所引用）說道：“在西伯利亞我所看到的和發覺的，觸動了我的內心的心弦，給我開放了一些新感覺的整個世界，在許多方面清洗了和提高了我的一些道德概念。我在那里認識了一些真正英勇的性格，如此高貴的类型，是屬於我們從人類歷史中所知道的最高貴的类型。我在那里看見了丈夫氣派的和強有力的人，他們無限的準備犧牲和死亡……。我出發去西伯利亞時對於這些被放逐者是懷有很深成見的；回來時，和他們分離，把他們緊緊擁抱在自己的懷中，眼睛里充滿了眼淚”²³⁶。吉荷米洛夫先生關於這些人有什麼話說呢？同密探們的屈辱的鬥爭，顯

① 《道威斯》。

② 《世紀》。

而易見地，对这些人沒有任何屈辱的影响。咳，格列奇先生，格列奇先生，您連大象也看不見！

說什么！如果革命者們不致受着密探的追踪，那将会好得多。但是这是取决于政府的。吉荷米洛夫先生对我们会作了一次很大的效劳，如果他对我們的統治集团的圈子暗示，不是一切手段在反对革命者們的斗争中都是好的，而且“沙皇的眼睛”看来是很不迷人心目的。

說到革命者們所仿佛是“从早晨到夜晚”不得不从事的一些欺騙，我们可以对吉荷米洛夫先生提出这样的理由。我們不知道，当他自認为是革命者的时候，他欺騙了多少的人。很可能，他欺騙了的人很多。他自己的自白表明，在出版《民意导报》的时候他的文字的活动是对讀者的欺騙；他那时候已經不相信他所辯护了的事业。但是由此还完全得不出結論說，所有的革命者們由于事物自身的力量必須是欺騙者。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可悲的例子不是他們的榜样。革命的活动所要求的只是保密，而由保密到欺騙还很远。一个最誠实的，在自己一生沒有說过一句謊話的人也有秘密，而这样的人有最完全的精神上的权利只是对于自己的“同志們”講那些秘密。难道格列奇先生不懂得这点嗎？

但是，讀者，最可惊奇的事情是：俄国的专制主义是这样的駭人听聞，甚至自己沒有走上真理道路的吉荷米洛夫先生也坚持不了自己扮演这种恭順作家的角色。在各种拖延和为了替沙皇政权辯护而捏造的一些詭辯以后，他完全意外地开始諷刺起来，陷入了謝德林的腔調。他写道，“立法的和执行的权力的源泉——按照俄国的法律——是国家的君主。在一些共和的国家里，选民們是这一源泉。那种的和別种的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点，但是在两种情况中，政治的活动不論是从哪一个源泉出发，都是除了通过一定的机

关(有时通过如象街垒之类的“机关”，吉荷米洛夫先生)以外，不能有別的表现。这些机关在俄国的活动能力不比在别国为少。在我国有国务会议，元老院，各部，以及各种額外的机关，有如工商部 and 一整系列經常存在的諸委员会”(第31頁)。由于这一諷刺的嘲笑，可以原諒我們的作者許多违反邏輯和违反常識的錯誤，不过，当然，不违反政治的誠实性。

四

或者，讀者从我們所写的一切得出这样的結論：我們不承認我們的专制主义有任何的功劳。但是这是不完全对的。而在俄国的专制主义的背后无疑地有历史的功績，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将促进自己灭亡的种子带进了俄国。不錯，它是由于和西欧成邻居而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它还是办到了这点，是值得我們方面的最誠实的感激的。

旧的莫斯科的露斯曾以完全亚細亚的性質为其特点。它無論在国家的經濟生活中以及在一切风尚和在全部国家管理的系統中都是一望便知的。莫斯科是屬於中国的一类，不过这一中国不在亚洲而在歐洲。由此，就有那一重要的差异，就是，正如現在的中国一切的力量都被欧洲所击退，我們的莫斯科的中国还从伊万雷帝的时候就以武器在手努力于为自己打开一个小窗口。彼得一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伟大的任务。他完成了巨大的激变，拯救了俄国免于麻痺。但是彼得皇帝所能做的只是沙皇的权力所能达到的。他建立了常备的、照欧洲样子武装的軍隊，而且把我們的国家管理的体系欧洲化了。一句話，对于“莫斯科露斯”的亚細亚的躯干“沙皇木匠”^①作了一双欧洲的手。“在回溯到大概是十一世紀时候的社会基础之上，出現了外交、常备軍、官僚的等級、学校、研究院、滿

足奢侈的嗜好的工业”以及其他，兰波在关于我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是說得好极了。一双新的欧洲的手的力量，在俄国的国际关系上效了大劳时，在它的国内生活的許多方面是有不利的反映的。在把俄国“吊到拷問架”（如普希金的話所說的）以后，伟大的沙皇把人民压在捐税的重担之下，把专制主义领导到了不可信的强大程度。所有的，哪怕部分地抑制沙皇权力的那些机关，都被摧毁了，所有的传说和习俗，哪怕是稍微保存它的一些优点的，都被抛在脑后，而在彼得一世死后馬上就开始那些“擲弹兵連的”嬉戏，由于它們，俄国帝国的历史在长时间内，如一个意大利的作家所說的，成了 nel un lupanar^② 的悲剧。彼得式的“改革”之为我們的沙皇和女沙皇所喜欢，是因为它可怕地加强了专制的权力。至于說到为彼得一世所开始的“文化工作”，那末他們对之是尽最后的可能来規避，必需要有惊人的事件，才使得俄国君主們回憶起“俄国的文化”。例如，克里米亞战争的不幸的結果，如我們已說过了的，迫使了亞力山大二世回憶起它。克里米亞的失敗表明了我們和西欧距离如何的远。然而当我们安于在拿破仑战争时所收获了的荣誉而且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士兵的忍耐心和俄国刺刀的勇敢的品質时，欧洲的民族就能利用了最新技术的所有成就。連我們也不得不稍微动起来。国家需要新的經費，新的收入源泉。但是为了找到它們，必須消灭厉害地限制我国当时工业的农奴制度。亞力山大二世作到了这点，于是在 1861 年 2 月 19 日以后可以說，我們的专制主义完成了在地球的极限之内人世上的所有的东西。

从六十年代开始以来在俄国有一些新的社会需要漸漸成熟了，这些都是专制政府如果不停止其为专制政府就不能滿足的

① 指彼得大帝，因为他曾到荷兰造船厂学做过木匠。——譯者

② 〔在妓院內〕。

需要。

事情是这样，欧洲的手渐渐对于我们的社会机体的躯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从亚洲的躯干逐步变成了欧洲的。为了维持彼得一世所建立的一些机关，需要的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是钱。在从人民榨取钱的时候，政府从而促进了我国商品生产的发展。以后为了支持同样的一些机关就需要不论哪一种的工厂工业。彼得一世在俄国奠定了这一工业的始基。从一开始——而这是完全与自己的起源相符合的——这一工业对国家是处在完全隶属的、补助的关系中。它和俄国一切其它的关系一样，被国家奴役着来为之服务。它自己是依靠着编入工厂和作坊的农民们的农奴劳动。但是它还是起了自己的作用，而且同样的那些国际关系也大大帮助了它。从彼得一世到亚历山大二世的这一时期俄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从如下的情况就得到最好的证明，即是当彼得一世的改革要求强化农民的农奴隶属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良没有它的消灭是不可设想的。在把我们从1861年2月19日到现在分隔开的二十八年中俄国工业是这样迅速地前进了，以致它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最重要的变化。在某个时候是从属于国家的，它现在力求使国家从属于自己。尼什哥罗德博览会的商人，在他们几乎每年呈政府的请愿书之一中天真地称财政部为商—工业等级的机关。从前没有政府的指示一步也不能走的企业家们，现在要求，政府要跟着他们的指示走。同一的尼什哥罗德的商人表示平凡的愿望，一些足以影响我国工业状况的措施只有得到他们“等级”的代表同意时才可以通过。在俄国经济发展的事业中，专制主义的美妙时光这样看来已经过去了。它的保护不仅已经不需要，而且对我们的工业是直接有害的。而当我们的“商—工业等级”，在经历了温和的劝说的无效以后，不得不以更严厉的声音提醒沙皇，tempora

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①。

在某个时候称颂过农民是可怕的革命力量的吉·荷米洛夫先生，现在指出他的反动本质，好象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事情。当他说到我国成千成万的人口除了沙皇制度以外关于别的事情连听也不愿听的时候，他正是指“农夫”说的。正象“茹烈霍夫斯基的演说”²³⁷的一篇开玩笑的诗中的检察长一样，现在他准备以怜惜的声音惊叹说：

感谢基督，

在种地人中找到了我们的救星。

①（时间是在改变，而我们也同它在一起改变。）

我们通常都以为，既然政府实行保护关税税则和不吝惜对这一或那—股份公司给以津贴，那末，这是说，我们的有产阶级没有任何理由不满意它了。这一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单是一些善良的愿望，在这一场合和在一一切场合一样是不够的，需要能力。而这是我们的政府所没有的。在这一场合，例如，受我们的莫斯科商人鼓励的伊·塞·阿克森柯夫就在自己的《露斯》报（见1882年10月30日）上说，我们的商人和工业家们寻求对外市场销售自己商品的努力“得到的政府的支持不仅是微弱，而且，可以说，这些努力还由于在我们政府中缺乏明了认识的总的商业政策而不停地被麻痺”。这种缺乏他以如下的正确想法来说明，即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官僚制度，在其下所有管理的工作都按照各部门来分配，损害了整体，每个部门几乎成了“国家里面的国家”。他举了这样一些论据来证明：“例如，财政部规定和制定对俄国工业和商业的一整套系列的奖励和援助，就中也规定输入俄国的外国商品的税则，而另一部，交通部所管理的一些铁路局却规定这样的一种铁路运费率把财政部的关税的一些结合化为乌有和牺牲着俄国的贸易以保护外国的。而第三个部，即管理非人工的而是天然的道路的内务部却让一些重要的，古老的商业大道荒废和不能通行，而外交部没有注意地考虑俄国的商业利益（只要是容许了，例如，柏林条约中为保加利亚所必须遵照的土耳其的税则的担任，这是最不利于俄国和最有利于英国和奥地利的，等等）突然地缔结不论哪一种的条约”。在《露斯》的下一期阿克森柯夫硬说，就保护俄国工业利益这一点说，我们的工业家们“是从战斗中，也就是说，是经过长时间的，也就是顽强的斗争以后才取得的”。在那里，关于高加索的过境运输，斯拉夫主义机关报的主编者（让我们在这里重复地说，即在这一场合也是受了莫斯科工厂主的鼓励的）说：“我们的工业界”不满足于彼得堡在这一问题上所定的方向，“是感觉羞辱了，生气了，精神悲痛，而且已经对于在彼得堡的官界的有力支持俄国的民族（原来如此！）失去了任何希望。”看来，是很清楚的！

而确实，农民会拯救吉荷米洛夫先生和他現在的“同志們”，如果吉荷米洛夫先生和他現在的同志們能拯救由善良的古老时代遺下給我們的农民。但是“实在沒有任何力量是能拯救他的”。

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根本改变了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我們的莫斯科的和彼得堡的专制主义是依靠着农村人口的智能不发达，他們是生活在，如上面所引的兰波的話所說的，大概十一世紀。資本主义把我們的旧的家长的乡村諸关系完全破坏了。格·伊·烏斯賓斯基先生在他的素描中以照象的真实性描画“真正的”农民，承認这一农民已經在世界上不能长久活下去了，說乡村里的旧的秩序在解体，說在乡村中有两个新的“等級”有产階級和无产階級在形成，后者随着自己的发生就离开乡村和走进城市，走进工业中心、工厂和作坊。

說无产階級的发展把社会的关系革命化，这是甚至沒有讀过中学的人也是知道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工人階級在欧洲現代历史中扮演的是哪一种角色。它在現代欧洲社会里，在一些統治的階級代表最使人厌恶的伪善、說謊、腐化、欺騙、交易所投机和政治的收买的地方，是一切誠懇的和有思想的进步之拥护者的唯一的支柱和唯一的希望。

在我們祖国这一階級的組成还有大的意义。从它出現的时候起俄国文化本身的性質就改变了，我們的旧的、亞細亞的經濟生活方式就讓位給新的、歐洲的方式。工人階級注定了要在我国完成彼得一世的事业：把俄国欧化的过程进行到底。但是工人階級將給予这一事业以完全新的性質，这是俄国作为文明国家的存在所取決的。在某个时候靠了俄国专制君主中最专制的君主的铁的意志从上层所已开始的，它将从下层，通过所有階級中历史所仅仅知道的最革命的階級的解放运动来完結。赫尔岑在自己的“日記”里

指出，在俄国，实在地说，没有人民，有的只是屈膝的人群和刽子手。在俄国通过工人阶级现在在创造象人民这一词的欧洲意义那样的人民。我们祖国的劳动人民将第一次挺起身来，并召唤自己的刽子手出来回答。那时候就是专制复灭的时间了。

这样看来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行程将解决一切不仅是我国形势的特色（这不仅是革命的而且也是任何“知识分子”的特色）的所有那些矛盾。俄国的“知识分子”自身就是在“学校和学院”中教育青年那时候已开始的彼得一世革命的虽然真实却是完全无心的果实。或多或少地照欧洲样式开办的这些学校，灌输了在它们里面学习的青年们以许多欧洲的概念，这些概念和俄国的制度，首先和专制的实践大相矛盾。所以可理解的是，俄国受教育的人们的一部分，在不满足于官职表的庄严前途时，将对政府取反对的态度。这就组成了我们普通称为知识分子的阶层。目前这一阶层是在大概回溯到十一世纪的社会基础上就已经存在，直到那时候，它（阶层。——译者）能“反叛”和为它所喜欢的不论什么空想所吸引，但是不能在围绕它周围的现实中改变什么。在俄国生活的总行程中这一阶层是“多余的人们”的阶层，它整个代表某种“聪明的多余”，如赫尔岑关于某些属于它的变种所说的。从俄国社会诸关系的旧经济基础破坏以后，从我国工人阶级出现以后，事情就在变化。从“知识分子”出身的我们的革命者们，在走进工人中间，在给工人们带着科学，唤醒无产者们的阶级意识时，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因素——他们常常是在绝望状态中垂头丧气，徒劳地改变一个纲领又一个纲领，如象无希望的病人徒劳地吃了一个药剂又换另一个药剂一样。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俄国的革命者们将为自己找到那一他们直到最近的时候还没有得到的“人民的”支持。工人阶级的力量将拯救俄国“革命”脱离那种现在吉荷米洛夫

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以满意的微笑在口中说的衰弱无力状态。“一些个体的反叛”，确实，是不能破坏不论任何一种的政治体系（而单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只不过是一定数目的“一些个体的反叛”），这些个体的反叛将和群众的整个阶级的“反叛”合流，正如个别的一些小河汇合为广阔的河一样。

现在还有时间，现在还不算迟。我们的“知识分子”会理解自己的情势，他们会熟练于所演的为历史所分配给它的可感谢的角色。

理解或是不理解，但是事变是不会等待他们的。缺乏从“知识分子”出身的同盟者们，不会妨碍我们的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理解自己的任务，从自己中间推出引导者们，建立自己的工人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叛变自己的事业，不会放任它给命运播弄。

然而还需要再一次指出，工人阶级在与专制斗争中，十之八九将不是单个的，虽然，不消说，只有它一个能给它以坚决的转化。情势的本身将必然推动它担任它所力能担负的对我們整个有产阶级的斗争，即是说，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商业—工业界、我们的地主们、这些小市民中的贵族、最后，甚至对乡村的“第三等级”的斗争。

柯尔帕也夫们和拉祖法也夫们²³⁸是愚蠢和保守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初看起来，仿佛他们负有为未来“制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服务的使命。将来有一天他们会熟练于这一角色，但是他们应当事先经历自己的“暴风雨般意图的时期”。

我们的财政体系是以农民为国家所奴役作基础的，国家从他拿走它“认为随意能拿走的一切”，指导他的是一种简单的想法：“他是足够的”²³⁹。忍受得住一切的“他”，长时间地没有辜负这一使

它得意的信念，但是現在連他的可驚的“足够的”能力也趋于衰落。如我們已說过的，“他”現在正經歷分化的过程，一边在变成无产者，另一边变成富农。因为从輕率的无产者們出身而又能逃出最孜孜不倦的和警覺的长官的人是不多的，那末公社的捐稅負担越来越落在富有的公社社員們身上。固然，他們力求以占有为无产者們所抛弃的地段作为补偿；然而不难理解，他們对于捐和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表现成为如象善良的旧日的“他”那样的清廉的人。在自己的純朴中“他”所梦想的只是經營独立的經濟，而当他这样做成功了时——这在旧制度的时候在絕大多数的場合他是会成功的，——国家会把他当作农奴，夺走一切为經濟学家們所已知的或未知的种类的收入，除掉最可憐的工資。富农是不能滿足于这样的付款的。他必須把它交給自己的雇农，而为了自己他需要可觀的利潤。但是这如果没有俄国財政經濟中的一些根本的改变，一些将只为全国代表們所能胜任的改变，是不能設想的。不需要是一个預言者，就能預先地知道：关于这一問題将在富农和他的“沙皇的父”之間产生一些强烈的不滿。

这样俄国的专制主义准备了和正在准备着自己的灭亡。它在俄国变成不可能的那一时候将是不远的，于是，在我們中間找得出的惋惜这件事的人将是不多的。可以和甚至是有益地来爭論一下，我們將以哪些道路来达到政治自由。但是在誠实的和有教养的人們中間，关于我們需不需要自由是不会成为問題的。“我們十分知道，我們的旧专制主义是什么。所以任何的妥協都不要！任何的躊躇都抛弃罢！勒住专制主义的喉头，把膝盖放在他的胸上！”^①。

^① 这是拉薩尔在《Was nun?》（《現在怎么办？》）演說中的話。240

五

在結論中关于我們的格列奇还講兩句話。讀者現在看出我們的革命諸理論的進步应当是什麼和將是什麼。如我們在上面指出了的，我們各種可能的派別和方向的社會主義者——民粹分子，“民意”黨以前也包括在內，不是在依靠“進化”而是以一切可能的詭辯拒絕承認它。他們的學說是對於那種經濟制度的理想化，如果它真是如他們所以為的那樣鞏固和不可動搖，將會永久陷他們於完全無力的狀態。所以對民粹主義的批評乃是我們的革命運動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上前進的第一步和必要的一步。假使吉荷米洛夫先生以為我們的革命者們不能使進化和革命一致起來而深深地憂愁，那末他是值得只從事於這一批評的。但是他的行動恰恰相反。他沒有批評民粹主義，他只是把他的一些基本論點引伸到了極端。民粹主義世界觀下面的一些錯誤在他的頭腦中達到了這樣巨大的規模，除非他可以开玩笑地稱自己為“進步的工作者”（和平的或者不和平的——這在現在的場合中都是一樣的）。簡單些說，假使民粹派分子們從某些錯誤的論點出發，那末吉荷米洛夫先生，在把這些錯誤的論點引伸到怪誕的程度時，現在幸運地是直接從荒謬出發。但是他騎在這匹馬上是走不遠的！

這就是我們的作者的“革命主義”的可悲歷史。這一“革命主義”長久地停留在完全的理論的孤獨狀態中，但是他看見他“一個人是不好的”，會願意和這一或那一進化的理論進入合法的婚姻的時候已到來。幾年來他為自己“找尋了”適當的黨，最後以滿腔的愛情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黨與國家的統一”上面。這個從外表看極為謙虛的女子，把自己當成最真正的，比方說罷，主幹的進化理論，原來是，第一，釘入吉荷米洛夫先生的“革命主義”棺材中的凶

恶妻子，而第二，——是一个和不论任何社会发展学说没有共同之点的冒名者。

而吉荷米洛夫先生想象着，在这一历史中有很多有教益的东西！历史是有教益的，但确是使他最不愉快的。

他想象着，在读完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以后，每一个读者会对自己说：这是本身就很明了的，作者曾做过革命者只应怪其他的一些人，只是由于所有我们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些极端愚蠢的思想习惯，而吉荷米洛夫先生之不再是革命者是由于自己“创造的”智慧和自己的爱国主义的卓越深度这些突出的特点。但是——可惜！——甚至《俄国通报》也不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吉荷米洛夫先生从革命者们那里为了他的“进化”而经验到的一些不愉快而有所抱怨，他自己的优越性的一种骄傲感是透过这些抱怨的。他比其他的人聪明些；别人没有理解他，不会评价他，而且在应当对他鼓掌的那个时候，甚至可怕地侮辱了他。

但是吉荷米洛夫先生是严重地错误了。他只是由于自己的不发达性而有了自己的进化。智慧的悲哀不是他的悲哀。他的悲哀是由于愚蠢的悲哀。

而这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概念也就是和彼得堡警察区的任何一个缮写员所具有的一样多的人，长时间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先知和某种特殊“俄国的”社会主义的解释者，他是乐意把它和西欧的相对立起来的！革命的青年注意了他的议论，认为他是热里亚波夫和彼罗夫斯卡亚事业的继续者。现在他们看出，这一冒名的继续者是怎样的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叛变迫使我们的革命者们批判地对待他这人物。但是还不止此。他们现在还必须批判地检查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八十年代的全部期间所写的一切，那时候，他自己不相信所说的，然而认为需要在文献中以革命者的姿态出

現^①。吉荷米洛夫先生在这一期間說了很多胡言，把許多問題弄混亂了。而我們現在未能廓清这一混亂，在未廓清这一混亂以前，甚至在与他斷絕了一切关系和按照功績來衡量他時，還是不会擺脫理論上的吉荷米洛夫主義，然而這是我們必需要擺脫的。

現在再見罷，吉荷米洛夫先生。願我們的正教的上帝給您健康，願我們的專制的上帝給您以上將銜！

^① 見他的小冊子第8頁。“靠信仰和真理，憑良心和信念”，吉荷米洛夫先生對革命事業的服務只是“到幾乎1880年底”。從這些遼遠的時候起他那里只殘留下了對旗幟的“形式的”忠誠。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對革命的各主題寫下了許多議論，即是，據他說的，構成“小號字六百頁以上”的議論。

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上的演說²⁴¹

(1889年7月14—21日)

〔第一草稿〕

你們在這一工人的大會上看見了俄國——即是迄今為止工人運動不幸還是太軟弱的俄國——的代表們，也許會覺得奇怪吧。但是我們以為革命的俄國無論如何不但不應當置身於歐洲最近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外，而且，相反地，這一運動和它現在的接近對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將帶來很大的好處。俄國專制主義在西歐的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你們都知道的。俄國的沙皇們是加冕了的兇兵，他們認為保護和支持從普魯士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歐洲反動是自己的神聖職責。例如，如果在這裡談尼古拉在1848和1849兩年扮演的角色會是浪費語言；明如白日的是，俄國專制主義的倒台將等於世界革命運動在全歐洲的勝利。現在只問，在哪些條件之下，俄國的革命運動會對於俄國專制主義獲得勝利呢？

一些其幻想大大超過了他們的社会—經濟消息的作家們，把俄國描畫成為象在經濟結構上和西方毫無共同之點的中国那樣的國家。這完全是虛假的。俄國舊經濟的一些基礎是處在完全解體的過程中。某一時候甚至為某些社會主義者所如此喜愛的，而實際上是我們的專制主義的主要支柱的鄉村公社，越來越變成鄉村有產階級手中剝削大多數農業人口的工具。農民中最貧窮的部分被

迫移居到城市和工业中心，而与此同时大的工厂工业在生长，吞併某一时曾会在乡村中繁荣过的家庭手工工业。我們的专制政府为金錢的需要所驅使竭尽一切力量促进了俄国資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过程。我們，社会主义者們，对于它的活动的这一方面只有感到滿意，因为它是在靠这一发展为自己挖坑。由于乡村公社解体而組成的无产階級将对专制制度給以致死的一击。假使它，不顧俄国革命者們的英勇的努力，直到現在还没有被战胜，那末这可以从革命者們脫离人民群众得到說明。我們的革命思想家們的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对沙皇們作为个人来斗争說来，可能是足够的，但是把沙皇主义作为政治体系來說，对它的胜利，他們是太少了。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意見，我們革命知識分子的任务可以归結为如下：他們必須熟諳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工人中間传播它們和借助于工人們从事夺取专制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当它是工人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才能获得胜利。我国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出路的！

〔第二草稿〕

公民們！

由于已經有了很多的演說人登記，所以大会只能給他們以不多的時間报告他們所代表的国家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情况，那末我力求尽可能地把自已的报告限于說俄国的工人运动。

或者，你們看見在这次大会上看見俄国——这一工人运动远不象西欧其它国家那样发达的俄国——代表們会有点奇怪。但是我們，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們，認為，革命的俄国無論如何不应当置身于其余的工人的和社会主义的欧洲之外，而且，相反地，

它和西欧的工人运动的接近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将带来很大的好处。

你们全都知道俄国专制主义直到现在的时候在西欧历史中所扮演的卑鄙的角色。

俄国的沙皇们是加了冕的宪兵们，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圣的职责是支持一切国家——从普鲁士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反动。

如果在这里谈皇帝尼古拉在著名的1848年各种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会是无益的浪费言语。

所以，革命运动在俄国的胜利会是欧洲工人们的胜利。

所以，重要的是弄明白，这一俄国的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怎样地和在哪些条件之下是可能的。

公民们，它是可能的，——而在这点上我们是坚定地相信的——只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即假使俄国的革命者们能取得俄国人民自身的同情。

但是当我们的运动还是思想家们和在校的青年们的运动的时候，它也许对于沙皇个人是危险的，但是对于作为政治体系的沙皇主义将没有任何的危险。

为了推翻和最后摧毁沙皇主义，我们必须依靠比学习的青年更为革命的成分，而这一成分在俄国是存在的，——这就是无产者的阶级，即是由于自己的艰苦的经济情况而革命的阶级，是就自己的本质说是革命的阶级。

某些经济学家，由于天赋的太热烈的幻想，暴露的善良意志比充实的知识为多，把俄国描画成为一种欧洲的中国，它就自己的经济结构说，和西欧是毫无共同之点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俄国的旧经济的诸基础现在是在完全分解的过程中。甚至在社会主义的报刊中说得这么多的我们的乡村公社，但它实际是俄国专制主义

的支柱，——这一被称頌的公社越来越成为富农手中资本主义剝削的工具，而貧农們則在离开乡村和到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去。与此同时大的工厂工业是在增长，并吞了某个时候在乡村中繁荣过的家庭手工工业。

专制的政府竭尽全力在加强这一情势和这样地促进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它的活动的这一方面只能使我們滿意，因为靠这一方法它自己就在准备自己的灭亡。

意識在开始觉醒的工业无产阶级将对专制制度給予致命的一击，那时你們将看見在自己的一些大会中有它直接的代表們同比較先进国家的代表們并肩在一齐。

而現在我們的任务就在于，同你們在一齐維護国际社会主义的事业，用一切办法在俄国工人們中間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說和率領着他們去轟击专制制度的堡垒。

而在結論中我重复地說——而且坚持这一重要点：俄国的革命运动只能作为工人运动而胜利，否則它永远不会胜利！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²⁴²

六十年前，1831年11月14日，一位无疑地将永远在思想史上占据最前列的地位的人逝世了。在法国人称为“道德和政治的科学”的諸科学之中，沒有一門沒有受到过黑格尔天才的强烈而且很有益的影响。辯証法、邏輯、历史、法律、美学、哲学史和宗教史，都由于受到黑格尔的推动而面貌一新。

黑格尔的哲学教育了并且鍛炼了下列的一些人的思想，如施特劳斯、布魯諾·鮑威尔、費尔巴哈、費舍、汗斯、拉薩尔，最后还有恩格斯和馬克思。黑格尔还在生前就已享有巨大的、全世界的声誉；他逝世之后，在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个期間，对他的哲学的几乎普遍的爱好，更是有加无已；可是从这以后，却开始了一种急剧的反动：人們开始对黑格尔加以藐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象正直的孟德尔逊在萊辛时代藐視斯宾諾莎一样，亦即把他看作一条“死狗”了²⁴³。在一些“有教养的”阶层中，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完全消失了；在学术界，这种兴趣也减弱到这种程度，以致迄今甚至沒有一个哲学史专家想到要判断和指出黑格尔哲学在它所涉及的各种知識部門中的“残余价值”了。怎样解释对于黑格尔的这种态度呢，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出一些来；現在只是指出，可以預料，在不久的将来，对于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对他的历史哲学的兴趣，又要变得浓厚起来的。工人运动的巨大成就迫使那些所謂有教养的階級注意到指导这个运动的那种理論，同时又迫使这些階

級去注意这种理論的源泉。

当这些階級一旦注意到这点之后，它們立即找到黑格尔，于是黑格尔在他們眼中就由“复辟期哲学家”一变而为目前最先进的思想的創始人了。

正因为这样，我們可以預言，虽然这些有教养的階級又对黑格尔有了兴趣，可是它們絕不会再象大約六十年前在德意志文化的各国中那样，对他抱有那么深刻的同情了。相反地，資產階級的学者們却正热烈地从事于对黑格尔哲学作“批判的审查”，将要有不少人在同这个已故哲学家的“极端性”和“邏輯上的任性”进行斗争中取得博士学位。

当然，从这种“批判的审查”里，科学所赢得的只有好处，这就是，資本主义的有学問的辯護士們日益发现自己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正同他們在政治方面早已发现的一样。不过通常說的“围着真理的根基加以发掘”总是有好处的，这句话还是不错。一些沒有偏見的人們，趁着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恢复了的机会，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独立的研究，这虽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却是极其有益的脑力工作。真正努力于求取知識的人，从黑格尔那里已經学到了很多東西。

在这篇文章里，我們试图对这个伟大的德国思想家的历史哲学的观点加以評价。这种評价工作，在总的方面，已經由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这一优秀著作中卓越地完成了。这一著作是刊载在《新时代》²⁴⁴上，以后又出版过单行本的。不过我們認為，黑格尔的这种观点完全值得更加詳細地考察一番。

黑格尔在社会科学里的地位首先决定于他对一切社会科学的现象是从生成的过程的观点、即从这些现象的发生和消灭的观点去观察的。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很大的貢獻，因为似乎不

象这样，就不能观察社会现象。不过，第一，我们在下面可以知道，直到现在，这种观点还是那些自称为“进化论者”的许多人所远不能理解的；第二，在黑格尔的时期，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还远落在他后面。只要回忆一下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就够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制度看作是极其有害的，这一点固然不错，可是又把它看作完全是人类错误的偶然产物。经济学家颂扬资产阶级的制度，简直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赞颂它，然而资产阶级制度对于他们也不过是偶然发现了真理的结果。虽然在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已经有了对事物的更正确的看法的萌芽，但是不论是社会主义者、不论是经济学家，都是把真理同错误抽象地对立起来，没有越过这一点再前进一步。

在黑格尔看来，把真理同错误这样抽象地对立起来，是“知性”思维所常常陷入的荒谬情况之一种。让·巴·萨伊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亚当·斯密以前的一切经济学家所讲述的都是错误的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智慧的表现。

在任何时代里，每一种“优越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真理，因而就由于这一点，黑格尔并不会把以前的各种哲学体系当作是陈旧无用的废物而加以抛弃。相反地，用他的话来说，“在时间上最后出现的哲学乃是所有以前的哲学的产物，因此就应该包括所有以前哲学里的各项原则”（《哲学全书》，第13节）²⁴⁵。当然，对于哲学史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是纯粹唯心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领导这种精神工作（指哲学的思想工作。——普列汉诺夫）的是唯一的活跃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思维的特性在于达到自我认识，而在达到自我认识之后，就立即超越已达到的阶段，更向前进”（同上）。

但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并不否认，每一种哲学体系只不

过是自己时代的智慧的表现^①。如果就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說，我們要問，我們現時應該用什么观点去观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那么我們就立即看到，我們同黑格尔的距离要比同薩伊的距离小得多。例如，按照薩伊的观点，即把真理和錯誤抽象地对立起来，那么，重商主义、甚至連重农主义，都应该說是、实际上真被說成只是偶然落到人类头脑里的荒謬思想。可是現在我們都知道，上述的每一种主义，在一定程度內都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如果貨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特別把世界貿易以及与世界貿易直接有关的国民劳动的特殊部門，当作财富或貨币的唯一真正的源泉划分出来，那末，必須注意到，在那个时代，国民生产大部分还是在封建形态中經營，还是当作生活資料的直接源泉而服务于生产者本身。生产物的大部分并不轉化为商品，因而也不轉化为貨币，它們根本不进入总的社会物質代謝之中，因而并不表現为一般抽象劳动的物化，实际上并不形成資本主义的财富。……与資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阶段相适应，那些不被人們所承認的預言家，坚持着交換价值的結实的、可以捉摸的、閃閃发光的形式，坚持着它的那种与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 (Karl Marx,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erlin 1859, S. 138—139)²⁴⁶②。馬克思把重农主义者同他們的反对者之間的爭論解释为关于哪一种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爭論 (Ibidem, S. 35)²⁴⁷③。当資產阶级当时正在发展时，这不正是对于他們非常“适时”的問題嗎？

不过黑格尔也并不把一种哲学看作是那个时代的自然的和必

① 当然，它可以是、并且經常是自己时代的仅仅某些方面的反映。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質。

② [卡尔·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版，第138—139頁]

③ [同上書，第35頁]。

然的产物；他还看到宗教、还看到法律。同时必须指出，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法律、宗教、艺术、乃至技术（《technische Geschicklichkeit》）^①，都是密切地相互联系着的：“只有在这种宗教之下，这个国家组织的形式才存在，并且只有在这个国家组织之下，这种哲学和这种艺术才可以存在”^②248。这一点又可能被認為是不足为奇的；还有誰不知道，国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及一切表现都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呢？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一点。可是黑格尔对于国民生活中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的理解，是同在这以前的許多“有教养的”人們和学生們对这种联系的理解有所不同的。他們似乎以为这种联系是上面所說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之间的简单的相互作用，并且，第一，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身仍然是完全不明白的，第二，——这是主要的一点——他們完全忘記了，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源泉，作为所有这些处在相互作用中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的基础。这样，这个相互作用的体系就成为是没有根基的，悬在半空中的了：法律影响宗教，宗教影响法律，而这两者又分別地和共同地影响哲学和艺术，哲学和艺术轉过来又相互作用，还作用于法律、作用于宗教，如此等等。真正为众所周知的智慧就是这样。姑且說我們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里可以满足于对事情的这种說法吧。可是我們仍然余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以前，宗教、哲学、艺术、法律等等的历史发展究竟是什么决定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人們通常仍然指出那个相互作用，这样一来，到最后，这个相互作用就再不能說明任何事物了；或者指出某

① [“技术的精巧”]。

②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3版，柏林，1848年，緒言，第68页。

一些影响到国民生活的这一或那一方面的偶然原因，可是这些原因相互間沒有共同之处；最后，或者是把整个事情归结为人們的主观邏輯；譬如說，費希特的哲学体系是按邏輯的方式从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得出来的，謝林的哲学是按邏輯的方式从費希特的哲学中得出来的，而黑格尔的哲学則是按邏輯的方式从謝林的哲学中得出来的。艺术中各种不同的派別之間的更迭，也用同样的“邏輯的方式”來說明。当然，这里有一部分真理。可惜的是，这样完全沒有說明什么东西。我們知道，从一种哲学体系或者从艺术中的一个派別过渡到另一种体系或派別，有时是很快地完成的，在几年內就完成了，有时却需要一整个世紀。这种差异是怎样发生的呢？思想之間的邏輯的繼承关系完全不能說明这一点。公認的学术界人物所指出的相互作用和偶然的原因也說明不了什么。但是“有教养的”人們对这一点并不担心。他們絮絮不絕地談論关于国民生活中各方面相互作用这种事物中的奥妙，他們满足于他們这种特有的奥妙之“表現”，可是恰巧在严格的科学思維开始充分取得自己权利的地方停止了思想。黑格尔同这种奥妙思想是有天淵之別的。他說：“如果我們只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去考察某一內容，那末这种考察方法……事实上将是毫无成效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所碰到的只是一堆枯燥无味的事实，而关于中介的要求（这恰巧是应用因果关系时最主要的問題），却仍然得不到滿足。仔細觀察一下就会看到，单单应用相互作用关系，其缺点就在于：这种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它本身还应当被理解。为了要理解相互作用的关系，我們不应当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当做直接現存的东西，应当承認它們是那有着更高的規定的第三者的环节。”^①这就是

^① 《哲学全書》(《Enzyklopädie》), 第 156 节, 附释 249 (參閱列宁:《哲学筆記》, 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146 頁。——譯者)。

說，例如說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我們不能只指出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就滿足，而應該在某种新的、“更高級的”、也就是在某种既能決定它們本身的存在、又能決定它們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的东西里去尋求它們的解釋。

那么，到那里去找到这种新的、“更高級的”东西呢？

黑格尔回答說，應該到民族精神的本性中去尋求这种东西。从他的观点看来，这一点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只是“普遍精神的表述和实现”。普遍精神的运动是通过几个阶段而完成的。“……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識和民族意志的一切方面，民族精神的整个现实，就在民族精神的特性中具体地表现出来；民族意識和民族意志在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倫理、民族的法律、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民族的艺术和民族的技术各方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所有这些特殊的特性都要从民族精神的共同特性去說明，就象反过来这些共同特性可以从历史家所研究的民族生活的事实細节中引导出来一样”^①。

在这里，可以容易无比地得到一个卓越的发现，这就是，上面所說的黑格尔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观点是浸透着最精巧的唯心主义的。正象果戈里說的一样，这一点对于任何人，哪怕是沒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至于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极端唯心主义輕蔑地聳聳肩膀、只是加以“批判”，同样也是容易无比的事。于是就常常有这样的一些人，他們自己沒有能力进行任何种首尾一貫的思維，他們不滿意于唯物主义者只是由于那些人是唯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緒言，第79頁，250

物主义者，他們不滿意于唯心主义者只是由于那些人是唯心主义者，他們非常滿意于自己，因为他們自己的世界观好象是不走任何极端的，可是事实上，这种世界观只是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构成的一种完全煮不烂也完全不能消化的大杂燴而已。至于黑格尔的哲学，無論如何却有一种无可爭辯的价值，这就是，它里面沒有一絲一毫的折衷主义。如果說，黑格尔哲学的錯誤的唯心主义的基础确实使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如果說黑格尔哲学为伟大人物的天才思想的运动設立了过于狭窄的界限，那么，正是这种情况應該使我們对黑格尔哲学給以极大的注意，正是这种情况使黑格尔哲学对人有高度的教育意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本身就包含着足以証明唯心主义站不住脚的最好的、完全无可辯駁的証据。但是同时，黑格尔哲学教导我們在思維中要首尾一貫，有人如果由于愛好和深思熟慮的結果而加入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严格的学派，他就会永远地对于折衷主义的大杂燴保持一种十分有益的憎恶态度……

如果我們現在知道，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不是“普遍精神的表述和实现”，这还不是說，我們可以滿足于对于这个論題的一种流行的論断，即認為任何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道德，而这个民族的道德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宪法，如此等等。我們必須同意黑格尔的意見，即認為道德和政治制度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源泉。至于这个源泉是什么，現代的唯物史觀已經指示給我們了。关于唯物史觀，我們暫時只能指出，折衷主义的先生們要理解它是有困难的，这种困难正如他們要深入理解同唯物史觀正相反对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的奥秘时所有的困难是一样的。

黑格尔每次叙述到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伟大民族时，都显示出他的知識的全面性和深入的洞察力；他作出真正光輝而且极有教

益的一些叙述，在这些叙述中就这个民族的历史的不同方面作了許多极有价值的说明。他使你迷惑了，你也就几乎忘记了你是同一个唯心主义者打交道，你甘愿承认他确实是“die Geschichte nimmt, wie sie ist”（“按照历史的真象去对待历史”），承认黑格尔是严格遵守他自己的规则：“坚守历史主义的、经验的基地”。可是黑格尔为什么需要这个历史主义的、经验的基地呢？原来是为了要决定这个民族的精神的特性。我們已經知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过是普遍精神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普遍精神的特性完全不是从研究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得出来的；普遍精神这个概念是作为一个完全现成的、各个方面都已最终形成的概念而拿去研究的。从这里就得出下面这一点：当历史同普遍精神的概念不相矛盾并且同普遍精神的发展“规律”不相矛盾时，就“按照历史的真象”去对待历史；黑格尔就“坚守历史主义的、经验的基地”。可是如果历史不仅同普遍精神的发展“规律”相矛盾，并且简直越出了这种假设的发展情况的常轨时，历史就是黑格尔的逻辑所不考察的一种东西了，这种历史是不必去注意的。表面上看起来，对待历史的这种态度，最低限度应该使黑格尔免于自相矛盾。但是事实上得到的结果不是这样。黑格尔完全没有避免掉矛盾。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黑格尔对于印度人的宗教观念，用下面的话来说明：

“仁爱、天堂——总之，一切精神的事物——全部被印度人的狂想想象出来，然而在另一方面，他所思想的东西对于他又同样是感性的东西，他……使自己沉沦于这种感性的东西之中。因此，宗教崇拜的各种对象就或者是人工所制作的許多奇怪的形态，或者是自然界里的东西。任何飞鸟、任何獼猴，都是一位现世神、一种绝对地普遍的本質。印度人不能够对事物作出知性的规定，以便观察对象，因为这必须经过反省。”①

根据这种说法，黑格尔认为对于自然物的动物崇拜乃是一种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印度民族的精神是处在普遍精神发展中的低级阶段中的一种精神。古代波斯人崇拜光明，也崇拜“太阳、月亮和其他五星”，他们把这些称为“奥马兹德的受人尊敬的象征”^②。黑格尔认为波斯人要比印度人高一等。可是我们可以看看黑格尔谈到古代埃及人的动物崇拜时的话。

“埃及的宗教崇拜根本是动物崇拜……在我们看来，动物崇拜引起我们的反感。我们可以习惯于崇拜天空，但是对于崇拜禽兽，我们就莫明其妙。然而，那些崇拜太阳和众星的民族，比起那些崇拜禽兽的民族，确实并不较高一等，而是刚好相反地要低一等；因为埃及人从禽兽世界里直观出一种潜伏的、不可理解的原理。”^③

同样的一种动物崇拜，在黑格尔眼中，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只看说的是印度人还是埃及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说印度人崇拜动物同埃及人真有什么不同么？不，这里的问题只在于：埃及的民族“精神”是到希腊“精神”的“过渡”，埃及民族精神在黑格尔的分类中占据一个较高的阶段，因而黑格尔不愿揭破它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在前述印度民族精神中则被指责为低等的东西。同这完全一样的是黑格尔对等级的看法，他在印度遇到等级和在埃及遇到等级时，看法完全不同。印度的等级“是一种自然的区分”，因而在印度，比起在中国来，个人更少可能重视自己，因为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在皇帝之下一律平等的。至于埃及的等级，我们知道，这些等级“并非固定的，却是互相接触和互相竞争的；它们常常解体而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192, 193页。251

② 参阅《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223页。这里的“奥马兹德”是“光明”——“善”的王国的主宰。参阅同书第221页。——译者

③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258页。252。

又重新产生出来”。可是就从黑格尔自己所說的印度的等級的情況已經可以看出，在印度，各等級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互相競爭和互相接觸的^①。在这里，也同关于动物崇拜的問題一样，黑格尔为了顧全那种完全任意制作的邏輯体系，就不得不对于完全类似的社会生活現象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然而这还不是問題的全部。在我們面前，当黑格尔不得不涉及到历史运动的重心由一个民族轉移到另一民族、或者涉及到一个民族的內部情况的变化时，唯心主义的弱点就特別表現出来了。在这些情况中，自然地发生了这种轉移和变化的原因問題。黑格尔，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就到那种精神本身的特性中去寻求解答，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就是这种精神的实现。例如，他对自己发問說，为什么古代的波斯沉淪复灭，而中国和印度却繼續留存呢？他在回答之前先作下述的說明：

“我們首先要排除那种偏見，以为繼續存在是什么优越的事情；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于生命短促、瞬息即逝的玫瑰。”

当然，絕不能把这个預先的說明当作是答案。下面接着就有一番議論：

“在波斯，自由的精神这个原則开始产生，与自然相对立；因此自然的存在就雕謝了、就衰敗了；在波斯帝国里起作用的是脱离自然的原則，所以波斯所占的阶段，較高于沉陷在自然里的那些世界^②。自然的进步的必然性就表現在这里；精神为自己开辟了道路，就應該完成自己的发展。中国人在死后才受到尊敬崇拜；印度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身体，沉溺在婆罗門²⁵³里，在完全沒有意識的状态里活活地死去，或者通过自己的降生而成为一位現世的神^③；

① 关于印度和埃及的等級問題，參閱《历史哲学》，三联書店版，第187頁、249頁。——譯者

② 即中国和印度的“世界”。

③ 即婆罗門。

这兒没有什么变化，不容許有什么进展，因为只有精神到达了独立境地，才可能有前进的运动。有了波斯人的光明^①，才开始有一种精神的直观，这里精神便向自然告别了。所以在这里，我們才第一次发现……客观性是自由的，那就是說，各民族^②沒有变成奴隶，可以保持他們的财富、他們的政体和他們的宗教。真的，波斯同希腊相形見绌的弱点，也就在这一方面。”^③

在这全部冗长的議論里，只有最后几行，談到波斯帝国的内部組織，把它当作是波斯人在同希腊人发生冲突时所表现的弱点的原由的那几行——只有这最后的几行可以說是要說明波斯复灭这一历史事实的。可是这种解释的企图同黑格尔所坚持的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解释是很少共同点的，因为波斯的内部組織上的弱点同“波斯人的光明”之間的联系是很不明白的。就在这里，黑格尔虽然仍是信仰唯心主义，但他至多只是把尚待說明的事实加上一层唯心主义的外衣而已。他的唯心主义到处都遭到同这完全一样的破产。我們再拿关于希腊内部腐化的問題来看。在黑格尔看来，希腊世界是美的世界，是“高尚的道德的德行”的世界^④。希腊人是优秀的、对自己祖国极其忠誠、并且能够作出任何自我牺牲的人民。只是他們在完成伟大的功績时却“缺乏反省”。

在希腊人看来，祖国是一种必然性，沒有祖国，他們就不能生存。直到后来，詭辯派哲学家才建立了一些原則；出現了主观的反省，道德的自我意識，以及每个人都應該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学說。从这时起，上面所說的希腊人的“高尚的道德的德行”就开

① 古代波斯人崇拜光明。

② 指屬於波斯帝国的各民族。

③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270—271頁，254

④ 众所周知，黑格尔是把道德同德行加以区别的。

始腐化了；“内心世界的自我解放”使希腊走向衰落。这个内心世界的^{一个方面就是思想}。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这就是，^{思想这种力量}，除了有其他的作用之外，是作为“使人堕落的原则”而起作用的。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只要看这一点，就是，这种观点较之启蒙学派的那种直线条的看法要大大地深刻些，在启蒙学派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上的成就必然会直接地导向于“进步”的。可是还剩下一个待解答的问题，这种“内心世界的自我解放”是从何而来的呢？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回答说，“精神只能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保持在高尚的道德的德行这种地步内。”但是显然可见，这又是完全没有回答出什么来，只是把问题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重述一次罢了。黑格尔自己好象也感到这一点，所以就赶忙加上一句说，“腐化的原则首先可以从外在的政治发展看得到——从希腊各国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城市内部各党派的相互火并看得到。”^①在这里，我们已站到具体的历史基地上了。用黑格尔自己的话说，城市内部“各党派”间的斗争乃是希腊经济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政党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希腊各城市之间产生的经济矛盾的表现而已。如果我们记得，就连伯罗奔尼撒战争²⁵⁶也不过是扩张到整个希腊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可以从福克迪德^②那里知道），那末，我们就不难作出一个结论，即必须到希腊的经济史中去找寻希腊腐化的原则^③。由此可见，虽然黑格尔自己认为希腊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腐化的原则”的表现，他却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可以说，用黑格尔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323页。255

② 福克迪德（约公元前460—395年），古希腊历史家。——译者

③ 黑格尔自己直率地说过：“拉栖代孟（拉栖代孟，或拉栖第梦，即斯巴达。——译者）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财产上的不平等。”257

的術語來表示的話，唯物主义却原来是真正的唯心主义。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我們几乎可以遇到許多象这样的意外发现。一位最大的唯心主义者似乎抱定目的要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当他論及中世紀的城市时，他一方面按照唯心主义的要求，把这些城市的历史当作是市民同僧侶、同貴族之間的斗爭，而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历史当作是公民中各个阶层相互間的斗爭，即“富有的市民同普通的人民”之間的斗爭^①。当他論及宗教改革²⁵⁸时，他又是首先向我們揭示“普遍精神”的秘密，然后就作出完全不象是唯心主义者的口吻的关于新教²⁵⁹之传播情况的一种說明来。他說：

“在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宗教改革早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武力、詐术和信仰的关系，这些国家里的改革运动終于被压倒下去了，虽然人們常常說，真理一进入了人类心灵的深处，就不能够連根拔出。至于斯拉夫各民族，却是农业的民族。（着重点是黑格尔加的）这种情况，带来了地主和农奴的关系。在农业中，自然力起着主要的作用，人类的劳动和主观的活动，在这里，一般說来是占据較小的地位的。因此，斯拉夫人之接近于主观的自我意識和普遍意識就要緩慢得多、困难得多，并且因而他們就不能参与到已經开始的解放运动中去。”^②

黑格尔在这些話里直接告訴我們，关于一个民族的宗教观点和在这个民族中間发生的一切解放运动，都必須在这个民族的經濟活动中去寻找說明。可是这还不够。按照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說明，国家是“道德观念、道德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就是最明显的

① 对于这一点，黑格尔还說过：“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各城市間的这种不安定的和变化无常的内部生活，以及各党派相互間的經常斗爭，我們就会惊奇地看到，在另一方面，那些地方的工业和海上貿易、陆路貿易一样地发达。至于引起这种工业发达的生活力原则，也就是这种内部兴奋状态所由发生的那同一种原则。”

②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506頁，260

实体的意志，而这种意志自我思維着、自我認識着，并且实现它所思維和認識的东西。”^①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原来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經濟发展的产物。

黑格尔曾經說：“只有在已經有了不同的阶层，只有在富人和穷人都已經很多的时候，并且，只是在出現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多数人已經不再能用他們所习惯的方式去滿足自己的要求，这时候，现实的国家和现实的政府才产生了出来。”^②

黑格尔認為婚姻制度也是同国家一起在历史上产生的，它們的产生也是同人类的經濟史密切联系着的。

“国家的真实起源，国家的第一次建立，同婚姻的确立一起，是完全确实地与农业的发生有关的，因为农业带来了……私有制，从而原始人类在动荡不定中为自己寻求生活資料的那种不安定的生活就过渡到私有权利的稳定状态，过渡到各种需要可以保證得到滿足的状态，同时，用婚姻制度来对性爱加以限制，就轉变为持續結合中的两性关系了；对需要的滿足也就成为对家庭的关心，至于占有物則成为家庭财产了。”^③

我們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来。不过为篇幅所限，我們現在只指出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所賦予的意义。

关于地理环境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在黑格尔之前和黑格尔之后，都有很多人談到过。但是不論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研究者都常常陷于錯誤，即仅仅局限于探究人們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者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視了自然界对社会

① 《法律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257頁。261

②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緒言，第106頁。262

③ 《法律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203頁，注释。263不必說，在当时的科学状况下，黑格尔对于家庭和所有制的最初历史的观点是极不明确的，但是重要之点在于，他已經感到要到什么地方去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了。

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①。至于黑格尔，就不仅在个别方面，并且在问题的整个提法上，都完全避免了这种严重的错误。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1）干燥的高地，同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和平原；（2）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3）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②。

在第一种地区里盛行着畜牧业；在第二种地区里盛行着农业；在第三种地区里则盛行着商业和手工业。由于这种基本差别，居住在这些地区里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各不相同。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就“历史”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说，他们是沒有历史的。他们常常大群地集合起来，象暴风雨一般地侵袭文明国家，在遍地造成毁灭和灾难^③。文化生活是在平原地区开始的，这些平原，由于有河流，所以肥沃丰饶。“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些国度里都产生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盛行着的是农业，农业成为这地方居民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农业是适应于严整的四季进行的，因而也就适合于有条不紊的各种工作；这里便有了土地所有权和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法律关系……”²⁶⁵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人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他们不善于利用自然界供他们支配的各种手段来互相联系。至于沿海居住的人民则完全沒有这种缺点。海并

① 例如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律的精神》一书中往往沉溺于自然界对人类生理的影响的议论。他企图用这种影响去说明许多历史现象。264

② 参阅《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152页。——译者

③ 黑格尔说过：“干燥的高地通向狭小的山间平原，这里居住的是安定的山民，部分从事农业的牧民。瑞士人就是这样。在亚洲也可看到这同样的人民，不过大体上说来，他们没有什么重要。”（参阅《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155页。——译者）

不能使人们隔离，却把他们联结起来了。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正是在沿海的国度里，文化以及随着文化而来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发展的最高度。这种例子并不要到很远处去找，只要指出古代的希腊就够了①。

读者们可能知道梅契尼柯夫的出版于1889年的《文明与巨大的历史河流》一书²⁶⁶。我们在梅契尼柯夫身上所看到的无疑地是唯心主义的倾向，可是一般地说来，他却是立足于唯物主义观点之上的。可是怎样呢？这个唯物主义者对于地理环境的历史作用的想法差不多同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看法完全相同。虽然如果梅契尼柯夫知道了他们之间的这种类似之后，可能是会非常惊奇的。

黑格尔还用地理环境的影响来部分地解释在不同程度中的原始社会之间的不平等情形之产生。例如他指出在梭伦以前的阿契卡省²⁶⁷里，各个阶层间的差异（他把各种在不同程度上的富裕的居民层当作各种阶层：平原居民，丘陵地居民和海滨居民。——普列汉诺夫）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地区的不同。确实，地区的不同以及由此而来的职业的不同，当然会对于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可是在现代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们的意见中，却一直没有运用这一方面的意见，这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黑格尔并没有很好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可是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的天才使他抓住了现象中的最具特点和最本质的一面。黑格尔较之与他同时代的一切经济学家（甚至连李嘉图也在内）更清楚地理解到，在建基于私有制的社会里，一方面财富的增长必然要伴随以另一方面的贫困的加深。他在他的《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一书中，特别是在《法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緒言。

律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一書中,都断然地講到这一点。用他的話說,这是一种辯証法。一方面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因而已經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来滿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財富集中在比較少数人的手中。这就必然引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里,公民社会虽然有大量財富却仍不够富足,这就是說,仍旧缺乏足够的資金以消灭极端的穷困和居民中的最下层(des Pöbels)① 268。

因此之故,公民社会② 就不得不超越自身固有的范围,寻求新的市場,并且求助于世界貿易和殖民政策。在所有与黑格尔同时代的人里面,只有傅立叶才明显地具有这种明确的观点,才如此确切地理解到資产階級經濟关系的辯証法。

讀者大概已經注意到,黑格尔把无产者看作不过是“下层”(Pöbel),認為他們沒有能力利用公民社会的“精神方面的优越性”。黑格尔沒有猜想到,近代的无产階級与古代无产者,例如与羅馬的无产者是多么地不同;他不知道,在現代社会里,压在工人階級身上的重担必然要引起这个階級的反抗,并且在这个社会里,无产階級在知識方面注定是远远超过資产階級的。不过就連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不知道这些道理,在他們看来,无产階級也无非是“下层”而已,无产階級值得令人怜悯和同情,可是沒有任何創造的能力。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善于理解現代无产階級的伟大的历史地位。

現在我們把上述一切加以簡單的概括。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只可能从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他用他的全部天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 285 頁;《法律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 243 頁。

② 这里,他主要指英国而言。

才、用他的辩证法的整个卓越的方法，给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加上了某些科学的性质。他的努力终究不能令人满意。就是他自己似乎也不满意于他所获得的结果，而常常不得不从蒙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峰顶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原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

正是因此，就给科学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在黑格尔死后逐渐完成的向唯物主义的过渡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复到十八世纪的朴素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在我们在此讨论的这个领域中，即在解释历史方面，唯物主义必然要首先求之于经济。如果不这样——就意味着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比起来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了。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不就等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前一世纪^①的唯物主义者是用唯心主义者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并且还是很朴素的唯心主义者。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时，把历史极力解释为思想的历史。在他们那里，阿那克萨哥拉的著名原理“理性统治世界”归结为人的理智统治历史这个原理。他们把人类历史中悲惨的时期仅仅归之于理智的错误。如果某一个国家里的居民还在恭顺地忍受着专制制度的束缚，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些居民还不懂得自由的好处。如果居民们还相信迷信，这只是因为他们受了宗教术士们的欺骗，至于这些宗教术士们则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而想到要利用宗教这个东西。如果人类遭受战争的灾难，这是因为人类没有很好地理解到战争的害处。别的事情也

① 本文写于1891年，所以这里所说“前一世纪”是指十八世纪。以下同。

都是这样。上世紀的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維科就曾說过：“观念的进程取决于事实的进程”。唯物主义者所想的恰巧相反：社会里的事实进程取决于观念的进程，而后者又取决于……姑且就按形式邏輯的規則，取决于知識的积累。

黑格尔的絕對唯心主义同启蒙学者的这种朴素的唯心主义是相距甚远的。当黑格尔重复阿那克薩哥拉所說理性統治世界的时候，他的意思完全不是說人的思想統治世界。自然界是理性的体系，可是这并不是說，自然界被賦予了意識。“太阳系的运动是按照不变的規律而进行的；这种規律就是这个系統里的理性，但是太阳和依此規律圍繞着太阳旋轉的行星並沒有意識到这种規律。”^①

人是賦有意識的，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具有确定的目的；可是从这里还不能就認為历史是照着人們所希望的那样进行的。在人的任何行为的結果中，总会有未能預料到的一方面，正是这一方面常常——更确切些說，差不多总是——构成了历史中最重大的成就，也正是这一方面导致于普遍精神的实现。

“在世界历史中，人类的行为会得出同他們原来所希求的不同的結果。”他們接着他們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活动，可是結果却得到了某些新的、某些虽然潜伏在他們的行动中，但沒有呈現在他們的意識中而且也沒有包括在他們的意图中的东西。^② 国家、民族和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自己的特殊目的。

无疑地，从这一方面看，他們是意識着的、思維着的的活动者。但是，在有意識地追求自己的私人目的时（这种目的通常也渗透着一定的对于善良和真理的普通的热望），他們却无意識地实现着普遍精神的目的。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15—16頁，209

② 同上書，第35頁，270

凱撒企图在羅馬实现个人独裁，这是他的私人目的；可是个人独裁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凱撒在实现自己的私人目的时也就同时是为普遍精神服务^①。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說，历史人物也同整个民族一样，乃是精神的盲目的工具。精神在这些人物面前放上他們的私人目的作为诱餌，再用热情这个馬刺来驅使他們（沒有这种热情，历史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做不出来的），这样就迫使他們为自己工作。

对于人說来，这里没有什么“无意識”的神秘之处。人的活动必然要反映到他們的头脑中，但是历史运动并不为这种反映所决定。事实的进程并不取决于思想的进程，而是取决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又不为人所意識到的某种外来的力量。

人在活动中任性而为或深思熟虑，这种偶然性讓位于合乎規律的状态，从而也就是讓位于必然性。同法国启蒙学者的朴素的唯心主义比較起来，“绝对唯心主义”无疑地有其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就在这里。绝对唯心主义对于朴素的唯心主义的关系就象一神教对于拜物教和魔法的关系一样。魔法不認為自然界里有什么合乎規律的状态，它認為“事实的进程”在每一分鐘都可以为魔法师的干涉所破坏。一神教認為自然界里的規律是神制定的，可是它認為（至少在它发展的高級阶段上，当它不容許奇迹时）事实的进程取决于这种制定后就一成不变的規律。这样，一神教就給科学留下了广闊的余地。绝对唯心主义也是这样，当它到某种不以人的任性为轉移的力量中去找寻历史运动的解释时，就給予科学一种任务，即按照規律去解释历史現象，这个任务如能解决，就能取消所有关于精神的假設的必要了，因为在这种解释工作中，关于精

^① 参閱《历史哲学》，三联書店版，第69頁。——譯者

神的假設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如果前一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可以歸結為人類理智統治歷史這個原理，那麼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就可以用下面的話來表示：從今以後，一切都將要按照開明的理智、即按照哲學去安排、去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絕對唯心主義者黑格爾卻賦予哲學一種謙遜得多的任務。

我們可以在《法律哲學》序言中讀到：“關於世界應該是怎樣的這種訓示，哲學常常是很遲才作出來的。就象世界的思想一樣，哲學是在現實世界完成了它的形成過程、從而呈現了完成的形態以後才出現的……當哲學在灰色的現實背景上用灰色筆調開始書寫時，青年時期已經不可能回復了，只能去認識這個青年時期；密納發的梟鳥是到黃昏才飛起來的。”^①

黑格爾在這裡無疑地是跑得太遠了。我們完全同意說，“哲學”不能使衰頹的、過時的社會制度復活，不過要問問黑格爾，什麼東西阻止了他，使他不能對我們指出——當然只是在一般特點上——那將要代替舊社會制度的新制度的性質。“哲學”是在現象的生成的過程之中考察現象的。而在生成的過程中有兩方面：產生和消滅。這兩方面可以作為時間上互相分開的兩方面去考察。可是不論在自然界、或者特別是在歷史中，在每一個一定的時間里，生成的過程都是一個雙重的過程：舊的東西消滅着，同時新東西從舊的廢墟上產生出來。難道這種新東西產生的過程對“哲學”永遠是不可知的嗎？“哲學”要認識存在的東西，而不是要認識按某人某人的意見應該存在的東西。不過，在任何一定的時間里，存在着什麼呢？存在的正是舊東西的消滅和新東西的產生。如果哲

^① 《法律哲學》（《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23--24頁。271

学只能認識旧东西的消灭，这种認識就是片面的，哲学就不能实现自己認識实际的任务。但是这是同黑格尔認為認識能力（理智）是无限的这种信念相矛盾的。

最新的唯物主义沒有这种局限性。最新的唯物主义根据什么东西現在存在着以及什么东西已經过时，就能够判定什么东西将要产生。可是不應該忘記，我們所謂什么东西将要产生这个概念，是同将来應該发生（sein sollenden）这个概念本質上有所不同的，前面所引黑格尔說的密納发的梟鳥这話就是反对后面这个概念的。在我們看来，将要产生的东西乃是那已經过时的东西的必然产物。我們之所以知道将要产生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另外的东西，这一点應該归功于使我們認識那正在产生的东西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我們并不把自己的思維来与我們周围的存在相对立。

但是黑格尔所与之进行論战的那些人并不是这样来观察問題的。他們認為思維可以任意地改变存在发展的自然进程的面貌。因此他們沒有看到研究这种进程的必要，也沒有看到有必要去考虑这种进程。他們关于應該发生的东西的观念，不是在对围绕他們的现实加以研究之后，而是根据对于他們所处时期里的公平而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意見形成的。可是这种意見却不过只是他們周围的现实界（主要地还是现实的否定的一面）所提示給他們的而已。把这样的一些意見作为根据，就意味着遵奉那同一现实的指令，这种指令是未加任何批評、也沒有借助于对提出这种指令的现实加以研究而对之加以任何檢驗就籠統地接受过来的。这样做法，就等于是要想努力去熟識一个对象，却不直接去观察这个对象，而要去观察这个对象在凸面鏡中的映象。錯誤和失望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愈是忘記了他們关于“将来應該发生的”这个观念是从他們周围

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这一事实，人们愈是相信他们憑持这种观念就能随心所欲地对待现实，那么，在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同他们所达到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愈大。試看現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法国启蒙学者所幻想的那个理性的王国是相距得多么遥远啊！人们如果忽视了现实，就不能从现实的规律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他们只能丧失預見这些规律的作用和利用这些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目的就成为达不到的了。所以站在启蒙学派的观点上，无非就意味着把自由和必然抽象地对立起来。

乍一看来，如果在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必然性，那末，历史中似乎就没有人类自由活动的地位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錯誤，这个錯誤已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所糾正。謝林就已指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看法是：自由就是必然，而必然也就是自由^①。黑格尔最終地解决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二律背反。他指出說，我們只有在認識了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服从这些规律、依靠这些规律的限度內，才是自由的。这一点是在哲学方面、也是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可是，只有現代辯証唯物主义才充分

① 謝林指出，脱离了必然性的自由是不可思議的。‘一个人在奋不顾身、牺牲自己时，如果不具有一种信念，即相信他这个个体所从屬的那一种生物是在絕不停留地胜利地前进着，那么，他还能作出自我牺牲嗎？至于这种信念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唯一的而且是絕对的源泉就是由于我們享有自由。这里，我們必須探求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超越于人的自由之上的，并且在我們的一切活动和全部行为中，我們都可以指望这种唯一的不可动摇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指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出一件具有重大后果的事业来，因为即使一切后果都考虑到了，这些后果仍然常常会受到其他方面（也同受到自由的实体方面一样）的干涉而发生变化，以致某种我們絕未料想到的事情会从我們的一切行为中产生出来。只有在我的行为由于我自己决定，即由我的自由所决定时，我有义务要采取某种决定时，我对我的行为的后果才完全安心而不疑，但是我的行为的后果或者从这些后果中引出的对我的整族的影响絕不是由我的自由所决定的，而是由某种其他的和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的。’（《先驗唯心主义体系》，《謝林全集》，第3卷，斯图加特与奥格斯堡版，1858年，第595頁。）272

地利用了这个成果。

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要以辩证的思维方法为前提。辩证法是在黑格尔之前已经为人们所知道的。可是黑格尔较之他的前辈中的任何人都要善于利用辩证法。辩证法在这个天才的唯心主义者手中成为认识一切存在物的强大工具。黑格尔说过：“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科学内容借以取得内在联系和必然性的唯一的原則……在我們通常的意識里，不坚持抽象的知性規定，似乎是一种普通明智的誠律——按照‘自己生活并讓他人生活’这个規則，于是一切都好得很了。可是問題的實質在于：一切有限物不仅自外受到限制，并且由于它本身內在的特性必然要被消灭而过渡到自己的对立面。”^①当黑格尔还信仰辩证法的时候，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我們說，一切事物（即一切本身是有限的物）都应该由辩证法来审查，这样一来，我們就把辩证法規定为一个普遍的、不可克服的力量，它必然要破坏一切，不論这一切在表面上是多么稳定。”当黑格尔說严肃地把握辩证法并对之作清晰的理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时，他是完全正确的。辩证方法是德国唯心主义的繼承人、即現代唯物主义从德国唯心主义的遗产中获得的一项最主要的科学工具。

不过唯物主义不能在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外貌之下来利用辩证法。必須首先使辩证法摆脱它的神秘主义的外壳。

卡尔·馬克思，这个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是一个在天才的智慧方面絕不下于黑格尔的人，是这个伟大的哲学家的真正的新生。馬克思完全有权利說到他自己，說他的方法是与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在黑格尔，思维过程——他在‘观念’的名称下，

^① 《哲学全書》（《Enzyklopädie》），第81节与補遺。273

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界的創造主；现实只是它的外部現象。反过来，在我，观念不外是人类头脑中变位了变形了的物質。”^①

由于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被提升为一个完整的、首尾一貫的和彻底的世界觀。我們已經知道，前一世紀的唯物主义者在历史方面还是极其朴素的唯心主义者。馬克思把唯心主义从它这个最后的避難所中驅逐出去了。他同黑格尔一样在人类历史中看到不依人的任性为轉移的合乎規律的过程；他同黑格尔一样对一切現象都在它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中去考察；他同黑格尔一样，不满足于对历史現象作形而上学的、空洞无物的解释；最后，他也同黑格尔一样，致力于寻求社会生活中一切作用着和互相作用着的力量之間的普遍的統一的源泉。可是他不是在絕對精神里去找这种源泉，而是在經濟发展的本身中去找。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当唯心主义就是在黑格尔的强有力而精巧的手中也成为軟弱无力和毫无作用的武器时，黑格尔也不得不求之于經濟发展。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这是偶然的，是或多或少的天才的推測。到了馬克思，这就是严整的科学的探討了。

現代辯証唯物主义較之唯心主义更加闡明了这个真理，即人們創造历史是不自覺的；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进程归根結底并不是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而是物質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唯物主义并且知道“密納发的梟鳥”在什么时候开始飞翔，可是它在这个鳥的飞翔中，也同在其他許多事物中一样，并未看到什么神秘难解的东西。它巧妙地把唯心主义所发现的自由和必然之間的联系运用到历史中去。当历史发展的动力还在人的背后起着

^① 《資本論》(《Das Kapital》), 第二版跋, 第19頁, 274

作用而不为人所意識的时候，人类曾經是，而且應該是無意識地創造历史的。可是，这些动力一旦被發現，它們起作用的規律一旦被研究，人类就能够把它們掌握在自己手里，使它們服从于自己的理性。馬克思的功績正是在于他发现了这些动力，并且对它們的作用进行了縝密的科学的研究。在庸人們看来，現代辯証唯物主义势将把人类变成自动机械，可是事实上，現代辯証唯物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开辟了通向自由和自觉活动的王国的道路。不过要走进这个王国，只有把目前的社会活动加以根本改变才有可能。庸人們也意識到、或者至少是預感到这一点。正是这样，所以唯物史觀招致了他們的万分怨恨和万分煩惱；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沒有一个庸人能够、或者願意充分地理解馬克思的原理，也沒有一个庸人能够或者願意充分地掌握馬克思的原理。黑格尔把无产階級当作群氓。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者，无产階級則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未来时代的体现者。只有无产階級是能掌握馬克思的学說的（我們不談那些例外），我們正在看到，事实上，无产階級正在日益深入地掌握馬克思学說的內容。

世界各国的庸人們正在大事喧嚷說，馬克思主义文献中，除了《資本論》外，沒有一本大的著作。但是第一，这是不真实的，第二，即算这是真实的，这一点也証明不了什么。如果一种思想每天都使整批整批的信仰它的人接受这种思想，如果这种思想为一整个社会階級开辟了新的广闊的前景，难道还能說这种思想是停滞不前的么？

黑格尔曾經以很大的热忱談到过雅典人；在雅典人民之前，表演过爱修拉斯和苏福克拉斯的悲剧；对这些人民，伯里克理斯发表过他的演說，并且从这些人民中間“出現了許多人物，他們成为几百年間的典范。”^① 我們对黑格尔的这种热忱是能理解的。不过必

須指出，雅典人乃是奴隶主階級的人。伯里克理斯并不是对奴隶演說，而伟大的艺术創作也不是供奴隶欣賞的。在我們这时代，科学却要献給工人，我們有充分的权利用兴奋的心情去注視現代工人階級，一些最精深博大的思想家都面向着工人階級，最具天才的音乐家們也向工人階級演出。最后，只有目前，科学与工人之間才結成了密切无間的联盟，这种联盟在全世界的历史中奠定了一个伟大而富有成果的时代的基础。

人們有时說，辯証法的观点与进化論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两种方法有彼此符合之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二者之間也存在着极其深刻而重大的差別，而且必須承認，这种差別远不能表示进化論的优越。現代的进化論者在他們的学說中增添了大量的保守主义的气味。他們想要証明，在自然界和历史中，都是沒有飞跃的。至于辯証法則很清楚地知道，不論在自然界、在人的思想和历史中，飞跃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辯証法也并不忽視一种不可爭執的事实，即在一切变化的契机中，都有同样的不间断的过程在起着作用。辯証法只是努力去闡明逐漸的变化必然地过渡到飞跃的各种条件②。

① 參閱《历史哲学》，三联書店版，第305—306頁。——譯者。

② 黑格尔极其明显地指出过，仅仅从量变的观点去說明現象，是多么地荒謬。他說：“关于发生的漸進性的假設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正在产生的东西，是感性地存在着或根本在现实中就已經存在着的，仅仅由于太小而还不能被人感知；正如关于消失的漸進性的假設，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的：非存在或代替正在消失的东西的他物也是存在着的，但还看不出来。——而且，这里所謂存在着并不是指：在現存的某物中已經包含他物于自身，而是指：他物已是現有的存在，只是还看不出来而已。因而，发生和消失一般地都被揚弃了。……而本質的差別或概念的差別則变成外部的、仅仅是量的差別。——用关于变化的漸進性的假設来理解发生和消失，就不能避免无聊的同語反复，因为那意味着：正在发生或消失的东西，預先就已經是現成的了，而变化則成了外部差別的簡單替換，这样，实际上就是同語反复。”（《邏輯学》，紐倫堡，1812年，第1卷，第313—314頁。）275

在黑格尔看来，乌托邦在历史中具有一种表征的意义：乌托邦揭示出这一时代所固有的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对于乌托邦也作了这同样的评价。目前正在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并不是各种改革家的空想的计划所决定的，而是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所决定的。正因为这样，与整个上一世纪完全相反，在当今这个时代里，改革家已经不再成为乌托邦主义者，而成为想阻住历史车轮的社会人物。最足以标志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即在于，不是改革家，而是他们的敌人走向于乌托邦。为现有的这个丑恶的现实作辩护的那些乌托邦主义者自己相信、也希望别人相信，这个现实里具有各种优越之处，因为只要把其中的某些弊端加以革除就行了。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不由得想起了黑格尔关于宗教改革所说的一些论调。他说：“宗教改革是教会腐败的结果。教会的腐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腐败还不仅仅是滥用权力和权威的结果。一般常常把滥用权力视为腐败的原因。同时认为，基础是好的，事物本身是没有缺点的，只是一种热情，一种主观的兴趣，一般地说来，人的偶然的意志利用了那种本身是好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因此，只要把这种偶然性消除就行了……在这种观点下，那个事物本身就受到原谅，而且只用某种外在的东西来说明罪恶。但是假如一件好事物当真是偶然被滥用的，这只是个别情形；至于说到如此广大普遍而巨大的罪恶，又是存在于象教会这样一个广大普遍的事物里面的，那么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① 所以毫不奇怪，黑格尔对于所有那些在问题是“事物”本身的根本变化时而喜欢在“偶然的”缺点上找寻借口的人们，是很少赋予同情的。这些人们对于渗透在黑格尔哲学中的那种勇敢的、猛烈的精神是感到惊恐的。

^① 《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第497—498页。276

从前曾經有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革新者阵营里的人也反对黑格尔。黑格尔对于当时普魯士的现实所持的庸俗态度使这些人对这个哲学家发生厌恶。这些反对黑格尔的人是大錯了：他們沒有在反动的外壳下面看到这个体系中的革新的内核。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人对于这个伟大思想家的厌恶还是从純正的动机出发的，这种动机还是值得重視的。到了我們这时代，资产阶级的有学問的代理人也斥責黑格尔，却是因为他們理解到、或者至少是本能地感到了黑格尔哲学的革新精神。由于这同样的原因，人們現在对于黑格尔的功績慣爱不置一辞，还热衷于用康德来与黑格尔对立，几乎所有的講師們都以贊頌“科尼斯堡的思想家”^①为己任。我們也衷心愿意給康德以应有的評价而不否認他的貢獻。可是我們看来，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爱好批判主义，并不是由于后者有力量，而是由于它有弱点，这种情形是极可令人怀疑的。康德的批判主义体系所固有的二元論最能吸引現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二元論在“德性”方面是最有利的东西。借助于二元論，可以建立最誘惑人的理想，可以在“美好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漫游，而一点不必顧及到把这种“理想”体现为现实。究竟比什么美好呢？譬如說，在理想里可以完全消灭阶级的存在，消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剝削，而在现实里面却为一个阶级的国家作辯护人，如此等等。在黑格尔看来，那种流行的、認為理想似乎是不能在现实中实现的見解，簡直是对于人类理性的一个絕大的侮辱。“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如所周知，这个原理不仅仅在德国，并且在德国之外，特別是在俄国，曾經引起了許許多多的誤解。这些誤解的原因，應該說是在于对黑格尔所賦予“合理”与“现实”

^① 指康德，康德出生于科尼斯堡。——譯者

两詞的意义理解得不明确。看起来，如果对这两个詞只是給予通常的庸俗的解释，这个原理的前一半、即“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还可看成具有改革的内容的。这句话适用到历史中时，只能解释为一种坚定的信念，相信凡是合理的都不会只是“彼岸的”，而一定要过渡到成为现实。如果没有这种对前途的信念，改革的思想就失去了一切实践意义了。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历史乃是世界精神（即理性）在时间中的表现和实现。那末，从这个观点怎样去解释社会形态的经常更替呢？要解释这种更替，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考虑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合理的变为荒谬的，善变为恶”。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对于过渡到自己的对立面、即变成为荒谬的东西的合理的东西，不必再有什么顾虑。当凯撒取得国家权力的时候，他破坏了罗马的宪法。表面上看起来，这种破坏宪法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罪行。凯撒的敌人有一切理由把自己看作是保卫法律的人，因为他们是在站在合法方面的。可是他们所保卫的法律，“只是形式上的法律，已经失去了生机，并且为神所抛弃了。”既然只有从形式方面看，破坏这种法律才是一种罪行，所以要說尤利·凯撒这个破坏罗马宪法的人是无罪的，事实上是再容易不过的。

苏格拉底曾经被谴责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德的敌人，黑格尔对苏格拉底的命运曾经表示道：“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意识地认识了并且说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则。这个更高的原则是有绝对的权利的。……这是整个世界史上英雄们的职责；通过这些英雄才涌现出新的世界。这个新的原则是与以往的原则矛盾的，是以破坏的姿态出现的；因此英雄们是以暴力强制的姿态出现，是损坏法律的。作为个人，他们都各自没落了；但是这个原则却贯彻了，虽然是以另一种方式贯彻的，它颠复了现存的东西。”^① 这里所引的话本身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黑格尔看来，走上世界历

梁

梁

211

史舞台的不仅仅有英雄們，不仅仅有单个的人，而且还有整批的人民，只要他們体现着新的全世界历史的原则就可以了。如果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問題就更清楚了。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权利所及的活动范围是极其宽广的：“如果违反了它的这种绝对权利——当作全世界精神的发展中统一阶段的体现者的权利——其他人民的精神就是不合法的。这种人民的时代就过去了。因而他們不再属于全世界历史的范围中了。”②

我們知道，在現在这个时代，新的全世界历史的原则的体现者不再是某一个单独的人民，而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了。不过，如果我们說，就同这个阶级的关系来說，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只在它們能够支持这个阶级的限度內，才能进入全世界的历史范围內。这时，我們仍是忠实于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的。

一往直前、在任何事物面前都不停止，向着伟大的历史目标前进而努力——这就是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遺訓。

① 《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第2卷，第120頁，277

② 《法律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第347节，278

[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費尔巴哈
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
俄譯本第一版所写的序言
(《譯者的話》)和注释]²⁷⁹

譯 者 的 話

当恩格斯的《費尔巴哈論》这部杰作的譯文問世的时候，我想略为談談它对俄国讀者的意义。

現在我們这里洋洋得意的反动派也披上了哲学的外衣，例如，《哲学和心理学問題》杂志²⁸⁰就証明了这一点。六十年代的否定派被誣蔑为极其輕率的华而不实的东西，而阿斯塔夫也夫分子、洛帕廷分子以及类似他們的愛智派，却被認為是哲学上的伟人（見亞·柯罗鮑夫斯基先生所叙述的《俄国人的哲学》，該篇附在他譯的宇伯威希-海因澤的《近代哲学史》一書中）²⁸¹。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要理会这个哲学反动派，因而就要研究哲学。在哲学領域中，也象在經濟和政治的領域中一样，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最可信賴的領導者。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是集了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的大成。

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簡練。因此我必須給它加上若干注释。其中較长的注释附于書末，用注碼标明。此外，書中还有两个附录，一个附录（《卡尔·馬克思論費尔巴哈》）是在德文版中就有的，另一附录（《卡尔·馬克思論法国唯物主义》）是从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的《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mp.》, Frankfurt a. M. 1845(《神圣的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之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中摘录下来的。但我不是直接从中摘录下来的, 因为该书是奇缺的珍本书。²⁸²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一章, 我是从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杂志《Neue Zeit》(《新时代》)上翻译过来的, 在数年前该杂志曾转载过这一章。²⁸³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关于布·鲍威尔可参阅注释^④)的论战, 在全世界文献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最新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哲学的首次坚决的发动。这次发动无论就其历史意义或内容来说(仅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部分来判断), 都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它在俄国仍然可以起巨大的作用, 因为在俄国, 甚至连最进步的著作家对社会生活仍然顽固地坚持唯心主义的观点。倘若我们手头有这部著作, 那我们会乐意地促使该书用俄文出版。但何时可以如愿以偿, 我不得而知, 目前只好满足于翻译其中的一章^①。这一章和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的言论有密切的联系, 它是相当完整的, 就其思想的丰富性来说, 该章远远超过了朗格的那部论述近代唯物主义的篇幅浩繁的名著。²⁸⁵ 我们提醒读者特别注意马克思所指出的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针对斯达克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²⁸⁶写的。但在《费尔巴哈论》中却很少谈到这本书, 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在序言中谈它了。至于一些必要的资料, 读者可以看注释^⑤。

格·普列汉诺夫

1892年6月

^① (1905年版注) 该书收在梅林所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r. Engels, 1841 bis 1850》) 284第2卷中。

〔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费尔巴哈……》
一書俄譯本第一版所写的注释〕

①²⁸⁷ 作者是指海涅論德国的几篇文章，它們最初发表在《Revue des deux Mondes》（《两个世界評論》）上，以后又出过单行本（单行本第一版的序言所注的日期是1834年12月）。讀者可在《海涅全集》中找到他的这篇出色的作品。²⁸⁸ 可惜它的俄譯本却被書报检查机关弄得面目全非了。

近代的阿里斯托芬对待他同时代的哲学，同那位天才的希腊人对待“詭辯学派”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不仅了解德国哲学的革命意义，而且正由于它有革命意义，才对它表示热烈的同情。但是，海涅在其論德国的書中，关于康德（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的革命（被他夸大的）意义比黑格尔的革命意义談得多。关于黑格尔，早在四十年代他就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意見。在保存下来的他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論德国》的信的断片中，我們发现作者跟“哲学之王”在談諧地交流思想。“有一次，当我发现对‘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有点困惑不解时，‘哲学之王’頗有点奇怪地发笑起来，并指出：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指一切合理的东西都应当存在。之后他惊惶地环顧左右，而又平靜下来，并相信只有亨利希·比埃尔听见了他的話。”²⁸⁹ 在这里，亨利希·比埃尔究竟是誰，这是无所謂的。这里应当指出的只是：海涅認為黑格尔本人了解自己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害怕去发现它。这样一种对黑格尔的看法，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这又是另外一个問題，对这个問

題，在我所推荐的这本小册子里已經作了回答。然而有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即海涅本人决不屬於那一类对黑格尔哲学所得出的結論表示害怕的、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的人物。在所引用的那段對話中，海涅改变了黑格尔的著名原理，不提現实的東西，而泛泛地談存在的東西，这不是无意的。显然，海涅是想表明，尽管一些很少知道黑格尔哲学的奥妙所在的人在口头上庸俗地談这个原理，但它仍旧保持其革命的意义。

②290 大家都知道，如何理解黑格尔所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学說，这个问题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我們的哲学界中，曾起了巨大的作用。正由于这个问题，俄国著作家中間一位头脑最清醒的著作家別林斯基，可以說是演了一幕悲剧。他的关于孟采尔和波罗底諾紀念日的两篇論文²⁹¹，对敢于斥責“现实”、即斥責人們周围社会关系的人們，充滿最辛辣的敌意。后来他非常不喜欢提起这两篇文章，認為它們是可耻的錯誤。他在积极地否定腐朽的俄罗斯制度时，已不拘泥于关于这些制度似乎是合理的任何哲学見解了。別林斯基之后按照同一方向从事著述的人，都認為无須回复到黑格尔去，无須检查这位天才批評家在其保守傾向时代所依据的那些理論前提。在他們看来，这些前提中除了錯誤之外什么都沒有。現在一些“进步的”俄国著作家也抱着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正确嗎？

赫尔岑在《往事和追思》中叙述他是用什么样的邏輯方法过一个理論关口的，这个关口乍一看来（应当指出：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极其肤淺的）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学說。他肯定說，这一学說不过是充足理由律的新的說法。但是，充足理由律却根本不能証明任何現存社会制度的正确。如果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有产生和发展专制制度的充足理由，那末，十二月党人的解

放运动，显然也有其充足的理由。假使专制制度在这种意义上是“合理的”，那末，想永远结束这种制度的愿望也同样是“合理的”。因此，赫尔岑肯定说，黑格尔的学说可以说是一切解放斗争的理论根据。这是真正的革命代数学²⁹²。

从最终的结论来说，赫尔岑是完全对的。但是这一结论他是通过错误的途径得出的。我们现在试举例来说明这点。

恩格斯在发挥黑格尔的思想时说道：“罗马共和国固然是现实的，但排斥了这个共和国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试问：为什么帝国代替了共和国呢？充足理由律只向我们证明说：这个事实不能是毫无原因的。可是，应当在何处找寻该事实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它却没有告诉我们任何线索。也许共和国之所以让位于帝国是因为凯撒比庞培具有更多的军事天才；也许是因为卡西夷和布鲁特犯了错误；也许是因为屋大维诡计多端，也许还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但黑格尔并不满意诸如此类的解释。按照黑格尔的见解，偶然性只不过是外壳，在其下面隐藏着必然性。当然，关于必然性的概念也可以极肤浅地加以解释；可以这样说，罗马共和国的崩溃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只是因为凯撒战胜了庞培。但是在黑格尔的学说里，这一概念具有另一种无比深刻的意义。假使黑格尔说某一社会现象是必然的，那在他看来，这就是说，这种现象是为它所在的那个国家以往的整个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在这种进程中应当找到此种现象的原因。因而，罗马共和国之所以崩溃，不是因为凯撒有天才，布鲁特有错误，或者因为其他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有错误，而是因为，在罗马的内部关系方面发生了某种变动，由于这些变动才使得共和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变动呢？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黑格尔本人的回答常常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黑格尔对社会现象所持的观

点，比起那些只懂得沒有原因就沒有結果的人的观点来，要深刻得多。但还不止此。黑格尔还强调指出了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真理。他说：任何一类现象的总和，在其发展过程中，从自身中创造出否定它即消灭它的那种力量；因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从自身中创造出那种摧毁它和用新制度来代替它的社会力量。由此就自然而然地得出下列的结论（尽管黑格尔并没有强调指出这一点）：如果我对某一社会制度抱否定的态度，那末，我的这种否定只有当它符合于这种制度内部所产生的那种客观的否定过程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种制度失去其历史意义而和产生它的那些社会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是“合理的”。

现在我们试将这种观点应用于曾使三十年代的俄国知识青年激动的那些社会问题。俄国的“现实”——农奴制、专制制度、具有无上权力的警察、书报检查机关等等——在这些青年看来显然是腐朽的、不正当的。因此他们不禁以同情的心情回想起不久以前十二月党人想改善我们社会关系的尝试。但是他们，至少是其中最具有才干的人，已经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任何抽象的革命的否定，不满足于浪漫主义者的任何自负的和自私的否定。由于黑格尔的缘故，这些青年的要求已经更加严格了。他们对自己说：“证明自己否定的合理性吧！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证明自己否定的正确吧！或者就把这种否定当做个人的嗜好、孩童的任性而抛弃吧！”但是，用俄国现实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来证明对这种现实的否定的正确，就是解决一个黑格尔本人不能胜任的任务。就拿俄国农奴制来说吧。要证明对这个制度的否定是正确的，就是要指出：这个制度自己在否定自己，也就是说，现在它已经不能满足产生它的那些社会需要了。究竟是哪些社会需要促使俄国农奴制产生的呢？这就是国家的经济需要，如果国家不使农民变成农奴，它就会

因经济枯竭而灭亡。因而应当指出，在十九世纪，农奴制已经成了满足国家经济需要的最坏的手段，它不仅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反而直接妨碍这些需要的满足。后来克里米亚战争就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切。然而我们再重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乃是黑格尔本人所不能办到的。按照黑格尔哲学的直接意思来说，其结论就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历史运动的原因是在它的内部发展中。这就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可是黑格尔本人违背了，而且也不能不违背这一非常正确的观点。“绝对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观念”的逻辑特性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原因。这样一来，观念的特性就成了历史运动的根本原因了。每当重大历史问题摆在黑格尔面前的时候，他首先用这些特性来说明它。但这样做就是扔掉历史的基础，并自愿地使自己根本不可能找到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黑格尔作为一个极伟大的、真正天才的人物，也觉得事情并不十分妙，老实说，他的解释完全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此，他在给“观念”以应有的估价以后，就赶快回到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上，寻找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但已不是在观念的特性中，而在他当时所研究的社会现象本身中去寻找了。同时他时常发表一些最有天才的猜测（因为他看出历史运动的经济原因）。但天才的猜测毕竟是猜测而已。它们缺乏牢固的、恒久的基础，因而在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中，它们也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因此当这些猜测发表出来的时候，它们几乎没有受到重视。

黑格尔给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所指出的伟大任务，始终没有被解决：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的内部原因仍然没有找到。不言而喻，当时在俄国不可能出现一个能够找到这些原因的人，因为俄国的社会关系太不发达，俄国的社会停滞现象太顽固，以致这些所要寻找的原因不可能浮现到俄国社会现象的表面上来。在西方，这

些原因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来了。然而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若干年之后，在我們所談到的那一时期里，那里的黑格尔主义者一否定派还陷在唯心主义的矛盾中。叙述过这一切之后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俄国年輕的黑格尔信徒开始就和俄国的“现实”彻底妥协，順便提一句，俄国的“现实”是非常腐朽的，以致連黑格尔本人都从来没有承認它是“现实的”。他們对现实的这种否定态度，由于在理論上没有得到証明，因而在他們看来就丧失了任何合理的存在权。他們放弃这种态度，自我牺牲地和大公无私地为哲学的忠誠而牺牲自己的社会願望。不过另一方面现实本身却又逼使他們不能作出这种牺牲。但腐朽不堪的现实每日每时都在使他們望而生厌，迫使他們無論如何要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說，即使沒有充足的理論根据，但也要采取否定态度。可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們对现实的悬求讓了步。別林斯基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断絕关系后，他就激烈地攻击不久前还为他所維護的制度。当然，从別林斯基方面來說，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必須承認，由于这样一种做法，这位天才的著作家降低了自己理論上的严格要求，就承認了：自己以及以自己为代表的整个俄国先进思想界，对理論來說，是沒有償還能力的負債人²⁹³。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有时对俄国社会生活說出极其深刻的看法。例如，他在四十年代末的一封信中說，只有資產階級即只有資本主义才为真正地和順利地否定丑惡的俄国现实創造基礎。²⁹⁴但是总的說来，在他所謂的否定中，对社会現象仍然抱着空想主义的观点。車尔尼雪夫斯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主觀的”著作家以及（同时代的）各派革命家都抱着类似的观点。事情愈向前进展，黑格尔被忘記得愈干净，俄国的否定派就越少意識到他們的社会观点渊源于某种理論上的錯誤，这是好的。我們的“主觀的”著作家們把沒有

科学根据的东西当作信条。他们竭力向俄国社会思想界证明理论的贫乏，以为他们在给俄国社会思想界制造一种最称心的和有价值的文件。但这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七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一些挫折，足以使俄国社会思想界不再醉心于自己的一些没有根据的论点。在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颠倒过来”之后，即把他的哲学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后，四十年代俄国哲学界尚未解决的理论任务就很容易解决了。马克思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内部原因。只有用马克思的观点去看俄国的社会关系。而社会民主党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常常是各不相干地得出对俄国生活的相同看法。以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思想界终于汇成一条十九世纪科学思想的洪流。旧的西欧主义者的理论错误得到了补救，因为在俄国的现实本身中已经找到把这种现实加以否定的牢固的客观基础。（参阅我的文章《Zu Hegel's sechszigstem Todestage》（《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载于《Neue Zeit》（《新时代》杂志），XI，1891，以及1898年我在日内瓦的讲演《维·格·别林斯基》）²⁹⁵、

②²⁹⁵ 黑格尔主义者亨宁在1827年开始出版《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liche Kritik》（《科学评论年鉴》），来传布和捍卫其老师的观点。但是亨宁抱着保守派的观点，所以他的杂志不能满足青年黑格尔派。在1838年，阿·卢格和爱赫特尔迈尔创办了《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在1841年，该杂志迁到莱比锡出版，同时改名为《Deutsche Jahrbücher》（《德国年鉴》）。《德国年鉴》无论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抱着激进派的观点。1843年该杂志在萨克森被查封，当时阿·卢格和马克思决定在巴黎继续出版该杂志，定名为《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该杂志的撰稿人有恩格斯和海涅。然而很遗憾，《德法年鉴》仅仅出过一

期双刊号。順便提一下，在这一期中曾刊载有馬克思的出色的文章：《Einleitung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88年在日内瓦用俄文出版）和《Zur Judenfrage》（《論犹太人問題》）以及恩格斯的同样出色的文章：《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在《Neue Zeit》（《新时代》杂志）第九年度第8期上曾轉載过該文）²⁹⁷。

《Rheinische Zeitung》（《萊茵报》）²⁹⁸是康普豪森、汉茲曼及其同道者創办的。馬克思是該报的最积极的最有才干的撰稿人。1842年（10月中旬），他当了該报的編輯。当时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²⁹⁹，然而他对政府的抨击却非常尖銳，以致他主編的这个报纸只存在了几个月。（1843年3月17日的該报上附有一个簡短启事：“声明：本人因現行書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萊茵报》編輯部，特此声明。馬克思博士”。（着重号是原来就有的）根据政府1843年1月25日的决定，該报必須在同年3月31日停刊。但編輯部在規定日期的前几天即在3月28日就停止了該报的发行。）但馬克思却几乎为它的停刊而高兴。以往的写作活动，使他深感自己經濟知識的不足，所以他想补充一下这方面的知識；对《科倫报》³⁰⁰的猛烈討伐，使得馬克思有可能暂时埋头于書房。当馬克思重新登上写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舞台时，他不仅具有了原先缺乏的渊博学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經濟科学有了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經濟学史上是划时代的。

《刊登在該报上的馬克思的最著名的論文，不久前由梅林收集在《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 Engels, 1841 bis 185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到1850年）第1卷第208—321頁中。对于俄國讀者來說，这几篇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去政

論性的意义。另外再补充一句，这些論文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³⁰¹

1848年6月，在恩格斯、弗萊里格拉特和威廉·伏尔夫(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獻給他的)的參加下，馬克思在科倫創辦了《新萊茵報》。馬克思及其最主要的撰稿人在該報上所發表的言論已表明他們是信念十分堅定的、最新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了，这种意义是他們的工作賦予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的。甚至敌人也承認，《新萊茵報》是当时最出色的報紙。但是，关于該報可以而且應該說的比这点还要多：無論在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報紙，都不能同它匹比。該報于1849年6月因公开号召“反抗政权”而被查封，当时受到了革命打击的政权已經迅速地恢复起来了³⁰²。

④³⁰³ 由于書報检查机关的細心，俄国讀者至今还很少知道恩格斯所談到的施特勞斯和布·鮑威爾的观点。因此，我們認為在这里把他們的观点簡略地敘述一下，并不是多余的。

問題是这样的。如果你們深信：所謂聖經是神(圣灵)选择了某个圣者作为秘書而写出的，那末，你們就不許有这样的想法：在聖經中会有什么〈錯誤和〉不合理的地方。那里所說的一切，在你們看来，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事实的意义。化身为大蛇的惡魔在引誘夏娃时，口吐人言，这些話就象一个曲意奉承和老于世故的伪善者所說的。这有点奇怪；但是，对于神來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所感到的奇怪只不过是神的万能的一个新例証而已。大家熟知的巴兰的驢，忽吐人言，和自己的乘客交談。这又是一个极非寻常的現象；但是，按照那个一成不变的公式，对于神來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东西〈甚至奇談怪論；credo quia absurdum〉也不能使信仰困惑起来。信仰是“对信賴者的示知，是看不見的物的揭示，也就

是說，把看不見的东西，信为好象是看得見的东西，把希望和期待的东西信为好象是真有的东西”。对于一个信教的人來說，神、自然界的創造者和主宰的万能，正是他所最“期望”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自然界作斗争，不是被迫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說，不是被迫去逐渐地研究这个自然界本身的規律，那末，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动人的，甚至都是非常可靠的。一旦人吃了有害的“智慧树”上的果子，他就不是那么容易地受謊言的影响了。即使他还是按照旧习惯繼續相信神的万能，但他的信仰已經具有了另一种性質：神已退到世界舞台的后面，具有永恒不变的鉄一般的規律的自然界已居于首位了。但是，奇迹是和規律性不能調和的：規律性不給奇迹以容身之地；而奇迹則否定規律性。現在且問：懂得了自然界的不变規律的人們如何对待聖經上的奇迹故事呢？他們不得不否定这些故事。但否定所采取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这要根据产生这一理性思潮的社会生活的性質和进程而定。

十八世紀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简单地嘲笑过聖經上的故事，認為它們是愚昧无知或者甚至是欺騙行为的表現。法国人的这种对聖經的激烈的否定的态度，是由当时該国第三等級所进行的反对一般“特权階級”、尤其是反对僧侶階級的斗争所决定的。在那时新教的德国，情况就不一样了。第一，自宗教改革后，僧侶階級本身在德国再沒有起过象它在天主教的国家里所起的那种作用；第二，德国的“第三等級”当时还远未想到反对“旧制度”。这些情况使十八世紀德国全部著述史受到了影响。当法国的第三等級的有教养的代表利用科学的每一个新結論（每一个新假說）作为反对那些在腐朽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观念和概念的武器时，在德国，与其說是根絕旧的偏見，倒不如說是使它們和新发现協調起

来。在具有革命情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看来，宗教是愚昧和欺騙的产物。在德国的启蒙运动的拥护者看来，甚至在其中最先进的人（例如莱辛）看来，宗教是“对人类的教育”。因此，圣经在他们的眼目中就不是那种可以予以否定和嘲笑的书了。他们力求“启蒙”这本书，给予这种书的故事以新的意义，使这些故事符合于“时代精神”。于是，开始了对圣经的最热心的折磨。旧约全书中神几乎在每一页上都在“说话”。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真的在说话。这只不过是东方人所如此贪恋的比喻性的言词而已。当我们读到神说过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应当把这理解成这样：即神把某一观念提示给了自己的这个或那个忠实的臣民。蛇这个引诱者所发生的事是这样，巴兰的驴所发生的事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些动物完全没有说过话。它们只不过把某种思想提示给似乎是它们的交谈者。正如大家知道的，在降灵节那天，圣灵变成火焰般的舌头，降临在使徒身上。这又是一种比喻性的言词。《使徒行传》的作者或作者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那时使徒强烈地发作了宗教感情。但是，按照另一些“启蒙的”考究家的解释，情况却有些不同。降临在使徒身上的火焰般的舌头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即电的火花。同样，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双目失明，这是由于雷电的自然影响；而长老亚拿尼亚用他的手一按就治好了保罗，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手常常是很冷，冷能够消炎退肿。耶稣使许多死人复活，这可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情況来说明，即他所遇到的不是死尸，而是处于昏迷状态的活人。他本人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假死。根据一位曾经是相当有名的博士帕乌卢斯^①的解释，耶稣本人因自己的意料不到的复活而惊奇（voll Verwunderung）。最后，至于耶稣的升天，只要根据

^① 帕乌卢斯于1800—1804年出版他的《福音评注》一书；于1828年出版《耶稣传》一书。下面的帕乌卢斯的话就是从后面这本引来的。

福音作者們关于这事的說法极不肯定这一点，就可以不必談它了。他們說，耶穌是被接升天的（馬可）；这是不是說，在他死后他的灵魂被接升天呢？福音作者們想要叙述一件不論自然科学家或“能够准确地計算出炮弹需要多少時間飞到天狼星”的天文学家都不能相信的事，这何苦呢？

‘无需証明，对福音的諸如此类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批判正好証明这种批判的代表者对問題沒有真正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作为第一步，可能是好的和有用的。但在斯宾諾莎早就走过的第一步之后，应该有第二步，而这个第二步，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并没有走。〉施特劳斯（1808—1874年）的全部功績在于，他消除了那些沒有成果的企图：“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把历史上沒有的变成历史上可以設想的”。施特劳斯認定福音所講的一些故事，不是講真实的事件（多少有些正确的，多少有些歪曲的），而只是一些神話，这些神話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无意識地形成的，并且反映了这些团体产生时代的信仰救世主的观念。与此相似，耶穌的說教——特别是其中最高超的，所謂約翰福音中所引的，——在施特劳斯看来，是較晚的作品。施特劳斯在其最近对《耶穌传》一書的修訂本中把他那时对福音神話的产生的看法叙述如下：

“我認为神話这个概念是理解福音中所講的奇迹以及理解其他許多与历史观点相矛盾的福音故事的鎖鑰。我說过，对于这样一些事实，例如东方博士面前出現了星、基督变貌、用几个餅奇怪地喂飽几千人等故事所講的一些事实，要寻找自然的解释，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不能設想这样的超自然現象是确实有的，所以只好承認类似的故事是捏造的。为什么在福音产生的时候造出了关于耶穌这样的故事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是由于当时人們对救世主的期待。我說过，起初有少数人認为耶穌就是

救世主，后来这样认为的人愈来愈多了，而在这以后，这些人就充满了一种信念：认为过去期待于救世主的一切，一定会在耶稣这里发生，他们所根据的是旧约圣经里的预言、预兆和通常对它们的解释。尽管大家清楚地知道，耶稣生于拿撒勒，但作为救世主和大卫的儿子，耶稣反正应该生于伯利恒，因为弥迦是这样预言的。在传说中可能保存有耶稣对其同乡的爱好奇迹的非常尖锐的批评。但由于人民的第一个解放者摩西创造了奇迹，那末人民的最后一个解放者、救世主即耶稣也应该创造出奇迹。以赛亚曾预言，救世主出现时，瞎子会睁开眼睛，聋子会听见，瘸子会象鹿一样地跳跃，口吃者会畅所欲言。因此，耶稣即救世主应该创造出什么样的奇迹，就可正确地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编造出关于耶稣的故事！不过它们没有意识到它们自己在编造这些故事……这样的观点把基督教神话的来源跟我们在其他宗教产生的历史上所碰到的东西，混为一谈了。科学在神话领域内的最新成就就在于：它了解了神话是如何产生的，神话不是别人的有意识的故意的虚构，而是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共同意识的产物。当然，一定是有一人第一个说出这种共同的信念的。神话不是隐藏某种观念的外壳，这里面的观念似乎是智者为了有利于无知群众和教化他们而藏进去的。神话里的观念只是和故事同时产生的，它只是以故事的形式而存在，纯粹的观念是为讲述者本人所不理解的……

但是，福音神话愈益具有（至少是部分地具有）新的独立的性质，那就愈难想象这些神话的作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把自己的捏造冒充为真实的事件。第一个说出耶稣生于伯利恒的人，是会真心地相信这一点的，因为先知弥迦已预言过救世主从伯利恒降临。耶稣既是救世主，因此他一定是生于伯利恒了。相反地，第一个说出

耶穌死时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馬太福音》第27章第51节)的人,大概已意識到,他所說的是他沒有看見过的,是沒有聽見什么人說过的,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比喻性的言詞,如象‘希伯来書’(第10章第19頁)所說的耶穌之死为我們开辟了一条通过殿幔走向圣所的道路之类,很容易为听者按照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因此,故事是可以沒有任何有意的虚构而产生的。同样,关于四个使徒負有得人的使命的故事,也可以这样地来表达:耶穌叫他們去的那个打魚之处,比过去他們捕获甚少之处出产的多得多,而由于后来的口传,便很容易地从这里形成了关于奇迹般的捕魚的故事(路加福音第5章)。构成基督复活的故事的材料,初看起来,或是真正的事件,或是明显的有意的撒謊。但是这里仔細考察一下,情况并不是这样。犹太人在和基督教徒爭論时会說:坟墓是空的,不足为奇,因为你們把尸体从坟墓中偷走了。基督教徒反駁道:‘我們偷走了嗎?你們用心地看守着坟墓,我們怎么能够做出这件事呢?’基督教徒所以这样說,是因为如此假定的。但是下一个講故事的人却根据他的話,大有信心地轉述道:‘有人看守着坟墓。’后来人們就开始說,有人封閉了坟墓,因为但以理提到过璽印封閉,而但以理的獅穴就是耶穌坟墓的原形……或者犹太人會說:‘可能耶穌出現在你們面前,但出現的是彼世的沒有肉体的幽灵。’基督教徒反駁說:‘怎么是沒有肉体的幽灵呢?他身上还有釘伤呢(这对基督教徒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他把这些釘伤給人看过。’——在以后的传述中,可能又加上摸过这些伤痕。类似的故事可能是完全純真地形成的,同时又是跟历史真相完全矛盾的。”^①

^① Das Leben Jesu für das deutsche Volk bearbeitet von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dritte Auflage, Leipzig 1874, S. S. 150—155.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为德国人民修訂过的《耶穌传》1874年莱比錫德文第3版,第150—155頁) 304。

毫无疑问，施特劳斯的观点，比起上述的他的前辈的观点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但不难看出，他还有很大的缺点。“历史事件经过口传而受到的更改，施特劳斯所指出的神话的发展，一句话，民间的基督传说，只是说明了所有福音共有的特征或它们的分歧，这些分歧具有偶然的无意的性质，没有显露出截然不同的趋向，并且也不是哪个福音作者经常所有的。相反地，当我们看到某些特征出现在某一部福音中而在其他福音中没有时，我们就不可能用所有基督教传说所固有的动机来说明这些特征；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些特征的出现是受了该书作者或这位作者所代表的基督教团体的局部意见和利害关系的影响。如果这些特征不只是在该著作的某些个别地方出现；如果该著作显然是为了把这些特征尽量地表现得有力而写成的；如果材料的分配、年表、故事的次要部分以及文体本身都是由这些特征决定的；如果该著作中还有通常传说所难以保存的冗长的谈话和对话（所有这些情况在第四部福音中和在第三部福音中使我们感到惊异，尽管是轻微的惊异），那末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碰到的已不是对宗教传说的简单叙述，而是作者的有意的创作。”^①可见，施特劳斯的神话理论还没有说明它所应该说明的一切。后来施特劳斯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在其对《耶稣传》的最新修订本中已经用很大篇幅叙述了“作者的有意的创作”。在恩格斯著作中所谈到的那个时代，即四十年代，施特劳斯还没有发现其观点中的那个受到布鲁诺·鲍威尔极其激烈的抨击的弱点。

鲍威尔(1809—1882年)责备施特劳斯爱好神秘的和超自然的东西，因为在他的神话的理论中“直接地起作用的是一般、类、宗

^① Ed. Zeller, Christian Baur et l'école de Tubingue, traduit par Ch. Ritter, Paris 1883, p. 98. (埃·采勒《克利斯提安·保尔和杜宾根学派》1883年施·利特尔的译本巴黎版，第98页。)

教团体、口传”，并没有给自我意识的中介活动留下余地。他说：“施特劳斯的错误，不是在于他指出了某种一般力量（即口传的力量），而是在于这种力量在他的著作中仅是在一般形式下起作用的，只是从自己的普遍性内部直接引伸出来的。这是宗教观点，是对奇迹的信仰，是宗教观念在批判观点中的再现，是对自我意识的宗教的粗鲁行为和忘恩负义……”施特劳斯的观点和鲍威尔的观点的对立就是“类和自我意识，实体和主体的对立”^①。换句话说，施特劳斯指出福音故事是无意识地产生的，而鲍威尔认为福音故事在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是通过人们的意识的，而这些人是为了某种宗教目的有意编造出这些故事的。这一点在所谓约翰福音^②中十分明显，约翰创造了一个和其他福音中的耶稣根本不同的特别的耶稣。不过，其他福音作者也有类似的编造。所谓路加按照自己的意见彻底修改了所谓马可编造的福音，而在他们二人之后执笔的所谓马太，对路加和马可都毫不客气，竭力使他们彼此一致起来，并使他们的故事适应于当时的宗教观点和宗教意图。但是他并不能解决这个不十分容易的任务。他陷于一系列的极端混乱的矛盾之中。请看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例子。马太说，在耶稣受洗礼之后，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让他在那里受魔鬼的诱惑。试问，为什么圣灵即上帝需要用魔鬼考验耶稣呢？“要知道他会懂得：他刚才（在洗礼时。——格·普）称之为爱子的耶稣是不会被诱惑的。”^③但问题在于马太不过是在讲述时搞糊涂了。“他不想简单

①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Zürich und Wintertur, 1842, S.S.117—118. (《正义的自由事业》1842年苏黎世版和温特图尔版,第117—118页) 305。

② 现在已经公认：使徒约翰不是该福音的作者。

③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zweite Auflage Leipzig 1846, I Band, S.213. (《对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历史的批判》1846年莱比锡德文第2版,第1卷,第213页)。

地抄录其先辈的故事；他力求解释它们，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①他在路加和马可的福音中读到过：圣灵把耶稣领到曠野，在那里受魔鬼的诱惑。因此，他就肯定圣灵把耶稣引到曠野，以便在那里借助魔鬼来考验耶稣。他在其福音中这样讲了，但他没有觉察到：这位无所不知的上帝在他的福音中陷入了何等荒唐的境地，竟认为考验自己的儿子是必需的。这里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以赛亚“预言”“在曠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为了实现“先知所说的”，马可和馬太迫使施洗的约翰在“曠野”传道，馬太甚至还明确地指出在什么样的曠野传道：在犹太的曠野传道。随后，他显然是重复马可和路加的话，他说，许多悔过的人都聚集到约翰那里，并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礼。只要看一看巴勒斯坦的地图，就可看出：约翰绝对没有体力既在约旦河为悔过的人洗礼，又在犹太的曠野传道，因为这个曠野离约旦河很远^②。（应当认为诸如此类的错误是讲故事者的个人的失败。）

有些教徒，而且只是一些多情善感的人，从各福音作者的福音中挑选出使这些作者惊讶的关于耶稣生平的个别特点，并且用这些特点为自己的宗教生活构成多少有些吸引力的“救世主”的形象，这种形象是适合于他们的想法、口味和嗜好的。施特劳斯的批判已经使得对拼凑起来的基督的加工很难进行了。鲍威尔对福音^③的批判使得这种加工完全不能进行了，因为他根本不承认历

①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zweite Auflage, Leipzig 1846, I Band, S. 214.（《对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历史的批判》1846年莱比锡德文第2版，第1卷，第214页）。

② 同上书，第143页。

③ 第1版：《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I und II Band, Leipzig 1841.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Iohannes》，III und letzter Band, Braunschweig 1842.（《对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历史的批判》1841年莱比锡德文版第1卷和第2卷。《对观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历史的批判》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和最后一卷）。

史上的耶穌。因此，很明显，他使得虔信宗教的“可尊敬的”人們多么害怕。他在神学系（他曾在波恩大学任講師）授課的权利被剝夺了，并且在許多小册子、論文和系报告書中受到严厉斥責。但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国已經不象十八世紀的德国了。1848年的革命风暴逼近了；德国人民中先进阶层的激怒一日千里地增涨起来了；这些阶层的文化界的代表們絲毫也不因为他們的批判的結論与各种固定的看法相违背而惶恐不安；相反地，他們愈来愈具有否定的傾向。布·鮑威尔激烈地回击了他的“可尊敬的”敌人的抨击，他既不饒恕一般宗教，也不饒恕“基督教的国家”。爭論得还要激烈的是他的兄弟爱德加，他由于自己1844年在伯尔尼出版的一本書《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批判家同教会和国家的爭論》）而被投入監獄。不言而喻，制度維護者这一方面的諸如此类的論战手法不能認為是十分值得嘉許的，但應該承認：爱德加·鮑威尔在这本著作中談得那么深远，甚至到現在还可能唬住許許多多俄国文化界的“先进”代表。他不承認上帝、私有制，也不承認国家。他談得如此深远，以至在否定方面已无路可走了。不，我們还是弄錯了，在这一方面还可以而且一定要走最坚决的一步，也就是說，可以而一定要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批判的武器坚固到什么程度？在采取否定行动时批判可靠到什么程度？或者，換句話說，批判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擺脫了它所抨击的偏見？走在鮑威尔兄弟前面的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Die Heilige Familie》（《神圣的家族》）³⁰⁶中专心研究了這個問題。原来“批判的批判”的双脚是站在它所激烈反对的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这就是它的最主要的缺点。当布·鮑威尔根据“自我意識”去分析福音故事时，他能够給予当时神圣化的偏見以很多沉重的打击；但当他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轉而批判“国家”和評價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的法国伟大事件时，他就得出一部分完全错误的结论，一部分总的说来是没有根据的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也只能如此。说当时的社会形态和我的“自我意识”相矛盾，这还不是确定这个社会形态的历史意义。不评价它的意义，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它，在跟它作斗争时也不可能有多大胜利的希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恰好做到了十九世纪哲学思想的全部发展进程所提示的一件事情：要同唯心主义一刀两段，就必须抛弃“自我意识”的专制，必须找出和指出那些决定自我意识本身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所担负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这一点此处不谈了，读者根据他俩的著作去判断吧。我们只指出：鲍威尔兄弟的抽象激进主义在很多方面象我们俄国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他们同样是不断地讲到“批判”、“批判精神”（我们这里叫做“批判思想”）；同样是不善于深思社会关系内部产生的并决定人们“自我意识”的批判进程。如果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把爱德加·鲍威尔用来反对黑格尔的论据（《批判家同教会和国家的争论》第4章）和尼·米海洛夫斯基提出反对斯宾塞的反驳³⁰⁷对比一下，这是非常有意义和有教益的。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表明，在标榜一时的主观方法中的新东西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它也可以表明：俄国的主观社会学家的全部独创性归根到底只是无意识地重复那些早就被西欧思想家指出和纠正了的别人的错误而已。

⑤³⁰⁸ 这里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详谈费尔巴哈的生活，我们只是从宇伯威希—海因泽的《近代哲学史》³⁰⁹中借用了几行（俄译本第394页）。“他是著名的刑法学家安瑟伦·费尔巴哈的儿子，生于1804年，他起初研究神学……后来成了黑格尔的信徒。他在1824年迁居柏林后，听黑格尔本人讲课，并且很快地就完全献身于哲学。1828年他开始在爱尔兰根讲课，从1836年起，居于安斯巴哈

和巴伐利亚之间的布鲁克堡村，从1869年起居于纽伦堡附近的腊亨堡村，其生活穷愁潦倒，于1872年去世。”

他的《基督教的本質》³¹⁰的内容也可以用不多的话叙述一下³¹¹。

费尔巴哈说：“宗教是人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在宗教中，人把自己、自己本人的“本質”神化了。神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或者，说得好些，是清除和摆脱了个人的局限性的人的本質。莱布尼茨在其“神正论”中说：“神的完善是我们灵魂的完善，但神具有的完善是全面的……我们具备某些威力，某些知識，某些善良品質，神則完全地具备这一切特性。”这是十分正确的，并且这只是意味着：“神的一切特性是人的一切特性。”但信教的人沒有意識到：他把自己的本質神化了。他把这种本質客体化了，即把这种本質“当作另一种与自己不同的独立存在物来直观和敬奉”。宗教是人的两重化，是人和自身的分割。根据这一点可得出两个結論。

第一，黑格尔完全歪曲了真相，因为他說：“人关于神的知識就是神关于自身的知識”，或者，換句話說，“神通过人認識自己”。事实恰好相反：人通过神認識自己，“人关于神的知識就是人关于自身的知識”。神的特性按照人如何思考和感觉而改变。“人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他的神的价值也就是什么样的。宗教是对人的隱秘的宝庫的胜利揭示……是对人的心愛的秘密的公开信仰。”宗教方面的任何进步就是人在認識自身方面的进步。基督、神的化身是“人們親見的神……是幸福的信念：即相信神存在着，并且象感情所需要和希望他存在的那樣存在着。因此，只有在基督身上宗教的最后願望實現了，宗教感情的秘密被揭示了（当然是用宗教所特有的形象的語言揭示的）；某种东西在神那里是本質，在基督那里却成了現象……就这种意义來說，基督教可以称为絕對的宗教”。东

方的宗教，例如印度的宗教也談論神的化身。但是，在东方宗教中这些化身出現得太多了，“因此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化身了的神在这些宗教中沒有形成人格，即沒有成为人，因为沒有人格就沒有人。

第二，既然在宗教方面人跟自身发生关系就象在跟局外的、单独的、与他对立的存在物发生关系；既然宗教不过是人的无意識的自我意識，所以宗教不可避免地引起一系列的矛盾。信教的人說：神是愛，實質上他說的只是：愛在世上高于一切。但在他的宗教意識中，愛被貶低为单独存在物即神的特性，神即使离开愛还是起作用的。对神的信仰，在信教的人看来，已成为真心誠意地以愛对待世人的必要条件。他为了他所宣传和崇拜的愛而憎恨无神論者。把人对自己本質的关系歪曲了的那种对神的信仰，就这样地把人們的相互关系歪曲了。对神的信仰成为宗教狂热病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灾祸的泉源。它为救渡而詛咒，为安乐而肆虐。神是幻覺。但这是极端有害的幻覺；它束縛理性，抑制人对真理和善的自然的愛好……因此已成长为自我意識的理性應該消灭这种幻覺。理性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理性只要把宗教所确立的一切关系翻轉过来。在宗教中作为手段的东西（例如，作为取得永久安乐的手段的美德），应当成为目的；在宗教中作为从屬的次要的事情、作为条件的东西（例如，愛世人是神对我们寵愛的条件），应当成为主要的事情，成为原因。“正义、真理、善在自身中、在自己的本質中，包含着自已的神圣基础。对于人来说，沒有高出人的存在物。”

（1902，《Mouvement Socialiste》（《社会主义运动》）杂志編輯部曾經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对教权主义的关系問題进行了一系列的 enquête〔調查〕³¹²。現在這一問題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但要正确地解决这一問題，必須預先闡明另一个主要是理論的問題：科学社

会主义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后一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主义文献中几乎完全没有分析过。这是这些文献中的大缺点，这个缺点正是由于大多数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求实精神”所造成的。有人说：宗教是个人的事。这是正确的，但这只是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不言而喻，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拒绝那些承认党纲并决心为实现党纲而斗争但同时又持有某些宗教偏见的人参加自己的队伍，那是很不划算的；如果一切政党摒弃作为党纲之基础的理论，那就更不划算了。理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是要把宗教当作错误的自然观和社会观的产物而加以排除，是要把它当作无产者全面发展的障碍而加以斥责的。我们没有权利把那些抱有宗教信仰的人关在组织的大门之外，但我们有义务尽我们的一切可能来消除这些人的宗教信仰，或者至少要阻止我们的信教的同志——当然用精神武器去阻止——在工人中间传播他们的偏见。彻底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跟宗教是完全不能调和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坚决否定宗教，是不足为怪的。恩格斯写道：“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³¹³马克思也把宗教叫做统治阶级企图用以麻醉人民意识的鸦片；又说，消灭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是人民对现实的幸福的要求。马克思又指出：“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己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³¹⁴

这一点正确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这里的一些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其资产阶级的倾向而不愿意也不可能愿意无产阶级完全觉醒，他们现在已回到宗教信仰的怀抱。³¹⁵

⑥³¹⁶ 恩格斯所使用的“小说文学”、“小说文学的”这些字眼的

含义和现在俄国所了解的不同。这里可能产生误解，读者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怎么会堕落为不吸引人的小说文学呢？大概‘真正’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写了坏的有倾向性的小说和故事吧？”但事情是这样的：德国人不仅把诗学(Dichtkunst)，而且还把雄辩术(Redekunst)列在小说文学(所谓shönen Wissenschaften)之内。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堕落为小说文学，如果用俄国著作家的话来表达，意味着它堕落为不吸引人的演说术。我们提一下，在别林斯基的著作中，“小说文学”这个字眼所具有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给予这个字眼的那种含义。

〈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见弗·梅林：《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cialdemocratie》. I. Theil, SS. 199—203³¹⁷（第1版）。梅林在给自己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所作的评注（《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①第2卷第349—374页）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一派别。阿德勒教授的著作《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②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其中摘录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莫·赫斯和卡·格律恩的著作。马克思在《Karl Grün: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oder die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wahren Sozialismus》^③这篇论文³¹⁸中对卡·格律恩作了最好的评述，这篇论文初次载于《Westfälischen Dampfboot》³¹⁹1847年8—10月号，后来转载于《新时代》杂志1899—1900年第1—6期。最后——last not least^④——应该记住《共产党宣

① 《遗著选集》。

② 《德国早期社会政治运动史》。

③ 《卡尔·格律恩：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或真正社会主义史料研究》。

④ 按次序来说是最后，不是按重要性来说是最后。

言》中的关于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这些言论虽然不多，但内容却特别丰富、真实，而且十分尖锐（见1900年版我的译本第3章第29—33页）³²⁰。刊载在《新时代》杂志（1895—1896年第37和38期，1896—1897年第34—35期）上的司徒卢威先生的一些论文现在几乎已失去了一切意义。其中第一篇是叙述马克思的两篇论文的内容（一篇是关于海尔曼·克里盖的论文，已由梅林全部刊出，见《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第2卷第415—445页；另一篇是关于卡·格律恩的论文，转载在上述各期《新时代》上）；司徒卢威先生的第二篇论文《Studien und Bemerkung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①是讲“阶级斗争思想史”的问题。在这里，他认为洛伦茨·斯坦因第一个宣布了这个思想，至少在德国文献中是这样。司徒卢威先生以为马克思从斯坦因那里剽窃了这一思想。这是没有任何根据和完全不可能的推测。要证实这个推测，司徒卢威就须证明：在洛·斯坦因的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著作问世时，马克思完全不知道那些早就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家的著作。司徒卢威先生不能证明这一点，而且永远也不能证明这一点（我敢于向对这一问题感到兴趣的读者指出我为《共产党宣言》1900年版所写的序言）。现在司徒卢威先生的论文只有从下述这方面来看还有些意思：他的论文告诉我们，1896—1897年的司徒卢威先生，虽然他的思想有很多缺点，修养很不够，但与他后来在编辑《解放》³²¹杂志时所降到的水平比较起来，却高得多。“从猿发展为人”，这是十分愉快的，但没有比从人到“猿”这种相反的变态现象再可悲的了……

“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根本毛病在于：他们对

①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问题的研究和短评》。

一般经济学、特别是对阶级斗争一无所知；他们在实践中最严重的错误是否认“政治”。现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保守分子也许都愿意赞同卡尔·格律恩对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运动的攻击吧！马克思极严厉地指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这是马克思的许多功绩之一。但是，在斥责真正社会主义者时，应该记住：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没有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对政治的关系问题。俄国也不例外；我们的民粹派和民意派把这一问题处理得很坏。不仅如此，甚至现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流传着一些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的奇怪的观点。只要提一下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夺取政权的传言就够了。赞成夺取政权的人忘记了工人阶级专政只有在将来谈到社会主义变革时才是可能和适当的。这些人（聚集在《无产者报》³²²周围的人）回到已经寿终正寝的“民意主义”的政治观点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夺取政权问题的看法则不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本书中写道：“能够落到极端派的领袖身上来的最不幸的事就是：当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足以使这个领袖所代表的阶级取得统治并贯彻一些保证这种统治的措施的时候，却不得不去夺取政权。这种领袖所能做的事，不是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对立程度，而这种对立程度又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这样的领袖应该做的事，即他自己的党要求他做的事，也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发展程度及其条件，因为他受以前的理论和要求束缚，这些理论和要求不是从社会阶级在当前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不是从暂时的、多少有些偶然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中产生的，而是由这一领袖的对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的理解能力决定的。因此，他必然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他所能做的事，跟他的以前的一切行为、他的原则及其党的

直接利益相矛盾；而他所应该做的事，也不能成功。总之，他不是维护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而是迫不得已维护这样的阶级，即运动已经成熟到足以能保证其统治的阶级。正是为了这种运动的利益，他不得不维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言和诺言来敷衍自己的阶级，不得不断言异己阶级的利益即自己的利益。要是谁陷入这种荒唐的地步，谁就是不可救药地堕落了。”³²³（这段话在我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中引证过，见该书第288—289页）

想一想这一点，对于列宁及其周围的尼采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都是有益的。但是有理由耽心：这些“超人”已丧失了思维的能力。³²⁴

⑦³²⁵ “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下面我们马上就会看得很清楚。

我一秒钟也不会怀疑自身的存在；我的无可反驳的内在信念向我担保我自身的存在。读者也许会补充上一句：“只要合理地思考一下，大概就可以这样认为：你也没有任何根据怀疑你用来写字的那张纸的存在。”在别的时候，我也不会怀疑这一点，但现在我想谈论哲理，在一个哲学家看来，通常的“合理思考”不总是有说服力的。我问读者：你说的是纸的什么存在呢？如果你认为纸存在于我之外，它属于组成所谓外部世界的那些对象之列，那末我向你提一个新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些对象存在呢？（什么东西向你担保外部世界的存在呢？）你的外部感官告诉你这一点，你的感觉向你证明这一点，就是说，你看见这张纸并触到这张书桌。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这说明，你其实不是和对象而是和感觉以及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表象发生关系。你仅仅根据感觉推论出对象的存在。但你用什么来证明这种推论的正确性呢？你以为对象是感觉的原因。我姑且不谈关于你的原因观念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但請你給我解釋一下：为什么你这样相信你的感觉的原因是在你之外，而不在你自身之內呢？誠然，你习惯于把自己的感觉分为两类：（1）原因在你自身之內的感觉；（2）原因在外部对象中的感觉。但是，这仅仅是习惯而已。你怎么知道这种把感觉分为两类的习惯分法不是你的“自我”特性的結果呢？（你的这个“自我”，只有当他在自身中通过无意識的創造活动創造外部世界即“非我”，并把它同自身对立起来时，才意識到自身。）在我看来，可能事情正是这样，任何外部世界，即我的“自我”以外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你們且为我的“詭辯”激憤吧，我繼續来談論哲理。但現在我抛开主觀唯心主义的观点（其最著名的代表是費希特），轉到怀疑論者的观点上来。

我翻开休謨的“人类悟性研究”一書，把它的第七章中的一段話³²⁶讀給你們听听。“当然，简单的自然的本能使人們相信自己的外部感官的陈述……遵照这种盲目的强有力的本能，他們經常会把他們由外部感官得来的映象列入外部对象，他們永远不会怀疑这些映象就是这些对象的模写”。但是，如果哲学要想証明本能不会騙人，那末它就会碰到极大的困难。决定性的論据可能只从經驗中取得，但是“經驗在这里默不作声而且应当默不作声”；我們只同表象发生关系，而且我們永远不能檢驗它們同对象的联系。因此，理性沒有为承認这种联系提供任何根据。当然，不必因此惶恐不安。諸如此类的一切想法只不过是徒劳无益地卖弄聰明而已。如果有人問怀疑論者，他依靠自己的机智的論据究竟要求什么，想得到什么，那末怀疑論者本人就会惶恐不安。“人应当行动、推理和信仰”，尽管人無論怎样努力，他不可能完全确信自己的行动和推理的最終基础。而在哲学上总不应当忽略这种不可能性。要記住，我們对世界的認識的領域只局限在非常狹小的圈子里。要知道，

連一个現象同另一現象之間因果联系的真实本質我們也不能理解。我們千百次地看到石头落在地上，因此我們相信，只要沒有什麼柱子阻挡石头落地，石头总是会落到地上的。但是我們的信仰只是建立在习惯上的。理性沒有而且也不能使这种信仰成为必然的。理性不能向我們担保：我們所謂的自然規律是不变的。

我們再往下談吧！我們都記得曾受过休謨怀疑論影响的康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我們之外存在着某些对象，但我們不知道它們是怎樣的。我們实际上只同自己的感觉以及我們内部的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对象的映象发生关系。但是，感觉以及对象的映象，是由两种力量合成的，一种力量是在我們身上引起某种印象的那些对象的特性，另一种力量是获得这些印象的那个接受者的特性，亦即我們的“自我”的特性。我們的“自我”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印象分类，換句話說，按自己的本性把这些印象分开和結合起来。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們关于对象的表象不可能同引起表象的对象相同，我們的表象是一回事，而独自存在的物又是一回事。但是还不仅止此。我們說过，我們的“自我”按自己的本性把外部对象（我們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在我們身上引起的那些印象分类。但是，“自我”怎样把它們分类，怎样把它們分开和結合起来呢？我們看到物体在空間中。試問：空間本身是否存在呢？經驗不能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至于說到悟性，那末，如果它假定空間是在我們之外并且不依賴于我們而存在的，它就会得出矛盾的結論；因此只有假定空間（完全象時間一样）无非是我們的直觀（或者按某些俄国著作家的表达法，就是观点）的形式，因而它和自在之物（本体）完全沒有关系。現在我們从表象轉到概念，我們就拿原因的概念來說吧！很可能，當我們說A現象是B現象的原因时，我們是錯了。但是，當我們一般地說在現象之間有着因果联系时，我們是不錯的。

如果你們取消原因的概念，那末留在你們那里的只是一堆混亂現象，其中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問題就在于，这个概念是不可能取消的。它是我們所必需的，它是我們思維的形式之一。我們不來一一列举思維的其他形式了。我們只說这样一点：只要我們一講到不依赖于我們的思維而独自存在的物，我們思維的这些形式就失掉任何意义。換句話說，我們所謂的自然規律只适用于我們意識中的現象世界，而本体（自在之物）則完全不遵循这些規律。

由此可見，在康德关于現象世界的學說中有两个因素：（1）主觀的唯心主义的因素——我們直觀的形式或思維、一般認識的形式；（2）实在論的因素——本体給予我們的并受我們的意識加工的那种尚未确定的材料。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先驗唯心主义。既然我們的自然必然性的概念不适用于本体世界，那末誰都可以認為这个世界是完全自由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所有那些同合乎規律性这一概念不两立的怪影，如上帝、灵魂不死、意志自由等，都能够为自己找到隱蔽之处了。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同这些怪影作过斗争，但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也就是說，在講行动而不是講抽象思辨的地方，却向这些怪影交了武器。

这种二重性（这种二元論）就是康德唯心主义的致命弱点。但是，甚至从康德的前提来看，这种唯心主义也显然是沒有根据的。

（例如，康德哲学所謂的现象是什么呢？它是由两种因素合成的：

（1）对象（本体）對我們的自我的作用；这些对象是在我們之外^①存在的，它們本身，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只有通过它們在我們身上引起的印象才知道它們。

（2）我們的自我的特性；我們的自我按照这些特性去改造自己从自在之物那里得来的印象。

但是，既然现象是由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所引起的，那就是说，这种物的作用是现象的原因了。但是，按同一位康德的学说，因果性范畴只在现象世界的范围内才适用，而对于自在之物是不适用的。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在十八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文献中早已指出了这个矛盾，摆脱这个矛盾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我们继续断言因果性范畴不适用于自在之物，因而抛弃关于现象由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所引起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继续认为这一思想是正确的，因而承认因果性范畴适用于自在之物。在第一种场合，我们直接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因为，既然自在之物不作用于我们，那末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而且关于它的表象本身在我们的哲学上应当被宣布为无用的，即多余的。在第二种场合，我们就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因为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断言，我们可以离开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知道它们本身是怎样的，我们只是这样断言：正由于这些物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才知道这些物，知道的程度取决于这些物对我们感官作用的程度。霍尔巴赫说：“我们既不知道物质的本质，也不知道物质的真实本性；不过我们却能根据物质对我们的作用而判断它的某些特性……在我们看来，物质就是以某种方式作用于我们感官的东西。”^② 328 朗格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史》（俄译本第1卷第349页，这里正是讲霍尔巴赫）中

① 在《纯粹理性批判》之后出版的康德名著《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一切可能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序论》）中，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实际上，如果照应当做的那样，我们认为我们外部感觉的对象是单纯的现象，那末，这样就承认自在之物是它们的基础了，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的特性，而只知道它对我们感官作用的方式。” 327

② 英国唯物主义者普里斯特莱更坚决果断地说出了同样的意见（见所著《Disquisitions relating to Matter and Spirit》（《物质和精神研究》）1782年伯明翰第2版第1卷第134页）。诚然，就普里斯特莱的那种和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很接近的唯物主义的精神来说，他走得太远了。不过这点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說“唯物主义固执地把感性假象的世界当作现实对象的世界”³²⁹，这仅仅是因为朗格“固执地”不去了解唯物主义。但無論怎么說，关于外部世界不可認識的問題在上述两种場合都得到了肯定的解决。实际上，如果我們轉到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場上，我們會明白，我們的自我能够認識他自己所創造的非我。如果我們宁願当唯物主义者，那末只要稍加思考，我們就会确信：如果我們由于自在之物對我們的作用而知道这些物的某些特性，那末同霍尔巴赫的意見相反，我們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它們的本性，因为物的本性正是表現在物的特性中的。通常把本性和特性对立起来，这是沒有根据的，而正是这种对立使得認識論陷入經院哲学的迷宮，在这个迷宮中，康德迷失了方向，而現今唯物主义的一切反对者依然不知所向，束手无策。歌德憑其天才的詩人和思想家的敏感，比“先驗唯心主义者”康德更清楚地，甚至比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也更清楚地懂得，真理究竟在什么地方。他說：

无所谓內，无所谓外，
 因为，內就是外，外就是內。
 不要迟疑，
 抓住这神圣的公开的秘密。^①

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可以說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整个“認識論”。但是，所有那些講着外部世界不可認識的經院哲学家們，至今都既不能理解这儿行字，也不能了解唯物主义的認識論。

黑格尔异常明确地揭露了作为我們不能認識自在之物这一切議論之基础的那种邏輯的（如果願意的話，也可以說認識論的）錯誤。的确，我們沒有任何可能来回答自在之物是什么的問題。其

① 《歌德全集》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230頁。——編者注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该物具有应当加以指出的那些特性；这一问题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某种意义。但是，那些讲着自在之物不可认识的“高谈哲理的人”，却预先把物的一切特性抽去，这样就使这个问题成为荒唐的问题，因而也不可能加以回答。黑格尔说，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把物的一切特性，无论是形式或内容方面的特性，都移入意识中。显然，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那末象这样一些情况，如树叶在我看来是绿的而不是黑的，糖是甜的而不是苦的，钟打两下，我听到的响声是一下接着一下而不是同时发出的，我不认为第一响是第二响的原因或结果等等，都仅仅是以我的主体为转移了。”（《逻辑学》，德文版，第1卷，第一篇，第55页；第二篇，第150页³³⁰，早在黑格尔之前，普利斯特莱在其“物质和精神研究”以及他和普莱斯的争论³³¹中，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认识这个词提出过许多值得注意的意见。）

但读者会这样反驳说：对不起，颜色和声音难道不是某种纯粹主观的东西吗？颜色和声音的感觉难道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类运动（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学说，这种感觉是由那种运动引起的）相似吗？当然是不相似的。如果铁在不同的温度下有不同的颜色，这是有不以我的“精神”组织的特性为转移的客观原因的。我们的著名的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得完全正确，他说：“同我们感觉到的声音的任何振动和传播在强度、高低、持续性上相符合的，乃是现实界声响运动的十分确定的变化。作为感觉的声音和光是人类机体的产物，但我们看到的形式和运动，完全象我们听到的声音的抑扬顿挫一样，其根源是在我们之外的现实中。”（《具体的思想和现实》，载《救济饥饿者》文集，《俄罗斯新闻》出版社版第188页）谢切诺夫又补充说道：“不管离开我们意识的外部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就算我们从外部对象得来的印象只是一种记号，但无论怎样，

同我們感覺到的記号的异同相适合的是现实的异同。換一句話說：人在他所感覺到的对象之間发现的异同就是现实的异同。”(同上書,第207頁)³³²這又是正確的。需要指出的只有一點,就是謝切諾夫先生的表達不完全確切。當他假定我們的印象只是自在之物的記号時,他仿佛就承認自在之物有某種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意識所達不到的“形态”了。但是,“形态”只不过是自在之物對我們作用的結果;除了這種作用,它們就沒有任何“形态”。所以,把存在於我們意識中的物的“形态”同據說物在實際上具有的那種“形态”對立起來,就是不懂得形态這個詞有什麼含義。康德主義的整個“認識論的”經院哲學,如上面所說的,都是建立在不確切的術語上的。我知道,謝切諾夫先生並不傾向於這種經院哲學。我已經說過,他的認識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不應當在術語上向我們的哲學敵人作讓步,這樣的讓步會妨礙我們十分確切地表達自己的原意。我所以要作這樣一個附帶說明,還因為在我給自己譯的恩格斯這本小冊子的第一版所作的注釋中也有一些不完全確切的表達,而且僅僅在後來才感到這些不確切的表達造成了種種不便。

因此,自在之物沒有任何“形态”,它們的“形态”只存在於受它們作用的那些主體的意識中。現在要問:誰是這些主體呢?人們嗎?不,不僅人們是主體,而所有那些由於自身結構的某些特殊性而有可能這樣或那樣地“看見”外部世界的有機體都是主體。但這些有機體的結構是不一樣的,所以外部世界對他們來說也有不一樣的“形态”。我不知道蝸牛是怎樣看東西的,但我相信它不象人那樣去看東西的。可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外部世界的特性僅僅有主觀的意義。完全不是的!如果人和蝸牛都從A點向B點移動,那末不論對人或蝸牛來說,直綫都同樣是這兩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如果這兩種有機體沿着曲綫行走,那末他們在移動中都要花

更多的劳力。这就是說，空間的特性，尽管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有机体看来有所不同，但也有客觀的意义。

还不止此。蝸牛对我來說是什麼呢？是通过某种受我的机体制約的方式而对我发生作用的外部世界的一个部分。因此，如果我假定蝸牛这样或那样地“看見”外部世界，那末我不得不承認，蝸牛看到的外部世界的那个“形态”本身，是由这个实际存在着的世界的特性决定的。由此可見，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存在和思維的关系，即恩格斯所說的現代哲学的基本問題，在我們看来，具有一种完全新的形式。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消失了；主体也是客体，物質（記住霍尔巴赫的定义：“在我們看来，物質是这样或那样地作用于我們感官的东西”）在某些条件下賦有意識。这是最純粹的唯物主义，而且这是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問題的唯一能多少令人滿意的、不同科学矛盾的解答。

其次，康德使自己的認識論同現代科学中占統治地位的发展学說不发生任何联系（关于这种学說，康德本人在“天体的一般理論和历史”³³³中也曾提出过很多論据）。这是一个大缺点，其原因当然归之于康德那个时代的生物学的状况。在現在，某些非常推崇康德哲学的生物学家已經明确地意識到了这个缺点。我可以举出去年（1904年）7月萊因凱教授发表在《德国評論》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康德的認識論和現代生物学》作为例子。

萊因凱发现：現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是和康德关于“人类悟性的先天特性”的学說不調协的。

象我們所知道的，康德認為因果性范畴不适用于自在之物，而只适用于現象，这是因为因果性是由我們的悟性加給現象的，因为因果性是先天的自然規律。总之，在康德看来，悟性是自然界的任何秩序的来源，因为悟性把自己的規律加給自然界。正就是这一

点使得莱因凯感到不安。他問道：“这样的先天(a priori)是否存在呢？”他回答說：“从人一生下来起，也就是說在任何經驗之先，人由于自己的悟性的特性而不得不用因果性范畴思考，并在空間和時間中設想現象(萊因凱也把時間和空間称为范畴，这不是笔誤，而是他对范畴学說的特殊理解，关于这点我在这里不談了)；但人也同样地由于自己的机体的特性而不得不呼吸、走路、飲食等等。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他服从一个伟大的自然規律，即适应自己生存条件的規律。如果以为这个适应規律是由我們的悟性加給自然界的，那是完全荒謬的。而有机体的精神特性也服从这个規律，因为它们也是屬於自然界的，它們也随着有机体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有机体对周围环境的一切适应形式，如肺、鰓等等，象思維形式一样，也是有机体先天具有的。有机体的这两类特性是由遗传得来的，并且是在有机体从細胞演化出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細胞中这些特性是完全看不見的。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某类动物怎样获得这些特性的？那末我們只有去考察地球的发展史。如果拿一个个体，即一个人或一个别的动物來說，那末所有这些特性，無論是物理的特性或精神的特性，都是先天获得的。”

这就是莱因凱的論断。他的这些論断是有趣的正当的，但康德所謂的先天却靠他得到了完全新的形式。莱因凱未必能得到康德本人的同意。只要說以下一点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莱因凱不承認時間、空間和因果性有絕對主觀的性質。相反地，他說：“根据肉体形式的适应类推起来，我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如果先天的思維規律……不符合我們之外的实在，那末它們就根本不存在。”虽然莱因凱是现代新活力論的台柱之一，当然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但他这段話却完全象唯物主义者說的話。当然，象柯亨、拉斯維茨甚至里尔之流的现代新康德主义者，無論如何也不会同意莱因凱关于先

天所說的那些話。但現代生物学是不会讓他們平安无事的。

另一位德国的著作家写道：“我不知道，那些信奉康德的認識論的哲学家怎样对付发展学說。康德認為，人的心灵是既定的、成分不变的量。在他看来，問題只是在于确定心灵的先天财富并从中得出其他一切，而不是在于指出这种财富的来源。但是，如果我們从人由一小团原生質演变出来的公理出发，那末正应当从細胞的原始生命現象中得出康德認為是整个現象世界的基础……的那些东西。”（貝克《模仿及其对心理学和人种学的意义》1904年萊比錫版第33頁）但問題却在这里：康德主义者迄今还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認識論是否同发展学說協調，甚至当有人建議他們考虑这点的时候，他們反而觉得很奇怪。我記得，当我在同施米特的爭論中反对康德而提出上述引文中貝克所提出的那些見解时，我的朋友康德主义者却輕蔑地聳聳肩膀。但是，真理总要胜利的，現在甚至象文德尔班这样的可以說是不可教的康德主义者，也不得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問題：信奉发展理論的人能否承認時間的“現象性”（die Phaenomenalität der Zeit）（見他的論文《一百周年紀念》，載《紀念康德》文集，1904年柏林版，第17—18頁）。

文德尔班发现：科学在这里向康德主义提出了“困难的^{問題}”。但“問題”在这个場合不是“困难的”，而只不过是沒有^{解決}而已。

发展是在^{時間}中进行的，但在康德看来，時間只是主觀的直觀形式。如果我信奉康德哲学，那末只要我講到在我^{之前}的东西，即講到沒有我因而也沒有我的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間的时候存在的東西，我就自相矛盾了。誠然，康德的学生企图用下面的論調来摆脱这个困难，他們說：康德指的不是个別人的直觀和思維的形式，而是全人类的直觀和思維的形式。但这个論調是无济于事的，它只会造成新的困难。

第一，我应当承認：或者是別人僅僅在我的表象中存在着，在這種情形下，別人在我之前並不存在，在我死後也不存在；或者是他們在我之外和不依賴於我的意識存在着，在這種情況下，關於他們存在於我之前和我之後的思想，當然沒有任何矛盾，但在这里，對康德哲學來說馬上又產生了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人們存在於我之外，那末這個“我之外”就是指憑我的頭腦結構而在我看來是空間的那種東西了。因此，空間不是僅僅主觀的直觀形式，同它符合的也有某種“自在的”（《an sich》）客體。如果人們生活在我之前和我之後，那末同這些“我之前”和“我之後”相符合的，顯然也有某種“自在的”東西，這種東西不依賴於我的意識，並且僅僅以時間的形式反映在我的意識中。因此，時間也不是僅僅主觀的。最後，如果人們存在於我之外，那末他們就屬於那些自在之物了，關於對它們的認識的可能性，我們唯物主義者是同康德主義者有爭論的。如果他們的行為能夠這樣或那樣地影響我的行動，而我的行動能夠影響他們的行為（關於這一點，凡是認為人類社會及其文化發展不只是存在於自己的意識中的人，都必定會承認的），那末因果性範疇也顯然適用於實際地存在着的外部世界，即適用於本體世界、自在之物。一句話，出路只有一條：或者是主觀唯心主義，它徹底導致唯我論（即承認別人只存在於我的表象中），或者是拋開康德的前提，這樣做的邏輯結果，象我在同康拉德·施米特的爭論中所早已指出的，一定會轉到唯物主義的觀點上去。³³⁴

我們再往下談吧！我們在想象中使自己處身於地球上只有人類的極遙遠的祖先存在的那個時代，如第二紀。試問：那時候的空間、時間和因果性是怎樣的呢？那時候它們是誰的主觀形式呢？是魚龍的主觀形式嗎？那時候是誰的悟性把自己的規律加給自然界呢？是始祖鳥的悟性嗎？康德哲學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它和現

代科学完全不能相容，它应该被抛弃。

唯心主义说：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地球的历史表明：客体在主体出现以前早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具有明显的意识的有机体出现以前早就存在了。唯心主义者说：悟性把规律加给自然界。有机界的历史表明：“悟性”只是在高级发展阶段上才出现。由于这种发展只有用自然规律才能加以说明，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然界把规律加给悟性。发展理论揭示出唯物主义的真理。

人类历史是总的发展过程中的个别情况。所以上述论点也回答了能否把康德学说跟对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结合起来的问题。当然，折衷主义者在自己的头脑中可以把一切东西结合起来。采用折衷主义的思维方法，不仅可以把马克思同康德结合起来，而且可以把马克思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结合起来。至于说到那些彻底地思维的人，那末，马克思和康德哲学的非法同居，在他们看来完全是骇人听闻的。

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说：哲学家的最大的义务就是要做个彻底的人，但正是这点通常却见得最少。在谈到康德本人以及他的那些想把康德同马克思结合起来的哲学门徒和帮手们时，我们不知不觉地想起了他的这个意见。

“马克思的批判者们”（其中包括上面提到过的可怜虫康拉德）多次大叫大嚷说：恩格斯以为实验和工业最有力地驳斥了外部世界不可认识的学说，这暴露出他对康德的根本不理解。其实，恩格斯是完全正确的。人的任何实验和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人为了有意识地引起某些现象而对外部世界采取的一种能动态度。但现象是自在之物对我作用（康德说：自在之物对我的影响）的结果，因此在我进行实验和生产某种产品时，我用某种自己预定的方法使自在之物“影响”我的“自我”。因而，我至少知道自在之物的某些特

性，即我借以使自在之物发生作用的那些特性。但还不止此。当我用某种方法使这个物作用于我的时候，我就同这个物发生因果关系了。而康德说，原因的范畴同“自在之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此，在这里实验对康德的驳斥，比他自己对自己的驳斥更为有力。康德是这样自己驳斥自己的，他一方面说原因的范畴只同现象（而不同自在之物）有关系，而另一方面又说“自在”之物作用于我们的“自我”，也就是说，“自在”之物是现象的原因。由此还可以说：康德认为“我们思维的形式”（范畴或“悟性的基本概念”，如因果性、相互作用、存在、必然性）仅仅是“先天的形式”，即自在之物同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等无关，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实，我们思维的基本形式不仅符合于自在之物间的关系，而且不能不符合于这些关系，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因而我们“思维的形式”也就不能存在。诚然，我们在寻找这些基本形式时很容易会犯错误，我们会把完全不是范畴的东西当作范畴。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同这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谈一点意见：当我们讲到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时，我们决不想以此说明，任何一位哲学家对外部世界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好吧，就算康德不对，就算他的二元论经不住批判。但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本身毕竟是不可证实的。你怎样指出休谟不对呢？怎样指出贝克莱之类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对呢（贝克莱的观点你在这条注释的一开始就已经讲过了）？

对于主观唯心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谁能够对于我在前面所指出的那种在逻辑上必然会导致唯我论的哲学感到满意，那末同这样的人争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要求他有彻底性。对这样的人来说，彻底性就是连他自己的诞生也要加以否定。除开“自我”什么也不承认的唯我论者，如果承

認他的母亲不仅在他的观念中存在着或者存在过，那末当然就造成一个重大的邏輯錯誤，即作了一次真正思想上的拚命跃进。而且，誰也沒有在自己的誕生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因此唯我論者根本沒有根据称自己是“女人生的”。但是，对于这种唯心主义只有不幸的波普里欽的头脑才会感到滿意。这种唯心主义无非是要导致那种怀疑外部世界可知性的荒謬的批判主义。休謨說过，人应当行动、推理和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我們唯物主义者只要加上一句就行了，即：这样的“信仰”是含义最好的批判的思維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哲学的不可避免的拚命跃进³³⁵。哲学的基本問題不是靠“自我”与“非我”即外部世界的对立来解决的。这样的对立只能把我們引到荒唐的死胡同里去。要解决上述問題，必須走出“自我”的圈子，并且看看“他”（具有意識的有机体）同周围的外部世界有什么关系。但是，只要这个問題具有这个唯一合理的形式，我們就馬上会清楚地看到：一般“主体”，包括我的“自我”，不仅不把規律加給客觀世界，而且自己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組成部分，只是从另一个方面、即从思想方面来看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象斯宾諾莎所說的从广延方面来看的組成部分^①（斯宾諾莎是一个无可怀疑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哲学史家們却不承認他是唯物主义者）。

思想的这一决定性的步驟也把休謨的怀疑論的難題解决了。不言而喻，当我怀疑外部对象的存在时，外部对象之間的因果联系問題，在我面前必然具有在休謨那里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我只有权利講我自己的那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印象的順序性。但是，当我的思想活动使我深信对外部世界的存在的怀疑会使我的理智陷入謬

^① 參閱费尔巴哈的話：“就我來說，或者就主觀來說，是純粹精神的、非物質的、非感性的活動，而就其本身來說，即就客觀來說，却是物質的、感性的活動。”（《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第350頁。）336

誤的时候，当我已經不是“独断地”，而是“批判地”宣称外部世界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时候，我从而就承認我的印象是外部对象对我作用的结果，就是說我給予因果性以客觀的意义。

当然，在思想者的某种情緒下，我所指出的思維的拚命跃进在他看来是不合法的，并且他感到自己有回到休謨的傾向。休謨的观点注定思想是完全呆板不动的，但每当休謨想思維的时候，他自己抛开了这种呆板不动性，开始“信仰”外部世界的存在了。正因为如此，回到休謨，根据恩格斯的公正的評語，同唯物主义比較起来，是一个退步。而在今天，經驗一元論者正是在这样地退步，里尔正确地把他們的哲学称为休謨哲学的复活（《現代哲学引論》1903年萊比錫版，第101頁。）

③337 关于这一点，也許可以指出的是：無論化学或生物学，最后大概都会被归結为分子力学³³⁸。但是，讀者知道，恩格斯所說的并不是关于这种力学，而这种力学不是也不能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他們的导师笛卡兒在論述“动物机器”时所指的那种力学。至于笛卡兒采用了哪些机械原来解释动物机体中所发生的各种現象，即使在他的《論情欲》（《Des passions en général etc》）³³⁹这篇著作的第一部分中也可以看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机械論世界觀和对自然界的歷史观点之間的联系是很少的，关于这一点，解释得最好的就是那本著名的著作《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³⁴⁰）。在該書第一篇第六章中，作者們遇到了关于人的起源的問題。关于人（动物学上的人）是逐漸发展的这种思想，虽然在他們看来并不是“矛盾的”，但却显然是一种完全不太可能的“猜测”。如果有人起来反对这种猜测，如果有人向他們說，“自然界借助于一定数目的一般的和不变的規律而起作用”（似乎一般的和不变的規律是跟发展相矛盾的！！），如果有人还要加上一句說，“人、四足动物、魚、

昆虫、植物等等都是自古以来就已存在并且是万古不变的”，那末作者們“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他們将会指出，这种观点并不和他們所闡明的那些真理（机械唯物主义的）相矛盾。归根到底，他們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根据这样一种想法：“人不能知道一切；他不能知道自己的起源，他不能洞察事物的本質，不能領悟第一原因；但是他能够有理性，能够有善心，他能够坦白地承認他不知道他所不能知道的东西，他不用令人不懂的詞和毫无意义的假設来代替自己的无知。”（《自然体系》1781年倫敦版，第1編，第75頁）³⁴¹这就是对那些喜欢空談“对自然界認識的界限”的人們的一个警告。

“自然体系”的作者們用“理性”的缺点来解释人类一切历史上的灾难。“人民不知道权力的真正基础，他們不敢向那些应当讓人民得到幸福的統治者去要求幸福…… 这种意見的必然結果，就是政治日益蜕化为为了一个人或某些有特权的人物的恣意妄为而牺牲大家幸福的那种宿命的艺术”等等（同上書，第291頁）³⁴²。用这种观点可以順利地反对現存的“特权”，但决不能以为这就是科学的历史观（关于这方面的更詳細的解释，可参閱別尔托夫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以及我所写的《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①。）

③³⁴³ 什么是绝对命令？为什么恩格斯这样輕蔑地来談論它？难道只是因为它暗示了一些过分崇高的理想嗎？（不，不是因为这样。）

什么是理想？“庸人的回答是：理想，这就是一种目的，它是我們在道德上所应当追求的，但它又是如此崇高，所以我們从来也不会达到它。”庸人由此便得出一个非常使他高兴的結論：“对理想的

① 《唯物主义史論丛》。

信仰”是和那些至少跟“理想”毫无共同之点的行为相一致的。在七十年代，俄国曾有过这样一些“有理想的”宪兵军官，他们在逮捕“虚无主义者”的时候向他说：社会主义的确是很好的东西，再也不可能想出比社会主义更好的东西了，但是理想是不能达到的，既然生活在人间，那就应该去想一些人间的事情，而“人间的事情”要求他这位有理想的宪兵军官去“搜寻和呈报”那同样是有理想的虚无主义者，于是他就来“搜寻和呈报”了。宪兵们说自己渴望着“理想”，说得更正确些，他们是在撒谎。让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我们的“合法的”民粹派曾经诚心诚意地追求过自己的“理想”。但是请看，他们对它的诚恳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社会理想，就是不受政府和上等阶层任何阻碍而独立发展的自由的“人民”。如果说政府和上等阶层在民粹派的理想中没有被完全消灭，至少可以说在他们的理想中已被涂抹得一干二净了。那末民粹派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呢？他们有时候只是为“基础”的腐朽而痛哭流涕（按照格·伊·乌斯宾斯基的说法：“为数目字而哭泣”）³⁴⁴，有时候向政府建议增加农民的份地并减轻纳税的负担，有时候——这也可以说是最彻底最干脆的方法——“到农村去”。但是，这一切完全不能促使俄国的现实接近于民粹派的理想。这就是为什么民粹派不但为数目字而流涕，而且也要自怨自艾的原因。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为什么会是软弱无力的呢？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现实是一回事，而理想又是另一回事，最好是说，理想仍然是理想，它和合法的民粹派先生们在一起继续“留在农村”中。因此，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正因为这样，理想便日益变得软弱无力了。当然，对于这种理想，恩格斯也许会象黑格尔那样来讥笑它。但是在这里的讥笑并不是嘲弄这种理想的崇高性，而是

嘲弄它的軟弱无力，嘲弄它脱离了俄国的运动的一般进程。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目的：解放无产阶级。他也曾有过“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他的理想，也就是现实，但这是明天的现实，是将要发生的现实，它将要发生并不是因为恩格斯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而是因为目前现实的特性就是如此，因为那可以叫做恩格斯的理想的明天的现实，是应该从目前的现实中，应该按照目前现实本身的内部规律发展而来的。无知的人们会向我们问道：既然一切都归于现实的特性，那末恩格斯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理想来干预难免的历史过程呢？难道没有他就不行了吗？从客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的原理是这样的意思：现实在其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中，吸引了他，把他当做行将到来的变革的必要工具之一。从主观的一面来看，恩格斯非常乐意参加历史运动，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职责和一生的伟大任务。社会发展规律，如果没有人的中介作用，很少能够实现，正如同自然规律如果没有物质的中介作用也是很少能够实现的一样。但这完全不是说“个人”就可以忽视社会发展的规律了。如果忽视的话，他将至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即变成可笑的唐·吉珂德。

〈施塔姆勒在《Wirtschaft und Recht》^①这部著名的著作中，在这样的問題上——即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认为促进这一革命的到来又是必需的——表现了极大的困惑莫解。在施塔姆勒看来，这就好象为了促进天文学上不可避免的月蚀而建立政党一样，同样是奇怪的³⁴⁵。但是，这种意见，象他的全书一样，说明了他完全不懂得作为现代

① 《经济和法律》。

社会主义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約·普利斯特萊就說得非常正确：“Though the chain of events is necessary, our own determinations and actions are necessary links of that chain”，这就是說，“虽然事件的鏈条是必需的，但是我們自己的决心和行动乃是这一鏈条上的必要的环节。”（《Disquisitions》，第1卷，第110頁）康德認為普利斯特萊是宿命論者。但是这里有什么宿命論呢？它連一点影子也沒有，关于这一点，普利斯特萊本人在和普萊斯爭論时就已經指明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絕對命令。这倒底是什么呢？康德把凡是具有“應該的特征”的那些規則叫做命令。命令有假言命令和絕對命令。假言命令所規定的仅仅是同某种願望的行动有关的意志。絕對命令所規定的是同这种或那种可寻求的目的无关的意志。絕對命令“甚至在我还没有問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产生可寻求的行动，或者为了产生这种行动我應該做些什么以前”，就决定了意志本身。因此，除了應該的特征以外，絕對命令还有絕對必然性的特征。如果有人向某人說：你應該工作并應該积蓄几个錢以防时运不济，那末这就是假言命令。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想在晚年过穷困的生活，而他又不能用其他方法保證自己不遭受貧困，这时他才應該积蓄金錢。但是，“不妄許諾言”这个規則所談到的只是人的意志本身，并且同該人所追求的那些目的毫无关系。这个規則先天地（a priori）規定了欲望。这也就是絕對命令。康德說，“因此，实践規律只是与意志有关，而和通过意志的因果性产生什么东西却毫无关系。而且为了使这些規律成为純粹的規律，即使抛开这种因果性也沒有什么关系”（《实践理性批判》，索柯洛夫譯，1897年圣彼得堡俄文版，第21頁）³⁴⁶。

其实只有一种絕對命令，它的內容是这样的：你的行动應該

根据你想把它提升为一般规律的那个规则(《Grundlegung zur Methaphysik der Sitten》, 1897年莱比锡德文版, 第44页)³⁴⁷。

康德引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思想。某人如此不幸,以致生活已经成为他的重担,于是他便问道,是否允许他自杀。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在绝对命令中可以找到。如果自杀成了一般规律,那末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将会是生命的终止。可见,自杀是与道德不相符的。还有一个例子。某人托另一人保管财产,试问可否允许这个人隐藏它呢?这个问题,在康德看来,也是用绝对命令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人人都隐藏了别人托付给他的财产,那末谁也不肯把财产托人保管了。第三个例子是:一个富裕的人如果帮助穷人是不困难的,但是他不肯这样做。这是否和道德义务相矛盾呢?是矛盾的。任何人都希望这种行为成为一般规律,因为每个人都会突然处于窘困的境地。

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康德的思想,但是它们也暴露了他的思想的破产。黑格尔就公正地指出过³⁴⁸,关于托付财产这个例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本来人们可以这样问道:即使不把财产托人保管,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人这样回答:这样一来就很难积蓄财产了,而财产本身最后也将会散失了,那末难道人们不能也这样来问一句:为什么需要财产呢?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在康德的学说里,没有一条道德规律是说得清楚的,是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没有矛盾的,是不依赖于其他定义的。这一点说得很正确,而且这一点特别是在关于自杀这个例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本来这个例子所谈的根本就不是关于所有人的自杀,而只是关于那些痛不欲生的人的自杀,这些人的自杀还不能算是终止了他的生命。

黑格尔说,不仅如此,康德的每一条道德规律都是空话,都是

象 $A=A$ 这个公式一样毫不說明問題的同語反复：托付的财产就是托付的财产，财产就是财产。这一点也是說得很公正的，而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康德說来，根本就不存在黑格尔針對着他的“空話”所提出来的那些問題：例如即使不把财产托人保管，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需要财产呢？等等。康德的理想，他的《目的王国》（《Reich der Zwecke》，見《Grundlegung》第58頁）³⁴⁹，乃是資產階級社会的抽象的理想，它的标准，在康德看来，就是不能反駁的“实践理性”的命令。康德的道德就是資產階級的，用他的哲学語言来翻譯的道德。它的主要缺点，我們已經知道，就是它完全不能解决关于发展的問題。为了証实这一点，我还要談一下前面从康德那里所引来的第三个例子。但是，我要先請讀者注意：康德是坚决反对功利主义的道德的。在他看来，在幸福的原則中，除了願望的能力所固有的那些东西以外，并不包括任何其他决定意志的基础。但是，决定意志的理性不会理会这种低級的能力。理性和这种能力是不相同的，甚至即使多少掺杂一点这种能力所引起的动机，“也会使理性失去力量和优越性，同样地，多少掺杂一点經驗，象数学論証中的条件一样，也会降低和消灭論証的全部效果”（《实践理性批判》，第27頁）。道德的原則就是对期望的对象的独立性。

这种对期望的对象的独立性，早就是开玩笑和写諷刺詩的題材了（例如，請參閱席勒、歌德的《短諷詩》³⁵⁰）。我在这里不能把它重述出来^①。我只想說，关于以上所举的康德的第三个例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如果我们采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并强迫我們的“实践理性”去考慮我們的“願望的能力”，才能承認这个例子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在康德看来，我所以應該帮助別人，是因为我自己有时也需要別人的帮助。还有什么比这更上算的事嗎？此外，我还想請讀者注意这个情况：康德在反駁功利主义者的时候，总是指

“个人幸福”的原则而言，他很正确地把它叫做自私的原则。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就不能解决道德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道德的基础不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是对整体的幸福，即对部落、民族、阶级、人类的幸福的追求。这种愿望和利己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相反地，它总是要以或多或少的自我牺牲为前提。而且社会感情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并可以因自然选择而日益加强（关于这方面的极中肯的说明，请参阅达尔文所写的关于人的起源那本书³⁵²），所以自我牺牲有时可以具有以下这样的形式：似乎自我牺牲就是绝对不掺杂有任何“愿望能力”的“自治意志”的问题。但是，这种无可争辩的情况丝毫不排除这种崇高能力的功利主义基础。如果自我牺牲的精神对于某一个社会、阶级毫无用处，或者对于某一种动物的生存斗争毫无用处（我们知道，社会感情不仅仅是人所固有的），那末它对这一社会、阶级中的个人人物或这一种动物中的个别动物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这种个人人物生而就有先天的“自我牺牲的能力”，正如同他——根据我们在前面注释⑦中所引证的莱因凯的意见——生而就有“先天的”呼吸能力和消化能力一样，但是在这种“先天性”中没有任何玄妙的东西，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起来的。

① 这就是《知麟诗》中的一段：

Gewissenskrupel

Gerne dien'ich den Freunden, doch thu'ich es leider mit Neigung
Und so wurmt es mir oft, dass ich nicht tugendhaft bin.

Decisum

Da ist kein anderer Rat, du musst suchen sie zu verachten,
Und mit Abscheu alsdann thun, wie die Pflicht dir gebietet. 351

（这就是说：——良心的苛责；我甘愿为友人牺牲，遗憾的是虽然我满腔热忱，但又唯恐不具善心。解决的方法：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痛恨他们，只有厌恶地去做义务命令你要做的一切。）

根据发展和社会效用的观点，象黑格尔用来反駁康德的道德規律的那些問題，例如为什么要把财产托人保管，为什么需要财产等等，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我再重复一遍——康德及其信徒不会运用发展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在道德学說中比在認識論中暴露得还要明显。我們應該常常想到康德的認識論，同样地，在这里我們也應該常常記住康德本人的話：“一个哲学家的最伟大的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彻底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点通常却見得很少。”

康德的同时代人雅科俾曾經反駁康德的道德学說，他在写給費希特的一封信中这样說道：“是的，我是无神論者，我不相信神，为了反对那种对任何东西都不希望的意志，我希望象捷斯得蒙临死时那样撒謊，象冒充奧勒斯特的比拉那样来撒謊和欺騙，象季摩列昂特那样来杀人，象意巴密嫩达和揚·得·維特那样来破坏法律和违背誓言，象奧頓那样来实行自杀，象大卫那样来鏟平庙宇教堂，甚至仅仅是因为我飢腸轆轆而想在安息日的时候去采摘麦穗。法律是为了人制訂的，而不是为了法律才創造了人。”这真是妙极了。黑格尔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認為雅科俾的这些思想“是非常純洁的，因为这些話虽是用第一人称来表达，例如‘我是’、‘我希望’，但并不影响这些話的客观性”³⁵³。但是，法律是为人服务的，而人不是为法律服务的，——这种完全正确的思想却給功利主义道德（按照真正的即客觀的意义所理解的）提供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①³⁵⁴ 黑格尔就曾經指出过，从道德观点来看历史事件，这是荒誕的（參閱他的《历史哲学講演录》，《黑格尔全集》，第1版，第9卷，第67頁）。但是我們的“先进的作家”至今还不懂得這句話的正确性（的确，关于這句話，他們甚至还未必听見過）。他們看到随着人民生活的旧“基础”、即遭到千人指万人罵的基础的崩潰以后所发生的风俗的败坏而真心地悲伤不已。在他們看来，工厂无产

阶级就是藏垢纳污之所。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所谓劳动者的道德的败坏，即首先是跟过去所建立的那种永世不移的道德决裂。关于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者在“先进的”俄国作家发现它以前早就知道了（例如，请参阅恩格斯的《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Leipzig 1845，第120页及以下各页^①）。但是恩格斯并不幻想父权制关系的恢复，而最重要的是他懂得了，从工厂无产阶级的“不道德的行为”中将会产生出新的“道德”，产生出与现存的旧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道德，这种道德最后一定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劳动者不会再“堕落腐化”，因为使他們“堕落腐化”的那些根源都将消灭掉了（第256页及以下各页）。关于最近俄国“先进”思想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说：我們甚至沒有想到西方先进思想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确实知道的那些东西。老实说，这就是为什么叫人失望的原因！

（这些话是在1892年写的，当时我們和不合法的民粹主义（以“民意派”的残余形式保留下来的）的争论还在继续着，同时我們和合法的民粹派的论战也还是刚刚才准备起来，这个论战在九十年代的后五年之間特別尖銳化了。如今我們的“先进的”作家沒有功夫去为“旧基础”的崩溃而悲伤了，他們現在已經不再为我們出現了无产阶级而惋惜了。生活本身如今已向他們表明了这个阶级的革命作用是多么的伟大；“先进的”刊物如今也不惜篇幅来恭维它了。俗話說，晚做胜于不做。可是我要說，迟做不如早做。如果我們的“先进”人士早一些放弃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單純的“痼疽”的那种荒謬观点，如果他們在放弃这种看法以后就全力来促进这个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錫版，第120页及以下各页，355

階級的自我意識的發展，那末臭名遠揚的“黑色百人團”就不会起他們現在所起的那種危險的政治作用了。所謂“先進的”知識分子對民粹派偏見的頑強而長期的堅持，老實說，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犯罪行為，如今鐵面无私的历史正在严厉地懲罰這種行為。）

①³⁵⁶ 談到原始社會，那末摩爾根的研究（參閱他的《古代社會》³⁵⁷，這部著作最初是用英文出版的，現在已經有了德文譯本、俄文譯本），如果沒弄錯的話，還有波蘭文譯本）就出色地証實了馬克思的历史觀點。某些心懷叵測的批評家硬說摩爾根關於氏族生活的結論只是根據了對北美洲紅種人的社會生活的研究才得來的。我們只要讀完他的這本書，就可以知道類似這種“批評的”意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同樣，我們只要詳細地，也就是說，從原始材料中考察一下古希臘羅馬世界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摩爾根和恩格斯關於這一點所說的一切是多麼令人信服了（參閱恩格斯的著作《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³⁵⁸。然而，儘管許多學者對摩爾根的著作採取敵視的態度，但是他的天才的思想，對於近代人種學來說，並不是沒有用處的。在北美洲，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許多人種學家的學派，他們的著作登載在斯密特遜研究院每年出版一次的——非常卓越的——《reports》^①上，這些著作對於從唯物主義來解釋原始社會的历史提供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材料。在歐洲，在根據摩爾根的著作所寫的那些作品中，應當首先提出我們的德國同志亨·庫諾夫所寫的關於澳洲黑人的血統、關於墨西哥和印加帝國的社會制度以及關於同“野蠻”部落的生產力發展有關的母權制的有價值的作品³⁵⁹。談到歐洲，話又說回來，我們應當承認

① 《報告書》。

摩尔根的思想在这里的影响至今还是很小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人种学”在这里对社会现象愈来愈经常地采取纯粹唯物主义的解释了。我并不想使卡尔·斯坦宁这样的研究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感到兴趣；至少在他的著作中根本看不出他对这个理论多少有一点熟悉。然而在他的《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Berlin 1894^①，这本极有教益的书中，从头到尾一贯运用的却正是“经济”唯物主义者³⁶⁰所推荐的方法，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运用得很成功。甚至那位认为必须表白自己不是唯物主义的拉采尔（参阅他的《Völkerkunde》II, S. 631）^②，也认为“精神”文化发展的原因是依赖于“物质”文化的发展的。他说：“每个民族在每个发展阶段上的总的文化成果都是由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组成的。这些成果是用不同的手段得到的，不是同样轻而易举地得到的，也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得到的……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就是物质文化的成果。”（同上书，第1卷，第17页）³⁶¹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沒有经过彻底深思熟虑的，因此它有一部分是不彻底的，有一部分是素朴的。我们在专门论究原始“文化”某一特别领域，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某种“思想体系”的发展问题的许多著作中，也可以遇到这种所谓完全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因此也是素朴的、多少有点不彻底的唯物主义。例如，对原始艺术的考查，已经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要证明这一点，可以把在欧洲和北美合众国所出现的著作开列出一个很长的书单子，但是我只想指出目前已有俄文译本的格罗塞的著作《Die Anfänge der Kunst》（《艺术的起源》）和毕歇尔的《Arbeit u. Rhythmus》（《工作和韵律》）³⁶²。有趣的是后一部著作乃是出于这样一个人的手笔，他对

① 《在巴西中部的原始氏族中》，1894年柏林版。

② 《人种学》，第2卷，第631页。

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的看法是和唯物主义的看法直接对立的（从毕歇尔曾经写过关于游戏和劳动的相互关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但是，甚至由于这些或那些偏见而不乐于承认真理的资产阶级学者，如今也未必能摆脱真理的影响。显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社会科学中即将出现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所观察到的一切：即一切现象都用唯物主义来解释，而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却被当作毫无根据的思想而被否定。如何解释对唯物主义的这种两面态度呢？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革命的世界观，而西方国家的“有教养的阶级”现在根本不倾向于革命。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诽谤“有教养的阶级”，其实这一点从一位美国人爱德文·罗·安·塞利格曼所写的《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New-York 1902^①这本有趣的小册子中也可以看出来。塞利格曼教授直截了当地说：从学者的眼光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自己同社会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见该书第90页），由于自己用了许多荒谬的夸张言辞（《absurd exaggerations》），其中也包含对一般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否定（见该书整个第4章）³⁶³，而害了自己。塞利格曼既然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正确的，他既然希望其他学者也承认它的正确性，所以他力求证明可以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不赞成绝大多数拥护它的人至今所得出来的无神论的结论和社会主义的结论。应该承认，塞利格曼，按照他自己的立场来说，是正确的，因为他所提出来的逻辑方法，虽然有某些不彻底性，但显然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也可能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资产阶级学者都听从塞利格曼向他们所提出的劝告，放弃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夸张言辞”，当然他们只会犯一个

① 《经济史观》，1902年纽约版。

大錯誤。但是，如果他們完全否認历史唯物主义，那末他們所犯的将不止是一个錯誤，而是許多錯誤。两害相比，可見前者为害究屬較小。

但是，无论怎样說，已故的尼·米海洛夫斯基毕竟是犯了严重的錯誤。他在和“馬克思的俄国弟子們”的爭論中，硬說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自己內在的弱点，不能吸引全世界學者們的注意力。如今全世界的學者們的注意力从各方面都被它吸引过来了。虽然資产阶级的學者們，根据上述原因，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很少肯于承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但是如今甚至地理学家在專門的著作中也常常地提到它了，而且象柏林地理学会的某些會員就已經費了不少精力来和它斗爭。这是当代的一件令人愉快而十分重要的事情。>

〔原校訂本第一版的注释〕

注释⑥的末尾

关于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可参閱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新的俄譯本已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还可参閱阿德勒(“不是那个”阿德勒，即不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者)的《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德国早期社会政治运动史》)。从这本不能令人满意的書中，讀者将会知道卡尔·格律恩的活动。“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变种之一，但其中已完全失去了这样的深刻思想，即欧文、圣西門、傅立叶等空想主义者的著作所表达的思想。“真正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起而反对“政治”，并且完全不理解什么是阶级斗争。大家知道，某些俄国的同样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至今还犯有上述的錯誤。关于“政治”，我們現在的議論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我們总是認為政治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不是說，我們都对政治有正确的看法。誰把社会主义和政治对立起来，誰不理解任何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誰說“首先研究政治，打倒专制，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就是絲毫沒有超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就是不了解工人阶级的政策，并且他大概会坚持那种跟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任务沒有任何直接关系的政策。

注释⑦的末尾

例如，我們知道，根据康德的学說，自在之物作用于我們，从而

提供为我們的意識所加工的材料。但是，正如宇伯威希所公正地指出的（《近代哲学史》俄譯本第 233 頁），“作用包含着時間性和因果性，而另一方面，康德認為作为先天形式的時間性和因果性仅仅在現象世界的範圍內才有意义，而在現象世界的彼岸則沒有意义”。諸如此类的其他矛盾可以指出不少，当然在这短短的注释中不能一一列举了。

現在，某些德国和俄国的“哲学家”兴致勃勃地大談“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問題。在他們看来，似乎他們在这个問題上說出了异常深刻的真理。但这是一个大錯誤。黑格尔已經完全正确地指出，“自在之物”无非是失去任何固定特性的空洞抽象，关于它，我們之所以什么也不能知道，正是因为它是失去任何規定性的抽象。我們不知道自在之物是什么……当然不知道！“是什么”这一問題的前提是物具有应当加以指出的那些特性，但既然我們抽去物的一切特性，我們当然不能回答物是什么的問題，因为在这个問題上已經沒有回答的可能了。先驗唯心主义把物的一切特性，無論是形式或內容方面的特性，都“移入”意識中。显然，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象这样一些情况，如树叶在我看来是綠的而不是黑的，太阳是圓的而不是四边形的，糖是甜的而不是苦的，鐘打两下，我听到的响声是一下接着一下而不是同时发出的，我不認為第一响是第二响的原因或結果等等，都仅仅是以我的主体为轉移的了（《邏輯学》，第 1 卷，第 1 篇，第 55 頁，第 2 篇，第 150 頁）。

但讀者会这样反駁說：对不起，顏色或声音难道不是純粹主觀的东西嗎？难道顏色或声音的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运动是一个东西嗎？完全不是，但是“同我們感觉到的声音的任何振动和传播在强度、高低、持續性上相符合的，乃是现实界声响运动的十分确定的变化。作为感觉的声音和光是人类机体的产物，但我們看到

的形式和运动，完全象我們听到的声音的抑揚頓挫一样，其根源是在我們之外的现实中。”（謝切諾夫：《具体的思想和现实》，载《救济飢餓者》文集，《俄罗斯新聞》出版社版，第188頁）总之，“不管离开我們意識的外部对象本身是什么样的，就算我們从外部对象得来的印象只是一种記号，但無論怎样，同我們感觉到的記号的异同相适合的是现实的异同。換一句話說：人在他所感觉到的对象之間发现的异同就是现实的异同。”（謝切諾夫，同上書，第207頁）在黑格尔指明了自在之物的邏輯的起源之后，即使有人还想談論自在之物，也不能推翻謝切諾夫的这些话，因而也不能談論什么自在之物的不可知性。

我們的感覺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訴我們的特种象形文字³⁶⁴。象形文字不同于它們所传达的那些事件。但是，它們能够完全正确地传达事件本身以及它們之間的关系（而且后者是主要的）。恩格斯說，对康德的理論駁斥得最有力的是实验和工业。如何理解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引証的謝切諾夫的話已部分地說明了。但这也許并不妨碍我們稍微詳細地講一講这个問題。任何实验和任何工业，即有意識地为了引起某些現象而进行的人們必需品的生产，就是人对自然界采取的能动态度。而这种能动态度給自然界以新的光輝，比印象的消极感知所給予的更为灿烂的光輝。其实，人利用其自然規律的知識，能修建电气化鐵路。这就是說，人本身在有意識地引起某些現象（电轉化为本来意义上的运动等等）。但康德哲学所謂的現象是什么呢？它是由以下两种力量合成的：（1）我們的“自我”；（2）自在之物对这个“自我”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在引起某种現象时，就用某种預定的方法使这个“物”作用于我的“自我”。因而，我至少知道它的某些特性，即我借以使用物发生作用的那些特性。但还不止此。当我用某种方法使这个物

作用于我的时候，我就同这个物发生因果关系了。而康德說，原因的范畴同“自在之物”是沒有任何关系的，因此，在这里实验对康德的駁斥，比他自己对自己的駁斥更为有力。康德是这样自己駁斥自己的，他一方面說原因的范畴只同現象（而不同自在之物）有关系，而另一方面又說“自在”之物是現象的原因。由此还可以說：康德認為“我們思維的形式”（范畴或“悟性的基本概念”，如因果性、相互作用、存在、必然性）仅仅是“先天的形式”，即自在之物同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等无关，这是一个极大的錯誤。其实，我們思維的基本形式不仅符合于自在之物間的关系，而且不能不符合于这些关系，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們就不可能生存，因而我們“思維的形式”也就不能存在。誠然，我們在寻找这些基本形式时很容易会犯錯誤，我們会把完全不是范畴的东西当作范畴。但是，这是另一个問題，同这里沒有什么直接关系。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只談一点意見：當我們講到存在和思維的基本形式的同一性时，我們決不想以此說明，任何一位哲学家对这些基本形式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好吧，就算康德不对，就算他的二元論經不住批判。但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本身毕竟是不可証实的，你怎样証明貝克萊之类的主觀唯心主义者不对呢？（貝克萊的观点你在这条注释的一开始就已經講过了？）可以証明这一点：請讀一讀与此有关的字伯威希的著作吧！

注释④的末尾

关于康德的絕對命令……但是，是否應該再談談它？其实任何哲学史总会比我們在这寥寥数行的注释中解释得更好。請不妨讀一讀字伯威希—海因澤的《近代哲学史》的俄文譯本第245—256頁。要是誰再有兴趣想知道黑格尔正是如何嘲笑这种絕對命

令，那末我們就特別介紹他讀一讀《精神現象学》（德文原著第1版）第550—581頁。本來我們只是想指出：如果說恩格斯對這種“難以實現的理想”採取鄙視的態度，那末，這並不是由於他庸俗地有意去順應任何社會制度，他所鄙視的僅僅是康德身上的那些馬尼洛夫精神而已。我想，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注釋①的末尾

關於經濟需要和經濟關係在古代東方歷史中的作用，在列·伊·梅契尼柯夫的《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uves historiques》（《文明和偉大的歷史的河流》）這本書中解釋得非常好，雖然該書的已故的作者並沒有抱定這樣的目的。這種需要和關係的作用，在列諾爾曼的那部淵博的著作《Histoire ancienne de l'Orient》（《東方古代史》）³⁶⁵中，就已特別引人注目。關於中世紀歷史和中世紀制度的起源問題，我們要指出奧古斯丁·梯叶里、基佐、茂勒，並稍微提一下伏斯切爾-德-庫蘭斯。最後，經濟關係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近代歷史上的意義，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馬克思的《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路易·波拿巴政變記》）³⁶⁶這部最卓越的著作中。我們就不提《資本論》了，這部著作象歷史著作一樣，也是非常精彩的。一般說來，歷史科學每向前跨進一步，都提供了對“經濟唯物主義”有利的新的證明。由此也產生了這樣的情況：許多歷史學家、作家，如今都“不依賴於馬克思”（也就是說，他們一點也不懂得他的理論）而發現了——說得正確些，在煙霧迷蒙的遠方看見了——早被發現的新大陸上的一小塊土地。但是，對他們說來，象這樣的“脫離”當代最重要的歷史理論，並沒有使他們未受處罰，關於這一點，至少從已經譯成俄文的日羅-台龍的關於家庭歷史的那本書³⁶⁷中也可以看出來。

馬克思的历史理論仍将要成为許許多多个別历史研究的基础。它的全部意义,甚至对于許許多馬克思主义者說来,如今还不是很清楚的。象保尔·巴尔特先生(参閱他的《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①)这样一类“哲学家們”还在惊异地問道:到底在哪些著作中証明了馬克思的理論是正确的。这只不过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无知,或者說,缺少判断力,康德曾經公允地承認缺少判断力是不可救藥的毛病。

① 《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往时的有产者³⁶⁸

“几乎一切人和一切民族的不幸都是发生于他们的法律的不完全和财富分配的太不平衡。在多数国家里只有两个阶级的公民：一个阶级连最需要的东西都感觉到缺乏，而另一个阶级则富裕得喘不上气来。第一个阶级只能靠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对一切人都是肉体上的痛苦，而对于某些人却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折磨。第二个阶级沉溺在奢华生活中，但是正由于此却寂寞而颓唐。颓唐正如贫穷一样是可怕的不幸。所以在大多数国家里住着的都是不幸的人们。为了把幸福还给他们，应当做些什么呢？减少一部分人的财富和增加另一部分人的财富；使没有财产的人处在这样顺利的情况中，即他们工作七或八小时以后，能得以满足自己的和自己的家庭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那时候他们将变得幸福，至少是在他们能力范围所能达到的那种程度”³⁶⁹。

在一百多年以前，爱尔维修就是这样的议论，他深信，“假如一般说来，劳动被认作是不幸，那末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多数的国家为生存所必需的資料是只有靠力不胜任的劳动才能得到，是因为关于劳动的概念，由于这关系，和关于痛苦的概念是永久联系在一起”³⁷⁰。他补充说，“适度的劳动一般说来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时间之最愉快的利用，假使我们不去满足其他的一些需要和不让自己醉心于其他的一些肉体的快感，这些快感虽然很鲜明，是时间上最不經久的”³⁷¹。

无疑地，爱尔維修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有产者。在他看来财产的权利是所有权利中的第一个和最神圣的一个。但是爱尔維修时候的有产者和现代的有产者是不相象的。那时候的有产阶级是能具有高贵的意图的。在对僧侣和贵族，对“有产者的权力”，对大臣們和有特权的人們斗争时，它是在为全人类的事业而斗争。它的一些开明的代表們的理想完全不是那一种如象后来几千个资本家吮吸以百万計的工人們的血汗为生的社会。相反地，十八世紀的哲学家們所梦想的正是由财富不平等的有财产者們所组成的社会，但是在它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和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而劳动的。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梦想。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规律都矛盾的。

但是当哲学家們怀抱着这一梦想的时候，他們不能成为剝削者們的保护者。而且他們常常对后者說一些令他們十分不愉快的事情。

由此看来，爱尔維修已經理解到了企业家們的利益是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矛盾的。他說过，“在已知的关系中，沒有东西如象被剝夺财产的人占大量的数目那样地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然而沒有东西比它更符合于商人的利益。沒有财产的人数越多，商人們支付給他們的劳动的代价愈低。……而在商业的国家商人常常是眞正的力量”³⁷²（爱尔維修想說——在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

另一个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霍尔巴赫对于这样的一种制度很憤慨，在它里面“整个諸民族必須劳动，遍体流汗，以眼泪灌溉地面只是为了供养一小撮的疯人們，使其滋生奇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耽于幻想，敗坏他們的口味，这是一小群无用的、不能快乐的人，因为他們的受了损伤的想象再也知道任何的界限”。

爱尔維修已經預見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为生存的斗

爭会有些什么后果。

他說，在所有的国家，只要那里有“货币流通”存在，就发生不顧一切来求自己发财的意图。但是要想使“求发财的热情推广到公民的一切阶级，而同时又在統治的阶级中不产生盜窃和舞弊行为的倾向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那时候人們就貪婪地从事“建造港湾，扩軍，建立貿易公司，准备战争，如象人們喜欢說的，为了民族的光荣，——一句話，找任何掠夺的借口。在国内馬上出現了一切敗行，貪婪的这些产物，逐漸地感染国家的所有成員，最后把国家导向灭亡”³⁷³。

一世紀多以前所預言了的突尼斯的和巴拿馬的丑事就是这样发生的。

从爱尔維修以来情况已大大变化了。在我們今天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有产者認自己的神圣义务就是奋起反对八小时工作日被剝削者們的一切其他要求。当現代社会的生产力量在空前的規模中发展时，剝削者先生們关于任何減輕工人的劳动的話是連听也不願意听的。而同时正由于“求发财的热情”，資產阶级的腐化已經超过了它的敌人們的想象所能創造出的一切，他們却企图說服我們，說資產阶级的世界是所有世界中的最好的一个。

难道我們会上資產阶级的献媚者們的鈎嗎？

爱尔維修某一时候所曾經梦想的和我們今日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劳动日沒有把工人变得“幸福的，至少是沒有把他們变得尽可能变到的那种程度”。但是它（劳动日。——譯者）将在他們为自己的完全的和彻底的解放的斗争中給他們以新的武器。

爱尔維修不知道一种对付他所預見到的“罪恶”的“藥剂”。我們是知道这样的藥剂的，而且这还是真实的藥剂：这是作为手段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生产組織。

論一元論历史觀之發展³⁷⁴

第二、三版序言

在这里我仅改正了第1版中的笔誤和誤排之处，我并不認為有權力去更改我的論据中的任何东西，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的这本书是一本論战性的著作。在論战性的著作的內容上作任何更改，就等于用新的武器去反对論敌，而迫使他用旧的武器应战。这种手法一般地是不允許的，而在目前这一情形下更是不允許的，因为我的主要論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已經去世了³⁷⁵。

批評我們的观点的人說我們这些观点，第一，本身是不正确的；第二，在应用于俄国时特別錯誤，俄国在經濟領域中似乎将走上獨創的道路；第三，这些观点之坏就在于它們促使自己的拥护者走向无所作为，走向“无为主义”。这最后一个責备，在目前恐怕未必再有人敢于重复的了。第二个責备，同样在一切人的眼前为最近十年来俄国經濟生活发展的全部进程所推翻了。至于第一个責备，那末只要看一看最近的人种学書籍，就足以坚信我們解释历史之正确。任何关于“原始文化”的重要的著作，当說到“野蛮”民族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現象的因果联系时，每次都不能不乞援于这些观点。作为一例，我指出封·斯坦宁的《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①。可是，不必多說的，关于这点我在这兒不能多加述說。

对于我的某几个論敌，我在附录《对我们的反对者講几句话》一文中回答了，这篇文章我是用笔名发表的，因此，在說到自己的書时，把它当做我所同意其观点的第三者的書来說的³⁷⁶。可是这篇文章并未反駁庫德林先生，他在《俄国財富》上起来反对我的时候，已經在这篇文章問世之后了³⁷⁷。关于庫德林先生我在这里說两句話。

在他的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論据之中，最重要的也許是他所举出的这个事实，即同一个宗教（例如，佛教），有时为站在完全不同的經济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所信奉，可是这个論据只有在初初一看的时候才能算作有根据的。观察指明，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經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質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內容。

我想回答庫德林先生的还有这么一点。他找得了在翻譯普卢塔克的希腊文的原文上的我的錯誤并关于这点作了若干很恶毒的指責³⁷⁸。可是，实际上我在这个錯誤上是“无辜的”。当我的書印刷时，我正在旅行中，我把原稿寄往彼得堡，其中普卢塔克的引文并未引上，只指出了应该引用的那些章节。与出版此書有关的人之一——毕业于几乎和庫德林先生讀过書的同一中学的——翻譯了指出的章节和……做了庫德林先生所指出的錯誤。这是非常抱歉的。可是亦應該說，这个錯誤是論敌們所能捉住我們的唯一缺陷。对于他們，某种精神的滿足亦是需要的啊！所以，按“人道”說来，我甚至为这一缺陷而欢喜。

恩·別尔托夫

① 《在巴西中部原始人民中》。

第一章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

“假如你現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³⁷⁹——碰到一個年輕人……他甚至有些過分性急地告訴你，他是‘唯物主義者’，那末，這不是說，他是一般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者，如我們舊時代的畢希納和摩萊蕭特的信徒那樣。常常你的對談者對於唯物主義的形而上學的和科學的方面沒有絲毫興趣，甚至關於這些他只有異常模糊的概念。他想說，他是經濟唯物主義的信徒，而且這亦是在特殊的有條件的意義上……”^①

我們不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碰到過哪一類的年輕人。可是他的話能夠使人設想，“經濟唯物主義”的代表們的學說和“一般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沒有任何聯繫。這是否正確呢？在實際上，“經濟唯物主義”的內容是否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樣狹隘和貧乏呢？

這個學說的历史的概述可以作為回答。

什麼是“一般哲學意義上的唯物主義”呢？

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的直接對立物。唯心主義企圖以這種或那種精神的屬性來解釋自然界的一切現象和物質的一切屬性。唯物主義恰恰相反。它企圖以物質的這種或那種屬性和人體或者一般動物肢體的這種或那種組織來解釋心理現象。所有那些在他們看來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學家屬於唯物主義者的營壘；而所

^① 《俄國財富》，1894年1月號，第2部，第98頁。

有那些認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則是唯心主义者。这就是关于一般的唯物主义，关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所能說的一切，因为时间在它的基本論点上建立了最为不同的上层建筑，它使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較之另一时代的唯物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詳論了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向。是的，在它們之旁差不多永远存在着二元論的体系，承認精神和物質为各別的、独立的本体。二元論永远不能滿意地答复下述这个必然的問題，即这两个各別的、彼此沒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本体何以能够彼此影响。所以，最彻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远是傾向于一元論，即借助于某一个基本原則去解释現象(Monos 按希腊文是統一的意思)。任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正如任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样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論者。在这上面，例如在貝克莱和霍尔巴赫之間就沒有任何区别。一个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另一个是同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是两人都同等地是一元論者；两人同等地很好地理解二元論的(至今几乎是最流行的)世界觀是站不住的。

在我們世紀的前半期在哲学上統治着唯心主义的一元論；在它的后半期在科学上(这时候哲学已和它完全混合了)唯物主义的一元論庆祝着胜利，不过，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元論还远不是永远是彻底的和公开的。

我們在此地沒有必要叙述唯物主义的全部历史。对于我們的目的，只要观察它从前世紀下半期起的发展就够了。而且就在这里，对于我們重要的是，主要地要注意其一个——是的，最重要的——流派，即霍尔巴赫、爱尔維修及其同道者的唯物主义。

这派唯物主义者和当时的官方思想家进行了热烈的爭辯，这

身

21

些官方思想家引用他們所沒有好好地理解的笛卡兒的話，斷言：人有某種先天的（即不依賴于經驗而出現的）觀念。法國唯物主義者在辯駁這個觀點時，實質上說來，只不過闡述了洛克的學說；洛克在十七世紀末就證明先天的觀念是不存在的（no innate principles）。可是在敘述他的學說時，法國唯物主義者給了他以更徹底的面貌，在那洛克以受過良好教育的英國自由派資格所不願提及的那些地方加以詳盡的發揮。法國唯物主義者是无畏的始終徹底的感覺論者，即他們把人的一切心理功能看做是感覺的變形。要從現代科學的觀點來考察他們的論據在某些問題上滿意到什麼程度，這是无益的事。不必說，法國唯物主義者還不知道現在每個小學生都知道的許多東西：只要提起霍爾巴赫的化學的和物理學的觀點就夠了；然而他們是精通自己時代的自然科學的。可是法國唯物主義者有一個不可爭辯的寶貴的功績，即他們是從他們同時代的科學的觀點上徹底地思想了的，而這是能夠和應該要求於思想家的一切。我們時代的科學已經遠遠超過了法國唯物主義者，這是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這些哲學家的論敵對於當時的科學說來，也已經是落后的人了。是的，哲學史家普遍將法國唯物主義者的觀點和康德的觀點對立起來；顯然，要責備康德為知識不足是荒謬的。但是這種對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並且不難證明：康德和法國唯物主義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觀點上^①，不過運用它的方法不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們是在不同的社會關係的影響下生活和思考的。我們知道，那些慣於相信哲學史家的話的人們會認為這個意見是怪誕的。我們在這裡沒有可能以詳盡的論據來証實它，

① 普列漢諾夫指出，“康德和法國唯物主義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觀點上”，這是錯誤的。與不可知論（康德的不徹底的主觀唯心主義）相反，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者是站在外部世界可認識的觀點上的。

可是如果我們的論敌們希望的时候，我們將不拒絕做这一点。

無論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看做是感觉的变形 (sensations transformées)。从这个观点观察心理活动，就是說，認為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他作用的结果。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这样观察这个问题的。他們不倦地、很热烈地和十分确定地声言：人及其一切观点与感觉是由他的周围环境造成的，即第一——自然，第二——社会。“L'hom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完全依赖于教育）——爱尔維修这样肯定地說，并且把“教育”一詞理解为社会影响的全部总和。这个把人看做是周围环境的产物的观点乃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許多革新要求的主要理論基础。实际上，如果人依赖于他的周围环境，如果人的性格的全部屬性是为环境决定的，那末，人的缺点也是为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如果你想和他的缺点斗争，那末你就应该相应地改变他的周围环境，而且正是改变社会环境，因为自然界是不会使人变恶或变善的。将人們放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中，即放在各人自保的本能不再推动他与別人作斗争的条件下，协调个人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而德行 (vertu) 便会自行出现，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块会自行落地一样。德行不需要說教而要以社会关系的合理制度来准备。由于前一世紀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輕易判断，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德至今被視為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他們自己更正确地規定，道德在他們那里全部变为政治。

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乃是周围环境的产物的学說，常常引导法国唯物主义者得出出乎他們自己意外的結論。例如，他們有时会說，人的观点对于自己的行为完全沒有任何影响，并且，因此，这种或那种思想在社会中的传布不能絲毫地改变社会往后的命运。下面我們將指明，这种意見的錯誤在哪里；現在我們先注意一下法国

唯物主义者观点的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为他的周围环境所决定，那末，人类的思想，在其历史发展中就为社会环境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所以，如果我们想描画“人类理性进步”的图画，而且假如我们在这里不限于“怎样？”（理性的历史运动是怎样完成了的？）这个问题，而提出十分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它正是这样地完成了，而不是另一样？），那末，我们应该从环境的历史，从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开始。这样，研究的重心，至少在其开始时将转到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接近了这个任务，然而非但没有能够解决它，而且甚至没有能够正确地提出来。

当他们讲到关于人类的历史发展时，他们忘了自己的一般地对于“人”的感觉论的观点，而和当时所有“启蒙派”一样断言：世界（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为意见所支配（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①。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所犯的基本矛盾就在这里，而它在其拥护者们的议论中又分解为整批次要的、派生的矛盾，正如钞票之换成辅币一样。

命题 人及其一切意见是环境和主要地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这是从洛克的基本命题：no innate principles（没有先天的观念）中得出来的必然结论。

反命题 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见的产物。这是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的基本论点：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②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① “我称传播在民族中的真理和谬误的总和的结果为意见；这结果约束它的判断，它的尊敬和嫌恶，它的爱和憎，它的爱好和习惯，它的弱点和长处——总之，它的道德风习。这个意见亦就支配着世界。”Suard, 《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Paris, An XII, t. III, p. 400. (秀厄：《文学杂录》，巴黎，十二年，第3卷，第400页。)

② (意见支配着世界)。

例如,从这个根本矛盾中产生了下列的派生的矛盾。

命題 人認為那些對他們有利的社會關係是好的,那些對他們有害的關係是壞的。人們的意見為他們的利益所決定。秀厄說:“L'opinion chez un peuple est toujours déterminée par un intérêt dominant”(特定人民的意見永遠為統治於他們中間的利益所決定)^①。這甚至不是從洛克的學說中得出的結論,而是簡單地重複他的話:“No innate practical principles... Virtue generally approved; not because innate, but because profitable... Good and Evil... are nothing but Pleasure or Pain, or that which occasions or procures Pleasure or Pain to us.”(沒有先天的實際的觀念……德行所以一般地為人們所滿意,不是因為它是先天的,而是因為它是有利的……善與惡……實質上不過是喜悅或痛苦,或者足以使我們喜悅和痛苦的東西。)^②

反命題 人們對於某一關係感覺得有利或有害取決於這些人們的意見的一般體系。依照同一個秀厄的話:任何人民“ne veut, n'aime, n'approuve que ce qu'il croit être utile”(任何人民只愛好、擁護、贊助那些他認為有益的東西)。所以,一切歸根結底重又歸於意見,意見支配著世界。

命題 那些以為宗教道德,例如宣揚對鄰人的愛(即使部分地)會促進人們的道德的改善的人是大大地錯誤的。這類說教以及一般地說,思想對於人們是完全無力的。整個問題是在於社會環境和社會關係^③。

反命題 歷史的經驗給我們證明:“que les opinions sacrées

① Suard. V. III p. 401.(秀厄,第3卷,第401頁)

②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 I, ch. 3; B. II, ch. 20, 21, 13.(《人類悟性論》第1冊第3章;第2冊第20、21、28章。)

furent la source véritable des maux du genre humain”^③，而这亦是十分可理解的，因为假如意見一般地支配世界，那末，錯誤的意見也就会支配它，正如残酷的暴君一样。

很容易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这类矛盾(許多我們現代的“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是从他們那里繼承来的)的单子加长起来。可是这是多余的。最好我們还是来看一看这些矛盾的一般性質吧。

有各种不同的矛盾。当伏·伏·先生在其《資本主义的命运》或《俄国經濟研究总结》第一卷中每一步自相矛盾时³⁸⁰，那末他的邏輯的过失也許只有作为“人类文献”才有意义；即将来的俄国文艺史家，当指出这些矛盾之后，應該研究这样一个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异常有趣的問題：为什么这些矛盾不管它們的完全无可怀疑和触目，而伏·伏·先生的許多讀者却看不到。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位作家的矛盾是无結果的，如著名的无花果树一样。还有另一类矛盾，这种矛盾与伏·伏·先生的矛盾同样是无可怀疑的矛盾，他們与后者的区别就在，他們不窒息人类的思想，不阻滯它的发展，而推动它向前，有时推动得这样有力，按其結果說，較之最严整的理論还要有效。关于这样的矛盾可以用黑格尔的話說：“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引导前进)。十八世紀法国唯物

③ 这个命題不止一次在《Système de la Nature》(霍尔巴赫：《自然体系》)中重复着。爱尔維修也这样表示过，他說：“假定我散布最惡劣的意見，从中得出最討厭的結論；假如我絲毫不改变法律，我也就不会改变道德風习”(《論人》，第3部，第4章)。长久生活于法国唯物主义者中的格里姆及和唯物主义者战斗的伏尔泰亦不止一次在《文学通訊》中說过这同一命題。在自己的“愚蠢的哲学家”以及許多其他著作中，“費恩的主教”証明，任何哲学永远也不曾影响过自己亲人的行为，因為他們在自己的行为中以习惯为指导，而不是以形而上学为指导。

④ (“宗教的意見是人类苦難的真正来源”。)

主义者的矛盾正是属于这类矛盾。

我们来探讨他们的根本矛盾：人们的意见为环境所决定；环境为意见所决定。关于这个矛盾不得不如康德在其“二律背反”中所说，命题与反命题是同样地正确的。实际上，没有丝毫怀疑，人们的意见为他们的周围社会环境所决定。同样无疑的，任何民族亦不会和那与他们全部观点矛盾的社会制度协调；他将起来反对这种制度，他将按自己的意见改造它。所以，意见支配世界亦是正确的。但是两个本身都是正确的命题怎样能彼此矛盾呢？事情可以很简单地解释。它们之彼此矛盾只因为我们从不正确的观点上去观察它们的缘故：从这个观点上以为——而且必然要以为——如果命题是正确的，那末反命题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可是如果你找到了正确的观点，那矛盾就消失了，而烦恼着你的每一个命题都带上了新的面貌：结果是它补充着，更正确些说约束着另一个命题，而完全不是排斥它；假如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那末，那个以前你以为是它的敌对者的另一个命题亦是不正确的。怎样找得这个正确的观点呢？

举例来说：人们常常说（特别是十八世纪），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习所约束的。而这是完全正当的。当罗马人的旧的共和的道德风习消失时，共和国让位于专制政体。但是，另一方面，同样常常有人说，某一民族的道德风习是为它的国家制度所约束的。实际上，例如在赫里奥加巴尔时代，罗马人从哪里得到共和的道德风习呢？难道不是十分明显的吗，帝国时代罗马人的道德风习应该是旧的共和的道德风习的对立物？而如果这是明显的，那末，我们就得到一般的结论：国家制度为道德风习所约束，道德风习为国家制度所约束。但是这是矛盾的结论啊！也许，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的命题之中有一个是错

誤的緣故吧。任你怎样絞尽腦汁，你不能发现两者之中任何一个是錯誤的，它們两者都是无可非難的，因为，真的，某一民族的道德風习影响它的国家制度，而在这个意义上是它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它們为国家制度所約束，而在这个意义上是它的結果。出路在哪里呢？人們对于这类問題，通常满足于发现互相作用：道德風习影响宪法，宪法影响道德風习——一切都明白了，有如青天白日，而不满足于这类明白性的人們就显露了值得一切責备的片面性傾向。在我們这里在目前差不多全部知識分子是这样議論的。他們从互相作用的观点上观察社会生活：生活的每一方面影响一切其他方面，而倒过来受一切其他方面的影响。誰有这样的观点，才值得称为有思想的“社会学者”，而誰(如馬克思主义者那样)企图找寻某种社会发展的更深刻的原因，那末他簡直就沒有看到社会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法国的启蒙学者，当感觉到需要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点加以整理并解决煩惱着他們的矛盾时亦傾向于这个观点。他們中間最有系統性的头脑(我們此地不說卢梭，他和启蒙学者一般地少有共同之处)，也沒有走得更远。例如，孟德斯鳩在其大著《Grandeur et Décadence des Romains》和《De l'Esprit des lois》^①中就保持这样的观点。而且这当然是正确的观点。互相作用无疑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之間。可惜，这个正确的观点解释得很少很少，只因为这个簡單的原因，即他对互相作用着的力量的

① 《羅馬盛衰原因論》和《論法律的精神》，霍尔巴赫在其《Politique naturelle》(《自然政治》)中站在道德風习和国家制度互相作用的观点上。可是因为在那里他碰到的是实际問題，所以，这个观点就使他陷于一个循环的圈子內。为了要改善道德風习，应该要改善国家制度；而为了要改善国家制度，就要改善道德風习。霍尔巴赫以想象的为一切启蒙学者所希望的 bon prince(善良的君主)跳出这个圈子，这善良的君主出現为 deus ex machina(奇迹創造者)，解决了矛盾，既改善了道德風习又改善了国家制度。

产生沒有給予任何指明。假如国家制度預先要有那种道德风习，它才能影响它們，那末，显然，促使这些道德风习最初出現的就不是国家制度。对于道德风习，亦應該这样說，假如它們預先要有那种它們要加以影响的国家制度，那末，显然，国家制度就不是它們創造的。为了解脫这笔糊塗帳，我們應該找到这样一个历史因素，它既产生这个民族之道德风习又产生它的国家制度，而且这样便产生它們的互相作用的可能。假如我們找到了这样的因素，我們发现了探求着的正确观点，那时我們將毫不費力地解决煩惱着我們的问题。

在应用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根本矛盾时，这就是說：当法国唯物主义者，违反他們自己对历史的通常的观点而說思想毫无意义，因为环境就是一切时，他們是大大地錯誤了。同样錯誤的是他們这个对历史的通常的观点（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①，宣布意見为任何一个社会环境存在的主要原因。在意見和环境之間存在着无疑的互相作用。但是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認这个互相作用上，因为互相作用远不能給我們解释社会現象。为着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說，一方面，人类意見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經歷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應該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話，應該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見发展的因素。十九世紀社会科学的任务正就是在发现这个因素。

世界为意見所支配。可是意見不是不变的啊。什么东西約束它們的变化呢？拉莫特·列·外叶在十七世紀就回答过：“教育的普及”。这是意見支配世界的思想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表现。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坚持了这点，有时却补充以忧郁的論調說，可惜教

①（意見支配着世界）。

育的前途一般地很少希望。但在他們中間最有天才的人物那里已經可以看到不滿于这种观点的意識。爱尔維修指出：知識的发展服从某种規律，因之存在着知識所依賴的某种隱秘的未知的原因，他做了一个极有兴味的至今尙未得到充分估价的嘗試，即以人类的物質需要来解释人类的社会的发展和智慧的发展。这个嘗試沒有成功，而且由于許多原因亦不能不失敗。但是他宛如一个給那些願意繼續法国唯物主义者事业的下世紀的思想家們的遺囑。

第二章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³⁸¹

“根据历史的研究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就是政府是民族性格的最真实的原因；民族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坚强或脆弱，他们的天才，他们的教育或他们的无知差不多永远不是气候或某一入种的属性的结果；自然给一切人以一切，而政府则保存或取消在它们管辖下的人们的那些在开始时是人类一般财富的品质。”在意大利既没有发生气候的变动亦没有发生入种的变动（野蛮人的侵入对于变动它的性质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自然对于意大利人在一切时候都是一样的；只是政府改变了——而这个改变总是先于或伴随着民族性的改变。”

西斯蒙第这样地駁斥那将民族的历史命运完全从属于地理环境的学说^①。他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真的，地理远不能解释历史上的一切，正因为后者是历史，亦即因为，用西斯蒙第的话说，政府变动了，虽然地理环境并未变动。但，这是附带的，我们在这里有兴趣的是完全另外一个问题。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在将地理环境的不变性和民族命运的变动性对置的时候，西斯蒙第将这些命运归之于一个基本因素：“归之政府”，即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民族的性格完全为政府的性格所决定。是的，断然地说出了这个命题之后，西斯蒙第马上便

^① 《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Nouvelle édition, t. I, Paris, Introduction. pp. V—VI.（《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新版，第1卷，巴黎，序言，第5—6页。）

很大地緩和了它：他說，政治的變更先于或伴随着民族性的變動。这就得出：政府的性格有时亦为民族的性格所决定。但在这种情形下，西斯蒙第的历史哲学就碰到了我們所熟悉的煩惱着法国启蒙学者的矛盾：某一个民族的道德风习依赖于它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依赖于道德风习。西斯蒙第如启蒙学者一样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不得不依次地将这个“二律背反”之一个方面当作自己議論的基础。但是無論如何，既然停留在两者之一之上，即認為民族的性格从屬於它的政府时，它便給“政府”这一概念以夸大的宽广的意义：在它那里政府包括着某一社会环境的所有一切屬性，某一社会关系的一切特点。更正确些說，在他那里某一社会环境所有的一切屬性是“政府的”事情，是政治制度的結果。这是十八世紀的观点。当法国唯物主义者想簡單和有力地表現自己关于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全能的影响的信念时，他們說：c'est la législation qui fait tout（一切从屬於立法）。而当他們說到立法时，他們所指的差不多純粹是政治立法，国家制度。在著名的維科的著作中有一篇小論文，題目是：《試論以政治革命解釋羅馬民法的法学体系》^①，虽然这篇“試作”写于十八世紀之初，可是其中关于民法对国家制度的关系的观点一直統治到法国的复辟时代；启蒙学者将一切归于“政治”。

① 我們从法文譯出这篇論文的名称时馬上指出：論文本身我們只知道某些法文的摘录。我們沒有能得到其意大利的原文，因为据我們所知，它只印在維科著作之一一个版本上（1818年），在1835年的六卷的米兰版上已經沒有这篇論文了。附带地說，此地重要的不是維科怎样完成了他的任务，而是他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附带地，在这里我們預防着那些揣測的批評家也許会急急地提出的責备：“你无区别地使用‘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这两个名詞——他們向我們說，——可是絕不是所有‘启蒙学者’都是唯物主义者，例如就是伏尔泰就热烈地反对过唯物主义者。”这是不錯的；可是，另一方面，黑格尔就已經証明：反对唯物主义的启蒙学者本身只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382

但是“立法者”的政治活动在任何情形下都是自觉的活动，虽然，显然并不是永远是合目的的活动。人的自觉活动依赖于他的“意见”。这样，法国启蒙学者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关于意见全能的思想，甚至在他們想鮮明地表示环境全能的思想时。

西斯蒙第还站在十八世纪的观点上^①。更年轻一些的法国历史家已经有另一种观点了。

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及其意外的事变，使得最“有教养的”思想家陷于绝境，这些事变是意见全能的思想的最明显不过的反驳。那时候许多人对“理性”的力量完全失望了，而另外一些没有失望的人更倾向于接受环境全能思想和研究它的发展的进程。但是，就是对于环境，在复辟时代亦从新的观点去观察它了。伟大的历史事变这样地讥笑了“立法者”以及政治宪法，以致现在再将某一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归附于他们，把他们看做是最后的因素，已经是怪诞的事了；现在已经把政治宪法看做是一种派生的东西，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

“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家和政论家——基佐在其《Essai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②（《法国史概论》）中说——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和种类。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l'état des personnes）——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

① 他开始研究意大利共和国史时还在 1796 年。

② 该书初版出版于 1821 年。

人民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家及希望知道他們过去如何被統治的政論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問題。”^①

这个观点是和維科的观点直接对立的。維科以政治革命来解释民法的历史，而基佐則以公民生活（即公民法权）来解释政治制度。但是法国历史家在分析“社会成份”上走得更远。按他的話說，在西羅馬帝国崩潰后出現于历史舞台上的一切民族那里，人們的“公民生活”是和土地关系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他們的土地关系之研究應該先于他們的公民生活的研究：“为着理解政治制度，應該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應該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質。”^②基佐以这个观点研究了法国最初两皇朝的历史。在他那里，这个历史是当时社会不同阶层的斗争的历史。在其《英国革命史》中，他又进了新的一步，描写这个事变为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这样，便默認了为着解释某一国家的政治生活，不仅要研究它的土地关系，而且要一般地研究它的一切财产关系^③。

① 《Essais》，10^{ème} edit., Paris 1860, pp. 73—74.（《概論》，第10版，巴黎，1860年，第73—74頁）

② Ibid., pp. 75—76.（同上，第75—76頁）

③ 在英国十七世紀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党派斗争之后“掩蔽着一个社会問題，各阶级爭取政权影响的斗争。是的，在英国，不象在别国一样，这些阶级并不尖锐地区別層和并不互相地仇視着。人民沒有忘記，有力的男爵不仅为自己本身的而且为人民的自由斗争过。乡村贵族和城市资产者三世紀来一起在国会中开着會議。但是在最近一世紀中，社会的各阶级的相对力量发生了大的变动，这种变动可沒有同时发生政治制度中相应的变动……资产阶级、乡村贵族、自耕农和小地主（当时在乡村中数量众多的），在当时对于社会事务的进程沒有适合于他們社会作用的重要性的影响。他們生长了，可是沒有提高起来。从此在这个阶层以及在它以下的其他阶层中出現了有力的自私精神，准备抓取第一个碰到的机会来风暴般的表现自己。”（《Discours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Berlin 1850, pp. 9—10（《英国革命史論丛》，柏林，1850年，第9—10頁））參閱原著六卷全集中关于英国第一次革命史及当时各社会活动家生活的概述。基佐在那里很少脫离过阶级斗争的观点。

这种对欧洲政治史的观点，在当时絕非仅仅为基佐一人所独有。許多别的历史家們都同意他，其中我們指出，奥古斯丁·梯叶里和米涅。

在其《Vues des révolution d'Angleterre》（《英国革命史述評》）中，奥·梯叶里描写英国革命的历史为资产阶级与贵族的斗争，“所有那些祖先属于英国的征服者之列的人——他关于第一次革命說道——抛弃了自己的庄园家宅跑到皇帝的营垒中去并占有合于他的身份的地位。城市中的居民則大群地跑到对方的营垒中去。当时可以說，两个军队集合起来了，一个以安逸和政权为名，另一个以劳动和自由为名。不管其出身如何，一切游手好闲的人，一切在生活中只找寻不劳动而享乐的人都站在皇帝的旗帜下，保护着类似他們本身利益的利益；相反的，那些当时以工业为业的英国征服者的后裔則加入于平民的党派。”^①

按梯叶里的意見，当时的宗教运动不过是世俗的生活利益的反映。“双方都为现实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其他一切是外表和借口。那些坚持臣民事业的人大部分为长老会派，即他們不願有任何服从，甚至在宗教中。而那些参加对立党派的則属于英国国教³⁸³或天主教派；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中，他們也企图获取政权和課人民以捐税。”在这里梯叶里摘引了福克斯在《History of the reign of James the Second》（《詹姆士第二統治史》）中所說的話：“对于宗教的意見輝格党³⁸⁴是以政治眼光去看的。甚至他們对于羅馬教的仇視，与其說是由于对这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宗派的迷信或所謂偶像崇拜，不如說是由于它企图在国家內建立絕對政权。”

按米涅的意見，“社会运动是为統治的利益所决定的。經過各

^① 《Dix ans d'études historiques》（《历史研討之十年》），《梯叶里全集》第6卷，第10版，第66頁。

种阻碍，这个运动力图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既达，它就停止了，讓位于另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开始是看不見的，只有当它已經是占优势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封建制度发展的进程就是这样。封建制度在实际上还没有存在时就存在于人民的需要中了——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它实际上存在了，逐渐不合于需要，以致最后停止了它的实际的存在。至今还没有一个革命是經過另一种道路完成的。”^①

在自己的法国革命史中米涅正是从各社会階級的“需要”的观点上去观察事变的³⁸⁵。这些階級的斗争在他那里成了政治事变的发条。不必說，这种观点是不合折衷論者的口味的，即使在那良善的旧时代，那时他們的头脑較之現在要多做許多工作。折衷論者責备新历史理論的拥护者們为宿命論，为偏爱体系(esprit de système)。正如在这类情况下所常常遇見的一样，折衷論者沒有看到新理論的真正薄弱方面，而用最大的毅力去攻击他們的无疑地有力的方面。附带地說，这是和世界同样陈旧的东西，因此是很少兴味的东西。更有兴味的事是圣西門主义者巴扎尔贊助这些新的观点，他是当时社会主义的最光輝的代表之一。

巴扎尔并不以为米涅关于法国革命的書是无可非难的。这本书的缺点在他眼中看来，其中之一就是，它将所記的事变描写为个别的事实，而和“那推翻了旧制度后应该促进新制度建立的努力的长长的鏈索”沒有任何关系。但是在这本书內亦有着无可怀疑的优点。“著者”企图分析那些依次指揮着革命的諸政党，揭露这些政党和不同的社会階級的联系，指明哪些事变的鏈索使他們一个

^① 《De la féodalité, des institutions de St.-Louis et de l'influence de la législation de ce prince》，Paris 1882 pp. 76—77. (《論圣·路易封建制及这位君主的立法之影响》，巴黎，1882年，第76—77頁。)

跟一个地站在运动的先头，以及最后它们如何消失”。那折衷论者用以责备新派历史家的“体系的和宿命论的精神”，按巴扎尔的意见，这却正是基佐和米涅的著作优于“历史—文学家（即只注意“辞藻”美丽的历史家）的著作之处。这些历史—文学家不管他们如何人数众多，可是没有把历史科学从十八世纪推进一步。”^①

假如人们去问奥古斯丁·梯叶里、基佐或米涅——是某一民族的风习创造它的国家制度呢？还是相反，它的国家制度创造它的风习呢？三个人都将回答，不论民族的风习与其国家制度之间的互相作用是如何巨大及如何无疑，可是，归根结底两者之存在都为第三个更深刻的因素所规定的，即“人们的公民生活，他们的财产关系”。

这样，十八世纪哲学家所纠缠不清的矛盾已经被解决了，而任何一个无所偏爱的人将会承认，巴扎尔是对的，在新的历史观点的代表们身上科学前进了一步。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上述的矛盾只不过是十八世纪社会观点的根本矛盾的部分情形。这根本矛盾是：（一）人及其一切思想和感觉是环境的产物；（二）环境是人的创造物和人的“意见”的产物。能否说，新的历史观点解决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个根本矛盾了呢？我们来看一看，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怎样解释公民生活的起源，财产关系的起源。依他们的意见，只有注意地研究这种公民生活、财产关系才能给予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

人们的财产关系属于他们的法权关系的领域；财产首先是法权的制度。说，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应该在人们的财产关系中去找寻，就是说，这个钥匙是在法权制度之中。这些制度从哪里来的

^①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Producteur》（《历史论丛》，载于《生产者》第4部中）。

呢？基佐完全正確地說：政治憲法先是結果，然後才成為原因；社會先創造它們，然後才在它們影響之下變形。但是對於財產關係難道不可以說同樣的話嗎？難道它們本身不是先為結果後成原因嗎？難道社會不應該先創造它們，然後才受它們的堅決的影響嗎？對於這些完全合理的問題，基佐答復得極度不能令人滿意。

在西羅馬帝國崩潰後而出現於歷史舞台上的民族那里，公民生活是與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因果聯系的^①；人對土地的關係決定了他的社會地位。在整個封建時代一切社會制度歸根結底是為土地關係所制約的。至於這些土地關係，那末，按基佐本人的話是“開始時，在野蠻人侵入後的初期”是為土地占有者的社會地位所規定的：“看土地占有者的強弱程度，土地得到不同的性質”^②。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什麼東西決定土地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呢？“開始時，在野蠻人侵入後的初期”什麼東西決定自由程度的大小，土地占有者的強弱呢？是野蠻人一侵略者之間的原有的政治關係嗎？但是基佐已經向我們說過，政治關係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為着理解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前的時代中的野蠻人的政治生活狀態，我們按照作者的勸告應得研究他們的公民生活、社會制度，他們中各階級的關係等等；而這樣的重新又引導到什麼東西規定人們的財產關係，什麼東西創造了存在於這一社會中的所有權的形式這個問題。所以顯然地，假如我們用他們的自由和勢力的不同程度，來解釋各

^① 就是說，只有在新時代的民族那里嗎？這個限制是更加奇怪的，因為希臘和羅馬的著作家已經看到他們本國的公民的和政治的生活同土地關係有密切的聯系的。不過，這個奇怪的限制並不妨礙基佐將羅馬帝國的崩潰和它的國家經濟聯繫起來。參閱他的第一個“嘗試”：《Du régime municipal dans l'empire romain au V-m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耶穌紀元五世紀時羅馬帝國之市政制度》）。

^② 即土地占有有不同的法權性質——換言之，即土地的占有按土地占有者的自由和力量的程度而有不同程度的依賴性 Loc. cit p. 75.（引言，全集，第75頁）。

社会阶级的地位，则我们什么也得不到的。这不是回答问题，而是在新的姿态下，略为详尽地复述问题罢了。

关于财产关系的来源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严格地和确切地提出的科学问题，在基佐的头脑中甚至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他要完全不理睬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混乱就证明了他的公式的含糊。在最后的分析中基佐对所有权形式的发展异常模糊地引用人的本性来解释。不足奇怪的，这个为折衷论者责备其观点的过分体系性的历史家，本人亦是一个不小的折衷论者，例如在其关于文明史的著作中³⁸⁶。

奥·梯叶里从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的利益”的观点上去观察宗教教派和政党的斗争并热情地同情第三等级反对贵族的斗争，他以征服来解释这些阶级和等级的来源。“Tout cela date d'une Conquête, il y a une conquête la dessous.”（所有这些都是从征服时起的，所有这些的基础是征服）——他关于新时代各民族的阶级和等级关系这样说过，他所指的纯粹是新时代的各民族。这个思想不论在他的政论文章中，不论在较后的学术著述中，他不倦怠地以各种语调发展着。但是即使我们不谈，“征服”（这是政治的国际的行为）使梯叶里回到十八世纪的观点，这观点就是以立法者的活动、即政权的活动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的；可是任何征服的事实必然地会惹起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它的社会结果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另一样的？在德意志野蛮人侵入之前，加利亚已经遭受过罗马的征服。这个征服的社会结果较之德意志的征服所引起的社会结果大有差别。中国被蒙古征服的社会结果和英国被诺曼人征服的结果极少相似。这类差别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说，这种差别是由在不同时期中彼此冲突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的差别决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仍然不知道什么东西决定这个社会制

度的。在这个问题上援引某个以前的征服，这就是陷于循环圈子内。不管你列举多少次的征服，归根结底你将得出这个必然的结论，即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有某一个 X，某一个未知的因素，它不仅不为征服所制约而且它本身制约着征服的后果，甚至常常也许永远制约着征服本身，它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梯叶里自己在其《英国被诺曼人征服史》中根据老年人的回忆指出那些引导盎格罗—萨克逊人去进行他们的争取独立的坚决斗争的激情：“不论如何危险，我们应当斗争——他们的公爵之一说，——因为这里事情不是在承认一个新的主人，而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诺曼人的首领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自己的武士和自己的人们，他们大部已经为此而承认为他的臣下。假如诺曼公爵成了我们的皇帝，他们将愿意承受这些恩赐，而他不得不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妻女交给他们；所有这些他早已答应他们的了。他们不仅想毁灭我们，而且要毁灭我们的后代，他们想夺取我们祖先的土地”等等。另一方面，征服者威廉向其左右说：“勇敢战斗，杀尽一切；假如我们胜利，则我们将大富。我获得什么，你们也获得什么，如果我有土地，则你们大家亦将有土地。”^① 这里再明白也没有了，征服本身不是目的，在“征服”之下有着某种“现实的”即经济的利益。试问什么东西给予这些利益以当时他们所有的面貌呢？为什么土著居民及征服者当时均倾向于封建的土地占有，而不是任何其他土地占有呢？在这里“征服”什么也不能解释。

在同一个梯叶里的《Histoire du tiers état》^② 388 及在一切他的关于英法两国内部关系史的概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

^①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等等，Paris, t. I. pp. 296 et 300. 387 《英国被诺曼人征服史》，等等，巴黎，第1卷，第296—300页。

^② 《第三等级史》。

历史运动的相当完备的图画。只要略为知道一点这一图画就足以知道将这一社会制度的发生与发展归之于征服的观点是如何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个发展是同封建贵族（即征服者及其后裔）的利益和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啊！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奥·梯叶里自己辛辛苦苦地以自己的历史研究来推翻自己本身对征服的历史作用的观点^①。

在米涅那里——同一的混乱。他说到土地占有对于政治形式的影响。但土地占有形式为什么，由于什么原因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米涅不知道。归根结底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形式亦归之于征服^②。

他感觉到，就在国际冲突的历史中我们所遇到的不是抽象的概念——“征服者”，“被征服者”，——而是有血肉有一定的法权和社会关系的人们，但是就在这里他的分析亦没有走得很远。“当住在同一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他说——彼此混合，它们消失着自己的薄弱方面和彼此交换其有力方面。”^③

这是不深刻的，而且也不很清楚。

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的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

把“人的天性”看做是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

① 很有兴趣的，圣西门主义者已经看到了梯叶里的历史观点的这个薄弱方面。例如巴扎尔在上引的论文中指出：征服在欧洲社会发展上实际上所发生的影响较之梯叶里所想者为小。“任何懂得人类发展规律的人，可以看到，征服的作用完全是从属的。”在这上面，梯叶里较之巴扎尔更接近其老师圣西门的观点。在圣西门那里西欧史自十五世纪起才从经济关系发展的观点来观察，而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则简单地解释为征服的产物。

② 《De la féodalité》，p. 50。（参阅《论封建制度》，第50页。）

③ Ibid., p. 212.（同上书，第212页。）

事件”的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紀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一世紀的启蒙学者那里繼承来的。

假如人在出世时沒有带来大批現成的先天的“实践观念”；假如善行之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是人們先天所固有的，而是因为它是**有利的**（如洛克所說）；假如社会利害的原則是最高規律（如爱爾維修所說）；假如人是一切人們互相关系上的事物的最高准繩——那末十分自然地会得出：人的天性就是我們應該用来判断某一关系的利或害，合理或背謬的观点。从这个观点上，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討論了当时存在着的社会制度以及他們所期望的改革。人的天性是他們在与其敌手爭論中的最主要的論据。这个論据的意义，在他們目光中是如何巨大，例如，下述的孔多塞的議論，就可以很好表示出来：“在一切賦有感觉及获得思想的能力的生物間，正义和法权的思想是同等式样地組成的。因此他們是一样的。”自然，会有人們曲解它們（les altèrent）。“但是任何正确地思考的人在道德上将同在算术上一样必然地达到一定的思想。这些思想乃是从人實質上是感觉的和思惟的生物这一无可爭辯的真理中所得出的必然結論。”³⁸⁹实际上法国启蒙学者的社会观点，显然不是从这个无可再弱的真理中引伸出来的；而是他們的环境提示他們的。他們所指的“人”，其特点不仅在有感觉和思惟的能力；他的“天性”要求一定的資產階級的秩序（霍尔巴赫的著作正是包含着那些后来为立法會議所实现的要求）；它規定着貿易自由，国家不干涉公民的财产关系（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①等等。启蒙学者經過特定

① 是的，不是永远是这样的。有时以同一天性的名义哲学家劝告“立法者和财产的不平等”。这是法国启蒙学者許許多多矛盾之一。但是我們此地无暇談它。对于我們重要的只是抽象的“人的天性”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下都是拥护社会的（而且仅仅是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个或那个阶层的十分具体的意图的理由。

的社会需要和关系的三棱鏡观察了人的天性。但是他們并没有怀疑历史在他們眼前放上了三棱鏡；他們以为經過他們的口說出了終究为人类的有教养的代表所理解和所估計到的“人的天性”。

关于人性，不是所有的十八世紀著作家都有着同样的概念的。他們在这上面馬上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們都同样地坚信，只有正确地理解这个天性才能給予解释社会現象的鑰匙。

上面我們已經說过：法国启蒙学者中有許多人已經看到在人类理性的发展上有一定的規律性。文学的历史首先引导他們到这个关于規律性的思想，他們問：“哪个民族不是先是詩人，而后是思想家？”^①以什么来解释这种次序呢？启蒙学者回答道：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甚至决定語言的发展。“說話的艺术，如一切艺术一样乃是社会需要和社会利益的产物。”——刚才在附注中所提出的僧正阿尔諾在其演說中这样証明³⁹⁰。社会的需要变化着，因而“艺术”发展的进程亦变化着。可是什么东西决定社会的需要呢？社会的需要，組成社会的人們的需要是为人的天性决定的。所以智慧发展的进程正是这样而不是另一样的解释亦应在这个天性中去寻找。

为着要起最高准繩的作用，人的天性自然應該被認為是一成不动的，不变的。启蒙学者真的認為它是这样的，讀者可从上引的孔多塞的話中看到这点。但是如果人的天性是不变的，那末怎样可以用它来解释人类的智慧的或社会的发展进程呢？一切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是許多变化。可否以任何不变的，一成不动的东西来解释这些变化呢？变数之变是否是因为常数不变呢？启蒙学者意識到——不，而为了摆脱困难，他們指出常数本身在一定的界限

^① 格里姆《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文学通訊》）1774年8月号。格里姆只是重复僧正阿尔諾的思想，后者在法国科学院的演說中发展了这一思想。

內是变动的。人经历不同的年龄：童年、青年、壮年等等。在这些不同的年龄中，他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人在童年以感觉、幻想和记忆为生，他找寻游戏，只需要歌谣和故事。以后来了热情的年龄；精神要求激荡和激动。以后思惟能力发展了，理性发展了，这样理性本身又要求练习，它的活动扩展至好奇性所能达到的一切上面。”

个别的人是这样发展的；这些过渡制约着他的天性；正因为这些过渡是在人的天性之中的，所以这些过渡在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中亦有其地位；正是这些过渡解释着各民族以诗人始，以哲学家终^①。

很容易看到，这类解释丝毫也没有解释任何东西，只是给人类智慧的发展加以一番描写（比拟永远是易于隐秘掉被描写的对象的属性的）。同样很容易看到，当给予这类解释时，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回到了我们所已熟知的循环圈子中：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实际上，这样一来，一方面，人类的智慧发展，换言之，人的天性的发展以社会的需要来解释；而另一方面则社会需要的发展以人的天性的发展来解释。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矛盾亦没有为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们所排除；在他们那里，它只不过采取了新的姿态。

^① Suard, loc. cit., p. 383. (秀厄, 前引书, 第 383 页。)

第三章 空想社会主义者

假如人的天性是不变的，以及假如知道了基本属性，就可以从其中数学地引伸出在道德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可靠的原理；那末就不难想出那种完全适合人的天性要求的社会制度，正是因为这样，这种社会制度将是理想的社会制度。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已经喜欢作关于完美的立法(législation parfaite)这一题目的研究。这些研究乃是启蒙学派著作中的空想的成份^①。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全部精神从事于这种研究。

这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完全支持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人类学的观点。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人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②；亦正如唯物主义者一样，他们陷于循环圈子中，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动的属性。

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

① 在爱尔维修那里，在其所著之《De l'Homme》(《论人》)一書中有這種“完美立法”的詳細草案。假如把这个乌托邦和十九世纪之初的乌托邦加以比較将是极有兴趣和最有益的。可惜，社会主义史家和哲学史家至今都没有任何关于这类对比的思想。至于特别地請到哲学史家，則附帶說一句，他們最不可允許地攻击爱尔维修。甚至最平靜和温和的朗格除了“淺薄的爱尔维修”之外，沒有找到別的稱讚。絕對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較之一切人更公允地對待絕對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

② “是的，人是由全能的社会和全能的教育所造成的。教育这一字应取其最广义的意义；即不仅了解其为学校的或書本的教育，而且一切人、物、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教育，其給我們的影響从搖籃起一分鐘也不中斷的”(Cabet:《Voyage en Icarie》, 卡貝:《伊加利亞旅行記》, 1848年版, 第402頁)。

准繩而設想完美立法的企图。例如，傅立叶以分析人的热情为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outline of the rational system of society》（《合理的社会体系概論》）中，从“关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則”（first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出发，而断言合理的政府應該首先“决定人的天性是什么”（ascertain what Human Nature is）；例如，圣西門主义者声言，他們的哲学建設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sur une nouvelle conception de la nature humaine）^①；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說，他們的导师所設想出来的社会組織乃是从人的天性的不变規律中所得出的許多无可爭辯的結論^②。

自然，把人的天性当作最高准繩的观点并不妨碍不同的社会主义学派在决定这个天性的屬性上异常厉害地分歧。例如，按圣西門主义者的意見，“欧文的計劃是如此程度的与人的天性的爱好相矛盾，以致它在目前（1825年写的）所享的那种盛名，初看来是不可解释的事。”^③在傅立叶的論战性的小册子《Pièges et charlatanisme des deux sectes Saint-Simon et Owen, qui promettent l'association et le progrès》（《允諾联合与进步的两个宗派——圣西門和欧文的狡計和騙术》）中，可以找到不少厉害的指責，說就是圣西門的学說亦是和人的天性的全部爱好相矛盾的。現在，如孔多塞时一样，在人的天性的含义上要取得一致，較之决定这个或某个

① 《Le Producteur》t. I, Paris 1825, Introduction.（參閱《生产者》，第1卷，巴黎，1825年，序言）

② “我的目的——給傅立叶从人的天性的規律中所得出的社会組織以粗淺的敘述，明白和容易接受的理解。”（康西德兰：《社会前途》，第1卷，第3版，宣言）“难道最后不是到了同意下述一点的时机了么？即应否在創立法律之先，先弄清人的真正的天性，以便使本身能变的法律与不变的和神圣的天性得到协和？”“关于傅立叶的社会科学之基本概念”，作者写此書是为着拥护傅立叶主义。（亨利·高尔塞，巴黎，1844年，第35頁）

③ 《Le Producteur》t. I, P. 139.（《生产者》，第1卷，第139頁）

几何学上的形态要难得多了。

既然，十九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持有人的天性的观点，因之，他們只是重复了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的錯誤——可是这个弱点是为他們同时代的一切社会科学所共有的^①。可是，在他們那里已經可以看到企求脱离那抽象概念的狭隘界限而依靠在具体基地上的有力企图。在这上面圣西門的著作較之他人更为显著。

法国启蒙学者，常常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或多或少幸福地造成的偶然性^②，而圣西門首先在历史中找寻規律性。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应该成为如自然科学一样的严格的科学。我們应该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事实为着在其中发现其进步的規律。只有理解过去的人，才能預知将来。当提出社会科学的这样的任务时，圣西門特別注意研究羅馬帝国崩潰后的西欧史。他的观点是如何新穎和广大，可从这点上看起来，即他的学生奧·梯叶里能够完成在法国史

① 在說到复辟时代的历史家时我們已指明这点。对經濟学者亦很容易証明这点。当拥护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反对反动派与社会主义者时，經濟学者正是把它当做最适合于人的天性的秩序来拥护的。找寻抽象的“人口律”的努力(不論是从社会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营垒方面来的)曾与把“人的天性”看做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的死点密切联系着的。为着信服这点，只要将有关于此的馬尔薩斯的与和高德温或密勒注释的著者的学說加以比較就够了。391 馬尔薩斯及其对手們都一样地找寻統一的，所謂绝对的人口律。现代政治經濟学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它知道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有他自己的特殊的人口律。可是关于这点以后再說。

② 在这个关系上，爱尔維修所加于孟德斯鳩的責备是非常特征的：“在其关于羅馬的兴盛和崩潰的原因一書中，孟德斯鳩沒有充分估計幸运的偶然性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的作用。他陷于那些想解釋一切的思想家和雷斋里的学者所常犯的錯誤中，这些人忘了人的天性而給人民的代表以不变的政治面貌和一式的原則。然而常常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图领导这个称为参議院(Senate. ——譯者)的重要會議。”(《Pensées et réflexions》CXL, V. III. 《Oeuvres complètes de Helvétius》，Paris MDCCCXVIII). 《思想与沈思》，第3卷，《爱尔維修全集》，巴黎，MDCCCXVIII)。讀者們，这是不是使你想起了現在风行于俄国的“英雄与群氓”的理論呢？392 等一等，以后的叙述中将不止一次地指明，在俄国“社会学”中新鮮的东西是如何稀少。

的研究上的差不多整個的革命。聖西門認為基佐竊取了他的觀點。我們暫置這個理論所有權問題不論，應該指出，聖西門較之他同時代的歷史專家更深地探究了歐洲社會內部發展的勞力。例如，假如梯葉里、米涅及基佐都指出了財產關係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那末，聖西門首先異常鮮明地照明了新歐洲這些關係的歷史，並繼續前進，自己問自己道：為什麼正是這些關係，而不是別的任何關係起這樣重要的作用呢？按他的意見，回答應該在產業發展的需要中去找尋：“十五世紀前世俗的政權掌握於貴族手中，而這曾經是有益的，因為貴族在當時曾經是最能干的產業家。他們領導了農業的工作，而農業工作在當時是最重要的產業的唯一類別。”^①為什麼產業的需要人類歷史上有這樣的決定的意義呢，對於這一問題，聖西門回答道：因為，生產是任何社會聯合的目的（le but de l'organisation sociale, c'est la production）。他給生產以這樣的意義，他把有益的和生產的視為同一（l'utile—c'est la production）（有益的——這是生產），而斷然地聲言：la politique……—c'est la science de la production（政治……——是生產的科學）。

可以設想，這些觀點的邏輯的發展應該引導聖西門走到這個結論，即生產的規律實質上就是最後地決定社會發展的規律，而研究這些規律應該成為企圖預見將來的思想家的任務。有些地方他似乎接近着這個思想，可是只是有些地方，只是接近。

為着生產，必需勞動工具。這些工具不是由自然以現成的形式給予的，它們是由人們發明的。發明，甚至簡單的使用某一工具，需要在生產者身上有一定的智慧的發展。因此，“產業的”發展乃

^① 《Opinions littéraires, philosophiques et industrielles》，Paris 1825, pp. 144—145. 參閱《Catéchisme politique des industriels》（《文學的、哲學的、經濟的觀點》，巴黎，1825年，第144—145頁，參閱《產業家之政治答案》）。

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所以，意见、“教育”就在这里亦是完全地支配着世界。似乎产业的重要作用弄得愈清，则这个显然是十八世纪哲学家的观点就愈加得到证实。圣西门较之法国启蒙学者更彻底地坚持这个观点，因为对于他，观念从感觉中来这一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他更少有思考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一问题机会。在他那里，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因素^①。他企图发现这个发展的规律；例如，他确立了那个三阶段（即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证的）的规律，这个规律以后奥古斯特·孔德拿来当作自己的“发现”并获得很大的成功^②。但是就是这个规律，在他那里亦是以人的天性的属性来解释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他说——因此，社会理性的发展只能是个人理性发展在大范围中的再现。”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每次当他能够在个人发展

① 圣西门把对历史的唯心的观点贯彻到极端。在他那里，不仅思想（“原则”）是社会关系的最后基础，而且在思想之中主要作用也归之于“科学思想”——“世界的科学体系”——，从其中产生出宗教思想，而宗教思想则制约着人们的道德概念。这是一种主知说（Intellectualism），它同时亦统治于德国哲学家的队伍中，可是已经带有完全不同的面貌了。

② 李特雷强烈地起来反对雨巴尔，当后者指出这个……剽窃时。他说圣西门只有“两个阶段的规律”：神学的与科学的。弗林特，引用李特雷这个意见时指出：“当他说，三阶段的规律在圣西门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提起过，他是对的。”（《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nce and Germany》，Edinburgh and London MDCCCLXXIV p. 158.）（《德法历史哲学》，爱丁堡和伦敦，MDCCCLXXIV，第158页）。我们且引下引的圣西门的话来和这个说法对置：“那个农业学者、物理学者、化学家和生理学者不知道，在人类智慧科学的任何领域，在从纯粹神学思想转入实证思想之前，长期保持形而上学的思想？对于每个从事科学史的人难道不是造成了这种坚信，即这个中间状态是有益的和为过渡所无条件地必需的？”（《Du système industriel》Paris MDCCCXXI, préface, pp. VI—VII）（《论工业体系》，巴黎，MDCCCXXI，序言，第6—7页）。三阶段的规律对圣西门有这样的重要性，以致他准备用它来解释纯粹的政治现象，例如在法国革命时的“法律派和形而上派”的统治。弗林特如果注意地读一读圣西门的著作就不难“发现”这点。可惜，写一本人类思想的学术的历史，较之研究它的发展的真正进程要容易得多。

中找得合适的比拟时，他便認為自己的社会发展的“規律”，是已經最后弄清楚了和証明了。例如，他断言，在社会生活中政权的作用将随着时代之进展而归于零^①。这个作用的逐漸的，但是因此是經常的縮小是人类发展的規律之一。他怎样証明这个規律呢？主要的論据是援引人們的个人发展：在小学中孩子們必須无条件地听从长者；在中学和大学中——听从的成份逐漸成为次要的，以便最后在成年时代讓位于独立的行动。不論如何观察“政权”的历史，任何人在这里将同意，在此地正如在一切地方一样，比拟——不是証明。任何个体的胚胎发展与該个体所屬之种的历史有許多相似之处。个体发育給系統发育以許多重要的指示。但是如果在現在有一个生物学者說应该在个体发育中去找寻系統发育的最后解释，我們將对他說什么呢？現代生物学恰恰相反，它以种的历史来解释个体的胚胎史。

对人的天性的乞訴使得圣西門及其学生所規定的一切社会发展的“規律”帶有十分独特的面貌。

它使他們陷入于循环圈內。——人类的历史以人类的天性来解释。可是从什么地方我們知道人的天性呢？从历史。显然，在这个圈子中循环則既不能理解人的天性，亦不能理解人的历史，而只能对社会現象的某个領域作个别的或多或少深刻的注释。圣西門做了一些精巧的，有时是真正天才的解释，可是他的主要目的——为政治找到坚固的科学基础——是沒有达到的。

“人的理性进步的最高律規——統治一切，駕馭一切；对于它，人只是工具……而且虽然这个力量（即这个規律）出于我們自己（*dérive de nous*），可是我們很少能够脫离它的影响和使它服从我們，正如我們不能

^① 这个思想以后为蒲魯东所窃取和曲解，并根据它創立了无政府的理論。

按自己的意志去改变那使地球繞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我們只能夠自觉地服从这个規律（我們的真正的先見），了解他所預定給我們的那个运动，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它。其次附帶地說，我們世紀的哲学意識所应完成的进步亦正在这上面。”^①

这样，人完全服从于它本身的智慧发展的規律，甚至在他想避免它的影响时亦无法避免。我們来仔細地檢討一下这个論点，为明显起見，我們举三阶段的規律为例。人类从神学的思惟走到形而上学的思惟，从形而上学的思惟到实証的思惟。这个規律以机械学的規律的力量作用着。

也許这是这样的，可是試問怎样理解，人类即使在他願意时亦不能改变这个規律的作用呢？这是不是，甚至在人类在神学时期之末已經感觉到实証思惟的好处时，亦不能避免形而上学呢？显然——不；假如，不，那末同样显然，在圣西門对智慧发展的規律性的观点中有某种模糊之处。这个模糊之处在哪里呢？它从哪里来的呢？

它就在把規律和改变它的作用的願望对立起来。既然人类出現了这类願望——它本身便成了他的智慧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而規律便應該包括这个事实，而不是和它冲突。當我們还容許这种冲突的可能时，我們还没有弄清規律的概念，那末我們不可免地将陷于两极端之一：或者我們抛弃規律性的观点而站在願望的观点上，或者完全抛弃願望——更正确地說为某一个时代人所願望的——而給規律以某种神秘性，将它变为某种宿命。在圣西門那里及一般地在空想主义者那里，當他們說到規律时，“規律”正是这种宿命。附帶地指出，当俄国的“主观社会学者”起来拥护“人

^① 《L'organisateur》（《組織者》），第119頁，《圣西門全集》，第4卷，在《圣西門和安凡丹的全集》第20卷內。

物”、“理想”及諸如此类的好东西时，他們正是以空想的、模糊的、不完全的因而站不住的关于“事物的自然进程”的学說武装着的。我們的社會學者甚至好象沒有听見過現代的科学的关于社会历史过程的規律性的概念是什么。

在規律性的概念上空想的模糊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我們上面已經指出的，空想主义者对人类发展所持的观点的根本缺点中来的，是的，正如我們所知，犯这个缺点的，不单单是他們。以人的天性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如果有了这个天性，那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規律，也許黑格尔会說，也就有了 an sich 全部历史。人之很少能干涉自己发展的进程，正如人之很少能不成其为人一样。发展的規律作为天意而出現。

这是历史的宿命論，它是那以为知識的进步（因之人的自觉活动）是历史运动的基本动力的学說的結果。

可是我們还要繼續下去。

假如研究人的天性提供理解历史的鑰匙，那末对于我，重要的即不在实际地研究历史，而在正确地理解这个天性。既然我領悟了对于人的天性的正确观点，那末我对于当前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一切兴味，而集中我所有的注意在社会生活应该如何适合于人的天性。历史上的宿命論并不妨碍在实践中对现实的空想态度。相反地，它促进它，割断科学研究的綫索。一般地，宿命論常常和最极端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宿命論常常把自己的情緒宣布为历史的不可避免的規律。正是对于宿命論者可以用詩人的話來說：

“Was sie den Geist der Geschichte nennen

Ist nur der Herren eigener Geist”.^①

① [那他們称之为历史精神的，
不过是这些先生們的自己的精神。]

圣西门主义者断言，剝削者从别人劳动中得来那部分社会生产物逐渐减少着。这种减少在他们目光中看来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律。他们援引利息和地租率的逐渐下降作证明。假如在这点上他保持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方法，那末他们便应得找寻他们所指出现象的经济原因，而为着这点，他们便应该仔细地研究生产物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如果他们做了这点，那末，他们也许会看到，利息水准甚至地租的低降（如果真有这回事的话），不绝对是私有者所得部分的减少。这时候，当然，他们的经济“规律”将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表述。但是对于他们是谈不上这些的。对于从人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神秘规律的全能的信心使他们的思想走向完全另一个方向。他们说：至今在历史上占优势的趋向在将来只会加紧，剝削者所得部分的逐渐减少必然地将以它的完全消失（即剝削者阶级的消失）为结束。预见到这点，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出那种社会制度的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将完全没有剝削者的地位。根据人的天性的另外一些属性，可以看出这种形式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社会改造计划制定得非常迅速：关于社会现象的合规律性的异常重要的科学思想可以用一两个空想的药方来解决……

当时的空想主义者认为这类药方是思想家的最重要的任务。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论点本身是不重要的。它们之所以有意义，就因为从它们中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实际结论。萨伊和李嘉图争论商品的交换价值以什么来决定。也许——这从专家的观点上看来是很重要的问题。可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应当决定价值，而关于这点，可惜，专门家没有想。我们来替专家们想一想吧。人的天性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样。当我们开始听从它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便会大吃一惊地知道：原来专家们目光中的重要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很重要的。可以同意萨伊，因为从他的论点中产生

出完全适合于人的天性的要求的結果。也可以同意李嘉图，因为他的观点，如果加以正确解释和补充也可以巩固这些要求。烏托邦的思想这样无礼貌地去干涉那些他們不了解其意义的科学論战。例如有教养的和熟知人的天性的安凡丹就是这样地解决了当时經濟学的爭論問題的。

安凡丹写了不少的政治經濟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能算为科学上的重大收获，但是也不能加以抹煞，如政治經濟学史家和社会主义史家至今所做的那样。安凡丹的經濟著作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有趣的阶段是有其意义的。但是他对經濟学者的爭論的态度是怎样的，下面的一个例子便可表示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馬尔薩斯坚持地(附带地說一句，很不成功地)辯駁李嘉图的地租論。安凡丹以为真理是在前者方面，而不是在后者方面。但是他并没有去辯駁李嘉图的理論，他不認為这种辯駁是需要的。照他的意見：“关于地租性質以及关于私有者从工作者那里取去的那部分的真正的相对的提高或降低的一切議論，應該归結为一个問題：在脱离事务的生产者(安凡丹这样称呼土地占有者)和积极生产者(即农民)之間，为社会的利益應該存在的关系的性質如何？当弄清楚了这些关系时，那末只要再弄清那些引导到这些关系的建立的手段就够了；在这里亦應該考虑到社会的当时的状况；然而，一切其他問題(即上面所提出的問題之外的問題)将是次要的；而且只会妨碍那些應該促进上述手段之使用的結合。”^①

政治經濟学(安凡丹更喜欢称之为产业哲学史)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指明生产者的各阶层的互相关系以及整个生产者階級及

^① 在論文《Considérations sur la baisse progressive du loyer des objets mobiliers et immobiliers》，《Producteur》，t. I, p. 564. (《論动产和不动产的租金之逐步低降》，《生产者》，第1卷，第564頁。)

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这种指明应该根据于产业阶级的发展史的研究上，而且这种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关于人类的新概念”，换言之，即人的天性①。

在马尔萨斯那里，对于李嘉图的地租论的辩驳是和对于很著名的（如我们现在人们所常说的）劳动价值论的辩驳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没有深知争论的本质，安凡丹急于以他的对李嘉图学说的乌托邦的补充（如我们现在人们所说的修正）来解决：“假如我们很好地理解这个理论——他说，——那末我们似乎应该以下述一点补充它，即……劳动者因为某些人耽于安闲和因为要有权使用生产资料而付款（以地租的形式）给一些人。”

在劳动者一词之下，安凡丹在这里同样（甚至主要地）指农场主—雇主。他所说的他们对土地占有者的关系是完全对的。但是在他的“修正”中一切只归结为将李嘉图所熟知的现象加以更尖锐的表述。可是，这个尖锐的表述（亚当·斯密有时表述得更尖锐）不仅既没有解决价值问题，亦没有解决地租问题，而且完全把这些问题从安凡丹的视野中排除了。而且对于他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他的兴味完全在将来的社会制度；对于他重要的是说服读者，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不应该存在。安凡丹曾直截地说过，如果没有这类实际问题，那末一切关于价值的学术争论将是一种简单的字眼的辩论。这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上的主观的方法。

空想主义者没有在任何地方直接介绍过这个方法。可是他们之很倾向于这种方法即以安凡丹曾责备马尔萨斯为过度的客观性这点亦就可证明了。似乎客观性是这位著作家的主要缺点。谁读过马尔萨斯的著作，他便会知道，客观性（例如为李嘉图所固有的）

① 特别参阅论文《Considérations sur les progrè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Producteur》t. IV.（《论进步与政治经济学》，《生产者》，第4卷。）

却正是“人口論”的作者所永远沒有的。我們不知安凡丹讀过馬尔薩斯的原著沒有(所有的材料使我們設想,例如,关于李嘉图的观点,他只是从法国經濟学者所做的一些摘引中知道的),但是就假定他是讀过的吧,那末,他也沒有能够估計它們的真正价值,沒有能指明,现实是和馬尔薩斯的学說矛盾的。忙于将来應該如何的念头,安凡丹既无時間亦无兴味去深思現在所有的事物。“你对的,——他准备着向他所碰到的第一个告密者說³⁹³——在現代社会生活中,事情正如你所描写的,可是你过度客觀;請从人本的观点上去看問題,那末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社会生活應該重新改造”。空想的肤淺議論不得不向任何或多或少的有學問的資產階級制度的拥护者作理論的讓步。空想主义者为着消除自己的无力的意識而安慰自己,責备自己的对手为客觀性;就算你比我更有學問,但是我可比你更善心。空想主义者不是駁倒有學問的資產階級拥护者;他只是給他們的理論作“注释”和“补充”。这类对于社会科学的完全空想的态度,对于注意的讀者,在“主观社会学者”的著作的每一頁上触目皆是。关于他們以后我还要很多地講到。暂时只引两个例子。在1871年出版了已故的齐別尔的論文:《李嘉图的价值和資本的理論及其最新的补充与說明》。在序言中,作者善意地,可是只是附帶地說到朱可夫斯基的論文:《經濟學上之斯密派及实証主义》(此論文登載于1864年之《現代人》上)。对这个附帶的批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指出道:“我很乐意地回忆到,在《論朱可夫斯基的著作活动》一文中我极公平地評論了我們的經濟学者的功績。我正是指出了,朱可夫斯基早已脫出了必需回到政治經濟学的历史家去的思想;在那里有着解决科学基本問題的一切根据——这些根据为政治經濟学的現代小派別所完全曲解了的。可是当时我便指出,‘首先从事’于这个思想的光荣(以后在卡尔·

馬克思的有力手中成为如此有效果的)，在俄国的作品中，不是屬於朱可夫斯基先生的，而是屬於另一个作家的，即屬於《經濟活动与立法》（《現代人》，1859年）、《資本与劳动》（1860年）、《密勒著作的注释》等等著者³⁹⁴。除了時間上更早外，这位作家和朱可夫斯基先生間之区别可以鮮明地表述如下。例如，如果朱可夫斯基先生詳尽地和严格科学地，甚至有些学究式地証明：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和一切价值为劳动所生产；那末上述論文的作者，沒有忽略事情的理論方面，而主要地着重于从其中产生出来的邏輯的实践的結論：一切价值既然为劳动所生产和測度，就應該屬於劳动。”^①不必深知政治經濟学的人，亦知道“注释密勒的作者”，完全沒有理解那以后在“馬克思的有力的手中”得到如此光輝地发展的价值論。而任何知道社会主义史的人了解：为什么这位作者，不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說，却正是“忽略了事情的理論方面”，而热中于在良好的社会內生产物應該照什么标准分配的思慮。密勒注释的作者是从空想主义者的观点去观察經濟問題的。这在他那个时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七十年代还不能和这个观点告别（而且以后亦沒有告别，不然在其著作的新版中他就会改正自己的錯誤），这时候，甚至从通俗的著作中亦可領会对事物的更正确的观点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了解“密勒注释的作者”关于价值所說的話。这是因为他亦“忽略了事情的理論方面”，热中于“从其中产生出来的邏輯的实践的結論”，即“任何价值應該屬於劳动”的思想。我們已經知道：热中于实践的結果永远是有害地影响于空想主义者的理論的議論。而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迷途的“結論”是如何陈旧，下列情况即可証明，即二〇年代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版，圣彼得堡，1888年，第239—240頁。

的英国空想主义者³⁹⁵已經从李嘉图的价值論中做出了这个結論。但是作为空想主义者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对空想主义的历史亦沒有兴趣。

另一个例子：伏·伏·先生在1882年这样解释他的《資本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一書之出版：

“本書是由散印于各种杂志上的論文集合而成的。將其出版为单行本，我們只給这些論文以外表的統一，稍微不同地編排材料，删除重复（絕沒有完全删除，重复之处書中还有很多。——普列汉諾夫）。他們的內容一仍旧观；新的事实和論据引用得很少；然而，我还决定將自己的著作再一次地請求讀者的注意，这只是为着一个目的——以全部武装同时攻击知識分子的世界观来促使知識分子注意提出的問題（图画：伏·伏·先生“全付武装地”进攻讀者的世界观，而駭怕了的知識分子实行投降，加以注意等等。——普列汉諾夫），引起我們的資本主义的和民粹派的有学問的和忠忱的政論家来研究俄国經濟发展的規律——国家生活的其他一切表現的基础。沒有这个規律的知識就不可能有有系統的及胜利的社会活动，而在我們間統治着的关于俄国最近将来的观念很难称之为規律（观念……可以称为規律?!）和很难能够給实践的世界观以坚固的基础。”（序言，第1頁）

在1893年，同一伏·伏·先生已經来得及变为民粹派的“忠忱的”——虽然，嗚呼，还不是有学問的——政論家了，他已經远离了关于經濟发展的規律是“国家生活的其他一切表現的基础”的思想。現在他“以全部武装”来进攻有这种“观点”的人們的“世界观”了。現在他想，在这个“观点中，历史过程，不是产生者——人，而变成了被产生的力，而人成了它的恭順的工具”^①；現在他認為“社会关系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派生物”^②，非常怀疑地对待关于社会现

① 《我們的方向》，圣彼得堡，1893年，第138頁。

② 同上書，第9, 13, 140頁及其他諸頁。

象的規律性的学說，而以“历史教授卡列也夫的历史的科学的哲学”来和他对立^①。（放明白些吧，人們，服从吧，因为教授先生和我們在一起啊！）

怎样一个借神力之帮助的轉变啊！什么东西唤起它的呢？就是这件东西。在1882年伏·伏·先生找寻着“俄国經濟发展的規律”，以为这个規律不过是他，伏·伏·先生，自己的“理想”的科学表述。他甚至相信，他已經找到了这样的“規律”，即俄国資本主义流产性的“規律”。但是此后他不是白白地活了整整十一年。他應該意識到（即使不是大声喧嘩地）流产的資本主义日益发展着。結果是，資本主义的发展几乎成了“俄国經濟发展”最不可爭辯的“規律”。这样，伏·伏·先生便急于反穿自己的“历史哲学”；找寻“規律”的他，居然說这类找寻是完全浪費時間。俄国的空想主义者不是永远依靠“規律”的；只要这个“規律”和那些他們不仅因为恐怖而且由于良心而力加支持的“理想”背道而馳的时候，他們便馬上抛弃它，如彼得之抛弃耶穌一样。不过，伏·伏·先生就是在現在亦不是永远和規律鬧翻了的。“使观点系統化的天然的企图應該引导俄国知識分子走向建成适合于我国发展的要求和条件的經濟关系进化的独立的图表；而且无疑地这种工作不久便会做成的。”（《我們的方向》，第114頁）显然，俄国知識分子在“建設”自己的“独立的图表”时，将醉心于伏·伏·先生在《資本主义的命运》中所热中的事业，即找寻“規律”。当这样的图表找到时——而伏·伏·先生祷告着，它将于不久的将来就找到——我們的作者就会和規律性庄严地和解，正如福音書上的父亲和其放蕩的兒子和解一样。滑稽家！显然，甚至在伏·伏·先生还在找寻“規律”的时候，他亦

^① 《我們的方向》，第143頁及以下各頁。

沒有弄清楚，这个詞用在社会現象上有什么意义。他对“規律”的态度正是二十年代空想主义者对“規律”的态度。只有这，才能解释，他希望发现一个国家（俄国）的发展規律。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之于俄国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呢？如果他以为，俄国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現象的規律性的概念上沒有超过空想主义者，那末他就錯了。然而，他正是这样想的，这可由他反对他們的意見中看出来。而且不仅他一个人这么想，“历史教授”卡列也夫先生亦是这么想的，一切“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都是这么想的。他們起初把对社会現象的規律性的空想主义观点加之于馬克思主义者身上，然后以或多或少的可疑的胜利来攻打这个观点。真正是与风車的战斗！

附带地說一說有学問的“历史教授”。下面就是他以什么样的詞句来介紹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观观点。“假使在历史哲学上，我們有兴味的是关于进步的問題，那末这便給与了科学的重要内容、它的事实和这些事实的配置的选择。但事实既不能臆想出来，又不能把它們放在臆想的关系中（就是，不論在选择上，不論在配置上，都不应有任何任意的行为？就是，配置應該完全适合客观现实？是的！听吧！——普列汉諾夫），从某种观点上来叙述历史过程，在叙述的忠实性的意味上仍然是客观的叙述。这里另一类的主观主义出現于舞台上：創造性的綜合可以造成整个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的世界，真理和正义的世界，现实的历史應該与之比較，前者即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这种描述是从人类生活的巨大变动的观点加以結合的。在这个比較的基础上产生历史过程的估价，但是这种估价同样亦不应任意而行的。須得証明：这样結合着的事实真有我們所給予它的那种意义，站在一定的观点上，以一定的标准加以估价。”

在謝德林那里，“庄严的莫斯科史家”，当夸赞自己的客观性时说：“雅罗斯拉夫打了伊兹雅斯拉夫也罢，伊兹雅斯拉夫打了雅罗斯拉夫也罢，对我是一样的。”創造了“整个理想的标准世界，应有的世界，真理和正义的世界”的卡列也夫先生是没有这类客观性的。我們假定，他同情于雅罗斯拉夫，虽然他不能将雅罗斯拉夫的失败写成他的胜利（“事实是不能臆想出来的”），但是他仍有替雅罗斯拉夫的悲惨命运一洒同情之泪的高贵权利，他不能不厌恶胜利者，伊兹雅斯拉夫。很难反对这种“主观主义”。可是，卡列也夫先生描写主观主义为如此无色因而无害的面貌是徒然的。这样描写它，就是說不了解它的真正的性質，将它沉沒于感伤主义的空話的大水中。实际上，“主观”思想家的特点是在：“应有的世界，真理和正义的世界”，在他那里是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没有任何关系的：这里——“应有的”，那里——“现实的”，而这两个領域以一条鴻沟（就是那在二元論者那里隔离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鴻沟³³⁶）彼此隔离着。十九世紀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建造一座桥梁通过这个似乎是无底的鴻沟。在我們还没有建造这座桥梁时，則我們还必然要对现实闭着眼睛，集中自己的注意于“应有”（例如，圣西門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显然，因此只会阻滯这个“应有”的实现，因为妨碍着获得对它的正确观点。

我們已經知道，复辟时代的历史家，和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相反，把任何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看做是它的公民生活的結果。这个新的观点在当时是如此流行和強調，以致在应用到实际問題上时，达到奇怪的，現在我們几乎不能了解的极端。例如，薩伊断言：政治問題不应为經濟学者注意，因为甚至在絕對相反的政治制度下，国民經济可以同样很好地发展。薩伊的这个思想为圣西門所称赞，是的，加上了一些更深刻的內容。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外，一

切十九世紀的空想主義者都同意這種對“政治”的觀點。

從理論上說，這個觀點在兩方面都是錯誤的。第一，有這種觀點的人們忘記了：在社會生活中，正如在一切地方一樣，我們碰到的是過程，而不是個別的现象，結果反過來成為原因，而原因成了結果；簡言之，他們在這裡非常拙劣地拋棄了他們在其他場合上同樣是非常拙劣地限制了他們的分析的互相作用的觀點；第二，假如政治關係是社會關係的結果；那末很難了解：為什麼同一的原因——“財富”的同樣的狀態可以引起極端不同的結果（政治制度的極端相反的性質）。顯然，這裡關於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狀態的因果性的概念還是極端模糊的。而真的，很容易證明，在一切空想主義者那裡，這一概念是如何模糊。

在實踐上，這種模糊性引起了兩種結果。一方面，關於勞動組織說得這麼多的空想主義者，準備着馬上便重復十八世紀的老格言：“*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自由、放任”）。例如，在產業的組織上看到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任務的聖西門說：“*l'industrie a besoin d'être gouvernée le moins possible*”（產業需要尽量少管理它）^①。另一方面，空想主義者——同樣除了某些屬於較後時期的例外——是完全冷淡地對待當前的政治，今天的政治問題。

政治制度是結果，而不是原因。結果永遠是結果，而不會反過來成為原因。從此就產生了差不多直接的結論：“政治”不能成為實現社會經濟“理想”的手段。因此，背向政治的空想主義者的心理是很明白的。可是在實現自己社會改造計劃的事業上他們仰望于什麼呢？一切與無。一切——在這個意義上，即無區別地等待

^① 十八世紀的啟蒙派完全同樣自相矛盾，不過他們的矛盾從另一方面表現出來。他們贊成國家不干涉，但是又時時要求立法者作瑣碎的規章。啟蒙學者同樣不清楚“政治”（他們認為是原因）與經濟（他們認為是結果）的聯繫。

从最对立的各方面来的援助。无——在这个意义上，即一切他們的希望都是毫无根据的。

空想主义者自以为是异常实际的人物。他們厌恶“空論派”³⁹⁷，而他們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最响亮的原則，毫不思索地牺牲于自己的 *idées fixes* (幻想)。他們既非自由派，亦非保守派，既非君主派，亦非共和派，他們准备和自由派也罢，保守派也罢，君主派也罢，共和派也罢，携手并进，只要能实现自己的“实际的”，如他們自己設想的，异常实际的計劃。在老的空想主义者中，在这上面傅立叶是特别显著的。他如果戈里的康斯坦如格罗³⁹⁸一样，企图把一切垃圾都拿来用的。他以在将来社会中他們的資本能获得巨大的利息的前途来誘惑高利貸者；他对瓜和薊的爱好者，誘之以将来的极好的瓜和薊；他説服路易·菲力普説那些現在被血統皇子們輕視的奧利央宮的公主們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不会沒有求婚者的。他抓到每一根稻草。但是，嗚呼！不論高利貸者，不論瓜薊的爱好者，不論“皇帝—公民”，对于傅立叶的好象是最令人信服的計算，听都不听一听，絲毫也未加注意。他的实际性成了預先命定的失敗，成了对幸运的偶然性的絕望的追逐。

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已經热心地从事于追逐幸运的偶然性了。正是由于希望这种偶然性，他們以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方法企图与当时的或多或少有教育的“立法者”和貴族发生友誼关系。普通以为，一个人既然説，意見支配着世界，那末他就沒有理由忧虑将来：*la raison finira pas avoir raison* (理智归根結底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并不这样。理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来得到胜利呢？启蒙学者説：在社会生活中，一切归根結底都从屬於“立法者”。因此，他們便去找立法者。但是同一启蒙学者很好地知道：人的性質和观点是为教育决定的，而一般地説，教育沒有預先規定

“立法者”領会启蒙学說。因之，他們不能不意識到在立法者身上希望很少。剩下来只有希望幸运的偶然性了。你設想你有一个大箱子，里面有很多黑球亦有两三个白球。你把球一个个地取出来，每次你取得白球的机会要比取得黑球少得多。但是无数次重复地拿取之后，最后你亦取得了白球。对于“立法者”亦是一样。在每一个个别情形下，立法者大概是反对“哲学家”的，但是最后亦会出现同意哲学家的立法者。这个人会做出理智所要求的一切。爱尔維修一字不变地这样地議論^① 399 对于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意見支配着世界”）显然給人的自由以这样广大的地位，以致实际上将他变成偶然性的玩具。所以这个观点在本質上是极为絕望的观点。

例如，我們不知道比十九世紀末的空想主义者（即俄国的民粹派和主观社会学者）的观点更絕望些的观点。他們每个都有准备好的挽救公社以及跟着它一般地拯救农民的計劃，每人都有自己的“进步的公式”。但是，嗚呼！生活按自己的进程行进着，絲毫也不理会他們的“公式”，而公式則除了也不理会生活，自顧自地在抽象、幻想和邏輯的結論的道路上前进外，亦別无他途。例如，我們听一听主观学派的亚吉尔（希腊神話中的英雄。——譯者）米海洛夫斯基的話吧：

“工人問題在欧洲是革命的問題，因为在那里它要求将劳动条件(?)交給工作者的手中和剝夺現在的私有者。工人問題在俄国是保守的問題，因为在这里只要求保存劳动条件在工作者的手中，替現在的私有者保証他們的财产。在我們这里就在彼得堡附近……在工厂、制造厂、修理

① “Dans un temps p us ou moins long il faut, disent les sages, que toutes les possibilités se réalisent: pourquoi désespérer du bonheur futur de l'humanité?” (“在多少辽远的将来——聪明人說——一切可能都应该实现的，为什么要对人类的将来的幸福失望呢?”)

厂、别墅从立着的地方，亦存在着乡村，乡村的居民靠自己的土地生活，烧自己的木材，吃自己的面包，穿着用自己的羊子的皮毛，自己做成的大衣和皮袄。你坚固地保证他们这些为他们自己的，那末，俄国的工人问题就解决了。假如真正地理解坚固保证的意义，那末为着这个目的便可以给予一切。人们说：不能永远停留在木犁和三耕制，以及太古的制造大衣和皮袄的方法之上。是的，不能的。从这种困难中有两条出路。一条是为实际观点所赞许的，很简单和方便：提高税率，解散公社，也许这就够了——而类似英国的工业将如雨后春笋一样怒长。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当然要困难得多。可是问题的容易解决还不是说就是正确的解决。另一条道路就在发展那些现在已经存在于极粗野和原始形态中的那些劳动和所有的关系。显然，没有广大的国家的干涉，这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国家干涉的第一个动作应该就是从立法上巩固公社。”^①

在辽远的世界中，
对于自由的心怀，
有两条大道。
鼓起自负的力量，
鼓起坚决的意志。
择一前进！⁴⁰⁰

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著者的一切议论大有瓜蒞之气味。而我们的嗅觉大概不会骗我们的。在瓜和蒞这事上傅立叶的弱点在那里呢？就在陷于“主观社会学”。客观社会学者将自己问自己道：我所描写的图画有没有可能吸引瓜和蒞的爱好者呢？其次，他将自己问自己道：瓜和蒞的爱好者能否改变现存社会关系和他们的特定的发展进程呢？大概，他们对于上述的每个问题都将加以否定的答复，因而将不会去浪费时间来和“爱好者”谈话。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2版，第102—103页。

但是这样做的将是客观社会学者，即将自己的计算根据在社会发展的特定的规律性的进程上的人。而主观的社会学者则以“希望”的名义赶走了“规律性”，对于他，除了等待偶然性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对罪恶即用棍棒亦可以射击的——这便是善良的主观社会学者的唯一可自安自慰的想象。

对罪恶即用棍棒亦可以射击的。可是棍棒是有两头的啊，可不知道它用那一头来射击。我们的民粹派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主观社会学者已经试用过了无数的棍棒（甚至关于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之下易于收集租税残余有时亦出现为魔术师的棍棒）。在极大多数的情形下，棍棒是完全不能作火枪用的；而当偶然地射击出去了时，那子弹恰正打着民粹派和主观主义者先生们自己。回忆一下农民银行。在巩固“基础”上对它曾有多大的希望啊！在农民银行开设时，民粹派先生们是如何地兴高采烈啊，而结果呢？棍棒正射击着兴高采烈者；现在他们自己都承认农民银行⁴⁰¹（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有益的机关）只是破坏“基础”；而这个承认等于感觉到，他们（兴高采烈者）曾同样是——至少在某些时间内——说空话的人⁴⁰²。

可是，银行之所以破坏着基础，只因为它的章程和实践没有完全适合于我们的理想。假如完完全全地实行了我们的理想则结果将完全不同……

第一，绝非不同：银行无论如何将促进货币经济的发展，而货币经济必然将破坏“基础”。而第二，当我们听到这无数的“假如”，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觉得，在我们的窗下小贩喊着：“买瓜蒞啊！呱呱叫的！”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就已经不倦地指出他们所想出的改良的“保守的”性质，圣西门直接以人民起义恐吓政

府和今日人們常說的社会，这个起义在当时應該描写为在“保守派”的想象中可怖的大家都还記得的长褲党的运动。但是从这个恐吓中，显然，什么結果也沒有得到，而假如历史真的給我們某种教訓的話，那末其中最丰富的教訓之一，就是，証明所有似乎是实际的空想主义者的一切計劃的完全非实际性。

当指明自己計劃的保守性时，空想主义者力图促使政府实现它，他們为証明自己的思想，常常提出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或长或短时期的概述——从这概述中显出了在某个时候和某个时候曾犯了“錯誤”，这些“錯誤”給全部社会关系以完全新的和极不合願望的形态。政府只要觉察和改正这些錯誤，那末，地上的天国馬上便会建立起来了。

例如，圣西門劝誘波旁王朝說，革命以前法国内部发展的主要特点乃是君主政体和实业家的联合。这个联合对双方是同样有利的。在革命时，政府由于誤会反对了实业家的合法要求，而实业家由于同样可悲的誤会起来反对君主政体。从此产生了以后时期的一切罪恶。但是現在当罪恶的根源已經发现时，事情便很容易糾正，因为只要实业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政府妥协就够了。这亦就是从双方无数困难中走出的最合理的保守的出路。現在，已經不必多說，不論实业家，不論波旁王朝都沒有听从圣西門的善良劝告。

“不去坚持我們古老的傳統；不去发展祖传下来的生产資料和直接生产者密切联系的原則；不去利用西欧科学的发明和使用它們来发展以农民占有生产工具为基础的实业形式；不去以集中生产工具在农民手中来增加他的劳动生产率；不去利用不是西欧的生产形式而是西欧的生产組織……不去做这一切，而我們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不管資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是建筑在剝削农民之

上，我們却不仅不去阻碍它的发展，而且相反地，企图用全力去促进全部我們經濟生活的根本破坏——这破坏引导到1891年。”^①尼古拉一逊先生这样悲泣着，劝告“社会”改正这个錯誤，解决“极困难的”但“非不可能的”任务：“发展人民生产力于这样的形式中，以便他們不为极少数人享受，而为全民所享受。”^②一切事情是在：改正“錯誤”。

很有趣的，尼古拉一逊先生自以为是与任何烏托邦都是毫无关系的。他常常援引那些我們确認為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批評家的人們⁴⁰³。一切事情是在国家的經濟，——他附帶地或非附帶地跟着这些人重复道——一切罪恶是从这里发生的：“因此消灭罪恶的手段，假如找到的話，正應該在于改变生产本身的条件。”在注释中——又引用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評家之一的話：“这些手段不應該为头脑所发明，而應該借思想之助在生产的現有的物質条件中去找到他們。”

但是那推动社会或者解决或者即使提出那尼古拉一逊先生所提議的任务的“生产的物質条件”到底是什么呢？这不仅对于讀者即对于著者本人仍然还是一种秘密，著者以自己所提出的“任务”很明白地表明了：在自己的历史观点上他仍然是純粹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他摘引完全不是空想主义的作家的話^③。

能否說，傅立叶的計劃是和他同时代的生产的“物質条件”相

① 尼古拉一逊：《我們改革后的社会經濟概論》，彼得堡，1893年，第322—323頁。

② 同上書，第343頁。

③ 与这一样，尼古拉一逊先生的实际計劃乃是差不多逐字逐句地重复那些我們的空想主义者——民粹派（例如普魯加文）所早已，自然是毫无結果地，提出了的那些“要求”。“社会—国家活动（如你們所見，这里既未忘了社会，亦未忘了国家）在工厂經濟的領域內的最后目的与任务應該为着：一方面为国家的利益收买一切劳动工具而将它租給人民作临时的租用；另一方面——确立这样的生产条件的組織（普魯加文先生簡單地想說：生产，但是按照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首的俄国作家的习惯，他用了“生产条件”

矛盾的呢？不，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依据在这些条件上的，即其缺点亦然。但是这并不妨碍傅立叶之为空想主义者，因为，他既“借思想之助”在和他同时代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上论证自己的计划，但他没有能够将这个计划的实现亦归结于这些条件，因之完全蒙昧地将“伟大的任务”加之于那些社会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由于同一的物质生产条件既无为解决这些任务而斗争的兴味，亦无解决之可能。尼古拉一逊先生之错误正如傅立叶或他所不欢喜的罗伯图斯一样大；更正确些说，他正是令人记起罗伯图斯，因为尼古拉一逊先生之援引古老的基础正是合于这位保守作家的精神的。

为着启示“社会”，尼古拉一逊先生指出西欧的可怕的例子。我们的空想主义者早已企图用这类指明来表明自己是现实的人物，不是幻想热中者，而只是善于利用“历史教训”的人物。但是这个手法亦完全不是新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已经企图以英国的例子恐吓和启示自己同时代人，在英国“雇主和工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英国在工人身上压着特殊的专制主义的枷锁。“在工业发展道路上跟着英国的其他国家——《Producteur》⁴⁰⁴说——应该了解，须得阻碍这类秩序在自己土地上的产生。”^④能够阻止英国式的秩序在其他国家产生的唯一的有效的阻碍乃是圣西门的“工作的和工作者的组织”^⑤。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德国成了避免资本

这一词句，不知其意义何在），在它的基础上安放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象国家经济力量的商品——资本主义组织下所有的那种市场、销售和竞争的利益。”（普鲁加文：《手工业展览》，莫斯科，1882年，第15页）请读者们将这段和上引的尼古拉一逊先生书上的摘引比较一下。

④ 《Le producteur》t. I. P. 149.（《生产者》，第1卷，第140页。）

⑤ 关于这个组织请看1831—1832年的《Globe》⁴⁰⁵，那里详细地叙述着，甚至还有准备的过渡的改革。

主义的梦想的主要舞台，德国的空想主义者长久地和頑強地将德国和“西歐”(den westlichen Ländern)对立。在西方国家中——德国的空想主义者說——新社会組織的理想的担負者是工人階級，在德国則是有教育的階級(即俄国称为知識分子的)。正是德国知識分子被認為是使德国避免資本主义的天然担当者^①。对于德国的空想主义者，資本主义是这样的可怕，因此，他們为着避免它，在必要时，准备忍受完全的停滯不进。立宪制度的胜利——他們議論道——将引导到金錢貴族的統治。因之最好讓它不要有立宪制度^②。德国沒有避免了資本主义，現在俄国的空想主义者說着避免資本主义。空想主义的理想这样地从西到东旅行着，到处出現为他們所反对和与之斗争的資本主义的胜利的預言者。但是他們愈到东方則愈加改变了他們的历史意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在当时是勇敢的天才的革新家；德国的則大大的低于他們，而俄国的空

① “我們的經濟学者企图以全部力量将德国提高到那英国已經达到的工业发展的阶段，英国因为这点而领导着一切其他国家。英国——他們的理想。自然，英国頗足自豪：英国在世界的各部分都有着自己的領土，它能够到处巩固自己的势力，它有最丰富的商艦和軍艦，它知道如何在訂結商約时加上自己的最惠条款，它有最大的投机家——商人，最大的資本家，最会发明的头脑，最好的铁路，最巨大的机械装置；自然，从这个观点上去看英国，它是幸福的国家。但是在估計英国时还有另一种观点，按这种观点，这个国家的幸福，在极大的程度上，为它的不幸所掩蓋着。英国是这样的国家，那里貧困到了极点，每年餓死千百人，巨大数目(成万人)的工人拒絕工作，因为不管他們的一切劳动和受苦，他們不能得到維持可怜生活的工资。英国是这样的国家，那里支付稅款以救济穷人的慈善事业应该成为形式的法律。經濟家，看看那搖摆的、弯曲的、佝僂的身体吧，看看那蒼白的、悲哀的、肺癆病的面孔吧，看看他們的一切精神的和身体的穷困吧！你們还想把德国做成英国第二嗎？只由于不幸和痛苦英国才能达到它現在所有的工业繁荣；而德国亦只有由于同样的牺牲才能达到相似的结果，即达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梯里报》，1846年，5月4日。重印于由赫斯所編之評論第1集：《社会之鏡，文明世界的社会条件》，第1卷，爱齐隆和爱尔倍福尔，1846年)

② “假如立宪主义者能够推翻德国的政府而建立君主政体或共和政体，那末我們將有如法国一样的金錢貴族，而最好还是讓它如至今以前那样吧。”(參閱《乔治·毕希納全集》，第122頁)

想主义者則只能以其古旧的面貌吓吓西方人士。

很有趣的，在法国的启蒙学者那里已經有着避免資本主义的思想，例如，霍尔巴赫有力地抨击英国立宪制度的胜利引导到 de l'intérêt sordide des marchands(商人的卑污利益)的完全統治。他很悲泣英国之不倦地找寻新市場这一件事。这样的追逐市場，使他們脫离哲学。霍尔巴赫同样斥責存在于英国的财产的不平等。他和爱尔維修一样，想造成理智和平等的胜利，而不是商人利益的胜利。但是不論霍尔巴赫，不論爱尔維修，不論哪一个启蒙学者，除了以对理性的頌詞和对于“peuple d'Albion”⁴⁰⁶的道德的主张外，不能以任何东西来对抗当时的事物的进程。在这上面，他們正和我們現代的俄国空想主义者一样无力。

还談一点，我們就結束空想主义者了。“人的天性”的观点喚起了在十九世紀上半期的那种濫用生物学的比擬，这至今还很厉害地影响着西欧的社会学的書籍，而特別是俄国的 quasi(也算)——社会学的書籍。

假如全部历史的社会运动的解答應該在人的天性中去寻找，以及假如圣西門就已經正确地指出，社会是由个人組成的，那末，个人的天性亦應該給予解释历史的鑰匙。人的天性由广义的(即包括着心理現象的)生理学来研究的。所以，生理学在圣西門及其門徒的眼中是社会学的基础，他們称社会学为社会物理学。在圣西門生时及在其积极参加下出版的《Opinion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industrielles》(《哲学的文学的及經濟的观点》)中，有一篇非常有趣的，可惜是未完的論文，这論文为匿名的医学博士所写，题目为《De la physiologie appliquée a l'amélioration des institutions sociales》(《論生理学之应用于改善社会制度》)。作者把社会科学看做是“一般生理学”的組成部分，它以“特殊生理学”的对个体的观察与試驗

丰富着自己，并得到高尚的見解。个体对于它，只是“社会的器官”，它之研究社会体的功能“正如特殊生理学之研究个体的功能一样”。一般社会学研究（作者說——表达）社会存在的規律，而成文法則应与之适应。以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例如斯宾塞，利用社会器官說，做出最保守的結論。但是我們上引的医学博士却首先是改革者，他在社会改造的形态中研究“社会体”，因为只有“社会生理学”和与它密切联系着的“卫生学”，才給予“可以在其上建設那文明世界現在狀況所要求的社会組織体系的肯定基础。”但是，显然，社会生理学和卫生学給作者的改革幻想的食料并不多，因为归根結底，他不得不乞援于医生，即处理个体器官的人們，請求他們給社会“以社会制度的体系”，“作为一种卫生藥方”。

这个对于“社会物理学”的观点以后为孔德在其各种著作中所承受，或者，如果你願意說的話为他所发展。下面就是他在年輕时，当他还参加圣西門的《Producteur》^①时所說的关于社会科学的話：“社会現象，作为一种人类的現象，无疑的是屬於生理学現象之列的。但是社会物理学虽然應該在个体生理学上有自己的出发点和与个体生理学有密切的联系，可是它还应作为一种完全独立的科学来加以观察和研究，因为人类的各代彼此发生进步的影响。如果保持着純粹的生理学的观点就不能对这个現象作应有的研究，而对这个現象的估計却應該放在社会物理学的主要地位。”^②

我們来更亲近地看一看，从这个观点观察社会的人陷于何种无出路的矛盾中。

第一，既然“社会物理学”在个体生理学上有其“出发点”，它便

① 《生产者》。

②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savants》，V. I. pp. 355—356.（《論科学与学者》，見《生产者》，第1卷，第355—356頁。）

建設在純粹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生理學上沒有對於對象的唯心主义觀點的地位。但是同一社會物理學應該主要地研究一代人給另一代人的進步影響的估計。某一代人影響另一代人，給他以他從上一代接受下來和他們自己得來的知識。所以，社會物理學是從知識發展及一般的“教育”（lumières）發展的观点上去觀察人類的發展的。這就是十八世紀的純粹唯心主义的觀點：意見支配世界。按孔德的勸告，把這個唯心主义的觀點和個體生理學的純粹唯物主义的观点“密切聯繫”之後，我們便成了純粹的二元論者，而且很容易，即就孔德本人的著作，就可看到這個二元論對於社會學觀點的有害的影響，但是這不是全部。大家知道，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已經指出，在知識的發展中有某種規律性。孔德力主這種規律，將著名的三階段（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和實證的）規律提到第一位。

但是為什麼知識的發展正是經歷這三個階段呢？孔德回答道：人的智慧的天性就是如此：“按其天性（par sa nature）；人的知識在其行動着的地方，到處經歷三個不同的理論狀態。”^①很好，然而，為了研究“天性”，我們不得不乞援於個體生理學，而個體生理學却不給我們以充分的解釋，我們又重復回到“後代”，而“後代”又把我們送回“天性”。這稱為“科學”，但科學在這裡却毫無蹤跡。有的只是在無出路的圈子中無終止的運動。

我們的，似乎是新奇的，“主觀社會學者”完全站在二十年代的德國空想主義者的觀點上。

“還在諾任的影響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關於自己說道——和部份地在他的領導下，我研究了關於生物學和社會學的界限及其能否接近這一問題……我與諾任的思想接觸所得的益處，難以筆墨形容，但是其

① 《Producteur》，t. I, p. 304.（《生產者》，第1卷，第304頁。）

中还有许多是偶然的，这一半因为这些思想就在諾任本人亦还正在发展中，一半因为他对自然科学领域不大通晓。实在说来，我从諾任那里，只得到了向一定方向的一个推动，但是是一个有力的、坚决的和有益的推动。我并没有想专门研究生物学，可是我按諾任的指示和似乎是他的遺囑讀了許多書。这个新的讀書潮給我以前所积累的很大的，虽然是乱七八糟的，而且部分地是不中用的实际的和思想的材料以特殊的和异常吸引我的反射。”^①

諾任在其概論中是以布哈尔崔夫的名义引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布哈尔崔夫“梦想过用自然科学的帮助来改革社会科学并且制定了改革的广大的計劃”。这个改革活动的方法如何，可从下文看到。布哈尔崔夫将巨大的关于动物学的論文从拉丁文譯成俄文，同时以自己的注释加于譯文上，在这些注释中他想把“一切自己独立工作的結果加进去”；而对于这些注释再加上“社会学”性質的新注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忠誠地介紹讀者去認識这种第二层的注释之一：“我一般地不能在自己对范—德尔—海文的补充中过分陷于理論的議論和关于应用所有这些純粹解剖学的問題去解决社会經濟問題的結論。因此我再一次請求讀者注意，一切我的解剖学和胎生学的理論有其主要目的在找寻社会生理学上的規律，而因此所有我的以后的著作，当然将建立在我在这本書上叙述的科学根据之上。”^②

解剖学和胎生学上的理論“有其主要目的在找寻社会生理学的規律！”这說得极不联貫，但是可以作为空想主义的社会学者的特征的。他建立解剖学的理論，依靠这个理論預备写出許多对于他周围的社会“卫生藥方”。在他，社会生理学亦便歸結于这些

① 《文学与生活》，《俄国思想》，1891年，第4册，第195頁。

②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2版，第265—266頁。

藥方。实在說布哈尔崔夫的社会“生理学”不是“生理学”，而是我們已認識的“卫生学”，不是关于現有事物的科学，而是关于根据……同一布哈尔崔夫的“解剖学和胎生学的理論”而應該如何如何的科学。

虽然，布哈尔崔夫亦是从諾任处抄来的，但总不失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創作（如果对上引的著述的注释可称为艺术創作的話）。因此，就是它的不成話的注释，也許实际上永远不曾存在过。在这种情形下，更可以作为以极大的尊敬說到它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特征。

“我無論如何还是在典籍上遇到难忘的友人——师长的思想的反映”——梯姆金說；童話是用梯姆金的名字說的。布哈尔崔夫——諾任的思想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过去和現在反映着。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自己的“进步的公式”。这个公式說：“进步是逐漸接近不可分者的整体性，接近器官之間更完全和全面的分工和人們之更少的分工。一切阻止这个运动的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有害的、非理性的。只有那减少社会的差异性和加强社会的各个人員的差异性的东西，才是道德的、正义的、理性的和有益的。”^①

这个公式能有什么样的科学意义呢？它是否解释着社会的历史运动呢？它是否說明历史运动如何完成及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另一样呢？完全沒有，而且它的“主要目的”亦不在此。它不是說，历史是如何經歷过的，而是說，为了值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滿意，它曾應該如何走法。这是空想主义者根据“有机体发展的規律的确切研究”之上而臆想出来的“卫生藥方”。这正是圣西門主义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2版，第186—187頁。

者醫生所曾經找尋過的。

“……我們說過在社會學上絕對要求客觀的方法將等于(如果是可能的話)以尺寸和斤兩相加,然而這並不是說,客觀的方法應該完全從這個研究的領域內趕出去;而只是說,在這裡最高監督應該屬於主觀的方法。”^①

“這個研究的領域”正就是期望着的社會的“生理學”,正就是烏托邦的領域。不必說,在這個領域內使用“主觀方法”是很方便於“研究者”的工作的。但是這種應用並不是根據於任何科學而是根據於“赤色的虛構的誘惑”;誰既然陷於其中,便也不再反對在同一“領域”內應用(自然在不同的權利上)兩種方法(主觀的與客觀的),雖然這類方法論的糊塗乃是真正的以“尺寸和斤兩相加”^②。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第2版,第185頁。

② 附帶說一句,即名詞本身:“客觀的方法”,“主觀的方法”已經是巨大的,至少是名詞上的糊塗不清。

第四章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

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者曾經坚信：他們已經給了唯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他們把唯心主义看做过时了的永远被抛弃了的理論。但是上世紀之末已經开始了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动，而十九世紀上半期，唯物主义本身却陷于那为大家認為过时了的、最后埋葬了的体系的地位。唯心主义不仅复活了，而且得到了空前的、真正光輝的发展。这当然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但是我們在这里且不提它，只来看一看十九世紀的唯心主义較之前一时代的唯物主义有无优胜之处，如果有，那末这个优胜之处在哪里？

法国唯物主义者當他們遇到在自然間或历史上的发展这一問題时，每次都表露他們的惊人的薄弱，簡直是出于意外的薄弱。即以人的起源为例。虽然这一物种之逐漸发展的思想，对于唯物主义者不觉得是“矛盾的”，但是他們認為这种“猜想”是很靠不住的。《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体系》。——譯者）的著者們說（參閱該書第1部分第6章），如果有人起来反对这种猜想，如果有人以为“自然是借助于一定数目的一般的和不变的規律而动作的”，再加上“人、兽、魚、虫、植物等等从古就存在着并且永远不变”，那他們亦将不加反对。他們不过将指出：就是这种观点亦和他們所闡明的观点并不矛盾。“人沒有被給予知道一切，他沒有被給予知道自己的起源。”——这就是《Système de la nature》的著者們对于这个重要的問題，归根結底所說的一切。

爱尔維修好象更加傾向于人的逐漸发展的思想。“物質是永

久的，但是物質的形式是变动的。”——他指出道，并且提起就在現在，人种亦是受气候的影响而变形着^①。他甚至認為一切动物种都是变动的。但是这个健全的思想，他却是用很奇怪的辭句說出来的。按他，动植物各种不同种的“相异”的原因或在他們的萌芽中的性質已經不同或在他們周圍環境的不同，他們的“教育”的不同^②。

这样，遺传性就排斥变动性以及相反。因之，如果我們接受了变动性的理論，我們便應該設想，在相當的環境中从每一个特定的“萌芽”中可以得到任何动物或植物：从櫟樹的萌芽中，可以得到牛或麒麟。显然，这类“猜想”对于物种原始这一問題的解决不能有所帮助，而爱尔維修本人在一度附帶地說过之后，也从沒有再回到这上面来过。

法国唯物主义同样不能好好地解释社会发展的現象。各种不同的“立法”制度为他們描写为絕對是“立法者”的自覺的創造活動的結果；不同的宗教体系是僧侶的狡猾的結果，等等。

法国唯物主义在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問題上的这种无力使得它的哲学內容成为非常貧乏的。在关于自然的學說上，这个內容歸結为反对二元論者关于物質的片面概念；而在关于人的學說上，他局限于无限地重复和稍稍变动洛克的命題：沒有先天的觀念。不管这种重复在反对过时了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理論斗争中如何有益，可是它只有在唯物主义者能够应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人类的精神发展时才能有郑重的科学意义。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法国

① 《Le vrai sens du système de la nature》，à Londres 1774, p. 15. (《自然体系之真諦》，倫敦，1774年，第15頁。)

② 《De l'homme》，Oeuvres complètes de Helvetius, Paris 1818, t. II, p. 120, (《論人》，《爱尔維修全集》，巴黎，1818年，第2卷，第120頁。)

唯物主义者(实在說, 爱尔維修)在这个方向上曾做了某些极卓越的尝试; 可是这些尝试是失敗了的(如果这些尝试成功了, 那末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发展問題上将是极强有力的), 而唯物主义者在自己对历史的观点上乃是站在純粹唯心主义的觀點上的: 意見支配世界。只有极少的时候, 唯物主义者在自己的历史議論中以注解的姿态插进了下列的命題: 即某个狂妄的原子, 落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并在其中造成腦的机能的破坏, 以致改变整个世紀的历史进程。这种唯物主义實質上是宿命論, 它沒有預見事变的余地, 換言之, 沒有思惟的个人自覺的历史活动的余地。

因此, 不足奇怪的, 对于那些沒有被引入那唯物主义在其中是极左派的惊人的理論武器的社会力量斗争中的有能力的和天才的人們, 这个学說是干燥的、阴暗的、悲慘的。例如歌德就这样批評它⁴⁰⁷。为着抛弃这个責备, 唯物主义不得不抛弃干燥的、抽象的議論而企图以自己的观点去理解和解释“活的生活”, 具体現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鏈索。但是在其当时的形态上, 唯物主义不能解决这个伟大的任务, 而唯心主义哲学掌握了它。

在这个哲学的发展上, 黑格尔的体系是其主要的、最后的一环, 因此, 在我們的叙述中我們主要地将指出它来。

黑格尔称那些不能理解現象的发展过程, 迫使得自己和別人都以为現象是僵化的, 无联系的, 不能彼此轉化的思想家(不論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 的观点为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以辯証法来和这种观点对立, 辯証法正是在現象的发展, 因之, 在其互相联系中研究現象。

按黑格尔, 辯証法是一切生活的原則。常常碰到这样的人, 他們在說出了某一个抽象的命題之后, 极願意承認也許他們錯了, 也許和它直接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彻头彻尾地浸透着

“忍耐性”的有教养的人：自己活下去也要給人家活下去——他們向自己的悟性說。辯証法和俗人的怀疑派的忍耐毫无共通之处，但是它亦能将直接对立的抽象命題协调起来。我們說，人是要死的，把死看做是完全根据于外的情况和完全与人的本性不同的东西。結果：人有两种屬性：第一，做活人，第二，同样做死人。但是在最亲近的觀察下可以看到：生命在本身中带着死亡的萌芽，并且一般地任何現象在下述意义上都是矛盾的，即它从它本身中发展着那些早晚要結束其自身的存在的成份，把它变为它本身的对立物。一切流轉着，一切变动着，沒有力量能够阻滯这个經常的流轉，停止这个永远的运动；沒有力量能够抵抗現象的辯証法。歌德将辯証法人格化为精神的式样⁴⁰⁸：

In Lebensfluthen, in Thatensturm
 Wall'ich auf und ab,
 Webe hin und her!
 Geburt und Grab——
 Ein ewiges Meer,
 Ein wechselnd Weben,
 Ein glühend Leben,
 So schaff'ich am sausenden Webstuhl der Zeit
 Und wirke der Gottheit lebendiges Kleid.^①

① 生潮中，业浪里，
 淘上复淘下，
 浮来复浮去！
 生而死，死而生，
 一个永恒的大洋，
 一个連續的波浪，
 一个有光輝的生长。
 我架起时辰的机杼
 替神性制造生动的衣裳。

(郭沫若譯：《浮士德》)

在某一分鐘运动着的物体在某一点上，而同时却又在这一点之外，因为假如他只是在这一点之上，那末，至少在这一瞬間，它成了不动的了。任何运动都是辯証的过程，生动的矛盾，而由于没有一个自然現象，在解释它时，我們可以不在最后去乞援于运动，那我們應該同意黑格尔，他說：辯証法是任何科学認識的靈魂。而且这不仅对于認識自然。例如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① 这一句老格言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說，我們的最正当的行动是既要尊重正义同时又要尊敬非正义嗎？不，这样議論的只有“庸俗的經驗，愚人的智慧”。这个格言是說，任何抽象的正义，当达到自己的邏輯的結局时就变成了非正义——即自己的对立面。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可以作为这一点的最鮮明的描繪⁴⁰⁹。現在請你們看一看經濟現象。“自由竞争”的邏輯的結局是什么？每个企业家力图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成为市場的唯一的主人。而当然，常常某人，路得希尔或王德尔毕尔，能够幸运地实现这个企图。但是这一点指明：自由竞争引导到垄断，即竞争的否定，即自己本身的对立面。或者請看一看，为我們民粹派書籍所如此夸耀的财产的劳动原則将引导到什么。只有我的劳动所創造的东西才是屬於我的。这是无可再正义的了。而同样正义的是，我按自己的自由意志使用我自己創造的东西：我自己使用它或者以它交換我因某种原因而喜欢的东西。最后同样正义的是我仍然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对我更喜欢、更好、更有利地去使用我所换来的东西。現在我們設想：我出卖自己本身劳动的产物，換取金錢，而金錢用在雇佣工人上；即購買別人的劳动力。使用这个劳动力之后，我便成了价值高过其購買时所花費的价值的占有者。这，从一方面說来，是很正义的，

①（最高的正义是最高的非正义）。

因为大家已經公認，我能够依我觉得更好和更有利的方法去使用我所换来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却是非常不正义的，因为我剥削了别人的劳动，因而否認了放在我的关于正义的概念的基础上的原則。我个人劳动所得的财产給我产生由别人劳动所創造的财产。Summum jus summa injuria。而这种 injuria (非正义) 以事物本身的力量产生于几乎每一个小康的手艺工人，几乎每一个过得去的农户的經濟中^①。

这样，每个现象由于制約他的生存的力量本身的作用，或早或晚，但必然地要轉化为它本身的对立面。

我們說过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从現象的发展的观点上去观察一切現象，这就是說，辯証地观察現象。应该指出：形而上学者亦能够曲解关于发展的学說本身。他們断言，不論在自然間，不論在历史上飞跃是沒有的。当他們說到任何某个現象或社会制度的产生时，他們将事情描述为，似乎这个現象或制度，过去某个时候曾經是很小的，完全看不見的，而以后則逐渐生长了起来。当說到同一現象和制度的消灭时，相反地以为是它的逐漸的縮小，直至由于自己的显微镜上的大小以致完全看不到。这样地理解的发展，什么也不能解释，它預先設想着它所应该解釋的現象的存在而只計算在其中所完成的量变。在某一个时期形而上学的思惟在自然科学中的統治曾經是这样地有力，以致自然科学不能对发展作另一想法，

^① 这个永远的和到处的辯証法的統治，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不可理解的，他帶着恶意的怀疑說，一切都变化的，除了辯証运动的規律。我們回答道：是的，眞是这样的，如果你奇怪这点，如果你想辯駁这一观点，那末請你記着，你不得不去和現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观点辯駁。为着使你信服这一点，你只要記起萊伊尔用来为自己有名的著作《Principles of Geology》(《地質学之原則》)作題詞的普辣依斐兒的話就够，他說：“当地球經歷着变化的时候，自然的构成却是一致的而它的規律是唯一地抵抗着一股运动的东西。河流与山岩，汪洋和大陆在一切部分上都变化了，可是指揮这些变化的規律及这些变化所服从的規律却始終不变。”

而把发展只看作是被研究着的现象的大小的逐渐的扩大或缩小。虽然从哈尔维时代起，就公認了“一切动物是从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从蛋中的发展，显然，沒有与任何确切的观念联系起来，而精虫的发现立即便引起了一种理論的产生，按这理論在种子的細胞中已經有准备好的，完全发展了的，可是在显微镜上才看得出来的小动物；所以一切它的“发展”归结为生长。許多聪明的老人，其中包括許多欧洲的著名的进化論社会学者关于“发展”亦是这样議論的，例如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他們說，历史不作飞跃：va piano…

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坚决地起来反对关于发展的这种畸形的概念。黑格尔恶毒地譏笑它并不可推翻地証明了：在自然界以及在人类社会，飞跃乃是和逐渐的量变一样的发展的必然契机。他說：“存在的变化不仅在于，一个数量过渡为另一个数量，而且也在于質量轉化为数量及其相反；而每一个后一类的轉化組成漸进性的中断 (ein Abbrechen des Allmählichen) 而給現象以新的与以前不同質的形态，例如，水在冷化的时候不是逐渐地……而是立即地冻结的；已經冷到冰点的水，如果还保持平静的状态它还是液体，这时只要小小的一动，它便突然成了固体。……在道德現象的世界中……同样亦有量到質的轉化，或換言之，就在那里質的區別亦是建設在量的區別之上的。例如，大一滴滴，小一滴滴就成了粗忽不再是粗忽而是罪惡的界限……例如，国家在其他相等的条件下只由于領土之大小便得到不同的質的性質。某一法律或某一国家制度跟着国家領土之扩大及人民数目之增加而得到完全不同的意义……”①。

① 《Wissenschaft der Logik》（《邏輯学》），第1版，第1部，第1册，第313—314頁。

現代的自然科學家很好地知道：量變如何常常引導到質變。為什麼太陽光的一部分引起我們的紅色的感覺，另一部分引起綠色以及其他顏色的感覺呢？物理學回答道：一切事情是在以太單位的擺動的數目。大家知道，這個數目對於每個分光鏡上的顏色是不同的從紅色增至紫色。不僅這樣。在分光鏡中愈接近紅色光帶的邊緣熱度愈強，而分光鏡外，在紅色光帶之外不遠便達到了最高度。這樣，在太陽光中有着一種特殊的光，它已經不發光而只燃燒。物理學在這裡也說：光綫的質是跟着以太單位擺動的數目的變化而變化的。

但是還不僅如此。太陽光引起某種化學作用，例如物質為太陽融解。紫光及不引起我們的光的感覺的紫外光有最大的化學力。太陽光之不同的化學作用又是以以太單位擺動中的量的區別來解釋：量變成質。

化學亦同樣証實這一點。臭氧較之普通氧有完全不同的屬性。這種區別從哪裏來的呢？就在臭氧的分子中，有較之普通氧的分子中不同數量的原子。試以三個炭氫化合物為例： CH_4 (Bog-gas), C_2H_6 (Dimethyl), C_3H_8 (methyl-ethyl)。所有他們是按公式組成的 N 個炭原子加上 $2n + 2$ 個氫原子。如果 $n = 1$ ，那末就有 Bog-gas。如果 $n = 2$ 就有 Dimethyl, n 等於三，就有 methyl-ethyl，這樣便組成整個行列，這行列的意義任何一個化學家都能告訴你的。所有這些行列一致地証實老的辯證唯心主義者的命題：量轉化為質。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區別的標志，可是讀者仍然還覺得不滿意。他問，那大家知道的，組成黑格爾哲學的全部實質的三段式在哪裏呢？對不住，讀者，我們之沒有說到三段式只是由於下述的簡單的原因：即它在黑格爾那裏絕沒有起那些對於這個思想家的哲學毫無概念而只依例如斯巴索維奇的《刑法

教科書》^①去研究它的人們所加之于它的那種作用。這些輕浮的人們，充滿着神聖的單純而相信：德國唯心主義者的一切論據歸結于援引三段式；老頭子不論遇到任何理論的困難，他安靜地微笑着讓別人去對這個困難弄破他的可憐的“未開竅的”頭腦，而自己則馬上建設三段式；一切現象都依三段式完成的，我遇到的是現象；因之我應乞援于三段式^②。這簡直是如卡羅寧的人物之一所說的瘋人的空話，或者如果你們更歡喜謝德林的說法的話，是反常的蠢話。在黑格爾的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內“三段式”從沒有起過論據的作用，而且誰如果多少知道一點他的哲學學說，就會理解，三段式決不會起這樣的作用。三段式在黑格爾那裏的意義，正和在費希特那裏一樣。後者的哲學是和黑格爾的哲學大不相同的。顯然，只有笨蟲才能認為：一個哲學體系的主要的特有的標志是至少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所固有的東西。

① “夢想着律師的前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敘述道，——我熱心地，但是無任何秩序地讀了各種法律書籍。其中有斯巴索維奇先生的刑法教科書。在這書中有着各種哲學體系與刑法學之關係的概述。我特別驚奇於黑格爾的著名的三段式，由於三段式，刑罰這樣優美地成為法和罪之間的矛盾的調和。黑格爾的三單位的公式在各種最不同方面的應用的誘惑力是大家知道的……不足奇怪的，在斯巴索維奇的教科書中我被它俘虜了。不足驚奇的，以後我便投向黑格爾及很多其他的人”（《俄國思想》，1891年，第3冊，第2部，第188頁）。可惜，很可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告訴我們，他對自己之“傾向黑格爾”滿意到什麼程度。從各方面看來，顯然，他在这方面並沒有走得遠。

②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堅稱，去世了的齊別爾在和他爭論資本主義在俄國的不可避免性時，“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論據，但在極小的危險下便隱匿於不可改變和不可爭辯的三單位的辯證發展的天幕之下”（《俄國思想》，1892年，第4冊，第2部，第196頁）。他同樣堅稱，一切（如他所說）馬克思的關於資本主義結局的預言只是依靠在“三段式”上。關於馬克思下面再說，關於齊別爾要指出：我們曾經不止一次和死者談過，可是沒有一次聽到過他援引“辯證的發展”。他自己不止一次說過，他完全不知道黑格爾在最新的經濟學的發展上的意義，自然，對於死人一切都可推到他身上去的，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說法是駁不倒的。

我們非常抱歉，三段式使我們离开了我們的叙述，可是既然談到它，就应談到底。我們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一只鳥。

任何現象，发展到底，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現象对立的現象，反过来，同样也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暂时将这种发展的进程是否适合于现实这一問題，放在一边；我們假定那些以为这是完全符合于现实的人們是錯的；但是無論如何，很明白的，“三段式”只是从黑格尔的一个命題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完全不是他的基本命題。这是很重大的差別，因为如果三段式正是起着基本命題的作用，那末，那些給它以这种重要作用的人們，真的可以在它的天幕之下去找寻保护，但是它既然并不起这样的作用，那末难道只有那些听了声响而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人才会掩藏在它的下面。

显然，“在最小的危險下”，辯証家不掩藏于三段式之后，而掩藏于任何現象轉化为自己的对立物这一命題之下，情形絲毫亦沒有改变的。但是他們亦从来沒有这样做过，他們之所以从沒有这样做过是因为上述命題並沒有說尽他們对于現象发展的观点。例如，除此以外，他們还說，在发展的过程中，量轉化为質，而質轉化为量。因此，他們需要顧及过程的量的以及質的方面；而这要求对于过程的现实的实际的进程要抱注意的态度；这就是說，他們不满足于从抽象的命題中产生出来的抽象的結論，或者至少，假如他們要忠实于自己的世界观就不應該满足于这样的結論。

“在自己著作的每一頁上黑格尔不断地和不倦地指出：哲学等于經驗的总和，哲学最坚持地要求深入于經驗科学……沒有思想的事实材料只有相对的意义；沒有事实材料的思想乃是简单的妄想……哲学是經驗科学本身达到的意識。它不能是別的东西。”⁴¹⁰

这就是拉薩尔从研究黑格尔哲学中所得出的对于有思想的研究者的任务的观点^①；哲学家应该成为他愿意帮助它到达“自觉”的科学底专家。显然，从专门研究对象到对“三段式”这一詞的輕浮的空談，其間的距离是很远的。請不要向我們說，拉薩尔不是真正的黑格尔派，說他是“左派”，而且曾經鋒利地責备“右派”，因为他們从事于抽象的构造等等吧。拉薩尔不是直接向你們說，他的观点是直接来自黑格尔那里借用来的嗎？

不过，你們也許想把《既得权利的体系》的著者（即拉薩尔。——譯者）的供辞当作不作算的，正如法官之否定亲屬的証辞一样。我們不来爭論和反駁；我且喚完全公正的人——《果戈里时代概述》的著者（即車尔尼雪夫斯基。——譯者）来作証人。

請注意：証人將說得很久并按自己的慣例，將說得很聰明：

“我不是黑格尔的信徒，正如不是笛卡兒或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一样。黑格尔現在已經是屬於历史的人物了，目前已有别的哲学并且很好地看到了黑格尔体系的缺憾；可是应该同意，黑格尔所提出的原則真的是很接近真理的，而且这个思想家所提明的真理的某些方面真是提得惊人地有力。从这些真理中有些发现是黑格尔的个人的功績；另外一些并不純粹屬於他的体系，而屬於从康德到費希特时代的整个德国哲学，但是在黑格尔以前，没有任何人象在黑格尔体系中写得这样明白，說得这样有力。

“首先，我們指出任何进步的最有成效的基础（这是一般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体系和統治于当时（十九世紀之初）的英国和法国人的虛伪的和怯懦的观点的最鋒利和灿烂的区别之所在）是：‘真理是思惟的最高目的；找寻真理——因为在真理中是幸福；不論任何真理，它比一切非真理都好；思想家的第一个責任：不在任何結果面前讓步；他應該准备着为

^①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2te Aufl. Leipzig 1880, Vorrede, SS. XII--XIII（《既得权利的体系》，第2版，萊比錫，1880年，序言，第12—13頁。）

了真理而犧牲自己的最愛好的意見。謬誤是任何沒落的來源；真理是最幸福及其他幸福之來源。’為估計這個為從康德時代起的德國全部哲學所共有的而特別為黑格爾所有力地說出的要求的異常重要性，應得回想到當時其他學派的思想家以怎樣奇怪和狹隘的條件來局限真理；他們之從事哲學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以後來‘証實對於他們可貴的信念’，即找尋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的成見的支持；每人在真理中只採取他所欣喜的，而推翻了一切他所不喜歡的真理，公開地承認，愉快的謬誤較之無所偏好的真理，對於他是更好的。這種不關心真理而只關心証實所愛的成見的风度，德國哲學家（特別黑格爾）稱之為‘主觀的思惟’（老天爺！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我們的主觀思想家罵黑格爾為詭辯家！——著者），為着個人的滿意，而不是為着真理的生動的要求而從事哲學。黑格爾殘酷地揭破了這個空洞的和有害的遊戲（聽啊！聽啊！）。作為反對脫離真理而傾向於偏愛自己的願望與成見的必要的預防手段，黑格爾提出了著名的‘思惟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的實質就是，思想家不應自安於某個肯定的結論，而應該找尋：在他所思索的對象中有無與這個對象在最初看來相反的質和力量；這樣，思想家迫得從各方面去觀察對象，而對於他，真理只不過作為一切可能的對立意見的鬥爭的結果而出現。用這個方法，代替以前的關於對象的片面的概念慢慢地出現了完全的全面的研究所組成了關於對象的一切現實的質的生動的概念。解釋現實成了哲學思惟的重要職責。從這裡產生了对現實的異常的注意，而以前對於它是不加思索的，無禮地曲解它以便於自己的片面的成見（*De te fabula narratur!*）^①。這樣，忠實地、不倦地找尋真理代替了過去的任意解釋。但是在現實中一切取決於環境，取決於地點和時間的條件——因此黑格爾承認過去用以判斷善惡而不觀察產生這一現象的環境和原因的一般辭句——這些一般的抽象的格言是不能滿意的：每個對象、每個現象有其本身的意義，而要判斷它就應該按其所存在於其中的環境來考察；這個規則表現於這個公式中：‘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是具體

①（寓言是在講你啊！）

的。’即一定的判断只能用之于观察了它所依存的一切环境之后的一定的事实。”^①

这样，在一方面，人们告诉我们：黑格尔哲学的特点是对现实的最注意的研究；对任何特定的对象的最忠实的态度；在其生动的环境中，在一切制约着或伴随着其生存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研究对象。在这一情形下，車尔尼雪夫斯基的供证和拉薩尔的供证是同一的。而另一方面，人们想说服我们：这个哲学是空洞的诡辩。这个哲学的一切秘密就在诡辩地运用“三段式”。在这种情形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供证和伏·伏·先生及整队其他俄国现代作家的供证是一致的。怎样解释这种证人的意见分歧呢？怎样解释，一听尊便，不过请记住：拉薩尔和《果戈里时代概述》的作者，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个哲学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和伏·伏·先生及其兄弟們大概没有费一点劳力去研究即使任何一部黑格尔的著作的。

^① 車尔尼雪夫斯基：《果戈里时代俄国文学概述》，彼得堡，1892年，第258—259頁。在一个特别的注释中，《概述》的著者很好地解释着这个观察某一现象所依存的一切条件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引这个注释于下。“例如，‘下雨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问题是抽象的；不能加以一定的回答，有时雨带来好处，有时（虽然这种情形较少）它带来坏处；应该更确定些问：‘在下种完毕后，一连下五点钟之久的大雨——对于麦子是有利的吗？’——只有在这里回答是明白的和有意义的：‘这雨是很有利的。’——‘但是在同一夏季，当将要割麦的时候，整星期不断下雨，——这对麦子好不好呢？’回答是同样明白而正当的：‘不，这雨是有害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一切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战争是毁灭呢还是创造？’一般地，不能坚决地回答它。应该知道，说的是什么战争；一切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对于野蛮民族战争的害处比较感觉得少；益处更容易感觉些；对于开化民族战争带来的益处较少害处较多。但是例如，1812年之战挽救了俄国人民；馬拉松之战⁴¹¹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有益的事变。——‘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具体的。’这一原理的意义就是这样；当对象以全部质和特点以及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而被表象出来，而不从这个环境和自己的生动的特点中抽象起来（如抽象思维所表象的一样；因此抽象思维的議論对于现实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的时候，关于对象的概念是具体的。”⁴¹²

并且請注意，在說明辯證思惟的特征时，《果戈里时代概述》的著者沒有一个字提到三段式。怎么他会沒有看到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伴們如此坚持和如此高兴地提供于众游客面前的那个大象呢？再一次，請記住，《果戈里时代概述》的著者知道黑格尔哲学，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同伴們却对于黑格尔哲学沒有絲毫概念。

也許，讀者願意提起《果戈里时代概述》的著者关于黑格尔某个另一种評論吧？也許，他将向我們指出著名的論文：《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見的批判》来吧？在这篇文章中，正是說到三段式，而且表面看来，它正是被提出为德国唯心主义者的主要节目。但是这只是表面看来。当講到所有权的历史时，著者断言，在其第三个，最高的发展阶段上，它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讓位于社会的所有权。他說，这种复归是显现于任何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規律。著者的論据，在此地真正只是援引了三段式。而这正是它的重大弱点：它是抽象的；所有权的发展沒有关联到它的具体历史条件去观察；因此著者的論据是机智的，光輝的，但不是令人信服的；它只惊住、吓住人而不是說服人。但是在《哲学成見的批判》的著者之論据的这个缺点上，黑格尔是否有过失呢？假如著者正是按照黑格尔的忠告而去观察对象，用他自己的話說，即坚持现实的基地，衡量一切具体条件、一切时间和地点的情况，那末你以为他的論据会成为抽象的嗎？似乎，不会，似乎这时候在文章中就不会有我們上述的缺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这个缺点怎样产生的呢？缺点的产生就在《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見的批判》的著者，在駁斥自己对手的抽象論据时，忘掉了黑格尔的良善的忠告，变成了不忠于他所援引的那个思想家的方法。我們很可惜，在論战的狂热中他犯了这个錯誤。但是再

一次問，在这种情形下，《哲学成見的批判》的著者，不善于运用他的方法，黑格尔是否有过失呢？从什么时候起，哲学体系的价值不按其內部的內容去估計，而按那些援引它的人所犯的那些錯誤去估計呢？

并且，不論上引論文的著者如何坚持地援引三段式，可是他总还没有把它提出为辯証法的主要节目；即在这里，对于他，这亦不是基础，而至多不过是无可爭辯的結果。辯証法的基本的主要的特点，他在以下的話中指出了：“由某种內容或傾向所产生的形式，因为这同一傾向之加紧，同一內容之更高的发展而发生着形式的永久的更替、形式的永久的演变……——誰懂得这个伟大的、永远的、普遍的規律，誰学会了应用它于一切現象——呵，他是能如何安靜地对待那些煩惱着別人的不意事件呵！”等等⁴¹³。

“为一定的內容所产生的形式的永远的更替，形式的永远的演变”……辯証法真的把这种更替，这种形式的演变看做是伟大的、永远的、普遍的規律。在目前不同意这个信念的只有某些社会科学部門的代表，他們不敢面向真理，企图即使借助于謬誤亦要坚持他們所宝貴的成見。因此，我們更应尊重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功績，他們从本世紀之初就不断地肯定，由于产生这形式的內容的加强，形式永远地更替，形式永远地演变。

上面我們將是否一切現象确如德国辯証法——唯心主义者所想的一样都轉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面这一問題“暫”置一边。現在，我們希望，讀者会同意我們，这个問題，實質上說来，可以完全不加考察的。当你应用辯証方法来研究現象时，你必須記住：由于“他們的內容的更高的发展”，形式永远变化着。假如想詳尽地知道对象，那末你对于这个形式演变的过程應該全面地加以追究。但是新形式是否与旧形式对立的——經驗将会告訴你这点，而預先知

道这点是完全不重要的。是的，正是根据人类的历史經驗，任何懂事的法律家将告訴你，任何法权制度或早或晚轉化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現在它能够滿足某种社会的需要，現在正是因为这些需要所以它是有益的、必需的，以后它开始每况愈下地滿足这些需要，最后，它成为滿足这些需要的障碍：从必需的东西变成了有害的东西——而这时候它便消灭了。任憑你举出任何东西来——文学史、物种历史，凡有发展之处，你都看到类似的辯証法。但是，無論如何，誰願意深入辯証过程的本質，而从考查每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中銜接的現象的对立性的学說开始，那他将是从不适当的一头去对待事情。

在选择这种考查的观点时，永远将有許多任意的东西。應該从它的客观方面去观察这个問題，換句話說，應該弄清楚，为特定的内容的发展所制約的形式的必然更替是什么？这是同一个思想，不过用別的話來說而已。但是考查它的时候已經沒有任意的余地，因为研究者的观点是为形式和内容的本来性質所决定的了。

按恩格斯的話，黑格尔的功績就在他第一个从其发展的观点上，从其产生和消灭的观点上观察了一切現象⁴¹⁴。“他是否是第一个，这是可以爭論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可是無論如何，他不是最后一个，而現代的发展論——斯宾塞的进化論，达尔文主义，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質学等等上的发展的观念——与黑格尔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①

假如現代自然科学每一步都証实黑格尔的关于量轉化为質的天才思想，那末，可否說，它和黑格尔主义沒有任何共同之处呢？是的，黑格尔不是說量变質的“最后一人”，其原因正如达尔文不是

① 《俄国財富》，1894年，第2册，第2部，第150頁。

說物种变化的“最后一人”，牛頓不是最后的牛頓主义者的原因一样。你还有什么說的嗎？这已經是人类理性发展的进程了。你說出正确的思想，你大概不会是拥护这个思想的“最后一人”，你說出胡話——虽然人們很喜欢它，但是你总还有成为它的最后一个拥护者和担当者的危險。例如，依我們的謙遜的意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有成为“社会学上主观方法”的最后一个拥护者的危險。公开地說，对理性的这种发展进程，我們看不見有任何足以使我們悲叹的理由。

我們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議——他“能够爭辯”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和很多其他的东西——駁倒我們下述的命題：在有发展思想的地方：“在心理学、物理学、地質学等等上”，到处它必然和“黑格尔主义有許多共同之处”，即在每个关于发展的新学說中必然重复着黑格尔的某些一般的論点。我們說某些而不說一切，是因为許多現代的进化主义者，由于沒有应有的哲学素养，而抽象地、片面地理解“进化”的緣故。例如，上面已經提到的那位先生力說不論在自然中或历史上飞跃是沒有的。这类人如果熟知黑格尔的邏輯，当获益非淺。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駁倒我們，只不过請他不要忘了：只按斯巴塞維奇的《刑法教科書》以及刘易士的《哲学史》去認識黑格尔，是不能駁倒我們的。需要費些力量去研究黑格尔本人的著作。

當我們說，进化主义者的現代学說，永远与“黑格尔主义有許多相同之处”时，我們并不說，現代的进化主义者从黑格尔那里盜取自己的观点。完全相反。常常，他們关于黑格尔有着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的錯誤观点。虽然如此，假如他們的理論（即使部分地而且正是在它們的正确之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新的图解，那末，这一情况只是显露德国唯心主义者的思想的惊人力量：

从来沒有讀过他的書的人，由于事实的力量和“现实”的显明的意义，而不得不照他那样說。对于哲学家，更大的胜利是不能想象的了：讀者抹煞他，但是生活証实他的观点。

至今还很难說，德国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曾在上述方向上影响了德国自然科学多少，虽然，无疑的，在本世紀上半期甚至自然科学家在大学时代亦研究了哲学，并且这样的生物学的名人如海克尔現在尊敬地說起自然哲学的进化的理論。但是自然哲学乃是德国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他的力量是在于涉及到历史发展的不同方面的理論。至于說到这些理論，那末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記住——如果在某一时候曾經知道过的話——正是从黑格尔学派中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想家和研究者，他們給宗教、美学、法权、政治經濟学、历史、哲学等等的研究以完全新的面貌。在一切这些“科目”中在某些——最活跃的——时期中，沒有一个杰出的工作者，在自己的发展上及对自己科学的新观点上不是获益于黑格尔的。不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否以为这也是“可以爭辯”的？如果是的，那末就請他試一試吧。

說到黑格尔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这样做，以便不知‘哲学白癡伊果尔·費多洛維其’（如举起反对黑格尔的暴动之旗的別林斯基所不恭敬的說法）的秘密的人們亦能懂得”⁴¹⁵。“为着这”他从恩格斯的《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①中举出两个例子来（为什么不从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中？“懂得秘密”等等的作家这样办方便些）。

“麦粒落于适合的条件：它发芽，这样作为种子的麦粒就被否定了；在它的位置上产生了麦程，它是麦粒的否定。植物发展

^① 《反杜林論》。

着，結了实，即新的許多麦粒，而当这些新的麦粒成熟时，麦稈死亡了，它——麦粒的否定，本身被否定了。而以后这个同样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无数次(sic!)地重复着。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安置着矛盾：麦粒是种子同时又不是种子，因为它永远处在现实的或可能的发展中。”显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点是“可以争辯的”。下面就是这个诱人的可能性在他那里怎样变成现实性。

“第一阶段，种子的阶段是 thesis (命題)；第二阶段直到新的种子的成熟是 Anti-thesis (反命題)；第三阶段——Syn-thesis (合命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心通俗地写，所以不使希腊字沒有注解或翻譯)。所有这些合成为三段式。而这便是一切活的东西的命运：他产生、发展，給予自己的重复以开端，然后死去。这个过程的一大堆个别表现，自然，馬上便会出现于讀者的脑际，而黑格尔的規律在一切有机界中(現在我們还没有走出有机界之外)就成了正确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更亲近些看我們的例子，那末我們將看到我們的概括异常的浮面性和任意性。我們采用种子，稈，再是种子或更正确些一堆种子。可是在結果以前植物都先开花。当我们說到麦或其他农业植物，我們可以注意种子、草料和收获的谷物，但是以为这三者說尽了植物的生命，那是毫无道理的，在植物的生涯中开花伴随着非常的和特殊的力的紧张，而且因为花不是直接从麦粒产生起来的，所以即使我們要堅持黑格尔的术语，我們得到的不是三阶段，而至少是四阶段，四級：稈否定麦粒，花否定稈，果否定花，忽略开花这一契机在下面这一关系上更有重要的意义。在黑格尔时代也許可以是麦粒为植物生涯的开端，而从經濟的观点即在現在也容許这样做：經濟年度是以播种开始的。我們現在很好地知道，麦粒有着异常复杂的結構，它本身是細胞发展的結果，而細胞增殖所需的東西却正是在开花的时机組成的。这样，在

植物生命的例子上，出发点之采用是任意的和不正确的，而全部过程人为地而且又是任意地束缚于三段式的框子内。”^① 結論：“已經是不要再相信燕麦是照黑格尔式生长的時候了。”^② 416

一切流轉着，一切变动着。在我們的时代，即当写这几行的人在学生时代研究自然科学时，燕麦是“按黑格尔式”生长的，而現在“我們很好地知道”：这是胡說；現在“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③。但是关于“我們”所說的东西，“我們知道”得很好嗎？完全嗎？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叙述从恩格斯那里窃取来的例子絕不如象恩格斯本身所叙述的一样。恩格斯說：“麦粒本身不見了，被否定了；在它的地位上发生由它生长起来的植物，麦粒的否定。可是这植物生活的正常循环是如何的呢？它生长，开花，結实，最后又产生麦粒^④，麦粒一成熟，麦稈即枯萎，而否定了自身。因这一否定的結果，我們又得到了原来的麦粒可是并不只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⑤ 417 在恩格斯那兒，麦粒的否定是整个植物，而在植物的生活循环中既有开花又有結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了”植物，在他的位置上放麦稈一詞。大家知道：稈只是植物的一部分，它为植物的別的部分所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⑥。可是正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了”恩格斯的用語，而拿自己的用語代替它：稈否定粒——他叫道——花否定稈，实否定花；这里至少四阶段！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但是所有这一切只証明：在和恩格斯辯論中你甚至不惜……怎样說得輕些

① 《俄国财富》，前引書，第2部，第154—157頁。

② [我們改变了这一切]。

③ 严格地說，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大麦麦粒，而不是燕麦麦粒，可是，这当然是不重要的。

④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反杜林論》）第1版，第1册，第111—112頁。

⑤ [一切規定是否定]。

呢……不惜采用改变你的对手的话……这一“手法”。这个手法多少有点……“主观的”。

既然顶替的“手法”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于是可恨的三段式就象纸房子一样坍台了。你忽略了开花这一契机——俄国的“社会学者”责备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道——而“忽略开花这一契机有重要的意义”。读者已经看到“开花的契机”不是恩格斯忽略了，而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恩格斯的思想时忽略了；他同样知道，这类“忽略”在著作中有重要的虽然是完全否定的意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亦用了不大漂亮的手法。但是怎样办呢？三段式是如此可恨，胜利是如此可喜，而“不知著名‘白痴’的秘密的人们”是如此轻信！

我们生来都无罪；
 名誉为我们所宝贵；
 然而冲突时常来，
 使我们简直不甘愿地犯了罪。……418

花是植物的器官，而作为植物器官的花很少否定植物，正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很少否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但是“实”——更正确些说，胎卵却正是作为新的生命的发展的出发点的某一有机体的否定。恩格斯正是从植物的胎卵发展起到由它再生胎卵止来观察植物生命的循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学者的态度指出：“植物的生命不是从种子开始。我们现在很好地知道”等等——简言之，我们现在知道，卵是在开花时受胎的。恩格斯知道这点当然不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坏。但是这指明什么呢？如果为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乐意，我们可以以胎卵代替麦粒，但这没有改变植物生命循环的意义，没有驳倒三段式。麦仍然将“按黑格尔式”生长。

附帶地說，我們暫時假設，“開花的契機”駁倒了黑格爾派一切論據。但是對於無花植物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吩咐怎麼辦？難道他將把它放在三段式的統治下嗎？這是無益的事，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三段式將有着巨大數量的臣屬。

但是我們提到這個問題實在說來只是為了弄清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思想。我們自己則相信：甚至有“花”也跑不掉三段式。而且是否只是我們這樣想呢？例如，園藝專家王一迪蓋就這樣說：“不論植物的形式怎樣，亦不論它由於這個形式而屬於那一類；這個植物體從先於它存在的別的體中產生出來，它和這體區別開來。而這個植物體，在一定時間中、一定的部分上又和其同類區別着，這便成了新體的出發點、萌芽等等。總之，它的生產和它的再生產都是‘分解’。”^①請看吧！尊貴的學者，研究院的會員，自然科學博物院的教授，而其議論却如真正的黑格爾派，他說從分解開始再回到分解。沒有一字提到“開花的契機”。我們自己亦了解這對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應該是很苦痛的；但是我們之這樣做，只是因為，大家知道，真理高於柏拉圖。

再一次假定，開花的契機推翻了三段式。那時“如堅持黑格爾的術語的話，我們得到的不是三段式，而至少四段式，四級”。“黑格爾的術語”使我們想到他的《哲學全書》。我們揭開其第一部，我們從那里知道：有很多三階段過渡為四階段的情形，而且一般地三段式的統治只在精神的領域內^②。結果：燕麥“照黑格爾式”長的，如王一迪蓋所証實的一樣，而黑格爾關於燕麥却“照米海洛夫斯基先

① 《Traité de Botanique》 par Ph. Van-Tieghem, 2-me édit., première partie, Paris 1891, p. 24. (王一迪蓋《園藝論》，第2版，第1卷，巴黎，1891年，第24頁。)

② 《Enzyklopädie》， Teil I, § 230. Zusatz. 419 (《哲學全書》，第1卷，第230節，附錄。)

生式”想的，如《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哲学科学概述百科全书》）所保证的一样。神迹！真是神迹！“她去他处，他来我处，而我到卖茶老爸彼得处去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恩格斯那里借来用以启示“不知秘密的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卢梭的学说⁴²⁰。

“按卢梭，人在自然的和未开化的状态中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动物的平等。可是人的特点却是有上进的能力，而这个上进却开始了不平等的产生，而以后文明每一步前进都是矛盾。‘表面上，这是向个人上进方面去的进步，而实际上它引导到人类的没落……金属品的制造和农业，这两种艺术的发明引起了伟大的革命。使人文明化而使人类没落的东西，在诗人的观点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的观点看来是铁和谷物。’不平等继续发展着，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在东方专制主义中转变为总的平等——即大家等于零，即转到了自己的出发点，而以后的过程以同样的秩序引导到社会公约的平等。”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转述恩格斯所引用的例子。不言而喻的，他在这里亦是“能够加以辩驳”的。

“关于恩格斯的叙述，可以加以某些指摘的，可是对于我们重要的只是要知道：在卢梭的论文（《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之起源和原因》）中，恩格斯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他没有提到卢梭对于历史进程的理解是否正确这一问题，对他有兴趣的只是卢梭是‘辩证地思维’的：在进步的内容本身中看到矛盾，而将自己的叙述配置得这样，以便可以把它赶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公式下去。而且的确是可能的，虽然卢梭连黑格尔的辩证公式也不知道。”

这只不过是对于恩格斯身上的“黑格尔主义”所做的第一次的前哨攻击。接着便是 sur toute la ligne（全面的）攻击。

“卢梭，不知道黑格尔，而按黑格尔式辩证地思维。为什么正是卢梭，

而不是伏尔泰，不是第一个碰到的人？因为，一切人按自己的本性是辯証地思惟的。可是选择到的却正是卢梭，此人之杰出于其同时代的人的，不仅是他的天才（在这方面許多人并不弱于他），而且是其智慧之构成及世界觀之性質。这样例外的現象似乎不应以它来检查一般的規律吧。可是我們有自己的手法。卢梭之所以有兴趣及重要，是因为他第一个以充分的尖銳性指明了文明的矛盾性，而矛盾乃是辯証过程的不变的条件。可是應該指出：卢梭所看到的矛盾与黑格尔意味上的矛盾毫无共同之处。黑格尔的矛盾是在每一个处在运动和变化（而且正是順次地按三段式变化的）的經常过程中的事物，在每一一定的時間单位中，是‘它’而同时又‘不是它’。如果把发展的必然的三阶段放在一边，那末，矛盾将简单地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基础。卢梭同样講到变化的过程。但是他絕不是在变化的事实本身中看到矛盾。他在《Discours de l'inégalité》（《論不平等》）及其他著作中的极大部分的議論可以总结为：智慧的进步伴随着道德的退步。显然，辯証思惟在这里絲毫无关，这里沒有‘否定之否定’，有的只是指出在这一类的現象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而与辯証过程全部相似之处只在‘矛盾’这一个詞上。可是，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此外，恩格斯在卢梭的議論中看到显然的三段式：在原始的平等之后，跟着它的否定——不平等。以后接着来了否定之否定——在东方专制主义下在皇帝的权力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是不平等的极度，亦是終极点，結束了圈子，回到了我們的出发点’⁴²¹。可是历史在这上面并不停止，发展着新的不平等，等等。上面引在引号中的是卢梭的原文，而这对恩格斯特別寶貴，作为卢梭按黑格尔式思惟的鮮明証据。”^①

卢梭“杰出于其同时代人”。这是正确的。杰出在哪里？就在辯証地思惟，而他的同时代人却差不多全是形而上学者。他对不平等的起源的观点正是辯証的观点，尽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否定这一点。

① 所有这些引語均引自上引之《俄国財富》。

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話，卢梭只指出了：在文明史上智慧的进步伴随着道德的退步。不，卢梭不仅指出这一点。他以为，智慧的进步是道德退步的原因。即使沒有讀过卢梭著作的人，亦可以信服这一点：只要記起，根据上述的引語，他給予那完成伟大革命、破坏原始不平等的金屬制品和农业以什么样的作用就够了。但是，讀过卢梭著作的人，当然不会忘記，他的《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論不平等》）中的下面一段話：“Il me reste à considérer et à rapprocher les différents hasards qui ont pu perfectionner la raison humaine en détériorant l'espèce, rendre un être méchant en le rendant sociable……”（“我所要做的只是估計和集合那既促进人类的理性而又毀坏人类，既使人类变为凶恶的动物又使他变为社会的动物的各种不同的情形……”）。

这一段是特別优越的，因为它很好地显示了卢梭对人类趋向进步的能力的观点。关于这一特点，他的“同时代人”亦說了不少。但是在他們那里这一特点乃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从本身中造成理性的胜利。按照卢梭，这种能力“永远亦不会自己发展起来的”。为着自己的发展，它需要从旁的經常的推动。这是对于智慧的进步的辯証观点（較之形而上学观点）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我們在后面还要說到它。現在对于我們重要的是上引的一段最鮮明地显示了卢梭对于道德的退步与智慧的进步之間的因果联系的意见^①。而这一点对于弄清这个作家对于文明进程的观点是极为重要的。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則得出：卢梭简单地指出了“矛盾”，是的，也許为了这，洒了几点同情之泪。而实际上，卢梭認為，这个矛盾是

^① 对于怀疑的人，我再抄一段：“我把这个沒落的第一阶段归之世界一切国度科学发展的最初一刻。”（《致僧正萊納爾的信》，《卢梭全集》，巴黎，1820年版，第4卷，第43頁）

文明的历史发展的基本的发动力。市民社会的奠基人，因之亦即是原始平等的掘墓人，乃是那个围起一块土地来而說：“这块土地属于我的”的人，換言之，市民社会的基础乃是所有权，它喚起了人們之間这样大的爭論，喚起了人們中这样大的貪欲，以致毀坏了他們的道德。但是所有权的产生需要有“技术与知識”(de l'industrie et des lumières)的一定的发展。所以，原始关系之毀灭正是由于这种发展；但是，同时，当这种发展引导私有财产胜利的时候，人們的原始关系，也已經处于它們不能再繼續存在的情形中了^①。如果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描写的卢梭所指出的矛盾去判断卢梭，那末，可以以为这个著名的日内瓦人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主观社会学者”，这样的学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想出一个道貌岸然的“进步的定式”，用它来治疗人类的灾难。而实际上，卢梭最恨这类“公式”，凡一有机会便加以攻击。

市民社会产生在已經不适于繼續存在的原始关系的废墟之上。这些关系在本身中包含着自己的否定的萌芽。在証实这一論点时，卢梭好象是預先图解了黑格尔的思想：任何現象都自行消灭，轉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卢梭关于专制主义的議論可以認為是这个思想的新的証明。

請你們自己判断吧，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显然，辯証思惟在这里毫无关系”，并且天真地以为恩格斯将卢梭算入辯証的管轄下，只是根据他用了“矛盾”，“圈子”，“回到出发点”等名詞的緣故的时候，他对黑格尔和卢梭有多少理解！

但是为什么恩格斯引用卢梭，而不引用別的人呢？“为什么正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不是第一个碰到的人呢？因为，大家知道，

^① 參閱《論不平等之起源》，第2卷之始。

一切人按其天性說是辯証地思惟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錯了，絕不是一切人；恩格斯第一个决不会把你当做辯証家的。他只要讀过你的《卡尔·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⁴²²一文，就会决然地将你归之于无可救藥的形而上学者之中的。

关于辯証思惟，恩格斯写道：“人們远在知道辯証法是什么东西之前，就辯証地思惟了，正好象人們远在知道散文这个詞以前，已經說着散文一样。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不自覺地实现于自然及历史中，然在其未被人認識之时，它在我們的头脑中，也是不自覺的——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只是首先为黑格尔所明白地規定出来。”^①讀者可以看到，这里所說的，只是不自覺的辯証思惟，它与自覺的辯証思惟还相差甚远。当我们說：“两极相遇”，我們不自覺地說出了对事物的辯証的观点，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們又是不自覺地从事于实用的辯証法（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运动是已經实现了的矛盾）。可是不論运动，不論辯証的格言都还不能將我們在有系統的思想領域內，从形而上学中拯救起来。相反地，思想史指明：在长时期中，形而上学較之原始的朴素的辯証法日益加强——而且必然地應該要加强：“自然界中个别部分的分析，各种自然現象和自然物之分成一定門类，有机体内部的各种部分的解剖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四世紀来自然科学知識的伟大进步之基本条件。可是这种研究，同时也传給我們以一种习惯，把自然物及自然現象各別观察，把它們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不是从运动状态中去观察，而是从靜止状态中去观察；不被看做本質上变化的事物，而被看做永恒不变的事物；不被看做活的，而被看做

① 《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etc.》，2.Aufl., S. 134. 423

死的。以后培根与洛克就把这种見解，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的領域上；这样的对于事物的見解，造成了数世紀来特殊的狹隘見解。——形而上的思惟方法。”

恩格斯这样說过，我們从恩格斯那里并且还知道：“在近代哲学中，虽然亦有卓越的辯証法的代表（笛卡兒及斯賓諾莎），可是近代哲学史更厉害地拘束于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中——特别是因为英国的影响——这种思惟方法差不多完全統治了十八世紀的法国人，至少是在他們專門的哲学著作上。可是在專門的哲学領域之外，他們也留下了一些辯証法的范例，我們只要指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論人間不平等之起源和原因》就够了。”^①

似乎是明白了吧，为什么恩格斯說到卢梭，而不說到伏尔泰或第一个碰到的人。我們不敢設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讀过他所引用的、他从那里取来作研究的“例子”的恩格斯的那本書。然而，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将“第一个碰見的人”推向恩格斯，那末只能有一种設想：我們的作者在这里亦应用了我們所熟知的偷換的“手法”……有意曲解对手語句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由于恩格斯的書沒有譯成俄文，而对于不懂德文的讀者這本書是不存在的緣故，所以，对于他也許覺得更方便的⁴²⁵。这里我們看到“自己特有的手法”，这里有新的誘惑，并且又是：“我們不甘願地犯了罪。”

呵！神呵，你們果真愉快呀，

當我們的榮譽頭朝下地消逝的時候^②。

① 同上書，第4—6頁。424

② 請我們的讀者不要因《美麗的叶連娜》的引言而責備我們。我們不久前重讀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达尔文主义和阿芬巴赫的小歌劇》一文，并且保留着它的有力的印象。

但是我們离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我們回到德国唯心主义者an und für sich.(本身。——譯者)来吧！

我們曾經說过：自然哲学是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薄弱的方面，他們的功績應該在哲学和历史的各种不同的領域中去寻找。我們現在再加說一点，即这在当时亦不能不如此。自称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永远包括着許多“世俗的內容”，即永远从事于許多實質上是科学的問題。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它的世俗的內容是不同的。例如——这里只限于近代哲学史上的例子——在十七世紀哲学主要地从事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問題。十八世紀的哲学为着自己的目的，曾經利用了前世紀的自然科学的发现和理論，但是它本身从事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也許只有康德；在德国放在第一位的当时是社会問題。十九世紀哲学家主要地繼續从事于这同一些問題，虽然是从另一方面去着手。例如，謝林曾直捷地說过，他認為一个历史問題的解决是先驗哲学的最重要的任务。這個問題是什麼問題，我們很快地就可以看到的。

如果一切都流轉着，一切都变化着；如果任何現象都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有益的制度，最后不变为有害的，轉变为自己本身的对立物；那末，寻找“完善的立法”是一件蠢事，那末，就不能想出一种对于一切时代和民族都是好的社会制度：一切东西在自己的地位上和自己的时代中都是好的。辯証的思惟排斥了任何烏托邦。

它尤其應該排斥烏托邦，是因为“人的天性”——这个为十八世紀的启蒙学者及十九世紀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不变地应用的似乎是經常的标准——亦遭受着一切現象的共同的命运；它本身被承認为变动的。

与这一起，那个亦为启蒙学者和空想主义者所公認的对于历

史的朴素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亦消逝了，这个观点表现在：理性、意見支配世界这一句話中。黑格尔說，当然，理性支配着历史，但是只在这个意义上，即在他亦支配着天体的意义上，即在規律性的意义上。天体的运动是合規律的，但是显然，天体并没有关于这个規律性的任何观念。对于人类的历史运动亦是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运动中，无疑地，有着自己的規律；但是这并不是說，人們意識到这些規律，并因此而人的理性，我們的知識，我們的“哲学”是历史运动的主要因子。猫头鹰只在夜間才开始飞翔。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素地上描画灰色的图样时，当人們开始思考自己的本身的社会制度时，你可以确信地說：这个制度已經过完了自己的时代，并准备讓位于新的秩序，而这种新秩序的真正性質同样亦只有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之后，才会为人們所明了。猫头鹰还是夜間才飞翔的⁴²⁶。不容說，聰明的鳥的定期的空中旅行是有益的，甚至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旅行等于什么也沒有說明；它們本身需要說明，而且大概可以說明的，因为在这些旅行中有自己的規律性，承認猫头鹰的飞翔中的規律性乃是对于人类智慧发展史的完全新的观点的基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派别的形而上学者，当領悟了某种哲学体系之后，就認為它是真理的，而一切其他的体系則无条件地是虛伪的。他只知抽象的观念（真理、謬誤）之間的抽象的对立。因此，思想史对于他們只是一部分是可悲的，一部分是可笑的錯誤的混乱的堆积，而这种錯誤的群魔乱舞一直繼續到最后那真理的哲学体系被想出来为止。例如，薩伊——这个形而上学者之中的形而上学者就已經这样地觀察了自己的科学的历史。他劝人不去研究它，因为其中除了謬誤外沒有任何东西。唯心主义的辯証論者不同地看待問題。他們說：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智慧的表现，每一个哲学对于自己的时代都是真理，对于別的时代都是

錯誤。

但是，如果理性支配着世界只是在現象的規律性的意义上；如果思想、知識、“教育”都不在人們的社会事务及历史运动中領導他們，那末人的自由在哪里呢？那人能“判断和選擇”、而不似孩子般地以空虛的嬉戲自慰、而不作外間的即使不是盲目的力量的玩具的領域在哪里呢？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問題——这个旧的，然而永远是新的問題产生在十九世紀的唯心主义者面前，正如它产生在前一世紀的形而上学者面前一样，正如它产生在涉及存在与思惟之間的关系問題的所有一切哲学家面前一样。这个問題，象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說：請你解开我这个謎，否則我便吃掉你的体系。

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問題，这个問題的解决之应用于历史上被謝林認為是先驗哲学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个哲学解决了它沒有呢？怎样解决了它呢？

并且請注意，对于謝林，正如对于黑格尔一样，这个問題之困难正在应用于历史方面……从純粹的人类学观点上看来，这个問題可以認為已經解决的了。

这里必須加以解释，請讀者特別注意，因为这个問題有着巨大重要性。

磁針向北指。这是产生于特殊物質的作用，这个作用服从于一定的規律：物質世界的規律。可是对于磁針，这个物質的运动是看不到的；它对于这个运动沒有絲毫观念。它以为，它之指向北方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外来的原因，簡簡單單只因为它乐意向那边指。物質的必然性，对于磁針表象为它本身的自由的精神活动的形态⁴²⁷。

萊布尼茨想以这个例子來說明自己对于意志自由的观点。以这类例子來說明自己和斯賓諾莎完全相同的观点⁴²⁸。

某些外間的原因傳給了石頭以一定數量的運動。運動，當然在一定的時間內繼續着，直至原因不再起作用為止。這個運動的繼續按照物質世界的規律是必然的。但是試設想，石頭思惟着，它意識到自己的運動給它以舒適，但是不知道它的原因，甚至，一般地不知道對於運動有任何外間的原因。在這種情形下，石頭對自己本身的運動作何表象呢？必然將作為自己本身的願望的結果，自己本身自由選擇的結果；他將對自己說：我運動是因我願意運動。“一切人們所如此夸耀的人的自由便是這樣。它的本質便在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意圖，而不知道引起這些意圖的外間的原因。例如，小孩子以為，那作為他的食品的奶汁是他可以自由地願望的……”

甚至許多現代的讀者，這種解釋在他們看來是“粗糙的唯物主義的”，而且奇怪，純粹唯心主義者的萊布尼茨怎樣會給予這種解釋，而且他們更將說：一般地說，比擬不是證明，而將人和磁針或石頭作幻想的比擬尤其不是證明。對於這一點，我們指出：只要我們記起每天在人的頭腦中完成着的現象，那末，比擬便不再是幻想的了。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已經指出：某種腦纖維的運動適合着腦子中每個意志的運動。那對於磁針或石頭是幻想的東西，對於腦子則成了無可爭辯的事實；按必然的定命的規律而完成着的物質運動，真的在他之中伴隨着思想的自由活動。至於初看起來十分自然的對於唯心主義者萊布尼茨的唯物主義的議論的驚奇，應該記得：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一切徹底的唯心主義者都是一元論者，即在他們的世界觀中完全沒有那二元論者觀點中所有的隔絕物質與精神的不可逾越的鴻溝的地位。按二元論者的意見，特定的物質聚合物之所以能夠思惟，只因為在其中加上了精神的粒子

的緣故。在二元論者目光中物質與精神是兩種完全獨立的實體，其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萊布尼茨的比擬在他們覺得奇怪的緣故，簡簡單單是因為磁針是沒有任何精神的緣故。可是試設想，你碰到這樣一個人，他這樣說，磁針真的是完全物質的東西。但是物質本身是什麼呢？我以為：物質的存在必需要有精神，但這不是說它為精神所創造，而是說它就是那同一個精神，不過存在於別一形態中罷了。這個形態不合於它的真正的本性，它甚至直接違反它的天性，但是這並不妨害它為精神的存在形態，因為按精神的本性說，它應轉化為自己本身的對立物的。——你也許對於這種議論也會驚奇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你會同意下面這一點吧，即承認這種議論為足以使人信服的人，認為物質只是“精神的他在”的人，對於那種給物質以精神的功能，或把這精神的功能與物質規律密切結合起來的解釋是不會覺得驚奇的。這樣的人能夠採用心理現象的唯物主義的解釋，而同時給他（勉強地或不勉強地——這是另一個問題）以嚴格的唯心主義的意義。德國的唯心主義者就是這樣做的。

人的心理活動服從着物質必然性的規律，可是這絲毫也不消滅人的自由。物質必然性的規律實質上不過是精神活動的規律。自由以必然為前提，必然全部轉化為自由，因此，人的自由在實際上較之二元論者所設想的要無可比擬地更廣大！二元論者企圖把自由活動局限於必然活動之外，這便從自由的王國中分去了那個他們給予必然的領域——這個領域即使按照他們的意見來說亦是很廣大的。

德國唯心主義的辯證論者曾是这样地論斷了的。讀者可以看到，他們是堅持着萊布尼茨的“磁針”的；只不過這個磁針是完全變形了，即在他們手中精神化了。

可是磁針的变形还没有解决一切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問題。就算，每个人是完全自由的，尽管他服从于必然的規律，甚至正因为服从必然的規律。可是，在社会中，因而在历史上我們遇見的不是个人，而是一大群个人。試問：每个人的自由是否破坏其他人的自由呢？我想做这件事和那件事，例如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我这个志願是为我自由地采取的，而且我采用以实现我的志願的行动亦将是同样地自由的。但是我的亲近的人妨碍我达到我的目的。他們起来反对我的志願，同我決定我的志願一样地自由。他們用来反对我的行动亦是同样地自由的。我怎样来克服他們所創造的阻碍呢？显然，我将和他們爭論，說服他們，也許甚至恳求他們或威胁他們。但是怎样知道，这会得到什么結果不会呢？法国启蒙学者說过：“la raison finira par avoir raison”（“理性归根結底永远是正确的”）。可是为着要使我的理性获得胜利，我便需要，使我的同胞承認我的理性同样是他們自己的理性，而我有什么根据希望这一点呢？因为他們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因为物質的必然性以我所看不見的道路轉化为自由——而按我們的前提，必然性是完全轉化为自由的——，所以我的同胞的行为就出于一切預見之外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我才能够希望預見他們，即如果我能如观察我的周圍世界的其他一切現象一样观察他們，就是說，把他們作为一定的諸原因的必然的結果，而这些原因是我已經知道的或能够知道的。換句話說：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我的自由才不是一句空話，即如果自由的意識能够伴同着对于那引起我的同胞的自由行动的原因的理解时，就是說，如果我能够从他們的必然性方面去观察他們时。我的同胞对于我的行动亦能够說完全同样的話。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如果在自由的人的活动的基礎上沒有安置着为活动者所理解到的

必然性时，那末任何人的自由的（自觉的）历史活动的可能性就等于零。

我們已經看到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實質上走到宿命論。实际上，如果整个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一个狂妄的原子，那末我們除了祈禱之外无可作为，因为我們决不能和永不能預見个别原子的这类恶作剧，亦无法預防它。

現在我們看到，唯心主义能够引导到同样的宿命論。如果在我的同胞們的行动中沒有任何必然的东西或者我不能从他們的必然性方面去理解他們，那末，我們除了期待善良的神意以外，別无办法。我的最合理的計劃，我的最高尚的志願为完全沒有預見的千百万其他人的行动所粉碎。那时候，按卢克莱茨的說法，从一切中可以产生出一切来。

而且很有兴味的，唯心主义在理論上愈是給自由方面以更多的地位，則在实际活动的領域中愈是将自由归之于无，因为在这里他們不能掌握那以自由的全部力量武装着的偶然性。

唯心主义辯証論者很好地了解这一点。在他們的实践哲学中，必然乃是自由的最可靠的唯一可靠的保證。謝林說过，如果我的行动的结果只取决于自由的話，那末即使道德的义务亦不能使我对于我的行动的结果放心。“在自由中應該有必然”⁴²⁹。

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實質上能够說到什么样的必然性呢？經常地反复地說某种意志的运动必然适合某种腦子的物質运动这一思想，仍不能給我多少安慰。在这种抽象的論点上不能建立任何实际的計算，而从这方面走对于我是沒有出路的，因为我的同胞不是蜜蜂，而他的腦纖維，亦不是玻璃蜂巢，我即使确然知道——况且我們大家还远沒有达到这点——跟着某个神經纖維的某种运动就在我的同胞的精神上产生某种願望的話，我亦不能观察他們的

运动。所以，应该从另一方面去研究人的行动的必然性。

尤其因为如我們所知，猫头鹰只在夜間才飞翔的，即人們的社会关系不是他們自觉活动的結果。人們自觉地追逐他們的独特的、个人的目的。例如他們之中，每一个都企图改善自己的地位，而从他們的各个人的行动的总和中产生出某种社会結果，这种結果也許完全不是他們所希望的，而且大概亦不是他們所預見的。富裕的羅馬市民購買了貧困农民的土地。当然，他們知道，由于他們的行动，某些托里或尤里会成为无地的无产階級，可是，他們之中，誰曾預見到大地产会毀灭共和国及和共和国一起毀灭意大利呢？他們之中誰曾估計到，誰能估計到他們获得的历史的結果呢？誰也不能，誰也沒有估計到。然而結果是，由于大地产毀灭了共和国以及意大利。

从一些个别的人們底自觉的自由的行為中必然地产生出出于他們意料之外的，為他們所沒有預見的有關於整个社会的結果，即影响于这同一些人們的互相关系的总和的結果。这样我們从自由的領域轉入于必然的領域。

如果為人們所沒有意識到的、他們的个人的行动之社会結果引导到社会制度的变更(这是永远发生着的，虽然其速度极不相同)，那末在人們面前又产生着新的个人的目的。他們的自由活动必然带有新的形态。从必然的領域我們重又回到自由的領域。

任何必然的过程是規律性的过程。為人們所沒有預見、然而由于他們行动的結果而必然地出現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是按一定的規律完成的。理論哲学應該发现这些規律。

由变化了的社会关系所加于人們的生活目的中的变化，加于人們自由活动中的变化，显然亦是同样的。換言之，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亦是按一定的規律完成的，这些規律能够而且應該为理論

哲学发现。

而如果理论哲学完成了这个任务，它便将给实践哲学以完全新的不可摇撼的根基。如果我们知道了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那末，我便能够按照我的目的去影响它，不必烦恼于狂妄原子的恶作剧，亦不必烦恼于拥有自由意志的生物的我的同胞能够在每一分钟内给我准备着的一大堆最可惊的意外之事。当然，我不能担保每一个个别的同胞，特别如果他是属于“知识阶级”的话，可是我能够知道社会力量趋向的大概，我只要依靠那些促进我的目的的完成的社会力量就够了。

所以，例如，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可喜的信念，即俄国和别的国家不同，“基础”将得到胜利，那末只是因为我把英勇的“俄罗斯人”的行动理解为规律性的行动，从必然性的观点上去观察它们，而不是从自由的观点上去观察它们。“全世界史是在自由意识上的进步，——黑格尔说，——这种进步我们应该从必然性上去理解它。”⁴³⁰

其次；不论我把“人的天性”研究得怎样好，我总还远不能理解那些从个别的人们行动中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结果。假定，我们和旧派经济学者一起承认谋利的意图是人的天性的主要的特殊的标志。我们能否预见这个意图所采取的形式呢？在特定的、一定的、为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关系下——是的；可是这些特定的、一定的、为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关系，本身亦将在“人的天性”的压力下，在公民的谋利活动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它们向哪一方面变化呢？这一点，我们将很少知道，正如我们很少知道：谋利的意图在新的变化了的社会关系下将采取什么新的方向一样。我们将陷于完全同样的情况中，如果我们和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一起来断言，人的天性不止一个谋利的意图，他还有“社会的感觉”(Gemeinsinn)。这

將是舊曲新唱。為了走出以或多或少的學術術語掩蓋着的無知狀態，我們應從研究人的天性轉到研究社會關係的本性，我們應該理解這些關係為合乎規律的、必然的過程。而這便使我們回到這一個問題上來，即社會關係的本性是由什麼決定的。

我們已經看到，無論上世紀的唯物主義者，無論空想社會主義者都沒有給這個問題以滿意的回答。唯心主義的辯證論者是否解決了這個問題呢？

沒有，他們亦沒有能解決，他們之所以沒有能解決，正因為他們是唯心主義者。為着弄清他們的觀點，我們應提起上面提到過的爭論：即是憲法依賴於道德風習呢？還是道德風習依賴於憲法？關於這個爭論，黑格爾正確地指出：問題提得完全不對，因為在實際上，雖然某一民族的道德風習無疑地影響其憲法，而憲法則影響於某一民族的道德風習，但是兩者都是某個“第三者”，某種特殊的力量的結果，它既創造影響憲法的道德風習，又創造影響道德風習的憲法。但是按照黑格爾的意見，人的天性及社會關係的本性所依靠的這種特別力量和這個最後基礎是什麼呢？這個力量是“概念”或者——這是一樣的——“理念”，某一民族的全部歷史就是它的實現。每個民族實現着自己的特殊的理念，而每個特殊的理念，每個個別民族的理念乃是絕對理念發展中的一個階段。這樣，歷史就好象成了實用的邏輯：解釋某一個歷史時代，就等於指明，它適合於絕對理念邏輯發展的某個階段。但是什麼是“絕對理念”呢？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本身的邏輯過程的人格化。請看那個自己深悉唯心主義學派，自己曾熱情地醉心於它，而又在早年已經指出了這個哲學派別的主要缺點在什麼地方的人關於它說的話⁴³¹：

“當我，根據我對真實的蘋果、梨子、莓、橘的認識，而自己制定了一個表象：果實；當我以後更進一步設想，我的……抽象的表象：‘果實’存

在于我之外，并且甚至成为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用思辨哲学的语句来说，我就是在宣布‘果实’是梨、苹果、橘等的‘本体’。我说，对于梨，本质的不是出现于梨的形态，对于苹果，本质的不是苹果。其中本质的是……我从它们那里得出的抽象的表象：‘果实’。而我宣布苹果、梨、橘等等只是简单的存在形态，——‘果实’的modi。当然，我的以外部感觉为根据的有限的悟性会区别苹果与梨，梨与橘，而我的思辨的理性则宣布这些区别是不重要的，非本质的，它在苹果上看到和梨上一样的东西，在梨上看到和橘子上一样的东西：‘果实’。思辨的理性把不同的现实的果实只看做是果实一幻影，它的真正的本质、‘本体’是‘果实’。

显然，按照这条道路走去是不会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只会重复一切矿物本质上是矿物的。矿物学者只能在自己的幻想中成为矿物学者……因此，思辨哲学——从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做出统一的抽象的果实的思辨哲学为了要达到任何积极的内容，应得企图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重新从‘果实’，从‘本体’转到罪恶之果：苹果、梨、橘等等。但是强迫抽象的表象、‘果实’、产生现实的果实，其困难正如根据现实的果实的知识创造这个表象之容易一样。不抛弃抽象就不能转到那构成它的直接对立物的东西上去。因之，思辨哲学也抛弃了它，可是在特殊的、思辨的神秘的调子上抛弃了它……思辨哲学只是形式上超越于抽象。他这样说：

‘假如苹果、梨、橘、莓实质上不过是“本体”、“果实”，那末试问，为什么果实在我面前有时出现为苹果，有时为橘；这个与我的思辨的表象：“统一”、“本体”、“果实”有力地相矛盾的多样性的幻影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由于——思辨哲学回答道——‘果实’不是死的、无特征的、不动的本质，而是活的、本身发展着的、动的本质。现实的罪恶之果的多样性不仅对于我的有限的悟性，而且对于‘果实’本身，对于思辨的理性都是有意义的。不同的罪恶之果乃是统一的果实的生活的不同的表现……在苹果上，‘果实’给自己以苹果形态的存在，在梨上——梨形态的存在……果实将自己安置在苹果、梨、橘子的形态中；存在于这些果子之间的区分实质上只是果实的自我区分，而且正因为如此，不同的果实只是‘果实’生命过程的不同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話是很諷刺的，但是同時是無條件地正確的。將我們自己的思惟過程人格化為絕對理念的形態，而在這個理念中找尋一切現象的解答，唯心主義這樣便引導自己走入死巷，要走出這個死巷，只有拋棄“理念”，即與唯心主義分手。例如，下引的謝林的話是否能給你們解釋一點兒磁氣的本性呢：“磁氣是靈感的一般動作，是將統一加于多數中，將概念加于區別中的一般動作。那在思想……是自我意識的主觀對客觀的同一侵入，在這裡是表現于存在中。”⁴³²是不是，這個話等于什麼也沒有解釋？這類解釋在歷史領域內同樣亦很少能令人滿意的。希臘為什麼原因沒落的呢？因為那組成希臘生活的原則，希臘精神的中心的“理念”（極好的理念）只能是全世界精神發展上的一個短促的階段⁴³³。這類回答只是將問題在正面的和誇張了的形式中重複而已。黑格爾——上引的希臘沒落原因的解釋是屬於他的——似乎自己亦感覺得這一點而急急于以援引古希臘的經濟的現實性來補充自己的唯心主義的說明：“拉開提蒙之沒落主要地是由于財產的不平等。”——他說。而且不僅在說到希臘時他這樣干。可以說，這是他在歷史哲學上的不變的手法：開始幾句援引絕對理念的屬性的模糊的話，以後——更展開的和當然是更令人心服的指明所述民族的財產關係的性質和發展。實質上說來，在後一類的解釋中已經沒有絲毫唯心主義的東西了，而說“唯心主義就是唯物主義的真理”的黑格爾迫得走到這點，他便簽証了唯心主義的貧乏的証狀，似乎是默不作聲地承認：實質上，事情完全相反：唯物主義乃是唯心主義的真理。

然而，黑格爾在這裡接近的唯物主義乃是完全沒有發展的、初生的唯物主義，一到需要解釋某種財產關係從何而來時，馬上又重新轉入唯心主義了。是的，就在這裡，黑格爾亦常常說出完全唯物主義的觀點。但是一般地說：他將財產關係看做是由于自己內部

力量而自己发展起来的法权概念的实现。

这样，我們关于唯心主义的辯証論者知道了些什么呢？

他們抛弃了人的天性的观点并因此而脫离了对社会現象的空想主义的观点，而将社会生活看做是有自己本身規律的必然过程。然而經過把我們的邏輯思惟的过程（即人的天性的一方面）人格化的迂迴的道路，他們回到了那同一不能令人滿意的观点并且因此社会关系的真正本性对于他們仍然是不能領悟的。

現在我再稍稍回到我們家里的，俄国的哲学上来吧。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菲里坡夫先生那里听到，而菲里坡夫先生又从美国人弗雷則尔那里听到說：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归結为“流·电·学·的·神·秘·主·义”。即从我們說过的唯心主义的德国哲学自己所提出的任务中，讀者們就可以看到弗雷則尔的意见是如何荒謬。菲里坡夫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亦覺得，他們的美国人是“过于极端的”：“只要記起以前的形而上学（从古代，从赫拉克利特起）的傳統的进程和（对黑格尔的）影响就够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而馬上便补充道：可是“不过，弗雷則尔的指明是极有趣的，而且无疑的是包含着—部分真理的。”應該承認，虽然不能不承認……这种“公式”謝德林就早已譏笑过的了。可是叫他的从前的同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样办？他要向“不知秘密的人”解释他只是听来的哲学家啊！不自願地只能帶着博学者的面貌重复什么意义也沒有的空話……

可是，我們回忆一下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傳統进程”吧。“流·电·学·的·試·驗·給·了·欧·洲·一·切·思·想·家·以·影·响·，·其·中·亦·影·响·了·当·时·的·年·輕·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黑格尔創造了巨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震动着全世界，以致由于它甚至莫斯科河畔拥挤不通……”这里把事情描写为，好象黑格尔直接从物理学家那

里，传染了“流电学的神秘主义”。但是，大家知道的，黑格尔的体系只是謝林的观点的繼續发展；显然，这个传染病应该首先影响到后者。它的确影响了他——米海洛夫斯基或菲里坡夫，或弗雷則尔先生安靜地回答道：“謝林，特别是曾經做过他的学生的几个医生将两极論貫徹到极点。”好的。可是謝林的先驅者，大家知道是費希特。流电学的传染病怎样影响了他呢？对于这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大概，他想，什么也沒有影响。假如他真是这样想的，那末他是完全对的：为了相信这一点，只要讀一讀費希特的最初的哲学著作之一：《Grundlage der gesammten Wissenschaftslehre》，Leipzig 1794。（《全部知識学之基础》，萊比錫，1794年）就够了。在这部著作中就用任何显微鏡也发现不出“高尔凡尼流电学”对于費希特的影响，可是那里正有着那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見認為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标志的著名的“三段式”，而这个三段式的家譜，弗雷則尔似乎“有极大部分的真理”把它归于从“高尔凡尼和伏尔塔的實驗”中引来的。应该認為，这是非常奇怪的，虽然不能不承認，尽管如此，黑格尔还是……这样，和那样。

讀者們已經知道謝林对于磁气的观点。德国唯心主义的缺点完全不是在：似乎在它的基础上安置了多余的，无根据的，采取神秘形式的对于当时自然科学发现的热中，而恰恰相反，是在它借助于他們所人格化了的思惟过程去解释一切自然和历史現象。

在結束时——还有一个有趣的新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发现：“形而上学和資本主义处于极密切的联系中；用經濟唯物主义的口吻來說，形而上学是建筑在資本主义生产形式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个必然的組成部分，虽然，同时資本主义将仇視形而上学的、根据于經驗与观察之上的科学的技术应用加以吞食，使之适合自

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約許在另一次中对于“这个新奇的矛盾”再加以說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将是真正“新奇的”东西。請你們自己想一想吧，那他称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在古代希腊和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国都得到了光輝的发展。至今大家以为古代希腊完全不是資本主义的国家，而德国的資本主义在上述时期才开始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将会証明，从“主觀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是完全不对的，而古代希腊和費希特——黑格尔时代的德国正是資本主义的典型国家。現在，你們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是非常重要”了吧！讓我們的作家赶快发表其著名的发明吧！可爱的人兒啊，唱吧，不要羞羞答答啊！

第五章 現代唯物主义

在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現象上唯心主义观点的站不住應該促使，而且真的促使了有思想的人們（即非折衷論者，非二元論者）回到唯物主义的世界觀上去。但是新的唯物主义已經不能是十八世紀末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說的简单的重复了。唯物主义再生了，以唯心主义的一切成就丰富了自己。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是辯証的方法，是在現象的发展中，在現象的产生与消灭中来观察現象。这个新的方向的天才的代表者是卡尔·馬克思。

馬克思不是起来反对唯心主义的第一人。起义之旗是由路德維希·費尔巴哈举起来的。以后，稍后于費尔巴哈，鮑威尔兄弟出現于文坛上了，他們的观点值得俄国的現代讀者特別注意。

鮑威尔兄弟的观点是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反动。然而他們自己却充滿着浅薄的、片面的、折衷論的唯心主义。

我們已經看到，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沒有能够理解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本性，找到它的现实的基础。他們在社会发展上看到了必然的、規律性的过程，而在这上面他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說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他們乞援于絕對理念，絕對理念的諸屬性应该是这个过程的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薄弱方面，哲学革命首先起来反对的亦就是这点；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坚决地起来反对“絕對理念”。

絕對理念存在于（当然，如果它存在的話）空間和時間之外，無論如何，它总是存在每个个别的人的头脑之外。在自己的历史发

展中再现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时，人类服从于异己的力量，站在它外面的力量。在起来反对绝对理念时，青年黑格尔派首先用人的独立性的名义，用终极的人的理性的名义。

“思辨哲学——爱德加·鲍威尔写道——在说到理性时把它当做某种抽象的、绝对的力量，这是十分错误的……理性不是一种客观的、抽象的力量，对于它，人好像只是一种主观的、偶然的、过渡的东西；不，统治的力量正是人自己，是他的自我意识，而理性只是这个自我意识的力量。因之，没有任何绝对理性，而有的只是跟着自我意识的发展而永远地变形着的理性；它绝不是存在于完成的形态中，它永远变形着。”^①

这样，没有绝对理念，没有抽象的理性，而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终极的、永久变化着的人的理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亦不曾对之加以辩驳的，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对于一切“都能辩驳的”……尽管成功之多少极可怀疑。可是怪事来了！我们愈深入于这个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处境即愈加困难。在老的德国唯心主义者那里，自然中和历史上的任何过程的规律性都归因于绝对理念。试问，在破坏了它的担负者——绝对理念之后，我们对这个规律性将归因于什么呢？假定，对于自然，满意的回答可以用几句话说明；我们将它归因于物质的属性。但是对于历史，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在历史上统治的力量是人的自我意识，永远变化着的、终极的人的理性。在这个理性的发展上有任何规律性没有呢？爱德加·鲍威尔，显然，将肯定地回答，因为对于他，人，因之，人的理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绝不是什么偶然的東西。可是如果你请求鲍威尔本人给你说明他自己关于人类的理性发展上的规律性的概念时，例如，如果你请问他，为什么在某

^① 《Der Streit der Kritik mit Kirche und Staat》，von Edgar Bauer, Bern 1844, S. 184. (爱德加·鲍威尔：《批评家同教会和国家之争论》，伯尔尼，1844年，第184页。)

一历史时代理性发展得这样，在另一时代則另一样，那末，实在說来，你在他那里将得不到任何回答，他将向你說：“永远发展着的人的理性創造社会形式”，“历史的理性是全世界史的动力”，而因此，只要理性在自己的发展上前进进一步时，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就成为过时的了^①。可是所有这些及类似的說法不是回答問題，而是在下述这問題周围轉圈子，即为什么理性在自己发展上前进进一步和为什么它正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进一步，而不是在別一方向上。被你迫得不能不对付这个問題的爱·鮑威尔将急急于以无內容地援引終极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的理性的屬性来躲避，正如老的唯心主义者躲避于援引絕對理念的屬性之下一样。

認為理性是全世界史的动力而以某种特殊的、它所固有的內的屬性来解释它的发展，就是說，将它变为无条件的东西，換言之，即在新的形态中复活那刚才才宣布其永远埋葬了的那个絕對理念。这个复活了的絕對理念的最主要的缺点就在它和絕對的二元論和平共处，更正确說，它必然地要設想后者。因为自然的过程不是为終极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的理性所制約的，因此在我們面前就有两种力量：在自然中——物質，在历史上——人的理性，而沒有将物質运动和理性发展联結起来的桥梁，沒有将必然的王国和自由的王国联結起来的桥梁。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說，鮑威尔的观点充滿着非常浅薄的、片面的、折衷論的唯心主义。

“意見支配着世界”——法国启蒙派曾經这样說过。我們看起来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鮑威尔兄弟亦是这样說。可是，如果意見支配着世界，那末历史的主要推动者便是那些批評旧意見和創立新意見的思想的人。鮑威尔兄弟正是这样想的。历史的过程

^① 《批評家同教会和国家之爭論》，伯尔尼，1884年，第185頁。

的本質，被他們歸結為用“批判的精神”改造意見的現存富藏以及為這個富藏所制約的共同生活形態。鮑威爾兄弟的這些觀點曾為《歷史書翰》的作者⁴³⁴完全移植於俄國的文壇之上，不過他已經不說批判的“精神”，而說批判的“思想”，就因為《現代人》雜誌禁止說精神的緣故。

既然把自己設想為歷史的主要建築者、創造者，“批判地思維的”人這樣便把自己及同類的人提高成人類的特殊的高級種類。這個高級的種類同沒有批判思維的，只能成為“批判地思維的”人物的創造的手中的粘土的群眾對立着——“英雄”同“群氓”對立着。不論英雄如何熱愛群氓，不論他對群氓的長期苦難和不斷的困苦如何充滿同情，他不能不以高高在上的目光去看他，不能不意識到一切事情是在於他——英雄，而群氓是沒有任何創造因素的群眾，好象是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們頭上謙遜地站着善良的“批判地思維的”人物時，才能有積極的意義。鮑威爾兄弟的折衷論的唯心主義乃是四十年代“批判地思維的”德國“知識分子”的可怖的，可以說，可厭的妄自尊大的基礎，而在現在，它經過自己的俄國信徒，在俄國知識分子中產生着同一的缺點。這個妄自尊大的无情的敵人和告發者是馬克思，我們現在就來講他。

馬克思說：將“批判地思維的”人物和“群眾”對立只不過是黑格爾的歷史觀點的諷刺畫——而黑格爾的歷史觀點本身只不過是關於精神與物質對立的老學說的思辨的結果。“早在黑格爾那里，歷史的絕對精神^①就把群眾當作材料對待，並且首先在哲學中得到它真實的表現。但是，哲學家只不過是創造歷史的絕對精神在運動完成之後用來回顧既往以求意識到自身的一種工具。哲

① 就是絕對理念。

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顧既往的意識，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絕對精神无意地完成了^①。所以哲学家是 post festum (事后) 才上場的。黑格尔的过錯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第一，按照他的学說，絕對精神只在哲学上才达到自我意識，因而亦只在哲学上存在，他拒絕承認现实的哲学家、个人为絕對精神；第二，在他那里，絕對精神只是表面上創造历史。实际上，因为絕對精神只在哲学家身上和只在 post festum (事后) 才意識到自己为創造的精神，所以，他的捏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識中、見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魯諾·鮑威尔先生取消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②，首先，他宣布批判为絕對精神，而宣布他自己为批判。正如批判的因素被从群众中驅逐出来一样，群众的因素也被从批判中驅逐出来了。所以批判認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鮑威尔及其門徒体现出来。其次，鮑威尔先生又取消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如果說黑格尔精神只是 post festum (事后) 在幻想中創造历史，那末，鮑威尔先生則和他以外的其他群众相反，他是有意識地在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他現在就已經戏剧性地对待这批群众，而且在深思熟虑之后却故意发明历史和实现历史。一方面是群众，他們是物質的、消极的、非历史的和无生气的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結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③

① 譯者沒有忘記早些时候引用过的黑格尔的話：“密納发的梟鳥只在夜間才开始飞翔。”

② 布魯諾·鮑威尔是上面提到的爱德加·鮑威尔的哥哥，是当时著名的《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对現福音書历史的批判》)的著者。

③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von F. Engels und K. Marx. Frankfurt. a. Main 1845, S.

这一段話引起奇特的印象，好象它不是在五十年代写的，而是在个把月以前写的，而反对的不是德国的左派黑格尔派，而是俄国的“主观”社会学者。在讀了下引的恩格斯文章中的一段話时，印象更加加强了：

“自滿自足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認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因为这无异于承認卑賤的群众的全部群众的群众性，而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正是要使群众摆脱这种群众性。因此历史将从它的大众性中解脱出来，而自由地处理自己的对象的批判又向历史吆喝道：你知道吗，你应当如此这般地产生！批判的一切法律都有溯及既往的力量；在批判的判决以前，历史完全不是遵照批判的判决产生的，因此，群众的，即所謂真正的历史是与批判的历史大有差别的。”④

这一片断說的是誰呢？說的是四十年代的德国著作家呢，还是某几个我們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呢？他們以自負的态度議論这个題目即：天主教把历史进程作一种表象，清教徒——另一种，君主主义者——第三种，共和主义者——第四种，因此对于好的主观的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为自己，为自己的精神的必要，設想出那完全适合于最好的理想的历史。难道恩格斯預見了我們的俄国的蠢才嗎？完全沒有！他显然是沒有想到他們，如果他的諷刺在半世紀之后恰中我們主观思想家的要害，那末事情簡簡單單地只因为，在我們的主观的胡說中絕沒有任何新鮮的东西：他不过是黑格尔主义的諷刺画的恶劣的“鷹制的”照象……而对黑格尔主义，他們这样失敗地战斗着……

126—128.《神圣的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反对布魯諾·鲍威尔及其伙伴》。馬克思与恩格斯，1845年，第126—128頁）此書为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批判的批判”的各种观点的論文集。本段引自馬克思反对布魯諾·鲍威尔的一文435。上章所引的一段話，亦出自馬克思。

④ 同上書，第6頁，436

从“批判的批判”的观点看来，一切伟大的历史冲突归结为观念的冲突。馬克思指出：当观念与某一时代的历史过程的担負者的社会阶层的实在的、经济的利益不适合时，观念每一次都“被污辱了”。只有理解这些利益才能給予理解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的鑰匙。

我們已經知道：就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亦沒有对利益閉目无視，就是他們亦常常借助于利益以解释特定社会的特定状态。但是在他們那里，这个对于利益的決定意义的观点，只是——意見支配世界这个公式的变形：在他們那里，得出了人們利益的本身亦是從屬於他們的意見的，而且跟着意見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利益的意义的这种解释乃是唯心主义应用于历史上的胜利。这种解释甚至亦深固地留在德国的辯証的唯心主义那里，照德国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当絕對理念需要在自己的邏輯发展中作新的一步时，这时候人們便出現了新的物質利益。馬克思完全不同地理解物質利益的意义。

对于普通的俄国讀者，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好像是某种对于人类的醜態的嘲諷。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在烏斯賓斯基的《破产》中有一个官僚夫人老太太甚至在垂死前的掙扎中还頑固地重复自己毕生的生活規則：“有机会便放进荷包里去，放进荷包里去！”俄国的知識分子天真地以为，馬克思把这个卑污的規律加之于整个人类；以为馬克思断言：人类的子孙不管他干什么，他永远地、絕對地、自觉地“找机会放进荷包中去”。对于沒有自私自利之心的俄国知識分子，这类观点自然是“不同情”的，正如某一位九等官的太太“不同情”于达尔文的理論一样，这位太太以为这个理論的全部意义只是归结为，她——尊貴的太太只是帶着头布的猴子这一大不敬的論点。实际上馬克思之沒有污辱“知識分子”，正如达尔文

之沒有污辱九等官太太一样。

为了解解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記住，直接先行于馬克思而出現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已經得到了什么样的結果。我們知道，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已經达到这个信念，即“公民生活”、“财产关系”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我們同样知道，在黑格尔身上，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亦达到同一个結論，——它的达到这个結論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违反自己的精神的，简单地由于唯心主义地解释历史的不充分和站不住的緣故。馬克思在領悟了自己时代的科学知識和哲学思想的全部結果之后，完全同意法国的历史家和黑格尔的上述的結論。他說，我坚信：“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既不能以其本身的天性来解释，亦不能以所謂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解释，它根源于物質的生活的关系中，这些关系的总和，黑格尔跟着十八世紀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称之为‘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解剖应该求之于它的經濟。”⁴³⁷

可是特定的社会的經濟是依賴什么來決定的呢？不論法国的历史家，不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不論黑格尔对这个問題都沒有能給多少令人滿意的回答。他們——直接地或間接地——都乞援于人的天性。馬克思的伟大的功績就在，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問題，他把人的天性看做是永远地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結果，其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維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圍的外間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品。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間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間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馬克思的历史理論的全部本質，虽然，很明白的，将这几句本身单独拿来，它并不能給予这个理論的应有的概念而需要加以說明。

富兰克林称人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使用与工具的生

产眞的是人的特点。达尔文反对只有人才能使用工具的意見；他举出許多例子，指明，許多哺乳动物都固有着使用工具的萌芽形态。而且显然，从他自己的观点說来，他是完全正确的，即在这个意味上，就是在著名的“人的天性”中沒有任何一点不在这种或那种别的动物种中同样遇見的，因此，完全沒有任何根据認为人是特别的生物，将它提在特殊的“王国”內。但是不應該忘記：量的区别轉化为質的区别。在一种动物身上作为萌芽而存在着的東西，可以成为另一种动物的特殊的标志。关于工具的使用特別应得如此說。象折下小枝用以驅蝇。这是有趣的和深可玩味的。可是在“象”种的发展史上，用小枝驅蝇大概沒有起任何重大的作用。象之所以为象，不是因为它的或早或晚的类象的祖先用枝驅蝇。人則不然^①。

澳洲野人的全部生活依賴于他的飞去来器，正如現代英国的全部生活依賴于机器一样。从澳洲人那里夺去他的飞去来器，把他造成农人，而他必然要改变其全部生活式样，全部习惯，全部思想式样，全部“天性”。

我們說，造成农人。在农业这个例子上清楚地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的过程不仅需要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只是为生产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因此更正确些，不說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說生产手段、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完全无疑的，在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属于或者至少至今曾是属于劳动工具的。

在劳动工具上，人好像是获得了改变他的身体构造的新的器官。从他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給了自己的发展史以完全新的面貌：以前这个历史正如一切动物一样归结于他的自然器官

^① “使用工具到处是人的仅有的特点，所以只要在堆积物或穴窟之內发现一个人工的烧石，就足以充分証明，这里有过人。”（但尼也里·威尔逊，《史前的人》，第1卷，第151--152頁，倫敦，1876年）

的变化；现在它首先是他人为器官的改进的历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

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同时亦是社会的动物，从远祖以来在许多代中是生活于或大或小的群集中。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合群地生活着，在这里对于我们并不重要（这应由动物学说明的而且正在说明着），但是从历史哲学的观点上，极端重要地是要指出：从人为器官开始在他的生存中起决定作用以来，他的社会生活本身就跟着他的生产力发展的进程而变化着。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自己也互相影响着。他们如果不用相当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从事生产。为要从事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经过这些社会的关系与联系，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①

人为的器官，劳动工具，这样便成了与其说是个人的器官，无宁说是社会人的器官。这说明了为什么劳动工具的任何重大的变化引起着在社会制度中的变更。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劳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这些条件，当然是依照生产资料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跟着新的战争武器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全部军队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员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由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变化了。因之，生产者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跟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而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其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而每一个生产关系总和同时又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②

① 《Lohnarbeit und Kapital》（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438。

② 同上书 438。

可以不必添加說：人类发展的更早的阶段亦同样是生产关系的特殊的总和。同样可以不必添加說：就在这些更早的阶段上，生产力的状态亦曾对于人們的生产关系有决定的影响。

我們應該在这里停留一下，以便考察一下那些初初看来颇为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見。

这种反对的意見的第一个就是：

人們常对馬克思主义者說：誰也不爭辯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是劳动工具是为人所发明和人所使用的。你們自己也承認：人們使用劳动工具需要比較地很高度的智慧的发展。在劳动工具改进上的每一个新步驟要求人的智慧的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結果。这就是說，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就是說，那些断言世界为意見(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們是正确的。

这类指摘是很自然的，可是并不妨害它是无根据的。

无疑的，劳动工具的使用需要智慧在动物—人身上高度的发展。但是請看一看，現代自然科学以什么原因来解释这个发展：

达尔文說：“如果不使用双手——这个异常听他意志指揮的工具，人永远也不会宇宙間达到統治的地位。”^①这不是新的看法——爱尔維修已經說过这一看法。可是爱尔維修不能确然地站在发展的观点上，因而沒有能够給自己的看法以多少确定的形态。达尔文提出了整批論据来拥护这一看法；虽然，这些論据只有假定的性質，但是在其总和上他們頗足令人信服的。达尔文究竟說了些什么呢？那对于人的“理性”的成功有这样显著的影响的，現存的、完善的人的双手，那 quasi-人(即类似人的人)从哪里得来的

^① 《La descendance de l'homme etc》，Paris 1881, p. 51. (《人的起源等等》，巴黎，1881年，第51頁。)

呢？大約，他們由于某种地理环境的特点形成的，这种环境使得前肢和后肢之间的肢体分工成为有利的。“理性”的成功是这个分工的辽远的結果，同样在順利的外間条件之下，它又反过来成为人为的器官、劳动工具的使用的最接近的原因。这些新的人为的器官給他的智慧的发展作新的效劳，而“理性”的成功又反映于器官。这里在我們面前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原因与結果經常地变换着。可是如只从简单的互相作用的观点上去观察这个过程，那将是錯誤的。为着人能够利用自己“理性”已經达到的成功来改进自己的人为的器官即为着扩大自己对自然的权力，他便應該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这个地理环境要能够給他：（一）为改进所必需的材料；（二）改进了的工具的加工的对象。在沒有金屬的地方，社会人的本身的理性無論如何也不会使他走出“磨石时期”的界限的；同样地为着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必需要有一定的植物和动物，沒有这些植物和动物，“理性将停留着不动”。然而这也还不是全部。原始社会的智慧发展，在原始社会之間的互相接触愈大的地方，就愈迅速，而这些接触，当然，在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条件愈多差异（即因此，在一个地方的生产品較之另一地方所生产的生产品愈少相似），則愈頻繁^①。最后，大家知道，在这关系上，天然的交通是如何重要；黑格尔就已經說过，山隔离开人們，河与海使人們接近^②。

① 在馬尔茨烏斯的关于巴西的原始居民的著名的書 439 中可以找得几个有趣的例子，指明，表面上最小的地形的特点在其居民之間的互相接触的发展上是如何重要。

② 附帶地說，关于海，應該指出，它不是永远使人們接近的。拉采尔（《Antropo-Geographie》，Stuttgart 1882，S. 92）（《人类—地理学》，斯图加特，1882年，第92頁）正确地指出：在发憊的一定的低級的阶段上，海是絕對的界限，即使得为它所隔开的民族之間的任何接触都成为不可能。另一方面，相互接触，起初它完全为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制約的，在原始种族的面貌上印上自己的烙印，島民与大陆居民大有区别。“居

地理环境对于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产生于原始氏族組織廢墟之上的国家的命运所加予的决定的影响，不会更小。“不是土地的绝对丰饒性，而是它的差异性，它的天然产物的多样性，組成社会分工的天然的基础，和使得因为其周围的天然条件的多色多样，而多样化自己的需要、能力、生产的手段和方式。为了大规模地开发自然，为经过有組織的人的努力来使自然服从人，对于自然的一切的力量确立社会监督之必需，在产业的历史上起着最决定的作用。在埃及、朗巴底、荷兰，或者在波斯和印度，治水的意义就是这样，在这些地方经过人工运河的灌溉不仅給土地带来了必需的水量，而且同时給土地从山上带来了矿物质的肥料。在阿剌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及西西里的产业繁荣之秘密就在开凿运河之中。”③

这样，只因为地理环境的某些特殊属性的蔭賜，我們的人类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轉化为 toolmaking animals (制造工具的动物) 所必要的智慧发展的高度。和这完全同样地，也只有地理环境能够給这个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④。在生产力住于島上的人民在个别情况下和附近大陆或附近大島的居民完全不同；甚至他們在起初是屬于同一人种或集团的，而他們永远是与这个集团非常厉害地不同的；我們更加上說：作为規律，他們彼此之間的差別大于住在大陆上的这个民族或集团的各分派之差別。(拉采尔：上引書，第 96 頁) 这里重復着那形成动物种和亚种的同一規律。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 3 版，第 524—526 頁。440 馬克思更添加說：“对于印度的失去互相联系的小的生产团体，国家政权之自然基础之一是水流的調节。这点，印度伊斯兰教統治者較之他們的英国的后繼者懂得更好。”以上引的馬克思的意見和最新的研究来比較一下：“在活的自然給予人的全部貢獻之中，最宝貴的不是物質財富，而是力的富，或者更好地說：是力的发展的喚起。”(拉采尔：上引書，第 343 頁)

④ 普列汉諾夫在关于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这个問題上的論据，不能認為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在其較后的著作中，普列汉諾夫直接說到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全部进程上的决定的影响。

除了正确的論点說：地理环境经过社会关系影响于人，在它产生之后，社会关系按其自己的内部規律发展着；普列汉諾夫錯誤地說：社会制度“归根結底是由地理环境的

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⑤。

不同的人类社会所达到的不同的结果（文化发展的阶段），其

属性决定的”（本卷第 766 页）。“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做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看做是经常变动的量”（本卷第 682 页）。

关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与意义的问题，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这样地指出：“不可争辩的，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需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它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但是它的影响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要快得多。在三千年内，在欧洲已经换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已经换了四种社会制度。而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或者完全没有变动，或者变动得很小，连地理学上都不肯提到它。这是显然的。因为地理环境的多少重大的变化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极重大的变化也只需几百年或千把年就足够了。

所以，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几万年中几乎不变的东西决不能成为几百年中就会根本变化的发展的主要原因。”

——俄文版单行本编者

⑤ “我们应该当心——路·海格尔说——不要过分地估计思考在工具产生中的作用。最初的一些极端重要的工具的发现，当然是偶然地发生的，正如许多现代的发明一样。他们当然更象找到的而不是发明的。我之达到这个观点，特别是由于下面的情形，即工具的名称永远不是从它们的制造中发生的，它们（即名称）永远没有元生的性质，而永远是工具所提供的应用中产生出来的。例如在德语中 Scheere（剪刀）Säge（锯）Hacke（鹤嘴锄）实质上是剪着的（scheeren）锯着（sägen）锄着（hacken）的对象。这个语言的规律由于下面这一点特别应该引起注意，即不是工具的日常用品的名称是创生地、受动地由他们所由或所因而产生的材料或工作而组成的。例如，盛酒的皮囊，在许多语言中就是剥取的兽皮；德语的 Schlauch 适合于英语的 Slough——蛇皮。希腊语的 asgi 同时是皮囊和兽皮的意思。所以，这个语言完全明显的告诉我们：称为皮囊的用品如何和由什么造成的。关于工具便不是这样；如果根据语言的话，工具在开始时完全不是制好了的东西，例如偶然地找到的，我将说半游戏地找到的尖石可能成为最初的小刀。”（L. Geiger, 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m Lichte der Sprache. Mit besonderer Beziehung auf die Entstehung des Werkzeugs, S. 36—37.（《在语言中的人类原始史，其中特别注意劳动工具的产生》，第 36—37 页）见论文集《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Stuttgart, 1878.（《关于人类发展史》，斯图加特，1878 年。）

原因正在周围条件不允許不同的人的种族在同等程度上使用自己的“发明”能力。有一派人类学者将上述的结果的不同归之于人种的不同的屬性。但是这派的观点是經不起批評的……它只是引用“人的天性”来解释历史現象的老方法的新花样（即此地引用人种的天性），而按照科学的意味說是和莫利哀的医生相去不远的，这医生庄严地說：鴉片之所以催眠，因为有催眠的屬性（某一人种落后；因为有落后的屬性）。

人在作用于在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

劳动工具既然成为生产的对象，那末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用以制造的劳动工具。这是不用任何解释，对任何人都明白的。可是，例如下面的情形在最初看来是不能理解的：普卢塔克在提到阿基米德在羅馬人围困西拉加斯的时候所做的发明时，認為需要原諒发明者。他說，哲学家从事于这类事情，当然是不大好的，可是因为他的祖国处于极端危急中，所以阿基米德情有可原。我們試問，現在，誰还需要去找尋替爱迪生減輕罪名的理由呢？我們現在对于一个人用他的才能去作机械的发明并不認為可耻的事，——完全相反！——而希腊人（或者如果你願意說的話，羅馬人），如你們所看到的一样，对于这点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机械的发现与发明在他們那里較之我們現在，應該来得无可比拟地更迟緩，事实上亦正是如此。这里似乎又是意見支配着世界。可是希腊人从哪里得来这种奇怪的“意見”呢？它的来源不能以人的“理性”的屬性来解释。只有記住他們的社会关系。大家知道的：希腊和羅馬的社会曾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在

这样的社会中，全部体力劳动，全部生产事业落在奴隶身上。自由人以这样的劳动为耻辱，因之自然而然地便确定了甚至对于有关生产过程的最重要的发明（机械的发明也在其中）的一种蔑视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普卢塔克之视阿基米德不如我们之视爱迪生一样的缘故^①。可是为什么在希腊建立了奴隶制度呢？是否是因为希腊人由于自己的“理性”的某些缺憾而认为奴隶制度是最好的缘故呢？不，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曾有这样的时候，在希腊人那里并没有奴隶，而在这时候他们完全没有认为奴隶制的社会制度是天然的和必然的。以后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奴隶并且逐渐地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时候希腊公民对它的观点亦变化了：他们起来拥护它，作为完全自然的和无条件必需的制度。可是为什么在希腊人那里产生了和发展了奴隶制度呢？大概，是和它在别的国度中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原因是一样的。而这个原因是知道的：它在于生产力的状态。实际上，为着使我能把被征服的敌人造成奴隶较之吃掉他更有利益，就需要他的强制劳动的生产品不仅能够维持他的生存而且至少部分地亦要能维持我的生存，换句话说，需要在我支配下的生产力有某一程度的发展。奴隶制度正是经过这扇大门进入历史的。奴隶劳动很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它之下，生产力的发展前进得非常之迟慢，然

^① “（这个机械的）创始者是爱夫多克斯和阿尔赫特，他们给了几何学以更多样的和有趣的内容，而为着这个科学的直接可触知的和技术上重要的应用忽略了它的抽象的和不能绘图的问题……而当柏拉图愤懑地向他们指出说：他们消灭了几何学的伟大，几何学在他们手里离开了无形体的和抽象的对象而转到可感觉的需要手工艺制造的对象；这时候机械学被从数学中赶出来了和数学分离了，并且在长时期中没有从哲学方面受到任何注意，成了军事艺术的辅助科学之一。”（Plutarchi, Vita Marcelli, edit. Teubneriana, C. Sintenis, Lipsiae 1883, Cap. XIV, pp. 135—136.）（普卢塔克：《马尔采尔之生涯》，1883年，第14章，第135—136页）译者们可以看到，普卢塔克的观点在当时绝不是新的观点。

而总还是前进了，而最后到了这样的时机，即剝削奴隶劳动較之剝削自由劳动获益更少。这时候，奴隶制度被取消或逐漸衰亡。引它进入历史的門的生产力的发展把它赶了出去^①。这样，当我们回到普卢塔克时，就可以看到，他对阿基米德的发明的观点是为他当时的生产力的状态所规定的。而因为这类观点对于发现与发明的往后的进程无疑地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更可以说：每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每一个特定的阶段上，其生产力之往后的发展是为我们所观察的时期的生产力的状态所决定的⁴⁴¹。

无疑地，在我们遇见发现与发明的一切地方我们亦就遇到“理性”。没有理性发现与发明是不可能的，正如它们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时是不可能的一样。我们所叙述的学说并没有忽视理性的作用；它只企图说明为什么理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是这样地动作，而不是另外一样；它并不蔑视理性的成功，而只是企图给它找出充分的原因来。

最近喜欢用另外一种理由来反对这同一的学说，这种反对的意见，我们且让卡列也夫先生来叙述。

“跟着时间的流轉——一知半解地叙述恩格斯的历史哲学的这位作家说——恩格斯以新的思想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末后来，他承认家族制度的

^① 大家知道：在长时期中俄国农民自己曾能够有而且亦常常有过农奴。农奴的状况对于农民说来是不会愉快的。可是，在俄国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下，没有一个农民能够在这个状态中看到不正常之处。积蓄了一些钱的“田夫”自然而然地想到购买农奴，正如罗马的自由民企图获得奴隶一样。在斯巴达克领导下之起义的奴隶曾与自己的主人进行了战争，可是没有和奴隶制进行战争，假如他们能够得到胜利，他们在顺利的条件下，他们自己会泰然自若地做成奴隶占有者。在这里不禁想起谢林的话：自由应该是必然的。这话在这里有着新的意义。历史指明：任何一种自由只在它成了经济的必然性时，它才出现。

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这是由关于婚姻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原始形态的新观念的影响而来的，它促使他不仅单单注意到生产物的生产过程而同时亦要注意到人类后代的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关系上，影响部分地是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方面来的。”以及諸如此类的話⁴⁴²。

这样，假如以前恩格斯“承認社会經濟結構的研究是唯物(?)史觀的基础”，那末后来，“承認了有同等的意义”以及等等，实在說来，他已經不再是“經濟”唯物主义者了。卡列也夫先生以公平的历史家的口吻叙述着这个事件，而米海洛夫斯基則关于这点“跳着和玩着”，但是两者在本質上說的是一样的話，两者重复着德国的极肤浅的作家魏正格倫在其《Entwicklungsgesetze der Menschheit》（《人类发展的規律》）一書中，早已說过的話⁴⁴³。

象恩格斯这样的杰出的人物，在几十年中注意地追踪着当时的科学运动时，很重大地“补充了”自己对人类历史的观点，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有一种补充和另一种补充，正如有“fagot et fagot”（“物各不同”）。在这一情况下，全部問題是在是否由于所加的“补充”，恩格斯的观点改变了；是否真的被迫得承認在生产发展之旁，还有其他“有同等意义”的因素的作用？任何对于这个问题多少願意加以注意和郑重地对待的人，都很容易回答的。

达尔文說，象有时用小枝驅蝇，关于这点，我們曾指出过，虽然如此，可是这些小枝在象的生命中不起任何本質的作用，象之所以成为象不是因为它用小枝的緣故。可是象增殖着。在雌象和雄象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雌象及雄象和子象之間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显然，这些关系不是由“小枝”造成的；这些关系是为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造成的，“小枝”在这些条件中的小作用，是这样的无限的微小，以致可以毫無錯誤地将它等于零。可是試設想，

小枝在象的生活中开始日益起着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味上,即它日益更大地影响象的一切习惯所依賴的一般条件,以及最后象本身的生存。試設想,小枝,在最后,获得了在創造这些条件上的决定的影响——那时候不得不承認,就是象对雌象及子象的关系归根結底亦是为小枝所决定的了。那时候,不得不承認,曾有这样的時候,当时象的“家族”关系是独立地(在它們对小枝的关系上說)发展的,可是后来到了这样的時候,即它們成为被小枝所决定的了。在这种承認之中有什么足以奇怪的东西嗎?除了小枝意外地获得在象的生活中的决定意义这个設想之奇怪外,其余都是不足为奇的。我們自己亦知道,对于象,这种設想看起来不能不是奇怪的;可是应用到人类的历史上,事情便完全不同了。

人只是逐渐地从动物界中脱离出来的。曾有这样的時候,当时在我們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曾起过象小枝在象的生活中所起的那樣渺小的作用。在很长的一個时期中,类人男和类人女之間的关系以及两者对他們的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經是为这一物种的一般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与劳动工具沒有任何关系。当时我們祖先的“家族”关系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應該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历史家在这里还无事可做。可是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而最后到了这样的时机,这时候,它得到了对全部社会关系(家族关系亦在其中)的构成的决定影响。这里就开始了历史家的事业:他們應該指明,我們祖先的家族关系跟着他們的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和为什么改变了,家庭怎样依賴于經濟关系而发展起来。但是很明白的,他如果从事于这个解释,那末在研究原始的家族时,他便不能只单单注意經濟;因为在劳动工具在人的生活中获得决定的影响之前人亦是繁殖着;因为在这个时期之前亦曾經存在过某种家族关系,这种关系

是为这个主要的种——homo sapiens^①——的一般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这里，实在说来，历史家应该做什么呢？他要做，第一，向自然科学家要一张这个种的经历表，自然科学家将继续研究人的发展的事移交给他；第二，“用自己的资料”来充实这一表格。换句话说，他应该着手于“家族”，例如说，在人类发展的动物时期是如何造成了的，而以后再指明在历史时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经济关系中变化的结果，家族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恩格斯所说的亦只不过是这个。而我们请问，当他说这一点时，是否对于自己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最初的”观点有丝毫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一因素的作用，还承认某个和它有“同等意义”的因素的作用呢？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然而，果真是这样，那末为什么魏正格伦和卡列也夫先生说到他的观点的改变呢？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跳着和玩着呢？最靠得住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轻浮。

我们的论敌们异口同声地向我们叫道：“就是在你所谓历史时期中，将家族关系的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的历史亦是一件怪事。”也许是怪事，也许不是怪事——我们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来说，这是可以争辩的事。而我们不反对和你们辩论，先生们，可是有一个条件，即在辩论中应该自重一些，注意地思考我们的话的意思，不要将你们自己的愿想加在我们头上，不要急于想在我们这里发现不论我们，不论我们的导师，现在没有和永远亦不曾有过的矛盾。同意吗？很好，来辩论吧！

你们说，不能以经济关系的历史来解释家族的历史；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我们断言和你们相反，我们来请专门的研

①（思想家）。

究家为証人。

日罗·台龙的書：《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①，你們当然是熟悉的吧？我們翻开这本你們所熟悉的書，我們可以找到，例如，这样的地方：

“在原始种族之內（日罗·台龙說，实在是“集群之內”——de la horde）引起单独的家族集团之发生的原因，显然是和这个种族的财富的增长有关的。某种谷类植物的使用或发现，某种新的动物的蓄养能够成为在野蛮社会中发生根本改变的充分的原因。在文明上的一切伟大成功永远是和居民的經濟生活状况的深刻变化相符合的。”（第138頁）^②

几頁之后：

“显然，从母系制轉父系制特别是表明了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性質的冲突。”（第141頁）

又：“我以为，男权占优势的家族組織到处是由极简单和极自发的……力量的作用所引起的——所有权的作用。”（第146頁）

你們当然知道，馬克林南对女嬰杀害在原始家庭历史上加以什么样的意义的吧？大家知道，恩格斯对馬克林南的研究是抱着异常否定的态度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認識馬克林南对于引起似乎在家庭史上給予了如此重大影响的杀嬰的出現的原因的观点，对于我們是更有趣的。

“对被敌人包围着的种族，在技术不发达的情形下，很艰难地維持着自己的生存，对于他們，男孩是力量的来源，在防御敌人的意味上以及在謀得食品的意味上，女孩——懦弱的源泉。”^③

① 《家族之起源》。

② 我們引的是1847年的法文版。

③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primitive marriage》，by John Ferg. Mac-Lennan, p. 75.（《古代史研究——原始婚姻》，馬克林南，第75頁。）

按馬克林南的意思，原始种族之杀戮女嬰是由什么引起的呢？生活資料的不足，生产力的薄弱，因为，如果这些种族有足够的食品，那末，大概不会因为将来敌人会来杀害和俘擄女人的恐怖而杀害自己的女兒的吧。

再說一遍，恩格斯不同意馬克林南对家族史的观点的，是的，我們亦觉得他的观点很不能令人滿意的；可是在这里对于我們重要的是：就是馬克林南亦犯了人們用以責备恩格斯的罪名，就是他亦在生产力的状态中去找寻家族关系的解释。

我們还要繼續摘引嗎？还要摘引李佩尔特、摩尔根嗎？我們沒有看到这种需要：誰讀过他們的書的，就知道，在这关系上，他們和恩格斯以及馬克林南一样都是罪人。大家知道，在这上面，就是斯宾塞也不是无罪的，可是他的社会学的观点和“經濟唯物主义”却毫无相同之处。

后面这一点，当然是可以为着論战的目的而加以利用的，說道：喂，你們看呀！就是說，可以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一个別問題上相同而不同意他們的一般的历史理論的啊！当然，可以。全部問題是在，在这里邏輯在哪一方面。

我們再繼續下去吧。

家庭的发展是为所有权的发展所决定的，——日罗·台龙說，——并且更加上說，一般地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与人类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变化符合的。讀者大概自己亦感觉到日罗·台龙用着完全不确的名詞吧：在他那里“所有权”的概念是为“經濟生活状态”的概念掩盖着。可是权利是权利，經濟是經濟，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是不行的啊。某种所有权从哪里来的呢？也許，它是在某一社会的經濟的影响下产生的（公民权利永远只是經濟关系的表現。——拉薩尔），然而也許它是由于完全另一种原因产生的。这

里應該繼續分析，而不是正在它獲得特別深刻的和最生動有趣的時機打斷它。

我們已經看到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家對於所有權的起源這一問題沒有找到滿意的回答。卡列也夫先生在其論文：《歷史上的經濟唯物主義》中提到法學的德國歷史學派。我們亦不妨提一提這派的觀點。

我們的教授（指卡列也夫。——譯者）關於這派曾這樣說：“在本世紀之初在德國產生了所謂‘法學歷史派’⁴⁴⁴，它們開始把法權不看做是法律規範的不變體系（如以前的法律家是這樣看的），而看做是運動着、變化着、發展着的东西，在這時候，在這派之中暴露了有力的傾向，把對法權的歷史觀點認為是唯一的和絕對正確的观点而與在這領域內所有其他的可能的觀點對立：歷史觀點從來不允許適用於一切時代的科學真理的存在（即在新科學上稱為一般規律的东西），而且直接否認這些規律，而跟着這，並在法權依存於地方條件的思想的名義下否認了法學的一般理論——當然，依存是到處和永遠存在着的，可是它並不排除為一切民族所共同的原則。”^①

在這不多的几行中，有着很多……——怎麼說呢——我們就說不正確性吧，法學歷史派的代表們和擁護者們將起來抗議這種不正確性。例如，他們將說，當卡列也夫先生以否認“那在近代科學上稱為一般規律的东西”加之於他們頭上的時候，那末他（指卡列也夫。——譯者）或者有意地曲解他們的觀點，或者是對於“歷史哲學家”說來是最不光榮的對不同概念的混淆，就是把那些屬於歷史和法權研究範圍內的“規律”和那些決定諸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

^① 《歐洲通報》，1894年7月，第12頁。

混淆起来；后一类规律的存在，法学历史派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否认它，它正是力图找到这样的规律，虽然它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可是它的失败的原因，本身便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而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费些力气想一想这个原因，那末——谁知道呢？——也许他，最后会懂得什么是“历史过程的本质”。

在十八世纪曾倾向于以“立法者”的行动来解释法学史。历史学派坚决地起来反对这种倾向。萨文尼在1814年就这样地制定了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总和归结为：任何法权产生于（按一般应用的而非完全确切的用语）所谓习惯法，即它开始为人民的习惯和信仰所产生，然后才为法律家产生；这样，它到处为内部的看不见的力量所创造的，而不是为立法者的自由意志所创造的。”①

这个观点萨文尼后来在自己的著名的著作《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现代罗马法体系》）更加以发展了。“肯定法——他在这本书里说——生活于人民的一般意识中，因此，我们亦可称之为人民法……可是这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法为人民的个别成员照其自由意志创造的……肯定法是人民的精神所创造的，这种精神生活于和作用于它的个别成员，因此肯定法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是在各个个别的人的意识中的同一的法。”②

“假如我们——他继续说——提到国家的起源的问题，那末，我们应该同样程度地力图以最高度的必然性，内部构成力的作用来解释它，正如一般地解释法的起源一样；而且我们说这个不仅一般地关于国家的存

①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von 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3te. Aufl., Heidelberg 1840, S. 14.（萨文尼：《论我们时代对立法和法学的使命》，第3版，海德堡，1840年，第14页。）（1814年，第1版）

② 同上书，第14—15页（1840年柏林版）。

在，而且亦关于国家在各个个别民族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①

法权象語言一样是“不知不觉地”产生的，它生活在一般人民的意識中，不是作为“抽象的規則，而是作为在其有机联系中的法权制度的活的表象，当必要性出现的时候，经过某些人为的过程 (durch einen Künstlichen Prozess) 从这个一般的表象中，抽象的規則在其邏輯的形式中分离了出来。”②

我們在这里不必提到历史法学派的实际的意图；至于它的理論，那末根据上引的薩文尼的話，我們可以說，这理論是：

(一)对于流行于十八世紀的观点：法是为个别的人的自由意志所創造的这一观点的反动；企图替法权史找到科学的解释，理解法权的历史为必然的，并因此是規律性的过程。

(二)企图从完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个过程：“人民的精神”，“人民的意識”是历史法学派上訴的最高法院。

在普赫特那里，这一学派的唯心的性質表現得更尖銳。

在普赫特那里，正如和在薩文尼那里一样，原始法是习惯法。可是习惯法怎样产生的呢？人們常常說出这种意見：即习惯法为生活的实践 (Uebung) 所創造的，可是这只是对于人民概念的来源的唯物主义观点的部分的情形，“正确的恰恰是相反的观点：生活的实践只是最后的契机，其中表现了和体现了已經产生了的、生活于某个民族的子孙們的信念中的法权。习惯之影响于信念只在这个意味上，即由于它，信念成为更自觉的和更牢固的。”③

①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Von D.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3te. Aufl, Heidelberg 1840, S. 22. (薩文尼：《論我們时代对立法和法学的使命》，第3版，海丁堡，1840年，第22頁。)

② 同上書，第16頁。

③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Erster Band, Leipzig 1841, S. 31. (《法制概論》，第1卷，萊比錫，1841年，第31頁。)—在附注中普赫特很有力地反对企图調和

这样，人们关于这种或那种法权制度的信念是不依赖于生活的实践，早于“习惯”造成的。究竟这个信念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人民精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某一民族的这个信念的特定的构成，是以某一民族的精神的特点来解释的。这是非常灰暗的，灰暗得连科学解释的标志也没有。普赫特自己亦觉得事情不大顺当，而企图以如下的议论来改正它：“法是不知不觉地产生的。谁能够担负起追踪那引导某一信念的产生、萌芽、发展、繁荣、出现的道路呢？那些企图从事于此的人们，大部分是从错误的观念出发的。”^④“大部分……”。就是说，也有这样的研究者，他们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些人关于人民法的产生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设想，这对于普赫特还是一个秘密，因为他并没有走出无内容地援引人民精神的属性之外一步。

这是上引的萨文尼的议论，即法生活在一般国民的意识中不是作为抽象的规则，而“是作为在其有机联系中的法权制度的活的表象”。亦丝毫也没有解释什么。而且不难理解，什么东西迫使萨文尼给我们作这几句混乱的报导。假如我们假定法“作为抽象的规则”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那末这便，第一，我们将与法学家的“一般意识”冲突，法学家很好地知道，人民是如何地难于把捉这些抽象的规则；而，第二，我们的法权产生论将带有难于置信的外表。即在参加任何一种彼此之间的实践关系之前，在获得任何一种生活的经验之前，组成特定民族的人们应该先行制定一定的诸概念，正如旅行者准备干粮一样，然后再放入生活实践的领域中

法的起源的对立的观点的折衷论者，一看他的反对语调，不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他难道已经预见卡列也夫先生的出现了吗？可是另一方面，也应该说，在普赫特时代，在德国本国的折衷论也够多的了，不论怎样，这类聪明人是到处和永远有的。

^④ 《Cursus der Institutionen》，Erster Band, Leipzig 1841, S. 28.（《法制概论》，第1卷，莱比锡，1841年，第28页。）

去，走上历史的旅程。这，显然是誰也不会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薩文尼排斥“抽象的規則”：法存在于国民意識中不是作为一定的概念，它不是已經結晶了的結晶体的集合，而多少是飽和溶液，而“当必要性出現的时候”，即当与生活实践接触的时候，就从这种溶液中发生沉淀而成为所需要的法制的結晶体。这种手段不是沒有自己的机智的成份的，可是显然，它絲毫也不能使我們接近于科学地理解現象。

举例來說。

按林克的話來說，在愛斯基摩人中差不多沒有正常的所有权；可是可以算做所有权的，他計算有三种：

“（一）屬於几个家庭的联合的財產，例如，冬季住屋……”

（二）屬於一个或者至多三个血緣家庭的財產，例如夏季的帳幕及一切屬於家計的用品，如灯、桶、木盆、石壺等等；用以運載所有这些东西及帳幕，犬拖橈等等的小船或大皮船，最后冬季的粮食貯藏……

（三）各人的私产……衣服、武器和工具，或者一切为个人使用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上甚至加上与其所有者之間的神秘的联系，好似精神和肉体之間的联系一样。把这些东西借給任何別的人是不合习惯的。”^①

我們試从旧的法学历史派的观点上来設想一下这三种所有权形态的起源。

因为，照普赫特的話，信念是先于生活的实践而存在的，而不是在习惯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那末就應該設想：事情是这样地发生的：愛斯基摩人在住在冬季的居屋以前，在开始建筑冬屋以前，就达到了既然他們要設置冬屋，那末它便應該屬於几个家庭的联合的信念。同样的，我們的未开化人先有着这样的信念：既然要設

^① 《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by Dr. Henry Rink, p. p. 9 and 30.（《愛斯基摩人的傳說和傳統》，林克博士，第9及30頁。）

置夏季的帐幕、桶、木盆、小船、壶、橈和狗，那末所有这些都應該成为一个或者至多三个血緣家庭的财产。最后，他們对于衣服、工具和武器應該成为个人的财产和甚至不應該将这些东西借給別人也有同样坚固的信念。除此以外，大概，所有这些“信念”不是在抽象的規律的形态中存在的，而是作为“在有机联系中的法权制度的活的表象”而存在的，而从这个法权概念的溶液中，后来——“当必要性出現的时候”——即按其于冬屋、夏帐、桶、石壶、木盆、小船、橈和狗接触时，沉淀为在其或多或少“邏輯形式上”的爱斯基摩人的习惯法的規律。而上述法权溶液的性質則为爱斯基摩精神的神秘的性質所决定的。

这完全不是科学的解释；这是（照德国人的說法）空洞的 Redensarten（廢話）。

那为法学历史派所支持的变态的唯心主义，在解释社会現象上，較之謝林和黑格尔的更深刻的唯心主义，愈加站不住。

科学怎样走出唯心主义所陷入的死巷呢？我們来听一听現代比較法学的著名的代表之一——柯瓦列夫斯基的話吧：

在指出原始部落的社会生活状态带着共产主义的烙印之后，柯瓦列夫斯基先生（伏·伏·先生請听呵，这位亦是“教授”呵！）說：

“假如我們問一問自己关于这种秩序的真实的基礎，假如我們想知道那逼迫我們的原始的祖先及現代未开化人保持多少明显地表現着的共产主义的原因时，那末我們便特別應該知道原始的生产方式。因为財富的分配和消費應該为財富的創造方式决定的。而关于这一点，人种学就这样說：在狩猎民族和捕魚民族那里，食品的謀得通常是用大的集团（en hordes）来进行的。在澳洲，猎取袋鼠是由几十个甚或几百个土人的武装队伍来进行的。在北方的国度中，在猎取鹿的时候亦是同样

的……無疑的，人不能孤獨地維持自己的生存；他需要援助和幫助，而聯合十倍地加強他的力量……這樣我們便看到了在社會發展開始時的社會生產及作為它的必然的天然結果的社會消費。人種學上證明這點的事實異常豐富。”^①

在提到列爾明涅⁴⁴⁵的唯心主義的理論即私有財產是由個人的自我意識中產生的之後，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繼續說：

“不，這不是這樣的。原始人的達到關於個人占有其用作武器之尖石或用以遮身之獸皮的思想不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之達到這個思想是因為在物件的生產上應用了自己個人的力量。他用來作斧頭之用的石片是他用自己的雙手磨尖的。在他和他的無數同伴們一起從事的狩獵中，他給了野獸以最後的打擊，因而這只野獸的皮成了他的個人的財產。未開化人的習慣法在這一點上是有極大的確切性的。它小心地預先規定着，例如這種情形，即被追逐着的野獸落於兩個獵者的共同打擊下，在這種情形下，獸皮給那個他的箭射得更近於心的獵者。未開化人的習慣法更預先規定在這種情形下怎麼辦，即負傷的獸為偶然碰到的獵人所捕獲。個人勞動的使用，因之，亦便邏輯地產生個人的占有。我們可以經過全部歷史追蹤這個現象。誰種了果樹，果樹便成為他的私產……以後，獲得捕獲品的武人成為這捕獲人的絕對的所有者，而他的家庭對它已經沒有任何權力；正如祭司的家庭對信徒供奉的犧牲品亦沒有任何權力，它成為他的個人的私產一樣。所有這些，為印度的法律，南部斯拉夫人、頓河哥薩克人、或古代愛爾蘭人的習慣法所同等地証實了的。而重要的正是對於這種占有的真正的原則不要弄錯了，這種占有是在獲得某一對象上使用個人的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在除個人的努力外再加其親近

^① M. Kovalevsky, *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 pp. 52—53. (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權的發生和進化的圖畫》，斯德哥爾摩，1890年，第52—53頁。)在已故的齊別爾：《原始經濟文化概述》中，讀者可以找到許多例子，最清楚地指明：占有方式為生產方式所決定的。

的人的帮助时……那末获得的对象就不成为私产了。”①

在上述一切之后就可以理解，首先成为个人占有的对象的是武器、衣服、食品、装饰品等等。“在开始饲养家畜时——狗、马、猫、役畜就成为个人和家庭占有的最重要的基金……”②可是生产的组织继续影响占有方式到何种程度，例如可用下述事实来表明：爱斯基摩人去捕鲸是坐大船，大队人去的；为这个目的用的船是公有财产；而那用以搬运家庭财产的小船则属于个别的家庭或“至多——三个血缘的家庭”。

从农业出现之后，土地亦成了占有的对象。或大或小的血缘联合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怎样解释它的起源呢？“我们以为——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原因就在那个在某个时候引起了占有大部分动产的社会生产中。”③

不必说，在一经产生之后，私有财产就和更古老的社会占有方式发生矛盾。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对于“个人的努力”日益广大的园地的地方，社会所有权很快地消逝了或者在所谓残存制度的形态下继续存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原始公共所有权分解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按其天然的、物质的必然性应该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现在只指出现代法学的一般结论：法权概念——即普赫特说的信念——到处是为生产方式决定的。

谢林在某时候曾经说过：磁力现象应该理解为“主观”之侵入“客观”。为法权史找寻唯心主义解释的一切企图不过是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的补充，“Seitenstück”。这些都不过是有时是光辉的、

① M. Kovalevsky, 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 Stockholm 1890, p. 95. (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和所有权的发生和进化的图画》，斯德哥尔摩，1890年，第95页。)

② Ibid. p. 57. (同上书，第57页。)

③ Ibid. p. 93. (同上书，第93页。)

机智的、但是永远是任意的、永远是无根据的、关于自滿自足的自我发展着的精神的这一题目的議論。

法权的信念就因下面这一原因而不能先于生活的实践，即如果它不是从生活的实践中产生，那末它的出現便毫无原因。爱斯基摩人贊成个人占有衣服、武器和劳动工具，只是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即这种占有更为方便，并且事物的本身的性質就暗示了它。为着学会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武器、自己的弓箭和飞枪，原始的猎人应得使自己适应于它，好好地研究它的各个的特点以及尽可能使它适应于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的特性^①。私有财产在这里較之其他任何占有形态来得更方便，因此未开化人“信服了”它的好处；如我們所知，他甚至給个人劳动的工具和武器与其所有者之間加上了神秘的联系。可是他的信念是在生活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先于它而存在的，而其起源不是由于他的“精神”的屬性，而是由于他与之相关的事物的屬性及那在他的生产力的目前状况中对于他是必然的生产方式的性質。

① 大家知道：在一切原始部族內，在猎人和武器之間存在着密切的关系。“Der Jäger darf sich keiner fremden Waffen bedienen”（“猎人不应使用任何别人的武器”）——馬尔茨烏斯关于巴西的原始居民曾这样說，并且馬上就解释这些未开化人从什么地方得来这个“信念”的：“Besonders behaupten diejenigen Wilden, die mit dem Blasrohr schießen, dass dieses Geschoss durch den Gebrauch eines Fremden verdorben werde, und geben es nicht aus ihren Händen”.（《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München 1832, S. 50）“特别那些以吹管射击野兽的未开化人确信，如果这武器为别地方人一用就会损坏的，所以他們不使它离开自己的手。”（《在巴西土人中的法权关系》，慕尼黑，1832年，第50頁）

“Die Führung dieser Waffen erfordert eine grosse Geschicklichkeit und beständige Uebung. Wo sie bei Wilden Völkern im Gebrauche sind, berichten uns die Reisenden, dass schon die Knaben sich mit Kindergeräten im Schiessen üben”.（Oskar Peschel, Völkerkunde, Leipzig 1875, S. 190）“使用这些武器（弓与箭）需要很好的技巧和經常的練習。旅行家告訴我們，在武器为未开化人使用的地方，小孩子已經用兒童的武器練習射击。”（别舍尔：《民族學》，萊比錫，1875年，第190頁）

生活的实践先于法的“信念”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原始法中存在着许多象征的动作看出来。生产方式变化了，跟着它，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互相关系亦变化了，而“信念”保存着自己旧时的面貌。它和新的实践矛盾，而这便产生了虚拟，象征的记号、动作，它的基本目的就在形式地排除这个矛盾。跟着时间的流转，最后，矛盾根本地被排除了；在新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法的信念。

为决定私有财产制度的性质，仅仅指出在特定的社会中对于这件或那件对象的私有财产的出现还是不够的。私有财产永远有着界限，这界限完全为社会的经济所决定的。“在未开化状态中，人只占有直接于他有用的事物。剩余品，虽然是以他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他普通是无代价地让给别人的一——家庭或氏族或部族的成员”——柯瓦列夫斯基先生说。林克关于爱斯基摩人所说的亦是完全一样的⁴⁴⁶。在未开化人民中这种秩序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按柯瓦列夫斯基先生的话，它的产生是因为未开化人不知道贮藏。这个不十分显明的用语，特别因为庸俗经济学者的滥用而显得不妥当。然而我们的作者在什么意义上用这个词倒是很明白的。“贮藏”真的是为原始人民所不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方便，也就是说，不可能实行贮藏。被打死的野兽的肉只能在极小的程度上“贮藏”起来，肉要坏的，坏了以后就完全不能用了。当然，如果可以出卖的话，那末把卖来的钱“贮藏”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货币还没有存在。因之，原始社会的经济，本身便给“贮藏”精神的发展以极狭窄的范围。此外，我今天幸而打死了一只大的野兽，我将它的肉分给别人，而明天（狩猎是靠不住的事）我空手回来而本族的别的成员分肉给我。这样，分肉的习惯就类似一种互相保险，不如此，狩猎部族的生存将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后，不应该忘记，在这种部族中，私有财产还只在萌芽状态中，社

会所有权还占着优势；在这个基础上产生起来的习俗和习惯反过来限制个人私有者的任意。在这里信念亦是跟着经济的。

下面这个例子（它为罗伯图斯所爱好和常常引用于其著作中的）亦很好地说明了：人们的法的概念和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之间的联系。大家知道：古罗马的著作家们猛烈地反对高利贷。罗马的法官卡通认为高利贷者比小偷坏二倍（老头子〔指罗伯图斯。——译者〕亦说，等于二倍）。在这点上基督教会的神父和世俗的著作家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值得注意的事！——两者都反对货币资本所生的利息。他们对现物借贷及由现物借贷所生的暴利却温和得多。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因为正是货币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惹起了当时社会中的可怖的破坏，因为正是它“毁灭了意大利”。就在这里法的“信念”亦是和经济并肩同进的。

“法是必然性（或者更确切些说，需要）的纯粹的产物，——波斯特说，——如果我们法中间去找寻任何理想的基础，那将是一件徒劳的事。”^① 假如这位作家不表现其很多和（按其结果说）很有害的概念的混乱的话，那末，我们将说，这是完全适合于现代法学的精神的。

一般地说，任何社会联合都力图制定那最好地适合它的需要的、那在当时对它最有益的法的体系。法制的特定的总和对社会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一种或任何一人的“理想”：如我们所知，它们取决于生产的方式及由这个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意义上法没有亦不能有理想的基础，因为它的基础永远是现实的。可是任何特定的法的体系的现

^① 《Der Ursprung des Rechts. Prolegomena zu einer allgemeinen Vergleichenden Rechtswissenschaft》， von Dr. Alb. Herm. Post. Oldenburg 1876. (波斯特：《法的起源。比较法学引言》，奥登堡，1876年。)

实基础并不排除特定的社会成员方面对这法制抱有理想的态度。整个地说，社会从其成员的这种态度中只会得到好处。相反地，在过渡时代，当现存于社会中的法的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它的由于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而增长起来的需要时，则居民的先进部分可能而且应该将更适合于“时代精神”的法制的新体系理想化。法国的典籍充满了这类将新的刚到来的事物的秩序理想化的例子。

只有在那些习惯于将需要归之于粗野的物质领域的并把这个领域和“纯粹的”、敌视任何需要的“精神”对立的人们的观念中，法的从“需要”中产生才排除法的“理想的”基础。实际上，只有有益于人们的东西才是“理想的东西”，而任何社会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时，仅仅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指导。这个无可争辩的一般规律的表面上的例外，其解释是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它的理想常常落后于它的新的需要^①。

社会关系取决于生产力状况的意识，不管许多学者的不可避免的折衷论，不管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成见，还是日益深入于现代社会科学中。“正如比较解剖学将拉丁的谚语：‘睹爪知狸’提高到科学真理的程度一样，人类学可以从某一民族的武装上确切地断定其文明的程度”，——我们在上面已经引过的奥斯卡尔·别舍尔说^②——……“社会的分化是和食品的谋得方法密切联结着的。在人与人联结着的一切地方便出现某种权力。在巴西的狩猎人群中

^① 波斯特正是属于还远没有和唯心主义绝缘的人们之中的。例如，在他那里，氏族联合适合于狩猎和游牧生活；而跟着农业和与此相联系的定居生活的出现，氏族联合就位于“Gaugenossenschaft”（我们可说：“邻居公社”）。显然，他不是在任何东西上，而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找寻解释社会关系发展史的钥匙。在各个个别情况下波斯特差不多是永远忠实于这个方向的。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把“im Menschen schaffendewigen Geist”（“生活于人身上的永远的创造精神”）看做是法的历史的基本原因。这个人好象是为了使得卡列也夫先生欢喜而特意地被创造出来的。

社会的联结最薄弱……游牧部族大都处于家长領主的权力下，因为畜群普通是属于一个主人的，他的同族人或者以前独立的，后来贫困了的畜群主則侍奉他。游牧生活极大部分（虽然不是绝对的）是以大的人民的移动为其特征的，如在旧大陆的北部或南非洲；相反地，美国的历史則只知道未开化狩猎部族对于引起他們兴味的文明民族的田野的个别的袭击。抛弃了以前的居住場所的整个民族，只有在带着自己的畜群时，才能作大的长期的移动，畜群是他們在路上的必要的食品。此外草原畜牧本身亦引起畜場的变更。跟定居生活和农业一起馬上便出现了使用奴隶劳动的企图……奴隶制早晚要引导到暴虐政治，因为誰有最大数目的奴隶，他便可以借奴隶之助来使較弱的人服从其意志……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分是社会等級区分的开端。”③

別舍尔有許多这类的議論。其中一些是正确的和很可引以為訓的；另一些則不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人可以加以爭辯的。可是对于我們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部分的情形，而是別舍尔思想的一般方向。而这个一般方向則与我們在柯瓦列夫斯基先生那里所已經看到的完全相符的：他在生产方式上，在生产力状态上寻找法权史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解释。

而这正是馬克思早已迫切地劝告社会科学的人物去做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經濟学批判》）的著名的序言的意义在极大部分上亦是，虽然不完全是（讀者在下面

② L. c., p. 139.（《法的起源。比較法学引言》，第139頁）——當我們摘引这段时，我們想象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他的座位上很快地站了起来，叫道：“我可以爭辯这点：中国人可以用英国的枪械武装着。是否可以根据这些步枪来論断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呢？”很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英国的枪械来論断中国的文明是不合邏輯的；而它却正應該用以論断英国的文明。

③ L. c., pp. 252—253.（前引書，第252—253頁。）

可以看到，为什么我們說，不完全是）在这点上。这一序言在俄国遇到极大的不幸，讀过它的原文或摘引的大部分俄国著作家是如此可怖和可惊地不理解它。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本身意志为轉移的关系——符合于他們的物質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阶段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組成社会的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賴以树立起来的现实基础。”⁴⁴⁷

黑格尔論謝林說，在这位哲学家那里，体系的基本論点是沒有加以发展的，而絕對精神則是突然而来的，如手枪的发射一样（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当中等的俄国知識分子听到在馬克思那里“一切归結于經濟的基础”（有些人简单地說，“归之經濟的东西”），他惶惑莫名，好象在他耳朵旁边手枪突然地发射一样，“呵，究竟为什么归之經濟的东西呢？”——他在煩惱和狐疑中問道。“不容說，經濟的是重要的（特別对于貧农和工人），但是智能的东西亦是同样重要的啊（特別对于我們，对于知識分子）。”我們希望上面叙述可以向讀者表明，俄国的中等知識分子的疑惑之所以发生，在这里只是由于他——知識分子对于他的“智能的东西”說来“特別重要的东西”多少不大关心的緣故。当馬克思說：“公民社会的解剖應該在它的經濟中去找尋”时，他完全不想以突然的射击来扰乱学术界：他只是給了在整世紀中煩惱着思想家的头脑的“可厌的問題”以直接的和确切的回答。

法国唯物主义者彻底地发展自己的感觉論的观点时，达到这个結論，即人及其所有的思想、感觉和意图乃是他的周围环境的产物。为着进一步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到論人的学說上去，那末便應該解决这个問題，即究竟什么制約着社会环境的結構和它的发展的規律是怎样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沒有能够回答这个問題，这

便迫得他們自己背叛自己，回到旧的、為他們自己所如此厉害地斥責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去：他們說，環境是人們的“意見”所創造的。不滿足於這個表面的回答，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家在自己面前提出了分析社會環境的目的。他們的分析的結果，便是那個對於科學極重要的結論：即政治憲法的根源在社會關係中，而社會關係是為所有權的狀態決定的。跟這個結論一起在科學面前產生了非解決它便不能前進的新問題：所有權狀態究竟是取決於什麼東西呢？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家沒有力量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迫得以什麼也不能解釋的關於人的天性的性質的議論來迴避它。與他們同時生活着的德國的偉大的唯心主義者——謝林和黑格爾已經很好地理解人性觀點的不能令人滿意的性質。黑格爾辛辣地嘲笑了這種觀點。他們了解了解釋人類歷史運動的鑰匙應該在人性以外去找。這是他們的極大的功績，可是要使這個功績對於科學有完全的效用就應指明，究竟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找尋這個鑰匙。他們在精神的屬性中，在絕對理念之邏輯的發展規律中去尋找它。這是偉大的唯心主義者的根本錯誤，使他們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回到人性的觀點，因為正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絕對精神只不過是我們思維的邏輯過程的人格化。馬克思的天才的發現糾正了唯心主義的這個根本錯誤，這便給了唯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所有權的狀況，以及跟着它，社會環境的全部性質（在關於唯心主義哲學的一章中我們已經看見了，就是黑格爾也被迫地承認“所有權狀態”的決定的意義）不是為絕對精神的屬性，不是為人性的性質所決定的，決定它的是“在自己生活的生產的社會過程”中、即在爭取生存的鬥爭中人們彼此之間必然發生的互相關系。人們常常將馬克思和達爾文比擬，這種比擬在米海洛夫斯基、卡列也夫及其弟兄們看來是可笑的。下面我們將說到應該在什麼意義上理解這種比

拟，虽然，大概即使我們不說，許多讀者也已經看到这点了；現在我們且不來觸犯我們主觀思想家的情感，而作另一个比拟。

在哥白尼以前，天文学教导道：地球是不动的中心，太阳以及其他的星球圍繞着地球旋轉。用这种观点不能解释許多天文現象。天才的波兰人（哥白尼。——譯者）从完全相反的方面去接近問題，他假定，不是太阳繞着地球而轉，而是地球繞着太阳轉，于是正确的观点便找到了，許多在哥白尼以前不明白的事情明白了。——在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上的人物曾从人性的概念出发；由于这，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問題沒有能够得到解决。馬克思的学說給了这件事以完全不同的面貌。馬克思說，当人为着保持自己的生存而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时，他改变了自已本身的天性⁴⁴⁸。因之，科学地解释历史发展的事业應該从相反的一端开始；應該弄清楚，这个人对外間自然生产作用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按其科学的重要性說来，这个发现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实在說来，馬克思以前的社会科学較之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更沒有坚固的基础。法国人过去和現在都称与人类社会有关的科学为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道德的和政治的科学）以与“*sciences*”这个詞的原来意义上的“科学”相区别，只有后者才被認為是唯一确切的科学。而且應該承認：在馬克思以前社会科学沒有能够而且亦不能够成为确切的科学。当学者以人性为最高級的审判官时，他們必然地應該用人們的观点、他們的意識的活动来解释社会現象；可是意識的活动乃是人的这样一种活动，它必然被他認為是自由的活动。自由的活动排斥着关于必然性的、即規律性的概念，而規律性乃是任何科学地解释現象的必要的基础。关于自由的表象遮蔽了关于必然性的概念，这便妨害了科学的发展。

这种錯誤直到現在还可以在俄国的“主觀的”作家們的“社会学的”著作中，以惊人的鮮明性看到。

可是我們已經知道：自由應該成为必然。当遮蔽了关于必然性的概念时，关于自由的表象本身亦被弄得极端朦朧和很少可以慰藉的了。从門里赶出去的必然性从窗里飞进来了。从关于自由的表象出发，研究者每分鐘都碰到必然性；归根結底不得不承認必然性的定命的、不可克服的、什么也无法阻挠的作用。他們吃惊地看到，自由成了盲目的必然性手中的永远的、无助的和无望的奴僕，无力的玩具。那最明晰的，最高尙的唯心主义的头脑所常常感受到的苦悶，真是令人感动。“已經几星期了——乔治·毕希納写道——我每分鐘都握着笔可是不能写一个字。我研究了革命的历史，我感觉自己好象是被历史的可怕的宿命論压倒似的。我在人的天性中看到可厌的平凡性，而在人的关系中看到不可克服的力量，这种力量一般地屬於一切的人，而部分地說来則不屬於任何人。个别人物只是浪潮表面上的泡沫，伟大只是偶然，天才的权力只是傀儡笑剧，反对铁的規律是可笑的企图；这种铁的規律在最好的情况下亦只能認識它，可是不能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的。”^① 可以說，就是为着避免这种完全当然的苦悶的发作，亦就需要即使暂时地放弃旧观点和試圖放弃自由，而乞援于那嘲弄自由的必然性；應該更一次地檢討唯心主义的辯証論者所已經提出来的了的問題：即自由是否是从必然中产生的，后者是否是人类自由不可避免的条件的唯一巩固的基础，唯一坚固的保證。

我們将会看到馬克思的这类企图得到什么結果。但我們先想

^① 在給未婚妻的信中，該信写于1833年。449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的附注；这不是那宣传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毕希納；这是他的早死的哥哥，是著名的悲剧《丹東之死》的作者。

弄清楚他的历史观点，以便在这上面不再留着任何误解。

在特定的生产力状态的基础上构成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关系在人们的法权概念中，在或多或少“抽象的规则”中，在不成文的习惯和成文的法律中得到自己的观念的表现。我们已经有必要来证明这点了；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法学已经替我们证明了这点（请读者记着：柯瓦列夫斯基先生关于这点所说的话）。可是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看这件事，即从下述这一方面。既然，我们弄清楚了人们的法权概念是怎样地为他们的生产关系所创造的，那末我们对于马克思的下面的话就不会吃惊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即他们的社会生存的形式），而是相反地，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对于意识的一个领域，这真是这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只是：这是否永远是这样，如果是的，为什么会永远是这样？暂时我们还只讲法权概念。

“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的—定的阶段上就和生产关系——或用法律的语言说：所有权关系——发生矛盾，而生产力在此以前是在这些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这些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它的发展的障碍。这时候社会变革的时代就来到了。”

对于动产和不动产的社会所有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它对于原始生产的过程是方便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支持着原始社会的生存；它促进了原始社会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而人们拥护它，他们认为它是天然的和必然的。可是，由于所有权的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生产力发展到这样，即开辟了使用个人努力的更广大的园地。现在社会的所有权在某些情形下成为对于社会有害的了，它阻碍着它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因此它让位给私人的占有；在社会的法权制度中完成多少迅速的变革。这个变革必然地伴同

着人們的法权概念的变革。以前以为只有社会所有权才是好的的人們，現在則認為在某些情形下私人的占有更好些。附帶地說，我們說得不确切，我們描写为两个单独的过程的东西，乃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它只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應該改变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的关系，而这些新的实际的关系表現于新的法权概念中。

卡列也夫先生告訴我們說：在应用于历史上时，唯物主义是和唯心主义同等地片面的。按他的意見，两者都只是在完全的科学真理发展上的“契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契机之后，第三个契机應該到来了，命題与反命題的片面性将在合命題中找得自己的应用，合命題是完全的真理。”^①这将是异常有趣的合命題。“这个合命題在哪里——我暂时不去說它。”可惜！所幸我們的“历史哲学家”不很严格地遵守自己給自己訂定的沉默之戒。他立刻使人們懂得，这完全的科学真理在哪里和从哪里来的，这个完全的科学真理，慢慢地会为全体受教育的人类所理解，而暂时还仅仅只有卡列也夫先生知道。它是从如下的議論中产生的：“每一个人，有肉体和精神，进行两重生活——生理的和心理的生活，在我們面前不仅仅是血肉及其物質需要，亦不仅仅是精神及其智慧和道德的需要。不論人的肉体以及人的精神都有自己的需要，找寻自己的滿足而将各个人安置于对外部世界（即对自然和別的人們，亦即对社会）的不同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有着两重的种类。”^②

人有精神和肉体，这个合命題是公允的，虽然已經不是很新的了。如果教授先生熟知近代哲学史，那末，他應該知道，关于这个合命題，近代哲学史在一世紀之間已經說得舌敝唇焦了，虽然，它

① 《欧洲通报》，1894年7月，第6頁。

② 同上，第7頁。

并没有能够适当地处理这个合命题。如果他幻想，这个“合命题”会给他开启“历史过程的本質”的话，那末即伏·伏·先生自己也会同意，他的教授碰着了一些不大顺手的事，而那个应该成为“历史哲学的”斯宾诺莎的将不会是卡列也夫先生。

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引起人们的互相关系的变化了的生产力一經发展，一切所有权的关系也就随之而改变。可是基佐就早已向我们说过：政治宪法的根源在所有权关系中。这为近代科学所完全证实了。血緣联合之讓位于区域联合正是由于在所有权关系中发生的变化。多少巨大的区域联合混合成为所谓国家这种机构亦是由于在所有权关系中发生了的变化或由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新的需要。这点，例如对于东方的大国家是已經很好地弄清楚了①。对于古代国家亦同样很好地弄清楚了②。而且一般地不难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都把它証明出来，只要我們关于这个国家的发生有充分的材料。在这里需要的只是不要有意地或无意地局限馬克思的观点。我們所想說的是下面的話。

特定的生产力状态制約着特定社会的内部关系。可是这个生产力状态亦制約着他对其他社会的外部的关系。在这些外部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了新的需要，为着满足这些需要生长了新的机关。在膚浅地观察問題的时候，各个社会之間的互相关系曾被看作是許多与經濟沒有直接关系的“政治的”活动。实际上，在社会之間的关系的基础上的正是經濟，經濟决定着族际关系和国际关

① 参閱去世的梅契尼柯夫的关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書 450。在这本書中，作者实在說来只不过总结了最有权威的历史专家，例如列諾尔曼所已經得出的結論。爱丽查·莱克留在該書的序言中說：梅契尼柯夫的观点在科学史上划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說話是不正确的，即这个观点不是新的观点；黑格尔就已最肯定地說过这种观点。可是无疑地，如果科学能够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則获益甚多。

② 参閱摩尔根的書：《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書：《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系的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外部的)动因及其結果。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有着自己的武装的体系,自己的軍事策略,自己的外交,自己的国际法。当然可以指出許多次数的国际冲突是和經濟沒有直接关系的。而且馬克思的信徒之中,誰也沒有想否認这种情形的存在。他們只是說:你不要停留在現象的表面上,要更深入下去,并試問自己,特定的国际法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这类国际冲突的可能是由什么造成的?——那末你归根結底将歸結到經濟。是的,各个个别情况的研究有着这样一个困难,即:参加于斗争中的常常有正經歷着經濟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社会。

可是,在这里我們的聰明的論敌們异口同声地打断我們的話:“好,——他們叫道——就算,政治关系在經濟关系中有其根源。可是,既然有了政治关系,它們——不管从哪里来的——便会反过来影响經濟。因此,这里有着互相作用而且除了互相作用外沒有別的。”

这个反对意見不是我們臆想出来的。下述的“真正来源”可以指明“經濟唯物主义”的論敌們对于这种意見是如何的宝贵。

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引用着指明英国貴族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謀取土地占有上的利益的事实。保尔·巴尔特博士,他曾在《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的題目下写了一篇《批判的經驗》的,捉住了这点,来責备馬克思自相矛盾⁴⁵¹。你自己也承認在这里有互相作用啊;而为着証明真的有互相作用,我們的博士应用了斯特恩涅格的書,斯特恩涅格是对于德国經濟史的研究貢獻頗多的一位著作家。卡列也夫先生以为:“巴尔特的書中关于批判經濟唯物主义的几頁,可以指出来作为应该如何解决經濟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問題的模范。”当然,他不会忘掉告訴讀者,巴尔特的意見

和殷納馬·斯特恩涅格的威权的声明：“斯特恩涅格甚至制定了这样一个一般的命题，即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相作用乃是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发展的基本点。”应该稍为弄清楚一下这个混乱。

第一，到底殷納馬·斯特恩涅格说了些什么呢？关于加洛林时代的德国经济史他指出：“组成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发展的基本点的政治和经济间的互相作用，在这里可以最确切地看到。落在某一民族身上的政治作用，给它的力量的往前发展和它的社会制度的构成以决定的影响；同样地，某一民族所固有的内部的力及其发展的天然的规律决定着它的政治活动的程度和种类。加洛林时代的政治体系之影响于当时人民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并不比人民的自发力量和它的经济生活之影响于这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给这个体系印上自己的烙印）来得小。”^①就是这几句话。这并不多，可是这不多的几句被认为足以推翻马克思了。

第二，我们现在看一看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法权和政治的关系说了些什么？

“法权的和政治的制度是在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互相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一定的時間以前，这些制度促进着人民的生产力的往前发展，它的经济生活的繁荣。”

这是马克思的确切的话；而我们问一问第一个碰到的无所偏爱的人，在这些话中有没有否认政治关系在经济发展上的意义呢？那些告诉他关于这个意义的人是否推翻了马克思呢？难道不是马克思连这种否认的影子也没有，而上述的人什么也没有推翻吗？认为问题不是在推翻了马克思与否，而是在为什么这样不懂马克思——

^①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ingenperiode》，Leipzig, 1889. Band I. S. S. 233—234.（《加洛林时代末期之前的德国经济》，莱比锡，1889年，第1卷，第233—234页。）

这难道不对嗎？而对于这个问题，我們只能以法国的俗話来回答：“la plus belle fille du mond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①。馬克思的批判家不能逾越那良善的天性所給他的理解的限度^②。

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相作用是有的。这是無疑的，正如卡列也夫先生之不理解馬克思一样地無疑。但是互相作用之存在是否禁止我們更进一步去分析社会生活呢？不，如果这样想，就等于說，好象卡列也夫先生所表現的不理解妨碍我們去获得正确的历史哲学的概念一样。

政治制度影响于經濟生活。它們或者促进这个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它。前一种情形从馬克思的观点上看来絲毫也不是为奇的，因为特定的政治体系之被創造起来就是为着促进生产力的往前发展（至于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創造出来——在这里对于我們是完全一样的）。后一种情形絲毫也不与这个观点矛盾，因为历史的經驗証明，既然特定的政治体系不再适合于生产力的状态，既然它变成了生产力往前发展的障碍，那末它便开始走向沒落，最

① [世間最漂亮的姑娘也只能以其所有給予人。]

② 馬克思說：“一切階級斗争是政治斗争。”所以，——巴尔特議論道——按你的意見，政治就完全不影响經濟，而同时你又引用許多事实，这些事实指明……等等。——好啊！——卡列也夫先生叫道，——这正是我称为应该怎样和馬克思爭論的模范啊！卡列也夫先生的“模范人物”一般地表現着可惊的思想的力量。卢梭——模范人物說，——生活于等級差別和特权盛行到极点的社会中，在这社会中一切服从于全能的专制政治；可是，从古代窃取来的合理的建設国家的方法——这方法亦同样为霍布斯和洛克利用过的——使卢梭創立了根据于一切平等和民权之上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和当时法国存在着的制度是完全矛盾的。卢梭的理論后来为国民會議所实现了；所以，哲学影响了政治，而經過政治亦影响了經濟。”

你們喜欢这光輝的論据不？为着这个論据的利益，卢梭——貧困的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者之子变成了貴族社会的产物。和巴尔特先生爭辯，就是說要陷于重复別人的話。可是对于推崇巴尔特的卡列也夫先生說些什么好呢？啊！伏·伏·先生，真是不大好啊！天啊，你的“历史教授”是不大好啊！我們毫无自私之心地劝告你：找一个新的“教授”吧！

后，被排除掉。不仅是这个情形不与马克思的学说矛盾，而且它最好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正是它指明：在什么意义上经济统治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先于人民的政治发展。

经济的进化引起法权的变革。对于形而上学者，这点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他虽然高叫着互相作用，惯于把现象一个在另一个之后以及一个离开另一个来观察。相反地，即使多少能够作辩证思维的人就不难了解这点。他知道：量的变化，逐渐地积累着，最后，引导到质的变化，而这些质的变化乃是飞跃、渐近性中断的契机。

这里，我们的论敌们便受不住了，拿出他们的“言谈和公事”⁴⁵²来了。他们叫道：看啊！黑格尔才是这样说的啊！我们回答道：全部自然界便是这样做的。

说话容易做事难。把这句俗语用到历史上就可以把它变为：说话很简单，而事情做起来却非常之复杂。说：生产力的发展引起法权制度中的变化，这是很容易的！这些变革乃是复杂的过程，其中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害的结合，变化无穷。一些人利于维持旧秩序——他们用一切他们所能用的手段来保持它。对于另一些人，旧秩序已经是有利的和可恨的了——他们以其所有的全部力量来攻击它。而且不止如此，即革新者的利益亦永远不是同样的：对于一些人，最重要的是一种改革，对另一些人——另一种。争论在改革者的营垒中产生出来了，斗争更复杂化了。而且，虽然按卡列也夫先生的公允的说法，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所以虽然斗争是为着最无可怀疑的物质的利益必然地在争论的双方面前提出最无可怀疑的问题：关于正义的问题。旧制度和正义矛盾到什么地步？新制度和正义适合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必然在斗争者的头脑中产生出来，虽然，斗争者并不简单地称正义为正义，而也许

會把它人格化為類人的或者甚至類神的神。所以，違反着卡列也夫先生給他們的命令，“肉体”產生“靈魂”。經濟鬥爭引起道德問題，而“靈魂”在親近的觀察下成了“肉体”；守舊者的“正義”常常就是剝削者的利益。

就是那些以驚人的智慧厚誣馬克思為否認政治的意義的人們，同時又斷言：馬克思不論對道德的、哲學的、宗教的和美學的概念，都不給以任何意義，到處只單單看到“經濟的”。這又是如謝德林所說的，不自然的空話。馬克思沒有否認所有這些概念的意義；他只是闡明了它們的起源。

“什麼是電氣？——運動的特殊種類。什麼是熱？——運動的特殊種類。什麼是光？——運動的特殊種類。啊！竟是这样嗎！那末你就不給光、熱和電氣以意義嗎？在你那里，一切都是一個運動；概念是如何片面，如何狹窄啊！”正是这样，先生，正是狹窄。你很好地理解了關於能的轉化的學說。

生產力發展的任何特定的階段必然地引起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人們的一定的結合，即一定的生產關係，亦即整個社會的一定的結構。而既然有了社會的結構，就不難了解，它的性質將一般地反映於人們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於他們的一切習慣、道德、感覺、觀點、意圖和理想之上。習慣、道德、觀點、意圖和理想必然地應該適應於人們的生活式樣，適應於他們的獲得食料的方式（用別舍爾的話來說）。社會的心理永遠順從它的經濟的目的，永遠適合於它，永遠為它所決定。這裡重復着希臘哲學家在自然中看到的現象：目的性勝利着，其原因很簡單，凡不合目的的東西，由於自己的性質命定地要趨於死亡。在社會的爭取生存的鬥爭中，這種社會的心理適應於社會的經濟，對於社會是否有利的呢？很有利的，因為不適合於經濟的，和生存條件矛盾的習慣與觀點，將妨害這個生存

的爭取。合目的的心理之有益于社会，正如很好地符合于自己目的的器官之有益于机体一样。可是，說动物的器官应该适合于它们的生存条件，是否就是說，器官对于动物沒有意义呢？完全相反。这是說，承認它們的巨大的意义，它們的重大的意义。只有异常貧弱的头脑才会作另一样的理解。先生，这对心理是完全一样的，正是完全一样的。当承認它适应于社会經濟时，馬克思同时便承認了它的巨大的，什么也不能替代它的意义。

馬克思和例如卡列也夫先生之間的区别，在这里归結为：后者虽然有其“合命題”的爱好，仍旧是最純粹的二元論者。在他手中，这里是經濟，那里是心理；在一个袋子里——灵魂，在另一个袋子里——肉体。在这两个本体之間有着互相作用，可是两者都进行着其独立的存在，其来源則为不知之暗霧籠罩着^①。馬克思的观点，消除了这个二元論。在他那里，社会經濟和它的心理乃是人們的“生活的生产”、他們爭取生存的斗争的同一現象的两方面，在生产中人們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态而一定地結合着。爭取生存的斗争創造他們的經濟，而在經濟的基地上生长他們的心理，經濟本身亦是派生的东西，正如心理一样。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經濟是变化着的：生产力的新的状态引起新的經濟結構，同样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从这里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說中才能說經濟是一切社会現象的最初的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結果，是生产力的“功能”。

現在我們來說到在附注中所預約过的那一节。“不論肉体以及灵魂都有自己的需要，找寻自己的滿足而将各个人对外部世界

^① 不要以为：我們在污蔑可敬的教授。他以极大的夸耀来引用巴尔特的話，按巴尔特“法进行着独立的，虽不是非依賴的生存”。而这个“独立性，虽然不是非依賴性”就妨害了卡列也夫先生去認識“历史过程的本質”。怎样妨害，我們在正文中馬上就有一节來說明。

即对自然和別的人們……置于不同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于各个人的生理的和精神的需要，并因此，一方面創造用以保証各个人的物質生存的各种技艺；另一方面則創造全部智慧的和道德的文化。……”⁴⁵³人对自然的物質关系根源于肉体的需要中、物質的屬性中。“狩猎、畜牧、农业、制造工业、商业和貨幣功能的原因”應該在肉体的需要中去寻找。——从健全的判断看来，这当然是这样的：因为如果沒有了肉体，我們还需要家畜和野兽、土地和机器、商业和金子干嗎？但是，另一方面，亦應該說：沒有靈魂的肉体是什么呢？那不过是物質罢了，而物質是死的。如果物質本身不是由靈魂和肉体組成的，那末它便什么也不能創造。所以捕捉野兽、畜养家畜、耕种土地、做生意和在銀行里开会，物質不是以自己的智慧来实行的而是按着靈魂的指示的。所以，人对自然的物質关系的发生的最后原因應該在靈魂中去找寻。所以，靈魂亦有双重的需要；所以，它亦是由靈魂与肉体組成的，而这便有些不大說得通。然而这还不够。而且对于下面这点亦自然而然地要发生疑問。按卡列也夫則在肉体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出人对自然的物質关系。可是这是否确实呢？只是对自然的嗎？卡列也夫先生也許还記得，修道院院长吉貝尔怎样咒詛那力图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城市公社吧；这些“卑污的”机关；其存在的唯一目的，似乎只是想逃避封建义务的公允的执行。在这里，在修道院院长吉貝尔身上說話的是什么呢：“肉体”还是“靈魂”？如果是“肉体”，那末我又將說：所以，肉体亦是由“肉体”和“靈魂”組成的；而假如是靈魂，那末，所以它亦是“靈魂”和“肉体”組成的，因为在这里，它很少表現对于現象的无自私的态度，——而这，按卡列也夫先生說来乃是“靈魂”的特点。这里你們試一試弄清这笔糊涂賬吧！也許，卡列也夫先生會說：在修道院院长吉貝尔身上說話的实

在是灵魂，不过它是在肉体的命令之下說的，而在狩猎、銀行等等事情上亦是一样。但是，第一，为了要能命令，肉体又应该由肉体 and 灵魂組成，而第二，粗野的唯物主义者可以指摘道：看呵！灵魂是在肉体命令之下說話的，所以，人是由肉体 and 灵魂組成的这一点依然什么也不能保証：也許在全部历史上灵魂只做了肉体命令它的事情？当然，卡列也夫先生是会被这个可厌的設想激怒起来而来駁复“粗野的唯物主义者”的。我們坚信，胜利是在可尊敬的教授方面的，可是在这斗争中，那人是由灵魂 and 肉体組成的这一无可爭辯的事实究竟能对他有多少帮助呢？

而且还不止如此。我們在卡列也夫先生那里讀到，在各个人的精神的需要的基礎上产生：“神話和宗教……文学和美术”和一般地——“对外部世界（以及对自己）的，存在与認識問題的理論的关系”及“外部現象（以及自己本身的思想）的无自私的、創造的再現”。我們相信了卡列也夫先生。可是……我們有一位朋友，他是工科学生，热心地研究制造工业的技术，而对于教授先生所列举的諸項的“理論的”关系，他可沒有。我們发生了一个問題，我們的朋友是否单单由肉体組成的？我們請求卡列也夫先生快些解决这个煩惱着我們和侮辱着年青有为、甚至也許是天才的技師的疑問吧！

假如卡列也夫先生的議論有多少意义的話，那末它就在：人有高級低級的需要；有利己的意图，和爱他的感情而已。这是最无可爭論的真理，可是完全不能成为“历史哲学”的基礎。带着这种真理决不会比无內容的早已被击破了的关于人性这一题目的議論走得更远；这种真理本身亦不过是这种議論而已。

當我們和卡列也夫先生談話时，我們的聰明的論敌已經来得及捉住我們的自相矛盾，主要地我們与馬克思之間的矛盾。我們

說过經濟不是一切社会現象的最初原因，而同时我們断言：社会心理适应于它的經濟——第一个矛盾。我們說：社会經濟和社会心理乃是同一現象的两个方面，而馬克思本人則說，經濟是现实的基础，其上建筑着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第二个矛盾，这对于我們是更为悲慘的，因为在这里我們与我們想叙述他的观点的人有了分歧。讓我們解释一下吧。

說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这我們說得一字一句都和馬克思一样的，所以这里任何矛盾也沒有。所以，如果要有矛盾，那末只在关于社会經濟对它的心理的关系这个問題上。我們来看一看到底有沒有矛盾。

請讀者記住，私有财产是怎样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把人們置于这样一种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下，某些对象的个人的占有对于生产过程成了更加便利的。适合于这种情况，原始人的法权概念变化了。社会的心理适应于它的經濟。在特定的經濟基础上命定地建筑着适合于它的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可是，另一方面，在生产力发展上的每一个新步驟把人們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中置于新的互相关系中，这个新的关系是和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合的。这个新的从未有过的情况反映于人們的心理上，有力地变化着它。向哪一个方向呢？社会的一些成員坚持旧制度，这是停滞的人們。另一些人——旧制度对他們不利的人們，赞成前进的运动；他們的心理变向那随着時間的到来将会代替旧的、过时的經濟关系的生产关系的方面去了。可以看到，心理对于經濟的适应繼續着，可是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經濟革命①。

当这个革命完成之后，就建立了社会心理与經濟之間的完全

① 實質上，現在歐洲的无产階級正經歷着这同一的心理过程：它的心理已經适应着新的、将来的生产关系。

的适合。这时候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新的心理怒放起来。在某一时期中这种适合是不可破坏的；它甚至日益巩固起来。可是慢慢地新的不和之芽又出现了：先进阶级的心理，依着上面指述的原因，又驾凌于旧的生产关系之上；一分钟也不停止它的适应于经济，它又去适应那组成将来的经济的萌芽的新的生产关系。这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吗？

直到现在我們主要地用法权领域内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法权无疑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第一级的，所谓，低级的意识形态。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的意识形态，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

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发展上，经济在这个意味上是基础，即社会应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以便抽出一定的人力，以全力从事科学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其次上引的柏拉图和普卢塔克指明：社会内脑力工作的方向本身亦是为它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关于科学，维科就已经说过，它由社会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象政治经济学这类科学，这对于稍稍知道其历史的人都是明白的。别基奥伯爵公允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特别证实，实践到处和永远先于科学^①。当然这点也可以在极抽象的意味上加以解释的；可以说：“显然，科学需要经验，经验愈多，科学愈圆满。”事情不在这里。请将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的经济观点和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观点比较

^① “当政治经济学在十七世纪中开始萌芽以前，某几个民族在几世纪中只靠自己的实践而过活了。这个经验以后为科学利用为自己的定理”——（《意大利之政治经济学史》，洛加诺，1892年，第11页）。

密勒重复道：“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实践是老早就先于科学而存在着……所以，理解政治经济学为科学的一个部门，这种理解产生得还不久。可是它的研究的对象必然地是在一切时代中人类的主要的实践利益之一。”（《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伦敦，1843年，第1卷，第1页）

一下，那末你便可以看到在一方面，古希腊的經濟科学和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社会的經濟科学之間有着不仅量的而且質的差別：完全另一样的观点，完全另一样的对对象的态度。用什么来解释这个差別呢？很简单就是，現象本身变化了：資產階級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不象古代的生产关系。在生产中的不同的关系創造了科学上的不同的观点。不仅如此，請把李嘉图的观点和例如巴斯夏的观点比較一下，那末，你就可以看到，对于按其一般性質說来未尝变化的生产关系——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因为，在李嘉图时代这些关系还只在兴盛，还只刚才巩固起来，而在巴斯夏时代，这些关系已經开始走向沒落。同一生产关系的不同的状况必然地應該反映于拥护它的人們的观点中。

或者以国家法权科学來說。它的理論怎样和为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国家法权科学的研究——龔普洛維奇教授說——只有在統治階級之間对于它們每一个所屬的权力的范围发生爭执的时候才开始。例如，我們在欧洲中世紀下半期所遇見的第一次大的政治斗争，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間的斗争，皇帝与神父之間的斗争，給了德国国家法权科学的发展以第一次的推动。使統治階級内部分裂和推动国家法权相当部分的法学的研究的第二个政治的爭論問題是关于皇帝的推选問題。”^①

什么是階級的互相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們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間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組織中和在各階級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个斗争成为各种政治理論的产生和发展的推动。在經濟基础上必然地建筑着适应于它的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

^① 《Rechtsstaat und Sozialismus》，Innsbruck 1881. S. S. 124—125.（《法权国家与社会主义》，因斯勃魯克，1881年，第124—125頁。）

然而就是这些意识形态，如果不是最初级的，却也决不是最高级的意识形态。例如，对哲学、对艺术情形是怎样呢？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应得稍为后退一点。

爱尔维修曾从 *l'homme n'est que sensibilité*^① 这一命题出发。从这个观点看来，很明白的，人将避免不愉快的感觉和力求获得愉快的感觉。这是感觉的物质的不可避免的天然的利己主义。可是，假如如此，那末，人怎样发生完全无私利的意图：对真理之爱，英雄主义呢？这是爱尔维修应解决的任务。他没有能够解决它，而为了逃避困难，他简简单单地将他要求得的那个 X，那个未知数划掉。他说，没有一个学者会无私利地爱好真理，每个人在真理的爱好上只看到走向荣誉的道路，而在荣誉上看到获得金钱的道路，而在金钱上看到获得生理的愉快的感觉的手段——例如用以买得美味的食品或 *belles esclaves*^②。不必说，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只表现了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法国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之无法解决发展的问题。

人们常将这种不外是重复爱尔维修的形而上学论点的对人类思想史的观点强加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之父的头上。例如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常常理解为近似这样：如果康德研究了先验论的美学的问题，如果他说了关于悟性的范畴或关于理性的二律背反，那末在他那里，这只不过是一些空话，实际上，不论美学，不论二律背反，不论范畴对他都毫无兴趣；他需要的只是一件事：给他所属的阶级，即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以更多的美味的菜肴和“很好的奴隶”。范畴和二律背反在他看来是对于这点的最好的手段，所以他来“分析”它们。

①（人只有感觉性）。

②（很好的奴隶）。

难道还需要说明：这是最纯粹的空谈吗？当马克思说，特定的理论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时，他绝不想以此说，在这个时期内统治着的阶级的思想的代表自觉地将自己的观点去迎合自己的多少富裕和多少宽大的恩人的利益。

当然，阿諛者到处和永远都有的，可是推动人类理性前进的却不是他们。而那些真正推动人类理性前进的人，却关心着真理，而不是当时世界的强有力者的利益^①。

“在所有权的不同的形态上——马克思写道——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上建筑着不同的特殊的感受和幻想、观点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所有这些都是为整个阶级根据其生存的物质条件及适合这些条件的社会关系所创造和形成的。”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对于人们是看不见地完成的。人们不把这个上层建筑看做一时的关系的一时的结果，而看做是按其本质说来是天然的和必定如此的东西。个别的人（他们的观点、感觉是在教育和一般地周围环境影响之下造成的）可以对于那些历史地在或多或少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和共同生活的形式充满着最诚恳的、最忘我的态度。对于整个政党亦是一样。1848年的法国的民主派表现着小资产阶级的意图。小资产阶级天然地意图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可是，——马克思写道，——如果以为小资产阶级自觉地企图维护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则将成为一种局限性。相反地，它以为它的解放的局部的条件乃是一种一般的条件，而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达到拯救现代社会和消除阶级斗争。同样不要以为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代表都是小生意人或小生意人的崇拜者。按其教育和个人地位，他们可以与小生意人有天壤之别。可是下述情形就使

^① 这不妨害有时候他为强有力者所骚扰。例如，康德关于自己曾说过：“谁也不能强迫我说与我所想的相反的话，可是，我不敢说出我想的一切。”

他們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他們的思想沒有走出小资产阶级生活环境的界限，而因此，他們在理論上达到那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物質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中所达到的同一样的任务和决心。一般地在某一阶级的政治的或文学的代表和这个阶级的本身之間的关系就是这样。”^①

这是馬克思在論拿破仑第三的 coup d'état ^② 的一書中說的⁴⁵⁴。在其另一著作中，他也許更好地給我們解釋階級的心理的辯証法。講的是有时个别的阶级所起的那个解放者的作用。

“如果不在暫時間激起本阶级和群众的热情，任何阶级都不能起这个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它与整个社会亲如手足，它被認為是全体的代表，大家同情它；在这一时期中，这个阶级的权利与要求真正是全社会的权利与要求，而这个阶级本身是这个社会的头脑和心脏。只是以社会的全体的权利的名义，某一阶级才能要求自己对于一切其他人的統治。为

① 当証明生活条件 (les circonstances) 影响于动物的机体时，拉馬克做过一个注解，这注解值得提一提，以避免誤会。“誰停止在我所說話的字面的意义上——他写道——他便將錯誤的观点加在我的头上。因为無論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他們不喚起动物形态和組織上的任何直接的变化。”由于生活条件中的重大的变动，在动物那里出現了新的与以前不同的需要。假如这些新的需要在很长久的时期中保留着，那末，他們便引导到新的习惯的出現。“而既然新的生活条件……引起动物的新的习惯，即刺激他們作已經成了习惯的新动作——結果則一些器官常常地練習，而有时对于那失去了用处的另一些器官則完全沒有練習。”練習的加紧或沒有練習对于器官的結構以及整个机体不是沒有影响的。(Lamarque, Philosophie zoologique etc., nouvelle édition par Charles Martin, 1873, t. I, pp. 223—224)(拉馬克，《动物学的哲学等等》，查礼馬尔丁新版，1873年，第1卷，第223—224頁。)經濟的及从其中产生出来的其他需要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亦應該这样理解。这里发生着由于練習和不練習的結果而生的緩慢的适应的过程；而我們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敌人們以为：似乎照馬克思的意見，人們在出現新的需要时，馬上便有意地改变自己的观点。显然，这在他們看来是一件蠢事。但是这种蠢事是他們自己想出来的，在馬克思那里絕沒有类似这样的东西。一般地說，这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見，使我們記起一个神父反对达尔文的胜利的論据：“达尔文說把鷄拋到水里去，它便生出足蹼来，而我則断言，鷄簡簡單單地会淹死。”

② [政变]。

了取得这个解放者的作用以及使一切社会势力范围为自己本身的势力范围服务的政治剥削者的作用，仅仅靠热情和精神的自信是不够的。为了要使一个等级能表现为似乎是代表全社会的，那末就需要一切社会的仇恨都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需要一定的等级出现为引起公愤的等级、压迫一切人的化身……为使一个等级 *par excellence* (真正) 出现为解放者的等级，需要另一个等级，在一般的意识中，相反地出现为压迫者的等级。法国的贵族和僧侣的消极的普遍的意义制约了和他们邻接的及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的积极的普遍的意义。”^①

在这些预先的解释之后，已经不难弄清楚，马克思对于高级的意识形态，例如对于哲学和对于艺术的观点。可是为着更大的明显性我们将它和伊·泰恩的观点对比一下：

“为着理解某一艺术作品，某一艺人，某一艺人的集团——这位作家写道——应该确切地知道，他们的时代的智慧和道德风习的一般状况。那里是最后的解释；那里有着决定其他一切的最初的原因。经验证实着这个真理。实际上，如果我们追踪艺术历史的主要时代，则我们可以看见，艺术与它们联结着的智慧及道德风习的一定的状况同时出现和同时消失。例如，希腊的悲剧——爱修拉斯、苏福克拉斯、幼里披底的悲剧——是和希腊人之战胜波斯人同时出现的，它出现于不大的城市共和国的英勇的时代，出现于那伟大的紧张的时机，由于这，他们夺得了自己的独立和在文明世界中确立了自己的领导权。这个悲剧同这个独立和这个热情同时消失了，当气质的颓败和馬其頓的侵略使希腊落于异族的统治之下的时候。——完全同样地，古代建筑之发展是和十一世纪的半文艺复兴时代的封建秩序的最后确立同时发展起来，这时候脱离了挪威人的侵入和海盗骚扰的社会是更巩固地确立起来了。它消失于这样的时机，即在十五世纪之末，当或大或小的男爵的军事制度随着从其中

^①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Paris 1814，《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S. 82 455.（《德法年鉴》，巴黎，1814年，論文《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导言》，第82頁。）

产生的道德风习由于近代君主政体的产生而一起瓦解的时候。——与这类似的，荷兰的绘画繁盛于这样的光荣时机，即当荷兰以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勇敢最后地摆脱了西班牙的羁绊，胜利地与英国斗争着，而成为欧洲的最富足的、最工业的、最繁荣的国家的国家的时候；它没落于十八世纪之初，这时候，荷兰已跌落为二等的作用，将第一的地位让给了英国，成了简单的银行、商馆，保持着最大的秩序、和平和安宁，其中人可以过安居乐业的资产者的平静生活，没有野心的计谋亦不受深刻的震动。最后，与这类似的，法国的悲剧出现于这样的时候，即在路易十四之下巩固地确立了的君主政体带来了礼仪的统治，宫廷生活，宫廷贵族的光辉和优雅的时候，而当贵族社会和宫廷的道德风习为革命所消除的时候，它便消失了……正如自然科学家研究物理的温度，为了去理解某一植物（燕麦或玉蜀黍、松或蘆葦）的出现一样，应该同样地研究道德的温度，为了去理解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世俗的雕刻或现实的绘画，神秘的建筑，或古典的文学，肉感的音乐或理想的诗歌。人类的精神产物正如生动的自然的产物一样只有以其环境来解释。”①

对于所有这些任何马克思的信徒是无条件地同意的：是的，正是任何艺术作品以及任何哲学体系可以以特定时期的智慧和道德风习状态来解释的。但是智慧和道德风习的这个一般状态以什么来解释呢？马克思的信徒以为它是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的属性来解释的。“人们地位中的任何变动引导到他们心理上的变动”②。——同一的泰恩说。而这是正确的。只要问一问，社会人的地位中的变动，即社会制度中的变动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呢？只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唯物主义者”和泰恩发生了意见的分歧。

对于泰恩，作为科学的历史的任务，归根结底是“心理学的任

① 《Philosophie de l'art》，12-me édit., Paris 1872, pp. 13—17.（《艺术哲学》，第12版，巴黎，1872年，第13—17页。）

② 《Philosophie de l'art dans les Pays—Bas》，Paris 1869, p. 96.（《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巴黎，1869年，第96页。）

务”。在他那里，智慧和道德风习的一般状态不仅創造不同种类的艺术、文学、哲学，而且創造特定民族的工业，它的整个社会制度。而这就是说，社会环境在“智慧和道德风习的状况”中有自己的最后的原因。

这样便得出：社会人的心理，为其地位所决定，而他的地位，則为他的心理所决定。这是我們所已經熟知的二律背反，对于它，十八世紀的启蒙派怎样也沒有能够对付得了。泰恩同样亦沒有解决了这个二律背反。他只是在其許多卓越的著作中給了許多表明他的第一个命題的例子——命題：智慧和道德风习的状况是为社会环境决定的。

与泰恩爭論其美学理論的他的法国的同时代人提出了反命題：社会环境的屬性是为智慧和道德风习的状况所决定的^①。这类爭論可以繼續到基督再生，不仅不能解决这命定的二律背反，而且甚至看不到它的存在。

只有馬克思的历史理論解决了这个二律背反而使爭論得到良好的結束或者至少給那些有耳来听有脑来想的人們以良好地結束它的可能。

社会环境的屬性是为每个特定时代的生产力的状态所决定的。有了生产力的状态亦就有了社会的屬性，亦就有了适合于它的心理，亦就有了环境及道德风习双方之間的互相作用。当布倫涅齐叶尔說，我們不仅适应于环境，而且使环境适应于我們的需要

① “我們受到政治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我們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們同样亦受到物理环境的影响。可是，我們不应忘記，如果我們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末，我們同样有着抵抗它的作用的可能，而且你們亦无疑地知道：許多証实这事实的显著的例子……如果我们受环境的影响，那末，我們亦有不受其影响的能力，不仅如此，我們可以使环境本身适应、适合我們本身的要求”（斐·布倫涅齐叶尔：《自倫納遜斯时代起至現代止的批判的进化》，巴黎，1890年，第260—261頁）。

的时候，他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问，那不适合于我们周围环境的属性的需要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之产生——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仅是物质的需要，而且一切所谓人们的精神的需要——仍然是由于那个历史运动，那个生产力的发展，亦就因为这个历史运动，这个生产力的发展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或早或晚都会变成不满意的、过时的、要求激进的改造的制度，也许简直变成只值得加以毁坏的东西。在上面我们已经在法权制度的例子上指出了人们的心理怎样能够超越于他们共同生活的特定的形态。

我们相信，在读了这几行之后，很多的甚至是善意地倾向于我们的读者会记起一大堆例子，一大堆历史现象，这些例子，这些现象在表面上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我们的观点来解释的。而读者们已经准备好向我们说：“你们是正确的，可是不完全；而抱有和你们相反的观点的人们亦同样是正确的，可是亦是不完全；你们和他们都只看到真理的一半。”可是，读者啊！请等一等，不要在折衷论中去找寻拯救，在还没有完全领会现代的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能够给予的东西以前。

至今我们的论点由于必要性还是很抽象的。可是我们已经知道：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我们需得给我们的论点以更具体的面貌。

因为差不多每个社会都受到其邻近社会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其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环境。每个特定的社会从其邻近的社会方面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是永远也不会等于另一个社会在同时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任何社会生活于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个历史环境也许——而实际上亦时常有过——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很相类似，可是永远也不会和永远也不能和它完全同一样。这给社会发展的过程加上

异常有力的多样性的因素，而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从我們以前的抽象的观点上看来原是极端刻板的。

例子。氏族联合是为一切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上所固有的共同生活的形式。可是历史环境的影响使得各部族的氏族的命运大为不同。它給予氏族本身以这种或那种所謂独有的性質，它延迟或加速其崩溃，它特别使这崩溃的过程大为不同。而氏族崩溃过程中的不同式样又制約了氏族生活形态所讓位于它的那个共同生活形式的不同式样。至今我們說，生产力的发展引导到私有财产的出現，原始共产主义的消逝。現在我們應該說：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的私有财产的性質，由于每个特定的社会之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大不相同。“对于亚洲的，特别是印度的，公社所有权形式的仔細的研究将指明，如何从原始公社的不同的形态中产生其瓦解的不同形态。例如，可以从印度公社的不同的形态中引导出羅馬的和日耳曼的私有财产的不同类型。”^①

特定社会的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当然亦影响到它的意識形态的发展。外国的影响是否能够削弱意識形态的发展对于社会經济结构的依賴性呢？如果能够，那末削弱到什么程度呢？

試把爱尼依达和奥德賽比較一下，或把法国的古典悲剧和希腊的古典悲剧比較一下。将十八世紀的俄国的悲剧和法国的古典悲剧比較一下。你将看到什么呢？爱尼依达只是奥德賽的模仿，法国人的古典悲剧只是希腊悲剧的模仿；十八世紀的俄国的悲剧虽然出諸凡手亦是照着法国的式样和形态而創造的。到处是模仿，可是在模仿者和范本之間有着一个距离，这距离正就是产生模仿者的社会和范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間之距离。而且請注意：

^①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S. 10, Anmerkung.（《政治經济学批判》，第10頁，附注。）

我們所說的不是作品的工拙，而是艺术产品的精神。拉辛的阿海尔象誰呢？象刚脱离野蛮状态的希腊人呢？还是象十七世紀的侯爵——talon rouge（紅靴）呢？人們已經指出了，爱尼依达的角色是奥古斯都时代的羅馬人。是的，关于所謂十八世紀的俄国悲剧的角色，很难說他們把当时的俄国的人物显示在我們面前；但是这些人物的不适当本身就証明了俄国社会的状态。他們显示了俄国社会的不成熟性⁴⁵⁶。

另一个例子。洛克，无疑地是极大多数十八世紀法国哲学家的导师（爱尔維修称之为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最伟大的形而上学者）。可是在洛克和他的法国的学生之間有着一个距离，这距离正就是在“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的革命）时代的英国社会和在法国人民的“Great Rebellion”（伟大的暴动）之前几十年的法国社会之間的距离⁴⁵⁷。

第三个例子。四十年代的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直接从法国輸入其思想。可是对于这些思想可以說已經印上了它們要在其中传布的社会烙印。

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学对于另一个国家的文学的影响是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的。当这种类似等于零的时候，影响便完全不存在。例子：非洲的黑人至今沒有感受到欧洲文学的任何影响。这个影响是单方面的，当一个民族由于自己的落后性，不論在形式上亦不論內容上不能給別人以任何东西的时候。例子：前世紀的法国文学影响了俄国的文学，可是沒有受到任何俄国的影响。最后，这个影响是互相的，当由于社会关系的类似及因之文化发展的类似的結果，交換着的民族的双方，都能从另一民族取得一些东西的时候。例子：法国文学影响着英国文学，同时自身亦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

拟古典主义的法国文学⁴⁵⁸在当时曾大受英国贵族的欢迎。可是英国的模仿者永远亦不能和自己的法国的范本比较。因为，虽有英国贵族的一切努力亦不能将法国的拟古典主义的文学在其中繁荣起来的社会关系移植之于英国。

法国哲学家很欣赏洛克的哲学。可是他们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这是因为，他们在法国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较之那个在洛克的哲学著作中表现了自己的意向的英国社会的阶级走得更远。

当——例如在新时代的欧洲——我们有着彼此异常有力地互相影响着的社会整个体系时，这时候，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复杂化起来了，正如它的经济发展在与别的国家不断的商业交换的影响下复杂化起来一样。

这时候，我们好似将有一种为全体文明人类所共有的文学。可是，正如动物学的种分为亚种一样，这个全世界的文学亦区分为各个民族的文学。

〈每一种文学派别，每一种哲学思想，在每个不同的文明国家里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色彩，有时候几乎是新的意义。〉^①

当休谟到法国时，法国的“哲学家们”当他是自己的同一思想的人而欢迎了他。可是有一次，在霍尔巴赫处吃饭时，这位法国哲学家们的无疑的同一思想的人提起了“自然宗教”。他说，“至于无神论者，我不允许他们存在；我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一个。”《自然体系》的作者反对他道：“你至今真是不幸，在这里你第一次可以看到坐在桌子旁边的是十七位无神论者。”同一休谟对康德有很大的影响，康德自己承认休谟使他从独断的微睡中觉醒起来。可是康德

①（该句只在第一版上有）。

的哲学和休谟的哲学大不相同。同一的观念的基础引导出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唯物主义，休谟的宗教的不偏不依主义和康德的“实践的”宗教。事情是在：宗教问题的作用在当时的英国与在法国不同，而在法国又与在德国不同。而这个在宗教问题的意义上的区别其原因是在：这些国家之中，每一个的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各不相同。在性质上是同样的而在发展程度上不一样的各种社会因素，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异常不同地配合着，这便使得每个国家有异常独特的“智慧和道德风习的状态”，表现于民族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之中。由于这个原因，同一个问题，可能为法国人所热情地感动，而英国人则淡然置之；同一个论据，可以为德国的先进分子所敬服，而法国的先进分子则异常厌恶它。什么东西促使德国哲学的巨大的成功呢？德国的现实，——黑格尔回答道，——法国人无暇从事哲学，生活驱使他们走向实践的领域(zum Praktischen)，德国的现实曾是更合理的，而德国人能够安静地钻研理论(bei dem Theoretischen stehen bleiben)。实质上，这个假想的德国现实的合理性不外是德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贫乏，这使得当时的有教养的德国人没有别的选择，除了或者作枯燥无味的“现实”的官吏(迎合“实际”)或者在理论上找寻安慰，将自己热情的全部力量，自己思想的全部热力集中于这一领域。可是如果“实践上”更先进的国家没有推动德国人的理论思想前进；如果他们没有觉醒他们的“独断的微睡”，那末这个否定的属性——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贫乏——永远也不会产生这个巨大的肯定的结果：德国哲学的光辉的繁荣。

歌德的米菲斯托菲说：“Vernunft wird Unsinn, Wohlthat——Plage”(理性成了无智，善行成了罪恶)，在应用于德国哲学史上时，几乎可以大胆地说出下列奇论来：糊涂产生理性，贫乏成了恩赐。

可是，显然，我们可以结束我们这一部分的叙述了。我们且把

以上所說的总结一下吧。

互相作用存在于諸民族的国际生活中，同样亦存在于其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无条件必然的，可是本身說来，它还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了了解互相作用，应该弄清互相作用的力量性質，但这个性質却不能在互相作用这个事实中找得最后的解释，尽管这些性質由于互相作用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地，互相作用的力量性質，彼此影响的社会有机体的屬性归根結底是由我們已經知道的原因來說明的：即这些有机体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則为它們的生产力的状态决定的。

我們希望，現在我們所叙述的历史哲学已經带着稍为具体一点的面貌了。可是它总还是抽象的，它总还是远离着“生动的生活”的。我們需得向后者更进一步。

开始我們說到“社会”，以后轉到社会的互相作用。可是社会按其成份說来不是一色的；我們已經知道，原始社会的崩溃引导到不平等，引导到階級的产生，而各階級則有不同的常常是完全相反的利益。我們已經知道，諸階級互相間进行着差不多不断的，有时隱秘的，有时明显的，有时慢性的，有时尖銳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給意識形态的发展以巨大的极度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如果不把階級斗争放在心目中，我們便絲毫也不能理解这个发展。

“你們願意不願意知道——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伏尔泰的悲剧的真正的原因嗎？——布倫涅齐叶尔問道，——請你第一，在伏尔泰的个性中去找，特別要在迫使他必然地既要和拉辛和基諾所做的不同，又要追隨他們中去找尋。关于浪漫主义的戏剧，雨果和仲馬的戏剧，我可以說，它的定义完全包括于伏尔泰的戏剧的定义中。如果浪漫主义不願意在舞台上做某一件事，那末这是因为它想做和古典主义相反的东西的緣故……在文学上以及在艺术上在个性的影响之后，最重要的作用是一

一个作品对另一个作品的影响。有时，我們企图在其本来式样上和我們的先驅者竞争，——而这种方法便巩固了某种手法，創造了派系，建立了传统。而有时我們則企图做那和他們做过的不同的东西，——而这时候，发展便和传统发生矛盾，出現新的派系，改造手法。”^①

暂时把关于个人的作用問題放在一边，我們指出，早就應該想一想“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的影响”了。在一切意識形态中，发展絕對都是按着布倫涅齐叶尔所指出的道路完成的。一个时代的意識形态——或者追隨着自己的先辈們的足迹，发展他們的思想，采用他們的手法，而只允許自己和它“竞争”，或者它們起来反对旧思想和手法，和他們发生矛盾。圣西門將說：有机的时代为批判的时代代替了。后一点值得特別說一說。

随便拿什么問題来講，例如关于貨幣問題。对于重商主义者，貨幣par excellence(主要地)是富。他們給貨幣以夸大的几乎是絕對的意义。起来反对重商主义者的人們，跟他們发生了“矛盾”，不仅糾正了他們的絕對性，而且本身，至少是其中最热烈的人物本身也陷于絕對性，而正是簡直相反的极端：貨幣这是简单的約定的記号；它本身沒有任何价值。例如，休謨就是这样看貨幣的。如果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可以以当时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不发展来解释，那末，如果简单地以商品生产与流通很有力地发展了这点来解释他們的反对者的观点将是极怪誕的。因为这种发展絕沒有使貨幣变成約定的失去內在价值的記号。休謨观点的极端性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斗争这一事实，从和重商主义“矛盾”中产生出来的。他想“做出”与重商主义者“相反的东西”来，正如浪漫主义者“想做出与古典主义者相反的东西一样”。因此，可以說（如布倫涅齐叶尔

^① L. c., p. 262—263. (《自倫納遜斯时代起至現代止的批判的进化》，第262—263頁)。

关于浪漫主义戏剧所說的一样), 休謨的貨幣观, 完全包含在重商主义者的观点中, 虽然是他的对_立物。

另一个例子。十八世紀的哲学家尖锐地和坚决地反对一切神秘主义。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多多少少都浸透着宗教性。什么东西喚起了这个回向神秘主义去呢? 难道, 这样的人物如《新基督教》的作者^{45°}較之百科全书派有較少的 lumières (知識, 教养) 嗎? 不, lumières, 他們并不少, 一般地說, 他們的观点和百科全书派的观点很密切地联結着; 他直接繼承着他們, 可是在某些問題上他們与之“矛盾”——即实在說来, 在关于社会組織的問題上。——他出現了“做”与百科全书派“相反的东西”的企图; 他們对宗教的态度乃是“哲学家”对宗教的态度的简单的对_立物; 他們对宗教的观点已經包含在后者的观点中。

最后, 拿哲学史来看: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 在法国唯物主义胜利着; 法国 tiers état (第三等級) 的极端派站在它的旗帜下。在英国, 在十八世紀, 唯物主义为旧制度的拥护者, 貴族、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所热中。在这里原因是很清楚的。复辟时代的英国貴族与之发生“矛盾”的人物乃是极端的宗教幻想者; 为着要“做”与他們、反动派“相反的东西”不得不走到唯物主义。在十八世紀的法国却正相反, 旧制度的拥护者站在拥护宗教的立場上, 而极端的革命者便走向唯物主义。这类例子充滿于人类思想史上, 而所有这些例子証明一件事: 为着理解每一个特定的批判时代的“智慧状态”, 为着解释, 为什么在这一时代中正是这些学說, 而不是另一些学說胜利着, 應該預先認識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 應該知道, 哪些学說和学派曾在当时統治过。如果沒有这一点, 則不管我們怎样好地通晓它的經濟, 也完全不能理解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的。

可是就是这一点亦不应抽象地理解, 俄国“知識分子”习慣了

把一切都抽象地理解的。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决不会和自己的先辈作 *sur toute la ligne* (全綫的)、在人类知識和社会关系的一切問題上的斗争的。十八世紀的法国空想主义者在許多人类学的观点上与百科全书派完全相同；复辟时代的英国貴族在許多問題上(例如公民权利等等)是和他們所厌恶的清教徒完全一致的。心理的領土划分为省,省分为县,县分为村和公社,公社乃是各个人(即各个問題)的联合。当“矛盾”产生时,当斗争爆发时,它的注意力普通只涉及个别的省——如果不是个别的县的話——,只有反射的作用才涉及于邻近的区域。首先被攻击的是那前一时代的领导权属于它的省份。只是逐漸地“战争的灾难”才扩张于邻近,扩张到被攻击省份的最忠实的同盟者身上。因此应该加上說,在弄清特定的批判时代的性質时,不仅要了解前一有机时代的意识形态的一般特点,而且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各个的特点。在一个时代中领导权属于宗教,在另个时代中属于政治以及諸如此类。这种情况必然地反映在相应的批判时代的性質上,其中每一个批判时代,按情况之不同,或者繼續形式上承認旧的领导权而将新的、相反的内容加到統治的概念中去(例子:第一次英国革命),或者完全否認它們,而领导权轉入新的思想的省份(例子:法国的启蒙典籍)。假如我們記得这些由于各个心理省份的领导权而来的爭論亦影响于其邻近区域,而且在每个个别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和不同方向地影响它們,則我們可以了解,在这里正和在一切地方一样,是如何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論点上啊!

“所有这些也許是这样的,——我們的論敌反对道,——可是我們看不見階級斗争在这里有什么关系;我們感觉到,你們极为自相矛盾。你們現在承認人类思想的运动服从着某种特別的規律,而与那你們囁嚅地扰人清听的經濟規律和生产力的发展,毫无共

同之处。”——我們赶紧来回答。

說到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或者确切些，在人类的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点据我們所知，“經濟”唯物主义者之中是沒有一个人加以否認的。他們之中誰也沒有，例如将商品流通的规律和邏輯的规律同一化。可是这派唯物主义者之中誰也不以为可以在思維的规律中找到人类智慧发展的最后原因、基本推动者。这正是“經濟唯物主义者”优于唯心主义者，特别是折衷論者的地方。

只要供給肚子以一定数量的食物，它便按照腸胃消化的规律动作起来。可是能否以这些规律来解释，为什么你們的肚子每天能得到美味和滋养的食品，而对于我的肚子，这类东西是稀客呢？这些规律能否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飢餓而死呢？显然，解释應該到另一个領域中去找尋，在另一类规律的作用中去找。对于人的智慧亦是一样。把它放在一定的情况中，周围环境給它一定的印象，它按照一定的一般规律結合他們（而且在这里由于得到的印象不同所以結果亦是极为不同的）。可是什么东西将它放在这种情况中的呢？什么东西制約着新的印象之源流和性質呢？这就是任何思維规律所不能解决的問題。

其次，試設想，弹性的球从高楼上落下来。它的运动是按照大家都知道的和很简单的机械规律完成的。可是球碰到了傾斜面，它的运动变形了，按着同样很简单的和为大家知道的机械的规律进行着。結果我們得到曲綫的运动，关于曲綫运动，可以和應該說，它的发生是为上面两个规律的联合的作用規定的。可是球所碰到的傾斜面是从哪里来的呢？不論第一个规律，不論第二个规律，不論两个规律的联合的作用都不能解释这一点。对于人类的思維亦完全是这样。那由于它才使人类思維的运动服从于某一些

規律的联合作用的情况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呢？这点不論它的个别規律，或它們的总合的作用都不能解釋的。

制約着思維的運動的情況應該到法國啟蒙派找尋過的地方去找。可是我們現在已經不再停留于那個他們所不能超越的“界限”上了。我們不僅說，人及其一切思想感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我們力圖理解這個環境的起源。我們說，環境的屬性是為某種在人之外的和至今不依賴于人的意志的原因所決定的。人們的事實上的互相關系的多色多樣的變動必然地要引起“智慧狀態”的變化，引起思想、感覺、信仰的互相關系的變化。思想、感覺、信仰是按其特殊的規律結合着的。可是這些規律却為與它毫無共同之處的外部情況促使其發生作用。在那布倫涅齊葉爾只看到一種文學作品對另一種文學作品的影響的地方，我們除此以外更看到，更深刻地存在着的社會集團、階層和階級的互相影響；在那他簡單地說，出現了矛盾，人們企圖做與他們的先輩相反的東西的地方——我們加上道：而他們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在他們的事實上的關係中出現了新的矛盾，新的社會階層或階級出現了，他們已經不能如舊時代的人們一樣地生活了。

在布倫涅齊葉爾只知道，浪漫派想和古典派矛盾，而在布蘭德斯則企圖以他們所屬的社會階級的地位來解釋他們的對矛盾的癖好。例如，請回憶一下，關於在復辟時代和路易·菲力普時代法國青年的浪漫主義情緒的原因，他是怎樣說的。

當馬克思說：“為使一個等級 par excellence (真正) 出現為解放者的等級，需要另一個等級，在一般意識中，相反地出現為壓迫者的等級”⁴⁶⁰時——他同樣指出特別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社會思想發展的規律。可是這個規律只作用于、而且只能作用于分裂為階級的社會中；它不作用于、而且不能作用于原始社會中，那里沒有階

級、沒有階級斗争。

仔細思索一下这个規律的作用。当一定的等級在其他居民的心目中成为公認的压迫者时，这时候，統治于这一等級中的思想，在人民看来自然也只是压迫者所应有的思想。社会意識便和它发生“矛盾”，社会意識热中于相反的思想。可是我們已經說过：这类斗争永远不是在一切战綫上都进行着的；永远有着某一部分思想为革命者和旧制度的拥护者所同等地承認的。最有力的攻击用来攻击那些特定的时期中是旧制度的最有害方面的表現的思想。对于意識形态的这些方面，革命者有着不可克服的志願和他們的先輩“矛盾”。而对于其他的思想，即使也是在旧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他們也常常是完全淡然置之，有时則按着传统繼續保持这些思想。例如，法国唯物主义者进行了反对旧制度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思想的斗争（即反对僧侶和宫廷专制），而完全沒有触及旧的文学的传统。是的，就在这里狄德罗的美学理論亦是新社会关系的表現。可是这里斗争很弱，因为主力集中在其他的戰場上^①。在这里起义之旗是在以后才举起来的，而且是为这类人举起的，即他們曾經热烈地同情被革命推翻的旧制度，而似乎亦應該同情那在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所形成的文学观点的人們。然而就是这个好象是怪事的事亦可以用“矛盾”的原理来解释的。如你們所希望的一样，例如沙托布里安同情于旧的美学理論，而伏尔泰——可恨的可厌的伏尔泰——曾是它的代表之一。

“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引导前进”）——黑格尔說。意識形态史好象是更一次的証明，这位老“形而上学者”並沒有錯。它，似乎亦証实着量变到質变的轉化。可是我們請

^① 大家知道，在德国，文学观点的斗争进行得远为有力，可是，在这里革新者的注意沒有为政治斗争所吸引。

求讀者不要因此就激动起来，听我們說到底。

至今我們說过，如果知道了社会的生产力——知道了它的經濟結構，因而亦就知道了它的心理。根据这点，可以把这样的思想加在我們头上，即从特定的社会的經濟状况出发就可以确切地断定它的思想的结构。可是，这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任何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只有在与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的联系中才能理解。当然没有一个阶级会热心于和它的意图相矛盾的思想的。每个阶级都很好，虽然亦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理想”来适应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是这种适应可以以不同的式样来完成，而为什么它这样地完成而不是另外一样，这不是以特定阶级的状况单独地拿来可以解释的，而是以这个阶级和其对立者（或諸对立者）的关系的一切部分来解释的。从阶级出现后，矛盾不仅是推动的始基，而且是构成的始基①。

可是人物在意識形态史上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布倫涅齐叶尔給不依赖于环境的人物以巨大的意义。居友断言，天才永远創造着某种新东西②。

我們說，在社会思想的領域內天才之超越其同时代人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他比他們更早地把握着新的产生中的社会关系的意义。所以，这里要說天才不依赖于环境是不可能的。在自然科学的領域內，天才发现規律，当然这种規律的作用是不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可是，社会环境在任何伟大发现上的作用是表现于：第一，

① 表面上看来，阶级斗争与这类艺术例如建筑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就是建筑亦是和这个斗争密切联系着的。参阅，柯罗爱依《L'architecture gothique》（《哥特式建筑学》），特别是其第四部分：《L'architecture civile》，（《市民建筑》）。

② “Il introduit dans le monde des idées et des sentiments, des types nouveaux”——（《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Paris 1889. p.31.）（“他把新型的观念和感觉引进世界。”）——（《社会学观点上之艺术》，巴黎，1889年，第31頁）

准备知識的积蓄，如果没有这种知識的积蓄，那末任何天才也什么都做不出来；而第二，指揮天才的注意力使其朝向某一方面^①。在艺术領域內，天才給特定的社会或特定的社会階級的占支配地位的审美傾向以最好的表現^②。最后，在所有这三个領域內，社会环

① 附带地說，这里影响的双重性只是形式地存在着。任何特定的知識的积蓄正是因为社会的需要推动人們去积聚它，并指揮他們的注意力朝向适当的方面去。

② 任何特定的階級的审美的傾向和判断是如何地从属于它的經濟地位这一点，《艺术和现实在美学上的关系》的作者（車尔尼雪夫斯基。——譯者）就很好地理解了。美便是生活——他說——并且以如下的議論來說明自己的观点。

“好的生活，‘应有的生活’，在普通的人民看来就在于吃得飽，住在好的草房內，睡得足；但是同时在乡民的‘生活’概念中永远包括着工作的概念：沒有工作便不能生活，而且将会寂寞。由于滿足的生活，由于有很多工作而不致精疲力尽的結果，青年农民和乡下姑娘将有着异常光鮮的脸色和双颊紅潤——这是普通的人民概念中的美的第一个条件。因工作得很多的緣故，乡下姑娘虽然身体結实，可是将相当的丰满——这同样是乡村美人的必要条件。上流社会的‘弱不經风的美人’在农民看来决然是‘奇丑的’，而且会引起他的不快之感，因为他习惯于把瘦弱看做是疾病或‘悲惨命运’之結果。可是工作不会使人发胖，假如乡下姑娘是肥胖的，那是一种病态，是体格松弛的标志，而人民以过分肥胖为缺点；因为工作得很多的緣故，乡下美人不会手足纖細的，——关于手足纖細这种美的特点在我們的歌謠中是沒有提起过的。总之，在民歌中的美人描写上沒有一种美的标志不是飽滿的健康和体格上力的均衡的表現——这是在經常的和不易易的，而又非过度的工作下的、滿足生活的永远的結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就完全不同：她的祖先好几代就不从事手足的劳动了；在无所事事的生活式样中血液流到手足上去的就少了；每代的手足上的肌肉就弱下去了；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手足纖細——他是这样一种生活，即上流社会看来这才是生活的生活——沒有体力劳动的生活的标志；如果上流社会的妇人有大手大足，那末这或者是她的体格丑陋的标志，或者是她不是从世家大族出身的标志……当然，健康永远不会在人的目光中失去其价值的，因为即使在丰满和奢侈中，沒有健康亦是不好过活的，——結果两颊紅潤和健康的光鮮对于上流社会的人物仍然是誘人的；可是病态、瘦弱、萎靡、衰弱在他們目光中同样有美的价值，这可以被看做是奢侈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式样的結果的。苍白、衰弱、病态对于上流社会人物还有另一种意义：假如农民找寻休息、安靜，那末有教养社会的人物就沒有物質的困窘和体力的疲勞，而因此常常为了无所事事和无物質的关心而感觉到寂寞，他們便寻找‘强烈的感觉、激动、热情’，使上流社会的生活有声有色，复杂多致和有誘人的魅力，否則就太单调无味了。而由于强烈的感觉，由于过度的热情人便很快地憔悴了；如果憔悴和瘦弱是她閱历頗多的标志的話，那末如何还不傾倒于美人的憔悴和瘦弱之前呢？”（參閱論文集，《美学与詩歌》，第6—8頁）461。

境的影响表现在给个人天才的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的 sizes 上。

当然，我們永远不能用环境的影响来说明天才的全部个性，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

弹道学能够解释炮弹的运动。它能够预见它的运动。可是他永远亦不能告诉你，某一炮弹破裂为多少片和每一破片向哪里飞去。可是这丝毫亦不减弱弹道学所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我們无须站到弹道学上的唯心主义的（或折衷论的）观点上去，对于我們，力学的解释已经足够了，虽然——誰会争论这点呢——这种解释还没有能说明每个个别的破片的“个人的”命运，大小和形式。

命运的不可思议的讽刺啊！那个我們的主观主义者如此热烈地与之搏斗着的矛盾的原理（他們把它当做“形而上学者”黑格尔的空洞的臆说）似乎使我們 avec nos chers amis les ennemis（同我們的亲爱的朋友—敌人）接近了。假如休谟为了和重商主义者矛盾而否认了货币的内在价值；假如浪漫派創造自己的創作只是为了要“做”和古典派“相反的东西”；那末，客观真理便沒有了，有的只是对于我，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梅歇尔斯基公爵等等的真理。真理是主观的，一切滿足我求知欲的东西，都是真理。

不，这不是这样！矛盾的原理并不破坏客观真理，而只引导我們达到客观真理。是的，这个原理迫使人类走的道路完全不是直綫的道路。可是就在机械学上亦有失于距离而得于速率的情形：按摆綫运动的物体，从上面一点达到下面一点，要比之依直綫运动到得快。矛盾出现在而且只出现在那有斗争、有运动的地方，而在那有运动的地方——思想便前进，即使經過迂迴的道路。与重商主义的矛盾使休谟得到对于货币的錯誤观点。可是社会生活的运动，因之亦即人类思想的运动并不停留在休谟时代所已经达到的那一点上。它迫使我們与休谟矛盾，而这个矛盾的结果便给予了

对于货币的正确观点。而这个正确的观点，全面地观察问题的結果已經是客觀的真理，它是任何往后的矛盾所排除不了的。密勒注释的作者就热情地說过：

一度为生活取得的東西，
命运也无力把宅夺去……

在应用到知識上去时，这是无条件地正确的。任何命运現在从我們这里，無論哥白尼的发现，無論能的轉化的发现，無論物种变化的发现，無論馬克思的天才的发现，都是无力夺去的了。

社会生活变化着，跟着它科学理論亦变化着。这些变化的結果最后便出現了全面地观察现实，因之亦即是出現了客觀真理。色諾芬曾有与薩依不同的經濟观点。薩依的观点在色諾芬看来大概是荒唐的；薩依則宣布了色諾芬的观点是荒唐无稽的。而我們現在知道：色諾芬的观点从什么地方来的，薩依的观点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們的片面性从什么地方来的。而这个知識已經是客觀真理，而任何命运再也不能使我們脫离这个最后发现了的正确的观点了。

可是人类的思想亦不停留在你所謂发现或馬克思的发现之上的啊！——当然，不，先生！它将造成新的发现，以补充和証实馬克思的这个理論，正如天文学上的新发现补充了和証实了哥白尼的发现一样。

社会学上的主觀方法是最大的荒唐无稽之事。可是一切荒唐无稽之事都有其充分的原因，而我們——伟大人物的謙遜的追从者，可以自負地說：我們知道这个荒唐无稽的充分的原因。这原因就是：

“主觀方法”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第一个发现的，甚至亦不是“学派的天使”——即《历史書翰》的作者第一个发现的。布魯

諾·鮑威尔及其信徒們就已經得有这种方法了，就是这个布魯諾·鮑威尔养育了《历史書翰》的作者，而就是这个《历史書翰》的作者养育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及其弟兄們。

“历史家的客观性，正如任何客观性一样，只不过是简单的空談。而且这絕不是在这个意味上，即客观性是不可及的理想。到客观性，即到大多数人所有的观点，到群众的世界观，历史家只能墮落下去。而如果他这样做，他便不再是創造者，他为薪水而工作，他成了自己时代的雇員。”^①

这些亦是施利格写的，他是布魯諾·鮑威尔的热烈的信徒并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Die Heilige Familie》（《神圣的家族》）中所这样刻毒地譏笑过的。在这几句话中試以“社会学家”一字去代替“历史家”，以社会“理想”的創造去代替历史的“艺术創造”，——那末，你便得到了“社会学上的主观方法”。

請設想一下唯心主义者的心理。对于他，人的“意見”實質上是社会現象的基本的、最后的原因。他以为，依历史的見証，在社会关系中常常实现了荒唐的意見。“为什么——他議論道——不实现我的意見呢，它，天爷上帝啊，絕不是荒唐的啊！既然有着某种理想，亦就有至少实现为这个理想所渴望的社会改造的可能性，至于說到以某种客观的尺度来考查这个理想，那末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类尺度是沒有的：大多数人的意見不能成为真理的尺度。”

这样，因为我的理想号召改革，因为我認为这些改革是有益的事，所以就有着某种改革的可能。我之所以認为它是有益的事，是因为我願意認为它是有益的事。所謂客观尺度，就是我的願望，此

^① Di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der Menschheit und die Kunst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Schlosser's, Gevinus's, Dahlmann's und Bruno Bauer's, von Szeliga, Charlottenburg 1846, S. 6. (《人类劳动組織和施路錫尔、赫尔文尼斯、达里曼及布魯諾·鮑威尔的史料編纂艺术》，施利格，舍綠登堡，1846年，第6頁。)

外便沒有別的标准。不要妨害我的素性——这是主觀的方法的最后論据。主觀方法是 *reductio ad absurdum* (到了荒謬絕倫地步的) 唯心主义, 当然还带着折衷主义, 因为在这个寄生虫的头上落着为它所吞食的哲学上“好好先生”的一切錯誤。

从馬克思的观点看来, 以“主觀的”观点来和“群氓”“大多数”等等的观点(作为某种客觀的东西)对立是不可能的。群氓是由人們組成的, 而人們的观点永远是“主觀的”, 因为这种或那种观点乃是主体的屬性之一。客觀的不是群氓, 客觀的是那些被表現在这些观点中的自然和社会中的关系。真理的标准不在我身上, 而在存在于我之外的关系上。正确地表象这些关系的观点是真理的; 曲解它們的观点是錯誤的。那正确地把握着自然現象的互相关系的自然科学的理論是真理; 那些正确地描写那存在于被描写时代中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描写是真理。在那历史家不得不描写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的地方, 如果历史家自己不变为一个干燥无味的書呆子的話, 他不可避免地要同情斗争的某一方面。在这上面他将是主觀的, 不管他同情少数或多数。可是这种主观主义并不妨害他成为完全客觀的历史家, 只要他不去曲解那些斗争着的社会力量所据以产生的真实的經濟关系。“主觀”方法的信奉者則忘掉了这些真实的关系, 而因此除了自己的尊贵的同情和可怖的厌恶之外, 他們便不能給予任何东西; 而因此只要他的論敌們告訴他这还不够的时候, 他們便大声囂鬧, 責备他的論敌們为侮辱道德。他感觉到, 他不能洞察真实的社会关系的秘密, 因此任何对于社会关系的客觀力量的暗示, 在他看来是一种侮辱, 是对于他的无力的嘲笑。他企图将这些关系沉沒在自己的道德的憤懣的汪洋大海中。

所以, 从馬克思的观点上看来, 理想是不同的: 有低級的, 高級的, 正确的, 錯誤的。适合經濟現實的理想是正确的。主觀主义

者听到这点便将說，如果我将我的理想去适应现实，那末我便成了“当权者”的可怜的僕从。可是他們所以这样說，唯一地是因为，作为形而上学者的他們不理解任何现实的两重的反对的性質。“当权者”依据在已經衰朽的现实之上，在这个现实之下正产生着新的现实，将来的现实，而为这新的现实服务就是促进“爱的伟大事业”的胜利。

讀者現在可以看到，那以为馬克思主义者不給予理想以任何意义的观念是否合于“真实”了。这一观念乃是“真实”的直接对立面。如果在理想的意味上說来，那末，應該說，馬克思的理論是人类思想史上任何时候都沒有过的最理想的理論。这不論对其純科学的理論或对其实践的任务說来，都是同等地正确的。

“如果馬克思不理解自我意識及其力量，那末你叫他怎样办呢？如果他这样渺視自我意識所觉察的真理，那末請教怎样办呢？”

这些话还在1847年就为布魯諾·鮑威尔的信徒之一写过了①，虽然現在已經不用四十年代的語調了，可是那些責备馬克思为抹煞历史上的思想和感觉的因素的先生們至今都沒有比奥比茲走得更远些。所以他們至今还坚信，馬克思异常渺視人类的自我意識的力量；所有他們还异口同声地断定这点②。实际上，馬克思認為解释人的“自我意識”是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

他說：“从来的唯物主义（包括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內）的主

① 《Die Helden der Masse. Charakteristiken》. Herausgegeben von Theodor opitz. Grünberg 1848, S. 6—7. (《群众的英雄，性格描写》，切奥多尔·奥比茲出版，格仑堡，1848年，第6—7頁。)我們很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讀一讀这本书。在这書上，他可碰到許多自己的原版的思想。

② 附帶地說，并不是所有他們：誰也沒有想过以“人由精神和肉体組成的”这种說法来攻打馬克思。卡列也夫先生是具有双重的創見的：(一)在他以前从沒有人这样地和馬克思爭論过；(二)大概在他以后也不会有人再是这样地和馬克思爭論。从这个注释中，伏·伏·先生可以看到我們能够給予他的“教授”以应有的尊重的。

要缺点是在它只在客觀的形式中或直觀的形式中觀察了现实、为外間感官所感受的对象世界，而不是在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形式中，不是在实践的形式中从主觀方面去觀察。因此，能動的方面，与唯物主义相反，至今是为唯心主义发展了，可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自然不知道具体的活动之为具体的活动。”⁴⁶²先生，你想了一想馬克思的这几句話嗎？我們来告訴你，这些話說的是什么。

霍尔巴赫、爱尔維修及他們的信徒以一切努力用来証明唯物主义地解释自然的可能。甚至否認先天的观念亦沒有引导这些唯物主义者超越把人看做是动物世界之一員，看做 *matière sensible* (能感覺的物質)。他們沒有企图以自己的观点来解释人的历史，而即使企图了(爱尔維修)，他們的企图亦是失敗了的。可是人只在历史上才成为“主觀”，因为他的自我意識只在历史中才发展起来。限制在觀察人为动物世界之一員就是說限制在把他看做是“客觀”，漠視了他的历史发展，他的社会“实践”，具体的人的活动，可是漠視所有这些就是說把唯物主义弄成“枯燥的、灰暗的、悲慘的”(歌德)。不仅如此，这就是說，把它弄成——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指明了的——宿命論的，使人完全服从盲目的物質。馬克思看到了法国唯物主义的甚至費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而提出了糾正它的任务。他的“經濟”唯物主义是对于人的“具体活动”怎样发展起来的，怎样由于它发展了人的自我意識，怎样形成了历史的主觀方面这一問題的回答。当这个問題即使部分地解决了的时候，唯物主义就不再是枯燥的、灰暗的、悲慘的了，它不再把解释人类生存的活动方面的首席讓位給唯心主义。这时候他脱离了它所固有的宿命論了。

善感的而又智力薄弱的人們之所以憤憤地反对馬克思的理

論，就因為他們把這個理論的第一個字當作最後一個字。馬克思說，在解釋主體時，讓我們看一看，在客觀必然性的影響下，人們站在什麼樣的互相關系中。既然明白了這些關係，就可以弄清楚，在它們的影響下，人的自我意識怎樣發展着。客觀現實幫助我們弄清楚歷史的主觀方面。可是正在這兒，善感的而又智力薄弱的人們通常就來打斷馬克思。就在這兒，通常重複着與却茨基和發麻索夫對話極為相似的東西（二人為格利保埃德夫名著《智慧的悲哀》中的人物。——譯者）。——“在自己社會生活的生產過程中，人們碰到一定的、規定的和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生產關係”……——啊！天啊，他是宿命論者！……——“在經濟基礎上聳立着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他說的是什麼？說的和寫的一樣！他完全不承認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請你至少聽一次吧；從上所述，即可得出”……——不聽，受裁判！受積極的進步人物的道德裁判，受主觀社會學的明白的監視！！

大家知道，斯卡羅茶勃（《智慧的悲哀》中的人物。——譯者）的出現，救了却茨基。在俄國的馬克思的信徒與他們的嚴格主觀的評價者之間爭論，至今事情與此全不相同。斯卡羅茶勃塞住了却茨基的嘴，這時候主觀社會學的發麻索夫放下了塞在耳朵里的手指帶着自己的優越感說話；可是他們說的總共不過兩句話；他們的觀點仍然是完全不清楚的⁴⁶³。

黑格爾就已經說過，任何哲學，如果限制在簡單地重複基本論點時，都可成為無內容的形式主義。可是馬克思並沒有這個缺點。他並不限制在重複生產力的發展是全部人類歷史活動的基礎。對於發展自己的基本論點，做得象他那麼多的思想家是稀有的！

——可是在哪兒，他在哪兒發揮了自己的觀點呢？——主觀主義者先生們以不同的聲調歌唱着，喧擾着，叫囂着，呼喊着。——你

們看看达尔文吧，他有一本書啊，而馬克思連書也沒有，不得_不來恢復他的觀點。

不消說：“恢復”是一件討厭的和不容易的事，特別對於那些缺乏正確理解，因而也是缺乏“恢復”別人的思想的“主觀”資料的人。可是，並無恢復之必要，而主觀主義者先生們所悲嘆其沒有的書却是早就有了的。甚至有着好幾本書，一本比一本更好地說明着馬克思的历史理論。

第一本書——這是十八世紀之末起的哲學和社会科學的历史。熟識這本有趣的書（當然“劉易士”在這裡是不夠的）：它將告訴你，馬克思的理論為什麼出現，為什麼曾經應該要出現，它回答了那些當時未曾解決和不能解決的問題，以及，它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第二本書——這是《資本論》，就是那本你們大家都“讀了”的，都“同意的”，可是你們沒有一個人曾了解的那本《資本論》，親愛的先生們。

第三本書——這是從1848年——即從著名的《宣言》出世之後起的歐洲事變的历史。費些氣力去鑽研這本巨大的和富有教訓的書的內容，如果在你的“主觀的”心中還有公平的話，請把手按在心口告訴我們：難道馬克思的理論並未給馬克思以驚人的前所未見的預見事變的能力嗎？和他同時代的反動的停滯的和進步的空想主義者現在還剩些什麼呢？他們的“理想”一和現實接觸便化為灰塵，而這灰塵現在又跑到什麼樣的污泥中去了呢？甚至連灰塵也毫無蹤迹可尋了，而馬克思所說的却實現了，當然是在其主要點上實現了，並且繼續不變地要实现，直至他的理想最后實現之時。

似乎這三本書的證明已經足夠了吧？並且，似乎也不便否認其中任何一本的存在吧？當然你們要說，我們從那里所讀到的并

非是那里所写的？好吧，請你們說出来和証明这一点；我們急切地期待着你們的論据，而为不使你們的論据过于混乱，我先和你們解釋一番第二本書的意思。

你們承認馬克思的經濟观点，而否認他的历史理論——你們說。應該承認，这就說得很多了，即这就是說，你既不曾理解他的历史理論，亦不曾理解他的經濟观点⁴⁶⁴。

《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到些什么呢？那里，例如，說到价值。那里說到，价值是生产的社会关系。你們同意这点嗎？如果——不，那末你們就抛弃了自己所說的关于同意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話。如果——是，那末，你們便承認他的历史理論，虽然，你們是显然并未理解它。

既然，你們承認，离开人們的意志而存在着的、在他們背后作用着的他們本身的生产关系，反映在他們腦子中为政治經濟学的各种范畴：为价值，为貨币，为資本等等，那末，这么一来，你們便承認在一定的經濟基础上必然地生长着一定的适合于它的性質的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在这种情形下，你們的轉向已經做了四分之三，因为給你們留下的只是应用你們“自己的”，即从馬克思那里剽窃来的观点去分析高級的意識形态的范畴：法权、正义、道德、平等等等。

或者，你們也許只同意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第二卷吧？因为，有着这样的先生們，他們之“承認馬克思”，只因为他写了一封所謂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信⁴⁶⁵。

你們不承認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嗎？那末，由你們看来，例如，那馬克思在《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新萊茵報》）和当时其他定期刊物上以及在《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s》（《路易·波拿巴政變記》）一書上所用以估价 1848 年至 1851 年的

法国历史事变的观点是錯誤的嗎？非常可惜，你們沒有多花些力气来指明这个观点的錯誤性；非常可惜，你們的观点停留在不发展的形态中，并且因为材料不足甚至要“恢复”它們也不可能。

你們不承認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嗎？那末，照你們看来，例如，那馬克思用以估計十八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学說的意义的观点是錯誤的嗎⁴⁶⁶？可惜，就在这种情形下，你們也沒有駁倒馬克思。可是，也許，你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說过这一对象吧？然而，在这种情形下，我們不想援救你們脱离困境；因为你們大发議論的“对象的文献”，你們是應該知道的啊；因为你們之中有許多——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話說来——是有寻常的和非常的科学鼓吹者的称号的啊。是的，这一称号并不妨害你們主要地只从事“私人的”科学；主觀社会学、主觀历史哲学等等。

——可是，馬克思为什么不写这么一本書，其中用他的观点叙述从古至今的全部人类历史并且考察一切发展的部門：經濟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等等呢？

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就在善于提問題，知道哪些回答是可以向現代科学要求的，哪些是不能的。而在馬克思的論敌那里，这个标志似乎是看不到的，不管他們的非常性，有时甚至寻常性，也許正是由于它們。难道你們以为在生物学書籍中有这么一本書，它用达尔文的观点叙述了动植物界的全部历史嗎？去同任何一个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談一談吧，他，将先訕笑你的孩子的天真，然后告訴你，用达尔文的观点表述物种的全部长期的历史——这是現代科学的理想，这理想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而現在則不过找到了这种观点，用这种观点才能理解物种的历史^①。在現代历史科学上情形亦完全一样。

“什么是达尔文的全部工作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問道——这

就是几个具有综合性的、彼此极密切地联系着的，把堆积成山的事实材料结合起来的。而马克思的相当的著作在哪里呢？这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也没有这著作，虽然这文献是卷页浩繁和牵涉极广的……无数次作为原理而重复着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根据本身至今仍然是彼此没有联系的和事实上并未检查过的，而这对于依据在物质的可感觉的事实之上的并自己贴上‘科学’的商标的理论原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②

说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根据本身仍然是彼此没有联系的——这是赤裸裸的谎话。只要读一读《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就可以看到，它们是何等完整和彼此密切联系。说这些论点是未经检验过的——这也是不对的：它们曾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在《资本论》中，而且绝不是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特别”在关于原始积累的一章上⁴⁶⁷，而是在所有一切章节上：从第一章起至最后一章止，借助于社会现象的分析而被检验过的。如果，虽然如此，这个理论并没有过一次和“堆积如山”的事实材料联系在一起叙述过——这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见，是它与达尔文的理论不同，并且是它的不利之处——，那末，这里又是一种误会。借助于，例如，包含在《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原始》）中的那些事实材料，主要地，证明了，物种的变化性；至于某些个别物种的历史，达尔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这也只是预言式的：说，历史可以这样或那样，可是一件事情是无

① “所有这些发展史的不同支脉，至今还是部分地非常分歧并从最不同的实验的认识源泉出发，到目前由于日益生长的结合它们的联系的意识而得到了更高的发展。按着最不同的实验的道路和依靠着最多样的方法，他们总还是走向同一的目的，走向包罗万象的一元论发展史的伟大的最后目的。”（海克尔：《现代发展史的目的与道路》，耶拿，1875年，第96页）

② 《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05—106页。

疑的：曾有历史，物种曾經变化过。現在我們請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馬克思是否需要証明，人类并不停留在一个地方，社会形态曾經变化，人們的观点屢經变易呢，一句話，是否需要証明这类現象的变动性呢？当然，无需用，虽然为着証明这点，很容易堆积起几十座“事实材料的山峰”。那末，馬克思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社会科学和哲学的以前的历史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矛盾，坚持地要求得到解决。馬克思就借助于理論解决了这些矛盾，这理論，正如达尔文的理論一样，乃是由“几个具有綜合性的，彼此极密切地联系着的思想”組成的。当这些思想出現的时候，就明白了，借助于它們將解决一切煩扰着以前思想家的矛盾。馬克思不需要用他的先驅者所收集的事实材料来堆积成山，而要（在其他材料之中）运用这些材料来从新的观点去研究人类的真正历史。馬克思就做了这点，研究了資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其結果就是《資本論》（我們已經不必去說如《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类的时事論著）。

可是，在《資本論》中，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指摘，“所說的只是一个历史时期，而且即在這些限度內，对象，当然，甚至近似地也沒有穷尽”。这是对的。可是我們再一次提醒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有教养的头脑的第一个标志是在懂得哪些要求是可以向科学家提出来的。馬克思决不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包括一切历史时期，正如达尔文不能写一切动植物种的历史一样。

甚至对一个历史时期对象亦并未穷尽，即使是近似地也罷。——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穷尽，甚至近似地也罷。可是，第一，請告訴我們，什么对象达尔文穷尽了呢，即使近似地也罷。而，第二，我們現在告訴你們，在《資本論》中問題怎样和为什么沒有穷尽。

按新理論，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引导到經濟关系变化的生产

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不得不从研究某一国度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状态开始。不容说，研究不应再停留在这上面，研究应该指明：经济的枯燥的骸骨怎样为社会政治形态的生动的血肉包裹着，然后——这是任务的最有趣和诱人的方面——怎样为人类的观念、感觉、意图和理想的血肉包裹着。可以说，到研究者手里的是死·的·材·料（这里，读者可以看到，我们部分地已经用了卡列也夫先生的术语）；从他手里出去的应该是有完·全·生·命·的·有·机·体。马克思所能穷尽的——是的，连这也只是近似地——只是主要地有关于他所选择的时期的物质存在的問題。马克思死时并不太老。可是，如果他再活二十年，那末，他大概还会继续（也许，又是除了一些个别的时事论著）穷尽地闡明同·一·时·期·的·物·质·存·在·的·問·題。这一点就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发脾气了。他攘臂而起向这位著名的思想家讀他的控訴書：“你怎么是这样的？兄弟啊！……只是一个时期……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我不能，我不能滿意……你向达尔文学学吧。”对于所有这个主观主义的說教，可怜的《資本論》著者只能长叹一声，悲痛地承認：Die Kunst ist lang und kurz ist unser Leben!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迅速地 and 威胁地轉身向马克思的信徒們的“群氓”，說：你們看什么，为什么不帮一帮老头子的忙，为什么你們不穷尽一切时期啊？马克思的信徒們脫帽鞠躬回答道：主观的英雄先生，我們沒有功夫，我們忙着別的事情，我們曾为着反对那些压在現代人类身上的重压的生产关系而斗争。不必責备我們！而且，我們总还是多少做了一点，只要給我时日，我們會做得更多⁴⁶⁸。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稍为軟了一些說：所以，現在你們自己也看

①（人生朝露，艺术千秋！）

到是不完全的吧？——怎么不看到！而且达尔文主义者^①也不完全啊，甚至在主观社会学中也是不完全的，自然，这是完全另外一出戏。

提起达尔文主义者使得我们的作者又发起火来了。——你们干什么用达尔文来和我纠缠呢！——他叫道——达尔文很多缙绅先生醉心于他，许多大学教授满意他，而谁跟马克思走呢？不过仅仅是工人，是的，还有一些谁也没有批准的科学的噤舌的助教。

谴责是有如此有趣的性质，我们不由自主地继续倾听它。

“在《家庭等等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曾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曾为行会的德国经济学家‘默杀’，而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则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一开始就主要地向工人说话，而在工人们那里遇见了在官方科学代表们那里未尝预期的接受性’。这些事实正确到什么程度和他们的意义怎样？首先，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要长期地‘缄默’，即在我们这里，在俄国，在我们科学和文艺生活全部的薄弱和微小之下，现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有无数大学，普遍识字，有各派的无数报纸传单，及不仅注意刊物上的说话而且注意口头的说话的德国，这是更加不可能的。至于某部分德国的官方的科学祭司们在开始时以‘沉默’来接待《资本论》，那恐怕是不能用想‘默杀’马克思的著作来解释的。更正确地是应该设想为沉默的动机是躊躇，而在这躊躇之旁，迅速地增长着狂热的反对和完全的尊敬，其结果，《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很快地已经占据了公认科学中的很高的地位。经济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理论（包括《资本论》中关于将来的那些前途在内的）的命运就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唯物主义，虽然已经有半世纪的存在，可是对于科学界却至

① 有趣的是：达尔文的敌手长期以来都硬说，甚至到现在还是硬说，他的理论正是缺乏实际证据的“勃朗峰”。大家都知道，微耳和曾在1877年9月于慕尼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者和医学者代表大会上也说到过这方面的問題。海克尔在回答他时正确地指出，要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都不能证实达尔文的理论的话，那么任何新的事实也都不能说明什么了。

今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影响，然而，真的，却迅速地流行在工人阶级中。”^①

这样，在短促的沉默之后，迅速地生长了反对派。这是不错的。其狂热到这样的程度，即任何一个助教，如果他即使只承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那末，他就不能得到教授的称号；其狂热到这样的程度，即任何一个，即使最无天才的助教，如果他能想出一两个明天就为大家忘掉的反对《资本论》的责难，那末他就可希望迅速高升。对的总是对的；很狂热的反对派。

还有完全的尊敬…… 连这个也是对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的是尊敬。这正是这样一种尊敬，就是现在中国人应该用以对待日本军队的尊敬：它打得不错，并且受到它的打击是不愉快的。德国的教授们至今是深深地浸彻着对《资本论》著作的这种尊敬的。而且教授愈聪明，他的知识愈多，则他的这类尊敬亦愈大，他愈明白意识到，他不能驳倒《资本论》。明星们极愿派出年轻的，无经验的，需要高升的“噤舌的助教”去作攻击。

在那用不到聰明的地方，

你派李亚特去吧！

而我就看着……

还有什么可说呢，这类尊敬是伟大的。而别种尊敬我们可没有听到过，而且在教授们身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国有这种尊敬的人是不会把他造成教授的。

可是这种尊敬证明些什么呢？它证明的就这么一点。《资本论》所涉及的研究原野正就是那以新的观点、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观点耕作过的原野。在这一原野上，敌人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不用说，这对于敌人是很好的。可是要有“主观”社会学者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5—116页。

的所有的天真，才会惊奇地問道，为什么这些敌人不依馬克思的精神用自己的力量去从事耕作邻近的田地呢。“亲爱的英雄，你想找什么啊！这兒就是这么一块田地，用这种精神耕作过了，活都不讓活了。在那兒鬼哭狼嚎，而你还想我們用同一体系去开垦邻近的田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實質懂得极差，而因此就不了解“作为历史理論的經濟唯物主义的命运”；同样亦不了解德国的教授們对“将来前途”的态度。老爸，当現在在脚下动搖的时候，将来在他們是来不及想的。

可是，并不是德国的一切教授都这样程度地浸透階級斗争及“科学”科目的精神的呵。亦有除掉科学之外什么也不想的专家的呵！不必說，無論怎样，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不仅在德国。可是这些专家——正因为他們是专家——完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吞沒了；他們耕耘自己的不大的科学田地而对任何一般哲学历史理論都无兴味。这类专家关于馬克思很少有任何观念，要是有的話，也許只是一个使某人和某处不安的不愉快的人。你們怎样能希望他們依馬克思的精神写作呢？在他們的專門著作中普通是任何哲学精神都沒有的。而这里就发生了类似人默則石鳴一样的情形了。研究者——专家們本身关于馬克思的理論毫无所知，而他們所得的結果則大声叫喊着有利于馬克思的理論。而沒有一个对于政治关系史或文化史的郑重的專門研究，不这样或那样地証实馬克思的理論的。現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精神逼迫专家們不自覺地站在馬克思的历史理論(正是历史的理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上到什么程度，可有許多惊人的例証来証明。在上面，讀者已可看到两个例子：奥斯卡尔·别舍尔和日罗一台龙。現在我們举出第三个来。在自己的著作《La cité antique》(《古代公社》)中，著名的伏斯切尔·德·庫兰斯說过这样的思想，即宗教观念是古代一切社会

制度的基础。可以设想，在研究希腊和罗马史的个别问题时亦应坚持这个思想。可是伏斯切尔·德·库兰斯在触及斯巴达的没落问题时是怎样的呢？结果，在他那里没落的原因是纯粹经济的^①。触及罗马没落的问题时——他又乞援于经济^②。所以，结果怎样呢？有人在个别的问题上证实马克思的理论，而如果你叫他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末他也许会双手大摇，这会使卡列也夫先生欣喜无似的吧。假如不是一切人都彻底到底的，那末请教怎样办？

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打断我们道，——让我也举出一些例子吧。“看一看……布洛斯的书⁴⁶⁹，我们看到，这是很可敬的著作，可是，在这书上绝无历史科学上根本变革的特殊痕迹。从布洛斯说到阶级斗争和经济条件中（比较地是不多的）还不能得出他把历史建筑在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自己发展上；在叙述1848年的事变时，不提经济条件甚至是聪明的。从布洛斯的书中涂去对马克思的颂辞——说他是历史科学革命的创造者，是的，还有某些从马克思主义术语中来的有条件的句子，那末，你们就不会以为你所遇见的是经济唯物主义的信徒。恩格斯、考茨基及某些别的人的历史内容的个别好的章节，亦同样可以不用经济唯物主义的商标就能通行的；因为在实际上，他们注意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即使在这曲调中，经济的弦线占着优势。”^③

① 参阅他的《Du droit de propriété à Sparts》（《论斯巴达的财权》）。对于我们这里，这书中附带提及的对原始财产的观点是丝毫没有关系的。

② “Il est assez visible pour quiconque a observé le détail, et le textes, que se sont les intérêts matériels du plus grand nombre qui en ont été le vrai mobile”（《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e l'ancienne France. Les origines du système féodal》, Paris 1890. p.94.）“对于每一个在其具体的详情上（正是具体的详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原文件上研究事实的人充分明显的是正是大多数人的物质利益乃是真正的动因”等等（《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巴黎，1890年，第94页）。

③ 《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7页。

显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牢牢记住这么一句谚语：“一心找菌，鑽进洞里去了。”（心无二用之意。——譯者）他这么議論：如果你是經濟唯物主义者，那末你應該注意經濟，而不要“提及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即使經濟弦綫占着优势”。可是，我們已經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証明：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任务正就在从弦綫开始，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他怎么能想到，要他們抛弃这个任务而同时还依然做馬克思主义者。真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来没有想过深思这个任务的意义，可是，这不必說，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在这里是并无过失的。

我們知道：当我們还没有抛弃这个任务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将常常陷于很困难的地位：在他讀到“历史內容很好的章节”时，将常常远离这种思想（“头脑里就不会有”！），即它是“經濟”唯物主义者写的。这正是所謂比省长还坏的地位！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之陷于此种境地，难道是馬克思的过错嗎？

主观学派的大将以为“經濟”唯物主义者只應該說到“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自己发展”。思慮深远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个“自己发展”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以为，按馬克思的意見，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那末你就大錯特錯了。什么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呢？这就是人們之間的关系。沒有人們，它怎样能够发展呢？試想，哪里沒有人，哪兒亦就沒有生产关系。化学家說，物質是由原子組成的，原子結合成分子，分子結合成更复杂的化合物。一切化学过程是按一定的規律完成的。从这里你便突然地得出結論說，全部事情是在規律、物質——原子与分子——可以完全不动，而絕不会妨害化学化合物的“自己运动”。大家都明白这种推理的荒謬。可惜，还不是大家都明白，按其內部价值說来，完全相类似地把人物和社会生活規律，人們的活动——他們共同生活的內部邏輯对

立的荒謬。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們再說一次，新的历史理論的任务是在以你所謂經濟弦綫——即在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綫”——这只是在这个字的一定的意义（我們已經說过在什么意义上），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徒然无益地以为，馬克思主义者“只靠弦綫为生”，如象烏斯宾斯基的短篇《波德卡》中的一个人物那样⁴⁷⁰。

坚持以一个原則来解释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可是請教怎么办？只要不是“主觀的”科学；其中一切問題都是惊人輕易地解释着的；科学一般地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然說到这点，我們就告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也許，在涉及意識形态发展的問題上，最深知弦綫的人，有时亦会束手无策的，如果他沒有某些特殊的天才，即艺术感。心理适应于經濟。可是这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理解它的全部进程，为了使自己和別人一目了然于它是怎样完成的，不止一次又不止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例如，巴尔扎克对于解释和他同时代的社会各階級的心理已經做了許多⁴⁷¹。从易卜生那里我們也可以学到許多，并且从別的人那里我們所能学到的难道会很少嗎？可以期望，随着时光的流轉，将出现很多这类的艺术家，他們，一方面，理解“弦綫”运动的“鉄的規律”，另一方面，能够了解和指明，如何在弦綫之上，并且正是由于弦綫的运动，生长着思想体系的“生动的衣裳”。你們說，凡有詩意的地方，不能不有艺术的自由意志臆測的构思力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是非此不可的。而这点馬克思是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就說，應該严格地区分特定时代的經濟状态（它可以以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規定）和它的观念的状态。在这个領域中，

對於我們，有許多、許多東西還是陰暗的。而對於唯心主義者是更加陰暗，對於折衷論者尤其陰暗，附帶地說，他們從來不理解他們所遇到的困難的意義，設想着他們借助於著名的“互相作用”可以對付得了任何問題。實際上，他們從來也沒有對付得了，而只是躲在他們所遇見的困難背後。用馬克思的話說，具體的人類活動至今純粹是由唯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的。可是結果怎樣：是否找到了很多滿意的解釋呢？我們關於人的“精神”活動的議論，按其薄弱的根據來說，使人想起古希臘哲學家關於自然的議論：最好只不過是天才的預言，否則只是簡單的機智的預言，由於缺乏科學證明所需的任何支撐點以致要証實、證明它們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那些不得不把社會生活和“弦綫”聯結起來的地方才多少做了一些。所以，當馬克思看到了這點時，就勸告不要拋棄已經開始的企圖，他說，永遠應該以“弦綫”為領導，這時候他被人非難為概念的片面性和狹隘！這兒公允在那裡呢——這種公允恐怕只有主觀社會學者才会有吧。

說下去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繼續嘲笑我們道，——你們的最新詞句“是五十年前說的”。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差不多。而更悲慘的是你至今還沒有懂得它。科學上幾十年或百年前所說的，而至今還為千百萬對科學毫不關心的“人物”所不知道的“辭句”，難道還少嗎？試設想你們遇見一個霍屯督人（Hottentot）和力圖使他信服地球是繞日而轉的。霍屯督人對地球，對太陽有他自己的“獨創”的理論。他很難離開它。而他就嘲笑起來：你來向我說最新的詞句，可是你自己也說，這在幾百年前就說過了！霍屯督人的嘲笑證明什麼呢？只證明霍屯督人是霍屯督人。可是這是無需證明的呵！

附帶地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嘲笑證明的東西比霍屯督人

的嘲笑所能证明的东西要多得多。它证明了我们的“社会学者”是属于健忘类的。他的主观的观点是从布魯諾·鮑威尔、施利格等人那里遗传下来的，这些人是在年代的意味上的馬克思的先驅者。所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最新詞句甚至在年代上也比我们老，而按其内容說就老得更多，因为布魯諾·鮑威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乃是复返于上世紀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地激动，因为美国人摩尔根的关于“古代社会”的书出现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了經濟唯物主义的基础之后許多年⁴⁷²并且完全“不依赖于它”。对于这点，我們指出：

第一，摩尔根的书的“不依赖”于所謂經濟唯物主义是由于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即摩尔根本人是站在它的观点上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果讀了他自己所举的书，那末，就很容易信服这点。是的，摩尔根之达到經濟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依赖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可是，这对于他們的理論是更好。

第二，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許多年后为摩尔根的发现所証实，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們坚信还会有許多証实这个理論的发现。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理論則我們坚信其相反：“主观的”观点不会为任何一个发现所証实，不論五年之后，还是五千年之后。

从恩格斯的一篇序言⁴⁷³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著者及其友人馬克思在經濟史領域內的知識在四十年代时还是“不充分的”（恩格斯自己的話）。对于这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欢欣雀跃起来：呵！所以，正是产生于四十年代的“經

^① 至于应用生物学来解决社会問題，那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最新詞句，按其类型說来，就提高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最新詞句”是很可敬的老者！其中“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真正是“反复背誦着并且二重地說謊着”。

济唯物主义”的全部理論是建筑在不充分的根据上的。这是机智的中学四年生所应有的結論。成年人就会了解，在应用于科学認識上以及其他一切上，“充分”、“不充分”，“小”、“大”，应取其相对的意味。在宣布了新的历史理論的基础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了几十年；他們热忱地从事于經濟史，并在其中造成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們有非常的能力。由于这些成功，他們以前的材料由他們看来應該是“不充分的”，可是这还不能証明，他們的理論是无根据的。达尔文关于物种原始的書出版于1859年。可以坚信地說，十年之后，达尔文就認為他在从事著作自己的書的时候的知識是不充分的。从这兒得出什么結論呢？

同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于这个題目，即“对于希望照明全世界历史的理論，在他被宣布了四十年之后（即似乎直到摩尔根的書出現），古希腊和羅馬史依然是未解决之謎”^①的諷刺还少嗎？这个諷刺的唯一根据是“誤会”。

安置在希腊和羅馬历史的基础上的是階級斗争——这点在四十年代之末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会不知道的，其原因极简单，即希腊和羅馬的作家就已經知道这点。只要讀一讀，福克迪德、色諾芬、亞里士多德，讀一讀羅馬史学家的著作，就是替特·李維的著作也罷——附带說，他在描写事变时常常走到“主觀的”观点——，那末你們可以看到，其中每个人都坚信經濟关系及为它喚起的階級斗争乃是当时社会内部历史的根据。这个信念在他們那里有着简单叙述简单的众所共知的生活事实的直接形式，虽然，在波里比那里已經有着建筑在承認这个事实之上的类似历史哲学的东西。不論怎样，可是事实是为众所共認的，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馬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08頁。

克思和恩格斯“不讀古書”嗎？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正如对于一切科学人物一样，未解决之謎乃是有关于希腊、羅馬和日尔曼人的史前生活形态的問題（正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在另一地方說的一样）。摩尔根的书回答了这些問題。可是，我們的作者难道以为，在达尔文写他的著名著作时，他就沒有当时生物学上所未解决的問題了嗎？

“必然性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繼續道，——是如此普遍和不可反駁，它甚至包括着最愚蠢的希望和最无意义的顧慮，而对于这些东西，它的使命显然是要和它們战斗的。从必然性的观念看来，把脑壳去碰破牆壁，不是愚蠢而是必然性，完全同样地，克伐齐姆多⁴⁷⁴不是白癡，而是必然性，卡因和犹大不是恶人，而是必然性。总之，在实践生活中单单以它为领导，則我們將陷入于某种幻想的无边际的領域，那里沒有观念和事物，沒有現象，而只有观念和事物的一色的暗影。”^①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是甚至任何白癡都是必然性的产物，正如一切最不經常的現象一样，虽然从这里絕對不能得出犹大不是恶人，因为把“恶人”的概念和“必然性”的概念对立起来是荒謬的。可是，敬爱的先生，你既是英雄（而任何主观的思想家都是所謂 *ex professo* [专业] 为英雄），那末，請你費些气力証明一下，你不是“瘋癲的”英雄，你的“希望”不是“愚蠢”的，你的“顧慮”不是“无意义”的，你不是“克伐齐姆多式”思想的，你不是邀請愚众“以脑壳碰破牆壁”。为着証明这些，你必須乞援于必然性的范畴，而你却不会用它，你的主观的观点排除这类动作的可能；由于这个“范畴”，现实对于你們变成了阴影的王国。在这兒你就走进了死巷，在这兒你就替自己的社会学签下了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第2部，第113—114頁。

“testimonium paupertatis”（“貧乏的証件”。——譯者），在這兒你就開始斷言，“必然性的范疇”並不表明什麼，因為，似乎它表明得過多。貧乏証件是你供給你的“找尋安居之處”的信徒們的唯一文件。太少了，太少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青鳥自稱為英勇的鳥雀並且說要燃起大海也是不費吹灰之力的。當請她說明她的燃海計劃是根據在哪些物理的或化學的規律之上的時候，她便陷於困境，為逃出這個困境，她開始以悲傷的和難懂的調子啾啾而鳴，說，呵，你看“規律”是這麼說的，而實質上規律沒有說明什麼，任何計劃都不能根據它們的；應該等待幸福的偶然，因為早就知道，對困難用棍子亦可射擊的，並且一般地，*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理性歸根結底永遠是正確的）。多麼輕薄的，多麼討厭的鳥呵！

我們把馬克思的勇敢的、驚人完整的歷史哲學來和這個青鳥的含糊的咕咕聲對比一下。

我們的類人的祖先，正如一切其他動物一樣，完全服從於自然。所有他們的发展乃是這麼一種完全無意識的发展，它完全為生存鬥爭中通過自然淘汰對其周圍環境的適應所制約。這曾是生理必然性的陰暗的統治。在當時，甚至意識的曙光，從而自由的曙光都尚未燃亮。可是生理必然性却已把人引導到这样的發展階段，在這階段上他慢慢地從其餘動物世界中區劃出來了。他成了製造工具的動物。工具是一種器官，人借助於它，作用於自然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使必然性服從於人的意識的器官，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只是在很薄弱的程度上，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就是只是片斷地、點滴地。生產力发展的程度決定着對自然的統治的程度。

生產力发展本身是為環繞着人的地理環境的屬性決定的。這樣，自然本身給了人使它自己服從於人的手段。

可是人不是孤单地和自然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和自然斗争的是社会人(der Gesellschaftsmensch),即按其范围说或大或小的社会联合。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①。可是既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的往后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部规律进行,它们的作用,加速或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人类的历史运动。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可是,因为这样,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种关系都和以前不同。地理环境对于凯撒时代的不列颠人的影响和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大不相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地解决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解决的矛盾^②。

社会环境的发展服从着自己本身的规律。这就是说,它的属性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亦不取决于地理环境的属性。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产生了人的隶属性的新种类,他的奴隶状态的新形态:经济的必然性。而且他对自然的统治愈增长,他的生产

① 这里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作用的估计是错误的。参阅本卷第681—682页注④。——俄文版单行本编者

② 孟德斯鸠说:有了地理环境——亦就有了社会联合:在一种地理环境中只能存在专制主义,在另一种中——只能存在不大的独立的共和国的社会等等。伏尔泰反对道:不,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随着时代之不同出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命运没有影响:全部的事情是在人们的意见中。——孟德斯鸠看到二律背反的一方面,伏尔泰及其同道看到另一方面。普通只是借助于互相作用来解决这个二律背反。我们已经看见,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互相作用,可是这里它在解释了它,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启蒙学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藏之袋中的二律背反,解决得异常简单:就在这里,辩证的理性较之启蒙学者的健全思想(悟性)亦是无限地更有力。

力愈发展，这种新的奴隶状况便愈巩固。跟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互相关系就更加复杂起来；这一个过程的进程就完全离开了他们的控制；生产者成了自己本身生产物的奴隶（例如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

可是正如包围着人的自然本身给了人以发展他的生产力的第一个可能，因之，亦就给了人从自然的统治下逐渐解放的可能一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其发展的本身的逻辑使人意识到经济必然性奴役他的原因。这就给了意识战胜必然性，理性战胜盲目的规律的新的和最后的胜利的可能。

在觉察了他被他自己本身的生产产品奴役的原因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后，生产者（社会人）便组织这个生产，这么一来，就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时候必然性的统治就完结了，自由登极了，自由本身就成了必然性。人类历史的序幕闭幕了，历史开始了①。

这样，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不象它的敌人诬陷它的那样，要企图

① 我们希望，在上述一切之后，对于马克思学说与达尔文学说的关系，也明白了。达尔文解决了怎样在生存斗争中发生了动植物种的问题。马克思解决了怎样在人们的生存斗争中产生了社会组织不同形态。逻辑上，马克思的研究正开始于达尔文研究总结的地步。动物和植物处于物理的环境的影响下。对于社会人物理环境经过社会关系作用于他，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后者在起初时发展的迅速，依物理环境的蓄性而定。达尔文不以动物机体先天固有的发展趋势（如拉马克所做的那样）来解释物种的起源，而以机体之适应其外间条件来解释：即不是以机体的天性，而是以外间自然的影响来解释。马克思解释人类历史发展不是以人的天性，而是以那些在社会人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产生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这两位思想家的研究精神决然地是一样的。所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之应用于社会学（虽然，在年代上并不是这样，可是这是不重要的）。而且这是它的唯一的科学的应用，因为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从达尔文主义中所做的结论并不是他的科学的应用于研究社会人的发展，而是简单的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有很不美丽的内容的道德的说教，正如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之从事于美丽内容的说教一样。资产阶级著作家引用达尔文，在实际上他们介绍给自己的读者的并非达尔文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达尔文所论及的动物的兽性。马克思和达尔文相同，资产阶级作家和达尔文所研究的野兽和家畜相同。

使人信服：起来反对经济必然性是荒谬的，而且相反，它第一个指出了怎样对付经济必然性。这样便消除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所固有的不可免的宿命论的性质。并且同样地消除了那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惟必然要达到的（如我们已看见的）那种悲观主义的任何根据。个别人物是巨浪表面上的泡沫，人们服从着铁的规律，这规律只能认识它，而不能使它服从人的意志——乔治·毕希纳曾这样说。马克思回答道，不，既然我们认识了这个铁的规律，那末推翻其桎梏就决定于我们，把必然性变为理性的顺从的奴僕亦决定于我们。

我是虫豸——唯心主义者说。当我无知的时候，我是虫豸，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我是神，——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道。Tantum possumus, quantum scimus ①！

这个理论第一次坚固地论证了人的理性的权力，第一次把理性看做不是偶然性的无力的玩具，而是伟大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可是人们却以似乎是被它侮辱的那同一理性的名义，以似乎是被它轻视的理想的名义起来反对这个理论！人们竟敢非难这个理论为无为主义，为企图与周围之东西妥协，几乎是阿諛周围的东西，象馬却林（《智慧的悲哀》中的人物。——译者）的阿諛一切比他官爵高的人一样？真正可以说，这里是张冠李戴！

辩证唯物主义②说：人的理性不能是历史的动力，因为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可是既然出现了这个产物，它不应该而且按其天性说亦不能够服从以前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现实；它必然地要依

① [我知道多少，就能够做多少]。

② 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曾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斗争过。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于辩证的唯心主义，而后者则为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名字是非常不恰当的。马克思从来没有自称为经济唯物主义者。

照自己的式样和类型来改造现实，使它更理性些。

辯証唯物主义正如歌德的浮士德一样，說：

Im Anfang war die That!

(事业在先!)

行动(人們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合規律的活动)向辯証唯物主义說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①。全部他的实践哲学归結为行动。辯証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

当主观的思想家說：“我的理想”——他就是說：盲目的必然性的胜利。主观的思想家不会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上；因此，在他那里在理想的小花园之墙外就开始了偶然性的、因而亦就是盲目的必然性的、无限广闊的原野。辯証唯物主义指出那些可以把所有这个无限广闊的原野变为理想的花园的方法。它只补充說，为了这个转变所需的手段隱藏于这个原野本身的胸怀中，只要找到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

辯証唯物主义并不如主观主义一样限制人的理性的权力。它知道理性的权力及力量是广闊的和不可限制的。他說：一切在人类头脑中是理性的东西，即一切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的真理的認識的东西，必然地要轉入这个现实，必然将自己那一部分的理性加进现实中去。

从这里可以看到，按辯証唯物主义者的意見，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哪里。他們远非把这个作用归之于零，他們在人物面前提出的任务，如果用普通的，虽然不正确的术语說，应该承認是完全的純粹的理想主义的。因为只有在認識必然性的本身的内部的規律之后，以自己的力量战胜必然性之后，人类的理性才能对盲目的

^① “社会生活主要地是实践生活。一切神秘的东西，一切引导理論走向神秘主义的东西，都在人的实践及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馬克思) 475

必然性高奏凯歌，所以发展知识，发展人的意识是思想人物的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Licht, mehr Licht!（光明，更大的光明！）这便是首先需要的。

可是如果早就有人说过：谁亦不会点起灯来，把它藏之柜中，那末唯物主义的辩证论者添加道：不要把灯放在“知识分子”的狭窄的书房里！当还有这么一种“英雄”，以为只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就足以随心所欲地引导群众到任何地方去，就足以把群众当作粘土一样，愿意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在这样的时候，理性的统治仍然不过是漂亮的空话、善良的梦想。只有当“群众”成为历史行动的英雄的时候，只有当在它这个粗野的“群众”中发展起与此相适应的自觉的时候，理性的王国才会大踏步地走近我们。我们曾说过：发展人的意识吧！现在我们添加道：发展生产者的自觉吧！主观哲学在我们看来是有害的，其原因就在：它妨碍知识分子去促进这个自我意识的发展，而把群众和英雄对立起来，以为群众不过是一大堆的零，其意义完全随着站在它头上的英雄的理想而转移。

民谚粗鲁地说，凡有池塘，即有鬼怪。主观主义者说，如有英雄，则群众对于他们说来是找得到的；而且这些英雄——就是我们，就是知识分子。对于这点，我们回答道：你们将英雄和群众对立只是简单的自吹自擂，而且因此是自欺自骗。而且在你们尚未了解为了你们理想的胜利必须消除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本身，必须在群众中发展英雄的自我意识之前，你们仍然只是简单的……空谈家①。

① “Mit der Grü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 deren Action sie ist”. Marx, Die heilige Familie, S. 120.（“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群众的规模将扩大，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神圣的家族》，第120页）。

意見支配着世界——法国唯物主义者說：我們既是意見的代表，因此我們就是历史的动力；我們是英雄，群氓只有跟着英雄走。

这个观点的狹隘性是和法国启蒙学者的地位的特殊状态适应的。他們曾是資产階級的代表。

現代的辯証唯物主义力图消灭階級，并且它出現于階級消灭已經成了历史的必然性的时候。因此它向應該成为最近历史时期的英雄的生产者說話。因此，第一次，从我們的宇宙存在以来和地球繞日而行以来，发生了科学与劳动者的接近：科学跑去帮助劳动群众；劳动群众在自己的觉悟的运动中依据于科学的結論之上。

如果所有这些不过是形而上学，那末，真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的敌人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們所說的一切只是有关于預言的領域；所有这些，仅仅是推測，只由于黑格尔的辯証法的把戏才帶有某些完整的形态；所以，我們称你們为形而上学者。——主观主义者先生們回答道。

我們已經指明：只有对于“三段式”沒有絲毫概念才能要用“三段式”来扰乱我們的爭論。我們已經指明，它就在黑格尔那里，也从来沒有起过論据的作用，它并不是他的哲学的特点。我們敢于設想，我們同样亦指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不是引用三段式，而是历史过程的科学研究。因此我們現在可以把这个反駁置之不顧。可是我們以为，提起七十年代中俄文学史中的下面所說的一个有趣事实，对于讀者不是无益的。

在評論《資本論》时，朱可夫斯基先生指出⁴⁷⁶：《資本論》的作者在自己的推測（如現在大家常說的）上，只是依据于“形式的”判断，他的論据只是概念的无意識的游戏。已故的齐別尔先生就这样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依然坚信，在马克思那里，物质问题的研究到处先于他的著作的形式方面。我们以为，如果朱可夫斯基先生更注意地和更无偏见地读完马克思的书，那末他自己在这点上就会同意我们的。那时候，他无疑地将会看到，《资本论》的著者正是用研究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个时期的物质条件来证明人类只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马克思一步步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迷宫中引导读者并且分析其组成因素，使我们理解其暂时性。”①

“就拿……工厂工业，——齐别尔继续道，——及其每一作业的不断变更人手，它的几乎把工人们每天从一个工厂赶到另一个工厂的狂热运动来说；——难道不是它的物质条件替新的社会构成形态，社会合作准备了环境吗？周期重复的经济危机的作用，难道不是走向同一方向吗？市场缩小，工作日缩短，各国在公共市场上的竞争，大资本之战胜小资本，又难道不是趋向同一目的吗？……”以后在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可想象的迅速增加之后，齐别尔又问道：“或者所有这些都是非物质的，而是纯粹形式的改造吗？……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地在全世界市场上堆积着商品，而同时却使千百万人在消费品过多的时候饥饿着，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在的矛盾吗？……其次，在资本主义下，资本所有者同时使无数人民失去工作而又埋怨工作人手不够（附带地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所有者自己亦乐于承认这点），难道这亦不是资本主义的实在的矛盾吗？它把减少工作的手段，如机械的和其他的改善和改进变成了延长工作日的手段，难道这也不是它的实在的矛盾吗？在保卫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时，资本主

① 尼·齐别尔：《对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卡尔·马克思及其论资本一书〉一文之若干意见》（《祖国纪事》，1877年11月号，第6页）。

义却剥夺着农民的土地而使大多数居民落于重利盘剥下，难道这不是实在的矛盾嗎？难道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許多情形——只仅仅是形而上学而事实上并无此事嗎？可是只要拿起任何一期英国的《Economist》（《经济学家》）就可以相信情形是相反。所以，现有的社会經濟生活状态的研究者絕无必要把資本主义生产人为地放在預先想好的形式的、辯証的矛盾之下；仅仅实在的矛盾实在多得够他搞一辈子的。”

齐別尔的答复，按內容是令人信服的，按形式是温和的。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来的，对同一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回答却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我們的可敬的主觀主义者至今对于他当时所拥护的著作还是理解得很狹隘的（如果不說片面的話），并力图使別人也相信，他的片面的理解是他的正确的估計。显然，这种人是不能成为《資本論》的可靠的拥护者的。因此，他的回答充滿了极稚气的不可思議。例如，下面的一个例子。朱可夫斯基先生之非难馬克思为形式主义，为濫用黑格尔的辯証法，其論据之一就是引用《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經濟学批判》）序言的一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認為：馬克思的論敌在这序言上“公允地看到黑格尔哲学的反映”：“如果馬克思只写了这个《Zur Kritik》（《批判》）的序言，那末，朱可夫斯基先生将是完全对的”^①；即将会証明：馬克思不过是形式主义者 and 黑格尔派。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如此漂亮地驢头不对馬嘴，我們不由自主地要問：我們的（当时还是有希望的）作者讀过这篇序言沒有^②？还可以举出几个类似的不可思議的东西（下面还举一个），可是現在事情不在这里。不論米海洛夫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65頁。

② 这里馬克思叙述他的唯物史观。

斯基先生怎样不好地理解马克思，他总还马上看到了，关于“形式主义”是朱可夫斯基先生“说滑了嘴”，他总还想到了，这种空话乃是无……礼的简单产物。

“如果马克思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即它本身自发地否定其以前的状况，然后又否定这个否定，而把经历过的诸阶段调和于个人的和公社的财产的统一中；如果他说了这而且仅仅是这（即使他写了许多篇幅），那末曾将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派，从自己的精神深处建立规律并且自安于纯粹的（即与内容无关的）原则。可是每一个读过《资本论》的人知道，他不只说了这些。”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话，似乎从马克思以经济内容充塞其间的黑格尔公式中，取去这个公式正象脱掉帽子或手套一样地容易。“关于经济发展的已经经历的阶段，这里甚至任何怀疑都不能有的……同样无疑地是过程往后的进展：生产手段的集中于日益更少的人手中。对于将来，当然，可以怀疑。马克思认为，因为资本的集中伴随着劳动的社会化，那末，后者便成为新的法律和秩序的秩序生长其上的经济的基础（这个劳动社会化怎么成为道德的基础？“形态的自我发展”又怎样了？——著者注）。朱可夫斯基先生有完全的权力称这个结构为推测，可是他没有任何权力（显然是道德的权力。——著者注）完全不提马克思给予社会化过程的意义。”①

“全部《资本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公允地指出，——用来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态怎样日益发展着、加强着自己的典型的特点，使生产方式的发现、发明、改善，新的市场，科学本身服从自己，同化(?)于自己，并逼迫他们为自己效力，并且怎样，最后，特定的形态再不能经受物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3—354页。

質条件往后的变化。”①

在馬克思那里“正是对社会形态(即資本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嗎?)与它存在的物質条件(即使資本主义生产形态日益不巩固的生产力,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嗎?)的关系的分析乃永远是邏輯体系和巨大的博学的紀念碑。朱可夫斯基先生有道德的勇气断言:馬克思迴避了这个問題。这里你是无法可想的。只有惊愕地注視那翻着筋斗娱乐观众的批評者的头晕目眩的演技,无疑地,一部分观众将立刻懂得勇敢的馬戏演員将在他們面前粉身碎骨,可是另一部更善良的观众,将給所見的景象以完全不同意义的显著的惊愕。”②

Summa summarum(总结的总结):如果朱可夫斯基先生非难馬克思为形式主义,那末,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話說来,这个非难乃是“由无数小謊言組成的大謊言”。

这个判决是严峻的,可是完全公允的。而如果它对朱可夫斯基是公允的話,那末,它对一切現在重复說馬克思的推測只是根据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的人亦是公允的。而如果这个判决对一切这类人是公允的話,那末……現在請費力讀一下下面的摘录:

“他(馬克思)以实在的内容充实了空洞的辯証的图式到这种程度,以致可以象取去茶碗盖子一样从这个内容上取去这个图式,而毫无改变,毫无損害,只有一点是例外,是的,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对于社会的未来的‘內在的’規律是完全辯証地提出的。对于正統派的黑格尔主义者,說随着‘否定’来的应该是‘否定之否定’就够了;可是与黑格尔的聪明无关的人却不能滿足于这个:对于他們,辯証的結論并非証明,而相信这結論的非黑格尔主义者應該知道:他正是只是相信,而非信服。”③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2卷,第357頁。

② 同上書,第357—358頁。

③ 《俄国財富》,1894年2月号,第2部,第150—151頁。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告了自己本身的判决书。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亦意识到，他现在重复着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推测”的论据之“形式性”的话。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卡尔·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一文而且甚至害怕他的读者会顺便地提到它。因此，他起初装作，他现在说的和七十年代说过的一样。为着这个目的，他重复说：“辩证的图式”可象“盖子”一样取去之类。以后来了“只有一点”，对这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轻轻地离开读者，完全和朱可夫斯基先生在一起了。可是，这个“一点”亦正是那最重要的一点，它成为控告朱可夫斯基先生为“马戏术”的证据。

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就是对于将来，即对于“巨大重要性的一点”也不限于引用黑格尔。而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得出——限于引用黑格尔。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以“惊人的逻辑力”和“巨大的博学”指明了“特定的形态”（即资本主义）如何不能经受它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往后的变化。现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忘记了，马克思关于这点说的是怎样的多和令人信服以及他在这处所表现的逻辑力和巨大的博学是怎样的多。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曾经惊诧朱可夫斯基的“道德的勇气”，后者抹煞了马克思在证实自己的推测上曾引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已经完成的劳动社会化。这亦是有关于“巨大重要性的一点”的。目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告诉读者说，关于这点，马克思是“纯粹辩证地”推测的。在1877年，任何一个读过《资本论》的人知道，马克思“说的不仅是这”。现在成了——“只是这”，并且马克思的信徒对于将来的信心“完全建立在黑格尔的三环链的末端”。多么大的变化呵！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宣告了自己的判决书并自己意识到他自己

宣告了它。

可是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起把自己放在自己所宣告的判決書之下呢？这个以前热情揭发著作上的“馬戏术”的人，难道在晚年自己也爱好“馬戏术”起来了嗎？难道这样的轉变是可能的嗎？任何轉变都是可能的，讀者！而有这类轉变的人是值得加以一切譴責的。我們不来替他辯护。可是对他也應該以所謂对人的态度对他。請記起密勒注释的著者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的話：当人做得不好时，那末这里常常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請記起他对尼·阿·波列伏依的著作事业所說的話吧：

“尼·阿·波列伏依是庫靜的信徒，認為后者是大圣大賢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庫靜的信徒是不能和黑格尔哲学調和的，当黑格尔哲学浸入俄国学术界时——庫靜的信徒就成了落后人物，所以，他們拥护自己的信念和称呼在智慧运动上先进于他們的人为荒謬，这点，从他們那方面說来是沒有任何道德的，是罪过的；不能責备一个人，因为別人比他有更新鮮的力量和更大的决心，超过了他——这些人是正确的，因为更近于真理，但是他是无罪的——他只是犯了錯誤。”^①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生是一个折衷主义者。他由于自己全部的心智构造，由于自己以前的——如果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这样說的話——哲学教养的全部性質不能和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調和。当馬克思的思想浸入俄国时，他試圖拥护它，当然，在拥护的时候，不会沒有无数保留和非常巨大的“狐疑”。他当时以为，这些思想也可以在自己的折衷主义的磨房中磨碎和这么一来使他的文化的食品更加多样。后来他看到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适用于裝飾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世界觀的那雕花細工，并且它的传播将威

^① 《果戈里时代俄国文学概述》，第24--25頁。

胁着破坏他所热爱的雕花细工。因此，他对这些思想就准备战斗了。当然，在这里他马上便成了落后的人物，可是，我们以为，真的，他并未犯罪，他只是犯了错误。

——可是所有这些并不能辩护“马戏术”呵！

——是的，我亦并未替他辩护呵，我们只指出情有可原之处：由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不不知不觉地陷于这样一种地位，要跳出这种地位只能借助于“马戏术”。是的，别的出路是有的，可是只有充满真正英雄主义的人才敢走。这个出路是：抛弃折衷主义的武器。

結 論

至今，在敘述馬克思的思想時，我們主要地考察了那些從理論的觀點上向他提出的非難。現在對於我們有益的是再認識一下至少是他的某部分敵人的“實踐的理性”。在這裡我們將採用比較的、歷史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開始考察一下，德國的空想主義者的“實踐理性”怎樣迎接馬克思的思想，然後再來考察我們的親愛的和敬愛的同胞們的理性。

在四十年代之末，馬克思和恩格斯與著名的卡爾·海村⁴⁷⁷發生了有趣的論戰。論戰立刻帶上很激烈的性質。海村竭力企圖嘲笑自己論敵的思想，而且在這上面他表現了絕對不亞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巧妙。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責任上亦不能緘默⁴⁷⁸。而且亦不能不用極尖刻之辭句。海村稱恩格斯為“輕浮的，粗野的孩子”；馬克思稱海村為 *der grobianischen Literatur* (鄙野的作家) 的代表，而恩格斯則稱之為“本世紀最無知的蠢漢之一”⁴⁷⁹。論爭以什麼為中心呢？海村以什麼樣的觀點加諸馬克思和恩格斯頭上呢？就是下述這些觀點。海村力言：由馬克思的觀點看來，多少有些善良意圖的人，在當時的德國絲毫也無可作為。海村說，按馬克思，“先應有資產階級的統治，它應該製造工廠無產階級”，後者再從自己方面開始行動^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考慮到那個由三十四個德國吸血鬼所

①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 1848, S.21. (《德國共產主義的英雄》，伯爾尼，1848年，第21頁)。

造成的无产阶级”，即，换言之，除工厂工人外的整个德国人民（“无产阶级”一詞，在海村那里只是指这个人民的贫困状况）。依马克思的意见，这个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似乎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更好的将来，因为它只带有“自己的压迫的图記，而不是工厂的烙印；它应该忍耐地飢餓和餓死（hungern und verhungern），直至德国成了英国。工厂是学校，为着有权来从事改善自己的地位，人民应该預先經過这个学校”^①。

任何一个对德国历史稍稍熟悉的人，现在亦知道，海村的这些非难是何等荒謬。誰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閉目无視德国人民的贫困状况。誰都理解，把在德国未变成英国以前，德国的善良人物无事可做的思想加諸馬克思和恩格斯头上是否公允；似乎，这些人物并未等待祖国的这类变化就已經少許做了一些事。可是为什么海村把这些昏語加在他們头上呢？难道因为他心术不正嗎？不，我們又要說，这里并非他的罪惡，勿宁是他的不幸。他简单地不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此他觉得这些观点是有害的，而既然他热爱自己的国家，那末他便和这些似乎对祖国有害的观点搏斗了。可是——不懂——这是爭論中的不好的顧問和极不可靠的助手。正因此海村陷于荒謬的境地。他曾是很聰明的人，可是如果没有理解而单靠聰明，是走不远的，而現在“les rieurs”（笑者）不在他那边了。

讀者可以看，由于完全相类的爭論，对于海村，我們不得不用以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目光去看他。是的，只是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嗎？所有一切把矢志为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⁴⁸⁰——这些名字是无数的——服务的意图加于“馬克思主义信

^①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 1848, S.22. [《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年，第22頁]。

徒”的人，都屬於此類，因為他們都重復海村的錯誤，因為他們之中，誰都沒有想出一個在差不多五十年前在海村的論據中所沒有的反對“經濟”唯物主義者的論據。如果說他們還有什麼新穎的東西的話，那末只有一個：即他們對於他們的不新穎到什麼程度這點的幼稚無知。他們都想替俄國找尋“新道路”，而由於他們的愚蠢，“貧乏的俄國思想”却只墮入了、充滿坎坷的、早已被拋棄的歐洲思想的老路。這是可驚的，可是，如果用“必然性的範疇”來解釋這個顯然是奇怪的現象，那末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特定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在它的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必然地”產生一定的胡說。

下述的例子指明，海村在和馬克思爭論中陷於何等可笑的地步。他窮追自己的論敵，要求他們說出自己的關於將來的詳盡的“理想”，他問他們道，請你們說一說，財產關係將應怎樣建立？一方面私有財產的界限，另一方面社會財產的界限應該怎樣？他們回答他說，在每一特定時機，社會的財產關係是由它的生產力的狀態決定的，因此，只能指出社會發展的一般方向，可是不能預先制定任何確切的一定的立法草案。現在就可以說，由現代工業創造的勞動社會化應該引導到生產資料的國有。可是不能說在什麼界限中——例如十年後——將實現這個國有：這將決定於那時小工業與大工業，及土地占有與農民的土地財產等等處於什麼樣的互相關係中。——海村推論道，那末，你們就沒有任何理想，只有以後將由機器造成的理想才是好的。

海村是站在空想主義的觀點上的。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在制定自己的理想時是從某種抽象的概念——例如，人性的概念——，或某種抽象的原則——例如，某種人權的原則或是某種“個性”的原則及諸如此類出發的。既然有了這種原則，那就不難從它

出发而最完全确切地、詳尽无遗地規定，例如，人們的财产关系应该怎样（当然，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形下是不知道的）。并且，当人們向空想主义者說，不能有那种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无关而本身是好的财产关系，而空想主义者以惊奇的目光看着他，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以为，这种人完全沒有任何“理想”。假如讀者稍稍注意地追踪我們的叙述，就可知道，在这兒，空想主义者非常不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理想而且是确定的理想：使必然性服从自由，盲目的经济力服从人的理性力。就从这个理想出发，他們指揮自己的实践活动，这活动显然不是在替资产階級效劳，而是在发展那些将来应该成为自己生产物的主人的生产者的自我意識。

馬克思和恩格斯絲毫也用不到“关心”变德国为英国，或者如俄国現在人們所說的替资产階級效劳；就是沒有他們的努力，资产階級亦发展起来了，而且要停止这个发展是不可能的，即沒有能够做这一点的社会力量。而且做这一点也是多余的，因为旧的經濟秩序，归根結底并不比资产階級秩序好，并且在四十年代已經陈旧到对一切人都有害的了。可是停止資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不可能却并未取消德国的有思想的人們替他的国民的幸福服务的可能。资产階級有着自己的同伴：一切由于經濟必然性的力量真正替它的錢袋服务的人。这些不自由的奴僕的觉悟愈发展，則他們的地位愈佳，他們对一切国度和一切人民的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的抵抗亦愈烈。馬克思和恩格斯亦就把发展这个自我意識作为自己的任务；根据辯証唯物主义的精神，他們一开始就在自己面前提出完全的、絕对的任务。

經濟现实是理想的标准。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这样說过，根据这点人們疑惑他是某种經濟的慕尔却林派（慕尔却林是《智慧的悲哀》一剧中的人物，是一个权势的阿諛者。——譯者），准备將經濟

上的弱者沉之污泥而趋奉经济上的强者。这种疑惑的来源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经济现实一語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当形而上学者听到：社会活动家应该依靠现实，他以为是劝告他和现实妥协。他不知道，在任何经济现实中有对立的因素，和现实妥协乃是和它的因素之一妥协，和在当时统治着的因素妥协。辩证唯物主义者曾经指出并且现在还指出现实的另一个因素，敌视这个因素的因素，其中成熟着将来的那个因素。现在我们请问：依靠这个因素，以它为自己理想的标准——是否是趋奉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呢？

可是，如果理想的标准应该是经济现实，那末，就可以理解：理想的道德标准之不能令人满意不是因人们的道德感值得蔑视和厌恶，而是因为这些感觉并未给我们指出替我们的亲近的人们服务的正确的道路。同情自己的病人，这对医生是不够的；医生要认识人的机体的生物现实，依靠它和它的疾病奋斗。假如医生设想道德愤懑就足以抗拒疾病，那末，他便值得最恶毒的讪笑。马克思就讪笑了自己的论敌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而论敌们以为他嘲笑了“道德”。“在那自己既无道德，又无意志的人的目光中，人的道德和意志是没有价值的。”——海村惊喜地叫道①。

可是，应该指出，如果“经济”唯物主义的俄国的论敌们一般地只是重复——*sans le savoir*（不知不觉地）——其德国先辈的论证，那末，他们总还是在某些部分上使自己的论据更为花样复杂。例如，德国的空想主义者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规律”并不发长篇大论的议论。而在我们这里这类议论实在是多得骇人。读者还记得，伏·伏·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初就答应了要发现俄国经济发展

① 《Die Helden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Bern 1848, S. 22.〔《德国共产主义的英雄》，伯尔尼，1848年，第22页。〕

的規律⁴⁸¹。是的，伏·伏·先生后来害怕这样的規律了，可是，他自己就說明，他的害怕只是暫时的，只在俄国知識分子还没有发现很好的和很善良的規律之前。一般地，伏·伏·先生是乐于参加俄国应否經過資本主义阶段的无限的爭論的。从七十年代起，馬克思的学說就被牵入于这个爭論中了。

在我們这里这类爭論是如何进行的，可以克里文科先生的最近的話为証。这位作家在和司徒卢威先生爭論时，劝告自己的論敌，更好地想一想关于“資本主义的当然性及其良好后果”的問題。

“如果資本主义制度是命定的、必然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經過的发展阶段，如果在这个历史必然性面前只有低头，那末应否采用那些只能阻滯資本主义秩序来到的办法，或者相反应否促进过渡到它并用一切努力促其迅速到来即力求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与手工业的資本化，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和一般地驅逐多余的农民到工厂中去呢？”^①482

塞·尼·克里文科在这兒，实在說来提出了两个問題：（一）資本主义是否是命定的必然的阶段？（二）如果是的，那末：从这兒产生出什么样的实际任务？我們且說第一个。

塞·尼·克里文科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地提出了問題，即一部分而且是一大部分我們的知識分子正是在这种形态中提問題：資本主义是否是命定的、必然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应当經過的阶段？有一个时候以为，馬克思肯定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并因此大为失望。当馬克思似乎是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信^②483公开了的时候，惊奇地看到，馬克思不承認这一阶段的“当然性”，这时候人們恶意地欣喜起来，以为，好呵，他丢了自己的俄国的学生的丑呵！可是恶

① 《俄国財富》，1893年12月号，第2部，第189頁。

② 馬克思的这封初稿的尚未校正的信是写給《祖国紀事》的編者的，而不是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馬克思以第三者称之。

意欣喜的人忘了法国的諺語：“bien rira qui rira le dernier”（“誰笑在最后，誰笑得最好”）。

馬克思的“俄国學生們”的論敵的这个爭論，从头到尾都是最“不自然的廢話”。

事情是在：当說到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可否应用于俄国时，他們忘掉了一件小事：忘掉了弄清楚，这个理論到底是什么？而因此，以米海洛夫斯基为首的我們的主觀主义者墮入了真正的巨大的陷阱。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讀了（如果讀了的話）《Zur Kritik》（《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序言，在这序言上叙述着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論，而断定这不过是黑格尔主义。在象所在之处沒有看見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开始左顧右盼，最后，他以为他在論資本主义积累一章上看到这个找寻着的象了，而这一章講的是欧洲資本主义的历史运动，却并非全人类的历史。

任何过程在它存在的地方是无条件地“当然的”。例如，火柴的燃烧，在它燃烧时是“当然的”；火柴“当然”要熄灭的，当燃烧过程完結时。在《資本論》中講的是資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在对于那些有这个发展的地方是“当然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設想了在这一章中有着整个历史哲学之后，就断定：按馬克思的意見資本主义生产对于一切国度和一切人民是当然的^①。这时候，他对于那些俄国人的困难地位就煩惱起来了，并且——好一个丑角——在給自己的煩惱的主觀要求偿付了貢稅以后，就庄重地轉向朱可夫斯基先生說：你看，我們也会批評馬克思，我們并非盲目地追隨 magister dixit（先生說过的話）。显然，这絲毫也沒有使得“当然性”的問題前进一步，可是在讀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煩惱辞之后，馬克思就想來幫助他。他以給《祖國紀事》的編者的信的形式

写了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文的意見的草稿。当馬克思死后，这信的草稿出現于我們的报章上时，就給了俄国人至少一个正确解决“当然性”問題的可能的了。

关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論文，馬克思能說什么呢？这个人陷于不幸的境况中，把馬克思的理論中完全沒有的东西，当做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論。显然，应该首先从不幸中救出那有希望的青年的俄国作家。此外，俄国的青年作家（指米海洛夫斯基。——譯者）又不平于馬克思之判決俄国走向資本主义。应该告訴俄国的作家，辯証唯物主义并不判決任何国家走任何道路，他不指出对于任何民族在任何特定時間的共同的和“当然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往后发展永远是决定于其內部的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因此，对于任何郑重的人，无需推測和煩惱于任何宿命的“当然性”，而首先应该研究这个互相关系；只有这种研究才能指明，对于特定的社会，什么是“当然的”和什么“不是当然的”。

所有这些馬克思都做了。首先，他发现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誤会”，“在論原始积累的一章中，我想描写西欧資本主义制度从封建—經濟制度走出来的道路。因之，在其中，追踪着那使生产

① 參閱《卡尔·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一文，——《祖国紀事》，1877年10月号。“在《資本論》第六章中，有一节，标题是：《所謂原始积累》。这里馬克思心目中有着資本主义生产开始时的历史概述，可是他給予了更多的东西——完整的历史哲学理論。”我們再說一遍，这完全是胡說；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論叙述在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完全不了解的《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序言中，采取着“几个綜合的，彼此密切联結着的观念”的形态。可是，这是附帶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在有关于資本主义过程对西方的“当然性”上亦是狡猾地不理解馬克思。他在工厂立法上看到对資本主义过程的宿命的不可曲折性的“修正”。他以为，按照馬克思，“經濟的东西”不用人們的参加，本身便作用着。他是这么彻底，以致在人們对自己生产过程的每一个干涉上都看到修正。他不知道的，只是按照馬克思，这个干涉在其每一特定形态上本身便是特定的經濟关系的产物。請和这样經常地不理解馬克思的人們去进行关于馬克思的爭論吧！

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历史进程，在这进程中，生产者变成了雇佣工人（现代意义的无产者），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在这个历史中，每一变革成为一个时代，成为资本家阶级发展的杠杆；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基础是剥夺土地占有者。在本章之末，我谈到资本主义积累的趋向，断言，它的最后一语将是资本主义所有权之变为社会的所有权。在这些结语中，我未曾举出任何拥护上述断言的证据，其原因是，这断言本身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冗长的多次的議論的一般結論。”⁴⁸⁴

为着更好地說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那里沒有而且不能有历史理論的地方，当做历史理論起見，馬克思指出古羅馬的例子。非常令人信服的例子！真的，如果一切人民都“当然”要經過资本主义，那末对羅馬人，对斯巴达人，对殷卡人的国家，对于其他許多民族怎么办呢，这些民族并未完成这些縹緲的当然性就离开了历史舞台？对于馬克思，这些民族的命运并不是不知道的；因此，他不能說到资本主义过程的到处的“当然性”。

“把我的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概述变为一切民族历史道路的整个历史哲学的理論，——馬克思說，——对于每个民族不論其历史存在的条件怎样，都是宿命地給他們預定着的；这对于我的批評者是很方便的。可是我請大家原諒：这种解释对于我，同时既是不胜荣幸，又是不胜羞辱。”⁴⁸⁵

是的，岂不正是如此！因为这种解释把馬克思变为一个“带公式的人”，而馬克思在和蒲魯东論战中早就嘲笑过这种人了⁴⁸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进步公式”加諸馬克思，而馬克思回答道：不胜感謝之至，可是，我并不需要这好东西。

我們已經看到空想主义者对于历史发展規律是怎么看的（請讀者記起，我們关于圣西門所說过的話）。历史运动的規律性，在

他們那里有着神秘的面貌；在他們的观念中，人类所走的道路，似乎是早已預定了的，任何历史事变都不能改变这个道路的方向。多么有趣的变态心理呵！在空想主义者那里，“人的天性”是他們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天性的发展規律，在他們那里立即带有神秘的性質，移植于人之外及人們关系之外的某处去了，移植到某个“超历史”的領域中去了。

辯証唯物主义在这里也是把問題移到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因而亦便給它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辯証唯物主义者“一切归于經濟”。我們已經解释了应该怎样了解这点。可是什么是經濟呢？这是組成特定社会的人們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不是不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物。它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同样亦在包围特定社会的历史环境的影响下永久地变化着。既然有了人們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在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就宿命地产生出一定的結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运动是規律性的，而且沒有人比馬克思更好地解释过这个規律性。可是每个社会的經濟运动有其“独自”的面貌，因为它在其中进行的条件是有“独自性”的，所以，不能有包括过去和預言将来一切社会的經濟运动的“进步公式”。进步的公式——这是抽象的真理，按《果戈里时代俄国文学概述》的作者的話，抽象真理曾为形而上学者所深爱。可是，按他的公允的論断，抽象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决定于時間和地点的情况，如果一切决定于这些情况，那末人們便应该研究它們⁴⁸⁷。

“为着能够确信地判断現代俄国的經濟发展进程，我学习了俄文并在数年間研究了政府的及其他的出版物上关于这一問題所有的材料。”⁴⁸⁸

俄国的馬克思的信徒在这上面是忠实于他的。当然，經濟認

識的廣狹可有不同，可是這里事情不在個別人物認識的範圍如何，而在觀點本身。俄國的馬克思的信徒並不以主觀理想和某種“進步公式”為領導，而是注意自己祖國的經濟現實。

關於俄國，馬克思得到什麼結論呢？“如果俄國繼續按照其在1861年以後所選擇的道路行進，那末它將失去歷史進程所給予人民的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激蕩的一個最方便的機會”。稍後馬克思更增加道：近幾年來在按上述道路行進上俄國已經“做了不少”。從這封信寫就之後（我們注一句：即從1877年後），俄國日益更甚和日益更快地按這道路行進着。

從馬克思的信中得出什麼結論來呢？——三個結論：

（一）他用自己的信不是丟了自己的俄國學生的丑，而是主觀主義者先生們的丑，這些先生們關於他的科學觀點毫無任何概念，企圖按照自己的式樣和類型改造他，把他變為形而上學者和空想主義者。

（二）主觀主義者先生們所以不對這封信感到羞恥，只是因為忠實於自己的“理想”的他們連信也沒有懂得。

（三）如果主觀主義者先生們願意和我們談論關於俄國向哪里去和怎樣去的問題，那末，他們在每一特定的時刻應該從分析經濟現實出發。

這個現實的研究使得馬克思在七十年代得出有條件的結論：“如果俄國將繼續按照它從農民解放時起走上的道路前進，那末，她將造成完全資本主義的制度，然後，它既陷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羈絆下，就不得不和其他人民——普通人一樣服從資本主義的不可動搖的規律。這就是一切！”

這就是一切。可是希望為自己祖國的幸福效力的俄國人不能滿足於這種有條件的答案：他必然產生這麼一個問題：俄國是否將

繼續按照这一道路前进？是否有能使人希望俄国将不走这一道路的根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又应该研究国家的实在状况，分析它的现代的内部生活。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根据这种分析，断言：是的，將繼續。沒有根据可以使人希望俄国将迅速抛弃其在 1861 年后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一切。

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学生们”错了。他们应当以同一俄国的现实所提供的根据来证明这点。“学生们”说，俄国將繼續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不是因为有某种外部的力量，某种神秘规律推动它走上这一道路，而是因为沒有能够使它离开这个道路的实在的内部力量。如果主观主义者先生们以为这样的力量是有的，那末，請他们说出来，它在哪儿，請他们证明它的存在。我们将很高兴地倾听他们。至今关于这点我们从他们那里什么确定的东西也沒有听到。——怎么沒有力量，我們的理想算什么？——我們的亲爱的論敌們惊叫道。

唉，先生！先生！真的，你們幼稚到可怜的程度。因为問題是在如何實現你們的理想（虽然你們的理想是頗为支离破碎的）。这样提出来的問題当然是有着干燥无味的性質，可是如果不解决这个問題，你們的理想便只有“理想的”意义。

把一个善良的青年投之獄中，鎖上鉄柵，放上严密的警戒。善良的青年人付之一笑。他拿起早就預备好的黑炭，在墙上画一只船，坐上这船……告别了牢獄，告别了森严的警戒，这善良的青年重又遨游于化日光天之下。

很好的故事！可是……只是故事。实际上壁上的画船，从来沒有把任何人渡到任何地方。

从农奴法取消之后，俄国就已經显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道路。主观主义者清楚地看到这点，他们自己也肯定：旧的經濟关系在我们这里以惊人的而且日益增加的速度瓦解着。可是这不要紧——他们彼此互相說道——我们把俄国放上我们的理想的小舟，它便会离开这一道路，便会到辽远的王国去。

主观主义者先生們是很好的故事家，可是……“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一切，然而这是非常之少啊，故事从来也不曾改变过人民的历史运动，其原因是非常枯燥无味的，正如从来沒有一只夜鶯曾經靠寓言养活过一样。

主观主义者先生們采用着把“那些……的俄国人”分为两类的奇怪的划分法：那些相信坐着主观主义理想之船划得开去的人們被認為是好人，真正的人民的善人；而那些說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人們被描写为某种非自然的恶意，企图使俄国农民餓死的人。在任何戏剧中亦不曾出現过如主观主义者先生們所設想的彻底的俄国“經濟”唯物主义者那样的恶人。这个惊人的見解之根据薄弱，正就如讀者們所熟悉的海村的意見之根据薄弱一样，后者曾把有意使德国人民“hungern und verhungern”（“飢餓与餓死”）加諸馬克思。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問自己道：为什么正是現在出現这样的先生呢，这些人“泰然自若地使千百万人們陷于餓死与貧困”？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以为：既然彻底的人决定了，資本主义在俄国是必然的，那末他只有“力求……手工业的資本化，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并一般地把多余的农民从农村中驅逐出去”。塞·尼·克里文科先生之所以这样想，其唯一的原因是，他自己不能作“彻底的”思維。

海村至少承認馬克思对带有工厂烙印的劳动者之偏爱。主观主义者先生們，显然，在“馬克思的俄国学生們”身上，甚至连这个

小小的弱点也不承認：呵，他們彻底地毫无例外地仇恨一切人类子孙。他想使他們都餓死，也許除掉买卖人阶层的代表。真的，如果克里文科先生允許在“学生們”身上，对于工厂工人有某些好意的話，那末，他便不会写上面所引的詞句了。

“力求：一般地把多余的农民从农村中驅逐出去。”上帝在此！为什么力求呢？新的工作人手之加入工厂居民的队伍将引起工資的低落。可是連克里文科先生也知道：工資的低落对于工人不会有好处亦不会觉得好过的。而彻底的“学生們”为什么要力求加害工人，使他难受呢？显然，这些人的彻底只在他們的仇視人类上，他們連工厂工人也不爱！也許是爱的，是特殊情調的爱；爱他——因之力求害他：“爱之如魂，恨之如梨。”怪人！惊人的彻底性！

“力求发展富农，破坏公社，使人民失去土地。”何等可怕！可是为什么要力求这些呢？試想富农的发展和人民失去土地将影响其購買力的下降，而購買力的下降将引起工厂制品需求之下降，减低劳动力的需求，即减低工資。不，彻底的“学生們”不爱工人！是的，只是不爱工人嗎？人民購買力的减少甚至影响到雇主的利益，后者依主觀主义者先生們的高見乃是学生們溫柔地信賴的对象。不，無論你怎样說，这些学生是怪人！

“力求……手工业的資本化”……“毫无顧忌地进行收买农民的土地，或开小鋪子和小酒店，或别的齷齪活动……。”可是彻底的人們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情呢？因為他們相信資本主义过程的必然性；如果某种設施，例如小酒店是这个过程的重要部分，那末小酒店就一定出現（應該設想小酒店在現在是不存在的）。克里文科先生以为：齷齪的活动加速資本主义过程的运动。可是，我們重复說一次，假如資本主义是必然的，“齷齪事”自然會出現。为什么馬克思的彻底的学生們要力求这个呢？

——这里，在他們那里，理論已經在道德感的要求面前沉默了；他們看到了齷齪是必然的，擁抱它当作这个必然性并且赶快从各方面去帮助它，否則，可怜的必然的齷齪，沒有我們就不会很快地支配着。

克里文科先生，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不，那末一切你的关于“彻底的学生們”的議論，都是不行的。而如果是——是，你的个人的彻底性，你本身的“認識力”是不行的。

随便你举出什么来都好，就举手工工业的資本化也罢！它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表现在，第一，在自己手中积累着生产資料的人們；而第二，为了取得一定的报酬而使用这生产資料使之作用的人們。假定，齷齪是前一类人的特点，那末，那些受雇佣而為他們劳动的人們似乎可以避免这个道德发展的“阶段”了吧？如果如此，那末，假使我把我的活动用以为这些人服务，如果我将发展他們的自我意識和保护他們的利益，則在我的活动中有什么齷齪的呢？克里文科先生也許会說，这种活动阻碍資本主义的发展。絕不如此。英国、法国、德国的例子告訴他，这种活动不仅不阻滞資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加速了它，而且使那里的某些討厭的問題的实际解决更加接近了。

或者以公社的破坏为例吧。这也是一个两方面的过程：农民的份地集中在富农手中；过去独立的田主日益增大的部分变为无产者。显然，所有这些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斗争的。“俄国的学生們”来到这喧扰之地，唱着短的然而真心同情的“必然性范畴”的贊美歌并且……開設小酒店。最“彻底的”这样干；較温和的限制于开小鋪子。是这样嗎？克里文科先生！可是为什么“学生們”不站在农村貧民方面呢？

——可是假如他想站在他們方面，他便應該力图阻止他們的

失去土地？——好，就假定应该这样。——而这便阻滞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丝毫也不阻滞。相反，甚至加速它。所有主观主义者先生们都以为公社“自身”倾向于转到某种“更高的形态”。他们是迷误着。公社的唯一真实的倾向，这是走向瓦解的倾向，而且农民的情况愈好，公社便瓦解得愈快。此外，瓦解能够发生于或多或少对人民有利的条件下。“学生们”应该“力求”使它在对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完成。

——那末，为什么不防止其瓦解呢？

——那末，为什么你们不防止 1891 年的灾荒呢？不能够吗？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以逻辑的论据来驳倒你们的观点，而只能把这类与你们无关的事变归罪你们的道德，那末，我们就认为我们的事情是输掉了。可是为什么你们用别的尺度来报答我们呢？为什么你们在和我們爭論中，把人民的貧困描写为似乎是我们干的事呢？因为在拿不出逻辑的地方就拿出空话，特别是可怜的空话来了。你们没有能防止 1891 年的灾荒吗？谁能保证，你们能够防止公社的瓦解、农民的失却土地呢？就以折衷论者如此喜欢的中间道路说吧：假定你们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防止了这一切。可是，在那些你们的努力无所成就的情况下，在那违背你们的努力公社还是瓦解的地方，农民还是失去土地的地方，你们对于这些命定的过程的牺牲品怎样办呢？哈伦只是把那能够出得起渡资的人渡过斯梯克斯的。你们是否只接受公社的真正社员到你的船上以渡到主观理想的王国去呢？你们是否将举起船篙赶走农村无产者呢？你们自己也会同意，先生们，这是很“龌龊”的吧。既然你们同意这点，那末，对于他们，你们便不得不依我们的意见行事，跟着任何有身份的人行事，即不开设使他们滥醉的小酒店，而扩大他们反对酒店、反抗酒店主人，反对任何酗酒的力量，扩大到历史所给予

或将给予他們的程度。

或者，也許，現在我們在开始說故事吧！也許，公社并不瓦解着？也許，人民在实际上並沒有失去土地？也許，我們为着使至今过得很幸福的农民陷入貧困这唯一的目的而想出这个来的吧？可是翻开任何一本你們同一思想的人們的作品，它将告訴你們，今天以前，即在甚至还没有一个“学生”開設小酒店或小鋪子以前，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当你們和我們爭論的时候，你們把情形描写得这样，似乎人民已經生活在你們主觀理想的王国中，而我們由于我們所固有的仇視人类的思想，而抓住他的脚，扯他向下，使之墮入資本主义的陷阱。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資本主义的陷阱存在着，而我們則問自己，怎样和这个陷阱斗争，怎样把人民安置在即使多少接近“理想的”境地？你們可以認為，我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对的，可是，你們为什么曲解我們的意图呢⁴⁸⁹？真的，这是齷齪的，这种“批判”連苏兹达尔人⁴⁹⁰也不願干的。

可是，怎样和資本主义陷阱斗争呢？我們重复一遍，这資本主义的陷阱不管我們的和你們的努力現在已經存在着。你們有一个回答：“巩固公社”，巩固农民与土地的联系。而我們則回答你們說：这只是空想主义者才会有的回答。为什么？因为，这是抽象的回答。按你們的意見，农村公社在一切时候和一切地点都是好的；而按我們的意見，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取决于時間和地点的条件。曾經有过这么一个时候，当时公社能够是对全体人民都有利的；也許，現在亦有些地方，它对农民是有好处的。我們并不起来反对这类公社。可是在許多場合下，公社变成了剝削农民的手段。我們起来反对这类公社，正如反对一切于人民有害的东西一样。請記起烏斯賓斯基所写的那个“白白”付款的农民⁴⁹¹。按你們的意見，对他应该怎么办？把他渡到理想之

国去——你们回答道。很好，和上帝一起渡去吧。可是当他还没有渡过去时，当他还没有坐上理想之舟时，当船还没有来，他还不知道船什么时候会来时，使他不“白白”付款岂不更好些？使他不做公社社员（公社给他的好处，只是完全不生产的花费，是的，另外也许也是到区公所去受定期的拷问），岂不更好些？我们以为——这要更好些，而你们则因此责备我们想使人民饿死。这是否公允呢？这里是否有些“齷齪”呢？或者，也许你们真的不能理解我们吗？难道真是这样吗？柴亚达也夫在什么时候曾说过，俄国人甚至不知道西方的三段论法⁴⁹²。难道这正是 *Votre cas*（你们的立场）吗？我们假定，塞·尼·克里文科先生完全真正地不理解我们；假定这对卡列也夫先生也是一样，对尤沙柯夫先生亦是一样。可是我们永远以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头脑要“清楚”得多的人呵。

先生，为着改善千百万实际上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命运，你们想出了些什么来呢？当说到“白白”付了款的人时，你们只能给一个回答。虽然他“白白”出了钱，但是这总还是应该的，为的是不破坏他和公社的联系，因为，公社破坏之后，你就不能恢复它了。自然，这会使“白白”出钱的人有一时的不便，可是……“农夫容忍一下，也非坏事”⁴⁹³。

这样，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准备把人民的最迫切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理想的牺牲品。这样，他们的说教实际上日益成为对人民有害的了。

“社会地位要她成为热情的女人”——关于安娜·巴芙洛娃娜·涉来尔，托尔斯泰曾经这么说过⁴⁹⁴。对资本主义的仇视成了我们的主观主义者们的社会地位了。老处女的热情能给俄国贡献一些什么好处呢？丝毫也没有。对资本主义的“主观的”仇视能给俄国生产者一些什么好处呢？同样丝毫也没有。

可是，安娜·巴芙洛夫娜的热情至少是无害的。而对資本主义的烏托邦式的仇視則开始肯定地有害于俄国的生产者，因为它使我們的知識分子对于巩固公社非常之不择手段。只要一說到巩固公社就来了一陣陰暗，在这陰暗中所有的猫兒都成了灰色的了（即不分青紅皂白之意。——譯者），而主观主义者先生則准备着亲热地和《莫斯科新聞》接吻。所有这些“主观的”精神錯乱正是引导到有利于那似乎是“学生們”想栽培的小酒店。說出来是可耻的，而藏在心里是罪恶：資本主义的烏托邦的敌人，实际上是資本主义的走狗，而且是它的最粗野、最討厭、最有害的走狗。

以上我們說的是过去曾經企图过或者現在还企图想出某种反对馬克思的意見的空想主义者。現在我們来看一看那些倾向于引用馬克思的空想主义者过去和現在是怎样办的。

海村——現在俄国的主观主义者們在与“俄国的学生們”斗争中以如此惊人的确切性重复着他的——曾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空想主义者。可是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曾有許多对抗这派的空想主义者的流派⁴⁹⁵。

当时德国的社会經濟状况的一般特点是这样的。

一方面，資產階級迅速地发展着，它經常地要求政府之援助与支持。著名的 Zollverein（关稅同盟）曾完全是它的事情；拥护关稅同盟的宣传鼓动不仅借助于“請願”而且借助于多少算是科学的研究；我們还記得弗里德里希·李斯特⁴⁹⁶。另一方面，旧的經濟“基础”的破坏使得德国人民对于資本主义是处于毫无保护的地位。农民与手工业者已經被充分地吸收于資本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他們身受了資本主义的一切不利的方面，这在过渡时期是特別有力地使人感觉到的。可是，劳动群众在那时候还很少能够抵抗。它还不能給資本的代表以多少有力的回击。在六十年代时馬克思曾說

过：德国同时受到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发展不足之苦。在四十年代，它所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之苦还更厉害。资本主义破坏了农民生活的旧基础；过去在德国欣欣向荣的手工业现在不得不经受它力所不及的机器工业的竞争。手工业者贫困了，一年年地更加严重地依赖于垄断商人了。而同时，农民对于地主和国家应该担负许多这样的赋役，这些赋役也许在以前是不甚沉重的，而在四十年代则日益沉重起来，日益更不适合农民生活的实际条件了。农民的贫困到了惊人的程度；富农成了农村的完全的主人；他们常常买农民的青苗；乞食成了谋生之道。当时的研究曾指出在公社中，几千户之内不乞食的只有数百。在有些地方——事情是不可设想的，可是为当时的德国报纸指出过——农民以食尸肉为生。他们在离开了乡村之后，在工业中心找不到足够的工资，报纸曾指出日益增长的失业及由它引起的移民。

下面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报纸之一怎样描写当时劳动群众的情况：“拉文斯堡及德国其他省区的几万纺织工人已经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了，他们不能销售自己的制成品（主要地是指手艺人），他找寻工作与面包，两者均无所得，因为除了纺织之外，他们要找到工资，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困难。为着微薄的工资，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竞争。”① 497

国民道德无疑地堕落了。旧的道德概念的动摇适合着旧的经济关系的破坏。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充满着对于工人的酗酒、淫乱、奢侈、浪费（这些是和工资减少一起在他们的队伍中发展起来的）的怨言。在德国工人中还没有看到新道德——即后来根据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唤起的新的解放运动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道德。群

① 《Der Gesellschaftsspiegel》，Band I, S. 78.（《社会之镜》，第1卷，第78页），维斯脱发里通讯。

众的解放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它的愤愤不平只是不时表现在无希望的罢工,无目的的骚动,无意义的破坏机器。可是在德国工人的头脑中已经开始有了觉悟的火花。在旧秩序下是不需要的奢侈品的书籍,在新秩序下已经成了必需品。读书欲已经抓住工人了。

这便是德国知识分子(der Gebildeten [有教养的人]——如当时所说的)应该加以考虑的情况。怎么办,如何帮助人民? 排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回答道。这时候问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为一部分德国知识分子所欣喜地欢迎,作为拥护必须排除资本主义的若干新的科学的论据。“一部分自由主义的论客先生们以新的力量鼓吹着李斯特的保护关税的喇叭,力图使人信服……他们之关心工业的高涨,主要地,是为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反对者,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则力图证明使英国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典型国家的并非保护关税——在这时候,非常适时地出现了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卓越的書,它破坏了最后的幻想⁴⁹⁸。大家公認,这書是现代的杰出的著作之一。它用若干不可駁斥的論据指明:以私有企业者(对于这些人,金錢就是神)的个人的貪婪、自由竞争为其推动原则的社会将落入怎样的陷阱。”^①

这样,应该排除资本主义,否則德国将陷于英国已陷于其底层中的深渊里去。这是为恩格斯所证明了的。誰来排除资本主义呢?知识分子, die Gebildeten (有教养的人)。依这样的Gebildeten之一的话,德国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德国排除资本主义乃是德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在西方(in den westlichen Ländern)与资本主义斗争得更多的是工人”^②。德国知识分子怎样排除资本主义呢?经过生产的組織(Organisation der Arbeit——劳动的組織)。为着組織生

^① 《Der Gesellschaftsspiegel》, Band I, S. 86. Notizen und Nachrichten. (《社会之鏡》,第1卷,第86頁,紀事与新聞。)

产，知识分子应做些什么呢？在1845年在凯伦出版的《Allgemeines Volksblatt》提出下列的办法：

（一）促进国民教育，组织民众阅读室、民众演奏会等等。

（二）建立大工场，其中工人、手工业者与手艺人可以为自己工作，而不替雇主或定货者工作。《Allgemeines Volksblatt》希望这些手工业者—手艺人能够自己团结为联合会。

（三）创立出卖制成品的货栈，这些制成品是由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以及国民工场供给的。

这些办法把德国从资本主义的毒疮中拯救起来。而采取这些方法是更容易的，——这一传单上加上道，——因为“这里和那里已经开始建立经常的货栈——所谓工业市场，手工业者可把自己的商品送去陈列以供销售”，并可即刻得到贷款……跟着描写从所有这一切中产生的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排除资本主义，人们似乎以为在它还发展得薄弱的地方来得最容易。因此，德国空想主义者常常喜欢描写德国还不是英国这一情况；海村甚至直接准备着否认工厂无产阶级在德国的存在。可是因为对于空想主义者主要的事情是在证明组织生产对于“社会”的必需，那末，他们便不费力地和不知不觉地、慢慢地转到这样一种人的观点上，这些人断言：德国资本主义由于它所固有的矛盾已经不能再发展了，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人民的购买力下降着，夺取国外市场是不大靠得住的。因此，在制造业做工的工人必然地将日益减少。在路·布里的著名的书：《Andeutungen über die

② 参阅同一卷厚厚的杂志上的海斯的文章，第1页及以下各页。同时参阅《Neue Anekdoten》，herausgegeben von Carl Grün, Darmstadt 1845, S. 220.（《新笑话》，卡尔·格律恩印，达尔姆斯坦，1845年，第220页），在德国与法国迥异，与资本主义战斗是由有数目的少数人来进行并“保证战胜它的”。

Noth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und über die Aufgabe der Vereine zum Wohl derselben》，Berlin 1845.（《劳动階級的貧困及改善劳动階級狀況协会之任务》，柏林，1845年）出版之后，我們在上面屢次引用的《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之鏡》）杂志就站在这样的观点上了。它是当时德国空想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之一。布里自己問自己道：提高工人階級幸福狀況的协会能否担任得起自己的任务呢？而为了回答这个問題，他提出了另一个問題，即在現時工人階級的貧窮从哪里来的呢？穷人和无产者不是一个东西，——布里說。穷人不願或不能工作；无产者找寻工作；他能工作，但沒有工作，而无产者便陷于貧困。这种現象在过去时代是完全不知道的，虽然永远有着穷人和永远有着被压迫者——例如农奴。

无产者从哪里来的呢？竞争創造了它。竞争破坏了联结生产的旧网結，喚起了工业的空前繁荣。可是亦就是竞争逼迫雇主們压低自己生产品的价格。因此，他們企图减少工資或工作人手的数目。后一目的由机器的改进而达到，它把无数工人赶到街头。此外，手工业者受不住机器生产的竞争，同样亦变为无产者。工資日益降低。布里举出在二十年代在德国繁荣的花布印染业为例。工資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很好的工人每周能有十八至二十泰列尔工資。可是机器及跟它而来的妇女及兒童劳动出現了——工資便惊人地慘跌。自由竞争的原則，在它得到統治的地位的地方，它便到处和永久作用着。竞争引导到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則引导到失业。并且大工业愈完善，失业愈生长，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数目愈少。情况真是这样，这可用下列一点来証明，即上述的不幸只有工业国家中才有，而农业国家則不知道的。可是竞争所造成的情况，对于社会（für die Gesellschaft）是非常危险的，因之，社会便不能毫不关心地对待它。社会干什么呢？这里布里轉到那个

放在他的著作的所謂尖角上的問題：一般地任何協會能否根絕工人階級的貧困？

柏林地方幫助工人階級協會提出了“與其消除現存的貧困，勿寧阻止貧困在將來的產生”的宗旨。現在布里向這個協會講話了。他問：你們怎樣預防將來貧困的產生呢？為着這點你們將怎樣干呢？現代工人的貧困產生於對勞動的需求不足。工人不需要布施，而需要工作。協會從哪里取得工作呢？為着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就要擴大對勞動生產品的需求。而這個對於勞動生產品的需求却因勞動群眾的工資的減少而減少着。或者，也許協會會發現新市場吧！布里認為這亦是不可能的。他得出結論說，柏林協會所提出的任務只是“溫和的幻想”。

布里勸告柏林協會在和工人階級的貧困進行鬥爭之前好好地深思一下其原因。他對彌補政策不以為是有意義的。“勞動交易所、儲蓄和救濟所等等，當然，能夠改善少數個人的狀況，但不能拔除罪惡之根”。聯合會（association）亦不能拔除它：“就是聯合會亦不能避免競爭的沉重的必然性（*dura necessitas*）”。

布里本人在什麼東西上看到清除罪惡的手段呢——這從他的小冊子中很難確切地看得出來。他似乎暗示，為助長罪惡需要國家的干涉，可是，又補充說，這種干涉的結果是可疑的。無論怎樣，他的小冊子對當時德國知識分子引起有力的印象。並且絕非在失望的意義上。相反，人們在他的小冊子上看到了組織勞動的必要的新證據。

下面就是《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會之鏡》）雜誌對於布里的小冊子所說的話：

“著名的柏林作家布里出版了以《勞動階級貧困》等等為題的著作。他以為——而我們同意他的意見——工人階級的不幸產生於生產力之

余剩；这个余剩是自由竞争及物理学与机械学上的新发现和发明的结果；回到行会和组合去是有害的，正如阻碍发现和发明一样；因此，在现存社会条件下（着重点是書評作者加的。——普注）没有可以帮助工人的有效的手段。如设想现代的自私自利的私有雇主的关系依然不变，则应该同意布里，任何协会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贫困。可是这样的设想是絕非必需的；相反，可以产生而且已经产生着那些以用和平的方法排除上述我們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基础为目的的协会。需要的只是政府不要妨碍协会的这种活动。”

显然，批評家沒有理解亦不想理解布里的思想，可是对于我們这不是重要的。我們之提到德国，只是为了借助于它的历史所給的教訓以便更好地研究现代俄国的某些思潮。可是，在这个意味上，四十年代德国知識分子的运动本身有着許多对于我們足資借鑒的东西。

第一，布里的論据使我們想起尼·一遜先生的論据。他俩都指明生产力的发展为劳动需求低落的原因，因之，是工人数量相对减少的原因。他俩都說到国内市場的飽和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劳动力需求繼續降低的必然性。布里似乎不承認德国人夺取国外市場的可能；尼·一遜先生对于俄国工业家坚决不承認这个可能。最后，他俩关于这个国外市場問題都是完全沒有加以研究的，他俩誰都沒有举出一个郑重的論据来拥护自己的意見⁴⁹⁹。

布里从自己的研究之中，除了在帮助工人階級之前應該好好地深思一下工人階級的状况外，沒有做別的鮮明的結論，尼·一遜先生得出这么一个結論：即在我們的社會面前放着一个困难的可是不是不可解决的組織我們民族生产的任务。可是如果以我們上引的《Der Gesellschaftsspiegel》杂志的意見来补充布里的观点，那末得出的，正是尼·一遜先生的結論。尼·一遜先生等于布里加

上批評者。这个公式引我們到如下的思想。

尼·一逊先生在我們这里被称为馬克思主义者，甚至唯一的“真正”馬克思主义者。可否說，布里和批評者对四十年代德国状况的观点的总和等于馬克思对同一状况的观点呢？換言之，布里——由批評者补充了的——是否是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唯一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par excellence（主要是）馬克思主义者呢？当然，不是。从布里指出資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而陷入的矛盾，还不能得出他站在馬克思的观点上。他从极抽象的观点观察了这些矛盾，就单单由于这一点，他的研究，按其精神說来，就与馬克思的观点毫无相同之处。听了布里的話，可以以为，德国資本主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就要在自己发展的重压下窒息而死，資本主义已无路可走了，手工业已經最后地資本化了，德国工人的数目迅速地走向降落。馬克思并未說过这样的观点。相反，当他在四十年代之末，特別五十年代之初要說到德国資本主义的最近命运时，他說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有完全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才能承認德国的尼·一逊們为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①。

① 尼·一逊們在当时德国是很多的，并且有极不同的派別。也許最令人注目的是保守派。例如卡尔·福里格拉夫博士，ordentlicher Professor der Rechte（法学正教授），在一本有很长的題目的小册子（《Von der über und unter ihr naturnothwendiges Mass erweiterten und herabgedrückten Concurrenz in allen Nahrungs- und Erwerbszweigen des bürgerlichen Lebens, als der nächsten Ursache des allgemeinen, alle Klassen mehr oder weniger drückenden Nothstandes in Deutschland, insonderheit des Getreidewuchers, sowie von den Mitteln zu ihrer Abstellung》，Darmstadt 1848.）（《論市民社会中一切食品生产領域內及工业領域內之竞争，逸出自然地必然范围或未达到此范围之竞争乃是或多或少涉及一切階級的德國之普遍貧困的亲近原因，特別是論粮食高利貸之原因以及消除它的办法》，达尔姆施坦，1848年）中，描述“德意志祖国”的經濟状况。惊人地类似在《我国改革后社会經濟概述》中所描述的俄國經濟状况。福里格拉夫同样将事情描写为，似乎生产力的发展，“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已經引导到在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数目之相对减少。在他那

德国的尼·一遜們的議論之抽象，正如我們目前的布里和福里格拉夫一樣。抽象地議論就是說，即使你从完全正确的原則出发，也会錯誤。讀者們，你們知道，什么是达兰貝爾的反物理学嗎？达兰貝爾說，他根据最无可爭論的物理学規律可以証明在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現象的必然性。只要注意每个特定規律的作用而一时忘記了別的使其作用变化的規律的存在，就可办到这点。这样的結果，大概就会得到完全荒謬的东西。为了証明这点，达兰貝爾举出了几个真正鮮明的例証并且甚至准备在空閑的时间写出整本反物理学。福里格拉夫先生和尼·一遜先生已經不是开玩笑而是严正地写着反經济学。他們的手法是这样的。他們采用著名的无可爭論的經济規律，他們正确地指明其趋向；然后，他們忘掉了这个規律在生活中的实现是整个历史过程，而把事情描写为这样，似乎在他们从事写作自己的研究时，特定規律的趋向已經完全在生活中实现了。而且，如果某个福里格拉夫，布里或尼·一遜将不會好好消化的統計材料如山一般地堆积起来，并随便地或順便地引証馬克思，那末，他的“概述”就带上《資本論》作者的精神的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研究的面貌了。可是，这是錯覺，而且不过是錯覺。

里，較之在布里那里更詳細地描写着失业对于國內市場状况的影响。一个工业部門的生产者同时是其他部門的生产品的消費者，可是，既然失业夺去了生产者的購買力，那末需求就减少了，因此，失业成了普遍的，就产生了完全貧困(völliger Pauperismus)……而且既然农民亦由于过度的竞争而破产，那末，就来到了事业上的完全停滯，社会机体瓦解，它的生理过程使粗野的群众出現，而饥饿在这个群众中引起騷动，国家的懲罰，甚至武器对它亦是毫无效力。自由竞争在农村中使农民失去其土地。在任何一家农户中，劳动力在整年内都没有找到充分的使用。“这样，在几万农村中，特別在土地省瘠之区，正象在爱尔兰一样，差不多完全貧乏的农民在自己的門戶之前既无工作又无所事事。他們中間誰亦不能帮助別人，因为，所有他們有的都非常之少，大家都需要工錢，大家都找寻而又找不到工作。”福里格拉夫自己亦想出了若干与“自由竞争”的破坏影响斗争的“办法”，虽然，这些办法是和《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之鏡》。——譯者)这个社会主义杂志的精神完全不同的。

例如，福里格拉夫在分析他所处时代的德国经济生活时忽略了許多东西，这就证明了那个无可争辩的事情，即他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机体的解体”的预言完全未中鹄的。而尼·一逊先生之徒然无益地引用馬克思的名字，正如朱可夫斯基先生之有时徒然无益地乞援于积分学一样。这点甚至最可尊敬的克里文科先生亦不費力地懂得了。

和那些責备馬克思为片面性的先生們的意見相反，馬克思从来也不把特定国家的经济运动撇开它同产生在经济运动基础上并影响其往后发展的社会力量的联系而来加以观察（克里文科先生，这对于你，暂时还不是完全明白的，可是——請忍耐一下）。既然有了一定的经济状况——这便亦就給予了一定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的作用必然地反映在这个状况的往后的发展上（克里文科先生，你已經不耐煩了吧！下面就有鮮明的例子）。原始資本主义积累时代的经济状况已經給予了。这亦便給予了那在当时集議于英国国会中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的行动是这个经济状况往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他們行动的方向是为这个状况所制約的。給予了現代英国的经济状况，这亦便給予了現代英国的社会力量，他們的行动将影响于英国的将来的经济发展。当馬克思从事于某些人所乐于称之为推测的时候，他曾把这些社会力量加入于考虑之中，并不以为这些社会力量的作用可以由这个或那个只是以自己良好意图为能事的人們集团的自由意志来加以阻止的。（“Mit der Gründlichkeit der geschichtlichen Action wird der Umfang der Masse zunehmen, deren Action sie ist.”）（“随着历史运动的深入，群众的規模将扩大，因为历史运动是群众的事业。”）

四十年代的德国空想主义者是不同地議論的。当他們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定的任务时，他們只注意本国经济状况的不方便，而忘

記了研究从这些状况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力量。上面提到过的批評家議論道：我們人民的經濟狀況是悲慘的，所以在我們面前有着困难的、可是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組織生产的任务。可是，那些产生于这个悲慘的經濟狀況基础上的社会力量是否会妨碍这个組織呢？关于这点，善意的批評家并未問过自己。空想主义者从来没有在足够程度上估計自己当时的社会力量，其原因很简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他永远把自己放在社会之上。而由于这同一的原因，用同一个馬克思的話來說，空想主义者的一切計算是“ohne Wirth gemacht”（“不經主人参加而造成的”），而他的全部批評不过是完全没有批評，不能批判地观察他的周围现实。

在特定的国家中，生产組織的出現只能是这个国家中存在着的社会力量的作用的结果。为着生产的組織需要些什么呢？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在其全部复杂性和整体上）的自觉的态度。在那还没有这种自觉态度的地方，只有那終身是不可救藥的空想主义者（尽管他們五亿次以最大的尊敬提起馬克思的名字）才能把生产的組織提出作为迫切的任务。尼·一逊先生在自己的著名的著作中关于生产者的觉悟講了些什么呢？絲毫也沒有說出什么来，因为他囑望于“社会”的觉悟。如果在这之后，还可以和应该承認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那末，我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承認克里文科先生是現代唯一真正的黑格尔主义者，par excellence（主要是）黑格尔主义者。

可是，是結束的时候了。我們的比較一历史法給了我們一些什么样的結果呢？如果我們不錯的話，是下述这些：

（一）海村及其同道关于馬克思用他本身的观点判定了在德国毫无作为这种說法是一种胡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那些現在在俄国保有馬克思的观点的人們不能对俄国人民有所貢獻，反而

对他有害的說法也是一种胡說。

(二)布里和福里格拉夫对当时德国經濟状况的观点，由于其抽象性成为狹隘的、片面的和錯誤的。可以担心，俄国今后的經濟历史在尼·一遜先生的观点中将发现同样的缺点。

(三)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提出生产的組織为自己迫切任务的人是空想主义者。在目前俄国高談生产的組織的人同样是空想主义者。

(四)历史粉碎了四十年代德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有一切根据設想，我們俄国空想主义者的幻想亦将遭受类似的命运。資本主义已經嘲笑了前者，我們痛心地預見，它亦将嘲笑后者。

可是，难道这些幻想对德国人民竟毫无貢獻嗎？在經濟关系上等于零，或者，你們要求用更确切的詞句，則差不多等于零。所有这些出卖手工艺制品的市場及所有这些創立生产者协会的企图几乎連几百个德国生产者的状况也未改进。可是他們促进了这些生产者的自我意識的觉醒，因此給予了他們很大的好处。德国知識分子的启蒙活动：学校，民众閱覽室等亦給予了同样的好处，可是是直接地，而非迂迴地。資本主义发展对于德国人民有害的后果，只有跟着德国生产者自我意識发展的程度才能在每一特定时期被削弱或消除。馬克思对于这点比空想主义者理解得更好；因此，他的活动对于德国人民就更有好处。

无疑地，在俄国情形亦会是同样的。不久前，在《俄国財富》1894年10月号上，克里文科“鼓吹”——象我国人們所說的一樣——組織俄国的生产⁵⁰⁰。克里文科先生用这些“鼓吹”，并不曾消除什么，并沒使任何人幸福些。他的“鼓吹”是拙劣的，不巧妙的和无結果的；可是，假如这些“鼓吹”，不管所有这些否定的品質而激动了即使一个生产者的自我意識的觉醒，那末，它們就是有益

的，這時候，克里文科先生就不会只是为着做出邏輯的錯誤和誤譯他所“不同情的”、用外國文寫的論文片斷而度此一生了。在我們這裡，亦只有跟着生產者自我意識發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和我們資本主義發展的有害的後果作鬥爭。而從我們的這些話中，主觀主義者先生們可以看到，我們并非“粗野的唯物主義者”。假如我們“狹隘”，那末只有在一個意義上，即我們首先提在面前的是完全觀念的任務。

現在再見了，我們的論敵們！我們預先体味着你們的對立論調所給予我們的一切最大的愉快。不過，你們，先生們，好好地看住克里文科先生。他也許寫得并不壞，至少是有感情的，可是，“什麼是为的什麼”，他是不懂的。

附 录 一

再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再論“三段式”⁵⁰¹

在 10 月号的《俄国财富》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于反对彼·司徒卢威时又表示了关于黑格尔哲学和关于“經濟决定論”的几点意見⁵⁰²。

据他說，唯物史觀和經濟唯物主义不是一个东西。經濟唯物主义者把一切都从經濟中引伸出来。“那末，如果我将在社会成員的种族的或部落的一些特点中；在他們的头顱的縱的和橫的直径的各种比例中，在面角的性質中，在顎的大小和方向中，在胸廓的大小、肌肉的力量中，如此类推，或者，从另一方面，在純粹的一些地理因素中；在英国的島国地位中，在亞細亚的平原性中，在瑞士的山地性質中，在北方河流的冰冻中，如此类推，在这些中間寻找不仅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制度，哲学的和其他的看的基础和根源，而且也找寻它的經濟結構的基础，——难道这不是唯物史觀嗎？明白的是，經濟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的理論，只是唯物史觀的个别情况而已……”^①

孟德斯鳩曾傾向于“以純地理因素”來說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在他彻底坚持这些因素时，他，无疑地，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0月号，第2部，第50頁。

我們已知道，現代的辯證唯物主義不忽視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它只是更好地闡明，地理因素怎樣影響“社會的人”。它表明，地理環境對人們保證較多或較少的可能來發展他們的生產諸力量，從而或多或少地有力地推動他們走着歷史運動的道路。孟德斯鳩是這樣地議論的：一定的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一定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特性，而這些特性就產生這一種或另一種社會機構的結果。辯證唯物主義發覺，這樣的議論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發覺地理環境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而且是在最強有力的程度上表現在社會關係的性質上，這些關係自身又比，例如，氣候，更無限些地影響人們的見解，影響他們的習慣和甚至他們的身體的發育。現代的地理科學（我們又回憶一下梅契尼柯夫的書和愛麗查·萊克留為它作的序言）在這一場合是完全和辯證唯物主義相合的。當然，這一唯物主義是唯物史觀的個別情況。但是它比一些其餘的“個別情況”所能做的更完全些地，更全面些地說明歷史。辯證唯物主義是唯物史觀的最高發展。

霍爾巴赫曾說過，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紀為在人的強有力的頭腦中戲耍的原子的運動所決定。這也是唯物史觀。但是這一看法對歷史現象的說明甚么也不能提供。現代辯證唯物主義在這一方面所產生的效果不可比擬地要大些。它當然是唯物史觀的個別的情況，但正是唯一符合科學的現代狀況的那種情況。霍爾巴赫的唯物主義的軟弱無力表現在他的信徒們回到唯心主義上面：“意見支配着世界”。辯證唯物主義現在把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一些障地裡逐出去了。

在米海洛夫斯基看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只能是靠分子力學的幫助來說明一切現象的那種人。現代辯證唯物主義不能對歷史作機械的說明。在這裡，如果您願意的話，可以說是它的弱點之所

在。但是现代生物学能对于种的起源和发展提供机械的说明吗？是不能的。这是它的弱点。拉普拉斯所梦想的那种天才，不用说，是不会有这样的弱点的。但是我们绝对不知道这一天才何时出现，我们就以对于现象的这样一些最符合于我们今日的科学的说明为满足。这就是我们的“个别的情况”。

辩证唯物主义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地，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不应当在哲学中而应当在某一社会的经济中找理解它当前状况的钥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点发表了几点意见；其中之一是这样的：

“……社会学者唯物主义者们的基本公式的否定的那半面(!)，不是对一般的哲学的，而显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抗议和反对之所在。说‘由意识决定存在’的正是后一哲学……经济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是黑格尔主义者，作为这样的人，正因为顽强地硬说：‘不是哲学决定’，‘不是意识决定’，因之他们不能，而且也不企图逃出黑格尔思想的圈子”①。

当我们读完这几行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在这里我们的作者，依照着卡列也夫先生的榜样，偷偷地到达了“合命题”。当然，我们对自己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合命题将比卡列也夫先生的稍为高明些；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限于重复在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小说《不可医治的人》⁵⁰³中教会助祭的那一思想，认为“精神是特殊的一部分”，而且认为“正如物质有于己有用的各种香料，同样，精神也有它们”；但是连米海洛夫斯基也不拒绝合命题：黑格尔是正命题；经济唯物主义是反命题，而现代俄国主观主义者们的折衷主义是合命题。象这样的“三段式”如何不诱人呢？而我们在

① 《俄国财富》，1894年10月号，第2部，第51和52页。

里开始記憶了馬克思的历史理論对黑格尔哲学的真实关系。

首先，我們“已指出过”，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运动完全不是由人們的見解，完全不是由他們的哲学來說明的。用人們的見解、意見說明历史的是十八世紀的法國的唯物主义者们。黑格尔曾嘲笑过这样的說明：他說，当然，理性在历史中支配着，但是須知它也支配着天体的运行，难道天体意識到自己的运动嗎？人类的历史发展，就合于規律的意义說，是合理的；但是历史运动的合于規律性还完全不能証明，应当在人們的見解中，在他們的意見中找到运动的最后的原因；完全相反的：这一合于規律性表明，人們是不自覺地在創造自己的历史。

我們繼續說过，我們不記得按照“刘易士”看来黑格尔得出的是哪些历史見解；但是我們沒有歪曲它們，凡是讀过著名的《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①的人是会同意我們这点的。因此，在主张不是人們的哲学决定他們的社會存在的时候，“經濟”唯物主义的拥护者駁斥的完全不是黑格尔；因此，在这方面他們完全不是他的反面。而这就是說，米海洛夫斯基的合命題將是不成功的，縱令我們的作者不限于重复教會助祭的思想。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的見解，說哲学，即是人們的見解，不說明他們的历史，只在四十年代的德国才可以，那时候还没有看出对黑格尔体系的反抗。現在我們看見，这样的意見在最好的場合也只是根据“刘易士”。

但是“刘易士”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介紹德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他这一介紹的不行到什么程度，除上面所指出的以外还有如下的情况也表明出。我們的作者狂喜地引証別林斯基的有名的

① 《历史哲学》。

信,在它里面他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帽子”永久地告别⁵⁰⁴。在这封信里,别林斯基就中也說到“主体的,个人的,人格”的命运要比全世界的命运和中国皇帝的健康(即是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①重要些。就这封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出了許多意見,但是他沒有“觉察到”,在别林斯基那里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是完全不适当地牽涉进来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看来,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和精神或绝对观念是一个东西,但是在黑格尔那里 *Allgemeinheit* 甚至不是绝对观念的主要特征。*Allgemeinheit* 在他那里所占的光荣地位,不过和,例如, *Besonderheit* 或 *Einzelheit* ^②差不多。而因此,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正是 *Allgemeinheit* 被命名为中国皇帝,并且不象自己的其他姊妹那样,却值得客气的一可笑的鞠躬。这可能被看作小事情,不值得现在时候的注意,但是这不是如此:理解得很糟的黑格尔的 *Allgemeinheit* 直到现在妨碍着,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理解德国哲学史,妨碍他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连“刘易士”也不能把他从灾难中救出。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見,崇拜 *Allgemeinheit* 使得黑格尔完全否定个性的各种权利。他說,“没有一个哲学体系象黑格尔的体系那样对人的个性那样歼灭性的蔑视和(那种?)冷淡的残酷”(第55頁)。这只是根据“刘易士”的說法。为什么黑格尔認东方的历史是人类发展中的最初的,低級的阶段呢?因为在东方沒有发展过、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发展个性。为什么黑格尔談到在其中現代的人感觉自己是在“家里”的古希腊时就狂喜呢?因为在希腊发展过个性(美妙的个性,“schöne Individualität”)。为什么以如此的狂喜談苏格拉底呢?为什么他,差不多是哲学史家中的第一

① (普遍性)。

② (特殊性或单独性)。

个，甚至替詭辯派說公道話呢？难道是因为他輕視了个性嗎？

米海洛夫斯基听到了鈴声，但是不知道它在哪儿。

黑格尔不仅不輕視个性，而且还主张对英雄的崇拜，这一崇拜后来完全为布魯諾·鮑威尔所承繼下来。黑格尔認為，英雄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他們自己是不自由的。布魯諾·鮑威尔反对过“精神”，并以此解放了“英雄們”。在他看来“批判的思維”的英雄們与“群众”相反，是真正的創造者，群众虽然由于自己的愚鈍和行动迟緩也把英雄激怒得流眼泪，但是結果总是走为英雄的自我意識所开辟的道路。“英雄和群众”（“群氓”）的对立由布魯諾·鮑威尔传到他的俄国的非婚生的孩子們，于是我們現在在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文中滿意地看到它（对立。——譯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記得自己的哲学的親屬，——这是不值得夸奖的。

这样一来，我們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供新的“合命題”用的一些成分。黑格尔对于为世界精神服务的英雄之崇拜是正命題；鮑威尔对于只是遵循自己的“自我意識”的“批判的思維”的英雄們之崇拜是反命題；最后，調和两个极端的，消除世界精神和以环境的发展來說明英雄的自我意識之起源的馬克思的理論，这就是合命題。

我們的傾向于“合命題”的那些反对者应当記住，馬克思的理論完全不是第一次的，对黑格尔的直接的反应，他們应当記住这一第一的——由于自己的片面性而是膚浅的反应乃是德国的費尔巴哈的見解，特别是布魯諾·鮑威尔的見解，我們的主觀主义者早就到了把后者認作自己親屬的时候。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反对彼·司徒卢威的論文中关于黑格尔和关于馬克思还說了不少沒有道理的話。篇幅不允許我們在这里把它們一一列举。我們只限于對我們的讀者們提出如下的有意思的課題：

假設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假設他對於黑格爾完全無知；假設他對於馬克思完全不理解；假設他關於黑格爾，關於馬克思和關於他們的相互關係有不可遏制的談論的傾向；試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由於這一傾向還將犯多少錯誤呢？

但是怕難有人能解答這一課題：這是一個帶有許多未知數的方程式。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一些確定量來代替它里面的一些未知量，因此正應當注意地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論文和發現他的一些錯誤。固然，這一事情是不愉快的和不容易的，錯誤將是很多的，只要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預先和比他更內行的人商量，因而不擺脫自己的談論哲學的壞習慣的話。

我們在這裡不想涉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司徒盧威先生的一些攻擊。如果談到這些攻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從現在起是屬於《俄國經濟發展問題的評述》的作者的，而我們不想侵犯別人的私有財產。不過，司徒盧威先生，或許，會原諒我們，假使我們敢於提兩點小“意見”。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為司徒盧威先生對他“揮起”一個問號而難過。他難過到這樣的程度，於是限於指出司徒盧威先生的語言的一些不正確，還罵他為異民族和甚至回憶起關於兩個德國人的笑話，其中的一個說了“стригнулся”，而另一人就糾正了他，斷定說，在俄國話中應當說“стриговался”^①。為了什麼司徒盧威先生對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舉起一只有問號武裝着的手呢？為了這樣的話：“現代經濟制度在歐洲是在這樣的時候形成的，那時候支配這些現象的知識還不存在”如此類推。問號附在“支配”一語後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照德國話，這，或者，不算好（如何不幸：

^① 這裡所說的“стригнулся”和“стриговался”都是指那些不會說俄國話的人所說的笑話，原意為“理髮”。——譯者

照德國話!)，但是就俄國話說來，我告訴您，司徒盧威先生：它並不引起任何問題，而且是不需要問號的。”寫這幾行的人有的是純粹俄國的姓，而且具有同樣的俄國精神，如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樣。最陰險的批評家不肯稱他為德國人，然而“支配”這一語在他心里引起問題。他問自己：假使可以說，科學支配着某些現象的一定領域，那末難道因此不可以把技藝變成特殊隊伍的長官嗎？難道不可以說，例如，試金術支配着合金嗎？在我們看來，這是不太恰當的。這會給予技藝以太軍事的面貌，正和支配這一語給科學以官僚的面貌一樣。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不正確的。司徒盧威先生不作聲地抓住問號；我們不知道，他會怎樣糾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不成功的說法。我們假定，他將開始“стригововаться”。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已經有幾次“стригнулся”，不幸，這已經是既成的事實。看來，他完全不是異民族！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論文中就司徒盧威先生的如下的話可笑地喧囂起來：“不行，我們承認我們的沒有文化，我們去向資本主義學習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把事情描畫成這樣，仿佛這些話意味着“我們把生產者交給剝削者作為他的犧牲”。司徒盧威先生將很容易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努力是白費的，而且大約凡是注意讀過《評述》的人也會看出這一點。但是司徒盧威先生很不謹慎地表達出來了，大概，他以此把許多頭腦簡單的人引入了魔途而且使得幾個江湖賣藝者高興。以後科學，——我們對司徒盧威先生說，而我們也提醒江湖賣藝者們，正如別林斯基在臨近自己生活的結尾時，當他與“Allgemeinheit”^①已告別了很久的時候，在他的一封信中發表了如下的思想，就是，只有資產階級將保證俄

① (普遍性)。

国文化的未来⁵⁰⁵。在别林斯基那里，这也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恐吓。但是他的不恰当是什么引起的呢？是一个西·欧·派·的·高·贵·的·醉·心。我们相信，司徒卢威先生的不恰当也是这样的醉心引起的。就这一事而喧囂只是那种一点也不反对，例如，这一作者的經濟論据的人。

連克里文科先生也反抗起司徒卢威先生来了⁵⁰⁶。他也有自己的委屈。他不正确地翻譯了司徒卢威先生的一篇德文論文的片段，而他揭穿了他这点。克里文科先生为自己辯解，力求表明，翻譯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辯解沒有成功，他仍然是錯在曲解自己的反对者的話。但是从克里文科先生得不到什么，由于他与某二个鳥无疑有相似之处，关于这个鳥人們已經說过：

天堂上的鳥杀倫，
它在歌唱中的声音大得很，
当上帝在歌唱时，
它就忘記自己。

当克里文科先生使“学生”慚愧时，他就忘記了自己。您为什么責备他呢，司徒卢威先生？

附 录 二

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⁵⁰⁷

最近的时候在我们的文献中重新提起了俄国经济发展将走哪条路的问题。关于这问题正说得多而热烈，是这样热烈，以致在社会生活中以谨慎闻名的人，甚至为争论双方的仿佛多余的激昂而惶惑不安起来；为什么焦急，为什么对反对者们投掷骄傲的挑战和辛辣的指责；谨慎的人说，为什么嘲笑他们，冷静的考察对于我们国家确实有巨大重要性的问题（但正由于自己的巨大重要性而要求冷静的考虑），不是更好些吗？

如在过去始终是和常常是这样的，谨慎的人是对同时又不对。为什么属于两个阵营的作家焦急和兴奋呢——这两个阵营中间的每一个人，不论他的反对者们在那里怎样说，都是力求就理解、力量和可能性说，拥护人民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利益的。看来，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会借助于适宜于任何字帖的两三句话马上把它一次而永久地予以解决的；容忍是最好不过的东西；应当尊重别人的意见，甚至在它与我们的意见大为分歧的时候，等等……这一切是很对的，而且在好久以前人们已把这一切“向世界”宣告了。但是同样正确的也是，人类过去，现在和将来每次当谈起他们的迫切需要的时候是急躁过，急躁着而且将要急躁。我们会说，这真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不知道，这一说法是如何经常地和厉害地被人滥用的。但是还不止此。主要的在于，人类关于这样的自己的本性

没有什么理由惋惜。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的步骤不是靠了热情的帮助而干成的，它在十倍增加精神的力量和使活动家的智力锐利的时候，本身就是伟大的进步力量。要冷静考虑的只是一些就本身说是完全不重要或者没有成为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当前问题的那些社会问题，因此它们只为一小撮室内的思想家关心。而一旦轮到那一个或另一个伟大的社会问题时，它必然激起伟大的热情，不管主张稳健而喊叫要冷静些的人有多少。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正是那一种不能为我们稳健地加以讨论的伟大的社会问题，其原因很简单，即是它已成为当前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只是在现在，经济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决定的意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它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在我們这里，如同在各地一样，这一意义不是关心社会事务的人所始终意识到的，而因此这些人把自己的热情的力量集中在只是最遥远地涉及经济的一些问题上面。请回忆一下哪怕是我們的四十年代吧。现在不是那时候了。现在在我們这里甚至那些激烈地反对馬克思的“狹隘的”历史理論的人也意識到經濟的根本的、伟大的意义。现在一切有思想的人們都意識到，一切我們的将来是依据着怎样解决我們的經濟的发展这一問題来形成的。由于这而甚至完全不“狹窄的”思想家們把自己的热情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这問題上面。但是假如現在我們不能温和地考虑这一問題，那末在現在我們可以而且应当关心無論是在明确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及在我們自己的論爭手法中有无放蕩性存在。对于这一要求的反对絕對是沒有任何理由的。西方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严肃的热情是排斥任何的放蕩性的。固然，在我們这里直到現在有时候人們还以为，热情和放蕩性是亲姊妹，但是連我們也到了文明化的时候了。

在文字的禮貌方面我們已文明化了，看來，文明化真是到很大的程度，即，它使我們的“先進的”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訓誡德國人（馬克思，恩格斯，杜林），因為在他們的論爭中仿佛可以找出“或者是完全無結果的”，“或者甚至以自己的粗野性歪曲主題和推開人的”一些東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起貝爾涅的意見，說德國人“在論爭中永遠是粗暴的”。他接着補充說，“而我害怕，同其他的一些德國影響在一起，這一傳統的德國粗暴性在傳播到我們這裡，還為我們自己的野蠻性所複雜化，於是論爭將變成抗辯，如阿·托爾斯泰伯爵把它放在公主的口中對波多克勇士所說的：

騙子手，傻瓜，目不識丁的奴隸！
恨不得把你變成公牛的角（турий рог）！
豬崽，牛犢，豬，埃塞俄比亞人，
魔鬼的兒子，沒有洗的鼻嘴！
假使不是顧我這一處女的羞恥，
假使不是不讓我說別的詞語，
我就會把你罵成騙子手，
而且還不止這樣罵！”^① 508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是第一次在這裡想起不體面的托爾斯泰式的公主。他不止一次地已經忠告過俄國的作家在自己的論爭中不要和她相比。忠告，不消說，是很好的。可惜的只是，我們的作者自己也不是始終遵守着它的。例如，如大家知道的，他把自己的一个反對者稱呼為“黃口小兒”，把另一个人稱呼為“文學上的江湖賣藝者”。他是用這樣的語句來修飾他和吉·拉·雪爾達的論爭：“吉·拉·雪爾達的話在所有的歐洲語言中只是在西班牙語中有

^① 《俄國財富》，第1冊，1895年，論文《文學與生活》。

一定的意义，在俄国話里的意思只是猪”。为什么它对作者是必要的，是十分难以理解的。

“难道不是实话嗎？”吉·拉·雪尔达就这事問道。确实是很好的而且也完全合于托尔斯泰式的公主的胃口。只是公主比較直率些，而当她想罵人的时候，她就这样地喊叫：猪崽，牛犢，猪，等等，不为了对反对者說粗暴的話而濫用外国語。

在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来和托尔斯泰式的公主比較时竟发现，他，在輕視“埃塞俄比亚人”，“魔鬼們的兒子”等等时，他是在偏重用厚脸皮的綽号，假如可以这样表达的話。在他那里您遇到“猪”，也遇到“小猪”，而且是各种各色的小猪：哈姆列特化了的，綠色的，等等。这是有点单調，但是很有力的。一般地假使从托尔斯泰式的公主的罵人詞彙中我們注意到我們的主觀主义社会学家的这样的詞彙，那末在我們之前的，当然是，一些別有天地的語言，其色彩的美丽，就自己的力量和表达性說，一点也不亚于活泼的公主的在論爭中所表現的美妙。“Est modus in rebus^①，或者用俄国話說，应当識相”，——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的。这是沒有比它更为正确的，而我們衷心地抱歎，我們的年高望重的社会学家关于这一点常常忘記。他关于自己可以叹息道：

…Video meliora, proboque,
Deteriora sequor!^②

然而应当希望，将来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文明化，一些好的意願在他那里也将最后对于“我們自己的野蛮性”占上风，于是他将不再以“猪”和“小猪崽”对自己的反对者投擲。米海洛夫斯基本

① [在事物中有分寸]。

② [……我看見和称許較好的东西，
而追隨的只是比較坏的。]

人想得對，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①。

讀者大眾現在不贊許我們的尖銳的論爭。但是他們的不贊許是因為把尖銳性和粗暴性混同了，然而這遠不是一個東西。普希金已經闡明過尖銳性和粗暴性之間的巨大差別：

有些罵人話，當然，是不體面。

不能寫：這樣一個老年人，

戴眼鏡的山羊^②，可厭的誹謗者，

既惡毒，又卑鄙——一切這將是罵個人。

但是您可以在出版物中說，例如，

“文壇的舊教徒先生

(在自己的論文里)是廢話的演說家，

極無活力，極端無聊，

稍為吃力和甚至有點愚蠢”。

這裡不是說個人，而簡單地是說文學家⁵⁰⁹。

假使您想着，象托爾斯泰式的公主或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樣，罵自己的反對者為“豬”或者“黃口小兒”，那末這“將是罵個人”，而假使您將證明，這樣一個社會學的，歷史的或者經濟的舊教徒在自己的一些論文里，著作中，或者“綱要”里是“特殊地無活力，特殊地無聊，吃力和甚至”……不聰明，那末“這裡不是說個人，而簡單地是說文學家”，那末這裡將是尖銳而不是粗暴。您可能，當然，在自己的判辭里有錯誤，而您的反對者如果暴露您的錯誤，將是做得很好的。但是他們將有權責備您犯錯誤，而不是責備您尖銳，因為沒有這樣的尖銳，是不能有文學的發展的。假使文學想着沒有這些尖銳的話也行，那末它很快會變成，如別林斯基說的，陳腐的一般

① [理性最後說來永久是正確的]。

② 即中國話戴綠帽子之意。——譯者

原理的諂媚的重复者，而这正只是它的敌人們所願意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传统的德国的粗暴性和关于我們自己的野蛮性的議論是由恩·別尔托夫的“有趣的書”《論一元論历史觀之发展》所引起的。許多人鄙斥責別尔托夫先生为过分的尖銳。例如，就他的書《俄国思想》的書評者說：“在不同意經濟唯物主义的，在我們認為是片面性的理論时，我們准备为了科学以及为了社会生活的利益祝賀这一理論的代表人，假使他們中的某几个（司徒卢威和別尔托夫先生）不在自己的論爭中放进太过分的尖銳話，假如他們对于其著作值得尊敬的那些作家們不加以嘲笑的話”⁵¹⁰。

这是在那同一的《俄国思想》中写的，它还在不久以前称呼过“經濟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們为“装滿了餡子”的脑袋并且宣布彼·司徒卢威先生的書为沒有領悟的渊博的产物，而且充滿了对邏輯的思想的无能。《俄国思想》不喜欢太过分的尖銳話，因此，如讀者看出的，它关于經濟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的評論是很温和的。現在它已經准备——为了科学和我們的社会科学的利益——祝賀这一理論的代表人。为什么要祝賀他們呢？难道填滿了餡子的一些头脑对于社会科学貢獻得多嗎？科学从未領悟的渊博和对邏輯思維的完全沒有能力难道得益很多嗎？我們以为，对于很多过分的尖銳話的害怕把俄国思想引导得太远并迫使它說一些事情，由于它們讀者們能怀疑它自己不会領悟某些东西并且怀疑它沒有邏輯的思維的能力。

在彼·司徒卢威先生那里完全沒有任何的尖銳話（我們更不用說太多的尖銳話），而在別尔托夫先生那里，假如有尖銳話的話，那末也只是那些，大概，如普希金所說的，只涉及文学家們的，所以使用這些話是完全許可的。《俄国思想》的書評者以为，別尔托夫先生对之嘲笑的那些作家的著作是值得尊敬的。假使別尔托夫先生

個，這兩個定義是彼此獨立到某種程度，因此，在一方面，數量可能改變，不改變對象的性質，但是另一方面，對象最初對之冷淡的它（數量。——譯者）的增加或減少，是有界限的，而且在越過這一界限時，質量就在改變。例如，水的各種不同的溫度最初對它的一滴的液體的状态不發生影響，但是在它的溫度繼續增加或減少時，就達到一點，那時候這一聯結的状态就變質了，於是水變成汽或冰。初看起來，仿佛數量的變化對於物體的現存的本質不發生任何影響，但是在它背後藏着某些別的東西，而這個，看來，數量的無機巧的，不改變物體本身的变化，是在改變它的質量”^① 511。

“不幸的是，別爾托夫先生，黑格爾沒有這樣論斷過，而只是證明了相反的”。您現在也以為，不幸的正是在這點嗎，書評家先生^②？或者，可能，您現在關於這一主題改變了自己的意見嗎？而假使改變了，那末在現時不幸的又是什么呢？我們會告訴您不幸的是什麼，不過我們害怕，您會責備我們為不必要的尖銳。

我們重復，不能要求每一個新聞記者知道哲學史。所以，《俄國思想》的書評家先生所陷入的不幸不是那樣的嚴重，如象這在初看起來的那樣。但是書評家先生的“不幸在於”書評家先生的這一不幸不是最後的一個。他的第二個和主要的不幸比第一個還要厲害些：他沒有費過力氣讀這一本他自己寫了評論的書。

在自己的書的第75—76頁〔本版的第752頁〕別爾托夫先生從黑格爾的大邏輯（《Wissenschaft der Logik》^③）抄了很長的一段。這就是它的開始：“存在的變化不僅在於，一個數量過渡為另一個

① 我們是在引証伏·契若夫先生的俄文譯本（第191—192頁）。

② 在《俄國思想》的第3期中書評家先生繼續擁護自己的這一意見，而且還忠告思想不同的人“稍稍”看看宇伯威希—海因澤的《近代哲學史》的俄文譯本。為什麼書評家先生不“稍稍”看看黑格爾本人的著作呢？

③ （邏輯學）。

数量，而且也在于质量过渡为数量，及其相反，等等”（第75页）。

假使书评家先生就是读过这一段征引，他也不会陷入这一不幸，因为那时候他也不会“断定”说，“黑格尔没有这样的断定，而只是证明了反面的东西”。

我们知道，在俄国的——而且，不幸也不仅在俄国的——书籍中多数的书评是怎样写的。书评家连续地翻一下书，很快地浏览一过，我们假定他看了每一个第十页，第二十页，记下他认为是最可注意的地方。后来他抄下这些地方，加上他们自己的责备或赞成的话：他“不了解”，“很可惜”或者“衷心地欢迎”——而事情就完结，书评就做好了。可以设想，有多少胡说是这样出版出来，特别假使（如象这常常发生的）书评家关于他所检讨的书中的那一事物没有任何的概念！

我们从没有想过要劝书评家先生完全抛弃这一愚蠢的习惯，已经驼了的背无论如何是医不好的。但是无论怎样，应当劝他们哪怕稍稍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事情，例如，在有关俄国的经济发展的争论中，这是我们祖国的最重要的利益之所系。难道他们即在这里将继续以自己的轻率的评论轻松地迷惑读者大众吗？应该也识相一点，如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

米海洛夫斯基也不喜欢别尔托夫先生的争论的一些手法：“别尔托夫先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他说——，而且也不缺乏俏皮话，但是它，不幸，常常在他那里转为不愉快的丑态”⁵¹²。为什么成为丑态呢？而别尔托夫先生的这一所谓丑态是谁看了不愉快呢？

比方说，在六十年代“当代人”嘲笑波戈金的时候，那末，波戈金大概认为，这一杂志是趋于不愉快的丑态。而且不止是一个波戈金这样认为，而是所有习惯于尊敬莫斯科历史学家的人也是这样的看法。那时候我们对于“放荡行为的骑士们”的攻击难道还少

嗎？對於“吹口哨的人們的兒童式的狂妄行為”的憤慨難道還少嗎？⁵¹³而我們却以為，“吹口哨的人”的光輝的機智永遠不會轉變為不愉快的丑態；而假使為他們所嘲笑的人想得不一樣，那末只是由於人類的軟弱的關係，因為這一軟弱而阿摩士·費多羅維奇·里亞普金—恰普金覺得，在其中稱他為“最強烈的低級趣味的人”的那封信是“過長的”^①。

——啊哈，原來它是這樣！您是想這樣說，別爾托夫先生具有如杜勃羅留波夫和他的作哨笛聲的擁護者們那樣的機智！這是太好了！——“不同情”別爾托夫先生的論爭手法的人們叫喊道。

請等等吧，先生們。我們不把別爾托夫先生和六十年代的“吹口哨的人們”相比；我們只是說，不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判斷，別爾托夫先生的幽默是否，或者正是在哪一地方轉變成為不愉快的丑態。誰可以在自己的事情中作裁判呢？

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責備別爾托夫先生不僅在作不愉快的丑態。他對於他還加上很嚴重的指責。為了使讀者能比較容易地懂得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他自己的話敘述自己的指責。

“在《俄國思想》上自己的一篇論文中，我回憶了自己和已故的尼·伊·齊別爾的認識，就中，並報道了這一尊敬的學者在關於俄國資本主義命運的談話中‘使用了各種可能的論據，但是在最小的危險的情況下就藏在確定不移的和無可爭論的三段式辯證法的保護之下’。”在引用我的這些話的時候，別爾托夫先生寫道：“我們曾

^① 這是果戈里的《欽差大臣》中的話。“欽差大臣”赫列斯達科夫在離開了他“私訪”的一個城市後寫信給該城郵局，形容了他所遇着的每一官吏，說法官阿摩士·費多羅維奇·里亞普金—恰普金是一個最低級趣味的人，阿摩士·費多羅維奇因為知道對他不會有好的評語，所以就在未念到它以前就說，“先生們，我認為這信是過長的”。

不止一次地同去世的人谈过而且一次也没有听到他引证过辩证的发展；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完全不知道黑格尔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当然一切都可以推到死者身上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陈述是不可驳倒的！”……我换句话说：不是一切都可以推到死者的身上的，而别尔托夫先生的陈述是完全可以驳倒的。……

在1879年在《言语报》中印出齐别尔的论文，题目是：《辩证法在科学中的应用》⁵¹⁴。这一论文（未写完的）是恩格斯的书《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①的重述或者几乎是整个的翻译。得啦，而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仍然对“黑格尔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完全不知道”，这不仅对于齐别尔是聪明的，而且甚至对于上面所引的公主关于波托克勇士的说明也是聪明的。这，我以为，在别尔托夫先生也是理解的。但是为防万一起见，我引用齐别尔的短序中的几行：“恩格斯的书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不但是就在它里面引用的哲学的和社会—经济的概念的彻底性和中肯性是这样，而且也因为它，在说明辩证的矛盾之方法的实际应用方面，提供许多新的例证和事实的榜样，这些例证和事实榜样是大有助于最密切的理解如此被人有力推崇而同时又被人如此贬损的研究真理的方法的。可以说，看来，从所谓辩证法存在的时候起这还是第一次，读者的眼中把它看得这样的真实。”

这样看来，齐别尔是知道黑格尔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意义的；齐别尔是很关心“辩证的矛盾的方法”的。这就是，为文件所证明的真理，而且它完全解决那引人注意的问题是誰在撒双料的誑^②。

真情，特别是有文件作证件的真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为了那一真情的利益我们将稍为继续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齐别尔的

① 《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即《反杜林论》。——译者）。

② 《俄国财富》，1895年1月号，第2部，第140—141页。

論文《辯證法在科學中的應用》中所引的一段。

正是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引文賴以完結的那些話的後面，在齊別爾那里就有這樣的話：“終究，我們自己一方面保留着對如下的問題的判斷，即是，這一方法在知識的各領域內是否合用，而且它是——就可以被賦予以真實的意義的那種程度說——進化理論的單純的變種或者甚至是萬有發展的方法的變化或者甚至是原胎。正是在最後的這一意義中作者是在考察它或者至少是努力於指出如下的一些真理來證實它，即是進化的理論所達到的那些真理，而且不能不認識到，在某一方面在這裡發現出大大的相似。”

如我們所理解的，已故的俄國經濟學家，甚至在翻譯恩格斯的書《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①的時候，始終關於黑格爾在現代經濟的發展中的意義和甚至一般地說關於辯證法對於知識的不同範圍中的應用的適宜性是不知道的。最低限度地說，他關於它（適宜性。——譯者）不想加以判斷。於是我們問：關於辯證法的適用性完全不敢加以判斷的那同一的齊別爾，在和米海洛夫斯基爭論中“在危險最小的時候隱藏在不可爭論的和無可辯駁的辯證法的發展之庇護下”，難道是可信的嗎？為什麼正是只在這些情況中齊別爾改變了自己的通常是對辯證法的不堅決的看法呢？難道不是因為，對於他，為他的可怕的反對者擊敗的危險是太大嗎？恐怕不是因為這一點吧！別人不談，而對於擁有很嚴肅知識的齊別爾，這樣的反對者不是“危險的”。

實在說來，真理這一物，如果為文件證明的話，是美妙的！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它將完全解決誰在撒雙料的謊這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時，是十分正確的！

① [杜林先生在科學中所實行的改革]。

但是假如体现在某一个人身上的“俄国灵魂”，无疑地，实行歪曲真理，那末他是不满足于为了两个而歪曲它的；他为了一个已故的齐别尔而加倍地歪曲它：一次是当它（灵魂。——译者）说，齐别尔隐藏在三段式的庇蔭下的时候，而另一次是在它以可惊的放肆引証那同一的序言的时候，而那一序言恰恰再明了无比地証明，别尔托夫先生是对的。

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聪明地留在关于黑格尔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不知道的情况中，却翻译恩格斯的《Dühring's Umwälzung》，——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高声音地说。仿佛这样是聪明吗？照我们的意见，完全不是的。在翻译上書时，齐别尔确实是应当聪明地留在对恩格斯的（不消说，也是马克思的关于黑格尔在上述科学的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不知道的情况中。这一意见在齐别尔是知道的，好象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这是从他的序言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作为不屈从外人意见的而且习惯于从第一手来源研究问题的严肃的学者，他，在知道了恩格斯关于黑格尔的意见后，还不认为自己有权说：“我知道黑格尔和他在科学概念发展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了解学者的这样的谦虚性；他，据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想知道黑格尔的哲学的“野心”，然而却放纵地谈论它。但是 quod licet bovi, non licet Jovi^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生不过是一个伶俐的小品文作家，他具有为这一称呼的地位的人所被授予的放肆。但是他忘记了在他和科学人之间所存在的差别。由于这一忘记，他于是敢于说出一些事情，从其中可以明显地得出有名的“精神”是绝对地“为两个人说证的”。

① [凡是对公牛许可的，对丘彼德就不许可]。

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不过，难道只是为了两个人而这一可敬的“精神”歪曲真理嗎？讀者或者記得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放过的”“开花的片刻”。这一“开花”有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真理也替恩格斯被歪曲了。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这一有教益的历史沒有提一个字呢？

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米海洛夫斯基先生！

而您知道是为什么嗎？須知，可能是，“俄国精神”也沒有歪曲真理，可能，它（俄国精神。——譯者），可怜，說純粹的真理。須知为了使人对它的真实性沒有怀疑余地，我們只有假定，齐別尔不过是开青年作家的玩笑，用“三段式”来吓唬他。它也与真实相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告訴說，齐別尔是知道辯証法的；作为知道这一方法的人，齐別尔应当清楚地了解，人所尽知的三段式在黑格尔那里任何时候都沒有起过論証的作用。相反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作为不知道黑格尔的人，可能在和齐別尔談話时提出那一后来他不正一次提出过的思想，就是，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們的一切論据都归结为引証三段式。在齐別尔看来这应当是有趣的，于是他开始用三段式逗弄热心的，但是不通晓的青年。不消說，假使齐別尔預見到了由于他的玩笑話他的對話人后来所陷于的多么可悲的处境，他是絕對不开这样的玩笑的。但是这一点他是不能預見的，因此他就讓自己取笑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后者的誠实是不会被人怀疑的，假使我們的假定是正确的話。且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記憶中搜索：或者，他将記憶出不論哪种情况，表明我們的假定不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就我們这方面說，我們會衷心地快乐，如果听到能挽救“俄国精神”的名誉的那一情况。当然，連別尔托夫先生也将是高兴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一个大玩笑家！他很不滿意別尔托夫先

生，因为他敢于說，在我們的主觀的社会学家的“一些新話”中“俄国的智慧和俄国的精神是在重弹旧調和說兩回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假使別尔托夫先生对于引証的内容不負責任，那末他总可以被承認为应对选择这一引証負責。只有我們的論战习惯的粗野性才迫使我們的可尊敬的社会学家承認，对別尔托夫类似的責备会是过分的敏銳。但是別尔托夫先生是从哪里找出这一“引証”的呢？他是从普希金那里找到的。叶夫根·奥涅金的意見是，在所有我們的定期刊物中俄国智慧和俄国精神是重弹旧調和代两个人說誑。难道可以承認普希金对他的詩中主角的这样尖銳意見負責嗎？一直到現在，如我們所知道的，誰也沒有想过，是这样的，不过极可信的，奥涅金表达了伟大詩人自己的意見。而这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使別尔托夫先生負如下的責任，即是在他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作中除了旧調重弹和“代两个人說誑”以外，沒有找到別的东西。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应用这一“引証”于我們的社会学家的“一些著作”呢？大概因为这些著作在这一社会学家的眼中是值得較大得多的尊敬的关系罢了。但是須知“关于这点是可以爭論的”，我們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話說。

“实在說，在这一地方，別尔托夫先生沒有責备我說了任何誑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他不过是这样順口溜地說出，以致发热，而引証，作为遮羞布，可耻地掩飾着”（第140頁）。为什么是“順口溜出”而不是发表自己的坚定意見呢？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自己的論文中是在重弹旧調和替两个人說誑的这种假定有怎样的意义呢？它的意思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是說出一些旧的，早就在西方被駁斥过的意見，而在說出它时在西方人們的錯誤上面还加上自己的，土著的錯誤。难道，在表达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字活动的看法的时候，非以“遮羞布”掩飾不可嗎？米海洛

夫斯基先生確信，可以只順口溜出類似的意見，確信它不可能是嚴肅的和深思的衡量的結果。但是關於這點是可以爭論的，我們再一次地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話說。

寫這几行的人是完全冷靜地和深思地，不需要任何的遮羞布，他聲明，依照他的確信，對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著作”的很不高的評價是任何一個大智慧的開始。

但是，假如在說到“俄國精神”的時候，別爾托夫先生沒有責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任何謊話，那末為什麼我們的“社會學家”正要指摘這一“引証”，從齊別爾的不幸事件開始呢？大概，是為了使自己動怒。實際上類似的手法本身中一點動怒的東西也不含有，但是對某些人好像是引他們動怒的。在格·伊·烏斯賓斯基的一個隨筆中官太太和一個掃院子的人爭論。掃院子的人說出 подлю ① 這字。“怎麼！我卑鄙嗎？——官太太喊叫說，——我給你個厲害看，我有一個兒子在波蘭服務”等等。同官太太一樣，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抓住個別詞的時候，發出“動怒的”叫喊：“我說了兩個人的謊，您敢於懷疑我的誠實，那末我現在要說您替許多人說了謊！請看看，您關於齊別爾說了多少不該說的話！”我們試看看，別爾托夫先生關於齊別爾說了甚么，於是我們看出，他是說了老實話的，Die Moral von der Geschichte ② 是——不論是官太太的，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憤怒，是不能得出任何好結果的。

“別爾托夫先生答應表明，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最後勝利是由所謂歷史中經濟唯物主義的理論確立的，這樣的理論，據說，和“一般

① подлю 是俄文，有“在……身旁”之意，對話人听成 подлый，即卑鄙的。

——譯者

② [歷史的寓意]。

的哲学唯物主义”有最密切的关系。别尔托夫先生抱着这个目的在哲学史中作了一种考察。关于这一考察的无秩序和不完全的程度已经可以从关于它的几章的标题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空想主义者》，《唯心主义的德国哲学》，《现代唯物主义》（第146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没有任何必要地急躁起来，而且他的急躁性又一次地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假使别尔托夫先生写一本哪怕是哲学史的简短概要，那末，确实，那一考察也许是无秩序的和不可理解的，他在那里由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谈到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家；由这些历史家转到德国的唯心主义者，等等。但是问题正在这里，就是别尔托夫先生没有写过任何哲学史。他在自己的书的第一页即宣称过，他打算把那—被人不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的唯物主义的学说做一简略的概述。他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发觉这一学说的某些微弱的幼芽，并表明了这些幼芽在大的程度上是在复辟时代法国的专门历史家那里发展的；后来他转向一些虽然就专业说不是历史家的人，他们总算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的一些最重要问题应当思想得很多的，就是说，他转向空想主义者和德国的哲学家。他远没有列举过十八世纪的所有唯物主义者，这一时代的所有复辟时候的历史家，所有的空想主义者和所有的唯心主义的辩证家。但是他指出了其中的最主要的，指出了一些人，他们对他所感兴趣的对象比别的人贡献得更多。他表明了，一切这些人，这样有优良秉赋和知道得很多，是迷惑在矛盾中，从这些矛盾中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唯一的逻辑的结论。一句话，il prenait son bien où il le trouvait^①。对于这样的方法有什么可反对的呢？为什么米海洛夫

①（他在寻得了财富的地方取得了它）。

斯基不喜歡這樣的方法呢？

假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僅讀過恩格斯的著作《Ludwig Feuerbach》和《Dühring's Umwälzung》^①，而且也——而這是最主要的——懂得了它們，那末他自己也知道，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發展中上一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復辟時候的法國歷史學家的，空想主義者的和唯心主義者——辯證家的思想有過怎樣重要的意義。別爾托夫先生着重指出了這一意義，把和這一場合有關的他們的和別人的，第三者和第四者的最重要的思想作了簡單的說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這一說明輕蔑地聳了聳肩，別爾托夫先生的計劃討不到他的喜歡。我們指出這一點，是因為個個計劃都是好的，如果借助於它的作者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別爾托夫已經達到了目的，這甚至他的反對者，如我們所知道的，也是不否認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繼續說：

“別爾托夫先生也談到法國的歷史家和說到法國的‘空想主義者’，按照他們的和其他的人對於經濟之作為社會建築的基礎是理解或不理解來衡量他們。然而奇怪的是，他於此完全沒有提到路易·布朗，雖然單是《Histoire de dix ans》⁵¹⁵的一個序言就足夠使他在所謂經濟唯物主義的最初的老師的行列中占一光榮的地位。當然，這裡有好多東西是別爾托夫先生所不能同意的，但是這裡也有階級鬥爭，有它們的經濟特征的說明，有作為政治背後動力的經濟，一般說來有很多後來被放進為別爾托夫先生所熱烈擁護的學說中去的東西。我之提出這一缺陷是因為，第一，它本身是可驚的而且暗示着某些與公平毫無共同之點的附帶的目的”（第150頁）。

① 《費爾巴哈》和《杜林的改革》。

别尔托夫先生談到了馬克思的先行者們，路易·布朗不如說是他的“同时代人”。不錯，《Histoire de dix ans》出版的時間是在馬克思的历史思想还没有最后形成的时候。但这本书对它們（历史的思想。——譯者）不可能有什么显著的影响，已經是由于如下的原因，就是路易·布朗对于社会发展的內在动力的观点和例如奥古斯丁·梯叶里或者基佐的思想比較起来絕對沒有任何新东西。完全正确，“这里也有阶级斗争，和它們的經濟特征的說明，和經濟”等等。但是这一切也在梯叶里，也在米涅，也在基佐那里都有过，如象别尔托夫所表明了。站在阶级斗争观点的基佐，同情了资产阶级反贵族的斗争，但是他对刚在他那时候开始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敌視的。路易·布朗則同情了这一斗争^①（在这点上他和基佐意見有了分歧。但是这一分歧完全不重要。它在路易·布朗对于“作为政治之暗藏的动力”这一点的看法沒有放进任何新的东西）^②。

路易·布朗和基佐一样，会說，政治的宪法是植根在人民的社会生活中，而社会的生活归根到底为所有制的一些关系决定。但是所有制关系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路易·布朗和基佐一样，不大知道的。和基佐一样，此所以路易·布朗不願自己的“經濟”，不得不回到“唯心主义”那里去。說他在自己的历史—哲学的見解中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这甚至是没有上过学的任何一个人都是知道的^③。

① 而且这点也是按自己的方式，因之路易·布朗在1848年起了这样可怜的作用。在如后来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斗争和按照路易·布朗的阶级斗争之間有整整的一道深渊。沒有觉察出这一深渊的人完全象那一个在动物园中沒有觉察出象的聪明人。516

② [1905年版注]。

③ 不消說，作为低一级的唯心主义者（就是說，不是辯証家）路易·布朗有过自己的“进步的公式”，它尽管自己“在理論上的无足重輕”，至少，不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进步的公式”坏。

在《Histoire de dix ans》出版的那時候，社會科學的當前問題是後來為馬克思所解決了的問題，就是所有制制度是從哪里來的呢？路易·布朗關於這點一點也沒有說什麼。天然的假定是，正因為這樣別爾托夫先生關於路易·布朗甚么也沒有說。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寧願關於某些附屬的目的進行誹謗。Chacun a son goût! ①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見，別爾托夫先生在哲學史領域中的游覽，“根據這些（以上列舉的）各章標題來判斷的話，是比能想得到的還要脆弱些”。為什麼如此呢？原來是這樣：別爾托夫先生寫道，“黑格爾把那些思想家們——不論是唯心主義者或唯物主義者——的觀點稱為形而上學的，他們，在不能了解現象發展的過程時，不自禁地把它們（現象。——譯者）對自己 and 對別人介紹成為凝固的，無聯系的，不能由一個轉變為另一個的一些東西。他以辯證法與這一觀點對立，辯證法研究現象正是研究它們的發展，因此，也就是研究它們的相互聯系。”就這一點，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毒辣地提意見道：“別爾托夫先生認自己是黑格爾哲學的專家。我高興地從他學習，如同從所有的有學問的人學習一樣，而且第一次想請別爾托夫先生指出，他是從哪里引出這一仿佛是黑格爾的‘形而上學的觀點’的定義的。我敢於斷定，他是不能指出定義所在的地方的。在黑格爾看來，形而上學是事物之無條件的實質的學說，是處在經驗和觀察之外的，是現象的潛伏的本體……別爾托夫先生所說的仿佛是黑格爾的定義，不是從黑格爾、而是從恩格斯那里引來的（都在那一反對杜林的論戰的書中），他是完全任性地以不動性或流動性的特征來把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分開”（第147

①（各人有各人的口味）。

也加上了思辨的因素，由於它，他的哲學就成為唯心主義的哲學。作為唯心主義者，黑格爾做了和一切其他的唯心主義者做得一樣的事情：他對於“這樣的一些結果”（這樣的一些概念）給予以特別重要的哲學意義，這也是舊的“形而上學”所很珍視的。但是這些概念本身（在它的發展各種形態中都是絕對的）對於他，由於“辯證的因素”，正是被看待為結果，而不是當作原始的資料。形而上學在黑格爾那里溶化在邏輯中，此所以他很驚異，如果他聽到人家 ohne Weiteres^①地稱呼他這思辨的思想家為形而上學家。他會說，這樣稱呼他的人們，“lassen sich mit Thieren vergleichen, welche alle Töne einer Musik mit durchgehört haben, an deren Sinn aber das Eine, die Harmonie dieser Töne, nicht gekommen ist”^②（他自己的說法，他以之痛斥淵博的學究）。

我們重復，這一輕視理性的形而上學（又是他自己的說法）的思辨的思想家，是唯心主義者，而且在這一意義上有了自己的理性的形而上學。但是難道別爾托夫先生忘記了這一事實或者在自己的書中沒有作過聲明嗎？他也沒有忘記而且是預先聲明了的。他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Die heilige Familie》^③一書中引證了一大段，很辛辣地批評黑格爾的“思辨的”結果的一長段。我們假定在這些摘引中十分暴露了把辯證法和米海洛夫斯基所稱為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合流的不平衡性。因此，假使別爾托夫先生也忘記了甚么，那末也許只是這一點：即是，儘管我們的“先進的”人們在哲學史部分是可驚的“不關心”，是应当向他們說明，在黑格爾的時代形

① [不問情由]。

② (“是讓自己和一些動物相比，它們聽完了任何樂曲的一切聲音，但是達到它們的感覺的却不是把這些聲音調和起來的一個總的東西。”)。

③ 《神聖的家族》。

而上学和思辨哲学是鮮明地区分到什么程度^①。而从这一切可以得出結論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徒劳地“敢于断定”实际上是不可能断定的那种东西。

据别尔托夫先生的話，黑格尔甚至把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也称为形而上学的，他們不会在現象中考察它們的相互联系。是这样的，还是不是这样的呢？請費力念念同一黑格尔的《哲学全書》的第一部的第二十七节的如下的一頁：“我們在旧形而上学中找到这一观点之在哲学中的应用，如象在康德以前所叙述的那样。不过关于哲学的历史这一形而上学的时候是已經过去了；就本身說，它永久是繼續存在的，代表对于对象之悟性的見解”⁵¹⁹。甚么是对于对象之悟性的見解呢？这正是与辯証法对立的对于对象之形而上学的旧見解。十八世紀的所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實質上是“悟性的”；它正是不会除了从最后定义的观点外来考察現象。說黑格尔清楚地看見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以及一般的十八世紀的法国哲学的这一弱的方面，这是凡讀过他的与这里有关的《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②第三部以及和这里有关的那几节就会这样相信的。所以，連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观点也不能不認為是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③。因此，别尔托夫先生是对还是不对呢？看来，显然是完全对的嗎？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敢于断定”……。关于这点不論是别尔托夫先生或者是写这几行的作者是沒有任何办法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不幸正在于，在进入和馬克思的“俄国学生們”爭論以后，“敢于”談論一些他完全不知道的东西。

① 順帶指出，假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哪怕部分地知道，最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有哪种的历史意义，那末我們介紹他一本通俗的并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小書：《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对黑格尔，无神論者和反基督者之末日审判的喇叭的号音。》）一本好的小册子。518

② 《哲学史講演录》。

一個好漢，你的勇敢把你害了。

凡是通曉哲學的人會不費力地看出，當別爾托夫先生敘述黑格爾和謝林的哲學見解時，他幾乎到處都用這些思想家本人的話來說：例如，他關於辯證的思維的說明幾乎是對《哲學全書》的第一部的八十一節的注和第一附錄的逐字翻譯；後來，他幾乎是逐字地從《Philosophie des Rechts^④》的序言和從《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⑤》中引用一些部分。但是這一很精確地引証一切愛爾維修，安凡丹，奧斯卡洛夫·別塞里等等的人，幾乎沒有一次指出，在自己的敘述中，他所指出的是哪一些，老實說，謝林的和黑格爾的著作和它們的哪些部分。為什麼他在這一場合離開了自己的一般規則呢？我們覺得這裡別爾托夫先生使用了軍事的狡詐。我們在想，他是這樣推論的：我們的主觀主義者宣布了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是形而上學並以此為滿足；他們沒有研究過它，如象密勒的注釋者所做的那樣。當我指出德國唯心主義者的某些妙極了的思想時，於是主觀主義者先生們，在沒有看到對這些思想家的著作的引征時，想着，是我自己在寫出這些思想或者是從恩格斯那裡抄來的，於是喊叫說：“關於這是可以爭的！”“我敢於斷定”等等。在這裡我揭露了他們的無知，這裡可以看熱鬧。假使別爾托夫先生真在自己的論戰中應用了軍事的狡猾，那末應當承認，對於他是沒有比這

③ [1905年版注]但是，關於唯物主義他說：“Dennoch muss man in dem Materialismus das begeisterungsvolle Streben anerkennen, über den zweierlei Welten als gleich substantiell und wahr annehmenden Dualismus hinauszugehen, diese Zerreißung des ursprünglich Einen aufzuheben”. (《Enzyklopädie》, Dritter Theil, S.54.) (*但是應當承認，在唯物主義中有一種充滿靈感的意圖，想逃出二元論的範圍之外（後者是承認兩個不同世界之同等的本質性和真實性的），並且想消除原始統一的這一分裂性”（《哲學全書》，第三部，第54頁。）

④ 《法的哲學》。

⑤ 《歷史哲學》。

更好的：确实是很热闹的！

但是我們再看下去。“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和别尔托夫先生一齐断定，‘理性的权利是没有边际的和没有限制的，正如它的力量一样’，所以它发现了事物之无条件的本质，——不管这是物质或精神，——就是形而上学的体系。……它于此想到了为它所提出的事物的发展的观念或是没有想到，而如果想到了，是否它领会了这一发展或者某种别的发展，——这，当然，就它在哲学史的地位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改变它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俄国财富》，1895年1月号，第148页）。就我们依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些话来判断，他，在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格格不入时，不认为，理性的权利是无限制的。应当希望，为了这梅歇尔斯基才称赞他。显而易见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不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无限的和不可理解的。这对于一个不止一次告诉自己的读者说 *la raison finit toujours par avoir raison*^① 的人看来可能是奇怪的：在理性的有限的力量（和甚至权利！）的情况下，这一信念很难说是恰当的。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总会说，对于理性之最后的胜利他只是相信，至于说到实际的生活，在谈到对事物之绝对的本质的认识时，他是怀疑它的力量的（“不论这是物质或精神”）。好极了。这一事物之绝对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不是康德所称为的自在之物（Ding an sich）吗？假使是的，那末我们坚决地声明，“自在之物”我们是知道的，而且我们关于它的知识正应当归功于黑格尔。（救命呀！我们的“清醒的哲学家们”喊叫说，但是我们请他们不要急躁。）

“自在之物……是一种物，在它里面把一切可达到意识的东西

①（理性最后说来永久是正确的）。

都抽象出來，抽出了一切感覺的成分，正如抽去了一切確定的思想一樣。顯而易見的，在這以後所剩下的只是純粹的抽象，空洞的存在，它只應該歸之于意識的限界之外，它是任何感覺和任何確定的思想之否定。但是在這方面很容易發很簡單的議論的，就是說，這一 *caput mortuum*^① 本身是構成這一純粹抽象的思想的產物，或者是空洞的‘我’，它成為自己的空洞的同一性的對象。人們給予這一抽象的同一性以否定的定義，使得它變為自己的對象，這已在康德式的範疇中提及過，而且同樣為人所知，正和這一空洞的同一性一樣。因此，應當驚異的是，如此常常地重復着，仿佛不知道，任何東西沒有比知道這點更為容易些”^② 520。

這樣一來，我們重復地說，我們清楚地知道甚么是事物之絕對的本質或者是自在之物。這是空洞的抽象。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用這樣的空洞的抽象來吓唬那些驕傲地和黑格爾在一起重復如下的話的人：“*von der Grösse und Macht seines Geistes kann der Mensch nicht gross genug denken!*”^③ 這是一個老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Sie sind zu spät gekommen!*^④

我們相信，為我們剛才所寫下的幾行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來將是空洞的詭辯。他會說，對不起，在這樣的場合里你對於有關自然和歷史之唯物主義的說明是怎樣理解呢？是這樣理解的。

當謝林說，磁力是主觀東西之往客觀東西里面的灌輸，這是对自然之唯心主義的說明；而當磁力被人從現代物理學的观点來加

① 〔一個沒有意思和內容的概念〕。

② 黑格爾，《哲學全書》，第一部，第79—80頁，第44節。

③ 〔‘說到精神的量 and 力，人不能把自己想得很高’。〕《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I, 6. 〔《哲學史》，第1卷，第6頁。〕

④ 〔您到來得太遲了。〕

以說明时，那末它的一些現象是被給了唯物主义的說明的。当黑格尔或者哪怕我們的斯拉夫派以人民精神的一些特質來說明一些已知的历史現象时，那末他們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現象的，比方，当馬克思以法国社会的階級斗争來說明 1848—1850 年的事变时，那末他是給予这些事件以唯物主义的說明的。明白嗎？当然，怎么不呢！这是这样的明白，如果还不明白我們所說的，那一定是太执拗了。

“这里有点不对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思考，他是浸在胡思乱想中（c'est bien le moment!①）。——朗格說，……”我們大胆地打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朗格說的是什么，我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是我們告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他的权威是很錯誤的。在自己的《唯物主义史》中朗格忘了引出，例如，最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一的这样一个可注意的声明：Nous ne connaissons que l'écorce des phénomènes（我們所知道的不过是一些現象的外壳）。其他的，同样著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多次地发表了和这一意义一样的意見。請看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法国唯物主义者还不知道，自在之物只是抽象的 *caput mortuum*，而且正是站在这一現在为許多人称之为批判哲学的观点上。

对一切这些，不消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將感到新穎而且甚至是完全不可信的。但是我們現在不告訴他，我們所指的正是哪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和他們的哪些著作。且讓他“敢于断定”，而以后我們再同他談談。

假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願意知道，我們是怎样看我們的感覺和外界物体的关系时，那末我們且介紹他謝切諾夫先生的載在《帮

① [正是时候]。

助飢餓者們》中的論文《外界的思想和現實》。我們以為，別爾托夫先生以及任何其他的，不論是俄國的或非俄國的馬克思的學生是完全同意這一著名的生理學家的。而這是謝切諾夫先生所說過的：“不管外面的對象自身是怎樣，離開我們的意識而獨立，——讓我們從它們得到的印象將只是一些符號，——無論怎樣為我們所感到的符號的相似和差別是和現實的相似和差別相應的。換句話說：為人在一些對象之間所發現的相似和差別，是真實的相似和差別”^①。

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駁斥謝切諾夫先生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將同意承認不僅人類理性的力量而且甚至它的權利都是有局限性的^②。

別爾托夫先生說過，在我們世紀的後半期科學中，即哲學當時與之完全融合的科學中，唯物主義的一元論高奏凱歌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說：“我害怕，他錯誤了。”為了為自己的擔心辯解，他引證朗格，據他的意見，“die gründliche Naturforschung durch ihre eignen Konsequenzen über den Materialismus hinausführt”^③。假使別爾托夫先生錯了，那末，這是說，唯物主義的一元論沒有在科學中勝利過。那末，這是說，學者們直到現在是靠了把主觀的東西灌輸給客觀的東西和其餘的唯心主義自然哲學的一些微細東西來說明自然嗎？我們害怕，“犯錯誤”的是那提議過這的人；我們尤其害怕，例如，在科學界享有盛名的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就是這樣議論的。

① 《論文集》，第 207 頁。

② [1905 年版注] 這給我們的反對者們以一個很好的機會抓住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矛盾：一方面，我們宣布康德的“自在之物”是空洞的抽象，而另一方面我們表示贊許地引證謝切諾夫先生，因為他說到一些自在地存在，不受我們意識的影響。理解的人們，當然，看不出任何的矛盾，但是須知在我們的反對者中間理解的人多嗎？

③ [對自然之徹底的研究將以自己的結論引導到唯物主義的範圍之外。]

“在我们今日，凡是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处和知道事实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应当在神经系统的生理学中找心理学的基础的。凡被称为精神活动的东西就是脑子的一些功能的总和，而且我们的意识的材料是我们的头脑活动的产物”^①。请注意，这是一个属于在英国被称为不可知论者的人说的。他以为，他关于精神活动的看法和最纯粹的唯心主义是完全相容的。但是我们知道彻底的唯心主义对自然界的现象可能给予的一些说明，而且也理解可尊敬的英国人的羞怯性是从哪里发生的，我们同别尔托夫先生在一起重复说：从第十九世纪后半期起在科学中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胜利过了。

大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谢切诺夫的一些心理的研究吧？对于这一学者的观点某个时候卡维林曾激烈地反驳过。我们害怕，已故的自由派是大大错误了。但是，可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意卡维林吗？或者，可能，他就这一部门一般地要求某些其他的解说吗？我们把它放在一边到那一个他打算着“断定”的时机。

别尔托夫先生说，在马克思以前在社会科学中支配着的“人类本性”的观点，给了一种借口来“滥用生物学的一些比拟，这些比拟直到现在使人强烈地感觉到西方社会学的，特别是俄国假社会学书籍的气味”。这提供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借口指责历史的一元论的作者为惊人的不公道而且多余一次地使人怀疑到他的论争方法的诚实性。

“我向读者呼吁，甚至他是对我没有好感的，但是稍为知道我的一些著作，哪怕不是一切的著作，而只是知道，例如，一篇论文：《社会科学中的比拟的方法》或者《进步是什么？》的人。说俄国的书籍是特别滥用生物学的一些比拟是不对的；在欧洲，以斯宾塞的

^① Th. Huxley, Hume. Sa vie, Sa philosophie, p.108. (托·赫胥黎，《休谟，他的生活，他的哲学》，第108页。)

順當的手，這一類東西無比地多一些，姑且不說布魯契里之流的喜劇的比擬的時代。而假使在我們這裡事情沒有走到比已故的斯特朗寧的那些比擬的練習那樣遠（《歷史和方法》，《政治之為科學》，里連恩費爾德的《未來的社會科學》），而且還有幾篇雜誌的論文，那末，‘這裡也有我的貢獻’。因為沒有人象我一樣地花費這多的氣力來和生物學的一些比擬鬥爭的。而在自己的時代我曾為此受過斯賓塞所產生出來的那些罪的。我將希望連現在的這一威脅將來也會過去的……”（第145—146頁）。這一冗長的議論有這樣誠實的面貌，於是，真正地，甚至對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好感的讀者會對自己說：“這裡，似乎，別爾托夫先生在陶醉於自己的論爭時，是走得太遠了。”但是這是不對的，而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本人也知道，這是不實在的；假使他訴苦地向讀者求助，那末唯一的原因就是特拉夫特^①的特蘭尼翁對自己說的：Pergam turbare porro: ita haec res postulat^②。

老實說，別爾托夫先生說了什麼呢？他說過，“如果整個歷史的社會運動的謎應當在人的本性中找，而且如果，正如聖西門所正確說過的，社會是由一些個體所構成，那末個體的本性應當給予說明歷史的鑰匙。個體的本性是生理學（就這詞的廣泛的意義說，即是，也包括心理現象在內的科學）所研究的。此所以生理學在聖西門和他的學生們的眼中已是社會學的基础，他們稱之為社會物理學。還在聖西門在世時出版的，而且是由他最積極的參加寫成的《Opinions philosophiques, littéraires et industrielles》^③，印出了

① 特拉夫特（公元前254—184年）偉大的古羅馬喜劇作家，寫的喜劇，傳到我們時代的約二十個，特蘭尼翁大概是他的一喜劇中的主角。——譯者

② [“我以後將繼續胡作非為；如事業所要求的”]。

③ [《哲學的，文學的和經濟的思想》]。

异常有意思的、不幸未写完的一篇无名的医学博士的論文，《De la physiologie appliquée à l'amélioration des institutions sociales》（《論生理学之应用于社会改善方面》）。作者把‘关于社会’的科学看作是‘一般生理学’的組成部分，它在以对于个体的专门生理学的观察和試驗丰富了自己以后专心于‘最高秩序’的思考。个体在它（专门生理学。——譯者）認為只是‘社会身体的器官’，它研究它們的功能，‘象专门生理学研究一些个体的功能一样’。一般的生理学研究（作者說，表达）社会生存的規律，这些是成文的法律应当与之一致的。后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例如，斯宾塞，使用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学說来作最保守的結論。但是为我们所引証的医学博士首先是一个改革家。他把社会体看成社会改造的一些种类来研究它，因为只有社会生理学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卫生学給予积极的基础，可以在其上建設文明世界的現在状态所要求的社会組織体系。”

从这些話里已經看出，据别尔托夫先生的意見，可以濫用生物学的比拟的不仅有代表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斯宾塞，而且也有空想主义者的社会改良計劃。把社会和有机体相比于此起了次要的、假使不是第十級重要的作用；問題不在拿社会和有机体相比，而在把社会学安放在这些或别的生物学的結論上論証的意图。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激烈地反对以社会和有机体相比；在反对这一相比的斗争中无疑地有“他的一点貢獻”。但是这完全不重要。如下的問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認為或者不認為可能把社会学放在这些或那些生物学的結論基础上論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而在这一点上任何怀疑都是不可能的，如凡讀过，例如，《达尔文的理論和社会科学》論文的人是会相信这一点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一論文中也說如下的話：“在《达尔文的理論和社会科学》的总标

題下，我們將說到為達爾文的理論所接觸、解決和重新解決的各種問題，以及為他的日漸增加的這些或那些擁護者們所提出的問題。然而我們的基本任務仍在於，從達爾文理論的觀點確定在生理學的分工之間的相互關係，就是，在一個不可分的限度之內的分工和經濟的分工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在種、族、民族和社會的範圍之內許多不可分體之間的分工。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這一任務歸結為尋求協作的基本規律，就是，社會科學的基礎”^①。在生物學中找尋協作的基本規律，就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這是站在二十年代的法國聖西門主義者的觀點上；換句話說，“背誦陳詞濫調和代兩個人說謊”。

這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能喊叫說：不過在二十年代達爾文的理論還不曾存在！但是讀者懂得，事情一點也不在達爾文的理論，而在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聖西門主義者所共同的應用生理學於改善社會的那一空想主義的意圖。在我們所指出的論文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完全和海克爾同意（“海克爾是完全正確”），他說過未來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家們必須主要地把自己的注意放在比較動物學上面，就是說，放在動物的比較形態學和生理學上面，假使他們願意關於自己的特殊的對象得到正確的概念。隨你的便吧，而假使海克爾是“完全正確”，就是說，假使社會學家（和甚至歷史家！）把自己的注意主要地放在動物的形態學和生理學上面，那末沒有濫用——朝這一或另一方向——生物學的比擬，事情是行不通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對社會學的觀點正是聖西門主義者的舊觀點，這難道不清楚嗎？

別爾托夫先生所說的也只是這點。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好象

① 《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5卷，俄文版，第2頁。

現在在卸除自己对布哈尔柴夫一諾任的社会学思想的责任，这是徒劳的。在他本人的社会学的研究中他从自己的已去世的朋友和导师那里沒有走开多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沒有理解，馬克思的发现是什么，因此就成了不可糾正的空想主义者。这是可悲的情势，但是从它里面出来只有靠新的思想上的努力；哭泣的求助于讀者，甚至完全有好感的讀者对于可怜的“社会学家”是一点也沒有什么帮助的。

別尔托夫先生为替司徒卢威先生辯护說了两句話。这給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尼·一逊以借口，“断定”說別尔托夫先生把司徒卢威先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們替別尔托夫先生辯护說得很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尼·一逊先生怎样說我們呢？他們，大概，会把別尔托夫先生看成我們的僕从。預先地在別尔托夫先生的面前道歉，說我們預先料到了他对主观主义者們的一些反对的話，我們問后者：难道同意这个或另一个作家就是把他放在自己的保护之下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俄国生活的某几个当前的問題是同意尼·一逊先生的。我們应当把他們的同意理解为这种意义，就是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尼·一逊先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嗎？或者，可能，尼·一逊先生是在保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嗎？已故的杜勃罗留波夫如果听到了現代的我們“先进的”文学的这一奇怪的语言会有什么話說呢？

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別尔托夫先生曲解了他的关于英雄和群众的学說。我們又以为，別尔托夫先生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对他的时候是扮演的特兰尼翁的角色。但是，在証实我們的这一意見以前，我們認為有必要关于尼·一逊先生的发表在《俄国财富》3月号上的《經濟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短文講几句话。

在这一評語中尼·一遜先生为反对別尔托夫先生树立了两个炮垒。我們一一地予以研究。

第一个炮垒的力量就在这里。別尔托夫先生說过，“为了解决如下的問題，俄国是否沿着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应当去研究这一国家的事实情况，应当去分析它的現代的国内生活。馬克思的俄国的学生根据这样的分析断定說：沒有資料使得人希望，俄国将很快离开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尼·一遜先生毒辣地重复道：“沒有这样的分析。”好象是沒有，尼·一遜先生？首先讓我們关于术语有一約定。您称什么为分析呢？分析难道是供給新的資料来判断对象或者是运用已經存在和用其他的方法得来的資料嗎？在冒被人指責为“形而上学”的危險时，我們仍坚持旧的定义，按照这个定义，分析不是供給新的資料来判断对象，而是运用現成的資料。从这一定义可以得出，馬克思的俄国的学生們能在自己对俄国内部生活的分析中不供給对于这一生活的独立的观察，而满足于，例如，为民粹派的書籍所搜集的材料。假如它从这一材料得出新的結論，那末这已經是表示他們已把这些資料作了新的分析。現在試問，这样說来：关于資本主义的发展这一部分在民粹派書籍中有哪一些資料，而馬克思的俄国学生們从这些資料中确实做了新的結論嗎？为了回答这一問題，我們試拿哪怕杰明切也夫先生的書《工厂，它給了居民什么和它从居民那里取得什么》。在这一本書里（第241頁及以下）我們讀到：“我們的工业，在它还没有取得如我們現在发现它的那种工厂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已經走过了如在西方那样的发展的一切阶段…… 我們落后于西方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农奴制。由于它而我們的工业通过了一个长得多的家庭手工业和家庭生产的时期。只是从1861年起資本获得了可能来实现那一在西方早在几乎一百五十年以前就过渡到的那

一生产形式，而且只是从这一年起开始家庭手工业和家庭生产的更迅速的垮台，使它们变成工厂的生产…… 但在这三十年（从废除农奴制的时候起）一切都发生变化了。在进入和西欧共同的经济发展的道路时，我们的工业必然地，宿命地应当采取——而且已采取了——它在其中在西方所铸成的那同一形式。人民群众的土地有保障，是被人们如此喜欢引用来作我国不可能有一失去一切东西的特殊的工人阶级作为现代工业的必然的伴随现象之证明的，——无疑地，这在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有力的阻碍的因素，虽然完全不象普通人们所想的那么有力。一方面，是很常见的土地份地的不足和农业经济的完全衰败，而另一方面，政府强烈地关心加工工业的发展，这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平衡的一个必需因素，这就是促进了和直到现在再不能多地促进着对于这一土地之有保障的意义的藐视。这样的情势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了的：一个工厂工人的特殊阶级的组成，这是一个和从前一样用‘农民’的称呼，但是和农民——种地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的阶级，只是在微末的程度上保存着他与土地的一半的联系，已经是在第三代永久没有离开过工厂和在乡村中没有任何的财产，除了法律的，实际上几乎不能实现的对土地的权利”。

为杰明切也夫先生引出的客观的资料是说得意味很深长的：资本主义以及它的所有的后果在俄国是在迅速的发展。杰明切也夫先生的这些资料以如下的议论来补充，按照这一议论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是可以被停止的，为了做到这点，只需要记着一个原理：*gouverner—c'est prévoir* ①（第246页）。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把杰明切也夫先生的这一结论拿来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并发觉

①（管理——这是预见）。

停止在這一情況是絕不可能的；認為杰明切也夫先生是錯的，正和很多那些在自己的調查中報道許多客觀的材料完全和他——杰明切也夫先生的資料相同的民粹派一樣^①。尼·一遜先生問道，這樣的分析在哪里。大概，他想說，在俄國出版界，甚么時候和在什么地方出現了這樣的分析。對於這一問題我們給他整整地兩個回答。

第一，在使他不愉快的彼·司徒盧威先生的書中，有很有道理的議論談到在現在的時候在俄國經濟生活中可能的國家干涉的界限。這一議論已經部分地是尼·一遜先生所要求的那種分析，而且也是尼·一遜先生說不出有道理的對立的話，而且也是不能反對的。

第二，尼·一遜先生記得在四十年代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爭論嗎？在這一爭論中“對俄國內部生活的分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出版物中這一分析幾乎僅僅只限於一些純粹文學上的問題。在這一點自有其歷史的原因，假使尼·一遜先生不願被人稱道為可笑的迂儒，他就應當考慮到它們。尼·一遜先生難道說，這些原因現在對“俄國學生們”的分析沒有任何的关系嗎？⁵²¹

“學生們”直到現在沒有出版過關於俄國經濟生活的獨立的研

① “從最近二十年或約在此時期進行的以百數的統計的和其他的調查中，——尼·一遜先生說，——我們不會遇着一些著作，從它們得出的結論會在不論某點上是和別爾托夫，司徒盧威，斯克沃爾佐夫先生們一致的。”您，尼·一遜先生心目中的調查的作者們在俄國普通是做兩重的結論：一個是和客觀的真理一致的，內容是說，資本主義是在發展，而陳腐的“基礎”是在崩潰；另一個結論是主觀的，歸結為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可以停止的，要是，等等。然而為證實這一最後的結論永遠沒有引証出任何的資料，於是它成為十足空洞的，儘管在那些調查中有或多或少的豐富的，用以粉飾自己的統計材料。尼·一遜先生的“概要”的毛病就在於它的，比方說吧，“主觀”方法的貧血病。實在說來，什么样的“分析”將證實尼·一遜先生的思想，說我們的社會現在就能組織生產呢？這樣的分析是沒有的。

究。其原因是他們所屬的那一派別在俄国是极新奇的。直到現在俄国書籍中支配着的是民粹派的方向，由于它，研究者們，在报道証明古旧“基础”的崩潰的客觀資料时，把它們淹沒在自己的“主觀的”指望里。但正是民粹主义者所报道的大量的資料就給了对于俄国生活的新看法的出現以借口。这一新看法，无疑地，是新的独立的观察所依据的基础。已經在現在我們可以对尼·一逊先生指出，例如，哈里茲門諾夫先生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和民粹主义的教义大有矛盾，而伏·伏·先生是十分同情这一教义的，常常地和沒有成就地企图駁斥可尊敬的調查者。《南俄农民經濟》一書的作者完全不是馬克思主义者，但是尼·一逊先生怕难說，波斯特尼科夫先生对在新俄罗斯公社中的現在的形势以及一般的对农民的土地利用的看法和我們的民粹派的意見是一致的。

而这里鮑罗金先生，关于烏拉尔的哥薩克軍队的絕妙的調查的作者，已經是双足站在我們所辯护的，和为尼·一逊先生所不喜欢的观点。但是这一調查沒有引起我們的民粹派的社論注意，但不是因为它缺少內在的价值，而唯一的是因为，上述的社論有特殊的“主觀的”精神⁵²²。而越到后来将越多些，尼·一逊先生：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时代在俄国只是在开头呢^①。

尼·一逊先生認自己是馬克思主义者。他是錯誤的。他只是伟大的思想家的旁系的后代。他的世界觀是馬克思的理論和伏·伏·先生不合法同居的果实。尼·一逊先生从“Mütterchen”^②剽

① 我們不說司徒卢威先生的書，因为尼·一逊先生是討厌它的。但是尼·一逊先生如此坚决地称这本書为毫无用处是徒劳的。在和尼·一逊先生爭論时，彼·司徒卢威先生很能为自己辯护。至于說到尼·一逊先生本人的“分析”，那末，除了一些老生常談，从它剩下的将不多，当人們从事于从馬克思的观点“分析”它的时候，应当希望对于这一“分析”的出現的等待将不是长久的。

② (“媽媽”)。

窃了術語和几个經濟定理，不过这些为他理解得极端抽象，因此是极不正确的。他从“Väterchen”^① 承繼了对社会改良的空想主义态度，借助于它他也就建立起了反对別尔托夫先生的第二个炮垒。

別尔托夫先生說，社会关系以其发展的自身邏輯引人認識到他的被經濟的必然所奴役的原因。“在已認識到他的被奴役的原因是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以后，生产者，‘社会的人’，組織这一生产，从而使之隶属于自己的意志。那时候必然的王国将完結而且自由将登极，它本身将成为一种必然。”按照尼·一逊先生的意見，这一切都是完全对的。但对于別尔托夫先生的这些对的話，尼·一逊先生作如下的补充：“因此，任务就在于使社会从阻碍它的生产力发展的某一規律表現之消极的旁观者，借助于现有的物質—經濟的一些条件得以寻出使这一規律服从自己的权力的手段，把这样一些条件安排在它的周围，讓它們既不阻碍而是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的劳动力(劳动力!)之发展”⁵²³。

尼·一逊先生自己完全没有觉察到地从別尔托夫先生的“完全正确的”話語做出了极端混乱的結論。

在別尔托夫先生那里事情是說的“社会的人”，說的是生产者們的总体，在他們的前面，确实是，行将征服經濟的必然。尼·一逊先生以社会代替生产者們，它“作为生产的整体不能毫不关心地，‘客觀地’对待这样的社会—經濟关系的发展，在这些关系之下它的成員的多数注定地日益陷于貧穷”。

“社会作为生产的整体”……仿佛为尼·一逊先生所坚持的馬克思的“分析”不停止在作为“生产的整体”的社会之前。他将現代社会，依照它的真实的本性，分割为一些个别的階級，其中每一个

^① (“爸爸”)。

階級有自己的特殊的經濟利益和自己的特殊任务。为什么尼·一逊先生的“分析”不照这样进行呢？为什么在本應該說俄国生产者們的任务的地方他却談整个社会的任务呢？这一社会，就它整个說，通常地，而且并非沒有理由地是和人民对立的，因此，尽管有自己的“整个性”，只是俄国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只是它的不算什么的少数。当尼·一逊先生告訴我們，这一微不足道的少数是在組織生产时，那末我們只有聳一聳肩和对自己說：这不是从馬克思那里抄袭来的；这是他从他的“Väterchen”^①，从伏·伏·先生那里承繼来的。

按照馬克思，生产組織須以生产者們对它的自覺的态度为前提，他們的經濟解放所以应当成为他們自己的事情。在尼·一逊先生那里，生产的組織以社会方面对它的自覺的态度为前提。假使这是馬克思主义，那末，确实，馬克思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

但是我們假定，社会确以生产的組織者的姿态出現。它对生产者們将取什么态度呢？它組織他們。社会是英雄；生产者們是群众。

我們問“断定”別尔托夫先生是曲解了他的关于英雄与群众的学說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难道他，象尼·一逊先生一样，認為，社会可以組織生产嗎？假使他是这样認為，那末他正是站在如下的观点上，根据它，社会，知識分子是英雄，是我們未来历史发展的創造主，而以百万計的生产者則是群氓，英雄們按照自己的理想願意把它們捏成什么就捏成什么。那末現在讓不偏的讀者說，別尔托夫先生在自己說明“主观主义者”的把人民当作群众的看法是不是对呢？

①（“爸爸”）。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聲明說，他和他的同志們也是一點也不反對生產者們的自我意識的發展的。他說，“我只是為了如此簡單和明了的綱領是用不着爬到黑格爾哲學雲端的後面並且下降到由主觀的和客觀的東西攪合成的涼菜的底層的”。但是問題正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你們類型思想的人的眼中生產者們的自我的意識不能有如你們的敵對者們的眼中所有的那種意義。從你們的觀點看來，生產能為“社會”所組織，從你們的反對者們的觀點看來，只能由生產者本人組織。從你們的觀點看來，“社會”是在行動，而生產者是在協助。從你們的敵對者們的觀點看，生產者們不是在協助而正是在行動。不言自明的是，為了做協助者比行動的人所需要的覺悟程度要少些，因為老早就有人很正確地說過：“月亮有光榮，太陽有光榮，一些星星有某種光榮，星星和星星之間的光榮又是各有不同的”。您對待生產者們，正如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法蘭西的和德國的空想主義者對待他們一樣。你們的反對者們斥責對待生產者的任何空想主義的態度。假如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更好地知道經濟著作的歷史，那末您也許會知道，為了消除對生產者們的空想主義的態度，正應當把自己高舉到黑格爾哲學的雲端和後來又下降到政治—經濟散文的底層。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喜歡“生產者”這一詞，您看，這裡有馬廐的氣味。我們說：盡我們所有的招待你，我們因此而高興。如我們所知道的，“生產者”一詞是由聖西門和聖西門主義者開始使用的。從《Le Producteur》（《生產者》）雜誌存在的時候起，就是說，從1825年起，它在西歐用了數不清的次數，誰也沒有聞着馬廐味。但是只要俄國的懺悔的貴族一提到它就馬上記起馬廐。怎樣說明這一奇怪的現象呢？大概，是關於懺悔的貴族的一些回憶和傳統。

尼·一遜先生很狡猾地引用別爾托夫先生的如下的話：“雖然

在馬克思的俄国学生們中間一个人对經濟的知識比較广博些，另一个比較差些，但是这里問題不是个别的人知識的多少的問題，而是在于观点的本身”。尼·一遜先生問道：一切主張憑借现实主張詳細研究經濟發展的進程的必要性的要求藏到哪里去了呢（“詳細研究的必要性”，这是有点不清楚的，尼·一遜翁先生）？現在原来是，一切这些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原来事情“不在于知識的多少，而在于观点”。

尼·一遜先生，大概，有时愛說些可笑的事情。但是我們劝他在那些当他想笑人的場合不要忘記常識。否則他就要成为被笑的人。

尼·一遜先生沒有懂得別尔托夫先生。我們試努力把他从困难中救出来。在刊載着尼·一遜先生的札記的《俄国財富》同一期中，在莫克叶夫斯基的論文《有教育的人是什么？》中我們发现了如下的，对于尼·一遜先生很有教益的几行：一个阿拉伯的学者对自己的学生說：“假使某一个人对你們說，数学的規律是錯誤的，而且为証明这点把手杖变成一条蛇，那末不要認為这一証明是令人信服的。有教育的人駁斥象这样的証据，虽然他（和学者不同）也不知道数学的規律。他将說：变手杖为蛇是一个不寻常的奇迹，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数学的規律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无疑地是，一切未受教育的人馬上会在象这样的奇迹的脚下烧掉自己的一切信念和信仰”。

在聰明的阿拉伯人的学生中一个可能有比較淵博的数学知識，另一个的知識可能少些，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个会拜倒在奇迹的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們中間的每一个都通过了好的学校的；因为这里問題不在知識的淵博性而在于那一观点，这一观点是，把手杖变成蛇不能作为对数学定律的駁斥。您懂得了这点嗎？尼·一

遜先生？我們希望，您是懂得了的；這實在是很簡單，甚至完全是最初步的東西。好的，如果是懂得的話，那末您自己現在也看出，別爾托夫先生關於觀點及其他的話一點也不消除堅持着實現這一要求。

但是我們害怕，您還是想得不大高明，不懂是怎么回事。我們提供您另一個例子。你們那里也不知道得清楚有多少經濟的消息，但是你們总比伏·伏·先生多一些這些消息。但是這不妨礙你們站在一個觀點上。你們兩人都是空想主義者。而當不論誰打算說明你們兩人的共同的看法時，他就把你們的知識的數量的差別丟在一邊不問並且說：問題在於這些人的觀點，從往昔時候剽竊來的觀點。

現在您，尼·一遜先生應當完全明白，您不恰當地說到別爾托夫先生的應用主觀方法，而且您做了很大的錯誤。

為防萬一我們用別的一些話來說這同樣的東西。不論馬克思的俄國信徒們就知識的多少上說在自己中間有多么的不同，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在繼續忠於自己的時候，當您打算斷定，看什麼地方“社會”在我國組織生產，他們是不會相信您，也不會相信伏·伏·的。他們的觀點妨礙他們把自己的信念放在社會的方士們的腳下犧牲^①。

關於這點已經夠了，但我們既然涉及主觀方法，那末我們提一提尼·一遜先生是如何輕蔑地看待它。從他的話里得出的結論是，這一方法本身沒有一滴的科學性，而只是被給予了某種法衣，“它漸漸地賦予了它以‘科學的’外表”。很好，尼·一遜先生！但是您的“保護人”關於您有何話說呢？

^①（1905年版注）我提醒我在上面引過的費爾巴哈的話，他說，正是觀點使人有別于猴子。

·尼·一逊先生一般对于自己的主观的“保护人”是不很客气的。他的论文《对于货币的权力作为时代的特征的强辩》⁵²⁴ 有一题铭：“L'ignorance est moins éloignée de la vérité que le préjugé.”^① La vérité^②——这，无疑地是尼·一逊先生自己。他也这样说：“假使誰将一往直前地遵循这一真正主观的研究方式，他，可能完全相信，达到那一些结论，假使不是和我们所达到的完全一样，那末是接近于它们的”（《俄国财富》，3月号，第54页）。Préjugé^③——这，当然，司徒卢威先生，是Vérité用自己的“分析”的针刺所针对着的东西。好的，不过誰是那一比 préjugé（就是说，司徒卢威先生）较为接近于真理（就是说，尼·一逊先生）的 ignorance^④ 呢？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尼·一逊先生的现在的主观的同盟者。很好，尼·一逊先生！您正好落到了您的同盟者们的弱点里面。但是再说一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您还说什么呢？须知他会记忆有名的寓言的教训：

在需要的时候人家给我们的帮助是可贵的，
但不是人人都能帮忙的……

那末，好象论争是够了！似乎，我们没有留下我们的反对者们的意见没有回答。而假使我们也发生忽视其中的某一意见的话，那末我们还必须不止一次地回到我们的争论。这是说，可以搁笔了。但在与它分手以前，我们还向我们的反对者说两句话。

这里你们，先生们，都在“忙着”消除资本主义；但是请看看，产生什么结果：资本主义自己就向前进而且没有觉察到你们的“关

①（“无知比成见距离真理要近一些”）。

②（真理）。

③（成见）。

④（无知）。

心”；你們，隨同着你們的“理想”和你們的美麗的意願，是在一個地方上面踏步不前。這裡有什麼好處呢？對自己既沒有益，對人也無益！為什麼這是這樣呢？是因為，你們是空想主義者，你們沉溺在社會改良的空想計劃中，沒有看見那些直接的和迫切的任務，這些任務，請原諒我們的說法吧，是直接在你們的鼻子下面的。請好好想一想吧。或者，你們自己會說，我們是對的。不過關於這點我們還要和你們談一談。現在——*Dominus vobiscum*①。

① 〔上帝保佑你們〕。

注 释

方括弧內的标题、脚注外文的翻譯和其他用語，都是本五卷集普列汉諾夫原文的編者所作。

- 1 普列汉諾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在俄国用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思想作了批評，列宁會称这部著作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Первый profession de foi”(信仰的第一次公开声明)(《列宁全集》，第4卷，第264頁)，这是“劳动解放”社第一次发表的言論。

普列汉諾夫是在1883年夏季打算写这本小册子的，它也为他在同时期写成，这是普列汉諾夫和民意分子之間的决裂已經成熟了的时期。

最初这一著作原是为《民意导报》杂志的第一期准备的，但是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普列汉諾夫之家”的信件以及发表在《事务与日子》杂志(1921年第2期)的書信，都証明普列汉諾夫和《民意导报》的磋商，没有产生任何結果。

《民意导报》的主編們拉甫罗夫和吉荷米洛夫謝絕了刊印这一表明民意主义“是最无原則的思潮”的著作(參閱1883年8月3日列·吉荷米洛夫給彼·拉甫罗夫的信)——《劳动解放》，第一輯，1924年，第245頁。《劳动解放》于1883年10月把这一著作印成单行本出版，作为“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的第一册。

拉甫罗夫发表了对《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書評(《民意导报》，1884年第2期，第64—67頁)，在这篇書評里对小册子的論战部分表示了极端的不滿。这一書評曾在普列汉諾夫作为对《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序言而載出的給拉甫罗夫的信中有了詳細的叙述(參閱本卷，第119—123頁)。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在1905年被重印在普列汉諾夫的《两条战

綫》論文中，同年被重印在日內瓦版的《普列漢諾夫全集》第1卷（這是在那里出版的唯一的一卷）內，在里面添了一些新的注釋，而在1906年又以小冊子形式單獨出版。在九十年代“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小冊子被譯成了波蘭文和保加利亞文。

本版中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是按照它的第一版和《兩條戰綫》文集的原文，經核對後而印出的。——第51頁。

- 2 《土地與自由》——是從1878年11月到1879年4月為“土地與自由”組織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革命民粹派的雜誌。一共出了五期：頭四期是由斯·克拉夫欽斯基和H.摩羅佐夫主編的，從第五期起普列漢諾夫也加入了編輯部。——第51頁。
- 3 《黑土重分》——是1880年年初到1881年年底由同名的革命民粹派組織出版的雜誌。最初加入編輯部的有格·普列漢諾夫，巴·阿克雪里羅德，雅·斯捷凡諾維奇和Л.杰伊奇。《黑土重分》的印刷所在彼得堡在印該雜誌第1期時被破獲，但是該期還是在國外出版了，那里也出版了第2期。其餘的第3—5期都在明斯克出版。——第51頁。
- 4 這里說的热里亞波夫傳，為列·吉荷米洛夫所寫，1882年在倫敦出版，作者匿名，書名為《安得烈·伊萬諾維奇·热里亞波夫》。——第52頁。
- 5 題詞引自《共產黨宣言》。——第53頁。
- 6 在庫爾城（瑞士）的國際社會主義大會是1881年10月舉行的。“俄國客人”是巴·波·阿克雪里羅德。——第54頁。
- 7 普列漢諾夫指的是列·吉荷米洛夫的作為社論刊登在1881年12月23日《民意》報第7號上面的論文，其中含有對巴·波·阿克雪里羅德（“俄國客人”）在庫爾大會上演說的尖銳批評。——第54頁。
- 8 這是从弗·席勒著的《瓦倫斯坦之死》悲劇中引出來的話（《席勒選集》，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84頁）。——第55頁。
- 9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于1867年出版。——第55頁。
- 10 參閱恩格斯：《社會主義从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頁。——第56頁。

- 11 《前进派》——这是彼·拉·拉甫罗夫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信徒。他们是由于拉甫罗夫于1873—1877年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日报《前进！》而得名的。一共出版了五期。拉甫罗夫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信；他和他的信徒们力求与欧洲的，其中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建立联系。

“巴枯宁派”——是民粹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米·亚·巴枯宁的信徒，他们认为农民是天生的暴动者，宣扬立即暴动的恐怖主义策略，由此被称为“暴动分子”。——第56页。
- 12 巴枯宁是第一国际（1864—1872年）的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进行了反对马克思的残酷斗争，于1872年在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第56页。
- 13 《La voix du peuple》（《人民之声》）自1849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蒲鲁东的报纸。——第56页。
- 14 《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一个革命者的忏悔》），是一本载有叙述蒲鲁东的世界观的书；在1849年印行。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下面所提到的一本书——《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叙述得最完备。——第57页。
- 15 《经济诸矛盾的体系》的作者是蒲鲁东。——第58页。
- 16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35页。——第59页。
- 17 恩格斯和民粹派理论家之一彼·尼·特卡乔夫的论争发生在1874—1875年。特卡乔夫用德文发表了《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 Engels, Zürich 1874》（《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信，苏黎世，1874年》）〔参阅《特卡乔夫选集》，第3卷，1933年，第88—98页〕。恩格斯在1875年的《Volksstaat》日报的第36期及以后几期上写了一篇《Soziales aus Russland》回答了这封信。当1894年恩格斯重印自己的回答时，他添加了一个注解，里面说到特卡乔夫的信，说它不论就形式或就内容来说，都带有“通常的巴枯宁主义的印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15 卷，1935 年，第 251 頁）。恩格斯嘲笑特卡乔夫的陰謀主義的幻想。他寫道，“比這為更容易和更愉快的革命，我們是不能設想的。只需要在三四處地方同時開始起義，於是那里‘革命者的本能’，‘實際的需要’，‘自己保衛的本能’就會把一切其餘的事情都办好。不過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是這樣的異常容易，何以革命有好久沒有發生，何以人民還沒有被解放，俄國也沒有變成模範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262 頁）。——第 61 頁。

- 18 《警鐘》——民粹派的雜誌，彼·尼·特卡乔夫主編，自 1875 年年底到 1881 年，最初在日內瓦，後來在倫敦出版。雜誌主張成立以奪取政權和社會改造為目的的陰謀家—革命者們的戰鬥組織。——第 61 頁。
- 19 布朗基主義（起源於法國革命者—空想家奧·布朗基的名字）“期待着的不是通過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是通過不多的少數知識分子的陰謀來使人類免於僱傭奴役制”（見《列寧全集》，第 10 卷，第 360 頁）。——第 61 頁。
- 20 參閱席勒：《威廉·退爾》，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19 頁。——第 62 頁。
- 21 參閱本注釋 11。——第 64 頁。
- 22 在 1879—1882 年中的幾年普列漢諾夫曾屬於否認恐怖是政治鬥爭所必需的革命民粹派組織“黑土重分”社，而那時的“民意”組織卻把恐怖的要求放在首要計劃上面。——第 64 頁。
- 23 “土地與自由”在沃羅涅日的大會上分裂為兩個組織——“民意”和“黑土重分”。——第 64 頁。
- 24 冬宮的爆炸是由著名的革命者、“俄國北方工人協會”的積極分子、工人斯捷潘·哈爾士林於 1880 年 2 月 5 日執行的，他是被民意分子們吸引去參加恐怖主義活動的。——第 66 頁。
- 25 小冊子的第一版里是：《西方自由貿易的時期》。——第 67 頁。
- 26 引語是摘自《民意》報 1879 年 10 月 1 日的第 1 期，那裡面說，“我們是自己主動地擔任起反政府的攻擊和政治革命，還是象魚攪冰那樣，我們將

- 照旧地忽视政治活动，把一切力量用在人民的周围奋斗呢？”。——第68頁。
- 27 参閱 Haym, 《Hegel und seine Zeit》, Berlin 1857. (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 柏林, 1857年。俄文节譯本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 圣彼得堡, 1861年)。——第69頁。
- 28 参閱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第 I — II 頁。——第72頁。
- 29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之一, 风行于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55年版, 第60—64頁)中, 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論文(同上書, 第545—586頁)中和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4—68頁)中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都作了尖銳的批評。——第72頁。
- 30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6頁。——第72頁。
- 31 参閱阿·伊·赫尔岑:《往昔与思維》, 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46年版, 第219頁。——第72頁。
- 32 这一說法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对《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譯本第一版序言中所使用的, 序言标明的日子是1882年1月21日(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4頁)。——第72頁。
- 33 普列汉諾夫譯的《共产党宣言》, 1882年被收入《俄国社会—革命丛書》, 在日内瓦出版。这一譯本是第一个正确的俄文譯本, 因为在它以前只有过一本于1869年在日内瓦为《鐘》印刷所出版的巴枯宁譯得不好的譯本。——第73頁。
- 34 参閱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8—70頁。——第74頁。
- 35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經济学家伊·伊万紐可夫的書《从亚当·斯密到現在的經济政策理論的基本原理》(莫斯科, 1880年), 伊万紐

可夫在這本書中也企圖證明馬克思是俄國革命的反對者。——第 74 頁。

- 36 這里所說的是蒲魯東的書(見本注釋 14)。——第 75 頁。
- 37 參閱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1 頁。——第 77 頁。
- 38 以里查德·柯布登為首的反糧食法鬥爭同盟,在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進行了反對糧食進口稅的鬥爭,它表達的是意圖減少工人和降低工資的資本家們的利益。——第 79 頁。
- 39 憲章運動,是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第一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第 80 頁。
- 40 布倫坦諾是政治經濟學中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學派的代表,鼓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和平”。他贊揚作為反對革命偏向的堡壘的英國工會。在本文提到的一本書《Ue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stung》,Leipzig, 1876。(《論工資與工時對勞動生產率的关系》,來比錫,1876 年)中,布倫坦諾硬說,提高工資和減少工作時間不僅對工人、而且對資本家也有利,因為它們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第 80 頁。
- 41 1881 年在英國成立的“民主主義聯盟”(自 1884 年改為社會民主主義聯盟)所鼓吹的一些觀點是領會得不很高明的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改良要求之結合。

普列漢諾夫所提到的宣言,這是由民主主義聯盟創立人海因得曼為該聯盟寫的小冊子《大眾的英國》(H. M. Hyndmann, England for all, London 1881.)。見弗·伊·列寧的論文,《海因得曼論馬克思》,載《列寧全集》,第 17 卷,第 275 頁。——第 80 頁。

- 42 “俄國北方工人協會”是 1878 年從工人們的小組中產生的。它有二百名以上的會員,一直存在到 1880 年。協會的綱領說,就自己的任務來說,它是依附西方的一些社會民主黨的,它規定自己的最後目的是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而自己的目前任務則是爭取政治自由和人民的政治權利。

這一綱領在俄國民粹派中間引起了不小的憂慮(參閱格·瓦·普列漢諾夫:《革命運動中的俄國工人》,《全集》,第 3 卷,第 184 頁)。——第 86 頁。

- 43 《种子》——是秘密的“黑土重分”集团于1880—1881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报纸。一共出了六期：第1期是1880年10月25日在日内瓦出版，第2—6期在俄国。报纸对于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的民粹主义的宣传予以特别的注意。——第86页。
- 44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们以《给编辑部的信》回答了民意分子，这封信登在1879年4月8日《土地与自由》的第5期上，在信里面证明，他们的一切“要求仍然是要求”，如果他们不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话。信里面说，“……我们也知道政治自由能保证我们的组织免于当权者的专横和允许我们更正确些的发挥自己的世界观和更成功地进行宣传的工作……”。——第86页。
- 4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47页。——第87页。
- 46 这一断语是普列汉诺夫从《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bertus-Jagetzow》，herausgeg. von Rud. Meyer, Berlin 1882.（《罗伯图斯—雅格佐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卢得·迈耶尔编，柏林，1882年）一书中引出的。——第88页。
- 47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历史学家托罗德·罗杰斯，特别是他的《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Oxford 1884.（《六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牛津，1884年）一书和法国新闻记者和国事活动家及马尔萨斯主义者查尔里·杜沙特尔的著作：《Traité de la charit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état moral et le bien-être matériel des classes inférieures de la société》，2—me éd., 1836.（《关于慈善事业和社会的一些低层阶级的道德状态及物质情况的论文》，第2版，1836年）。——第88页。
- 48 参阅格·瓦·普列汉诺夫：《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评者的司徒卢威先生》（《全集》，第2卷）。——第88页。
- 4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第89页。

- 50 “自然法”——在資產階級的一空政治學說中關於法的概念，是從人的本性，從他的理性中發生的。

自然法的擁護者們認為國家和法是某些固定性的產物，即仿佛是不改變地屬於人、而不以它屬於以哪一階級和社會發展為轉移的一些屬性的產物。

十八世紀盧梭、愛爾維修、霍爾巴赫和其他的人贊成自然法的思想，並且利用它來反對封建制度。他們宣布封建制度是違反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是和人的天性及理性的一些要求不相容的。雖然法國啟蒙主義哲學家關於自然法的觀念是有局限性的和形而上學的，但他們從自然法的一些原則卻做出了一些批評的和革命的結論。——第 90 頁。

- 51 講壇社會主義者（出自德文 Katheder [講壇]）——出現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並團結了一群德國資產階級教授們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們，他們以大學的講壇來宣傳把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理論。——第 91 頁。

- 52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66—467 頁。——第 93 頁。

- 53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4—45 頁。——第 94 頁。

- 54 參閱同上書，第 66 頁。——第 96 頁。

- 55 《人民事業》——俄國革命民粹主義者在日內瓦創立的機關刊物。除第 1 期為巴枯寧準備的以外，其他各期均是以前的民意分子、第一國際的俄國支部書記 Н. И. 烏金主編的。《人民事業》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堅持他們在國際中的策略路線方面，在揭發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分子方面積極地幫助了他們。但是《人民事業》基本上仍然是站在民粹主義的立場上的，它把俄國農民公社理想化了，不理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第 96 頁。

- 56 普列漢諾夫指的是以別爾托夫的筆名出版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第 98 頁。

- 57 在1879年11月15日《民意》报的社論里关于立宪議會說：“在这一議會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代表来自农民，而假使我們的党的活动是十分灵活的話，那末，百分之九十也就是来自于党。这样的議會能决定什么呢？极其可信的是，它会使我們得到我国一切經濟的和國家关系的完全革命……”。——第101頁。
- 58 关于革命組織夺取政权的問題，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8—9期的社論中有所論述。——第101頁。
- 59 在这里和在下面引証的普列汉諾夫的《党的准备工作》論文是綱領式的論文，登載在日內瓦出版的《1883年民意大事記》第122—124頁上。——第101頁。
- 60 “民意”执行委员会的綱領刊登在《民意》报的第3期上。普列汉諾夫所引的命題在B部第2节(第6頁)。——第102頁。
- 61 “民意”給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是在1881年3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以后，立即用传单发表的。它被轉載在“1883年民意大事記”第9—14頁上面。——第102頁。
- 62 “民意”的执行委员会对亚历山大三世建議把所列举的一些自由“作为国民議會决定以前的临时措施”。——第103頁。
- 63 “铁血宰相”是人們对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的称呼。——第106頁。
- 54 这一节所有的引語都是摘自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3頁上的社論。——第106頁。
- 65 第一版用的是“阶层”。——第107頁。
- 66 《工人报》——是一些工人(“民意”党党员)于1880年12月至1881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非法报纸；由安·伊·热里亚波夫主編。一共只出了三期，由于“民意”的組織被破坏而停止。——第114頁。
- 67 《工人》——巴枯宁主义方向的非法报纸，1875—1876年在日內瓦出版。一共出了十五期。报纸向俄国的“工作的人們”——工厂的工人們和农民們——号召反叛。——第114頁。

- 68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頁。——第115頁。
- 69 《星期》——自1866到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周报。从1876年起轉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手中，主持宣传“小事情”的理論，即是說，号召知識分子放弃革命斗争而从事于“文化工作”。——第116頁。
- 70 关于刊行《民意导报》的《发刊詞》，是在1883年出版的該杂志的第1期上面刊出的。这一《发刊詞》的头几行說：“《民意导报》想成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国外机关刊物，它怎样表现在完全确定的一些条件下为完全确定的目的而奋斗的民意党中。”——第117頁。
- 71 普列汉諾夫在1884年写成作为《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第3册，和在1885年年初出版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是《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以后“劳动解放”社的第二部理論巨著。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給薇·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对普列汉諾夫这一著作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評价（見《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們的通信集》，1951年俄文版，第308—311頁）。

对于《我們的意見分歧》出版的重要評論是俄国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組之一的布拉戈也夫分子的彼得堡小組^①給“劳动解放”社的一封信。在这封属于1884年或1885年的信（保存在普列汉諾夫文献集中），他們写道：“假使这本书也不强使人完全同意我們的社的意見（虽然已經观察到有这样的現象），那末无疑地是，它将給予大量材料来批評民意的綱領，而为了斗争的利益，对这一綱領的修改肯定是必要的。假使可能的話，請把这一小册子多寄些来……”

普列汉諾夫本人給予这本书以特殊的意义，認為它标志着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最重要的阶段。在它出版以后过了十年，他曾两次试图以同一書名（作为它的第二部）出版自己的新著作，这次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沃龙佐夫等人。但因为这些著作都是合法出版的，为了不暴露自己是作者，普列汉諾夫不得不用了另一些

^① “布拉戈也夫分子的彼得堡小組”——布拉戈也夫(Благоев)是保加利亚的革命活动家，进行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的小組与“劳动解放”社在1885年就建立了联系。

書名（《論一元史观的发展問題》和《在沃龙佐夫（伏·伏·）先生的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論証》）。稍后，在反对民粹主义的后輩——社会革命党人时，普列汉诺夫重新打算对反对他們的小册子用这样的書名。但是小册子沒有完成，在1903年以几篇論文的形式发表在《火花》上，定名为《无产階級和农民》（見《火花》第32—35及39期）。

和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普列汉诺夫的其他早期著作一样，《我們的意見分歧》在1905年以前沒有再版过，并且是圖書目录中罕見的書。在1905年，《我們的意見分歧》印在日内瓦版《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卷（只出过这一卷）中。

本版发表的文字是根据《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版和日内瓦版的第1卷校正过的。——第119頁。

- 72 拉甫罗夫的評論登載在1884年4月出版的《民意导报》的圖書評介栏中（第2期第2部，第64—67頁）。在这一評論中評論了《現代社会主义叢書》所出版的两本新的小册子：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評論的署名为彼·拉·。——第119頁。
- 73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詩《誠实的，勇敢地死去了的人們》（見《涅克拉索夫选集》，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45年版，第328頁）。——第122頁。
- 74 非国教主义者——英国的新教徒的一个教派，它不同意統治的英国教会和因此受到迫害。“非国教主义者”一字的字面意义是不一致的。——第123頁。
- 75 普列汉诺夫在七十年代屬于革命民粹主义小組之一的暴动者——巴枯宁主义者一派。見本注释11。——第124頁。
- 76 指的是塔拉索夫（尼·魯散諾夫）的論文《资产階級科学的破产》（《民意导报》第1期，第59—97頁）。——第125頁。
- 77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塔拉索夫的論文《各民族生活中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因素》，它的起头登載在《民意导报》的第2期第1部，1884年，第1—36頁。在这篇論文中塔拉索夫依据杜林的說法，硬說在历史进化中是政治的因素起着首要的作用。——第125頁。

- 78 伏尔泰的哲学故事《珍妮的历史或无神論者和智者》(《Histoire de Genni ou l'athée et le sage》)中的人物,《伏尔泰全集》,第21卷,巴黎1879年版,第529頁。——第128頁。
- 79 《〈現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发刊》声明是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发表的,有主編人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諾夫的署名,日期是1883年9月25日。同年的10月它被作为《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第1版的附录刊登出来,并在1905年被放在《普列汉諾夫全集》日内瓦版的第1卷中(第139—140頁)。在这最后的一版中删去了杰伊奇所写的注释。它在《告讀者》的标题下重印在未印頁碼(数起来是第3頁)的一頁上。在《全集》(革命后的一版)的第11卷中这一声明印在第21—23頁。——第130頁。
- 80 吉荷米洛夫的論文《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刊登在《民意导报》第2期第1部,1884年,第227—262頁。——第131頁。
- 81 伏·伏·——瓦·巴·沃龙佐夫。——第131頁。
- 82 涅恰也夫的組織“人民的懲罰”(1869年)是建立在为涅恰也夫及他的感召者巴枯宁所宣揚的耶穌会主义、吓唬、恐怖主义諸原則之上的。按照巴枯宁的說法,涅恰也夫的任务不是“教导人民而是使他們暴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出来坚决地反对过涅恰也夫主义,而涅恰也夫的諸計劃被形容为“軍营的共产主义”。——第132頁。
- 83 引自彼·拉甫罗夫的評論《在俄国国境之外》(《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1884年,第3頁)。——第133頁。
- 84 这里指的是“劳动解放”社在1884年公布的第一个綱領。这一綱領还附有注,在里面指出了,它不是最后的,并且容許不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相矛盾的修正和补充(見本卷第410頁)。——第133頁。
- 85 暴行——这是由于在政治基础上的敌意而发生的对某一个人的暗杀。——第134頁。
- 86 这是但丁的話“遵循自己的道路,讓人們說他們喜欢說的話吧”,馬克思以这句话結束了《資本論》第1卷初版的序言。——第136頁。
- 87 引自普列汉諾夫的論文《俄国社会經济发展的規律和社会主义的任务》

- 的第一部分。普列汉诺夫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还是站在民粹主义的立场上，这篇论文发表在《土地与自由》杂志的第3期和第4期上（《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62和66页）。——第140页。
- 88 瑪格里特对浮士德的汎神主义的演说的评语：“只是措辞有点不一样”（见歌德，《浮士德》）。——第140页。
- 89 引自馬克思对《資本論》第1卷初版所作的序言（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參閱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第142页。
- 90 赫尔岑給英国的政治活动家和新聞記者林頓的三封信是在1854年用英文发表的，后来在1858年被譯出，以《旧世界和俄国》为書名发表。这些信載入《赫尔岑的著作和書信全集》（列姆克編，第8卷，圣彼得堡，1919年版）。普列汉诺夫这里引用的是論俄国的第3封信（见第8卷，第45—46页）。——第143页。
- 91 車尔尼雪夫斯基的論文《对反对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哲学偏見的批判》发表在1858年《同时代人》第12期上（见《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集），第5卷，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357—392页）。——第146页。
- 92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5卷，第21—122页。——第147页。
- 93 所有上面所引的引文都是摘自車尔尼雪夫斯基为批判哈克斯特豪生的《論俄国人民生活的内部关系而特别是乡村机关》一書而写的《研究……》一文。这一論文刊載在1857年第7期的《同时代人》上面（见《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4卷，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303—348页）。——第149页。
- 94 在对薇拉·巴芙洛美娜的第四个梦的描写中，車尔尼雪夫斯基在《做什么？》的小說中，对社会主义的社会作了空想的描写（见《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1卷，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39年版，第269—284页）。——第150页。
- 95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
“尽打坏主意，老做好事情”。——第153页。

- 96 引自海涅的诗《德国·冬季的神话》。这一句诗所从出的全节，列维克的译文如下：
“我们现在，朋友们，开始
一个新歌，一个更好的歌：
我们把地上变成天上，
地上将成为我们的天国”。
(见《海涅选集》，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1950年版，第591页)。——第153页。
- 97 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哈克斯特豪生的论文(见本注释93)。——第155页。
- 98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路易十八和查理第十时代法国的党派斗争》，登载在1858年的《同时代人》第8期和第9期上(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1950年俄文版，第213—291页)。——第155页。
- 99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5卷，1950年俄文版，第216—217页。——第156页。
- 100 引自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成立宣言》(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中文版，第361页)。——第157页。
- 101 普列汉诺夫所引用的是1882年版《共产党宣言》的页码(人民出版社1954年译本第45页。)——第158页。
- 102 引自拉甫罗夫的学生民粹派分子瓦尔札尔的小册子《巧妙的机构》，这本书是七十年代初在和平的宣传者“到民间去”的时期出版的。——第162页。
- 103 《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一文是赫尔岑在1851年写成的给法国历史家米什列的一封信(见《赫尔岑哲学著作选集》，第11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年版，第134—166页)。——第168页。
- 104 《露斯》的编辑是斯拉夫主义的阿克萨柯夫；《莫斯科时报》的编辑是卡特柯夫。——第169页。

- 105 引自吉荷米洛夫的《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第170頁。
- 106 一位俄国作家——在上面第168頁提到的給米什列信的赫尔岑。——第170頁。
- 107 《土地的权力》是烏斯宾斯基的一套連載的短篇小說的标题。——第170頁。
- 108 在古波斯的宗教中，奥尔茂茲达是最高神，是善的起源；阿里曼是惡魔，是貧困的精灵。——第171頁。
- 109 特卡乔夫：《給1874年在〈民族国家〉第117和118期上刊登的〈流亡者的文献〉論文的作者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見《特卡乔夫著作选集》，第3卷，1933年俄文版，第88—98頁）。——第176頁。
- 110 特卡乔夫：《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給〈前进!〉杂志編輯的一封信》，1874年（見《特卡乔夫著作选集》，第3卷，俄文版，第55—87頁）。——第180頁。
- 111 《思想的无政府》（特卡乔夫的批評隨筆集），《警鐘》杂志出版社，倫敦1879年（見《特卡乔夫著作选集》，第3卷，俄文版，第303—337頁）。——第180頁。
- 112 《告俄国社会革命青年》——是拉甫罗夫为了反对特卡乔夫的《俄国革命宣传的任务》小册子而写的論战性的小册子。拉甫罗夫的这本小册子1874年在倫敦出版，署名为《前进!》杂志的編輯（見《拉甫罗夫社会政治著作选集》〔八卷集〕，第3卷，1934年俄文版，第335—372頁）。——第180頁。
- 113 在同一題目《論革命的宣传》之下，写的一些社論的論文，刊載在1877—1878年《警鐘》杂志的許多期中。——第181頁。
- 114 引自特卡乔夫的論文《現在作甚么?》（載《特卡乔夫著作选集》，第3卷，俄文版，第442和446頁）。——第181頁。
- 115 有思想的现实派——这是在皮薩列夫的一些著作中用的名称。有时革命的民粹派分子也这样称呼自己。——第185頁。

- 116 引自拉甫罗夫对《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的書評(載《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 1884年, 第65頁)。——第188頁。
- 117 引自恩格斯的論文《流亡者的文献》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綱領》(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5卷, 1983年俄文版, 第225頁)。論文曾刊載在1874年的《民族国家》上。——第189頁。
- 118 《德法年鉴》是由馬克思和阿尔諾德·卢格于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只出版了一期, 共两册。普列汉諾夫这里說的是在这一期发表的馬克思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一文。——第191頁。
- 119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塔拉索夫为研究伊万紐可夫的《从亚当·斯密到現在的經濟政策理論的基本原理》一書而写的論文《资产階級科学的破产》(見本注释35)。——第192頁。
- 120 彼·拉·拉甫罗夫(見本注释112)。——第194頁。
- 121 見黑格尔:《历史哲学》, 載《黑格尔全集》, 第8卷, 苏联国家社会經济書籍出版局1935年版, 第414頁。——第195頁。
- 122 《給以前的同志們的信》的作者是奥·伏·阿普捷克曼。在这封信里, 对于“平分土地”社的政綱和活動作了历史的和理論的論証。——第196頁。
- 123 这一社論是普列汉諾夫所写的(見《普列汉諾夫全集》, 第1卷, 俄文版, 第125頁)。——第197頁。
- 124 独立教派——十七世紀英国资产階級革命时期的一个政党, 代表资产階級中等阶层和资产階級化的貴族的利益。独立教派以自己的宗教自由和独立(independence)的要求短时期地吸引了小资产階級和农民跟在他們的后面。——第198頁。
- 125 在这一章以及在以下的几章中的引文都是引自吉荷米洛夫的論文“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 ”。——第199頁。
- 126 在引号中的話, 是拉薩尔在他的有名的小册子《工人們的綱領》中的表述。——第202頁。

- 127 見本卷第 111 頁及以下各頁。——第 203 頁。
- 128 在《党的准备工作》一文中（見《1883 年民意大事記》，第 122—134 頁）。——第 203 頁。
- 129 見本注釋 66。——第 204 頁。
- 130 在保存在列宁格勒的普列汉诺夫紀念館中的一篇未发表的短記中，普列汉诺夫引用了某些法国活动家在 1870—1871 年法普战争前夕的华丽的言論。我們譯出一个短記：
“列別夫元帅：‘我們已准备好，而且准备得非常好；假使战争拖长甚至一年，我們也将一点也不感觉缺乏，連复鞋套上的最后一顆扣子也不缺乏！’
參議院議長：‘先生，由于您的一些关心，法国已准备好了’。
国防部长：‘沒有普魯士的軍隊，我是否認它的’。”——第 205 頁。
- 131 班格罗斯——是伏尔泰的小說《贛第德》中的贛第德的教師。班格罗斯以萊布尼茲式的原理为指导原則：“在所有的世界中这一最好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朝最好的一方面走的”。——第 210 頁。
- 132 根据傳說，羅馬的女貴族卢克萊茨亚（公元前六世紀）为当时的国王塞克斯特的兒子所奸污，自杀身死，这好像成了起义的借口，結果是赶走了羅馬的諸国王和建立了貴族共和国。——第 210 頁。
- 133 引自海涅的詩《問題》（据莫·米哈依洛夫的翻譯）：
“他的胸中充滿了悲苦，脑中充滿了怀疑……”。
（《海涅著作选集》，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50 年版，第 133 頁）——第 212 頁。
- 134 見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8 頁。——第 214 頁。
- 135 見 1873 年 1 月 6 日的信。《罗伯图斯—雅格佐夫博士的書信和社会政治論文集》（《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 Rodbertus Jagetzow》），魯多尔夫·麦耶出版，柏林 1882 年，第 1 卷，第 291 頁。——第 214 頁。

- 136 見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3 年版，第 32—33 頁。——第 215 頁。
- 137 見《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7 卷，蘇聯國家文學書籍出版局 1950 年版，第 223 頁。——第 217 頁。
- 138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
“聰明變成愚蠢，善變成惡”。——第 218 頁。
- 139 引自《哲學的貧困》，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79 頁。——第 218 頁。
- 140 “工資鐵律”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教條，它以馬爾薩斯的反動的人口理論為根據。“鐵的”是拉薩爾稱呼它的。馬克思是這樣敘述這個“規律”的：“按照這個教條，工資會因資本積累而騰貴起來。騰貴的工資，會刺激勞動人口的更迅速的增殖；這種增殖會繼續下去，以致勞動市場過剩，使資本對於勞動的供給成為相對的不足。工資又跌落，並由此顯出徽章的反面。”（見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802—803 頁）從這一說工資在人口的增长中有“自然的”、“天然的”界限的教條出發，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硬說，勞動者階級的窮困和失業不應當責怪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色的社會條件而應責怪自然。而在《資本論》中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證明了“鐵律”的毫無根據。——第 220 頁。
- 141 引自吉荷米洛夫的論文《我們所期待於革命的是什麼？》（載《民意導報》第 2 期，1884 年，第 240 頁）。——第 223 頁。
- 142 在第一版是“西方的”。——第 223 頁。
- 143 宇未良和約是在 1678 年法國和荷蘭之間簽訂的和約。——第 228 頁。
- 144 凡爾賽和約是 1783 年 9 月 3 日在一方是美國和它的盟國（法國、西班牙和荷蘭）與另一方是英國及其盟國之間的和約。——第 228 頁。
- 145 引自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第 1 卷第 9 章，斯圖加特和吐賓根 1842 年第 2 版，第 154 頁。——第 231 頁。

- 146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55頁。——第231頁。
- 147 “共产主义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夏季在倫敦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組織。由于受这一組織的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成了于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1848—1849年在德国革命的失败，在1850年导致了“共产主义同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拥护者和維利赫—沙培尔派之间的分裂。1852年年底由于马克思的提議“同盟”正式被解散。“共产主义同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一国际的先驅者之一。——第234頁。
- 148 这里以及以下的一些引語，都是摘自马克思的《关于科倫审讯共产党人的揭发》論文（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30年俄文版，第548—549，506和507頁）。——第234頁。
- 149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民意》执行委员会1881年8月30日为蹣跚犹太人的暴行而发表的《告乌克兰人民書》的宣言。《民意》編輯部在《国内評論》（見《民意》第6期，1881年10月23日）中对这一宣言表示完全的贊同。——第236頁。
- 150 《Walka Klas》（《阶级斗争》），是以波兰文在日内瓦出版的“国际社会革命党”的机关刊物。見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一机关刊物第2期的評論（《普列汉诺夫全集》，第4卷，俄文版，第279—280頁）。——第237頁。
- 1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07頁。——第237頁。
- 152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紀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梭內、屠尔哥等人）的一个集团，它認為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并且拥护发展工业的农业。——第240頁。
- 153 曼彻斯特派，是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英国经济学家（柯布登、布頓特等人）的一个集团，代表前垄断时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它的自由貿易的意图和它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任何干涉的抗議。他們一方面为反对谷物稅，另一方面为反对对工作日的立法限制而热烈地斗争；他們認為生产的基本动力是自由竞争。马克思指出，在曼彻斯特派的蠱惑宣传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意图，即达到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和加强对工人

- 階級的剝削。——第 241 頁。
- 154 著名的俄國資本家波里亞科夫為了獲得建築鐵路的承租權對部長們實行賄賂。——第 243 頁。
- 155 沃龍佐夫是從刊載在《歐洲導報》1870 年第 10 期上的維希尼亞柯夫的論文《俄國的工業及其需要》中抄來的這一表。——第 245 頁。
- 156 這裡說的是 1882 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全俄美術—工藝展覽會。——第 253 頁。
- 157 在論文《有關經濟書籍的消息(圖書評介)》。伏·伏·《俄國資本主義的命運》，聖彼得堡，1882 年》中(見《法學導報》，1883 年 1 月，第 89—110 頁)。——第 268 頁。
- 158 引自普列漢諾夫對《社會民主黨人要什麼？》小冊子的第八注(見《普列漢諾夫全集》，第 2 卷，俄文版，第 399 頁)。——第 273 頁。
- 159 指的是杜岡—巴拉諾夫斯基的書《工業的危機。英國社會史概論》，聖彼得堡 1900 年第 2 版。有 1923 年版。——第 273 頁。
- 160 普列漢諾夫於 1905 年關於列寧的這些斷語是絕對不正確的。這裡明顯地看出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為了損害布爾什維主義的目的，把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市場理論的維護和論證，說成是重彈讓·巴·薩伊的市場理論的老調。正是在《市場理論問題評述》的著作中列寧批評了斯密—薩伊的市場理論。——第 273 頁。
- 161 見《馬克思、恩格斯與俄國政治活動家的通信集》，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1 年版，第 340—342 頁。——第 276 頁。
- 162 不確切地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詩《嚴寒，紅鼻子》(見《涅克拉索夫著作選集》，蘇聯國家文學書籍出版局 1945 年版，第 101 頁)。——第 277 頁。
- 163 無敵艦隊——西班牙的艦隊，為國王菲利普第二在 1588 年所裝備來征服英國的艦隊。同荷蘭和英國的船隻的軍事衝突和風暴，使艦隊歸於覆滅。——第 289 頁。

- 164 看来,这是一个錯誤。在普魯加文的書中,这一引語所从出的第40頁所提到的是尤列也夫县的以下的几个乡:斯巴斯乡、叶西普列夫乡、达未多夫乡、彼得罗夫乡、高尔金乡、西姆乡。——第298頁。
- 165 見恩格斯:《反杜林論》,三联書店1953年版,《引論》,第11頁。——第310頁。
- 166 同上書。——第311頁。
- 167 “忠誠无詔”——保羅一世授与阿拉克切也夫的徽章上的題詞,由于普希金的警句而成为在有势力的人的面前卑躬屈膝的同義語。——第316頁。
- 168 *Credo, quia absurdum* (“我相信,因为荒謬”)——这被認為是基督教的作家切爾圖里安(三世紀)的箴言。——第318頁。
- 169 引自拉甫羅夫对普列汉諾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書評,这一書評发表在《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1884年,第64—67頁。——第319頁。
- 170 薇·查·——普列汉諾夫指的是薇拉·伊万諾夫娜·查苏利奇。——第319頁。
- 171 关于《民意导报》发刊的声明,上面写的日期是1883年8月,刊登在这一杂志的第1期,第3—10頁。——第320頁。
- 172 克·塔·——克·塔拉索夫。普列汉諾夫这里是指的他对这本书的評論:拉維尔德:《議會清談館(对代議制度的批評)》(*Les assemblées parlantes. Critique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巴黎1883年版。見《民意导报》第2期第2部,1884年,第67—85頁。——第322頁。
- 173 指的是卢契茨基的《比利牛斯山中的土地公社》一文(《祖國紀事》第9期,1883年,第57—75頁)。——第329頁。
- 174 由于皇帝彼得三世在1762年2月18日頒布的关于貴族自由的宣言,貴族被免除了义务兵役或國家的民事服役。——第331頁。

- 175 党派(Факции, 源自拉丁字 factio)——政党, 派別。——第 334 頁。
- 176 打重点号的句子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小册子中没有着重点。——第 346 頁。
- 177 “害怕达奈伊茨人”的說法——“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 (我害怕达奈伊茨人, 甚至他們带来的礼物), 这是和关于特洛伊人劳孔的神話有关的, 他企图說服自己的同胞們不要把希腊人(达奈伊茨人)所遺留下的木馬运进城。劳孔的忧虑实现了: 在木馬中竟有灭亡特洛伊的武装士兵。——第 346 頁。
- 178 即 1812 年法国將軍馬勒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陰謀。——第 347 頁。
- 179 薩多瓦之战, 发生在 1866 年 7 月, 是結束奥普战争并且預先决定普魯士在統一德国的事业中的领导角色的一战。——第 348 頁。
- 180 “悔过的貴族”——这是由米海洛夫斯基引用到文学中的一个說法, 形容那种类型的人, 他認為自己在人民面前担负着自己的先人們所犯的未經偿付过的一切罪过, 农奴制度的一切可怕罪行。——第 348 頁。
- 181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
“……在得不出概念的場合,
就可以用一个詞来代替它們”。——第 354 頁。
- 182 見柯瓦列夫斯基的書《公社土地所有制, 它解体的原因、进程和后果》, 莫斯科, 1879 年。——第 359 頁。
- 183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
“我的亲爱的朋友, 我劝你,
首先学学邏輯对你是有益的”。——第 366 頁。
- 184 見阿尔图尔·阿尔努:《国家与革命》(《L'état et la révolution》), 日內瓦—布魯塞爾, 《工人》, 1877 年。——第 367 頁。
- 185 指的是 1859 年在柏林出版的馬克思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第 371 頁。
- 186 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解放社 1949 年版, 第 135—136 頁。——第

- 380 頁。
- 187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223頁。——第380頁。
- 188 吉荷米洛夫在自己的論文《我們所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中以民意分子的观点与“劳动解放”社的观点相对立,据他断定,“劳动解放”社除了协助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为自由主义的宪法奋斗以外,仿佛没有别的出路。据吉荷米洛夫断定,民意分子力爭宪法,是为了将权力移交給人民,而不是为了“給资产阶级一些新的手段通过剥夺土地、罰款和打耳光来組織工人阶级和訓練它遵守紀律”(見《民意导报》第2期,1884年,第237頁)。——第383頁。
- 189 爱尔杰尔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說中,把商人和工业家描繪成經濟的組織者和进步的担当者,他的小說刊登在《民意导报》第6—8期,1883年。——第383頁。
- 190 格里波耶多夫的《智慧的煩惱》中列別蒂洛夫的話。——第384頁。
- 191 所說的是在巴黎于1867年6月6日,波兰革命者別列佐夫斯基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第384頁。
- 192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詩《被遺忘的乡村》(載《涅克拉索夫著作选集》,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45年版,第44頁)。——第385頁。
- 193 大概,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吉荷米洛夫的論文中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把保守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等量齐观,前者認為拯救俄国的道路是在强有力的貴族身上,后者認為是在工人阶级身上。——第387頁。
- 194 見《民意导报》第2期,1884年,第236頁。——第390頁。
- 195 普列汉諾夫的对比是說的民意分子哥尔登柏格在被捕以后的行为。哥尔登柏格違反了秘密工作的規則,陷入了暗探局的圈套。在已理解自己已成为不自願的叛徒以后,哥尔登柏格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要塞自杀了。热里亚波夫与哥尔登柏格相反,是意志异常强的地下革命的秘密工作者的典型。——第393頁。

- 196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是引的《1883年民意大事記》中的一篇論文——《党的准备工作》。这一論文的《城市工人》一章开始就說：“城市工人，無論就其状况，以及就相对大些的成熟性說，对革命都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应当引起党的严重的注意”（第130頁）。——第393頁。
- 197 由哈尔吐林所实行的爆炸冬宮和在小薩多瓦雅挖地道，是实现“民意”执行委员会所拟定的以1881年3月1日的恐怖行为而完成的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计划的几个阶段。——第394頁。
- 198 关于“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見本注释42和44。——第394頁。
- 199 七十年代末的特征：席卷許多工业部門，首先是紡織工业的罢工浪潮，在紡織工业中对工人的剝削是最厉害的。在三年（1878—1880年）的时间发生了一百次以上的罢工。这些罢工是純粹的經濟的性質，工人們还相信沙皇和甚至向皇位的繼承者亚历山大三世遞請願書。一些民意分子，其中也有普列汉諾夫积极参加了这些罢工的組織（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卷中的通信和第3卷中的論文《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第396頁。
- 200 以列·吉·器名的吉荷米洛夫的短評：《普列汉諾夫：〈我們的意見分歧〉，日內瓦，1885年》（《民意导报》第5期第2部，1886年，第40頁。关于一些新書的短評）。——第409頁。
- 201 論文《必然的轉变》（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31—40頁），是普列汉諾夫就吉荷米洛夫对他的書《俄国的政治和社会》（《La Russie politique et sociale》）的第2版序言所写的；論文《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或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煩惱》是对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为什么我不再是革命者》的回答。对这本小册子，普列汉諾夫也写了一个短評（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3卷，俄文版，第41—44頁）。論文《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見本卷。——第409頁。
- 202 普列汉諾夫写这一綱領的第一草案的时间，正是在1883年秋季組織“劳动解放”社的时候。这是可以从它的社員們的通信（見《“劳动解放”社》，彙集，第1册，第187頁）和Л. 杰伊奇給俄国的同志們的信对提綱的提及（見《格·瓦·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彙集，第1册，第225頁）証实的。

綱領稍后一些，于1884年在日内瓦以单行本刊行。在1905年，綱領第一次印在出版于日内瓦的《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第1卷中。

現在的发表是根据着《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中的经过作者在世时最后的1905年版的文字校正了的。——第410頁。

203 关于印在第二草案中也保存着的人民直接立法一点，列宁于1899年在論文《我們党的綱領草案》中写道：“这一点是不应載入綱領中的，因为‘原則上’把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以人民直接立法来代替議會主义联結在一起是不許可的”（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18頁）。——第411頁。

204 在这里和在草案的下面有关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一些表述一样，使人感觉到綱領起草者們的民粹主义的过去。——第412頁。

205 关于这一和其他的类似它的一些表述，列宁于1907年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几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說：“这一綱領的錯誤不在于它里面有一些錯誤的原則或一些錯誤的局部要求。不是的，它的一些原則是对的…… 这一綱領的錯誤性是它的抽象，是它对于事物缺乏任何具体的看法…… 不言自明的是，如果把这一錯誤归咎于在工人党組成以前很久第一次叙述一些有名的原則的起草人們是很荒謬的。相反地，应当特別強調的是，在这一綱領中，在俄国革命二十年以前就承認了农民改革事业之‘彻底改变的必需性’”（見《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1頁）。——第414頁。

206 也保存在第二草案的关于生产者組合一条，反映了拉薩尔主义的影响。类此的条文在哥达綱領——在1875年5月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中也是有了的（見《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第2卷，第21—22頁）。

列宁說到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綱領中去掉这一条的必要性，不过認为对于“劳动解放”社的时期，把它放在綱領中是天然的（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20—221頁）。——第414頁。

207 第一草案中关于个人恐怖的必需性的錯誤的一条是对民意主义的回声和讓步。在第二草案中所說的已經不是关于个人恐怖而是关于在适当的时刻轉变到对政府的“总的，坚决的攻击”，同时，恐怖已不被認为在一

切条件下都是必要的一种斗争手段(見《綱領的第二草案》，本卷第416頁)。——第415頁。

- 208 在号召知識分子走向在工业无产階級中間工作时，草案的起草人們容許了农民的“独立的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在第二草案中这一容許是沒有了。不論是在第一以及在第二草案中都沒有以足够的明确性強調农民在资产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革命作用，也沒有強調只有同农民联盟无产階級將能战胜沙皇主义的那种思想。——第415頁。

- 209 “劳动解放”社的綱領的第二草案是在1887年写成的。它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11—212頁)。

綱領的第二草案第一次的发表是于1888年在日内瓦，标题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們的綱領草案》，是小册子《社会民主主义者們要甚么》的附录。第二次只是十年以后在对1898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巴·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論当前的一些任务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們的策略問題》的附录。下一次的出版是在《1902年社会民主主义的大事記》中，这是由“战斗”社在日内瓦出版的。1903年草案由T. A. 苦克林以单行小册子連同着《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的宣告》一齐出版的。这是作者在世时最后的一版。

在本卷中草案是照着《普列汉諾夫全集》第2卷的文字印的，根据头两版和作者在世时的最后一版訂正的。——第416頁。

- 210 見对綱領第一草案的第372頁第1注(即本注释203。——譯者)。——第416頁。
- 211 所有这些“对知識分子的‘不稳定性’及其他的原因的一些指示”，据列宁的意見，是应当从綱領的原則部分刪去的(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17頁)。——第418頁。
- 212 列宁在1899年就这一条写道：“……我們以为，在工人党的綱領中对于国外的革命者們的团体是必要的有关活动手段的一些指示，在这里就不是地方……”再往下就是：“为了不让有半吞半吐的話語存在，我們現在附保留地說，据我們个人的意見，恐怖在現在的时候是不适宜的斗争手段，說党(作为党)应当攢弃它(一直到足以引起策略变化那些条件变化

- 的时候)……”(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17—218頁)。——第418頁。
- 213 在头两版中：“根据这些……权利，工人党将提出……。”在1903年作者在世时最后的一版中改变了，全集中草案的文字大概是依照这一版印出的。——第419頁。
- 214 就这一条，列宁写道：“我觉得这里表达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社会民主党实在应当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相应的要求”(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21頁)。然而对于九十年代之末，他認為这一要求是不明确的。連普列汉諾夫在《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綱領草案的評論》中也是这样的承認，說明綱領的这一表述是出于“外交上的考慮”(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2卷，第214頁)。——第419頁。
- 215 对这一条的改变和补充，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19—220頁中所写的。——第419頁。
- 216 見对綱領第一草案的第375頁第2注(即本注释206)。——第419頁。
- 217 就这一注，列宁在1899年写道：“……当革命民粹主义的传统还活着的时候，这样的声明也就够了，但是现在我們自己必須开始审議在农民中‘活动的基本原则’，假使我們要使社会民主党自己成为爭取民主主义的先进战士的話”(見《列宁全集》，第4卷，第226頁)。——第420頁。
- 218 引起写《专制主义的新辯护人或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煩惱》小册子的口实的乃是1888年在巴黎以俄文出版的喧嚣一时的列·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

列夫·吉荷米洛夫，以前的民意分子，“民意”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員，背叛了革命斗争，誹謗了俄国的革命者們。在发表自己的可耻的小册子以后在1888年提出了請求赦免的呈文，在1889年从国外亡命回到了俄国，很快就成了专制的最热烈的辯护者和理論家之一，是反动的帝制主义的日报《莫斯科新聞》的撰稿人，后来又是它的主編。

普列汉諾夫在吉荷米洛夫的小册子問世以后立刻，在1888年8月，以書評来回答，在里面，順帶地，以很大的洞察力写道：“这真是受委托主編《莫斯科新聞》的人！吉荷米洛夫先生的創造的智慧会是我們反动报纸的真实的发现”(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3卷，第43頁)。

小册子《专制主义的新辩护人》第一次于 1889 年在日内瓦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第九册)出版。在 1906 年,在彼得堡已经出了第二次的合法版,是《鹰》杂志的附刊。这一版是第一版的重印而且带有已检查过的校样的痕迹:最尖锐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关于俄国诸君主的形容语是大大地被缓和、减轻了。

这一卷是照着《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3 卷本的文字排印的,而且是同第一版(1889 年的日内瓦版)核对过的。——第 421 页。

219 疯狂的希腊人的——赫罗斯特拉特的——虚荣是指功名爱好者的可耻的虚荣,他不惜以任何手段,直到犯罪以求达到它。——第 421 页。

220 见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有名的信(别林斯基:《哲学著作选集》,第 2 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517 页)。——第 422 页。

221 《俄国通报》是月刊。自六十年代起,成了农奴主义反动和俄国专制的喉舌。——第 423 页。

222 按照居维叶的学说,有机的种在每一个地球史中,所仿佛发生过的灾变以后,将从地球上完全绝迹。后来新的有机世界是通过突然的创造行为发生而且不变地存在直到下次灾变。——第 423 页。

223 法国摄政的时期(1715—1723 年)是路易十四死后的一时期,那时候在未成年的路易十五之下摄政的是菲利浦·奥尔良。这一时期的经济事变促进了有产阶级地位的巩固。——第 428 页。

224 见黑格尔《逻辑学》,《全集》第 5 卷,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434—435 页。——第 430 页。

225 引自海涅的诗《丢掉自己的一些隐喻吧……》。普列汉诺夫所译的这几行是被检查官歪曲了的。为米·米哈依洛夫译出的这首诗的真正译文第一次是在《往事》杂志 1906 年第 2 期第 279 页上发表。这一译文是:

“……或者上帝的意志

在地球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的嗎?”

(《海涅选集》,苏联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415 页)。——第 431 页。

- 226 “民意”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发表于《民意》日报第3期，1880年1月1日，第5—7页。——第434页。
- 227 由于“土地与自由”内部关于斗争诸方法的问题矛盾尖锐化，于1879年6月，在伏隆涅热召集了土地自由分子的大会。在对它准备时，恐怖主义斗争的拥护者们在里宾克单独集了会。在伏隆涅热的大会上通过了一个不彻底的决定，要求同继续在人民间工作并行，“特殊的发展对政府的恐怖主义斗争”。
- 普列汉诺夫所說的是在伏隆涅热大会上的自己的立場，他在那里的发言是恐怖的坚决反对者。在沒有遇到支持以后，他离开了大会，書面叙述了自己退出“土地与自由”的一些理由。关于这点，見他的論文《“民意”党的不成功的历史》（見《全集》，第24卷，第145页）。——第435页。
- 228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德·居斯丁在巴黎出版的标题为《La Russie en 1839》（《1839年的俄国》）一書。居斯丁叙述了自己在俄国各地旅行的印象并且严厉地斥責了专制政体。反动的新聞記者尼·伊·格列奇写了一本以法文和德文出版并得到沙皇和第三处贊許的小册子，其中企图駁斥居斯丁的意見（关于这点見赫尔岑的日記，《阿·伊·赫尔岑》〔十三卷本全集〕，第2卷，1954年，第311—312页、第340页）。——第442页。
- 229 《莫斯科公报》——日刊，1756年开始出版。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它轉入卡特科夫之手和表示了最反动的、帝制主义的分子們的見解。——第442页。
- 230 康斯坦若格洛和穆拉佐夫是果戈里的小說《死魂灵》中的人物。——第446页。
- 231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以下的几个历史事变。由于俄土战争（1877—1878年），依照圣斯捷范的和平条約在1859年以摩尔达瓦和瓦拉赫亚两个公国的合并而形成的罗马尼亚的独立被承認了。以后不久（在1883年）罗马尼亚进入了以反对俄国为目的的和奥匈的同盟。按照1878年的圣斯捷范的条約，保加利亚和塞爾維亞也得到了独立。然而从屬于普遍欧洲的反动势力的沙皇政府的政策导致到俄国沙皇专制的威信在这些国家的大大低落。同时，罗马尼亚的、塞爾維亞的和保加利亚的人民是充

- 滿了对帮助他們从土耳其的宰制下解放出来的俄国人民的同情的。——第 448 頁。
- 232 克特·格推奇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由于旁人的过錯而头痛》中的商人克特·格推奇·布魯斯科夫的失真的名字，它成了指固执的人的普通名称。——第 448 頁。
- 233 見阿·康·托尔斯泰，《由戈斯托咪斯里到季瑪舍夫的俄国国家史》（詩的全集，“苏維埃作家”版本，1937 年，第 364 頁）。——第 449 頁。
- 234 擲彈手是普列奧布拉仁斯基团的近卫軍的擲彈兵連，由于他們的帮助在 1741 年发生了宫廷政变，把叶里札維特·彼得罗夫娜拥上了皇后的宝座。——第 450 頁。
- 235 受了来自民意分子們方面强化了了的恐怖惊吓的亚历山大第三，在革命的爆炸之前恐惧，在八十年代的开始（在亚历山大第二的被暗杀以后）关闭自己在加特欽的皇宮里，这是他自願地把自己和他的家庭关闭在那里两年。“加特欽的俘虏”，他同时的人們是这样称呼他的。在对《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版所作的序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称亚历山大第三是“革命的战犯”。——第 452 頁。
- 236 美国旅行家乔治·坎南在西伯利亚的旅行，是在 1884—1886 年那几年按照和《Century magazine》的事先商定而进行的，他担任在該杂志发表自己的观察。因为在 1882 年，坎南公开地斥責过恐怖主义者們，俄国的当局乐意地允許他进入俄国和訪問監獄及强制劳动的地点，希望在自己对俄国革命者們的反对态度中，他能把世界公論引誘到俄国政府方面来。然而坎南辜負了他們的期待。在从西伯利亚回国以后，他出版了許多描写俄国監獄和俄国被流放的革命者們生活条件的書籍。这些書产生了最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讀者們对沙皇政制的斥責。在俄国，他的書籍被禁止一直到 1905—1906 年。——第 453 頁。
- 237 在以《193 人的审判案》（1877—1878 年）的标题著称的对革命者—民粹分子們的审判中，检察长茹列霍夫斯基宣讀了控訴詞。他的演說由于自己的平淡性，无說服力和对被告的显明的誹謗，而得到了丢脸的声名。在审判的时候，被告之一写下了一首詩，諷刺这篇演說。在 1883 年这諷

- 刺为民意分子們以胶印器印成小册子出版，書名是：《检察长茹列霍夫斯基就193人案（1877—1878年）的起訴詞》（見《紅色案卷》，1929年，第3卷，第228—230頁）。——第458頁。
- 238 柯尔帕也夫們和拉祖法也夫們——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的某些故事中的人物（見，例如，《笨伯的故事》）。柯尔帕也夫們和拉祖法也夫們的名字成为以保守主义、粗暴、趋向于最残酷的剝削諸形式为特征的商人們、富农們和乡村有产阶级的其他代表們的共有名詞。——第461頁。
- 239 “他是足够的”——这是薩尔梯柯夫—謝德林的作品《孟勒頗庇护所》中商人拉祖法也夫的話。对于如果人民“完全貧穷”的时候他将从哪里取得利潤的問題，拉祖法也夫回答說：“連他也会是足够的！”——第461頁。
- 240 《现在怎么办？》这是拉薩尔《論宪法的实質》的第二篇演說，他以这篇演說参加了1862年普魯士的議會选举（見《拉薩尔全集》，第2卷，莫斯科1925年版，第45頁）。——第462頁。
- 241 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的第一次大会，是在1889年7月14—21日举行的。“劳动解放”社那时候在俄国还没有巩固的基础和没有取得派代表出席大会的資格。同时它也懂得了，它在大会的发言不仅对于俄国的革命运动而且也对于国际社会主义会有很大意义。

关于参加大会的問題，是由“劳动解放”社作出了肯定的决定的（《“劳动解放”社》，文彙第3册，第238—239頁）。

普列汉诺夫去到了大会，在那里发表了一篇演說，以俄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是工人运动的胜利这句有名的話为結語。

在和沃吉恩談話时，恩格斯說普列汉诺夫在巴黎大会上的演說《为他和許多同志所欣喜》（見《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忆》，1956年，第344頁）。

我們知道的普列汉诺夫的演說有两种譯文：其中一种是发表在日內瓦的《社会民主党》，1890年，第1期第2部，第28—29頁；另一譯文是在他死后发表在《馬克思主义史册》，1926年第1期，第78—79頁；在《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第一草稿載在第4卷中，第53—54頁；第二草稿載在第24卷，第319—320頁。两个草稿彼此大有区别；而且两者都是

值得发表的：第一种作为生前的而且绝对是通过普列汉诺夫之手的，第二种作为从法文原稿译出的，是在格德的案卷中从其余的大会文件中找出的。

现在这一版的文字，是和头两次俄文的刊载在《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史册》上的译文核对过的。——第466頁。

- 242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这篇论文是普列汉诺夫用德文为《新时代》杂志写的，于1891年11月在《Zu Hegel's Sechzigstem Todestag》（《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的标题下刊载于该杂志的第7,8,9号上。这篇论文出现在《新时代》上之后，恩格斯立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1891年12月3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篇论文好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1940年版，第394頁）。

普列汉诺夫知道了这个评语之后写信给恩格斯说：“有人转告我，您对考茨基谈到我论黑格尔的文章，曾经说过一些夸奖的话。如果这是确实的话，我就不再希求其他的称赞了。我的全部愿望只是要做一个够格成为马克思和您这样的老师的学生的的人。”（《普列汉诺夫于1893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版，第325頁。）

1892年，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译为保加利亚文，刊载在保加利亚文的论文集《社会民主党人》第2号中。就在这一次，恩格斯也对这篇文章的刊出表示过意见。他在1893年6月9日写信给这个论文集的编辑部说：“我很高兴地看到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译成为保加利亚文”（《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版，第461頁）。

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于1894年刊载在法文《新时代》杂志第10号和第11号上，直到1906年才第一次译成俄文，收入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对我国批评家的批评》（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203—228頁）中。

现在的这个版本是以《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原文（第7卷第29—55頁）为基础，并用上述的第一个俄文版本（这个版本是普列汉诺夫亲自准备的）来核对过。为了精确起见，还利用过德文版本。在俄文译本中，普列汉诺夫曾将《新时代》上所刊的几处文字作过删除，并添进了几个新的句子。——第470頁。

- 243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和马克思于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239页）。——第470页。
- 244 《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这个杂志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作品和信件。不过还在恩格斯生前，以考茨基为首的杂志编辑部就没有彻底执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在杂志上刊载了一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后并且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的文献也加以伪造了。——第471页。
- 245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1卷，1930年，第31页（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66页）。——第472页。
- 246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9—120页。——第473页。
- 247 参看同上书，第29页。——第473页。
- 248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1935年，第51页（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3页）。——第474页。
- 249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259—260页（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27页）。——第475页。
- 250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61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104—105页）。——第476页。
- 251 参看同上书，第149页（参看同上书，第200页）。——第479页。
- 252 参看同上书，第197页（参看同上书，第255—256页）。——第479页。
- 253 婆罗门——印度教的宗教学说中的一个高级神祇。按照印度教的观念，万事、万物的始因，是一种无人格的不定形的神的实体，即世界精神。——第480页。
- 254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206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266—267页）。——第481页。
- 255 参看同上书，第249页（参看同上书，第310页）。——第482页。

- 256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是古代希腊的城邦国家雅典的民主派奴隶主同斯巴达的奴隶主寡头之间进行的战争。在参战的各城市内部,特别是在战争末期的雅典,各政治党派间的斗争异常剧烈。——第482页。
- 257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246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308页)。——第482页。
- 258 宗教改革——十六世纪欧洲各国反对天主教教会和封建制度的一种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宗教改革从精神上和政治上破坏了封建制度,为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第483页。
- 259 新教——由于宗教改革的结果而在德国和欧洲其他诸国内发生的一种基督教的教派(卡尔文教、路德派等)。——第483页。
- 260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391—392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467页)。——第483页。
- 261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63页。——第484页。
- 262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82页。——第484页。
- 263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225页。——第484页。
- 264 普列汉诺夫所讲的孟德斯鸠的议论中的一个显明的例证,见孟德斯鸠所著《论法律的精神》一书第14卷第2章,章名为《在不同气候下的人们怎样不同》(参看《孟德斯鸠选集》,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85页。
- 265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85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155页)。——第485页。
- 266 此书的苏维埃版本有:梅契尼柯夫:《文明与巨大的历史河流》,莫斯科1924年版。
普列汉诺夫写过一篇专论:《论梅契尼柯夫的书》(载《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第15—18页)。——第486页。
- 267 阿契卡——古代中希腊东南方的一省,在地理特点方面极其复杂。公元

- 前594年,梭伦在阿契卡省的首府——雅典,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第486页。
- 268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220页;第7卷,第254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278页)。——第487页。
- 269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12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49页)。——第487页。
- 270 参看同上书,第27页(参看同上书,第66页)。——第487页。
- 271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17—18页。——第491页。
- 272 参看谢林:《先验唯心主义的体系》,苏联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6年版,第345—346页。——第493页。
- 273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135—136页(参看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版,第188页)。——第494页。
- 274 参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第495页。
- 275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5卷,第434—435页(译文参看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02页)。——第497页。
- 276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8卷,第385页(参看《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第459页)。——第498页。
- 277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10卷,1932年,第85页(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7页)。——第501页。
- 278 参看《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356页。——第501页。
- 279 恩格斯的著作《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于1886年首次刊登在《新时代》杂志第4期和第5期上。1888年恩格斯略加修订,以单行本出版,同时加了一篇序言,并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该书的附录,一并发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初的俄文译本,于1892年在日内瓦由“劳动解放”社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出版,译者是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在自己译文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序《译者的话》,并写了注

釋。《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俄譯本第二版，于1905年在日內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丛书》出版，普列汉諾夫又为該書写了一篇新的长序，而对注释也作了若干修改和增补。

(普列汉諾夫于1905年所作的增补和修改，在本書中一律用三角形的括号括起来。凡是第一版注释的原文已为1905年的新方案代替，在这种情况下，則把1892年的原文单独列出。普列汉諾夫为1905年版所写的序已载入《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

普列汉諾夫的注释是按照1892和1905年的日內瓦版以及普列汉諾夫紀念館所存的几乎完整的手稿校对过的全集的原文发表的。——第502頁。

280 《哲学和心理学問題》是于1889年至1918年期間在莫斯科出版的一种反动的杂志。在它周围聚集了各色各样的唯心主义派别的代表，这些派别在这許多年內是彼此更替的，起初是新康德主义者，后来是馬赫主义者、“路标派”等等。——第502頁。

281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亞·柯罗鮑夫斯基給字伯威希—海因澤的《近代哲学史》一書所加的書目附录。在該附录的第三部分《俄国人的哲学》中，对于六十年代的哲学作了如下的簡短評述：“轟轟烈烈的六十年代是以唯物主义的出現为标志的。車尔尼雪夫斯基、安东諾維奇和皮薩列夫就是这个学說的拥护者，他們之坚强有力，与其說是由于他們学說的有根有据，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对于这个派别的哲学原理，尤尔凱維奇对付起来并不困难，然而对于这些著作家的影响，对付起来就困难了”(第529頁)。——第502頁。

282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的家族》一書出版于1845年。在九十年代，要得到這本書是极其困难的，关于这一点，从培拉季奇答复普列汉諾夫要他暂时弄到這本書的請求的一封信內，就可以得到証明。培拉季奇在1892年12月19日从維也納写給普列汉諾夫的一封信中說：“……关于《神圣的家族》一書，昨天我應該接到一份和維克多尔·阿德勒博士交涉的結果的通知，他是我所接触的范围內唯一拥有這本書的人……我將設法把它轉抄一本，可以把手抄本寄給你”(見《普列汉諾夫遺著》，第1卷，第265—266頁)。——第503頁。

- 28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神圣的家族》中的一节，《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刊登在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9期第385—395页上，题目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曾将该节译出，并把它作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但是在此之前，在1885年他曾摘译过这一节，而在《星期报》变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喉舌以前，他还为该报著文阐述过这一节。然而这篇论文没有刊登出来，可能是由于《星期报》改变方向的缘故。该文在普列汉诺夫死后才发表在《普列汉诺夫遗著》第1卷第164—168页上。——第503页。
- 284 俄译本只是在1906年才出版，而且也不完整：马克思、恩格斯：《神圣的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之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只摘译一部分，论思辨哲学，论蒲鲁东，圣彼得堡《新声》1906年版。——第503页。
- 285 朗格：《唯物论史及其在目前的意义的批判》，圣彼得堡1881年版。——第503页。
- 286 C. N. Starcke, 《Ludwig Feuerbach》, Stuttgart, F. Enke, 1885 [斯达克：《费尔巴哈》，斯图嘉特，1885年]。——第503页。
- 287 普列汉诺夫的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话：“……诚然，这个人不是别个，而是亨利·海涅”（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第357页；在以下所引注的恩格斯《费尔巴哈》著作各处引文的页码都是指这两卷集而言）之后。——第504页。
- 288 海涅的杰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504页。
- 289 《海涅全集》，恩斯特·爱勒斯特出版，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6卷，第535页。——第504页。
- 290 第二个注释有关于恩格斯著作第341—346页，是注在：“当时的普鲁士人有着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第358页）之后。——第505页。
- 291 《茹科夫斯基的波罗底诺纪念日》和《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这两篇论文见《别林斯基全集》，第3卷，1953年俄文版，第240—250页、第385—419页。——第505页。

- 292 參閱赫尔岑回忆录《往事和追思》第4部分《南方的莫斯科》一文(《赫尔岑哲学选集》,第2卷,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183—185頁)。——第506頁。
- 293 參閱《1841年3月1日別林斯基致波特金的信》(《別林斯基書信选集》,第2卷,1955年俄文版,第141—142頁)。普列汉諾夫說,別林斯基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起,也就是說,在放弃了“同现实的妥协”之后,降低了“理論上的严格要求”,这种說法無疑地是錯誤的。——第509頁。
- 294 參閱《1848年2月15(27)日別林斯基致安年柯夫的信》(同上書,第389頁)。——第509頁。
- 295 《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紀念》一文,見本卷第470頁至第501頁。
《別林斯基》(1898年春天在日內瓦、苏黎世和伯尔尼的俄国人举行別林斯基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講詞),參閱《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0卷,第319—349頁。——第510頁。
- 296 第三个注釋是注在恩格斯的語:“……哲学的外衣,对它只是为了轉移检查机关的視綫而已”(第363頁)之后。——第510頁。
- 297 《德法年鉴》在1844年出了唯一的一期双刊号。普列汉諾夫提到馬克思的著作《論犹太人問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19—451頁、第452—467頁、第596—625頁。——譯者注)。
此外,在《德法年鉴》上还刊載恩格斯对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一書的評論,題为《英国状况》(同上書,第626—655頁。——譯者注)。——第511頁。
- 298 《萊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每日在科倫出版。該报由反对普魯士政府的萊茵資產階級的激进代表所創立,并有一部分黑格尔左派分子参加。該报在馬克思的领导下具有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質(參閱列宁《卡尔·馬克思》,載《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31頁)。——第511頁。

- 299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了”。——第511页。
- 300 就是指《莱茵报》。《科伦报》这个名称可能引起误解，因为在科伦同时出版由普鲁士政府的密探海尔梅斯主办的反动的《科伦报》（《Kölnische Zeitung》）。——第511页。
- 301 刊载于《莱茵报》上的马克思的论文（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243页。——译者注）。——第512页。
- 302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出版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1848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写道：《新莱茵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没有任何一种德文报纸——无论在它以前或以后——象《新莱茵报》这样有力量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29页和第334页。——译者注）。
- 列宁称《新莱茵报》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出色的无与伦比的机关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64页）。——第512页。
- 303 第四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话：“‘实体’还是‘自我意识’”（第364页）之后。——第512页。
- 304 俄文版：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第1册，伏·乌尔里赫译自德文，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111—112页、第113页、第114页。——第517页。
- 305 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的全称是《正义的自由事业和我的私人事业》（《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第519页。
- 306 见《神圣的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之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68页）。——第521页。
- 307 米海洛夫斯基曾在许多著作中反驳斯宾塞的进步论，这些著作是：《什

么是进步?》、《什么是幸福?》、《門外汉的札記》。在这些著作中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实证論社会学的两个派別之間的分歧。——第 522 頁。

308 第五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这不过是我们自身本質的幻想的反映”(第 365 頁)之后。——第 522 頁。

309 參閱本注释 281。——第 522 頁。

310 參閱《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5 年俄文版，第 7—405 頁。——第 523 頁。

311 普列汉諾夫所叙述的主要是第 2 章《宗教的一般本質》(同上書，第 41 至 63 頁)。萊布尼茨的話是費尔巴哈在上述著作第 43 頁的注释中引来的。——第 523 頁。

312 1899 年 1 月在巴黎出版的社会党人的杂志《Mouvement socialiste》(《社会主义运动》)(主編人是拉加迭尔)所进行的調查，是由于十九世紀初法国共和政府和天主教会的残酷斗争引起的，这一斗争于 1905 年以教会和国家的分离而告終。

各国社会党人的回答刊载于該杂志 1902 年第 107 期至第 110 期(从 11 月 1—15 日到 12 月 1—15 日)这四期上。——第 524 頁。

313 恩格斯《英国状况》(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649 頁。——譯者注)。——第 525 頁。

314 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 卷，第 453 頁。——譯者注)。——第 525 頁。

315 普列汉諾夫指的是別尔嘉也夫布尔加可夫以及其他“合法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九十年代末，从康德主义的立場出发“批判”馬克思，后来在 1905 年革命后，轉变为寻神說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拥护者。——第 525 頁。

316 第六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这一方向的典型代表者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第 365 頁)之后。——第 525 頁。

317 參閱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1923 年版，第 237—242 頁。——第 526 頁。

318 对卡尔·格律恩著作的評論是《德意志思想体系》中的一章(參閱《馬克

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第489—534页）。——第526页。

- 319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是“真正社会主义者”吕宁格所办的月刊，在1845年1月至1848年3月期间先在比雷菲尔德、后在帕德尔邦出版。——第526页。

- 320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5年俄文版，第451—453页（参阅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95—498页）。——第527页。

- 321 《解放》是司徒卢威主编的杂志，1902年至1905年在斯图嘉特和巴黎出版。该杂志从1904年起是自由资产阶级“解放联盟”的机关报，“解放联盟”在1905年是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提议的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揭露了该杂志的反革命反无产阶级的性质。——第527页。

- 322 《无产者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自1905年5月14（27）日至11月12（25）日在日内瓦出版。列宁是该报的编辑。该报是列宁的《火星报》和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的继续，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它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中心和组织中心。该报揭穿了孟什维克的向资产阶级妥协的策略。成为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给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作的注释的补充中，企图诽谤《无产者报》所贯彻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说成是回到“民意主义”去。——第528页。

- 323 参阅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这篇论文中考察了恩格斯的这些原理，这篇论文说明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和尾巴主义的区别”。——第529页。

- 324 普列汉诺夫为了迎合孟什维主义并给布尔什维克带来派别之害，在1905年硬说列宁有布朗基主义。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决议，并把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任务限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的议会制的共和国。列宁则认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该政府的活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 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前提。——第 529 頁。
- 325 第七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是一种当众拒絕唯物主义，暗中却偷运它的羞怯作风”（第 369 頁）之后。——第 529 頁。
- 326 參閱休謨：《人类悟性研究》，譯自英文，彼得堡 1916 年版，第 178 頁。——第 530 頁。
- 327 參閱康德：《一切可能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未来形而上学的序論》，苏联国家社会經濟書籍出版局 1937 年版，第 87 頁。——第 533 頁。
- 328 參閱霍尔巴赫《自然体系》（或《論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1940 年俄文版，第 25 頁。——第 533 頁。
- 329 參閱朗格：《唯物論史及其在目前的意义的批判》，圣彼得堡 1881 年版，第 349 頁。——第 534 頁。
- 330 參閱黑格尔：《邏輯学》，載《黑格尔全集》，第 5 卷，1937 年俄文版，第 43—45 頁、第 583 頁。——第 535 頁。
- 331 普列斯特萊与普萊斯的爭論，參閱 D. Priestley《A free discussion of the doctrines of materialism and philosophical necessity》，1778 年倫敦版。——第 535 頁。
- 332 參閱謝切諾夫《哲学和心理学論文选》，1947 年俄文版，第 350 頁和第 359 頁。——第 536 頁。
- 333 參閱康德：《一般的自然史和天体理論》（摘譯）（《古典的天体演化学的假說》〔1923 年俄文版〕）。——第 537 頁。
- 334 普列汉諾夫反对康·施米特所写的文章，參閱本書本版第 2 卷。——第 540 頁。
- 335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指出在这里“表露了普列汉諾夫用語的混乱”。——第 543 頁。
- 336 參閱費尔巴哈：《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 and 精神的二元論》，載《費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5 年版，第 213—

- 214 頁。——第 543 頁。
- 337 第八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 371 頁)之后。——第 544 頁。
- 338 关于不容許抹煞物質运动的各种本質不同的形式的特殊性的問題，关于不容許把这些形式归結为一种形式的問題，恩格斯提出了辯証唯物主义的解决方法(參閱恩格斯：《自然辯証法》，1955 年俄文版，第 197 頁和第 200 頁)。——第 544 頁。
- 339 參閱《笛卡兒文选》，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0 年版，第 595—623 頁(《灵魂的情欲》，第 1 部分，《情欲一般并順便談談整个的人性》)。——第 544 頁。
- 340 《自然体系、或論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是霍尔巴赫的主要著作，1770 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他用的笔名是密拉波，并且在版权頁上写了一个假的出版地点——倫敦。有很长一段时期，人們都認為《自然体系》是由一群作者执笔的。——第 544 頁。
- 341 參閱霍尔巴赫：《自然体系》，苏联国家社会經濟書籍出版局 1940 年版，第 56 頁。——第 545 頁。
- 342 霍尔巴赫：《自然体系》，第 199 頁。——第 545 頁。
- 343 第九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而黑格尔乃是一个十足的唯心主义者哩”(第 374 頁)之后。——第 545 頁。
- 344 在烏斯宾斯基的《活的数目字》这部故事集中有这样几句话：“啊！原来統計的分数中竟隱藏了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啊！想想这些圓圈圈，再計算一下，突然会流下眼泪来，于是一切都模糊了”。——第 546 頁。
- 345 參閱魯·施塔姆勒：《以唯物史觀所研究的經濟和法律》，第 2 卷，圣彼得堡 1907 年版，第 97 頁。——第 547 頁。
- 346 參閱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圣彼得堡 1908 年版，第 20 頁。——第 548 頁。
- 347 參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莫斯科 1912 年版，第 45 頁。——第

- 549 頁。
- 348 參閱《黑格尔全集》，1832 年柏林德文版，第 1 卷，第 349—359 頁。关于这一部分的叙述可見庫諾·費舍的《近代哲学史》，1933 年俄文版，第 8 卷，第 1 册，第 209—210 頁。——第 549 頁。
- 349 參閱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莫斯科 1912 年版，第 61 頁。——第 550 頁。
- 350 《短諷詩》是席勒和歌德的諷刺詩集，其中大部分是二人合写的。——第 550 頁。
- 351 脚注的引文是《哲学家》这首詩（1769 年）的結尾（參閱《席勒全集》〔八卷集〕，第 1 卷，1937 年俄文版，第 164 頁）。——第 551 頁。
- 352 參閱达尔文《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第 5 章。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一書中批判了这种把生物学概念搬用到社会科学領域的企图。——第 551 頁。
- 353 參閱《黑格尔全集》，1832 年柏林德文版，第 1 卷，第 105—106 頁。这些话是黑格尔从雅可俾那兒引来的，見《雅可俾全集》，德文版，第 3 卷，第 37—38 頁。——第 552 頁。
- 354 第十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阶级的历史，就可作为这方面的不断的証据”（第 380 頁）之后。——第 552 頁。
- 355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347 頁及以下各頁，第 437 頁及以下各頁。——第 553 頁。
- 356 第十一个注释是注在恩格斯的話：“但是，不消說，这里我們不能去詳細考察这点了”（第 394 頁）之后。——第 554 頁。
- 357 參閱摩尔根：《古代社会》或經過粗野到文明的从野蛮到人类进步的路綫之研究，譯自英文，姆·柯斯維主笔，并參閱恩格斯：《論史前家庭（巴苛芬、馬克林南、摩尔根）》一文，列宁格勒 1935 年版。——第 554 頁。
- 358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 2 卷，第 160—310 頁。——第 554 頁。
- 359 參閱亨·庫諾夫《Die soziale Verfassung des Inkareichs. Eine

- Untersuchung des altperuanischen Agrarkommunismus», Stuttgart, Dietz, 1896. (《印加帝国的社会制度。古代秘魯农业共产主义的研究》, 1896年斯图嘉特版) 以及他的論文《Les bases économiques du matriarcat》(《母权制的經濟基础》), 載于《社会的未来》杂志(《Le devenir Social》), 1898年第1, 2, 4期。——第554頁。
- 360 參閱卡尔·斯坦宁:《在原始民族布拉斯里族中》, “青年近卫軍”, 1935年俄文版。——第555頁。
- 361 參閱拉采尔:《人种学》, 第1卷, 圣彼得堡1900年版, 第25—26頁。——第555頁。
- 362 參閱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莫斯科1899年版; 毕歇尔:《工作和韵律》, 1899年。——第555頁。
- 363 參閱塞利格曼:《經濟史觀》, 斯米尔諾夫譯自英文, 圣彼得堡1905年版, 第81頁及以下各頁。——第556頁。
- 364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載《列宁全集》, 俄文第4版, 第14卷, 第219—226頁)一文中已批判了普列汉諾夫在“象形文字”这一問題上的錯誤。——第560頁。
- 365 雷諾尔曼:《波斯战争以前东方古代史指导》, 第1—2卷, 基也輔1876—1879年版。——第562頁。
- 366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 第1卷, 第208—302頁。——第562頁。
- 367 台龙:《家庭之起源》, 《論宗法时期以前之社会状况》, 圣彼得堡1876年版。——第562頁。
- 368 論文《往时的有产者》是普列汉諾夫在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节日为法国杂志《Le Socialiste》写的和发表在这一杂志的1893年4月23日, 标题为《Le bourgeois d'autrefois》。在俄文中它只是第一次在普列汉諾夫死后他的全集第24卷第335—337頁上发表。
- 在本版中刊印是根据全集的本子, 經過了和《Le Socialiste》杂志的文章核对的。——第564頁。

369 見克·阿·愛爾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蘇聯國家社會經濟書籍出版局 1938 年版，第 304—305 頁。——第 564 頁。

370 同上書，第 302 頁。——第 564 頁。

371 同上書，第 303 頁。——第 564 頁。

372 同上書，第 252—253 頁。——第 565 頁。

373 同上書，第 264 頁。——第 566 頁。

374 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書《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起初，書名為《我們的意見分歧。第二部》，以便秘密發表。但是由於公開出版這本書的機會已經出現，《我們的意見分歧》這個書名也就被抽換掉了，因為這個書名會立刻暴露出作者是誰（參閱本注釋 71）。《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這本書，用別爾托夫的筆名出版於 1895 年 1 月。根據保存於普列漢諾夫檔案中的原稿片斷，根據已經在國外收集到的被發現的校樣，以及根據其他一些至今尚少為人所知的資料，在不久以前，這本書的歷史開始搞清楚了（見《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第 4 集）。

指出下面這點情況，是不無益處的，即普列漢諾夫所寫的本書第一章，是他最後一次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適用性問題以及馬克思本人在其著名的致《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已經表述過的對這個問題的觀點。在整理普列漢諾夫檔案時，曾經發現這一章的兩份原稿，根據所有的材料判斷，這兩份原稿是寫於 1892 年年底，並且是為在合法刊物上登載準備的。普列漢諾夫想把它登載在《北方通報》上，但是他沒有做到。一份原稿上題名為《奇怪的誤會》，另一份原稿上題名為《不大的誤會》，這兩份原稿當時都未見知於世，而且只是在他死後，在 1937 年，才第一次刊印在《普列漢諾夫的文學遺產》第 4 集中。

本版《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這部著作是按照《普列漢諾夫全集》第 7 卷（1925 年）的原文刊印的，並根據 1895 年的第 1 版和 1905 年的第 2 版校正過。——第 567 頁。

375 1905 年革命的臨近，使本書第 2 版在俄國的出版成為可能。第 2 版沒有在國外出版過。當時（1904 年），普列漢諾夫首先對之展開論戰的主要論敵米海洛夫斯基已經去世了。和 1905 年的第 2 版一樣，1906 年的

- 第3版也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是对第1版做某种增补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了。1904年2月9日普列汉诺夫在写给伯尔尼支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的信中就会提到这一点（见《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第4集，1937年俄文版，第203页）。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有趣的文件——这种增补的简要草稿，其中包含着许多将在别尔托夫的书中加以发挥的暗示。这份文件用译写的方式发表在《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第4集第203—236页上。在下面的注释里面就引用了一些这种增补。——第567页。
- 376 参阅本注释507。——第568页。
- 377 指库德林的论文《站在客观真理的高处》。这篇文章是对别尔托夫的书的书评，刊载在1895年《俄国财富》杂志第5期第144—170页上。——第568页。
- 378 库德林指责别尔托夫（普列汉诺夫），说他“引用的不是普卢塔克的原文，而是在某个小册子中偶然碰到的恶劣的译文”。——第568页。
- 379 这里以及下面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刊载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上。它是在这个杂志上用《文学和生活》这个总标题连载的许多论文中的一篇，它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向马克思主义者发动攻击的最初一批文章中的一篇。——第569页。
- 380 伏·伏·（即沃龙佐夫）的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出版于1882年。文集《根据土地统计资料的俄国经济研究总结，第1卷，农民公社》出版于1892年。——第575页。
- 381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是指1814—1830年从路易十八即位时起至1830年七月革命时止的时期。——第580页。
- 382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曾谈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参阅《黑格尔全集》，第11卷，1935年俄文版，第381—399页）。——第581页。
- 383 英吉利教派是英国的国教派，是十六世纪时国王政权为控制教会和加强专制国家而实行改革之后产生的。

- 長老會派是英吉利和蘇格蘭的加爾文教信徒，站在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英吉利教派的立場上。他們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 584 頁。
- 384 輝格黨是英國的政黨，產生於 1679—1682 年，以金融界及資產階級化了的農業貴族和商業資本家為靠山；在 1688—1689 年的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到十九世紀中葉改組為自由黨。——第 584 頁。
- 385 米涅：《從 1789 年到 1814 年的法國革命史》，巴黎，1824 年版。有幾種俄文版本。——第 585 頁。
- 386 基佐：《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第 588 頁。
- 387 參閱梯葉里：《英國被諾曼人征服史》，1900 年俄文版，第 51 頁和第 55 頁。——第 589 頁。
- 388 參閱梯葉里：《第三等級產生和成功的歷史》（載《梯葉里選集》，1937 年俄文版，第 1—204 頁）。——第 589 頁。
- 389 孔多塞在自己所著《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t. 1—2, Paris 1794. 一書中發展了這些思想。普列漢諾夫在其他著作中也不止一次引用這本書（參閱孔多塞：《人類智慧進步史概論》，1936 年俄文版）。——第 591 頁。
- 390 僧正阿爾諾：《1771 年 5 月 13 日在參加法國科學院的儀式上的演說》，巴黎，1771 年版。——第 592 頁。
- 391 密勒注釋的著者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他花了很多篇幅去批判馬爾薩斯主義（參閱《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9 卷，1949 年俄文版，第 251—334 頁）。——第 596 頁。
- 392 “英雄與群氓”這個名詞是米海洛夫斯基在他寫於 1882 年的一篇同名的文章中最初使用的（參閱《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 2 卷，1907 年俄文版，第 95—190 頁）。——第 596 頁。
- 393 俄文為 Сикофанты，指古代雅典的職業化的刀筆和密告者。——第 605 頁。

- 394 指車尔尼雪夫斯基。——第 606 頁。
- 395 所謂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英国烏托邦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是指罗伯特·欧文及其学生威廉·湯普遜、托馬斯·高德斯金和約翰·葛萊等人。——第 607 頁。
- 396 按照米海洛夫斯基的說法，二元論就是肯定两个真理——“真实的真理”（现实的）和“正当的真理”（应有的）——的存在。——第 610 頁。
- 397 空論派是温和的资产階級自由主义者的团体，在复辟时代的法国政治生活中起过显著的作用。空論派是民主和共和制的凶惡的敌人。他們否定革命的原則本身以及革命的合規律性，但是却承認新的国内秩序、即新的资产階級經濟制度。——第 612 頁。
- 398 康斯坦如格罗是果戈里的小說《死魂灵》第二部中的人物。——第 612 頁。
- 399 參閱爱尔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1938 年俄文版，第 336 頁。——第 613 頁。
- 400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长詩《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第 2 部，第 4 章。——第 614 頁。
- 401 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曾經寄与希望的农民土地銀行，是 1882 年时沙皇政府在帮助农民購買土地的美名之下建立的。事实上，这个銀行迎合貴族意旨，抬高地主土地的价格，成为在农村中培植和加强富农分子的工具。——第 615 頁。
- 402 “兴高彩烈者”和“說空話的人”这两个名詞来自涅克拉索夫的詩《識时务的英雄》：
“讓我离开兴高彩烈者、說空話的人和双手沾滿鮮血的人，
进入那些为爱的崇高事业而牺牲的人的营垒！”——第 615 頁。
- 403 尼古拉一遜（即丹尼尔遜），是俄国民粹派分子。他第一个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譯成俄文，并因此获得了馬克思主义者的虛名。——第 617 頁。
- 404 «Le producteur»（《生产者》）是 1825—1826 年在巴黎出版的圣西門

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它是圣西門自己生前所創立，而由他的学生巴札尔、安凡丹、罗德利盖斯等編輯的。这个杂志的題詞是这样一句話：

“盲目的传统一直求之于过去的那个黄金时代就在我們眼前”。——第 618 頁。

405 «Globe» (《地球》)——自 1831 年起是圣西門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系皮尔·萊魯于 1824 年所創。——第 618 頁。

406 Albion (亚尔比昂)——不列顛群島的古称。——第 620 頁。

407 歌德曾在《詩歌和真理》中这样写道：“曾經引起許多爭吵并被宣判焚毀的禁書，对于我們並沒有任何影响。例如，我們由于好奇而讀过的‘自然体系’。我們不能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書会是危险的；它是那样的阴暗、悲惨、死气沉沉，以致很难弄清它的內容。我們面对着它，就象看見幽灵一样地发抖”(《歌德三十卷集》，第 10 卷，1937 年俄文版，第 48 頁)。——第 628 頁。

408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第 629 頁。

409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貸者色洛克貸款給年輕商人安东尼奥，条件是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时，可以从債務人身上，在尽量靠近心脏的部位割肉一磅。安东尼奥的情人假扮成律師，根据起訴的合法性支持了色洛克。但是她在向他建議执行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坚持要他严格遵守契約上的文字：“文書上沒有一个字提到血……而且要整整一磅，不多不少”(參閱《莎士比亚著作选》，1950 年俄文版，第 196—197 頁)。——第 630 頁。

410 參閱拉薩尔：《既得权利的体系》，載《拉薩尔全集》，俄文版，第 3 卷，第 231 頁。——第 635 頁。

411 雅典人与波斯人之間的馬拉松之戰(公元前 490 年)以雅典人的胜利告終。这次战役預決了第二次希波戰爭对希腊人有利的結局，并且促进了雅典民主的繁荣。——第 638 頁。

412 參閱《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 3 卷，1947 年俄文版，第 208 頁。——第 638 頁。

- 413 参阅卑尔尼雪夫斯基：《对反对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哲学成见的批判》，载《全集》，第5卷，1950年俄文版，第208页。——第640页。
- 41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129页。——第641页。
- 415 1841年3月1日，别林斯基在写给鲍特金的信中曾这样提到黑格尔的哲学：“伊果尔·费多洛维奇，我要向您的哲学白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但是我也有幸以对您的哲学庸俗作风所应当表示的尊敬向您申明，如果我能够爬上发展的梯级的最高层，那末我就要在那里请求您给我说明生活和历史的条件的一切牺牲物，以及偶然性、迷信、宗教裁判、菲利普二世等等的一切牺牲物：否则，我就要从最高层头朝下跳下来”（见《别林斯基书信选集》，第2卷，1955年俄文版，第141页）。——第643页。
- 416 此处和下面所引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论辩证的发展和进化的三段式》，载《全集》，第7卷，1909年俄文版，第758—780页。——第645页。
- 417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140页。——第645页。
- 418 阿芬巴赫的小歌剧《美丽的叶连娜》中的一节（歌词作者为梅利雅克和哈列维）。——第646页。
- 419 参阅《黑格尔全集》，第1卷，1930年俄文版，第334—335页。——第647页。
- 420 指《反杜林论》第8章中恩格斯关于卢梭所说的话（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144页）。——第648页。
- 421 参阅卢梭：《论人类不平等之起源》，1907年俄文版，第104页。——第649页。
- 422 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载于1877年第10期《祖国纪事》上（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1909年俄文版，第165—206页）。——第652页。
- 423 恩格斯：《反杜林论》，参阅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6—147页。——第652页。

- 424 參閱同上書，第 18 頁。——第 653 頁。
- 425 《反杜林論》的第一个俄文全譯本出版于 1904 年。——第 653 頁。
- 426 黑格尔在《法律哲学》序言中写道：“当哲学开始在灰色的素地上描繪灰色的图样时，这就証明某一生活形式已經衰老了，而哲学在灰色的素地上描繪灰色的图样并不能使这个生活形式年輕，而只是为了了解它；猫头鷹只是在黄昏到来时才开始飞翔”（見《黑格尔全集》，第 7 卷，1934 年俄文版，第 17—18 頁）。
- 普列汉諾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曾談到黑格尔的这个論点（參閱本卷第 470—501 頁）。——第 655 頁。
- 427 萊布尼茨：《神正論》，載《萊布尼茨哲学著作集》，第 6 卷，柏林，1885 年版，第 130 頁。——第 656 頁。
- 428 參閱斯宾諾莎：《1674 年 10 月給舒勒尔的信》，載《斯宾諾莎書信集》，1932 年俄文版，第 188—191 頁。——第 657 頁。
- 429 參閱謝林：《先驗唯心主义的体系》，1936 年俄文版，第 355 頁。——第 660 頁。
- 430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書中發揮了这些思想。——第 662 頁。
- 431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馬克思。下面的引文引自《神圣的家族》（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71—72 頁）。——第 663 頁。
- 432 參閱謝林：《来自自然哲学領域的理念》，1803 年兰德斯胡特版，第 223 頁。——第 665 頁。
- 433 參閱黑格尔：《历史哲学》，載《黑格尔全集》，第 8 卷，1935 年俄文版，第 246 頁。——第 665 頁。
- 434 《历史書翰》的作者是拉甫罗夫。《历史書翰》以米尔托夫的笔名于 1870 年出版于彼得堡。——第 672 頁。
- 435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8—109

- 頁。——第 674 頁。
- 436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3 頁。——第 674 頁。
- 437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批判一書序言》（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340 頁）。——第 676 頁。
- 438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67 頁。——第 678 頁。
- 439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馬尔茨烏斯的《Von dem Rechtszustande unter den Ureinwohnern Brasiliens》，München 1832。（《巴西原始居民的法律状况》，1832 年慕尼黑版）。——第 680 頁。
- 440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31 頁。——第 681 頁。
- 441 普列汉诺夫在第 2 版沒有收进去的增补里面，更充分地發揮了这些思想（參閱《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遺產》第 4 集，1937 年俄文版，第 209 頁）。——第 685 頁。
- 442 參閱摩尔根：《古代社会》，譯自英文，科斯文編輯。附恩格斯的文 章《論史前家庭（巴奇芬、馬克林南、摩尔根）》，列宁格勒 1935 年版。——第 686 頁。
- 443 普列汉诺夫死后发表的反对馬克思的早期“批評者”之一魏正格倫的文章，參閱《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遺產》，第 5 集，第 10—17 頁。——第 686 頁。
- 444 法學历史派是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前半期德国法學界中的一个反动派別。它維護农奴制和封建君主制而反对法国革命的国家思想和法权思想。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是胡果、薩文尼和普赫泰。——第 691 頁。
- 445 柯瓦列夫斯基在普列汉诺夫所提到的那本書里，引用了法国著名法学家列尔明涅的理論（參閱所引的柯瓦列夫斯基的書，第 54 頁）。——

第 697 頁。

- 446 是指 H. Rink, 《Tales and traditions of the eskimo with a sketch of their habits, religion, language and other peculiariti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75. (林克:《爱斯基摩人的神話和傳說以及他們的风习、宗教、語言和其他特征的概述》, 爱丁堡和倫敦, 1875 年)。——第 700 頁。
- 447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第 1 卷, 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 第 340—341 頁。——第 704 頁。
- 448 參閱馬克思:《資本論》, 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 192 頁。——第 706 頁。
- 449 參閱乔治·毕希納:《給未婚妻的信(1834 年春)》, 載《全集》, Academia 版, 1935 年, 第 295 頁。——第 707 頁。
- 450 普列汉諾夫說的是梅契尼柯夫的著作《La civilisation et Les grands fleuves historiques》. Aves une préface de M. Elisée Reclus, Paris 1889. (《文明和伟大的历史河流》, 附爱丽查·莱克留的序, 巴黎, 1889 年)。載于苏联版《劳动之声》, 1924 年。——第 710 頁。
- 451 普列汉諾夫这里指的是保尔·巴尔特在以下書中所做的反駁:《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 Leipzig 1890, S. 49—50 (《黑格尔及馬克思和哈特曼以前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 萊比錫, 1890 年, 第 49—50 頁)。——第 711 頁。
- 452 “言談和公事”是十八世紀时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治偵探的一个暗語。“說話和办公事”就指的是对叛国罪的告密行为。——第 714 頁。
- 453 引自卡列也夫的文章《历史中的經濟唯物主义》, 載《歐洲通报》, 1894 年 7 月, 第 7 頁。——第 717 頁。
- 454 引自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第 1 卷, 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 第 249 頁、第 251—

- 252 頁)。——第 724 頁。
- 455 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64 頁。——第 725 頁。
- 456 指苏馬罗科夫、科尼亚日宁、赫拉斯科夫以及十八世紀的其他戏剧作家所写的悲劇。——第 730 頁。
- 457 “光荣的革命”指英国在 1688—1689 年間所发生的政变；“伟大的暴动”是指十八世紀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 730 頁。
- 458 过去的各种版本都誤印成“拟古典主义的英国文学”。——第 731 頁。
- 459 《新基督教》的作者是圣西門。——第 735 頁。
- 460 引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64 頁。——第 738 頁。
- 461 引自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論文《艺术和現实在美学上的关系》（載《全集》，第 2 卷，1949 年俄文版，第 10—11 頁）。——第 741 頁。
- 462 引自馬克思的《費尔巴哈論綱》（參閱《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 2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401 頁）。——第 747 頁。
- 463 普列汉諾夫會准备在新版中把为逃避書报检查而故意弄得模糊不清的这个地点加以說明。在保存在档案中的他的未被利用的增补中，关于这个地点有如下一个注解：“斯卡罗茶勃就是書报检查。用同一个別尔托夫以及《选集》、《新語》和《創始》的历史来加以說明”。

这个清单包括了曾經受到書报检查迫害的各种出版物：普列汉諾夫（別尔托夫）的著作《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出版就迅速銷光，圖書館又沒有收藏，可是在十年中間，直到 1905 年，一直沒有能再版；馬克思主义著作选集《說明我国經濟发展的材料》刊印于 1895 年，在書报检查机关积压了一年半，后来除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几本以外全部被焚；杂志《新語》早在 1897 年 12 月就被查封；杂志《創始》繼《新語》之后創刊于 1897 年，出版了五期就被查封。可見，馬克思主义者几乎完全被剝夺了合法的講坛，而民粹派分子却能够完全自由地享有合法的講坛。——第 748 頁。

464 在未发表的增补中，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个地点曾經这样写道：“人們不懂得，承認馬克思的經濟观点而否認他的历史观点是不行的，因为《資本論》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著作。但是甚而許多‘馬克思主义者’都沒有很好地理解《資本論》。第3卷的命运，以及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杜岡—巴拉諾夫斯基都歪曲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見《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遺產》，第4集，第223頁）。——第750頁。

465 指馬克思于1877年末因《祖國紀事》杂志編輯之一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卡尔·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載1877年第10期《祖國紀事》）而写給該杂志編輯部的著名信件。这封信沒有发出去，是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他的文件中发现的。它曾发表在1886年第5期《民意通报》和1888年第10期合法的《法学通报》上。通常都把这封信錯誤地說成写給米海洛夫斯基的，虽然馬克思在信里提到米海洛夫斯基的时候用的是第三人称（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220—223頁）。

馬克思在信里駁斥了对他的观点的歪曲，反对把他的“……关于資本主义在西欧的产生的历史論述，变成关于一切民族都必须走上的普遍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論，而不管这些民族处于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民粹派分子抓住了信里面的这个地点，認為这是肯定了他們所指望的俄国发展的特殊道路（參閱《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1909年俄文版，第327頁；參閱本注釋483）。——第750頁。

466 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的《絕對批判的第三次征討》一章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一节中（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8—170頁），以及在《德意志思想体系》（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55年俄文版，第409—412頁）中，均曾說到十八世紀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第751頁。

467 1892年，米海洛夫斯基在《俄罗斯思想》第6期第90頁上写道：馬克思的哲学理論“在《資本論》第6章的一个朴素的标题《所謂原始积累》下面有所闡述”（參閱《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1909年俄文版，第321頁）。——第752頁。

- 468 普列汉诺夫想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增补：“关于‘没有功夫’。用阶级斗争来说明”（参阅《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第4集，第223页）。——第754页。
- 469 指布洛斯的《1848年德国革命史》一书。1922年版题为：《德国革命。1848—1849年德国运动史》。——第758页。
- 470 在乌斯宾斯基的短篇《波德卡》中有一个靠供应小型流浪乐团弦线为生的老人。他曾骄傲地说，他的弦线是珍贵的，“不是那种烂货”，因为他只能这样：“只要我是靠弦线度命的，那末我就必须使弦线发出宏亮的声音来”。——第760页。
- 471 1888年4月初，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里提到巴尔扎克的作品时写道：“甚至在经济的细节上，……我所学到的东西也比当时所有专门历史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全部著作合拢起来所学到的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05—406页）
- 普列汉诺夫对这个地点有如下一个备注：“乌斯宾斯基在这一点上可以大胆地与巴尔扎克并列。他的《大地的统治》，参看我的《社会民主党人》论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乌斯宾斯基》”（见《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第4集，第224页）。关于乌斯宾斯基的文章载《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0卷。——第760页。
- 472 摩尔根的书出版于1877年。——第762页。
- 473 恩格斯是于1888年2月21日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中说这个话的（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356页）。——第762页。
- 474 克伐齐姆多是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第764页。
- 475 引自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第8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403页）。——第769页。
- 476 朱可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及其论资本一书》一文中评论了《资本论》（载《欧洲通报》，1877年，第9卷）。——第771页。

- 477 恩格斯曾經这样描述过卡尔·海村：“海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的小官吏，早在 1844 年就會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幻想过一部聊胜于无的德意志宪法”（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98 頁）。——第 779 頁。
- 478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刊載在 1847 年的《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报上的反对海村的几篇文章。恩格斯的兩篇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村》，馬克思的一篇是《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97—315 頁、第 322—356 頁）。——第 779 頁。
- 479 恩格斯的這句話的原文是：“海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繼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調整。海村先生（本世紀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該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必然結果”（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03 頁）。——第 779 頁。
- 480 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責难馬克思主义者，說他們喜欢农村的資本主义化，欢迎那伴随着苦难的农民失地現象，并且勾結农村的富农、吸血鬼、“原始积累”的英雄們，如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在他的諷刺作品《蒙列波避難所》中所描繪的科罗派也夫和拉楚伐也夫之流，千方百計地想促进这个过程。——第 780 頁。
- 481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伏·伏·（即沃龙佐夫）給他 1882 年出版的論文集《俄国資本主义的命运》写的序。沃龙佐夫在这篇序里說明再版自己的旧論文的原因时說，他希望“喚起我国的学者以及資本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公認的政論家去研究俄国的經济发展規律——其余一切国家生活現象的基础。不懂得这个規律就不可能有系統地順利进行社会活动”（第 1 頁）。——第 784 頁。
- 492 引自克里文科的文章《論文明的单千戶》，參閱《俄国財富》，1893 年，12 月号，第 2 部，第 189 頁。——第 784 頁。
- 483 1884 年，恩格斯把馬克思的未发出的信的抄本寄給查苏利奇。他在署明 3 月 6 日的信里写道：“隨信寄去馬克思的手稿（抄本），或許对你們有

用。我不知道他是在《新語》还是在《祖国紀事》上发现了那篇《卡尔·马克思在朱可夫斯基先生的审判之前》的文章。他写这个答复，显然是为了在俄国发表，但是他因为害怕他的名字会使那个刊登他的答复的杂志受到生存的威胁，所以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見《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306頁）。——第784頁。

484 这段引文，也和后面的几处引文一样，是摘自馬克思給《祖国紀事》編輯部的信（參閱本注釋465）。——第787頁。

485 按問題的实質來說，馬克思的思想可以归結为这样，就是村社“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如果“俄国革命成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的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第一版序言中就曾这样提出过。更早以前，恩格斯在1875年发表于《人民国家报》上的《論俄国的社会关系》这篇答复特卡乔夫的《公开信》的文章中，也曾表述过这个思想（參閱恩格斯：《論俄国的社会关系》，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56—58頁）。

但是在九十年代时，恩格斯已經知道，俄国的村社正在日益发展的資本主义的壓力下迅速解体。他在这一时期的許多著作中，都會提到这一点，如：《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93年）、《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欧洲能够裁减軍备嗎？》（1893年）等等。最后，在1892年，他在《答特卡乔夫》一文的《結語》里写道：“这种村社是不是还能保存到那种程度，以致在必要的时候，正如馬克思和我在1882年时所期望的，将能配合着西欧的变革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呢？关于这一点我不去下判断。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要想从这种村社保存下一点什么东西，首先必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須要有俄国的革命”（見《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297頁）。——第787頁。

486 參閱馬克思：《哲学的貧困》，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198頁。——第787頁。

487 車尔尼雪夫斯基对于真理的具体性問題的观点在他的《果戈里时代俄国文学概述》中有所發揮（《車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1947年俄文

版)。——第 788 頁。

- 488 馬克思是在給《祖国紀事》編輯部的信中說这段話的(參閱《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 1951 年俄文版, 第 221 頁)。——第 788 頁。
- 489 对这个地方, 普列汉諾夫曾打算做如下的增补: “在这里, 我指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在消灭腐朽的生产方式, 例如家庭工业的同时, 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社会民主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可以用貝貝尔在布莱斯拉夫里党代表大会上所說的如下的話来简单地加以說明: ‘我随时自問, 这种办法会不会損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会, 我就反对它……’”(《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遗产》, 第 4 集, 第 229 頁)。——第 795 頁。
- 490 “苏兹达尔人”是个比喻的詞, 用来象征粗糙、拙笨。这个詞导源于苏兹达尔地方手工圣象画家的一种古老的手工艺。这种画家中有許多人画法拙劣, 但他們所做的圣象价錢便宜, 因此有很大銷路。——第 795 頁。
- 491 在《生动的数字》从書本烏斯宾斯基的短篇《整数的零》中, “白白”付了款的, 也就是沒有种地就付了款的农民們坚信, “白白”付款远比种份地划算。——第 795 頁。
- 492 柴亚达也夫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学書信》中說过这个話(參閱柴亚达也夫:《哲学書簡集》, 1906 年俄文版, 第 11 頁)。——第 796 頁。
- 493 引自涅克拉索夫的詩《門庭旁的遐想》。——第 796 頁。
- 494 載小說《战争与和平》。——第 796 頁。
- 495 普列汉諾夫曾想在这里加以說明: “也就是我想說: 社会主义者的流派”(《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遗产》, 第 4 集, 第 230 頁)。——第 797 頁。
- 496 德国經濟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资本主义在德国尚未充分发展时期的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曾把个别国民經济的生产力发展提到首要的地位。他認為国家的协助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例如, 对工业品的保护关税制)。——第 797 頁。

- 497 引自1845—1846年在爱里别尔菲尔德出版的《Der Gesellschaftsspiegel》（《社会之镜》）杂志。这个杂志曾经刊载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它的纲领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29年俄文版，第595—598页。——第798页。
- 498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于1845年出版于莱比锡（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587页）。——第799页。
- 499 对这个地点，普列汉诺夫曾写过如下的备注：“关于尼·一逊。他的基本错误是什么。没有弄懂‘价值规律’。不是用动态的眼光，而是用静态的眼光去看它……恩格斯关于司徒卢威和尼·一逊的错误的可能性说了些什么……”（《普列汉诺夫的文学遗产》，第4集，第230—231页）。
- 恩格斯在1895年2月26日，给普列汉诺夫的信里写道：“至于说到丹尼尔逊[尼·一逊]，恐怕对他是没有办法的……他所属的那伙俄国人仍然相信俄罗斯、真正神圣的罗斯有着与其他不信教的民族不同的自发共产主义的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1951年俄文版，第341页）。——第803页。
- 500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克里文科的《论民族工业的需要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曾刊载在1894年第10期《俄国财富》上。——第808页。
- 501 这一附录（《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在《论一元主义历史观之发展》的第一版中已刊载过。——第810页。
- 502 在《文学与生活》评论（论彼·司徒卢威先生和他的《关于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登在《俄国财富》，1894年第10期（《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7卷，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885—924页）。——第810页。
- 503 格·伊·乌斯宾斯基的短篇《不可医治的人》登载在《新的时候，新的关心》的连载中。——第812页。
- 504 引自别林斯基的1841年3月1日给波特金的信，见本注释415。——第814页。

505 別林斯基在1848年2月15(27)日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当我,在与你关于资产阶级的爭論中称您为保守分子时,我是一个双料的混蛋,而您是聪明人。……而現在可以看得清楚的是,俄国的国内发展的內在过程是从俄国的贵族变成资产阶级的那一分鐘开始,而不是在“它以前”(《別林斯基書信选集》,第2卷,苏联国家文学書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389頁)。——第818頁。

506 克里文科評論过1894年出版的彼·司徒卢威的書《俄国經濟发展問題評述》,見他的論文《論俄国工业的需要問題》的后序(《俄国财富》,1894年第10期,第126—130頁)。——第818頁。

507 这篇附录是对于刊載在1895年10月1日的《俄国财富》第1期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論文《文学与生活(Н. 別尔托夫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的回答(見《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8卷,圣彼得堡1914年版,第17—36頁)。

論文《对我們的反对者講几句话》是第一次以烏奇斯的笔名于1895年在被检查員焚毀的馬克思主义的論文集《說明我們經濟发展的材料》(第225—259頁)中刊登的。留存下来的一百册論文集成了絕版書,因此只在十年以后,当《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第2版发行时該論文作为附录发表在里面的时候,它才能为广大的公众看到。

在本版,論文是依据《普列汉諾夫全集》的第7卷刊印的。文字經過了和保藏在普列汉諾夫的手札集的核對,而且也 and 論文集中《說明我們經濟发展的材料》的第一版核對,論文是作为附录二而登在那里的。——第819頁。

508 引自阿·康·托尔斯泰的叙事詩《波多克一勇士》(見《詩全集》,“苏維埃作家”出版,1937年,第288頁)。——第821頁。

509 引自普希金的《被杂志残酷欺負的人》題墓詩(見《普希金全集》〔十卷集〕,第3卷,“苏联科学院”出版,1949年,第108頁)。——第823頁。

510 《俄国思想》的書評家是自由主义分子B. 戈里澤夫。他的一篇为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引証的短的書評是登在1895年《俄国思想》的第1期中,第8—9頁。——第824頁。

- 511 見《黑格尔全集》，第1卷，苏联国家社会經濟書籍出版局1930年版，第186頁。——第827頁。
- 512 引自米海洛夫斯基的《文学与生活》同一篇論文（見本注释507）。——第828頁。
- 513 这里所說的是《同时代人》杂志的諷刺栏——《口哨》（1859—1863年）。《口哨》的主要撰稿人和作者之一是杜勃罗留波夫，他用康拉特·里里恩斯瓦格爾的笔名在那里写稿。——第829頁。
- 514 尼·齐別爾的論文《辯証法在科学中的应用》是在1879年的《話語》第11期第117—169頁中用H. 3.的笔名发表的。——第830頁。
- 515 《Histoire de dix ans》（《十年史》）——是一部五卷本的著作，为路易·布朗在1841—1844年中写成。作者在書里面对法国奥尔良政府的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評，描述了这十年（1830—1840年）的經濟和社会的关系。恩格斯很賞識這本書。——第837頁。
- 516 打算作为第2版的补充是稍为不同的一种表述：“說路易·布朗是呼吁了階級調和。在这方面，人們不能拿他和基佐相比：后者是不可調和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只讀过《Histoire de dix ans》”（《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第4集，第233頁）。——第838頁。
- 517 見《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69頁。
在本論文以后还有一些补充，不过没有发表，里面有这样的几行：“在22頁的背面，附录I.还要从黑格尔的百科全書的第一部作更精确的引証。比較更可靠的是把这些話放在这一位置。从黑格尔的‘比較精确的引征’，这是，大概，第80节和特別是对它的附注，在那里对于辯証的和形而上学的思維方法都作了說明”（見《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第4集，第131—132頁）。——第840頁。
- 518 这一在1841年匿名出版的書的作者是布魯諾·鮑威爾。——第842頁。
- 519 見《黑格尔全集》，第1卷，第64頁。——第842頁。
- 520 見同上書，第91頁。——第845頁。

- 521 对于这一地方有如下的补充：“指出我們的秘密書籍，这是尼·一遜先生不能不知道的。如果装作不知道有这类書籍的样子，知道引証秘密的書籍是检查官不許可的，这便是不誠实”（《普列汉諾夫的文学遺產》，第4集，第234頁）。——第855頁。
- 522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指的是俄国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們的著作：雪·哈里佐門諾夫的《波克罗夫斯基县和亚列山大洛夫斯基县》（在《弗拉吉米尔省的手工业》一書的第3分册中，莫斯科，1882年），弗·叶·波斯特尼科夫的《南俄农民經濟》（莫斯科，1891年）和尼·安·鮑罗金的《烏拉尔的哥薩克軍隊。两卷集的統計叙述》（“烏拉尔斯克”，1891年）。——第856頁。
- 523 一切为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引用的引証，是从尼·一遜的刊印在1895年《俄国財富》的第3期的札記《什么是經濟的必需》中摘出来的。——第857頁。
- 524 尼古拉一遜的論文《对于貨幣的权力作为时代的特征的强辯》是刊载在1895年《俄国財富》的第1期和第2期中。——第862頁。

人名索引

三 画

大卫 (Давид, 公元前 11—10 世纪) ——半神话式的犹太国王。——552.

四 画

王一迪盖, 菲利普—埃杜阿尔特—列昂 (Ван-Тигем, Филипп-Эдуард-Леон, 1839—1914 年) ——法国自然科学家和植物学家。——647.

王德尔毕尔 (Вандербилт) ——美国亿万富翁的家庭成员的姓。——630.

尤沙柯夫, 塞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Южак-ков,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9—1910 年) ——俄国政论家, 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796.

文德尔班, 威廉 (Виндельбанд, Вильгельм, 1848—1915 年)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539.

牛顿, 伊萨克 (Ньютон, Исаак, 1642—1727 年) ——209, 642.

孔德, 奥古斯特 (Конт, Огюст, 1798—1857 年) ——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主义的创始者。——598, 621—622.

孔多塞, 让·安都阿纳 (Кондорсе, Жан Антуан, 1743—1794 年) ——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启蒙运动者, 在革命的时候是吉伦特派。——591—592, 595.

日罗—台龙, 阿列克西斯 (Жиро-Талон, Алексис, 生于 1839 年) ——原始社会的历史学家, 日内瓦教授。——562, 689—690, 757.

巴尔扎克, 翁诺尔·德 (Бальзак, Оноро де, 1799—1850 年) ——760.

巴扎尔, 圣阿曼 (Базар, Сент-Аман, 1791—1832 年)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圣西门的学生。——585—586, 590.

巴布斯特, 伊万·康德拉奇也维奇 (Бабст, Иван Кондратьевич, 1824—1881 年) ——俄国经济学家, 有关俄国经济的一些著作的作者。——239.

巴斯夏, 弗烈德里克 (Бастия, Фредерик, 1801—1850 年) ——法国庸俗经济学家。——91, 370, 721.

巴尔特, 保尔 (Барт, Пауль, 1858—1922 年) ——德国资产阶级积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政论家。——563, 711, 713, 716.

巴枯宁,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 年) ——俄国社会活动家, 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为第一国际所开除。——60—61, 87, 165—168, 170—176, 181—185, 190, 193, 196, 216, 219, 325, 349—350, 368—370, 378, 382, 407—408.

五 画

卡贝, 埃蒂耶纳 (Кабэ, Этьенн, 1788—

- 1856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594。
- 卡維林,康士坦丁·德米特里也維奇(Кавел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8—1885年)——俄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自由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反对者。——848。
- 卡尔(Кар)——見卢克莱茨条。
- 卡列也夫,尼古拉·伊万諾維奇(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年—1931年)——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政論家,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275, 286, 508, 610, 685—686, 688, 691—692, 649, 702, 705, 709—711, 713—718, 746, 754, 758, 796, 812, 825。
- 卡尔十世(Карл X)——法国国王(1824—1830年),王位为1830年的七月革命所推翻。——155—156。
- 卡罗宁,斯·(Каронин, С., 1853年—1892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尼古拉·耶尔庇底多維奇(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Елпидифорович)的笔名,俄国民粹主义作家。——634。
- 卡西夷,龙金·盖伊(Кассий, Лонгин Гай, 公元前一世紀)——罗马政治活动家,护民官,反对凱撒阴谋的主謀人之一。——506。
- 卡特柯夫,米哈依尔·尼基伏罗維奇(Катков, Михай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年)——俄国政論家,由自由主义轉变到了反动的帝制陣营。——169, 423, 442。
- 卢梭,讓·雅克(Руссо, Жан Жак, 1712—1778年)——577, 648—651, 653, 713。
- 卢格,阿尔諾德(Руге, Арнольд, 1802—1880年)——德国激进派政論家,左派黑格尔分子,同馬克思一起出版了《德法年鉴》杂志。六十年代傾向于俾斯麦。——510。
- 卢克莱茨,基特·卡尔(Лукреций, Тит Кар, 公元前99—55年)——卓越的羅馬詩人,唯物主义哲学家,《物性論》的作者。——660。
- 卢克莱茨亚(Лукреция, 公元前第六世紀)——据传说,著名的羅馬妇女,因被太子所污而自杀。——210。
- 卢契茨基,伊万·瓦西里也維奇(Лучицкий,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45年—1918年)——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立宪民主党員,法国史的一些著作的作者。——329。
- 尼古拉一逊(丹尼尔逊的笔名),尼古拉·弗兰澤維奇(Николай-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1918年)——俄国文学家,八十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論家之一,曾与洛巴泰一起翻譯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271, 275—276, 285, 308, 617—618, 803—808, 852—853, 855—862。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俄国的沙皇(1825—1855年)。——161, 356, 440—443, 448, 450。
-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II)——最后的一个俄国沙皇(1894—1917年)。——440。
- 兰波,阿尔弗列德·尼古拉(Рамбо, Альфред Никола, 1842—1905年)——法国自由主义傾向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456, 459。
- 叶卡特林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俄国女皇(1762—1796年)。——277, 440—441, 446, 450。
- 叶里札維特·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 1741—1761年)——俄国女皇。——448—450。
- 皮茲列夫,德米特利·伊万諾維奇(Писа-

- ров,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0年—1868年)——442.
- 皮德, 威廉(年长的)(查坦姆)(Питт, Уильям (Старший) (Чатам), 1708—1778年)——英国国事活动家, 民权党领袖。——231.
- 弗林特, 罗伯特(Флинт, Роберт, 1838—1910年)——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598.
- 弗雷泽尔, 亚历山大·肯普贝尔(Фразер, Александр Кэмпбелл, 1819—1914年)——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家。——666—667.
-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Фрейлиграт, Фердинанд, 1801—1875年)——德国的革命诗人。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新闻》的编辑之一。——512.
- 弗里德里希二世(Фридрих II)——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448.
- 司徒卢威, 彼得·伯恩哈尔多维奇(Струве 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政论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九十年代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白俄流亡分子。——527, 784, 816—818, 824—825, 852, 856—857, 862.
- 圣茹斯特, 路易·安图安(Сен-Жюст, Луи Антуан, 1767—1794年)——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导人之一, 公安委员会的委员, 在热月九日政变后被处死。——446.
- 圣西门, 昂利·克劳德(Сен-Симон, Анри Клод, 1760—1825年)——558, 590, 596—600, 615—618, 621, 734, 787, 849, 859.
- *圣* 路易九世(Людовик IX “Святой”)——法国国王(1226—1270年)。——585.
- 汉兹曼, 大卫(Ганцман, давид, 1790—1864年)——莱茵区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年任普鲁士部长。——511.
- 幼里披底(Эврипид, 约公元前480—406年)——古希腊的诗人 and 戏剧作家。——725.
- 布朗, 路易(Блан, Луи, 1811—1882年)——法国改良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年革命的活动家。——837—839.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Бланки, Луи Огюст, 1805—1881年)——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以一小撮阴谋者的力量完成革命的主张者。——189, 324, 384.
- 布洛斯, 威廉(Блос, Вильгельм, 1849—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机会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758.
- 布鲁契里, 约翰·卡斯巴尔(Блюччи, Иоганн Каспар, 1808—1881年)——瑞士法学家, 反动的有机法学派的代表。——849.
- 布里, 路德维希(Буйль, Людвиг, 1814年至八十年代初)——德国急进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800—805, 808.
- 布申, 阿图尔·波格丹诺维奇(Бушон, Артур Богданович, 1831年—1876年)——俄国统计学家。——251.
- 布兰德斯, 乔治(Брандес, Георг, 1842—1927年)——丹麦文学批评家, 实证主义美学的代表。——738.
- 布伦坦诺, 路易奥(Брентано, Луио, 1844年—1931年)——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资产阶级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代表。——80.
- 布鲁特, 马尔克·尤尼(Брут, Марк Юний, 公元前85—42年)——罗马共和主义

- 者,反对凯撒的阴谋的首脑。——506。
 布伦涅齐叶尔,斐迪南(Брюнетьер, Фердинанд, 1849—1906年)——法国批评家和文学研究家;曾试图以自然科学中的方法应用于文学史。——727, 733, 734, 738。
 布尔加林,法捷依·文涅吉克托维奇(Булгарин, Фаддей, Венедиктович, 1789—1859年)——俄国反动作家和新闻记者,警察特务和告密人。——825。

六画

- 达兰贝尔,让·勒朗(Д'Аламбер, Жан Лерон, 1717—1783年)——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唯物主义者。——805。
 达里曼,弗里德里希·赫里斯托夫(Дальман, Фридрих Христоф, 1785—1860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活动家。——744。
 达美特,克劳德—马丽—昂利(Дамет, Клод-Мари-Анри)——见高尔塞,昂利条。
 但尼也尔逊,尼古拉·弗兰泽维奇(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见尼古拉—逊条。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Дарвин, Чарлз Роберт, 1809—1882年)——69, 209, 551, 641, 675, 679, 686, 705, 724, 749, 751—755, 763—764, 767, 850—851。
 乔治·桑(Жорж Санд),阿芙罗里·杜德万(Авроры Дюеван)的笔名(1804—1876年)——著名的法国女作家。——444。
 齐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年)——俄国经济学家,马克思学说的最初通俗宣传者之一。——605, 634, 797, 771—772, 829—833, 835。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801—1825年)——俄国皇帝。——441, 450。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55—1881年)——俄国皇帝。——134, 161, 173, 239, 242, 397, 440, 446—447, 456—457。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81—1894年)——俄国皇帝。——102, 440, 452。
 亚里士多德(Аристотель, 公元前384—322年)。——57, 389, 636, 720, 763。
 宇伯威希,弗里德里希(Ибервег, Фридрих, 1826—1871年)——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家。——241, 502, 523, 559, 561, 827。
 安凡丹,巴特米·普罗斯比尔(Анфантон, Бартолеми Проспер, 1796—1864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信徒。——600, 603—605, 843。
 托尔斯泰,阿列克塞·康斯坦丁诺维奇(Толстой, Алекс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17—1875年)——俄国诗人。——449, 822。
 托尔斯泰,德米特里·安得烈也维奇(Толстой, Дмит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23—1889年)——人民教育部部长(1866—1880年)。从1882年起为内务部部长和宪兵的首长。——443。
 托尔斯泰,列夫·尼古拉也维奇(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年)。——796。
 伊沙也夫,安得烈·阿列克塞也维奇(Исаев,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51—1924年)——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263, 268。
 伊万四世,瓦西列维奇(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俄国大公(1533年—1547年),“全俄沙皇和大公”(1547年—1584

- 年)。——277, 455.
- 伊万诺夫, 格·(Иванов, Г.)——烏斯宾斯基的笔名。
- 伊万纽可夫, 伊万·伊万诺维奇(Иванюк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44—1912年)——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教授, 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74—75, 192.
- 伊兹雅斯拉夫, 姆斯基斯拉维奇(Изяслав Мстиславич)——基辅大公(1146年—1154年)。——610.
- 伏斯切尔·德·库兰斯, 紐馬·德尼(Фюстоль де Куланж, Ньюма Дени, 1830—1889年)——法国历史学家, 历史科学中退化倾向的代表。——562, 757—758.
- 伏·伏·(В. В.)——見沃龙佐夫, 瓦西里·巴夫洛维奇。
- 伏尔塔, 亚历山得罗(Вольта, Александро 1745—182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最初发现和研究电流的学者之一。——667.
- 伏尔泰, 弗朗斯瓦·馬丽·阿魯埃(Вольтер, Франсуа Мари Аруэ, 1694年—1778年)——443, 575, 581, 649, 733, 739, 766.
- 伏尔夫, 威廉(Вольф, Вильгельм, 1809—1864年)——德国政論家,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512.
- 休謨, 大卫(Юм, Давид, 1711年—1776年)。——530, 542—544, 731—732, 734, 735—744, 748.
- 仲馬, 亚历山大(Дюма, Александр, 1803年—1870年)(父)——法国作家, 許多历史小說的作者。——733.
- 列宁(烏里揚諾夫),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Ленин (Ульян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年)。——529.
- 列諾尔曼, 弗朗斯瓦(Ленорман, Франсуа, 1837—1883年)——法国考古学者, 历史学家和旅行家。——562, 710.
- 列尔明涅, 讓·路易·爱任(Лерминьо, Жан Луи Эжен, 1803—1857年)——法国法学家, 自由主义政論家, 自三十年代末起为保守主义者。——697.
- 列瓦歇尔, 爱米尔(Левассер, Эмиль, 1828年—1911年)——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228.
- 西門, 茹里·弗朗斯瓦·苏伊斯(Симон, Жюль Франсуа Сюисс, 1814—1896年)——法国政治活动家, 政論家和哲学家。——220.
- 西斯蒙第, 讓(Сисмонди, Жан, 1773年—1842年)——瑞士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評者。——91, 580—582.
- 朱可夫斯基, 尤利·哈拉克基昂諾維奇(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論家, 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敌人。——605—606, 652, 771—776, 785—786, 806.
- 考茨基, 卡尔(Каутский, Карл, 1854—193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是不徹底的馬克思主义者, 后来成了中派的理論家和机会主义者。——758.
- 汗斯, 爱德华(Ганс, Эдуард, 1798—1839年)——德国法学家, 黑格尔主义者, 法权的哲学学派的代表。——470.
- 刘易士, 乔治·亨利(Льюис, Джордж Генри, 1817—1878年)——英国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生理学家。——642, 749, 813—814.
- 米涅, 弗朗斯瓦·奧古斯特·馬丽(Миньо,

- Франсуа Огюст Мари, 1796—1884年)——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584—586, 590, 597, 838。
- 米哈依洛夫, 米哈依尔·拉里昂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 Михаил Ларионович, 1829—1865年)——俄国诗人和政论家, 民主主义革命家。1861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西伯利亚, 死在该处。——442。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年)——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 马克思主义的恶毒的反对者。——98, 522, 557, 567, 569, 605—607, 613—614, 618, 622—625, 631, 634, 638—639, 641—654, 666—668, 670, 686, 688, 703, 705, 707, 742—744, 746, 750—765, 773—781, 784—787, 791, 796, 807, 810—817, 821—825, 828, 830—837, 839—842, 844—852, 858—859, 862。
- 米哈依尔, 弗多洛维奇·罗曼诺夫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 1613—1645年)——俄国沙皇。——449—450。
- 色诺芬 (Ксенофонт, 约公元前430—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720, 743, 763。
- 吉贝尔特, 诺维根特修道院院长 (Гиберт, 1053年至约1124年)——法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78, 717。
- 吉荷米洛夫, 列夫·亚历山大洛维奇 (Тихомиров, 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年)——七十年代的土地与自由党人, “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从八十年代末起成为叛徒, 反动分子。——98, 131, 135, 138—143, 169—172, 176, 178—180, 188, 190—203, 205—212, 214—227, 229, 231—232, 234, 236, 238—240, 244—245, 250, 252—254, 268, 270, 274, 276, 308—312, 316—318, 322—340, 343, 345, 349—354, 356, 358—370, 372, 374—375, 378, 380, 382—383, 385, 387, 390, 406—409, 421—428, 430—431, 434, 436—446, 448—454, 458—459, 460, 463—465。
- 年长的卡通, 马尔克·波尔茨 (Катон Старший, Марк Порций, 公元前234—149年)——古罗马的政治活动家及作家。——701。

七 画

克拉夫琴斯基, 雪·米·(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 М.)——见斯切普尼亚克—克拉夫琴斯基条。

克里文科, 塞尔盖·尼古拉也维奇 (Кривенко, 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7—1907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784, 791—793, 796, 806—809, 819。

克里盖, 海尔曼 (Криге, Герман, 1820—1850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魏特林格的拥护者, “正直人同盟”的纽约小组的组织者。——527。

克虏伯, 阿尔弗勒德 (Крупп, Альфред, 1812—1887年)——德国兵工厂厂主。——223。

克累洛夫, 伊万·安得烈也维奇 (Кры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1769—1844年)。——317。

克·德·(К. Т.) (塔拉索夫, 克·) (Тарасов, К.)——见鲁散诺夫, 尼·雪·条。

克里, 亨利·查理 (Кери, Генри Чарльз, 1793—1879年)——美国的庸俗经济学家。——9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米哈依尔·伊万诺维奇 (Туган-Баран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65—1919年)——俄国资

- 产阶级经济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268, 273.
- 杜林, 欧根(Дюринг, Евгений, 1833—1921年)——德国小资产阶级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对他作了无情的批评。——77, 97—98, 643, 645, 652, 821, 830—831, 837, 839.
- 杜沙特尔(Дюшатоль (Дюшатлэ), 1803—1807年)——法国新闻记者和反动的国家活动家。——88.
- 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年)。——829, 852.
- 李特雷, 爱米尔(Литтрэ, Эмиль, 1801—1881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598.
- 李奇可夫, 列昂尼德·谢明诺维奇(Личков, Леонид Семенович, 生于1855年)——俄国统计学家和政论家。——302—303, 307.
- 李佩尔特, 尤里乌斯(Липперт, Юлиус, 1839—1909年)——奥地利文化史学家和民族学家。——690.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Лист, Фридрих, 1789年—1846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立者之一。——67, 232—234, 797, 799.
- 李嘉图, 大卫(Рикардо, Давид, 1772年—1823年)——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之一。——91—92, 486, 602—605, 720—721.
- 李维, 替特(Ливий, Тит, 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罗马历史学家。——763.
- 秀厄, 让·巴蒂斯特·安图安(Сюар, Жан Батист Антуан, 1733—1817年)——法国批评家和新闻记者, 保皇党人。——573—574, 593.
- 毕歇尔, 卡尔(Бюхер, Карл, 1847—1930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属于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555.
- 毕希纳, 乔治(Бюхнер, Георг, 1813年—1837年)——德国剧作家,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秘密的“人权会”(1834年)的创始人。——619, 707, 768.
- 毕希纳, 路得维希(Бюхнер, Людвиг, 1824年—1899年)——德国生理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569, 707.
- 亨宁, 里奥波尔德(Геннинг, Леопольд, 1791—1866年)——柏林哲学教授, 右派黑格尔主义者。——510.
- 亨利四世(Генрих IV)——法国国王(1594年—1610年)。——239.
-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年)。——146—151, 154—155, 156—162, 184—186, 217, 328, 388, 391, 442, 638, 741.
-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Гильдебранд, Бруно, 1812—1878年)——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216.
- 希尔奥姆, 詹姆斯(Гильом, Джемс, 1844年—1917年)——瑞士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秘密“协会”的领导人之一。——369.
- 貝克莱, 乔治(Беркли, Джордж, 1684—1753年)——英国主教, 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542, 561, 570.
- 貝尔涅, 卡尔·路得维希(Берне, Карл Людвиг, 1786—1837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 《巴黎书信》的作者。——821.
- 里希留, 阿尔曼·让(Ришелье, Арман Жан,

- 1585—1642年)——卓越的法国国事活动家, 红衣主教。——227.
- 里連恩費尔德, 巴維尔·費多羅維奇 (Лилленфельд, Павел Федорович, 1829年—1903年)——俄国社会学家; 所謂有机学派的追隨者。——851.
- 里尔, 阿洛伊士 (Риль, Алоис, 1844年—1925年)——德国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538, 544.
- 狄德罗, 德尼 (Дидро, Дени, 1713—1784年)。——653, 739.
- 坎南, 乔治 (Коннан, Джордж, 1845年—1924年)——美国新聞記者和旅行家。——453.
- 伯恩施坦, 埃杜阿尔特 (Бернштейн, Эдуард, 1850—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极端机会主义一翼的領袖, 修正主义的理論家。——85.
- 伯利哥, 沙利 (Порико, Шарль)。——229.
- 別林斯基, 維薩里昂·格里哥里也維奇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年)。——100, 127, 422, 442, 505, 509—510, 526, 643, 813, 817—818, 824.
- 別尔托夫, 恩·(Бельтов, Н.) (普列汉諾夫的笔名)。——98, 545, 568, 824—830, 832—844, 847—853, 855, 857—861.
- 別里亞也夫, 伊万·德米特里也維奇 (Беляев,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0—1873年)——俄国历史学家, 斯拉夫主义者, 莫斯科大学教授。——358.
- 別列佐夫斯基, 安东·約瑟伏維奇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Антон Иосифович, 1847年生)——波兰革命家, 1867年在巴黎对亚历山大二世行刺未遂。——384.
- 別佐布拉佐夫, 弗拉基米尔·巴夫洛維奇 (Безобразов, 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1828年—1889年)——德国地理学家和經濟学家, 自由主义者。——268—269.
- 別基奧, 哲則貝 (Пеккио, Джузеппе, 1785年—1835年)——意大利的法学家和經濟学家。——720.
- 別舍尔, 奧斯卡尔 (Пешель, Оскар, 1826—1875年)——德国地理学家, 理論民族学家和政論家。——699, 702—703, 715, 757.
- 苏格拉底 (Сократ, 公元前469—399年)。——500, 814.
- 苏杰依金 (Судейкин)——宪兵上校, 1883年依照“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被暗杀。——452.
- 苏福克拉斯 (Софокл, 約公元前497—406年)——古希腊戏剧作家。——496, 725.
- 麦耶, 摩里茨 (Мейер, Мориц)。——230.
- 麦耶, 魯多尔夫·赫尔曼 (Мейер, Рудольф Герман, 1839—1899年)——德国經濟学家, 与罗伯图斯通信的人。——214.
- 沙培尔, 卡尔 (Шаппер, Карл, 約1812—1870年)——德国社会主义者, “正直人同盟”的創始人之一。在1850年是“共产主义同盟”的“左派”領袖之一。——234—237.
- 沙托布里安, 弗朗斯瓦·倫涅 (Шатобриан, Франсуа Рене, 1768—1848年)——法国作家, 反动的浪漫主义者的首腦。——739.
- 沃龙佐夫, 瓦西里·巴夫洛維奇 (Воронцо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47—1918年)——笔名伏·伏·——俄国經濟学家和政論家, 十九世紀八十——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論家之一。——131, 217—218, 223—224, 241—242, 244—247, 266, 271, 273—274, 276, 309, 336, 370, 384, 393, 575, 607—608, 638, 710,

783—784, 856, 858, 861.

八 画

波旁(Бурбоны)——1589—1792年, 1814—1815年, 1815—1830年统治法国的王朝。——616.

波列伏依, 尼古拉·阿列克塞也维奇(Полевой,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796—1846年)——俄国新闻记者, 作家和历史学家, 二十—三十年代俄国最初资产阶级理论家之一, 后来成了反动分子。——777.

波斯特, 阿尔贝尔特·赫尔曼(Пост, Альберт Герман, 1839—1895年)——德国理论民族学家和法学家。——701—702.

波斯特尼科夫,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Постн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1844—1908年)——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 俄国南部农民经济和公社的研究者。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研究了波斯特尼科夫的统计资料。——856.

波尔茨格, 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Борнг, Иоганн-Карл-Фридрих, 1801年—1854年)——德国大资本家。——223.

波列莎也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Полежа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4—1838年)——俄国诗人, 因《沙斯卡》讽刺诗反对警察农奴制度而被迫当兵。——441.

波里比(Полибий, 约公元前201—12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763.

波里亚科夫, 斯·斯·(Поляков, С. С., 1837—1888年)——俄国资本家, 因铁道的租让而获得巨利。——243.

波戈金, 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Погодин,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00—1875年)——

俄国反动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贵族帝制的理论家。——828.

庞培, 格涅依(Помпей, Гней, 公元前106—48年)——罗马大将。——506.

拉辛, 斯捷潘·季摩费也维奇(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死于1671年)——顿河区哥萨克, 十七世纪俄国最大的反封建的人民起义的领袖。——51, 164—165, 369—370.

拉辛, 让(Расин, Жан, 1639—1699年)——法国戏曲作家, 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733.

拉采尔, 弗里德里希(Рацель, Фридрих, 1844—1904年)——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 反动的所谓人本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555, 681.

拉普拉斯, 比埃尔·西蒙(Лаплас, Пьер Симон, 1749—1827年)——卓越的法国天文学家,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812.

拉薩尔, 斐迪南(Лассаль, Фердинанд, 1825—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的活跃家, 支持俾斯麦的政策, 并与他有秘密的勾结。——74, 83, 112—113, 135, 173, 382, 398, 462, 470, 636, 638, 690.

拉斯维茨, 库尔特(Лассвиц, Курт, 1848—1910年)——德国小说作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538.

拉吉舍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Радищ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749—1802年)。——441.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笔名米尔托夫(Миртов)(1823—1900年)——民粹主义的著名理论家之一, 社会学中主观主义学派的代表, 《历史信札》的作者。——97, 119—131, 133, 135—136, 188, 193—194, 225, 318—321, 323, 328, 335, 337, 340—342,

- 379, 406.
- 拉馬克, 讓·巴蒂斯特(Ламарк, Жан Батист, 1744—1829年)——著名的法国自然科学家, 进化論者, 达尔文的先驅。——724, 767.
- 拉莫特·列·外叶, 弗朗斯瓦(Ламот ле Байе, Франсуа, 1588—1672年)——法国哲学家—怀疑論者, 神学教条和經院式的“絕對真理”的反对者。——578.
- 彼得罗夫斯卡娅, 索菲娅·里沃夫娜(Петровская, Софья Львовна, 1853—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 “民意党”的著名女活动家; 积极参加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464.
- 彼得尔斯(Петерс)——德国建筑工程师, 与罗伯特斯通信的人。——376.
- 彼得一世(Петр I)——俄国沙皇(1682—1721年), 全俄罗斯皇帝(1721年—1725年)。——277, 429, 440, 441, 446, 455—457, 459—460.
- 彼得三世(Петр III)——俄国皇帝(1761年—1762年)。——448—450.
- 彼得拉舍夫斯基(布塔舍維奇), 米哈依尔·瓦西里也維奇(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Буташевич],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1—1866年)——十九世紀中叶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政治小集团“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領袖(1848年)。——422.
- 征服者威廉一世(Вильгельм I Завоеватель)——英国国王(1066—1087年), 曾是諾曼底公爵, 征服了英国。——589.
- 罗舍(Рошэ)——絲带生产中水磨机的发明家。——259, 260.
- 罗伯斯庇尔, 馬克西米利安(Робеспьер, Максимилиан, 1758—1794年)——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活动家, 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政府的首脑。——446.
- 罗伯特斯—雅格佐夫, 卡尔·約翰(Робертус-Ягецов, Карл Иоганн, 1805—1875年)——德国庸俗經濟学家, 反动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理論家。——74, 90, 91, 94, 173, 214, 220, 223, 371, 376, 618, 701.
- 罗杰斯, 詹姆士·爱德华·托罗德(Роджерс, Джеймс Эдвин Торолд, 1823—1896年)——英国自由主义傾向的资产阶级經濟学家和历史学家。——88.
- 若累斯, 讓(Жорес, Жан, 1859—1914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法国历史学家; 反对战争和軍国主义的积极战士。——56.
- 茂勒, 乔治·路得維希(Маурер, Георг Людвиг, 1790—1872年)——德国历史学家, 古代和中世紀德国社会制度的研究者。——562.
- 范—德—海文, 約翰(Ван-дер-Гевен, Иоганн, 1801—1868年)——荷兰自然科学家。——623.
- 孟德斯鳩, 沙利·路易(Монтескье, Шарль Луи, 1689—1755年)——法国启蒙运动者和社会学家。——485, 557, 596, 766, 810.
- 孟德尔遜, 摩依塞(Мендельсон, Моисей, 1729—1786年)——德国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470.
- 孟采尔, 伏尔夫甘(Менцель, Вольфганг, 1798—1873年)——德国批評家和作家, 曾批評过歌德。——505.
- 居維叶, 若尔日(Кювье, Жорж, 1769—1832年)——卓越的法国自然科学家, 比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創造者, 反动的灾变論的发明者。——432, 425, 426, 431.

- 居斯丁, 阿多尔夫 (Кюстин, Адольф, 1790—1857年)——法国旅行家和文学家。——442。
- 居友, 讓·瑪麗 (Гюйо, Жан Мари, 1854—1888年)——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唯心主义者。——740。
- 舍利加 (Шелига)——見茨赫林斯基, 弗兰茨。
- 舍夫琴柯, 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維奇 (Шевченко,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4—1861年)。——441。
- 雨果, 維克多 (Гюго, Виктор, 1802—1885年)。——733。
- 雨巴尔, 尼科里亚·古斯塔夫 (Гюббар, Николая Густав, 1828—1888年)——法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598。
- 法南, 亨利·瓦尔柯特 (Фэрнэм, Генри Уолькот, 1853—1933年)。——228。
-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維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年—1852年)。——476。
- 林頓, 威廉·詹姆士 (Линтон, Вильям Джемс, 1812—1897年)——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新聞記者。——143, 144。
- 林克, 亨利·約翰 (Ринк, Хинрик Йохан, 1819—1893年)——丹麦民族学家, 旅行家, 格陵兰的研究者。——695, 700。
- 杰里雅諾夫, 伊万·达維多維奇 (Делянов, Иван Давидович, 1818—1897年)——1882—1897年的俄国国民教育部部长。——443。
- 杰明切也夫, 叶夫斯塔斐·米哈依洛維奇 (Дементьев, Евстаф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0—1918年)——俄国的医生, 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工厂, 它给予人民什么和它从人民那里拿走什么》(1893年)一書的作者。——853, 854, 855。
- 季諾維也夫, 普·(Зиновьев, П.)——俄国地方自治局統計員。——304。
- 季摩列昂特 (Тимолонт, 約公元前411—336年)——哥林斯的統帥和困事活动家, 憎恨暴政者。——552。
- 季米里亚捷夫, 德米特里·阿尔卡吉也維奇 (Тимирязев, Дмитрий Аркадьевич, 1837—1903年)——俄国統計学家, 从事于俄国农业經濟和家庭手工业状况的研究。——247。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維尔·波里索維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年)——“劳动解放”社的創始人之一, 后来是孟什維克。——127。
- 阿克薩柯夫, 伊万·塞尔盖也維奇 (Аксако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23—1886年)——俄国政論家, 斯拉夫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169—171, 216, 458。
- 阿德勒, 維克多 (Адлер, Виктор, 1852—1918年)——改良主义者,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領袖之一。——558。
- 阿德勒, 乔治 (Адлер, Георг, 1863—1908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526, 558。
- 阿那克薩哥拉 (Анаксагор, 約公元前500年—428年)——古希腊哲学家。——488, 489。
- 阿里斯托夫, 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 (Аристов, 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1834年—1882年)——俄国历史学家。他把分裂看成是人民运动。——185。
- 阿里斯托芬 (Аристофан, 約公元前446—385年)——古希腊的戏剧作家, 政治主题的諷刺喜劇的作者。——504。
- 阿尔諾, 弗朗斯瓦 (Арно, Франсуа, 1721—1784年)——法国作家和政論家, 法国科学院院士。——592。

- 阿尔努, 阿尔图尔 (Арну, Аргур, 1833—1895年)——法国政治家, 作家, 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326, 367.
- 阿基米德 (Архимед, 约公元前287—212年)。——683, 684, 685.
- 阿尔赫特·塔伦茨基 (Архит Тарентский, 约公元前440—360年)——希腊哲学家, 毕达哥拉斯主义唯心主义者, 学者和国事活动家。——684.
- 阿斯塔夫也夫, 彼得·埃夫根尼也维奇 (Астафьев, Петр Евгеньевич, 1846—1893年)——莫斯科大学讲师, 唯心主义哲学家。——562.
- 阿芬巴赫, 雅克 (Оффенбах, Жак, 1819—1880年)——法国作曲家, 法国古典滑稽歌剧的巨匠。——653.
- 陀思妥也夫斯基, 弗多尔·米哈依洛维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1—1881年)。——442.
- 刻奥普斯 (Хеопс, 公元前3000年)——古代埃及的法老。——211.
- 易卜生, 亨利克 (Ибсен, Генрик, 1828—1906年)——挪威戏剧作家, 挪威民族文学的經典作家。——760.
- 欧几里得 (Эвклид, 公元前三世纪)——古代世界的伟大的数学家。——143, 165.
- 采勒, 埃杜阿尔特 (Целлер, Эдуард, 1814—1908年)——德国古代哲学史家。——518.
- 帕烏卢斯, 亨利·爱伯尔哈尔德·哥特里布 (Паулус, Генрих-Эбергард-Готлиб, 1761—1851年)——新教的神学者。——514.
- 洛克, 约翰 (Локк, Джон, 1632—1704年)。——571, 591, 653, 713, 730, 731.
- 洛兰, 弗朗斯瓦 (Лоран, Франсуа, 1810—1887年)——比利时法学家和历史学家。——78.
- 柏拉图 (Платон, 公元前427—347年)。——647, 684, 720.
- 柯罗爱依, 爱德华·朱理 (Коррауе, Эдуард Жюль, 1837—1904年)——法国建筑工程师和作家, 关于建筑史的许多著作的作者。——740.
- 柯斯梯里科夫, 依·恩· (Костыльков, И. Н.)——家庭手工业者—发明家。——262.
- 柯布登, 理查德 (Кобден, Ричард, 1804—1865年)——英国工厂主, 自由貿易的拥护者, “反谷物条例斗争同盟”的发起人。——67, 78—79.
- 柯瓦列夫斯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年)——俄国学者, 法学家,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292, 359, 696—698, 700, 703, 708.
- 柯亨, 赫尔曼 (Коген, Герман, 1842—1918年)——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538.
- 柯罗鲍夫斯基, 雅科夫·尼古拉也维奇 (Колубовский, Яков Николаевич, 生于1863年)——历史学家和俄国哲学的图书学家。——502.
- 柯尔柏, 讓·巴蒂斯特 (Кольбер, Жан Батист, 1619—1683年)——法国国事活动家, 为巩固绝对帝制的利益, 曾执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67, 227, 228.
- 兹拉托弗拉茨基,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Златоврат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5—1911年)——俄国民粹主义

九画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I)——俄国皇帝(1796—1801年)。——448—450.

- 作家。——280—282, 289, 310。
- 屋大維, 馬尔克(Октавий, Марк, 第二世紀)——羅馬护民官, 曾反对提庇略·格拉古的土地法。——506。
- 欧文, 罗伯特(Оуэн, Роберт, 1771—1858年)。——558, 595。
- 威尔逊, 丹尼也里(Вильсон, Даниель, 1816—1892年)——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677。
- 哈尔維, 威廉(Гарвой, Уильям, 1578年—1657年)——卓越的英国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 发现了血液循环。——632。
- 哈克斯特豪生, 奥古斯特(Гакстгаузен, Август, 1792—1866年)——反动的普鲁士官僚, 叙述俄国公社制度残余的一些著作的作者。——149, 154, 155, 161, 280。
- 哈里茲門諾夫, 塞尔盖·安德烈也維奇(Харизоменов, Серг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4—1917年)——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 农业統計的許多著作的作者。——856。
-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利斯托夫(Шлоссер, Фридрих Кристоф, 1776—1861年)——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431。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Штраус, Давид Фридрих, 1808—1874年)——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著名的左派黑格尔分子之一, 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470, 512, 515, 517—520。
- 施米特, 康拉德(Шмидт, Конрад, 1863—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修正主义者, 新康德主义者。——539—541。
- 施塔姆勒, 魯多尔夫(Штаммлер, Рудольф, 1856—1938年)——德国法学家和新康德主义哲学家。——547。

- 查苏利奇, 薇拉·伊万諾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年)——革命的民粹主义者, 后来是社会民主党党员, 参加了“劳动解放”社組織,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維克。——211, 319。
- 查达也夫, 彼得·雅柯夫列維奇(Чадаев, 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1794—1856年)——俄国启蒙运动者和唯心主义哲学家。——174。
- 查坦姆(Чатам), 伯爵——見皮德, 威廉(年长的)条。
- 茨赫林斯基, 弗兰茨(施利格)(Цыхлинский, Франц [Шелига], 1816—1900年)——青年黑格尔派, 鲍威尔的期刊的撰稿人。——744, 762。

十 画

- 馬布利, 加布里埃尔·博諾·德(Мабли, Габриель Бонно де, 1709—1785年)——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240。
- 馬格尼茨基, 米哈依尔·里昂蒂也維奇(Магницкий, 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1778—1855年)——卡贊学区督学, 极端反动派和宗教的反动分子。——443。
- 馬克林南, 約翰·弗尔古生(Мак-Леннан, Джон Фергюсон, 1827—1881年)——苏格兰的法学家, 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者。——689, 690。
- 馬隆, 本努亞(Малон, Бенуа, 1841—1893年)——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曾加入第一国际, 后来领导了法国工人党的右翼和可能主义者的組織。——80。
-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Мальтус, Томас Роберт, 1766—1834年)——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仇視人类的人口理論的宣揚者。——596, 60—605。

- 馬勒, 克勞德·弗朗斯瓦 (Малэ, Клод Франсуа, 1754—1812年)——法国將軍, 曾組織反对拿破仑的陰謀未成功。——347—348.
- 馬克思, 卡尔 (Маркс, Карл, 1818—1883年)。——頁碼略。
- 馬尔采尔, 馬尔克·克拉夫吉 (Марцелл, Марк Клавдий, 約公元前270—208年)——羅馬大將。——684.
- 馬尔茨烏斯, 卡尔·弗里德里希·菲利浦 (Марциус, Карл Фридрих Филипп, 1798—1868年)——德國自然科學家和旅行家。——680, 699.
- 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 (Наполеон I, Бонапарт)——法国皇帝(1804—1814年和1815年)。——229, 346.
-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 (Наполеон III (Луи Бонапарт))——法国皇帝(1852年—1870年)。——344, 562, 724, 750.
- 哥尔登柏格, 格里哥里·大卫多維奇 (Гольденберг, Григорий Давидович, 死于1880年)——民意派, 許多恐怖活動的參加者。——393.
- 哥白尼, 尼古拉 (Коперник, Николай, 1473年—1543年)。——706, 743.
- 庫靜, 維克多尔 (Кузен, Виктор, 1792—1867年)——法国唯心主义哲學家, 折衷主义者。——777.
- 庫諾夫, 亨利希 (Кунов, Генрих, 1862—1936年)——原始社會史的一些著作的作者, 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修正主义的理論家之一。——554.
- 庫德林, 恩·(Кудрин, Н.)——見魯散諾夫, 尼·雪·条。
- 格列奇,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 (Греч,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87—1867年)——俄国反動的新聞記者和作家。——442, 443, 447, 454, 463, 825.
- 格里戈里也夫, 瓦西里·尼古拉也維奇 (Григорьев,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2—1925年)——地方自治會的統計家, 民粹派傾向的經濟學家和社会活動家。——282.
- 格里姆, 弗里德里希·米爾赫奧爾 (Гримм, Фридрих Мельхисор, 1723—1807年)——文學家, 外交家, 百科全書派小組的成員, 《文學通信》的出版者。——575, 592.
- 格羅塞, 愛爾恩斯特 (Гроссе, Эрнст, 1862—1927年)——德國資產階級的社会學家, 理論民族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庸俗的經濟唯物主义的擁護者。——555.
- 格律恩, 卡尔 (Грюн, Карл, 1817—1887年)——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論家之一。——112, 526, 527, 528, 558, 800.
- 高尔塞, 亨利 (Горсе, Анри), 笔名达莫特, 克勞德—馬利—亨利 (Дамета, Клод-Мари-Анри, 1812—1884年)——法国政論家, 政治經濟學教授, 傅立叶主义者。——595.
- 高德温, 威震 (Годвин, Вильям, 1756年—1836年)——英國小資產階級作家, 政論家和文學史家, 无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596.
- 高尔凡尼, 路易治 (Гальвани, Луиджи, 1737—1798年)——意大利生理學家和解剖學家, 曾發現流電現象。——667.
- 索別斯基, 揚 (Собесский, Ян)——波蘭國王(1674—1696年)。——448.
- 索柯洛夫, 尼古拉·馬特維也維奇 (Соколов, Николай Матвеевич, 1860年生)——詩人, 批評家和康德、叔本華和其他人的哲學著作的翻譯者。——548.

- 海格尔, 路得維希 (Гейгер, Людвиг, 1848年—1919年)——德国历史学家, 歌德的研究者和出版者。——682.
- 海涅, 亨利 (Гейне, Генрих, 1797—1856年)。——99, 504—505, 510.
- 海因涅, 馬克斯 (Гейнце, Макс, 1845年—1909年)——德国哲学教授, 二元論者。——502, 522, 561, 827.
- 海村, 卡尔 (Гейнцен, Карл, 1809—1880年)——德国激进派的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779—781, 791, 797.
- 海克尔, 爱尔恩斯特 (Геккель, Эрнст, 1834年—1919年)——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 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拥护者。——643, 752, 851.
- 海姆, 魯多尔夫 (Гайм, Рудольф, 1821—1901年)——德国文学史和哲学史家, 实证主义者。——69.
- 特卡乔夫, 彼得·尼克基奇 (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6年)——著名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 以一小撮阴谋者夺取政权的主张者。——61, 131, 165, 175—176, 178—181, 183—185, 187—188, 193—196, 198, 204, 209, 324—328, 334—338, 340, 349—350, 367—369, 378—379, 382, 388, 407.
- 殷納馬—斯特恩涅格, 卡尔·切奥多尔 (Инама-Штэрнег, Карл Теодор, 1843—1908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711—712.
-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Энгельс, Фридрих, 1820—1895年)。——頁碼略。
- 栖罗姆亚特尼柯夫, 姆·普·(Сыромятников, М. П.)——俄国统计学家。——251.
- 莎士比亚, 威廉 (Шекспир, Вильям, 1564—1616年)。——630.
- 勒卢阿—波里埃, 比埃尔·坡尔 (Лоруа-Болье, Пьер Поль, 1843—1916年)——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91.
- 泰恩, 伊波里特 (Тэн, Ипполит, 1828—1893年)——法国文学研究家, 艺术研究家,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725—727.
- 烏斯宾斯基, 格列布·伊万諾維奇 (Успенс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43—1902年)。——170, 171, 277, 399, 459, 546, 675, 760, 795, 812, 835.
- 夏波夫, 阿芳納西·普罗科夫也維奇 (Щапов, Афанасий Прокофьевич, 1830—1876年)——俄国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 俄国历史过程的公社—联盟概念的拥护者。——185, 442.
- 热里亚波夫, 安得烈·伊万諾維奇 (Желябов,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881年)——卓越的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 “民意”組織的发起人。——52, 53, 393, 409, 464.
- 桑巴特, 維尔涅尔 (Зомбарт, Вернер, 1863年—1941年)——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国家主义者和“种族理論”的宣扬者。——273.
- 爱迪生, 托馬斯·阿尔瓦 (Эдисон, Томас Алва, 1847—1931年)——卓越的美国发明家。——683—684.
- 爱森哈特, 雨果 (Эйзенгарт, Гуго, 1811—1893年)——德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保护关税的拥护者。——232.
- 爱夫多克斯·克尼茨基 (Эвдокс Книдский, 約公元前408—355年)——古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684.
- 阿尔維修, 克勞德·阿德里安 (Гельвеций, Клод Адриан, 1715—1771年)。——564—566, 570, 572, 575, 579, 591, 594, 596, 613, 620, 626, 627, 628, 679, 722, 730, 747, 768.

- 爱赫特尔迈尔, 泰奥多尔 (Элтермейер, Теодор, 1805—1844年)——德国作家, 左派黑格尔分子, 同阿·卢格在一起创办了《关于德国科学与艺术问题的高卢年鉴》杂志。——510。
- 爱里斯曼, 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Эрисман,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842—1915年)——医生—卫生学家, 学校和职业卫生的研究者。——248—250, 261。
- 爱尔杰尔,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Эртель,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55—1908年)——俄国作家, 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表明了地主经济的分化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383。
- 爱修拉斯 (Эсхил, 公元前525—456年)——古希腊的诗人—悲剧家, “悲剧之父”。——496, 725。
- 爱非斯的赫拉克里特 (Гераклит Эфесский, 约公元前530—470年)。——666。
- 席勒, 约翰·弗里德里希 (Шиллер, Иоганн Фридрих, 1759—1805年)。——55, 550。
- ### 十一画
- 康西德兰, 维克多 (Консидеран, Виктор, 1808—189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595。
- 康普豪生, 鲁多尔夫 (Кампгаузен, Лудольф, 1803—1890年)——普鲁士资产阶级国家活动家, 1848年普鲁士首相。——511。
- 康德, 伊曼努尔 (Кант, Иммануил, 1724—1804年)。——57, 70, 184, 478, 499, 504, 531—535, 537—542, 548—552, 558—563, 571, 576, 636, 637, 654, 722, 723, 732, 842, 844, 845。
- 俾斯麦, 奥托 (Бисмарк, Отто, 1815—1898年)——“铁血宰相”, 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230。
- 莱蒙托夫, 米哈依尔·尤里叶维奇 (Лермонт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1814—1841年)。——441。
- 莱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 (Лессинг, Готхольд Эфраим, 1729—1781年)——德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活动家, 批评家, 政论家, 戏曲作家。——470, 514。
- 莱布尼茨, 哥特弗利德·威廉 (Лейбниц, Готфрид Вильгельм, 1646—1716年)——著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523, 657, 658。
- 莱伊尔, 查理 (Ляйель, Чарльз, 1797—1875年)——英国大地质学家, 进化地质学的创始人。——631。
- 莱克留, 让·雅克, 爱丽查 (Реклю, Жан Жак, Элизе, 1830—1905年)——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 1871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710, 811。
- 莱纳尔, 吉约姆·托马·弗朗斯瓦 (Рейналь, Гийом Тома Франсуа, 1713—1796年)——法国历史学家, 接近于百科全书派。——650。
- 莱因凯, 约翰 (Рейнке, Иоганнес, 1849—1931年)——德国植物学家。——537, 538, 551。
- 菲里波夫,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 (Филлип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38—1903年)——文学家, 有一个时候曾依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 《科学评论》杂志编辑。——666, 667。
- 密勒, 约翰·斯图亚特 (Милль, Джон Стюарт, 1806—1873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哲学中实证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 或译为穆勒。——147, 596,

- 606, 720, 743, 777, 843.
- 屠尔哥, 安·罗伯尔·雅克(Тюрго, Ан Робер Жак, 1727—1781年)——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和国事活动家。——67, 228, 431.
-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Ланге, Фридрих Альберт, 1828—1875年)——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84, 503, 533, 534, 594, 846, 847.
- 培根, 弗兰西斯(Бэкон, Франсис, 1561—1626年)。——653.
- 基诺, 菲利普(Кино, Филипп, 1635—1688年)——法国诗人和戏曲作家。——733.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Гизо, Франсуа Пьер Гийом, 1787—1874年)——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562, 582, 583, 586—588, 590, 597, 710, 838.
- 捷尔沙文, 加弗里尔·罗曼诺维奇(Державин, Гавриил Романович, 1743—1816年)。——317.
- 梯叶里, 奥古斯丁(Тьерри, Огюстен, 1795—1856年)——著名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78, 562, 584—586, 588—590, 596, 597, 838.
- 梅林, 弗兰兹(Меринг, Франц, 1846年—1919年)——德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 “斯巴达克”团的团员, 文学研究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学家。——503, 511, 526, 527.
- 梅契尼柯夫, 列夫·伊里奇(Мечников, Лев Ильич, 1838—1888年)——俄国地理学家和政论家, 社会学中的地理学派的拥护者。——486, 562, 710, 811.
- 梅歇尔斯基,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Мещер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1839—1914年)——保守主义的政论家和作家, 极端保皇主义者。——742, 844.

笛卡儿, 勒内(Декарт, Рене, 1596—1650年)。——544, 571, 636, 653.

十二画

- 富兰克林, 本杰明(Франклин, Бенжамин, 1706—1790年)——著名的美国政治活动家, 作家, 学者和哲学家, 参加过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676.
- 普加乔夫, 叶梅里扬·伊万诺维奇(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约1742—1775年)——俄国十八世纪反封建的最大的——次农民起义的领袖。——164, 166.
- 普赫特, 乔治·弗里德里希(Пухта, Георг Фридрих, 1798—1846年)——德国法学家, 教授, 反动的法律历史学派的代表。——693, 694, 695, 698.
- 普希金, 亚历山大·塞尔格也维奇(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年)。——441, 456, 823, 824, 834.
- 普鲁加文, 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Пругавин, Виктор Степанович, 1858—1896年)——俄国经济学家, 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学家, 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254—256, 260—265, 276, 285, 296, 298, 304, 305, 373, 618.
- 普卢塔克(Плутарх, 约46—126年)——古希腊的作家——道德学者, 卓越的希腊和罗马的活动家们的传记的作者。——568, 836—685, 720.
- 普拉夫特, 基特·马克崔(Плавт, Тит Макций, 约公元前254—184年)——罗马诗人。——849.
- 普利斯特莱, 约瑟夫(Пристли, Джозеф, 1733—1804年)——卓越的英国化学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 533, 535, 548.
- 普萊斯, 里查德(Прайс, Ричард, 1723—1791年)——英國經濟學家和政論家。——535, 548.
- 普林斯—斯密, 約翰(Принс-Смит, Джон, 1809—1874年)——經濟學家, 德國自由貿易派的創始人之一。——91.
-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塞也維奇(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1—1878年)。——451.
- 涅恰也夫, 塞爾格·根納吉也維奇(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年)——俄國革命家—陰謀家、恐怖分子。——132, 180, 181.
- 塔拉索夫, 克·(Тарасов, К.)——見魯散諾夫, 尼·雪·索。
- 傅立叶, 沙利(Фурье, Шарль, 1772—1837年)。——369, 370, 487, 558, 595, 612, 614, 617, 618.
- 凱撒, 蓋·尤利(Цезарь, Гай Юлий, 公元前100—44年)——羅馬皇帝, 著名的統帥和國事活動家。——450, 500, 506, 766.
- 黑格爾,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Гегель, Георг Вильгельм Фридрих, 1770—1831年)。——69—72, 87, 97, 98, 172, 184, 185, 195, 209, 426, 429, 430, 470—489, 491—501, 504—510, 522, 523, 534, 535, 546, 549, 550, 552, 559, 560, 563, 575, 581, 594, 610, 628, 630, 632, 633—640, 641—652, 655, 656, 662, 663, 665—668, 669, 672, 673, 676, 680, 696, 704, 705, 710, 711, 714, 732, 739, 742, 748, 771, 775, 776, 810, 811—816, 826—833, 839—846.
- 斯達克, 卡爾·尼古拉(Шгарке, Карл Николай, 1858—1926年)——丹麥哲學家和社会學家。——503.
- 斯坦因, 洛倫茨(Штейн, Лоренц, 1815—1890年)——德國法學家和經濟學家, “社會帝國”的擁護者。——84, 527.
- 斯坦寧, 卡爾·封·登(Штейнен, Карл фон дер, 1855—1929年)——卓越的旅行家和民族學家。——555.
- 斯巴達克(Спартак, 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最大一次奴隸起義(公元前74—71年)的領袖。——685.
- 斯密, 亞當(Смит, Адам, 1723—1790年)——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代表之一。——309, 472, 604, 720.
- 斯密·普林斯(Смит Принс)——見普林斯—斯密條。
- 斯巴塞維奇, 弗拉基米爾·但尼洛維奇(Спасович, Владимир Данилович, 1829—1906年)——俄國法學家, 自由主義者。——633, 634.
- 斯賓塞, 赫伯特(Спенсер, Герберт, 1820—1903年)——英國實證主義哲學家, 社會學中所謂有機派的首腦。——135, 522, 621, 641, 690, 848, 849, 850.
- 斯賓諾莎, 巴魯赫(別涅狄克特)(Спиноза, Барух(Венедикт), 1632—1677年)。——122, 470, 515, 543, 653, 657.
- 斯切普尼亞克-克拉夫泰斯基, 塞爾格·米哈依洛維奇(Сто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年)——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義者, 土地與自由黨人, 作家。——111.
- 斯特朗寧, 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Стро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27—1889年)——俄國作家和政論家。——849.
- 斯圖德尼茨, 阿爾圖·羅伯特(Штудниц, Аргур Роберт, 1851年生)。——79.
- 斯圖根伯爾格, 伊萬·費多洛維奇(Штукенберг,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8—1856

- 年)——俄国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257, 258.
- 斯克沃尔佐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Скворц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48—1914年)——俄国农学家和经济学家。——855.
- 斯维亚托斯拉夫 (Святослав, 约945—972年)——基辅大公。——200.
- 斯卡里柯夫斯基, 康斯坦丁·阿波隆诺维奇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поллонович, 1843年生)——俄国作家和采矿工业方面的行政家。——247.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Фейербах, Людвиг, 1804—1872年)。——218, 470, 471, 502—504, 522, 523, 543, 669, 755, 815, 837, 861.
- 费尔巴哈, 安瑟伦 (Фейербах, Ансельм, 1775—1833年)——哲学家路·费尔巴哈之父, 渊博的犯罪学者。——522.
-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勃 (Фихте, Иоганн Готлиб, 1762—1814年)。——475, 552, 634, 636, 667, 668.
- 费舍, 弗里德里希·切奥多尔 (Фишер, Фридрих Теодор, 1807—1888年)——德国艺术家, 左派黑格尔分子。——470.

十三画

- 路易十一 (Людовик XI)——法国国王 (1461—1483年)。——428.
- 路易十四 (Людовик XIV)——法国国王 (1643—1715年)。——240.
- 路易十六 (Людовик XVI)——法国国王 (1774—1792年)。为国民议会判处死刑。——240.
- 路易十八 (Людовик XVIII)——法国国王 (1814—1824年)。——155, 156.
- 路易·波拿巴 (Луи Бонапарт)——见拿

破仑第三条。

- 路易·菲力普 (Луи Филипп)——1830年革命后被立的法国国王, 被1848年革命所废黜。——189, 612, 738.
- 路德, 马丁 (Лютер, Мартин, 1483—1546年)——德国的新教 (路德主义) 的创始人。——128.
- 路得希尔 (Ротшильды)——银行家一百万富翁家族。——630.
- 奥比兹, 切奥多尔 (Опитц, Теодор)——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政论家。——746.
- 奥尔洛夫,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Орл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48—1885年)——莫斯科省自治机关的统计员。奥尔洛夫著作的资料曾为马克思、列宁、普列汉诺夫所引用。——283, 284, 285, 286, 287, 289, 295, 296, 302, 308.
- 奥斯特瓦尔德, 威廉·弗里德里希 (Оствальд, Вильгельм Фридрих, 1853—1932年)——德国化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反动的马赫主义唯能论的创始人。——533.
- 奥古斯都 (Август)——罗马皇帝 (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730.
- 雅可毕, 约翰 (Якоби, Иоганн, 1805年—1877年)——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民主主义者, 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 俾斯麦的反对者。——157, 348.
- 雅科毕, 弗里德里希·亨利 (Якоби, Фридрих Генрих, 1743—1819年)——德国诗人、哲学家、歌德的朋友。——61, 552.
- 雅库什金娜, 叶里札维塔·马尔达里叶夫娜 (Якушкина, Елизавета Мардарьева, 死于1893年)——都拉省 (斯塔路亨诺村) 的女地主, 在农民中从事慈善的活动。——304.
- 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洛维奇 (Ярослав

-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加甲茨基的公爵(1152—1187年)。——610。
- 塞利格曼, 爱德文(Зелигман, Эдвин, 1861—1939年)——美国经济学家,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社会学中英、美心理学派的拥护者。——556。
- 塞克斯特-埃庇里克(Секст-Эмпирик, 第二世纪中叶)——罗马哲学家—怀疑论者。——210。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Прудон, Пьер Жозеф, 1800—1865年)——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56—60, 64, 74, 81, 191, 192, 196, 218, 219, 228, 309, 369, 370, 371, 372, 375, 599, 787。
- 詹姆斯第二(Яков II)——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1685—1688年)。由于1688—1689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而失去了王位。——584。
- 瑞欽豪生, 姆·(Риттинггаузен, М., 1814—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新莱茵报》记者。——59, 81, 157。
- 微耳和, 鲁多尔夫(Вирхов, Рудольф, 1821—1902年)——德国学者, 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755。
- 意巴密嫩达(Эпаминонд, 死于公元前362年)——希腊统帅和政治活动家。——552。
- 锡生, 尤利·埃杜阿尔多维奇(Янсон, Юлий Эдуардович, 1835—1892年)——俄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1890年第一个模范的城市调查的组织者。——284。
- 550, 628, 629, 732, 747。
- 赫尔文尼斯, 乔治·哥特弗里德(Горвинус, Георг Готфрид, 1805—1871年)——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文学史家。——744。
- 赫罗斯特拉特(Герострат)——爱非斯城的希腊人, 为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而于公元前356年焚毁了爱非斯的阿尔特米达寺院。——421。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笔名伊斯堪吉尔(Искандер, 1812—1870年)。——72, 122, 143—145, 163, 165, 168, 186, 459, 505, 506。
- 赫斯, 莫泽斯(Гесс, Моисей, 1812—1875年)——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526, 619, 799。
-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Гексли, Томас Генри, 1820—1895年)——英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848。
- 赫里奥加巴尔(Гелиогабал, 204—222年)——罗马皇帝。——576。
- 维特, 扬·得(Витт, Ян Де, 1625—1672年)——尼德兰的国事活动家, 斯宾诺莎的朋友。——552。
- 维科, 乔巴蒂斯特(Вико, Джамбаттиста, 1668—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社会发展循环论的发明者。——489, 581, 583, 720。
- 维利希, 奥古斯特(Виллих, Август, 1810—1878年)——普鲁士军官,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极左派小组的首脑。——234—237。
- 福克迪德(Фукидид, 约公元前460—395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482, 763。

十四画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Гете, Иоганн Вольфганг, 1749—1832年)。——218, 534,

福克, 尼古拉 (Фукэ, Никола, 1615—1680年)——法国国事活动家, 财政家。——227。

福克斯, 查理·詹姆斯 (Фокс, Чарльз Джемс, 1749—1806年)——英国政治活动家, 属于辉格的自由党。——584。

福里格拉夫, 卡尔 (Фолльграф, Карл)。——804, 805, 806, 808。

菲赫尔, 茹里·尤里乌斯 (Фаухер, Жюль Юлиус, 1820—1878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者。——91。

十五画

摩尔根, 路易·亨利 (Морган, Льюис Генри, 1818—1881年)——美国学者—理论民族学家、原始社会研究者。——554, 555, 686, 690, 710, 762—764。

摩罗·德·浪涅斯, 亚历山大 (Моро-де-Жоннес, Александр, 1778—1870年)——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246。

摩洛佐夫, 萨瓦·瓦西列也维奇 (Морозов, Савва, Васильевич, 1770—1862年)——工厂主, 俄国纺织工厂主王朝的创立者。——267。

摩莱蒂特, 雅科布 (Моляшотт, Якоб, 1822—1893年)——生理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569。

诺任, 尼古拉·德米特里也维奇 (Ножин,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43—1866年)——俄国六十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政论家, 生物学家。——622—624, 852。

诺维可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Новик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744—1818年)——俄国启蒙运动者, 讽刺作家, 新闻记者, 书籍出版者。——441。

鲁尼奇, 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 (Рунич, Дмитрий Павлович, 1778—1860年)——

彼得堡学区的督学, 启蒙运动的压制者。——443。

鲁散诺夫, 尼古拉·塞尔格也维奇 (Русанов,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笔名塔拉索夫, 克·, 库德林, 恩· (Терасов К., Кудрин Н., 生于1859年)——政论家, 青年时期是民意派, 后来为社会革命党, 十月革命后成为白俄流亡分子。——125, 322, 568。

十六画

鲍威尔, 布鲁诺 (Бауэр, Бруно, 1809—1882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之一。——470, 503, 512, 518—522, 669, 670—674, 743—744, 746, 762, 815。

鲍威尔, 爱德加 (Бауэр, Элгар, 1820年—1886年)——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派。——521, 522, 669—673。

鲍罗金, 尼古拉·安得列也维奇 (Бородин,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61年生)——俄国鱼类学家, 统计学家和社会活动家。——359, 856。

霍尔巴赫, 波尔·昂利 (Гольбах, Поль Анри, 1723—1789年)。——533, 534, 537, 565, 570, 571, 575, 577, 591, 620, 731, 747, 768, 811。

霍布斯, 托马斯 (Гоббс, Томас, 1588—1679年)。——713。

萨文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 (Савиньи, Фридрих Карл, 1779—1861年)——德国法学家, 反动的所谓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之一。——692—695。

萨尔梯柯夫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米哈依尔·叶夫格拉伏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笔名恩·谢德林 (Н. Щедрин, 1826—

1889年)。——123, 200, 454, 610, 666, 715.

薩伊, 讓·巴蒂斯特(Сэй, Жан Батист, 1767—1832年)——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273, 472, 473, 602, 610, 655, 743.

十七画

謝切諾夫, 伊万·米哈依洛維奇(Сечен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9—1905年)——最大的俄國自然科學家, 唯物主義生理學的奠基人。——555, 536, 560, 846, 847, 848.

謝德林(Щедрин)——見薩爾梯柯夫條。
謝夫萊, 阿里貝爾特·愛伯爾加爾德(Шеффле, Альберт Эбергард, 1831—

1903年)——德國經濟學家和社会學家, 講壇社會主義者。——82.

謝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Шеллинг, Фридрих Вильгельм, 1775—1854年)。——475, 493, 654, 656, 660, 665, 667, 685, 696, 698, 704, 705, 843—845.

十八画

魏正格倫, 保尔(Вейзонгрюн, Пауль, 1868年生)——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 最早的修正主義者之一。——686, 688.

二十二画

魏普洛維奇, 路得維希(Гумплович, Людвиг, 1833—1909年)——奧地利反动法學家和社会學家, 種族主義者。——721.

后 記

本書是根据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編五卷本《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翻譯的。本卷的文章有四篇系采用已有的中文譯本，即博古譯的《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张仲实譯的《普列汉諾夫为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俄譯本第一版所写的序言（《譯者的話》）和注释》；刘若水譯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們的意見分歧》。这四篇譯文在收入本卷时只作了少数的修改。新譯的各篇，除《緒論》是刘磊譯，《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是謝怀譯外，其余都是刘若水譯的。書中边注凡后面沒有署名或署名“格·普·”的，都是普列汉諾夫的原注。《論一元論历史观之发展》一書中文单行本中原有的一些边注，仍旧保存，但都注明了出处。

三联書店編輯部

1959年5月